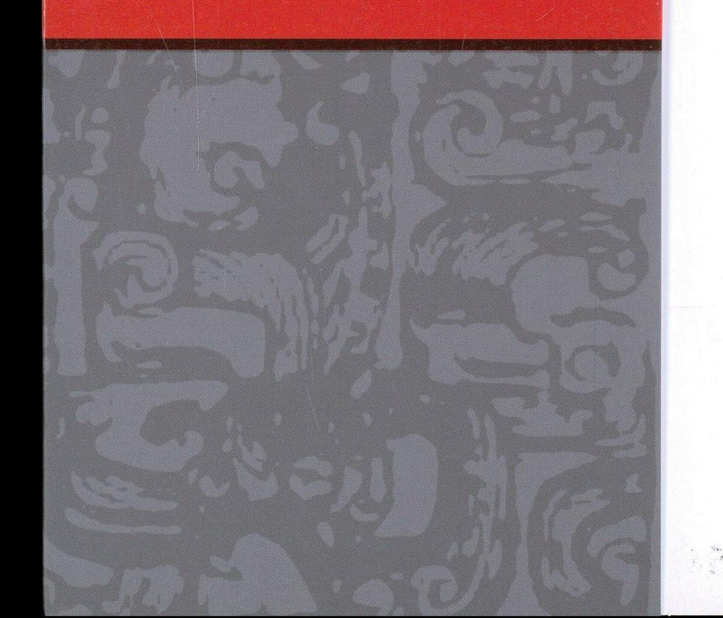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熊志庭
封面设计：吴颖辉

湖湘文丛谈
第二集
湖南省文史馆 组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81113-485-8
9 787811 134858
全套定价：160.00元





湖湘文史丛谈·第二集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长沙

《湖湘文史丛谈》

主　编　阳盛海

副主编　伏家芬　熊治祁

刘泱泱　陈书良

胡渐逵　李治湘

目　次

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人才群体

郭辉东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结构上看，它具有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三个层次。精神层面包括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士习民风等等。区域文化是特定地理背景下，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经过一代代湖湘士子的呼唤风雷和一阵阵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汇纳群流，融合中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和风格。本文着重从精神层面回顾湖湘文化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西方文化的四次大融合的历史行程，追溯湖湘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人才群体。

一、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古代湖湘文化：源于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与河南洛阳人程氏兄弟，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开其端，四川广汉人张栻在长沙兴学建学术基地，与江西婺源人朱熹在福建创立的闽学同出一门

中国内部文化的流向，宋代为止是自西北向东南，近代是自东南向西北。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之一，儒学、道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均趋日盛，也是封建国家中央专制主义达到更加完善、巩固的时期。这个时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湖南道县人周敦颐（公元 1017—1073 年）继承发展了孔子、孟子、董仲舒和韩愈以及佛学、道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创立濂溪学，成为宋明理学的创始人。河南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生卒年限分别为公元 1032—1085 年、1033—1107 年），同受业于周敦颐，并为理学奠基人。

湖湘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有胡安国、胡宏和张栻。福建崇安人胡安国，是二程的弟子，自称“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并同程门四大弟子中的谢良佐、杨时、游酢有密切的学术交往。建元之乱后，胡安国与其季子胡宏由湖北

迁入湖南，避居在衡山一带，著书立说，创建碧泉书院和文定学堂，聚徒讲学，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宁、胡宏都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尤以胡宏（公元1106—1161年，号五峰）功绩为巨。全祖望在《五峰学案》序录中认为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胡氏之学由胡宏的得意高足张栻传到长沙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使发源于衡山的湖湘学派重心转移到长沙，岳麓书院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四川广汉人张栻（公元1133—1180年，号南轩）是南宋中兴贤相张浚的长子，1161年随父到长沙并定居城南。他奉父命前往衡山拜胡宏为师，从学10年，除继承胡氏之学外，还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的学术思想，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初具系统性。

在福建，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至朱熹，朱熹14岁时父亲病逝，朱松临死时把儿子托付给胡宪、刘勉之等人帮助教养。胡宪是胡安国的侄儿，早年从胡安国学周程之学，朱熹师事最久的是胡宪，共有10多年时间。朱熹以儒学为主体而融合佛道，特别是继承了周程的理学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思维等方面的问题熔于一炉，综罗百代，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创立程朱理学，或称朱子学、闽学。

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在《真文忠公读书记》中曾说过：二程之学，杨时得之而南传之罗从彦，罗氏传之李侗，李氏传之朱熹，此一派也。谢良佐传之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张栻，此又一派也。

1167年8月，朱熹行程三千里，抵达岳麓书院访问张栻，在湖南停留两个月，朱张会讲被学术史传为佳话。张栻英年早逝后，湖湘学子又多从学于朱熹。1194年，朱熹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再次到长沙，此行影响最大的事是重建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经朱熹重建，发展甚快，学子达千人之众，在教育和学术上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此外，朱熹还同湖南九所书院有关系，对湖湘弟子产生过影响。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最早称胡张一派为“湖湘学”和“湖湘学者”。朱熹编著的《伊洛渊源录》按地域区分的九大学派中，胡安国的湖南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江西学、吕祖谦等的浙学，具有渊源关系或有直接的学术交流。正因为湖湘学（亦称湖南学）能博采众长，所以宋代开始就在各省区中跃居先进行列。

湖湘学派从宋末到清代道光时期，经历了由兴而不旺再到引人注目的转变过程。经过“两起两落”的流变后，明末清初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又一次“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使之从而发展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把湖湘学派推向新的阶段。后又经陶澍、魏源、汤鹏、曾国藩等人的阐发，重新发扬

光大。

二、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三次大融合，使湖湘文化更具生机与活力，亦使湖南从“碌碌无所轻重”的闭塞地区渐次变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显赫省份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三次交汇与融合。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最早办洋务且成效较大的是湖南人，倡导变法并身体力行的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也有一大批湖南人。在近代以来的三次中西文化大融合中，湖湘文化一次次吸收着新鲜的养分。湖南也三次出现了人才群起的局面，由“碌碌无所轻重”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地区。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大融合，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

鸦片战争是东方刀矛与西洋炮舰的拼杀，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反省，导致了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大融合。湖南人既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洋务运动的最早实行者，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和湘军的勃兴，湖南人大批地走出了湖南，并带头走向世界，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派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湖湘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

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邓显鹤等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先驱，致力于探索拯救社会的道理，大力倡言并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出了开言路、广贤路和整治河政、漕政、盐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由陶澍、魏源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

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湖南邵阳人）以超迈前古的恢弘气魄，在《海国图志》中首倡会通中西，预言“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从闭塞的狭小天地引入各放异彩的多元世界。

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提出“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和比较全面、完整地表达洋务派观点的思想政治路线，发动一场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译书局、办新式学堂、选派幼童留学等，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学习西方的窗口。有绝世奇才之誉的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创建了当时全国最大

的企业——福州船政局，并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

出使过英法等国的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眼界看得更为高远，他主张把学习西方的重点摆到政教制度方面。出使过英法俄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广泛留意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富国强民之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先导作用。

湖南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很少往来，在古代历史上很少有闻名全国的人物。鸦片战争前后，这种面貌开始改观了。湖南地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从而成为新旧思想撞击、中西文化融会的场所，也为湖南人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南人开始成批地走出湖南，对于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成批的湖南士子经过科举的道路步入仕途，并与京城和江浙等沿海地区风雅之士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当时湖南人要想出头，只有中举人、考进士、点翰林这一条路。道光年间，湖南文风大盛，考中进士的人逐渐增多，湖南名人开始成批地出现。可以称得上楚材之盛第一人的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安化人），以其特殊的经历和才学，在湘籍人士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地区人士的联系中起到了一般人所起不到的桥梁作用。二是大批加入太平军，为湖南人大批走出湖南提供了条件。太平军1852年在湖南转战半年，从南到北攻克20多个州县，兵力由入湘时不足万人，发展到出湘时15万人。三是湘军的兴起，为湖南人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为镇压太平天国，湘军走出湖南征战12年，湘军集团一跃成为清王朝的主要支柱和最大的实权派，致使当时出现了湖湘弟子满天下、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据罗尔纲对湘军人物182人的考查，在各级实授官职的将官中，官至总督13人，巡抚13人，其他文职在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在提督上下的有143人。另据有关资料表明，仅在湘军12年征战中保举三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就达一万余人，他们散布于朝廷内外各级政权之中，成为颇有势力的政治力量。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近代第二次中西文化大融合，导致湖南人才开始进入世界文化的网络

甲午中日之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应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各项制度的更新。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的第二次大反省，泱泱大国居然败于“弹丸之地”的小国，令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大为震惊。特别是湘军在辽东与日军三战皆败，迫使他们开始探索拯救湖南进而拯救中国的途径。湖南的维新派诸人，莫不是从此而觉醒奋起，导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维新壮剧。戊戌变法兴起后，经过

谭嗣同、唐才常（均湖南浏阳人）等维新志士的努力，原来被反动派看成“安静世界”的湖南，成了“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连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徐仁铸等地方官吏，都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任用维新志士办新政、开学会、兴学校、办报纸。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社会思潮由改良转向革命，孙中山成了20世纪初期探索中国走民主之路的先行者。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是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继起响应者首推黄兴和他在内地最早组织的华兴会。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参加7月30日筹备会的共79人，其中湖南籍20人。同盟会最初两年会员为976人，湖南籍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的黄兴和蒋翊武。武昌起义胜利以后的12天，湖南成为“首义之省”。

值得注意的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湖南人才开始进入世界文化网络的时期，湖南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对于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数量之多、进出之频繁，不仅为史所罕见，而且成为各省之冠。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即达373人。据查证，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杨树达、谭人凤、禹之谟、范源濂、蔡锷、章士钊、杨度、李达、林伯渠等人，都先后到日本或留过学或避过难或学过工。杨昌济1903至1913年曾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9年，我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1914年官费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1918年曾遍历欧美各国考察。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达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徐特立、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蔡畅、何长工等人，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参加者或组织者。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介绍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学习。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近代以来第三次中西文化大融合，湖湘文化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巨子的崛起，改写了“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突与融合已从制度层面进入精神层面。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进行了第三次大反省，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最沉痛的检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旧教育、旧文艺、旧道德、旧传统进行最猛烈的冲击；另一方面高扬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

实践。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闭锁的洞庭湖闸门开动了，浩浩荡荡的中外新思潮涌进了湖南，马列主义磅礴于湘江两岸，连罗素、杜威、张东荪、吴稚辉等人也先后来湘贩卖反马列主义的货色。在如潮水般涌进的中外思想文化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先驱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抉择，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新文化运动的工作重点由思想启蒙转移到造就一代新人和直接的政治运动。此后，在湖南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的范围。特别是在文化和道路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19世纪人类最高成就的马克思主义选作指导思想，并选择了“仿效列宁”从根本上进行“再造”的俄国式革命道路，这与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先驱相比，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更高的理论视野，在道路选择上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成功地利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创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毛泽东思想，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血与火的考验和锤炼中，湖南的英烈屡仆屡起，涌现了大批党政军杰出人物。在中国共产党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89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10人；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73人。在政治、思想、军事和其他领域中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20世纪的帷幕将徐徐降落，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在世纪之交和千年更迭的光辉里程碑前，人类已处在新的转折点上，东西方文化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全球形式的未来世界中，文化将从西方转向东方，“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时代”。早在1974年，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汤因比就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希望。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未来的世界是充满竞争的世纪，天边的飓风和海啸正向我们狂奔而来，我们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将有一场场大的搏斗。从最坏处设想，从最好处努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过去已不复存在，未来即将降临。追昔抚今，放眼未来。我们既不能为湖湘文化曾有的辉煌而盲目陶醉，也不必为湖湘文化出现的衰微而过度忧虑，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中，只要我们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吸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根除自傲与自卑的双重心理定势，正确选定整体文化的发展目标，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式，以超迈前古的大度，引进竞争和效率观念、求新求异观念、开拓创新观念，同时又以宽容与友好的心态去发掘人的潜能，而且保持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湖湘文化必然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湖南人才必然会再度群起，湖南将再度辉煌。

论近代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

郭仁成

（一）

岳麓书院师生上承楚诗人屈原的余绪，经历南宋年间与金元诸外族连绵不断的战争洗礼，积累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千年来涌现出一个个堪称民族精英的人才群体。在古代，头一个是以吴猎为代表的力抗金元的“岳麓诸儒”，第二个则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末遗民集团。进入近代，把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是魏源。这里我们要论述的就是以魏源为代表的第三个群体以及以后的第四个、第五个群体，也就是近代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封闭的环境里，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故国沦亡，异族入主，所以他一生总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坚持反对清政府的统治。魏源则生活在一个落后的、却被迫洞开门户的老大帝国里，昔日互相斗争的国内各民族经过近150年的进一步融合，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而这个大民族所面对的共同敌人，却是不但种族不同而且文化传统迥异的西方侵略者。因此，他认为，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内扩大到全世界，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引进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目的。

魏源的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分界。前阶段着重在以其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对内进行改革；后阶段则着重在对外学习西方，以达强国御侮的目的。当魏源出世的时候，清王朝已走完了它的黄金时代——康雍乾三朝，不但国内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运动连绵不断，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来，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一年比一年紧迫，老大帝国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病也就一天比一天暴露得充分。而那些读书人则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雨懵然不觉，或依旧拘囿于八股利禄之场，或一味埋头于考据训诂之学，大多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魏源前期的爱国思想，就是在这种内外交煎的环境中激励而成的，其“以经术为治术”的学风，发端

于刘逢禄的今文传授，受益于龚自珍的相互切磋，而其兴利除弊的经济之学，则大都出自他和岳麓师友的改革实践，也与岳麓书院的传统有关。魏源的叔父辅邦（《岳麓志》作宁邦）也曾肄业岳麓书院，受山长罗典“明习时务”思想的熏陶，《魏源师友记》称：“（默深）文章经济的有声名重华夷，多辅邦有以教之也。”

在魏源用世前后，岳麓学院师生已经形成了这个书院历史上的第三个人才群体，他们或为师或为友，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在国计民生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严如熤是这个群体的先驱。曾知汉中府十余年不调，《清史稿》称他“化榛莽为桑麻，此其功皆在一时节钺之上”。平生“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所到之处“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他不是个经验主义者，凡起而行的都能坐而言，著书立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以上引语均见《清史稿》本传）他的独生子正基也以经济之学显名。严氏父子的经济之学对魏源影响甚大。如熤是前辈，魏源的父亲邦鲁“少时尝晤溆浦严如熤于京师，从受奇门六壬占筮，兼闻经世之学”（《宝庆府志》）。魏源早年得闻傅鼐治理苗疆的有用经验，又能亲炙袁名曜的经世之学，都由于严氏的推引。正基于魏源为岳麓同学，后来他们还同时参与过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幕府，他们的老师袁名曜虽然只做过编修、侍讲一类的官，无从施展其经世之才，但严如熤仍称他为“楚南第一流人物”，闻其掌教岳麓书院，不远数千里遣其子正其就学。陶澍也说他“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他“遇事议论锋发”，“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他这些有用之学使岳麓书院诸生眼界大开，思想也活跃起来，所以当他“每日暮出行讲院前，诸生环绕，名曜——指论瑕瑜”。（引语均见同治《宁乡县志》本传）即此可见，他对造就岳麓书院历史上第三大人才群体是作出过切实贡献的。

在这个爱国志士群体中，陶澍和贺长龄居于关键的地位，二人皆出身岳麓书院，与魏源志同道合，在改革种种弊政中做出了实绩，使魏源的经济之学一开始就具备明显的应用性。陶澍是一个著名的理财家、水利专家，在改革漕运、盐政诸方面具有超凡的魄力和出色的才干。《清史稿》称他“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魏源亦称他“力犯群忌，且事未尝不举”（《陶文毅公神道碑铭》）。贺长龄宣力中外四十年，勇于兴利除弊，守南昌时，设自理漱局，评定章程；布政江苏时，力主海运，并促其实现，及总督云贵，瞻仓储，种桑麻，僻远之区，民皆利赖。陶贺二人与林则徐都曾经是魏源父亲的上官，后来遂成通家之好，而魏源从事改革的政治生涯则是从26岁时进入贺长龄幕

府开始的。他们合作的第一大丰硕成果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和出版。道光五年（1825），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延魏源合选当代关系治道、切中时弊的论议文章为一编，以倡经世之学，为改革作舆论准备。次年，《皇朝经世文编》选入一千三百多篇。辑成一百二十卷。魏源在序言中提出他们经世济时的四项原则："事必本乎心"，而"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法必本夫人"，而"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今必本夫古"，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物必本于我"，而"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这部书一问世，便如巨石击水，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后来俞樾称它："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矱，几于家有其书。"（《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一时经世致用之学便蔚为风气。而以经世名编，仿其体例者前后竟达三四十种之多。

也就是贺魏合辑《皇朝经世文编》的时候，陶澍也调任江苏巡抚，他与魏源"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魏府君事略》）。这期间，魏源写出了《筹漕编》，又代贺长龄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力主由海商运送漕粮以革除漕运的弊端。次年江苏试行海运成功，随即刊刻《江苏海运全案》，他在序言中说："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物可知也；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患，反是正之，百废可举也。"这些见解充分表现出一个改革者的勇气和信心。

魏源在陶澍幕府时，对水利建设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首先根据自己早年对两湖地区河流湖泊的实地勘察，代陶澍作了《湖北堤防议》，后来又扩充为《湖广水利论》，提出要兴水利、除水弊，首先就要"除其夺水、夺利之人"，"不问其为官为私，而但问其垸之碍水不碍水"，凡是妨碍泄洪、蓄洪的垸子，都应坚决毁掉，以达到"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的目的。道光十三年（1833），他代陶澍为凌涑《东南七郡水利略》作序，则是他对江浙水利问题研究的成果。魏源与陶澍合作的改革项目中，盐政的改革最有成绩，他们坚持"便国便民"的原则，主张"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于一孔"，也就是使盐利尽归商民，国家则因此增加税收。当时，陶澍已升任两江总督，首先在淮北实行票盐法，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都可领票运销，把一切居中"仰食于弊之人"的特权通通革除。这就大大有利于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他先后写《筹鹾篇》和《淮北票盐志序》两篇专论，反映了他在盐法改革中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在鸦片战争前三年，魏源还辑有《明代食兵二政录》七十八卷，这是继《皇朝经世文编》之后又一经世致用文章的汇编，而他先后为此书写的两篇序言则对当时尚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弊政和失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于所看到的种种弊端，他几乎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而且大多能身体力行，为天下倡，这就是魏源前阶段爱国思想的鲜明

特色。

魏源后阶段的爱国思想之所以从国内改革转向学习西方，一方面是由于前阶段的改革实践使他坚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默觚下・治篇》），这就是说，欲求祖国富强，必须在思想上打破时间和地域的界限，只要能富国利民，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国度的办法都可以用。另方面是由于他已经越来越觉察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跟过去大不相同了。"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商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而当他协助陶澍、林则徐等更币禁烟，不但没有达到堵塞漏卮的预期目的，反而招致英国侵略者更加猖狂的进攻时，就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觅救亡图存的途径了。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爆发，魏源就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听到伊里布视师宁波，俘获英人安突德，就赶赴军中向安突德询问英国情况，写成《英吉利小记》。九月，积极反侵略的林则徐被诬革职，清廷改派琦善到广东"议抚"，魏源愤而赋《寰海》，对清廷"不诛夏览惩贪帅，枉罢朱纨谢岛夷"的错误决策深表不满。第二年春，裕谦奉旨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亦受命协防，魏源又应邀入裕谦幕府，积极参加反侵略战争。但实际情况使他很失望，数月便不得不辞归。到了五月，林则徐终于与邓廷桢一道，被充军伊犁。魏源与林则徐在京口晤别，林嘱他撰《海国图志》。从此他满怀御侮雪耻之志，却又手无斧柯，报国无门，只得退而挥笔著书来唤起国人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而结束，魏源撰成了十四卷的《圣武记》。这本书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回顾了清初以来奠定祖国疆域的武功，首先是为了激励广大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振奋士气，以抵御外侮，同时也是为了鞭挞那些在入侵者面前前倨后恭的妥协投降派，他反复告诫统治者："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他引《礼记》的话勉励大家："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这些都是他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的流露。与《圣武记》问世的同时，魏源还是第一个撰成了鸦片战争史《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失利，关键在于："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奕山不筹守而即战，是浪战也；颜伯焘、裕谦、牛鉴不择地而守，是浪守也。"也就是撰成《圣武记》的同一年年底，魏源又辑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后来陆续增补至一百卷，这是他后阶段最重要的代表作，书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他在序言中首先说明编这部书是他和林则徐共同的意愿："《海国图志》五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

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部书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至今仍不失为创见卓识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它第一个主张"开眼看世界"。在这以前，中国士大夫"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圣武记·武事余记》）。对于妄自尊大、愚昧无知的状况，《海国图志》是一剂振聋发聩的良药，向老大帝国的臣民们展示出一个真正的"天下"，这比他们过去所想象的大得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从今以后必须日日同这些陌生的国家打交道，闭关锁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部书使人们大开了眼界，所以其反响的强烈是十分惊人的，不但不受时间限制，而且超出了国界。在国内，60年间，其书不胫而走，不同的版本达13种之多；在日本，摘译翻刻的版本竟有23种。书出16年后，也就是魏源去世后一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还专门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推荐《海国图志》，"乞饬左右购以进呈"，并"请饬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八）。

第二，它第一个明确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学习敌人。在他那个时代，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顶住来自顽固派的种种责难，没有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没有对当时世界的清醒认识和对自己方面的透彻了解，就不可能抛弃一切虚荣，大胆承认落后。可当时诸大臣却口口声声不能"示弱于外夷"，"但肯受害（战败赔款），不肯受益（学习西洋）"，把西方的先进机械技术斥为"奇技淫巧"，把接受新事物当作"多事"。对于这些谬论，魏源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物，借风力、水力、火力，本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海国图志·议战》）又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同上书，卷三十七）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表现在轮船、火器和兵制三方面，因而主张官办军事工业，学习西方养兵练兵之法，改进军队武器装备，同时还要发展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经营以及仿铸西洋银钱，更新币制等。随着《海国图志》增补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对西方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对欧美的民主政治，也开始加以赞扬，凡是西方的声华文物，认为都应当以"域外友人"视之，传统的华夷之防的偏见也打破了。这些思想后来就成了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而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成了维新派的先驱。在魏源身后，变法维新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受他深刻影响的。康有为自称22岁时已反复阅读了《海国图志》，"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康南海自编年谱》）。谭嗣同则在他的感召之下，发出赞叹："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而梁启超甚至认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饮冰室合集》，卷七十五）。

第三，它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要团结对敌。这种思想来源于儒家传统的"民本"之说，而具体形成于鸦片战争的实践之中。魏源历来信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道理，认为"人聚则昌，人散则尪，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而天子应该"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当鸦片战争一打响，沿海人民群众闻风奋起，与入侵者作殊死斗争。广州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还把英军包围在四方炮台，只是由于投降派奕山的劝解，才让敌人逃跑了。可是，投降派反而诬蔑广东军民，胡说"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坚持"患不在外而在内"，的反动论点，始终以人民为敌。这就使魏源清晰地看到：要挽救危亡，希望只在于人民，而要发挥人民的作用，就非驳倒投降派的谬论不可。他首先在《寰海》组诗中热情赞扬了三元里人民反侵略的爱国精神，接着就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明确指出：当时"人心之积患"决"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在同书卷一里，他用确凿的事实批判了执政者"防民甚于防寇"的错误做法，指出"广东之斩夷首，损战舰者皆义民"，"两擒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粤者亦人民"。为了充分发挥义民的优势，他提出了"守外海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的主张。他指出："各省之民勇原足充各省之精兵，一省之精兵原足以捍一省之疆圉。"于是进一步提出"以兵法部伍其民"，"积粮莫如令民自积"。事隔十年，魏源在改定《道光洋艘征抚记》时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并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执政者所作所为不过是"化良民为奸民"，"诬义民为顽民"（《道光洋艘征抚记》下）。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苦口婆心地规劝最高统治者务必相信"义民可用"，希望他们放弃"防民甚于防寇"的错误政策，团结全民族一致对敌。

魏源晚年登第，58岁才补了高邮知州，但他梦寐以求的民族团结终于未能实现，太平天国的滔天浪潮，即将倾覆清皇朝这只破船。可双方尚在"城头谯鼓兼画角，蚌鹬相持几时活"（《江头月》）时，给外来侵略者提供渔翁得利的机会。他感到"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与周诒朴书》），彷徨、矛盾、进退失据，无可奈何，终于因"迟误文报"，"玩忽军机"被革职。不过，魏源毕竟是一个执著的爱国者，他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他在被革职以后，仍然拼命地写作，把《元史新编》最后定稿，并作《进呈元史新编序》，借元朝失国的历史教训，对最高统治者进行最后的规劝。他引《礼运》的话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楚越。""元代之弊，皆由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他的良苦用心，无非希望统治者猛省回头，捐弃种族偏见，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击西方侵略者。

魏源的爱国思想为岳麓书院的传统增添了新的近代色彩，对岳麓书院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致而言，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中兴名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经济之学，故光绪《湘潭县志》称：“湖湘经济之学始魏源，而左宗棠继之。”左氏对魏源的经世之学是终身服膺的，他在《答陶少云书》中说：“道光间，讲经世之学者，惟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直到晚年，他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还再三流露出这种感情，深以未能实现魏源的理想而负疚。“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宗棠老矣，忝窃高位，无补清时，书此弥觉颜之厚，而心之负疚滋多。”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洋务派则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魏源的向西方学习的观点，郭氏在《书海国图志后》说：“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梁启超曾经讲过：“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戊戌政变记·附录二》）这三人或出身岳麓书院，或为岳麓书院学生的后代，他们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先驱，而魏源又是其中的首倡者。

（二）

近代中国的门户是从南方被打开的。从此，内忧外患都首先由南向北袭来。而湖南既紧靠着南大门，又控扼着江南的上游，自然成了斗争的焦点。岳麓书院师生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走出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其功过是非至今还在聚讼纷纭之中，但就总的趋向来说，他们的行为没有超越爱国主义的范围。而通过多次的考验和曲折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救国之道，从而使岳麓书院的爱国传统大放异彩。

如何对待太平军的革命运动？这是历史给予岳麓书院诸生最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太平军是中国农民的优秀代表，他们反抗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的战争是正义的，爱国的；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更是可歌可泣，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但是，历史发展的悲剧性却在于：他们碰到的劲敌首先竟是以拯救中华为己任的岳麓书院诸生。那时候，由于魏源的倡导，岳麓书院诸生和湖南绝大多数爱国知识青年都相信：只有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团结对外，同时“师夷长技”，对内进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因此，他们对于太平军的武装夺权自然要视为危害国家民族的叛乱，而对洪杨公然崇奉天主、毁弃传统文化的宣言，则尤其不能容忍。当太平军一进入湖南，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毫不迟疑地投笔操刀而起，一直坚持十二年之久。太平军终于被扑灭，岳麓书院诸生起了关键性作用。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不下，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当时主持湖南防务、坚守危城达 80 天之久的，正是岳麓书院出身的罗绕典。而岳麓书院老山长丁善庆也在围城之中，等到解

围之后，他就“趣治战船以济天师，立恭武社使诸生与众练卒肄习火器”（《丁君善庆墓志铭》）。从此，以曾国藩为首的岳麓书院诸生闻风而动，一支由读书人为骨干、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基础的湘军迅速组成，通过出省作战，最后取代绿营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围绕着湘军与太平军的长期搏斗，岳麓书院诸生形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四个人才群体，其中除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为首倡者和领袖人物外，还有：最后攻下天京的曾国荃；最先办团（练）、后来进主方面的刘长佑；曾解宝庆之围，后又俘获幼天王的席宝田；左宗棠总督甘陕时帮办军务兼署陕西巡抚的刘典；被咸丰帝称为“谋勇兼优，人才难得”（《贵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的李元度；创建广武军扞遏石达开由郴桂直攻长沙，后来历任浙江山东巡抚的陈士杰等。在这个人才群体中，还应当列入城南书院出身的一批湘军将领。这是因为这两个书院自宋以来就有共尊朱张、互为“表里”的传统，而清代重建的城南书院完全是“因岳麓而有”，极似近世的分校或预科，其学风与传统实在是密不可分的。湘军将领出身城南的，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左宗棠既曾肄业城南又被选入岳麓书院附设的湘水校经堂，具有双重身份外，还有胡林翼、邹汉勋、罗泽南等。就是这个庞大的岳麓书院人才群体，在本乡本土组织起 30 万众的湘军，转战 18 省，战胜了太平军。从此，湖南便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的中心之一。

对于湘军战胜太平军的功罪是非，近百年论者多有异同，因而对于曾、左、胡、郭等的评价更是毁誉难定。大致而言，都是随着政治斗争的形势而变化的：在他们有生之年，大都被誉为中兴名将，曾左则被称为“湖南近古人豪”，尤其是对曾国藩，人们更是“诵德不衰”，以为“提挈群贤，中兴清业，所就出诸葛亮、陆贽、司马光诸公之上”（《湘学略》）。但是时隔二十余年，进入 20 世纪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对曾左等人的评价便逐渐发生变化，就连他们的岳麓书院后学也以有这些前辈学长为可羞了，比如陈天华“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面有愧色”（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他“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认为：“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双手仍把江山送还满洲，真个好蠢的东西呀！”（《警世钟》）那个时候，一般爱国青年都主张排满革命，他们继承王夫之“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的思想，认为只要把清朝推翻，政权回到汉族手里，谁来当皇帝或总统并不很重要。与此同时，也有人已经看到湘军的兴起对以后的历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经过湘军和太平军这场悲剧性的搏斗之后，满族专制的格局已经打破，军政大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汉人手里，国内各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加速了，使清皇室中的顽固派日益失势，汉族广大知识

分子中的改革派得以逐步开展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斗争，而当一切改良措施都无济于事时，五族共和的革命道路终于为全民所接受。凡此，都是曾左等获致的权力转移所造就的积极成果。所以，当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对于曾国藩等的评价，即使是民国领袖也来了个大转变。据《湘学略》说："蔡公锷手录曾胡用兵要略以教诸将，黄公兴称（曾）公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至于蒋介石以曾国藩为学习的榜样，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却荒谬地以曾国藩自比，而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太平军一类的"叛乱"者，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要批判曾国藩了。1944年问世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除继续指责"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以外，还加上"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一条。

近十年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关于太平军和曾左的讨论得到进一步深入，并提高了它的科学性。除湖南史学界对曾左等的著述进行了大量整理研究工作外，在全国范围内也兴起了关于太平军研究的新潮，连老一辈学者冯友兰先生也参加了。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现在一味争论湘军该不该扑灭太平军是意义不大的。因为历史的事实是它已经把太平军扑灭了。最切实际的还是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把这个问题放到当时国内国际大环境中去考察。经过清王朝二百年的融合，我国汉满蒙回藏各族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他们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日趋缓和，而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却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摆在这个时代的爱国者面前的历史任务应当是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发动内战，给帝国主义更多的可乘之机。我们今天来看这场悲剧，既不能简单地把太平军判为叛乱者，也不能笼统地把湘军排除在爱国者的行列之外，应当说，他们双方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们的愿望都在于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存。实事求是地看，太平军还没有超越历代旧式农民暴动的范畴，其最佳结局也不过如刘邦、朱元璋那样改朝换代，绝不可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何况，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悲剧在历史上可说是司空见惯，就连那些被称为"民族英雄"的名将也很少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而数百年来人民群众既同情钟相杨幺的起义，又歌颂曾镇压钟杨的岳飞，正反映一种对悲剧的务实心态。还有种意见认为在革命战争时代我们表彰农民起义，宣扬"造反有理"是有利于动员群众去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而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就该更多地总结历史上消除动乱、巩固政权的经验，以便有效地组织人民去建设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左等人一整套治国治军治学以至治家的经验，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还是有借鉴价值的，其中既有糟粕，也不乏精华。值得一提的

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原是一个曾国藩崇拜者，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直到十年内战时期，教条主义者还在挖苦他"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等等，来指挥战争"（以上引文均见《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足见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他还没有改变对曾胡军事思想基本肯定的态度，这就进一步反证抗战时期的猛烈批曾实际上是批蒋，也体现他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一贯主张。

在对待太平军这个严峻考验面前，湘军领袖们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既有阶级的偏见，也有忠君的愚昧，甚至还有地域的观念，但促使他们几乎是同时奋起，并不惜赴汤蹈火的，主要还是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对内忧外患交迫的焦虑，对自己民族文化不容毁弃的赤子之心。所以，恰好也是1944年成书的《星庐笔记》就有这样的看法："世谓湘粤之争，乃为孔耶之战，而非忠于清室也。"只要略举这班将领初起时若干言行，便可洞见其肺腑了。曾国藩早"有澄清天下之志"，故太平军一入湘，他就"投袂而起"，首揭"不要钱不怕死"（《曾文正公别传》）之旨；既带兵，"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左宗棠十八九岁时，"购顾氏炎武《郡国利病书》、顾氏祖禹《方舆纪要》诸书，昕夕稽究"，"所藏《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还自为联语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郭嵩焘"虽蓬户独处，其意渊然，以天下为量"（王先谦《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常以"吾人生世要为天下不可少之人"（《玉池老人自叙》）与曾国藩共勉。胡林翼"曩昔慨然有康济斯民之志"，"谋国之忠，进德之勇，为清中兴名臣之冠"（《湘学略》）。刘蓉自谓"于钻营无耻之事，非特不敢见之于事，并不敢存之于心，非特不敢存之于心，并不敢形之于梦寐"。罗泽南"家世贫甚"，"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可是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要说这些人没有一点爱国思想，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维护反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当然，要判别一个人有没有爱国之心，主要看他怎样对待外来的侵略。近年来，由于湖南史学界的倡导，对出身岳麓书院的湘军人物如左宗棠、郭嵩焘等在反侵略方面的史迹以及他们的爱国思想，已有了较深入的发掘。郭嵩焘30余年、200万字的日记，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令人信服地说明，郭嵩焘不愧为一个勇敢的爱国者。他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亲身远涉重洋，第一次对欧洲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对中西文化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他发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使西纪程》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于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国人：“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记》）他目睹西洋“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使西纪程》十一月初八日）；于是积极研讨西方的经济理论，主张“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记）。他从观察和比较中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而“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议会）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他还特别留意西方的文化历史和教育制度，并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对科学家比耕（培根）、格刀里渥（伽利略）、纽登（牛顿）的学说作过介绍，同时为弄清其源流，还探索过刚莫特（孔德）和嘎尔代希恩（笛卡儿）的哲学思想。这样，他看出不光是物质文明，即使是精神文明，我们也应向西方学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大声疾呼：“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应学习泰西学制，“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致沈幼丹制军》）。又建议“各小督抚多选少年才俊”，“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不仅专习军事，还要兼习“相度（勘探、测量）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伦敦致伯相》）。他本是一个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但思想认识水平却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因此，他对当时洋务派的眼光短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直枪炮而已？人心风俗偷敝至于此极，即有枪炮，亦资‘寇’兵而赍‘盗’粮而已。”（光绪五年二月十三日）又说：“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尾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九日记）这种思想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未免惊世骇俗，但他却终身坚持这种主张，直到罢官回籍还公然宣称：“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可贵之处。

对左宗棠的研究，近年来已进入一个热潮：《左宗棠研究论文集》已有两辑问世。首次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已于他逝世百周年之际在湖南召开，而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重新整理的《左宗棠全集》也在陆续出版。现在，史学界对左氏的评价虽然尚有争议，但把他肯定为一位爱国者这一点，已经趋于一致了。左宗棠继承魏源经世致用的改革思想，广泛运用于治军从政的实践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幕中时就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称誉；而以垂暮之年，独排众议，提师十万，力抗英俄威胁，一举戡平阿古柏叛乱，收复新疆为行省，其历史功绩至今仍为人民所赞颂。他出关时直陈衷曲，忧国之情溢于言表：“欲力图恢复，絜二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戢万千族殊俗之民，渐以声教。”（《光绪朝东华录》）“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左文襄公奏稿》卷四七）当西征军打开南疆门户，即将乘胜荡平全疆，而英帝国主义再次玩弄“调停”阴谋时，左宗棠直截了当地指出：“帕夏（阿古柏）侵战回部（南疆）十余年，英人阴庇之亦十余年。”对于英人“以护持安集延为词，以保护立国为义”的“隐情”，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予之，或即割印度予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待到新疆平定，而俄人仍然霸占伊犁，左宗棠移西征军司令部于哈密。“舁榇西行”，以示“不成功，即成仁”（《戡定西域记》）的决心，一时士气悲壮，中外震动。通过军事与外交的努力，迫使沙俄不得不把伊犁归还中国。左宗棠在进军新疆过程中还大力推行屯田垦荒，浚河打井，筑路植树，制造农具，广植桑棉，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并在安西修城开河，沿堤栽植杨柳万株，使塞外积沙之地，顿生春色。所以后来杨昌浚借此写了那首传诵至今的七绝：“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能引起后人如此广泛和经久不息的共鸣，正好说明左宗棠及其率领的湘军的爱国事迹在人民群众中早有定评了。

但是，对于曾国藩，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议，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抑曾扬左”，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曾左是“大同小异”。后一说指出前一说避而不谈左氏前期大肆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的“罪过”，只论其后期一桩抵制帝国主义的“功劳”，归根到底，还是不能科学地论证他一生在历史上有功还是有罪。左宗棠前期和后期的活动是不能割断的，这个道理前人早已讲到了。“论者谓粤‘寇’未平，无以制捻，捻‘寇’未殄，无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朱孔彰《左文襄公别传》）可以说，镇压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农（回）民起义，正是收复新疆的必要条件，要是没有彻底荡平内乱，使国内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国力有所恢复，西征就不可能，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所以，正如上文论证的，历史地看问题，平定太平军、捻军以至陕甘农（回）民起义对

历史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评价曾左这些历史人物。曾左作为历史人物，他们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名望也相同。他们一生的主要事业其实都是镇压农民起义，评价他们的主要依据也就只能在此。只有要么把他们都贬为历史罪人，要么都定为爱国者，逻辑上才说得通。当然，他们也有小异，比如在个性方面，左宗棠自谓“刚而褊”，所以“雄杰自喜，俯视辈流”，对外国侵略者总是“以夷酋畜之”、“持论凛凛向敌”（《湘学略》）。曾国藩则自称“生平以诚自信”（与弟国荃书），所以临事小心谨慎，“于西人常称其以商贾之国而有君子之风”，“驭外常持和节”（《湘学略》）。这大概就是人们在感情上更容易与左氏相通的缘故吧！曾国藩只比左宗棠大一岁，却先死13年，一生几乎全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度过，等到陕甘农民起义最后收拾完毕，左宗棠有条件可以专心西征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所以，他跟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始终是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稍一不慎就会危及大局。除了“内图自强，外羁縻之”外，实别无良策。关于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上的主张，李鸿章曾有过比较客观的综述：“初，咸丰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坚人尝谒江南师，愿以夷兵助战，十一年和议既成，俄罗斯、米利坚皆请以兵来助，公议以为宜嘉其效顺而缓其师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兰西又以为请，公又议以为宜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皆报可。廷议购夷船，公力赞之，比船至，欲用夷将，则议寝其事。其后自募工军，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议开局制造，自是外洋机器轮船夷炮，中国颇得其要领矣。六年诏中外大臣筹和议利害可许不可许，公议以为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移直隶总督，天津民有击杀法兰西领事官者，法人讼之朝，天子慰解之，法人固争，有诏备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从之，而密议储将练兵，设方略甚备。”（《曾文正公神道碑》）这中间，办理天津教案一事，至今还为世所诟病，连他自己至死也感到“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曾国藩未刊信稿》）。当时人民群众的批评和他本人的内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身受帝国主义一系列侵略和凌辱之后所激发的民族感情的流露。但是总的来说，他在对外交涉中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其“谋国之忠”，即历诋其“伪”的左宗棠也自愧不如。他和左宗棠一样，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早实践者，而用西法自制火轮枪炮，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其议皆自他发。似乎可以说，他们都是功过参半的爱国者。

在出身岳麓书院的湘军将领中，还有一个刘长佑，在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在刘长佑巡抚广西期间，法帝国主义庇护匪徒黄崇英等扰乱中越边境，长佑与提督冯子材合力击败之。法人攻陷河内，黄崇英再起，他又发兵援越，迫使法人罢兵言和。是时，越将刘永福所率黑旗军既破黄

崇英于河阳，又抗击法军于河内。法人深以为患，于是制造假象，声言与越南会剿群盗，以缓我援越之师，实则欲乘机诱使越南剿灭黑旗军而招抚黄崇英，长佑及时揭穿了法人的诡计，指出：“越官能剿匪者莫如刘永福，越匪宜亟剿者莫如黄崇英。”急饬援越兵加紧进攻，终于擒斩了黄崇英。在总督云贵期间，他上奏：“云南五金开产，洋人觊觎已久……今若制机器开采，则利由自取，权不人操。”又奏言法人“所以处心积虑者，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吞越境为守边之计，不如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并“力言刘永福可御寇，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及法人陷东京，他就派沈寿榕引军出关，再次迫使法军“以东京还越官，毁其城而去”（王定安《武慎刘公行状》）。总之，从湘军中成长起来的岳麓书院人才群体，乃是岳麓书院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个爱国人才群体，近世湖南人才愈出愈盛，就是以这个群体为基础的。

（三）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岳麓书院师生所面临的第二次严峻考验是怎样对待戊戌维新运动。时下的论者大都以为，岳麓书院是站在维新运动的“对立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当时守旧派中固有岳麓山长王先谦，岳麓书院出身的叶德辉，还有宾凤阳等岳麓书院诸生，但维新派中也不乏岳麓出身的人物，唐才常、杨毓麟、沈荩都是湖南推行新政的激进分子，而杨昌济、李永魁等在院学生也积极参加了南学会的讲学活动。所以，确切地说，是岳麓书院师生在维新浪潮中思想分化了，用梁启超的话说：“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更何况，湖南维新变法的思潮实发端于校经书院。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湘学报》的编辑易鼐以及时务学生石陶钧等一大批维新人物都出自校经书院；而校经书院却是郭嵩焘等为了改革岳麓书院的学制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的。因此，完全可以说，湖南的新旧之争，表面为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之争，其实也就是岳麓书院师生的两派之争。围绕这次斗争中所形成的人才群体，是岳麓书院爱国人才的第五个群体，其核心和主体则是新派人物。他们不但继承和发展了郭嵩焘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且在总结百日维新失败的教训以后，大多东渡日本，接受革命思想，逐步走上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的道路。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去换取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觉醒的，这要算是这个爱国群体最突出的特色。唐才常继谭嗣同之后，与三湘志士十余人喋血汉口，向全国人民再一次昭示：改良之路已不可通，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所以，后世论者称他：“继戊戌维新之盛轨，开辛亥覆鼎之先河，事业未成，影响实巨。”（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沈荩处清廷辇毂之下，既揭宫中丧权辱国之密约，又图行刺帝后，虽被立毙杖下，血肉横飞，而中外舆论大哗，革命的风潮遂至不可遏止。所以

当时人已知他“非宪政党，乃革命党”，他的革命行动是为了“远绍曾静、张熙之遗风”，“终成谭嗣同、唐才常之隐志”（黄中黄《沈荩》）。后先媲美的蹈海烈士杨毓麟、陈天华，同时也是两位齐名的革命宣传家。杨的反帝反封建名著《新湖南》发表于1902年，比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都要早，他在岳麓书院也是陈的学长，当陈于1900年进入岳麓书院（后又转入求实书院）时，杨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维新派了。但陈的通俗读物在国内的读者更多，他为国牺牲的时间也要比杨早得多，因此，他的爱国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比杨更广泛更深刻。陈天华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留日时的同学石陶钧回忆道：“陈天华是此次东行同伴中感受风气最深之一人，他因口吃，半年还不能说一句倭话，也正因此，他的工作全用在写《敬告湖南人》、《混沌国》、《猛回头》、《黄帝魂》一类的小册子上。他同我对坐一个桌子，我每见他暗自哭泣，便知道他又写到一笔惊心动魄的字句上来了。”（《六十年的我》）陈天华的炽热爱国之情深深地感染了全国广大青年，当他的遗体被公葬岳麓山时，“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公葬大会成了对清政府的大示威，对湖南青年的革命大动员。从此，湖南和岳麓书院革命志士踏着烈士的足迹，终于实现推翻帝制的宏愿。黄兴就是他们中间的领袖和代表，被章太炎称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有记载说黄兴也曾肄业岳麓书院，但一般人都持怀疑态度。不过，他前后就读城南书院五年，并一度调入校经堂，则是比较确实的，因此，把他列入岳麓书院第五个爱国人才群体亦未尝不可。

至于守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是否可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呢？这是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他二人排除在外，因为新旧不能作为区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正如陈天华所云：“新的也要爱国，旧的也要爱国，就没有不同之处。”（《警世钟》）就其一生的全部行事来看，这两人都是学者，而不是官僚，他们的学术至今还是国家的财富，而绝不是赘疣。哪有为国家创造了如许文化遗产而不让跻身于爱国者之林的道理？王先谦48岁就辞官专心著述，垂老仍孜孜不休，他所编著校刊行世久远的书不下40种，约3000卷，其中《东华录》、《汉书补注》、《合校水经注》、《皇清经解续编》等，仍为当今学界所珍重。所以《湘学略》称之为“湘国灵光，皕年寡两”，“能张大楚风，集成清学”。叶德辉成进士后虽以主事用，但还在观政吏部时就请长假回籍，根本没有正式做官。据《叶德辉评传》附录所载，从他回家那年（1892）到死（1927）的35年中，由他选辑校刊行世的书已达155种之多；死后到1980年这段时间，陆续又由别人出版了13种；再加上至今尚未刊行的20种，合计为188种，都是他35年从事研究的成果，这跟任何一位多产作者相比恐怕也不

会有多少逊色。他平生为学主通经识字，而尤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世谓其所辑《书林清话》“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人燕语”（《观古堂书目》）；“辨章学术，开示法程”（《湘学略》），都是超迈前人的鸿篇。故章太炎称他“如此学问”，“非可与专作鹰犬者并论也”（《复叶德辉书》），甚至还说：“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书空集·两知己诗》）杨伯峻最近也说“其人固不足取，其学实有可传”，认为“叶氏之行尚不至如庾（信）、冯（道）、钱（谦益）辈屈事仇敌并异族”（《叶德辉评传·后记》）。当革命风暴之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叶氏适撄其锋，其死固不可免。但人们日后深思，总觉得这也带有悲剧性，这就是一部分学者今天之所以主张把他们两人列入岳麓书院第五个人才群体的第一层道理。还有第二层道理是：就戊戌两派论争的性质来说，首先是经学今古文之争，其次是中西文化比较之争。王、叶更多地继承了曾国藩、左宗棠安内攘外的思想，所持的论点固多迂腐落后的糟粕，而其维护民族传统的本意也不可一笔抹煞。康梁变法维新的主张虽然为当时进步青年所拥护，但康氏附会经传、托古改制的做法，即新派人物如陈宝箴亦大不谓然。所以叶德辉的《翼教丛编》一出，章太炎也说“是书驳康氏经说，未尝不中窾要”（《翼教丛编书后》）。后来时过境迁，到了民国三年，梁氏曾对人说：“吾于（王益吾）先生，特学派不同耳！”并写信问候，信中还告诉他：“郋园（叶德辉）来京，已与相见，旧嫌尽释，新欢重缔。”（《星庐笔记》）对于西学，王、叶并不一概反对，而且都有相当的研究。叶在驳康梁时常引西书以为据，王则著有《五洲地理图志略》、《外国通鉴》诸书，在教学中仿西法进行了一些改革，还积极带头创办实业，提倡学习外国富强之道。但他们坚决反对“废中学而尚西文”，王先谦攻击的是“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上陈中丞书》）。宾凤阳等攻击的则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上益吾院长书》）叶德辉声明，“西法非不足尚，要贵实事求是”。并说：“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与俞恪士观察书》）梁氏这种说法经易鼐发挥，就叫做“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交行），“合种以留种”（黄人与白人互婚），这篇题为《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的文章在《湘报》发表后，“见者人人骇怒”（张之洞语），因为它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伤人们的民族感情，超过了人们思想所能承受的限度。可见，王、叶等的反对康梁从主观上讲还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的，代表着当时外族压迫下激起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有一定盲目性，也有其积极因素，从1892年周汉反洋教活动以来就在湖南人民中日益高涨起来，1896年岳麓书院诸生数十人为抵制德国人谔尔福来湘，也曾发生过大闹

藩署的事件。在守旧派看来，康梁的议论未免“张皇太甚”，简直是在对自己国家“幸灾乐祸”。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周锡瑞所分析的那样，他们以为“这回的威胁来自广东，而饰之以西方学说的艳装”，这就难怪他们要“把康有为和梁启超看做是半世纪之前湖南曾猛烈阻击过的从粤桂来的伪托耶稣的太平天国的再次出现了”（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之所以比暴力革命还复杂，在于它必须依靠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原班人马去推行新法。这就决定它不能不采取渐进的办法，不得不适应全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戊戌变法之所以招致旧派的坚决抵制，就是由于新派提出的要求有一些确是过高，而做法上也有操之过急之处。时下论者多把新旧水火的责任一概归于旧派，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也就不利于总结出那次改革失败的真正教训。比如激发矛盾的人身攻击其实就是新派首先发难的。1898 年 8 月上旬，“新党有长沙大痞王麻、湘潭大痞叶麻行状，院试发给考生”（《皮锡瑞日记》戊戌八月初十日），事在旧党商订《湘省学约》之前；而据王先谦说，《时务学堂禀词》指控的“宾凤阳揭帖有秽亵语一段，乃熊（希龄）窜入”（《皮锡瑞日记》己亥二月二十三日）。再加上熊希龄在《上陈中丞书》中公开宣称：“龄本箪人，生性最戆，不能以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而徐仁铸又严令追查“开学宫，立议约”之事，坚持坐罪倡议主笔之人，这就更加加剧了紧张局势。总之，戊戌新旧之争，只是地主阶级改革者内部之争。救亡图存是双方共同的目标，因此，参加这次论争的岳麓书院两派都应算在第五个爱国群体之内。只不过与以往几个群体相比，这个群体要显得庞杂一些，内部思想斗争不断，既有戊戌当时的新旧两派之争，又有后来的立宪和革命之争。但也只有经过反复比较斗争，爱国志士才最后找到一条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革命的道路。

自从 1903 年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时务学堂也同时并入，戊戌论争双方终于合流。1904 年，时务学堂学生蔡锷放弃了康梁的改良主张，从日本回到湖南，与高等学堂教务长周震鳞积极谋划革命，后来他到广西训练新军、开办干部学堂，又从高等学堂带去一批革命意志坚强的学生。（据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高等学堂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时务学堂的爱国传统，使之与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却远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我们的爱国志士向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之后，才最终建成一个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枷锁的新中国。也只有在这场长达 30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积累千年的岳麓书院爱国传统才终于大放前所未见的异彩，在岳麓书院的后身高师、湖大等校，培育出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在岳麓书院历史上最大的第六个人才群体，其中有中国革命

早期的著名领袖蔡和森、邓中夏，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袁任远，有杰出的党的干部甘泗琪、周小舟、刘彬，有久享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历史学家吕振羽，还有在教育界、学术界卓有成就的舒新城、黎锦熙等，各有千秋，蔚为大观。今天，当我们追溯这个人才群体的历史渊源时，不应当忘记岳麓书院最后一批学生中，有两个人曾经默默地为岳麓书院的爱国传统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结合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就是赵必振和杨昌济。赵必振（1873—1956）于 1894 年肄业岳麓书院，戊戌维新中就是一位新派人物，庚子自立军起义，他和何来保同为常德方面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先参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的工作，后又从章炳麟、秦力山那里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并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同时，惊喜地发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1902 年回国后，他首先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书。1927 年曹聚仁在重版此书时盛赞它是“多么伟大”，“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第二年，赵氏又出版了它的第二部译著：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这又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它确实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忱，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革命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新空气”（姜义华《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毫无疑问，赵必振是岳麓书院诸生中第一个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为岳麓现代革命人才的奋起作了前驱（按：赵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杨昌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的历史功绩在于融合中西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并用他那种独有的开明、进步、向上的思想和身体力行的作风，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一班有志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怀抱远大理想又能促使其实现的优良品性，一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便如虎添翼，终于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杨昌济出身岳麓书院，后来又执教岳麓书院的后身高等师范和城南的后身第一师范。由于他的崇高精神的指导，一师出身的毛泽东和高师出身的蔡和森等紧紧团结在一起，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组成了湖南第一个革命青年的组织——“新民学会”，后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建党基础。从此，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积累的爱国传统，便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刘蜕哲学思想试析

郭仁成

两破天荒

刘蜕，字复愚，长沙人，唐代散文家，大中进士，曾任左拾遗。

湖南文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刘蜕的名字，大多是因为他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文学家第一个举进士及第，破了荆南解 50 年的天荒。其实，他破的更大天荒还是千一百多年前，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南思想家，撰成了《文泉子集》这本奇书，对老庄哲学作出了深刻的阐述，成为湖南道家的第一个传人。

遗憾的是，《文泉子集》十卷已佚其九，所以刘蜕的思想体系及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我们今天已无从窥其全貌，知道他是一个思想家的人也很少了。不过，只要细读残存下来的少数篇章，如《太古无为论》、《赢秦论》、《较农》、《疏亡》、《山书十八篇》等，其崇道非儒的思想倾向便清晰可见，千载下锋芒仍然锐不可掩。难怪《四库总目提要》站在维护儒家正统的立场上，要批评他的“大旨与元结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所谓古者乃多归宗于老氏，不尽协圣贤之轨，又词多恚愤，亦非仁义蔼如之旨”了。本文试取其思想某些独到处，条析而衍绎之。

不为万物凿

《山书·十八篇》其二云：“天地之先，未尝有形。故字其形为人民，为禽虫、万物。然后受其字，据其形之动曰生，形之静曰死。呜乎！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尝用其形窍以出纳，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尝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为万物凿者而已矣。”“混沌”这个概念出于《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章则云：“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混沌盖指宇宙构成的最初本原。《庄子·应帝王》则称为浑沌，并把它拟人化了：“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

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也是一则寓言，对那些予圣自雄者好心干蠢事作了辛辣的讽刺。

刘蜕在前面的一段议论，显然是从后面庄子这则寓言引发出来的。他的独到处在于悟出了一条返朴归真的途径：即使不生在天地之先，也可以做到“混沌之似”，关键是坚持“不为万物凿”，不“用其形窍以出纳”，也就是不受外物的任何干扰，永葆天真未凿的混沌。取名为蜕，字为复愚，正是他立志返朴归真的表现。在《山书》前面的引言中，他标榜其主旨为“大不复物”，这个“大”与老子“大小多少”、儒家“大一统”的“大”相同，作动词用，“不复物”即不复返于物，而要复返于愚，复返于混沌。这才能返璞归真，保持天性。

问题是今人既不生在天地之先，也不生在太古无为之世，所以要保持天性就得经历一个漫长的抵制清除历史积淀与世俗污染的过程。刘蜕在《文冢铭》中对所封文稿的谆谆告诫，其实就是他抵制传统和世俗侵蚀的郑重自警：“慎无朽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无坚为金铁以作货起争，慎无潏为醴泉以味手谄口，慎无祷为城社以狐鼠凭妖，慎无耸为良材以雕斫伤性，慎无荫为兰以佩服见亵。”又借巫师三招文稿游魂之言，反复自戒千万不要为物欲名利而入歧途：“在几阁而来归兮，奄为尘垢；在耳目而来归兮，奄视汝丑；在口吻而来归兮，誉不汝久。”

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庄生的“洸洋自恣以适己”，所以在《吊屈原辞》中写道：“摇劲节而绵舒兮，荫而自美”；“谅高节之自任兮，匪庭篠之云比”；“怅灵均之节兮依然，想真恣兮千年若此!”一则曰自美，再则曰自任，三则曰真恣。真恣者，天真而自恣也。这都是个性解放的结果，自我人格的实现。

百姓爱名不甚于爱身

《山书》十四云：“棺衣之厚，葬以王礼，百姓不贪其死，以其爱名不甚于爱身。任时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权必易死，是于名，则君子爱身不甚于百姓焉!”

爱名不甚于爱身，也出于《老子》。一章云：“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十三章云：“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王弼注：“无物以易其身，故曰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然后乃可以天下付之也。”吴澄则云：“爱惜贵重此身，不肯以之为天下，

杨朱为我之学原于此。”杨子之言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辩，如此其省也！”又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篇》）这后一段话，其实就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之旨的极好发挥。因为无为的大敌是野心家的有为，而自古至今，有为者莫不假“利天下”之名，谋“悉天下奉一身”之实，遂使天下百姓永远也不能摆脱少数人的愚弄压迫、驱策朘削，根本无法去干自己该干的事。

继老、杨之后，庄子对爱身的哲学也有深刻的论述。《让王》云：“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秋水》亦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三人之言甚辩，理甚明，但却遭到儒家最激烈的攻击，也一直被当权者视为异端，孟子仇恨杨子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但孟子的谩骂也生动地反映出杨朱为我无君之学乃是战国时代流传平民百姓之中的显学，使用现代名称可算为大众哲学，这也就是刘蜕在上边那番议论中发前人所未发的一点新意，他不讲圣贤如何看待爱身这个问题，却专从百姓的看法来讲爱身的道理，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棺衣之厚，葬以王礼，百姓不贪其死，以其爱名不甚于爱身。”这个极平常却极正当的道理，其实早在古代社会流行，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指导人们实际行动的理论基础，如果不跟官家的人讲话，不写在教科书上，老百姓之间是直言不讳，不以为羞的。

由于历史的误导，爱身跟性生活一样，总是被当成犯罪，只能偷偷摸摸地背着人干，可笑的是人人都口非而心好之，人人都不能不作伪。应当感谢刘蜕在千多年前就把“百姓爱名不甚于爱身”这个极重要的事实揭示出来了。

孔子之道如商君以其法自弊

刘蜕少年时颇锐意仕进以救世，故亦曾自称“小儒”（《吊屈原辞序》），但入世既深，所见封建专制和儒术之弊日积，其非封建非孔孟的倾向也就日趋激烈。他在年逾知命时所作《文泉子集序》中先说“收其微词属意古今上下之间

者，为外内篇焉；复收其怨抑颂记婴于仁义者，杂为诸篇焉”。公然宣称自己的文章若不是对当世隐晦的批评（微词），便是满腹牢骚（怨抑）、触犯（婴于）仁义的议论。又说“覃（延）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旗帜鲜明地向儒学发起挑战，主张兼容百家之旨，反对一家独尊。跟比他大52岁、以孔孟仁义道德传人自诩的前辈韩愈的名篇《原道》唱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调，表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他不但在《相孟子说》中批评“孟子之爱人也细，缘其言而不精，以为习而有利，则心唯恐其利至于伤人，则曰术不可不慎也”，指出“术”焉得慎？慎则情背也；心则可慎，慎则惟术之恶而不利其伤也”。更为大胆的是，他在《江南论乡饮酒礼书》中借题发挥，把矛头直指孔子：“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长，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过于一日，尚犹偷惰如此，况天下尊君敬长，能终日者乎？是以朝廷时诛不顺，邻里日起纷争，固为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则用其道自达，故化耕稼为王侯，化陶渔为公卿，其变化不测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预兴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严有司，时阅其威仪乎？呜呼！则蜕谓王公大人髦老衰罢，固当然也。”由此，他毫不客气地向孔门提出质疑：“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

在刘蜕心目中，孔门的繁文缛节的礼教其用意不过教人“尊君敬长”。但是在实际上，不用说老百姓阳奉阴违，即使是王公大人也只是借这个阶梯去谋取利禄，谁又真正把它当作“自化之术”，而能“一日勤其容”呢？故曰：“髡褐（僧徒）尚能自大其法”，“唯王公大人无惭髡褐乎？”在《赢秦论》中他也指出：“盖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败无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绝其事君敬长之术，而后从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又说：“陶唐氏之水，前有圣人之化，后有圣人之勤，而后民知事君敬长之术。自秦之火，前圣已远，后圣不作，而其术不数世亦已成矣。”这就是说，儒家艳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也不过是这班自命为君为师的圣人们设计出来教人服从自己的“事君敬长之术”。这套治术并不神秘，秦火之后在没有圣人的情况下，经过不到几代又由新的君师们重新设计出来了。

把儒术归结为“事君敬长”四个字，这又是刘蜕的一大贡献。四字道出了儒术的真相实质，它并不过问谁为君谁为长，也不管他们是如何爬到人民头上的，只要他们掌握了政权，就无条件地把“事君敬长之术”奉献给他们，为他们捧场，使他们从马上得到天下之后能够马下治之。所以，两千多年来尽管君长不断更迭，朝代不断兴亡。而孔门始终稳坐师位，即使是最革命的朝代，在兴起时容或有批孔的锋芒，但一登君位，为了稳定局势，便也无例外地照旧尊孔读经了。由此也可见，自命君师的封建专制跟尊君敬长的孔孟之道其实是狼

狈一体、相依为命的。自古迄今，任何封建专制政权最终都必然尊孔崇儒，而任何革命政权如果它最终回到尊孔崇儒的老路上，那就证明它的革命性已经丧失殆尽了。谈现代化而寄望于复兴儒学，求民主科学而取法乎事君敬长，无异于与虎谋皮，非愚即伪。

仁人之术不过以爵召盗

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最早把盗贼产生的根源归于统治者的有为。庄子发挥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又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就进一步尖锐指出：窃国盗名的大盗，原来都是自命君师的圣人培植出来的。

到了刘蜕手里，盗与圣人的暧昧关系终于大白。《疏亡》云："盗，恶名也，取之有以合圣人，若取其乱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则民乐其取也，后岂择其故欤？故昏夜之盗为小人，衰乱之盗为大夫。能知其取者而尝蹈其背也，故不以无人而弃其守者。有大弃天下者，仁义盗其名；有小弃其国者，小人有盗其器。故《春秋》不贬其器，圣人必正其名。呜呼！盗非恶名也，左右前后亦可惧哉！"为什么同样是"盗"，而其名却可以为"恶"又可以为"非恶"呢？就是因为孔门圣人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巧立下双重标准来愚弄百姓。只要他盗取的东西"有以合圣人"，圣人作的《春秋》都"不贬其器"，承认它是合法的；对于"衰乱之盗"，圣人还替他正名为"大夫"，对"大弃天下"以盗取之名，则称之为"仁义"。究竟哪些盗"合圣人"，哪些盗又不合呢？那就只看他盗到手的权力是否已达到控制天下国家的地步，是否有资格接受圣人"事君敬长之术"的捧场。

为了穷追圣人的伪善用心，刘蜕还在《山书》十五中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圣人有意哉！故劝善以爵，使利爵者乐修。夫恶杀人，与杀盗，钧为仁人之心，则亦召盗以爵。呜呼！使圣人无意，由劝善不以爵矣。故君子为善不独乐，欲为圣人而出。是不见仁人之术使爵禄以召盗乎?"这就是说：圣人用爵劝善，是有意使那班追逐利禄的人乐意做善事。但实际结果却只是引诱他们以做善事为手段去盗取爵禄。由此得出结论：孔门所谓仁人之术也不过使爵禄以召盗罢了，所以后世君子做善事的动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自己乐意，而是由于圣人有意用爵禄诱发而出；他们最后沦为窃取爵禄的盗贼，也应拜圣人之赐。这段剖析也可算是刘蜕的一个新发现，它对于当世君子之热衷于"新儒学"者无疑也是一剂醒酒汤。

"黄老"思想简说

余明光

"黄老"思想是道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它和老子之学共同构成完整的道家学说。由于"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在汉代以后失传，而老子之学却独传于世，"黄老"遂不为人所知，成为学术史上的千古之谜。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黄帝四经》，才使我们对"黄老"思想的真面目有所认识，才解开了这个千年学术之谜。现在就"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向大家作个简要的介绍。

一、"黄老"名称的由来

"黄老"一词，在先秦古籍中是没有的。而在道家文献中，只有黄帝和老子的名称。同样，也只有托名于黄帝和老子的著作。所以在先秦时代，思想学术界的认知是非常清楚的，黄帝就是黄帝，老子就是老子，从来是分别论述而不混同的。故道家文化，祖述黄帝和老子是有依据的。

那么"黄老"这一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源于《史记》。是司马迁所创造的。在《史记》中，如在论述申不害时，乃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在写韩非时，又称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诸于此类的叙述，在《史记》中屡屡出现。可知"黄老"这一名词的创造者乃是太史公司马迁。由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采用同类相聚的写作方法，他把同时都属于道家的黄帝与老子这两个学术流派合称为"黄老"也就很自然了。但造成后世的黄老混同以及在学术思想上的种种误解，却是司马氏始料不及的。

自从《史记》创造了"黄老"这一专有名词后，尔后班固又在《汉书》中加以认可和继承。因此"黄老"这一名称遂为传统的思想学术及文化界所认同，一直承传至今。虽然这个名称不怎么科学，但我们今天也不得不沿用这个历史的名称，来论述黄帝之学。

二、"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

"黄老"思想，简称"黄学"，也就是道家黄帝之学。黄帝之学，在战国中期以后，发展成为显学，各种托名黄帝的著作，层出不穷，蔚为壮观。仅就《汉书·艺文志》所录的黄帝书，就有12类26种之多，而其中道家文献占了绝大多数。在道家文献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黄老"思想的代表作《黄帝四经》。可是这部著作，到汉代以后就失佚了，人们无从了解到它的真面目，大家所知道的也只限于《史记》和《汉书》上所记载的一些片言只语。所以"黄老"也就成了千年之谜。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大批帛书，在这批帛书中，有一部帛书经学术界考证，它就是《汉书》上所记载而失佚了千年之久的《黄帝四经》。后来我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并参照战国秦汉的历史，认定它确为黄帝书，并且是"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因之写成了《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这本专著，使我们对"黄老"思想的具体内容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破译了学术思想史上这个千年之谜。

这部黄帝帛书，是由四篇经文组成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所包含的哲学、政治、伦理、军事等思想却非常丰富。

根据对这四篇经文的研究，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一）哲学思想

在《道原》篇里，集中地论述了"黄老"的理论基础——"道"的本原、性质和作用。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渗透着"道"的思想，体现道的功能和作用。这是作为道家文献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此书定性的依据。

《道原》认为，"道"是创造万物的本原。世界的本体就是"道"的存在，才产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以"道"不仅主宰自然，而且也主宰着人类和人类社会。它的特点是："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即至大无外，同时又是"精微之所不能至"，即至小无内。它既无形又无名，"高而不可察，深而不可测"，使人高深莫测。同时它又是"坚强而不撌，柔弱而不可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使人捉摸不定。"道"就是这么一个虚无缥缈的浑沌一体的存在。虽然你对"道"感到神秘莫测和捉摸不定，但"道"却天天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为我们所运用。"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人人都可体会到它的存在。正是这个客观独立存在的"道"，它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受任何事物的支配，它高于一切，贯穿一切，它是宇宙万物生成之本，也是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

"道"不但是一个客观的独立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运动着的

东西。其运动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按一定规律运行的。正是由于道的运动，才使万物形成对立、统一和斗争，促使事物对立的双方相互转化。这些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四篇经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二）"黄老"的社会政治思想

在这方面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是大不相同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文武并用，刑德兼行。儒家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王道、仁政和德治，故崇尚文治；法家则力主霸道、镇压和刑法，故崇尚武功。两家都不免有片面的地方。而黄老之学则兼采众家之长，主张文武并用和刑德兼行。认为这是符合天道的。何谓文？何谓武？"四经"都有具体的解释："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伐也以伐死，谓之武。"天道如此，故政治也应该遵循天道，"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所以治国应该"文武并用"，才"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使天下服从。但文武之用，何为重点？则要视国情而定。

与"文武并用"紧密相连的是"刑德兼行"。认为治国既要有强制性的刑罚，又要有心悦诚服的德教。故说："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又说："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要"刑德相养"，政治才能稳定，国家才能久安。

2. 以法为符，皆断于法。古佚书中的法治思想，是黄老之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经法》开篇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强调法是从"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认为法是判断是非、得失、曲直的标准。经文说："法度者正之至也。"指出法律是最公正的标准。又说："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有了法律条文，一切是非黑白都可判定。所以古佚书强调"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并且指出执法者要大公无私，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乱法，即所谓"生法度者，不可乱也"。只有严格而公正的执法，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故说："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又说："案法而治则不乱。"

值得注意的是黄老之学虽重视法治，但没有走向极端，而且它是坚决反对过极政策的。如说"过极失当，天将降殃"。更不允许滥用法律条文镇压老百姓。在法与德的关系上，它是主张"先德后刑"的，对执法取慎重态度，认为这是"顺于天"的。

3. 无执无处，无为而治。黄老讲无为与老学讲无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子之学的无为是自然主义的；而黄老的无为则是有前提条件的，也就是在既定的统治秩序下，各自安分守己，从上到下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好和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十六经》说："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总之，一切都在既定的统治秩序下

的各自有为，便构成上层统治者的无为。这就是黄老无为的实质。这一特征最显著的表现在汉初曹参为相和汉惠帝讲的那一套无为而治的大道理，汉惠帝因而茅塞顿开，体察到黄老无为之妙。

黄老无为而治的理论与薄赋敛、省刑罚、与民休息的治道紧密相连，因而大大丰富了无为的内涵。所有这些理论，在汉代初期都已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付诸了实行，使汉帝国得以空前强大。

4.保民、爱民和养民。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在黄老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十六经》通过黄帝的口说："吾受命于天……吾畏天爱地亲民……吾爱民而民不亡。"并把"失民"看成是"五逆"之一。要不失民，首先又在"养民"，故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为了保证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帛书强调统治者"毋乱民功，毋逆天时"。一切号令都要符合民心，合于民利，认为"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又说"圣人举事也……使民同利"。能如此，则可收到"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的效果，老百姓也可发家致富。所以黄老思想是积极鼓励老百姓发展生产以致富的，而政府则应该放宽政策，采取"薄赋敛"和"弛关市之征"的措施。《经法》更主张"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认为"赋敛有度则民富"。其具体的步骤则是"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使百姓三年致富的时间表。它确实反映出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振兴经济、发展生产的雄心壮志。这是与老子之学大不相同的。

以民为本的思想还非常重视民智的开发和对民意的尊重上。这也是和老子的"愚民"思想不同的。《十六经》说："毋壅民明。"就是不要堵塞民意，要让言路畅通，广泛吸取人民的智慧。《称》篇甚至号召要"因民以为师"，认为"主得臣辐属者王"。

这当然是比较开明的政治，所以黄老反对暴政，认为"人恶苛……苛而不已，人将杀之"。而苛政最集中的表现就在征收赋税上。所以黄老之学特别重视对人民取予的度量，认为这是关系到政权是否稳定的大事。《称》篇说："取予当，立为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历史上国家的存亡兴废，其原因大多与此有关。所以古佚书是深深懂得这一历史辩证法的。

5."贵贱有恒位"的等级思想。这也是与老学不同最为显著的地方。黄老之学认为等级是由"道"产生出来的，等级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符合天道的，故说"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认为"主阳臣阴，上阳下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可见在黄老之学看来，"贵贱有别"、"富贵有等"是合乎阴阳大道

的。无疑，这是为新兴的封建等级制度作辩护的理论。

以上五个方面就是黄老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尚有其独特的军事思想与伦理思想，因篇幅有限，在这里就不讲了。

三、"黄学"与"老学"的差异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并使用"黄老"这个专用名词后，对后世学术思想界造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黄老混同。这个问题自汉以后一直延续到当今，千多年来，学术界在解释"黄老"时，毫无例外地都是以"老"代"黄"，即拿老子之学解释并代替黄帝之学，因此常常造成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形成很多历史疑案。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春申君列传》，《汉书·高五王传》，都记载有"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道家言论。过去读《史》、《汉》，对这些话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老庄的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言论，《史记》又怎么说它是道家言呢？后来在研读黄帝帛书时，才赫然发现这些言论的记载，心中才豁然开朗。又如《史记·论六家要旨》，司马迁用"圣人不朽，时反是守"来概括总结道家文化的精要。可是在老子书中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的论述，而在黄帝书中却有明确的记载。再如西汉初年，《史记》明明记载是黄老无为之治，可是历来的著作，包括冯友兰、侯外庐这些著名的学者，都用老子之学来解释。可是，讲来讲去，总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使人觉得总有些牵强附会，得不到要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区分黄学与老学的差异，没有弄清楚黄与老虽同属道家，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所以要正确解释历史，就要严格区分"黄"与"老"的不同。现就"黄"与"老"的主要分野，论次如下：

(1)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老子》思想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它代表着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阶级，因而反映出消极避世的思想特色。而"黄学"的阶级基础却是从庶民中新上升起来的地主阶级和富有者，因而处处表现出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2)《老子》讲道而不讲法，甚至反对法。如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而"黄学"则认为"道生法"，"案法而治则不乱"。所以是否讲法用法，是区分"黄"与"老"的重要标志。

(3)《老子》强调无为而不争，"黄学"则强调"不争亦无以成功"，认为该争而不去争的话，那就是"逆天"。

(4)《老子》既主张不争，遇事总是慢吞吞，时间观念很差。因之"不敢为天下先"。"黄学"则认为时间很宝贵，故说："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强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皆见《十六经》)。认为抓住时机，果断决策，对于发

展生产、用兵打仗都是极为重要的。

(5)《老子》一书，未尝有一言谈及生产，也无发展生产的明显要求。而"黄学"则对生产相当关心，《四经》中关于发展生产的话很多，并鼓励老百姓发家以致富。

(6)《老子》书思想甚为闭塞、内向，要求人们"三绝"："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做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完全与外界隔绝。而"黄学"则相反，它鼓励人们"周流四国"和"外内交接"。这种外向的、开放的思想是老学所没有的。

(7)《老子》重自然无为而反对人为，认为："为者败之。"完全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黄学"则认为人可胜天。《经法》曰："人强胜天，慎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后来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8)《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黄学"则不认为这就是绝对真理，认为："人道刚柔，刚不足以，柔不足恃，刚强而虎质者丘，康沈而流湎者亡。"它比老学更懂得刚柔的辩证法。

(9)《老子》讲无为完全是自然主义的，即《淮南子·原道》篇所解释的："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而"黄学"的无为则是在既定的统治秩序下的各自有为，才构成上层统治者的无为。

(10)《老子》主张不分贵贱，一律平等。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认为人人都是自然中的一分子，故无贵贱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而"黄学"则认为等级是天道所生，故等级的存在是合理的，只有按等级统治才能治理国家，故曰："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

以上就是"黄学"与"老学"的十大差别。故"黄"与"老"是不能混同的，只有正确区分"黄"与"老"的不同文化内涵，才能把握住这两个学术流派不同的特点，也就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

四、"黄老"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先秦时期的文化，尤其是战国以来的各家思想，就其思想影响来说，韩非称儒墨为显学，孟子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可见真正成为显学的乃是儒道墨三家。但就道家而言，先秦时期老庄之学远远比不上黄老之学的昌盛。如齐国的稷下学宫，黄老学派几乎占了统治地位。正因为黄老学者众多，所以在战国秦汉这段时间内，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个以研究黄帝为中心的文化高潮，各种托名黄帝的著作大批地涌现，因而使黄帝得以确立在思想文化上的至高地位和理论上的权威，而属于道家的黄老之学亦蔚为壮观，终于在西汉初期形成历史的高峰。它对历史文化的贡献在于不仅补充了老庄学派的不足，而且全面发

展了道家学说，形成了道家一个新的流派，极大地丰富了祖国文化的思想宝库。

黄老学派以其理论和实践，在众多的文化选择中被汉初统治者选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走上了政治舞台。在西汉初期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汉帝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老的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政治思想在西汉建国的实践中，被政治家们运用，创造出独特的汉家制度，即王霸道杂之的统治术。这一统治模式，对后世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由于汉武帝尊崇儒学，黄老之学乃逐渐走向衰微，加上它的代表作《黄帝四经》的失佚，黄老之学遂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其余绪亦渗透融合在其他各种历史文化之中。例如战国末期直至汉代的儒学更新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的兴起，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寻其发源，探其发展，究其余绪，是今后研究"黄老"的重要课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周敦颐与汝城

王兴国

周敦颐于皇祐年间由郴县令改任桂阳县（今汝城县）令。在此任职4年。时间虽短，但留下了一些行踪的记载和传说；汝城人民为了纪念这位“父母官”和思想家，曾建有一些祠堂和书院；他们还用周敦颐的言论反复教育后人，使之能成为“彬彬圣人之徒”。本文拟根据现存的一些史料和地方文献，对此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关于周敦颐在汝城活动的记载和传说

关于周敦颐在汝城活动的记载和传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设置木匭以藏文书。对此，度正在《周敦颐年谱》中有记载：“时于桂阳县厅置木匭一，高四尺，阔视高加尺焉，以贮官文书，上锓‘皇祐四年置，桂阳县令周’十字，而书押于下。”这说明，这个木箱有4尺高，5尺宽，并有周敦颐的画押。其用途是装官方的文书。周思诚写于嘉定十五年（1221）的《初建濂溪祠记》，全文引用了度正的上述记载，并说在周敦颐离开此县之后的一百多年之内，由于“屡经盗火”，此木匭“煨烬亦久矣”（民国二十一年修《汝城县志》卷十七。以下引用此志材料，只注卷数）。

其二，为郴州知府李初平讲学。此事在度正编的《周敦颐年谱》中，是系于宝元八年（1048），即周氏任郴县县令的第三年。但《宋史·周敦颐传》却是将它系于周氏任桂阳县令期间。传云：周敦颐“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如之何？’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高佑釲在《重修濂溪书院记》中也说：周氏“令桂阳阅四载……郴守李初平知先生贤，问之曰：‘吾欲读书何如？’”先生对曰：“‘公老矣，无及也。请得为公言之。’初平遂日听先生语。盖二年而有得。”（卷十七）笔者认为，度正的年谱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因为李初平要“日听”周敦颐的讲学，只有在周氏任郴县令时才有可能。

其三，濂溪吟弄处。据《汝城县志·建置志》记载：“在县西桂枝岭对岸，

峭石临江，先生筑亭于此，今圮，字迹犹存。”邑人范仲易在《濂溪吟弄处记》中说：“先生令桂阳时，吏治之暇，尝行吟于此。虽云自适，亦以考道且观政也。”邑人袁宗佺作《秋日游濂溪吟弄处诗》云：“古篆何年挂石磴，登临弥望思无穷。今人不见当时月，百代犹闻夫子风。两岸青松长洒落，一泓秋水自熙融。孔颜真乐无寻处，想在吟风弄月中。”（卷十二）

其四，爱莲池。《汝城县志·建置志》云：“周濂溪为邑令时所凿。遗址在典史署北，县堂之东。池上构阁与堂，日久就湮，遂失所在。民国十九年（1930）县长陈必闻创开公园，遂不谋适得故址。”据度正所编年谱记载，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于嘉祐八年（1063），已是他离开桂阳10年之后。因此，桂阳“爱莲池”恐系后人之附会。（卷十二）

其五，予乐窝。据《汝城县志》记载：“在县西五里江口。二程从学濂溪至此，有‘时人不识予心乐’之句，后人遂名其地为予乐窝，俗名为予乐湾。”（卷十二）关于此乡名称的来源，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其一，周思诚在《初建濂溪祠记》中说：“县西五里有山环合，林木茂翳，而溪流清泻萦纡其间，土人号其乡为‘予乐’。岂亦因先生而名之欤？思诚窃记程明道（颢）先生有‘过前川而予心乐之’句，盖明道尝从先生游也。今读其诗，亦可想见先生之迹矣。”这一说法并没有明确肯定二程到过汝城。其二，高佑釲在《重修濂溪书院记》中说：“县西五里旧有‘予乐湾’，相传程子从先生游此，有‘时人不识予心乐’之句，后人因以名其乡，且筑‘予乐亭’为祠，是先生所凭也，久而复圮。”（卷十七）这一说法就肯定了程颢到过汝城。“时人不识予心乐”，出自《河南程氏文集》卷三《偶成》，原诗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原诗题下有注：“时作鄠县主簿。”（《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页）可见，上述有关程颢到桂阳的故事，明显带有传说性质。

二、汝城人民对周敦颐的纪念

在历史上，汝城人民除了将上述相传周敦颐活动过的地方，如濂溪吟弄处、爱莲池、予乐窝等遗迹多次加以修整、保护之外，还修了一些有关周敦颐的纪念性设施。这主要有以下三处：

其一，濂溪祠。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嘉定十三年（1220），周思诚出任桂阳县令。“入境诣学，谓学必有先生（周敦颐）祠。乃巍然独存大成殿，其门庑遗址尽没于蒿莱，惟一厅一寝室，旁无他房，欲求拜先生之遗像而竟莫知所向，惕然为之不宁。”于是，周思诚利用修建县学的机会，于大成殿右庑之西南，立祠以祀周敦颐。他“又思县之正堂，先生昔尝居之，因榜其中间曰

'濂溪堂'，俾得申其景仰。别创屋三间于东边，曰'光风堂'，亦祀先生像于其中，其旁二间则以为政暇读书之所，庶几朝夕如见先生"（卷十七）。周思诚，字纯夫，号敬斋，江西临川县人。《汝城县志》说他"崇重濂溪，振兴文教，民歌思之。后历官侍郎"（卷二十二）。

周思诚修建的濂溪祠后来毁圮。宋理宗宝祐年间，邑簿李劲请于邑令黄遂，又建祠于学宫前，颜曰"希濂堂"，以祀周敦颐，并祀邵雍、程颢、程颐、张栻、朱熹，名曰"六君子祠"。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邑令李原复建濂溪阁于县厅之东，肖像祀之。阁前为堂，堂下有池，即周敦颐所凿爱莲池遗址。永乐间，此阁毁于寇。成化年间，邑令桂显将爱莲池加深，仍构楼于上，且迎学中所设周敦颐像而祀之。正德年间，邑人御史范辂建议巡抚发白银60两，将祠改建于县西南桂枝岭的予乐湾，且筑予乐亭以祀。嘉靖己酉（1549），知县刘翔嫌其所在地偏僻，又将它迁回县堂东爱莲池旧址。桂阳县设县立濂溪书院后，濂溪祠便与书院合一。乾隆年间，濂溪书院停办以后，邑令胡醇悫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建考棚时，以余资重新修造了濂溪祠，"规制坚朴，内外整齐"。不久又毁。邑人何允纬等"目击心伤，自备资斧"，重修濂溪祠，"刻期蒇事"。他们还通过清查，追回被私售的祠田，"招僧耕管"（同治《桂阳县志》，卷二十）。

其二，县立濂溪书院。这是在濂溪祠基础之上扩建的。早在明正德（1506—1521）初年，邑人就已经计划改祠废庙，在予乐亭所在的江口建立濂溪书院，但此议未果。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宪潘伯骧将刘翔恢复的濂溪祠迁到桂枝岭的予乐湾。次年，知县徐兆先在濂溪祠基础上，增构讲堂、学舍，从而建立了濂溪书院。明代著名学者罗洪先为之作《濂溪书院记》。罗氏从汝城人民数百年来对周敦颐尊崇不辍这一事实，发挥如下感想："知位不在大，则贱可使贵；知学圣有要，则愚可使贤；知风流有自，则身可使存；知见大忘小，则物可使化；知心能有主，则欲可使无；知无欲常尊，则懦可使立……故曰：至易而行，难果无难焉，则先生（周敦颐）可使复见于今日。"（卷十七）

清顺治八年（1651），濂溪书院毁于寇。康熙六年（1667）知县黄应庚重建，以僧守之。到康熙十年，知县盛民誉在书院旁别筑庵，迁去佛像，专门安置周敦颐之木主以奉于中堂。到乾隆初，由于朝阳书院兴建，濂溪书院遂废。

其三，乡立濂溪书院。在县西一里许之旧濂溪吟弄处，与旧县立濂溪书院隔岸相峙。嘉庆九年（1804）建。据邑人范毓洙《西关口濂溪书院碑记》称，此书院兴建的原因，是鉴于乾隆初兴建的朝阳书院"今已就圮，主院者恒假馆于外"，使乡中学子无"群萃州处考校其术艺"之地，"而父兄师长无从第分其甲乙"的情况，于是"县中诸同志谋建立乡学兼束脩膏火之费，以便后之学者。因设立捐籍，随所乐输，以襄厥事。卜地于西城外周子当年吟弄处，与其祠堂隔水一溪。计工三万有奇，计费三千有奇。讲堂斋舍轩豁明爽，倚窗而望，则夫云淡风轻之景，光风霁月之怀，仿佛斯在，因榜其额曰濂溪书院，志渊源所自来也。"

三、汝城人民对于周敦颐思想的评价和继承

从上述汝城人民对周敦颐纪念地的多次修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周氏是充满了敬意的。往下，我们拟进一步介绍汝城人民（包括一些与当地有关的官吏和学者）对于周敦颐的评价和对他思想的继承。

其一，对周敦颐人品的评价。

明人刘节在《重修濂溪阁记》和清人高佑釲在《重修濂溪书院记》中，都曾引用宋儒黄庭坚对于周敦颐的评价。刘记为："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稀世而尚友千古。"高记为："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锐于求志，厚于得民。"（卷十七）两文所引内容均出自黄庭坚《濂溪词并序》。黄庭坚的这些话，对周敦颐的人品的确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而范仲易在《濂溪吟弄处记》中认为，周敦颐之所以有这种"洒落"的胸怀，是与他善于"超然物外"，即虽日处烦琐的政务之中而不为之所困的方法是分不开的。他说："昔唐孟郊仕溧阳，于溧之林水幽胜处，常往来赋诗，而案牍益理。先生（周敦颐）见此山高水清，轻云冷石，花木鱼鸟之各适其性，故道心益粹，政治益古。呜呼！天下之为令者多矣。终日间所视者簿书，所言者国宪，所对者槁项黄馘之粮长，所左右者丰脸大睑之胥吏，所见于堂下者鹑衣虮虱之刑人，能如先生之超然物外者几人哉？余故记之，以为吏于人者告。"（卷十二）

其二，对周敦颐学术地位和学术宗旨的评价。

高佑釲在《重修濂溪书院记》中说："孟子没而圣道浸衰，两程夫子出，续千四百年不传之绪，传及朱子，使圣学复昭而治术以正，皆濂溪先生承先启后之功也。先生得蕴奥于遗经，以穷理尽性之旨昭示来学，其阐图著述，若《太极》、《通书》皆以发明精义，上继孔孟之传，下开程朱之学，修己治人实本乎此。然先生遭盛时不为苟禄，一生仕宦都在州邑，未尝一日坐论庙堂，故其经纶设施亦未尽展布……朱子谓其博学力行，遇事刚果，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南轩张氏亦谓先生仕不大显于时，其泽不得究施，然学者考论师友渊源，必本先生。是先生遗泽，足以使人仰止景行，况昔时过化之地哉？"（卷十七）这一评价是比较实在的。

罗洪先则在《濂溪书院记》中，概括了周敦颐的主静宗旨及其作用。罗洪先对于周敦颐“无欲则静虚动直”的思想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并且还有其独到的见解，研究周敦颐学说者可以披阅其全文。

其三，对周敦颐思想的实践。

汝城人民在历史上不仅十分推崇周敦颐的思想，而且注意以之指导自己的行动。周思诚在《初建濂溪祠记》一文中，谈到他于嘉定十五年将县学和濂溪祠修好之后，率30多名士子“挟册吟咏”时，发现他们“多能读书通道德性命之说，非如他邦举子束此书于高阁，谓非时文所急也。乃知是邦之士沐先生之泽，洽于其心久矣”。这就是说，汝城士子由于受周敦颐思想影响，十分重视把读书与修身相结合，而不是把儒家经典仅仅当成猎取功名的敲门砖。

高佑釲则在《重修濂溪书院碑记》中，分析了周敦颐离开桂阳600多年之后，还为该县人民所追仰的原因：“釲尝读先生所著《拙赋》有云：‘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其《爱莲说》则云：‘中通外直，不蔓不支，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先生又谓其友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无所必。束发为学，将有以设施泽于斯民。必不得已，正未晚也。’今诵其言以思其学术治行，俱灿然如在目中，宜其去桂阳六百三十年，能使后人思之愈久而愈深，岂非学道爱人之明效耶？”

今年是周敦颐初令桂阳951年，我们召开周敦颐学术思想研讨会，其目的之一，不也是要使周氏之“流风遗韵历久弥光”吗？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对外开放精神

王兴国

湖湘文化历来有一种平视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和开放精神。这种精神到了近代，便发展成为主张向西方学习、坚持对外开放的精神。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影响所及，涵盖整个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而，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综观湖湘文化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精神，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湖南人始终站在全国对外开放的前列。

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是在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的威逼下进行的。因此，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也就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从表层到深层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杨昌济在其1914年发表的《劝学篇》中有过清晰的描述。他说：“吾国输入西洋之文明，有其进步之次第焉。其始也以为吾宜师其铁船、巨炮，但取敌之而已，他非所宜用也；既乃学其制造，谓工业可以致富也；终乃师其政治、法律。吾则谓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之科学也。”（《杨昌济文集》，第200页）这段话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后前几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发展阶段作了比较准确的划分，它不仅符合全国的情况，同样符合湖南的情况；并且必须指出，在这些阶段，湖南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始终是站在全国最前列的。

所谓“师其铁船、巨炮”，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西人“长技”的内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作了明确的界定：“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他所讲的夷人“长技”主要还是偏重于西方的兵器和兵法。魏源的这一认识当然首先是从他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目睹英国侵略者的铁船、巨炮要比中国落后的大刀、长矛厉害千百倍之后得出的，因此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一口号的提出，却有如石破天惊，有力地震撼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要再老大自居，起码在军事设备和技术方面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样，就为以后人们向西方学习奠定了一个初步的思想基础；而当时一些著名的湘籍政治家和思想家，如曾国藩、左

宗棠、郭嵩焘等，则更是自觉地将他们在中国开创的洋务运动，视为对魏源上述口号的继承和实践。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曾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解）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这说明，曾国藩的"师夷长技"，购买洋枪洋炮，开始时并不是为了"制夷"而是为了"制民"；而他所说的"期永远之利"，则是为了制夷。所以他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正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48页）正是在此前一年，曾国藩创立了安庆军械所。而这个军械所的设立，则就是杨昌济后来所说的中国向西方学习三阶段的第二阶段——"既乃学其制造，谓工业可以致富也"的开端。安庆军械所不仅生产了一批近代武器，而且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后来安庆军械所迁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制造局，以后又发展为江南制造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骨干之一。

左宗棠和郭嵩焘对魏源编的《海国图志》及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左氏在《〈海国图志〉序》中说："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励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7页）可见，左宗棠是十分自觉地将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视为对魏源思想的继承的。郭嵩焘则在《书〈海国图志〉后》中说："魏氏此书，征引浩繁……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4～95页）郭氏这里所说的"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正是指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

由于洋务运动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它不敢也不愿触及当时已腐败透顶的封建政治制度。因此尽管"师"来了一些西方的近代工业及军事设施，还是无法使中国富强。甲午战争中国海军的惨遭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思考救国之道。于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便进入了杨昌济所说的第三阶段："终乃师其政治、法律。"就是说，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要救中国，不能停留在学习西方的"长技"，即器物层面上，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在我国便先后发生了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在这两个重大政治事件中，湖南人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先说戊戌变法，它虽然是由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但当时最有成效的变法活动还是首推湖南。而其中的骨干分子当推谭嗣同和唐才常。谭嗣同曾批评洋务派是"沾沾于洋务之枝叶，而遗其至精"。在他看来这种"至精"，就是"西人之体国经野、法度政事"（《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61页）。所以他大声疾呼："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同上，第155页）"故不变法，即偏安割据亦万万无望，即令不乏揭竿斩木之辈，终必被洋人之枪炮一击而空……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同上，第156～157页）为了避免这种当洋奴的厄运，谭嗣同为变法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不久，唐才常又在自立军起义中殉难。谭、唐的英勇献身精神，更加激励了湖南年轻士子向西方学习的热忱。所以，在本世纪初掀起的出国留学潮中，湖南留学生人数位居全国的前列。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先进分子在认真总结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教训之后，认识到改良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才是拯救国家的惟一出路。于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禹之谟等等，纷纷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领导下，经过反复起义，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辛亥革命，推倒了封建帝制。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又被袁世凯窃取。袁氏为了实现其独裁的野心，继续大肆宣扬封建礼教，蛊惑人心。这时，先进的中国知识界便开始认识到，光有政治革命还不行，还必须深入进行思想革命，才能拯救中国。在湖南，乃至在中国，杨昌济对此认识是比较早的。所以，他在1914年发表的《劝学篇》中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吾国近来（指辛亥革命以来——引者）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涛，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杨昌济文集》，第200页）杨昌济这段话，预示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四阶段，即从思想层面上学习的阶段的到来。所以，当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15年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杨昌济便热情地支持它和宣传它。正是在杨昌济的指导下，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五四"青年迅速成长和崛起。他们不仅创立了五四时期中国最早的社团——新民学会，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而且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迎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着手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人民（包括湖南人）向西方学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二，近代湖湘文化的对外开放精神，是在和保守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开篇曾指出："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及究其洋务之谓，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土番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者，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73～174页）谭嗣同的这段话表明，近代湖湘文化的对外开放精神的形成，充满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

郭筠仙是郭嵩焘的字，他是中国近代最精通洋务者，也是宣传洋务思想最为积极的一员。为此，备受朝野的攻击。但郭嵩焘决不气馁。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当他在朝廷工作时，大学生沈桂芬告诫他"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于谤讟刺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接往来，亦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生一衅端"（《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可见，郭嵩焘完全是基于正确处理中外关系的立场，希望人们深入了解洋情，"通晓洋务"，因而不避"谤讟刺讥"，坚定不移地宣传他的洋务思想的。光绪二年（1876），当他行将出使英国之际，更是遭到湖南士人的猛烈攻击。在他们看来，这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当时，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集会玉泉山对他进行声讨，并将他倡议修复的上林寺烧毁，还扬言要砸他在长沙的家。有人则编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郭嵩焘将他从上海去伦敦的旅途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送交总理衙门，同文局将它刊刻出版，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由于该书中有不少对西方文化的赞美之词，当时一位御史便参劾他"有贰心于英国"，朝廷也颁布圣旨，将此书毁版。曾劼刚是曾纪泽的字。他曾继郭嵩焘任出使英、法大臣，并经过艰苦谈判，修改了崇厚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取得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惟一的一次胜利。可是在此以前，曾纪泽因父亲曾国藩逝世，从南京乘小轮船至长沙，从而引起官绅大哗，数年不息。上述情况，正是谭嗣同说的郭、曾二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的根据。可见，在19世纪，人们宣传对外开放是何等艰难。

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左宗棠办洋务，没有受到这么厉害的攻击，而郭嵩焘为什么如此备受攻击呢？这是因为，一方面，郭氏没有曾、左那么多"事功"，威望也不及他们高，所以当时一些士绅对曾、左还有所顾忌，而对郭嵩焘则无所顾忌。另一方面，曾、左办洋务重在实行，不尚言谈。左宗棠就曾扬言："洋务不可说，一说便招议论，直须一力向前干去。"（参见《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857页）郭嵩焘则不然，他不仅干洋务，而且著文谈话都要宣传他的洋务思想。而他的洋务思想又大大超出同时代人的水平，所以更难以为一般士绅所接受。这里，我们仅举二例以说明之。

例一，我们知道，洋务派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认为中国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完善的，只是物质文明不如西方；因此只要学了西方的"长技"，中国就会自然富强。郭嵩焘则以为不然。他在光绪元年（1875）上奏朝廷的《条议海防事宜》中指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郭嵩焘奏稿》，第345页）就是说，中国有中国的本末，西方国家有西方国家的本末。我们向西方学习，不能遗其本而效其末。何况，"造船、制器"不过是"商贾"这个"末"中之"一节"呢？所以他主张："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渐积之功。"（同上，第344页）如果说这里还只提到要了解西方国政、军政的话，那么他通过两年对英、法等国的亲身考察，就盛赞其制度的先进，并希望中国能仿效之。显然，郭嵩焘的这一认识，已大大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樊篱，而步入了早期改良派思想的范畴。这种思想的超前性，当然难以为同时代的士大夫所接受。

例二，是郭嵩焘抓住那些保守派以大帽子压人的基本论据，反复进行揭露和批判。当时，保守派反对学习西方的最基本论据，就是儒家宣传的"夷夏之辨"。在古代，儒家提出这一观点，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较高，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较低，提出这一口号，对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致被异民族入侵所中断，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可是，当历史进入近代之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已明显高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这时，如果继续抱着这种"夷夏之辨"的观点，就只能意味着拒绝向西方学习。郭嵩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日记中，就曾尖锐地批评过"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其立言不过主尊朝廷、攘夷狄，以议论相高"（《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402页）。他认为正是士大夫的这些议论，导致朝廷在战争前后"彷徨迷乱，莫知所措"的根本原因。郭嵩焘的这些尖锐的批评，当然更加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前对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批评，与郭嵩焘是一脉相承的，谭氏在谈到洋务运动时曾指出："近日又有一种议论，谓今日之祸（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者）皆数十年之讲洋务。冤乎！中国虚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讲之

者？李自成虽有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虚糜帑项而已。”（《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8页）在批评士大夫的虚骄之气时，谭氏亦云：“独怪博学工文、平日自命不凡之士，犹复不知此时为何时，所当为者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而怙以虚骄，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人。动辄夜郎自大，而欲恃其一时之意气，尽驱彼于海外，而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无术以处之者，彼一出而旦夕可定。及见有识者讲求实学，力挽时局，又恶其形己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媢之疾之，诋之为异端，訾之为用夷变夏，然则便当高坐拱手以待诛戮耶？”（同上，第156页）正是郭嵩焘、谭嗣同等人与保守派不遗余力地进行的这些斗争，才为以后湖南广大青年士子积极从政，虚心向西方学习，扫清了种种思想障碍。

在分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对外开放精神的两个基本特点之后，我们还必须进而分析这种开放精神给近代湖南和湖湘文化所造成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要地指出以下三点：首先，它有力地提高了湖南在全国的政治地位。鸦片战争以前，湖南在全国的地位平平，并无多大影响，而进入近代之后，其地位便骤增。这固然与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军，因而导致清王朝的“同治中兴”有密切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曾国藩的湘军将大批农民和知识分子带至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使之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方文化。而曾国藩、左宗棠所兴办的洋务事业，又培养了一批精通洋务的人才，从而有力地调动了湖南士人开眼看世界的积极性。湖湘文化本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的士人沿着前辈向西方学习的足迹，不断加深自己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因而使自己的思想不仅能与时俱进，而且往往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这不仅有郭嵩焘为证，而且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湖南先进人物的表现，均是明证。

其次，使“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真正成为现实。在古代的湖南，出现的人才不多，群体更少。而在近代短短的80年间，却先后涌现了五个巨大的人才群体，即以嘉道年间的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人才群体；咸同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为代表的人才群体；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为代表的人才群体；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为代表的人才群体。这些人才群体的形成，虽然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条件，但是不同之中又有相同，就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对外开放的精神，而且越到后来的人才群体，这种对外开放的精神越强。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当时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分不开的。当时的政治家或思想

家，要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作出些微的贡献，就离不开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西方国家情况的了解。上述不同时期的人才群体，正是因为他们从自己时代的历史条件出发，对当时世界形势和西方国家的知识进行了深浅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不同的改造中国的方案或蓝图，因而使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最后，是使近代湖湘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例如，郭嵩焘通过对英、法、德等国近代科学的考察，将中国传统的“实学”概念与西方的“科学”概念统一起来加以认识，说：“实学，洋语曰赛英斯［Science］。”（《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173页）进而认为，西方科学的认识论原因，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同上，第731页）这样，就不仅和曾国藩一样，坚持将“实事求是”从一个考据学命题变成哲学认识论命题，而且进而将“实事求是”与近代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谭嗣同则力图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糅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梁启超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一方面大声呼唤发扬“湖南人精神”，另一方面则如饥似渴地探讨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学说；一方面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和湖南的省情，另一方面又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毛泽东还将“实事求是”给予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认识路线。而在这个改造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代湖湘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李自成归宿研究

叶志芬

我国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究竟归宿何处，三百多年来未能定论。1980年以来，湖南石门夹山及其周围出土和发现了许多与李自成有关的文物，这些文物发表、公布之后，引起了史学界、新闻界以及各方人士的关注，展开了甚为热烈的争论，召开过若干次学术研讨会议，各类报刊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报道与文章，不少人认为李禅隐夹山是可信的，有确切依据的。1991—1993年间，石门县修复了夹山灵泉寺，新建了闯王陵及李自成纪念馆，并将夹山出土的文物移至纪念馆陈列，参观者甚多。1993年秋再次在石门召开了“李自成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各地史学界、新闻界，文物、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参加。通过参观文物和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李自成禅隐夹山为僧，是可信的。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刘重日教授，简述了当年郭沫若主修《中国通史》时委他撰写明史部分有关李自成归宿的情况。在会议以后，这些在社会上，特别是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实事求是地对待文物，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中共石门县委、县人民政府，经过慎重认真的研究，决定敦请中国明史学会、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联合在石门主持召开“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以求通过会议，对出土、收集的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作出公正的评价。中国明史学会乐意主持召集此会，很快向全国史学界（主要是明史研究者）发出了邀请，于是评议鉴定会于1996年3月21、22日在石门正式召开，有史学界28位专家、学者参加（其中有明史学会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理事11人），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物报》、《团结报》、中央电视台、《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电视台、《长沙晚报》、《常德日报》、常德电视台等18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编审或负责人与会。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国恩、常德市政协主席韩林安、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部长蒯定勋出席了会议。石门县原政协主席、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副会长覃正海主持了开幕式，中共石门县委书记周用金作了讲话，他说：“近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停止过对李自成归宿问题的研究，也从未放弃过对这一研究作出最终结论这个目标的追求。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有个明确的结论，但不强求，更不强人所难。因此，恳请专家、学者来石门，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然后坐下来谈一谈，对李自成归宿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议和鉴定。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与要求。”

一、文物是最有说服力的信据

会议开幕前后，与会者的心态是各不相同的，来过夹山，看过文物、资料的同志，希望此次会议能统一认识，作出公允的结论，结束300多年来的一桩历史悬案；而更多的人却是第一次来石门，对夹山说半信将疑，抱着“看一看”的态度。开幕式后，全体与会者到夹山参观了夹山寺（又称灵泉寺）、奉天玉墓葬处、野拂塔、寺下地道以及康熙、道光碑，闯王陵等，详细看了纪念馆陈列的出土文物和资料、拓片。许多人兴致勃勃，边看边听，边议边问，频频点首，一派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参观后开展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中国明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刘重日教授首先发言，他说：“来这里的专家、学者都是研究明史的佼佼者，李自成归宿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石门夹山出土了许多文物、资料，我是研究明史的，应当来看看，于是我参加了1993年的那次石门会议，会间并没有说多少话，可是通山说的某些人，将这个问题搞得沸沸扬扬，说我是推波助澜，那么，石门就是兴风作浪啰。推波、作浪，总得要有水嘛，水是基础，是事实。因此，我想将这个问题摊开，请史学界、新闻界的朋友来评一评，讨个说法。”随后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发言，直抒自己的心情和看法。中国明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德信说：“夹山文物很多，改变了我的看法，奉天玉墓葬与米脂墓葬相同，这就直接说明了问题。‘奉天玉诏’说明奉天玉不是一般和尚，和尚有什么诏？梅花诗残版和梅花诗，也反映了奉天玉不是一般和尚，也不是一般文人。”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张中政说：“我的思想也有个转变过程，念书的时候，老师说要重视正史，因而接受的是通山说，参加工作后也看到夹山说的材料，但不以为然。现在认为夹山文物是有说服力的，本来阿济格、何腾蛟说李自成已死的奏报，都没有真正的东西——没有首级。根据史料分析，当时李自成兵败后尚有20万众，为了保护自己，以图东山再起，隐伏下来在夹山为僧，是有可能的，是符合情理的。”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福泉说：“昨天以前我还是通山说者，来石门看后思想起了变化，‘奉天玉诏’解决了奉天玉的身份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将这一思想贯穿进去。”

对几件新出土的文物，专家们作了进一步的有联系的分析。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中义说："'奉天玉诏'将奉天玉和皇帝划了等号，一般的和尚要什么诏？我认为'奉天玉诏'相似兵符一类的东西，用以调兵遣将。我分析可能不止一块（记录者：已发现两块），要注意再发现，那样更能说明问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兴亚说："'敕印'很重要，我认为'敕勒'不是一个印章，因为它刻的是正文，可能是随葬品，用以说明身份的，以便让后人知道墓主人是谁。这就将奉天玉与李自成的衔接距离缩短了。本来夹山说的材料很多，张琮伯是最早见过奉天玉的，何璘看了画像，冒砍头的危险写了文章（记录者：指《书李自成传后》），还有奉天玉墓碑、野拂墓碑、西安王马铃等，这些材料都是可信的，希望有更新的发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商传说："来石门后看了《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和文物，认为夹山说有理有力有据，这次明史学会来了十多个成员，大家应该有个公正的评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萧良琼说："在石门召开的三次李自成归宿研讨会我都参加了，1985 年那次，我也是不相信的，抱着来看一看的态度，看后认识有了转变。1993 年，在开会之前我向一些同行说过'不怕你不信，只怕你不来'。我的意思是你去看了就会想念的。我是石门人，我觉得除了文物、史料可信外，还有许多关于李自成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值得注意。我小时就听到过不少。这些故事三百多年盛传不衰，说明李自成做过不少好事，说明他确实在这一带有过长期的活动并归宿于此。大家知道，口碑往往是很重要的。"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张显清说："李自成归宿的研究对明史研究作了贡献。参加会议的学者都是造诣很深的，他们是不容易接受与原来观点不同的意见的，这次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记录者：指肯定夹山说的主流地位。）主要是由于材料、文物，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实地参观之后，大家对文物是一致肯定的，认为是李自成禅隐夹山的可靠依据。

二、夹山说应当成为主流

李自成之死，过去曾有六七种说法，经过长期的文物发现与研究，形成了死于九宫山说和夹山寺禅隐为僧说并存的局面。但人只能死一次，只能有一个归宿，不论是谁，概莫能外。这次会议，经过鉴定文物、资料之后，一致认为夹山为僧是可信的，两说并存的情况应当有所改变。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吕景琳说："以前对夹山不很了解，系统认识是在凤阳会议上听了石门博物馆龙馆长的发言，真打动我、说服我的还是来这里以后。李自成究竟是怎样

死的，明史上是个谜，这个人不在了，到底怎样死的，没有说清楚。通山没有材料，更没有新发现。石门令人折服，如果不带偏见，来阅读、考察材料，李自成禅隐夹山是不应该成问题的。我们搞历史的常常是有九分材料只说八分，这次我看在座的是有了十分材料，但只说九分。这样好，如果采取另外的办法，未必可取。"福建大学历史系教授唐文基说："昨天看了文物，夹山说是可信的，这次来石门不虚此行。大学教材明史有关部分是我写的，回去后，要变过来，将来讲课，我一定把夹山说作重点讲，把通山倒过去。"张中政先生说："唐先生说到大学教材中的通山说、夹山说倒过来，我很同意，完全应该，我们陕西也要如此。"商传先生说："前面的先生们说了，写历史教材要把李自成归宿的两说倒过来，我看文物后同意这样做，夹山说应该成为主流。历史大辞典、中国通史，也应该把夹山说放在主流地位。"范中义先生说："我是写农民战争史的，通史稿已写好交出版部门了，但不要紧，估计尚未付印，回去后我想将李自成归宿问题原来的两说倒过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志清说："李自成死于通山疑点很多，禅隐夹山的史料、文物很有说服力，大典、通史上可以以夹山说为主。"吕景琳先生说："我想编通史写有关李自成归宿问题时，把夹山说从括弧里请出来，把通山说放进去。要去掉括弧也可以，但我们不这样做。随着进一步研究，让他们（记录者：指坚持通山说者）心服口服，自己去掉为好。"陕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余树声说："对明史研究我是票友。我只说一个常识范围内的话，就是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不同的，文学不能当信史看。我看了史料、文物之后，觉得夹山说的研究，已经达到可以结论为'禅隐夹山'的程度了。我认为这并不妨碍通山传说的存在。"

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赞成确立李自成禅隐夹山的主流地位。

三、统一认识指日可待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明史》上是这样说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的，虽然没有确凿的依据。清初，何璘就写了《书李自成传后》，民初，章太炎又提出了"六不可信"。但此谬误流传已久，要改变是不容易的。郭老主修《中国通史》时，对此问题也曾有过考虑，刘重日先生说了当时的详细经过。他说："我是从 1955 年毕业后就分配到中国历史研究所的，几十年没有动过。那时候血气方刚，于 1957 年写了几篇论文，评价较好。后来中央有文件，大学生要下放锻炼一年，我下去半年，领导上就要我回来，说是帮郭老写文章，但公社不让我走，留我继续在那里写写画画。不久还是回去了，到'明史稿组'，一直到现在。要我写明史稿，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几章。我首先尽量收齐材料，然

后下功夫看，所以看了以后，评语是洋洋洒洒，活灵活现。关于李自成死的材料我都收了，两种说法我也知道。可是，我是为郭老写书呀，要符合他的观点。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李自成当和尚有损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于是说是地主武装打死的。一次和郭老在一起吃饭时，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郭老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以后的事，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以后发现了文物、资料，你们再研究。'在座的当时有两位在场，你们可作见证。郭老从来没有否定夹山说。他是讲科学的，李自成墓原来在通城，之后移至通山，就是例证。"张德信先生说："夹山说是可信的，但以之代替通山说，不是短期可以统一的，但我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张中政先生说："夹山文物是有说服力的，但教科书要完全变过来，是需要时间的。不过我认为被大家接受，是指日可待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僡说："我认为对一个历史问题作结论，一要有材料，再要受其他方面的制约，比如个人情绪、先入为主的思想等，石门文物很多，材料丰富，应更严谨一些，不忙作结论。"该所另一位研究员王熹说："这个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现在解释李自成的归宿推进了一大步，作结论（指禅隐为僧，记录者）已很接近，这次会议，大家的认识趋向一致就很了不起。我建议进一步挖掘档案材料，明、清史料在故宫博物院上千万册，认真查找，定会有所发现的。"吕景琳先生说："通山说来头很大，时间很久，要统一认识须花大气力，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努力向社会宣传。"李福泉先生说："研究李自成的归宿已接近完成，下一步就是研究他联明抗清的问题，他为什么当和尚，如何领导联明抗清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审宋元强说："我们《历史研究》重视李自成归宿的研究，早在1956年第9期就发表过一批文章。1981年石门的同志投了一批稿，看到了夹山说的材料，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我们当时在刊物上只发了一个综述。对于李自成，以后会有许多新的研究，十分欢迎大家的研究成果见诸我们的刊物。"

专家们发言之后，新华社的刘春贤、《人民日报》的周立松、《中国文物报》的王莉、《中国青年报》的唐湘兵、《团结日报》的黄自荣等同志相继发言，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科学的会、民主的会、有意义的会。夹山说是可信的，应该确立它的主流地位，表示认真地作如实报导。

最后，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会长杨杰作了发言，他说："我们石门研究李自成的归宿，是从1980年开始的，当时，我在地委宣传部工作。研究的目的是想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绝未当成地域之争，也不是荣辱之争，那时候更没有什么'招商引资'的这样一个说法。这次会议，经过大家看文物、看资料和大会讨论，一致认为夹山说可信，应当确立为主流地位。综合大家的意见，

大致有三：一是拥有几乎与闯王同步产生的史料记载；二是有可信的文物，而且达数十件之多，特别是近年出土的'敕印'和'奉天玉诏'，最能说明奉天玉和尚的身分；三是有代代相传，历三百多年不衰的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也是很有价值的补充和佐证。所以，一致认为确立夹山说的主流地位是正确的。今后，我们应当继续收集、挖掘文物，继续发现资料，并多向社会宣传介绍，尽量争取缩短李自成归宿统一认识的时间。同时把研究内容扩展开来，不断推向新的阶段。"

在李自成故乡——米脂博物馆，申长明向石门李自成纪念馆赠送"自成王"马铃和一张拓片，东道主周用金同志讲话后，会议在团结、喜悦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史家的误笔

——谈王船山的《双鹤瑞舞赋》

谭承耕

王船山，衡阳人，是明末清初之际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今年是王船山逝世300周年，我们怀念他，我们正重温和研讨他的著作和学术思想。

这里只说说他的《双鹤瑞舞赋》。因为这虽然只是一篇小赋，但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历史的误会。

记得1982年10月间，曾在我省衡阳举行全国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会议筹备期间，给王船山定下的评价基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思想家。可是，就在会议举行之前，即1982年6月份，中国历史博物馆将王船山亲笔用绢书写的《双鹤瑞舞赋》在《文物》杂志1982年第6期影印发表，同时发表了史展的文章，认定此赋是王船山写给当时正驻兵武汉的清朝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简称尚善）的，当时清朝封他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以讨伐正盘踞湖南称王反清的吴三桂。该赋向尚善祝寿，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据此，史展认为王船山已向清朝妥协，言外之意，就是王船山晚节不终，投降了敌人。史展文章最有力的论据是：①这个赋的确是王船山写的，符合他的笔迹，白绢黑字，铁证如山，无法抹煞；②赋的开头称“唯我安远公，大将军”，“安远公”，自然就是指尚善那位清朝大将军了；③还有一个旁证，即《姜斋诗集·编年稿》中有一篇《安远公所遣都护刘君过寓庵问病歌以赠之》七言古诗，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认定这首诗就是写给多罗贝勒尚善派来的刘都护的，说：“公有疾，寓僧寺，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遣都统刘公省问。”这就表明船山先生与尚善确实是有联系，写赋向他祝寿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双鹤瑞舞赋》的影印以及史展文章的发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这个赋原收藏在长沙某人的手里，解放初期这个人将这个绢书的赋送给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即将此赋交历史博物馆收藏，外人皆不知晓。这时，一下子抛出来，自然出人意料。当时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筹备者，也感到有点被动，

因为人们一向认为王船山始终坚贞不屈，坚决反对满洲贵族的入侵，因此被尊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学术会议也正是据此定下评价的基调。而现在一下子说他已妥协投降，而且摆出了确凿证据，这当然有点难于转弯。

在当时的衡阳全国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根据《双鹤瑞舞赋》认为王船山只能说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能说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他晚节不终；一部分人认为王船山仍然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从王船山当时写的一系列诗文来看，船山不可能与清朝妥协，但当时也提不出坚实的证据。还有一部分人，一方面承认《双鹤瑞舞赋》的真实性，承认王船山已向清朝作了妥协，但又认为王船山仍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他能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来处理与清朝的关系，因而他是更高级的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这的确是历史的宏论，但当时许多人觉得这个论点有点牵强。会议无法对此作出结论。后来，本人经过一番艰苦的考证，终于真相大白。原来王船山的《双鹤瑞舞赋》并不是写给清朝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的，而是写给当时响应吴三桂反清起义的广西将军孙延龄的，王船山根本没有向清朝妥协，与清政府及其将领未发生过任何联系。

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这篇用绢写的赋，的确是王船山写的，但并未写明赋是写给谁的。而且如果赋是写给满清将军多罗贝勒尚善表示祝寿的，那就决不会在末尾落款为“南岳遗民王夫之顿首谨识”，因为“遗民”二字是表示不归顺的、不合作的，是表示划清界限的。

二、史展认为此赋是向多罗贝勒尚善祝寿的最主要的依据，即赋的开始，有“大将军安远公”一语。而当时号称“大将军安远公”的却有两个：一个就是多罗贝勒尚善，因为他当时被清朝授予“安远靖寇大将军”的称号；而另一个则是当时的广西将军孙延龄。据《清史稿》载：“康熙十三年二月，孙延龄举兵反……延龄自称安远大将军，移牒平乐、梧州诸郡。”（《清史稿》，卷四七四）当时孙延龄是响应吴三桂反清起义的，拥兵于桂林。两个中，到底是哪一个呢？而根据赋的内容，只可能是写给孙延龄的，而决不可能是写给多罗贝勒尚善的。①从这两个人官衔的全称来看，孙延龄自称“安远大将军”，这很可能被人亲昵地呼为“大将军安远公”；而尚善官衔的全称是“安远靖寇大将军”，皇帝所授予的官衔是神圣的，岂能去掉“靖寇”二字而单呼为“安远公”呢？②从赋所点明的地点来看，也只可能是写给孙延龄的。如赋的序文说：“（夫之）望秀峰，梦漓水，不自知其未与于笙镛之侧也。”赋的正文还这样描写仙鹤飞翔的方向与地域：“维摄提之天开，腾八荒之瑞气，虬开南云，鹰腾海澨，式我公之胥匡，奋南溟之鹏翅。”不言而喻，这里的“秀峰”，即广西桂林的独秀峰，这里的“漓水”，即广西之漓水。这里的“海澨”、“南溟”，自然

也是描写广西，而决不是描写湖北的武昌，因为广西正挨着南海。既然这样，那这篇赋就毫无疑问不是写给尚善的，而是写给孙延龄的。因为这时清朝的“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正驻兵武昌，他虽奉命“帅师赴岳州”，但进师不利，一直未进入湖南，只师次武昌。如果船山写此赋向尚善祝寿和颂功德，为什么不描写湖北武汉之景，倒描写广西呢？显然，这赋正是写给反清起义的孙延龄，向他祝寿并歌颂其起义的伟大功绩的，因为他其时正在广西桂林举兵起义。此外，赋中还有许多内容，可证明是写给孙延龄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三、史展文章的第三论据，即以王之春《船山公年谱》曾根据《姜斋诗集·编年稿》中的七言古诗《安远公所遣都护刘君过寓庵问病歌以送之》，认为王船山曾与多罗贝勒尚善派来的刘都护有过联系，因而认为《双鹤瑞舞赋》是写给多罗贝勒尚善的。这个旁证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首七言古诗并未写明安远公是谁。另外，同治年间刘毓松作《王船山先生年谱》，也在康熙十三年（甲寅）内，既未写王船山与安远公有联系，更未写他与多罗贝勒尚善有联系。只是到光绪年间，王之春作《船山公年谱》，同在康熙十三年（甲寅）内，在“秋与唐端笏渡洞庭阻风青草湖”之后，加上一条“公有疾寓僧寺，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遣都统刘公省问”。王之春其所以产生这个错误，一是由于他主观臆断，未曾分析船山此时的思想倾向和全面历史与形势；二是因为他乃清朝高级官吏，又是王船山八世从孙，把船山说成已向清朝妥协，和清朝贵族有交往，对他自己政治上有利，对他作《船山公年谱》有利。

总之，现在事情终于已经弄清，船山的《双鹤瑞舞赋》，不是写给清朝贵族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的，而是写给当时响应吴三桂反清起义的广西将军孙延龄的。船山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未向清廷妥协。不过，由于《双鹤瑞舞赋》原件影印和史展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6月，当时即将召开全国性的船山学术讨论会，因此影响很大。故此说一说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澄清历史的误会，使先哲不再背黑锅。

王文清著述叙略

寻 霖

言清代之学术，于湘者，常称四王：王夫之，开一代之宗师，后十数年而有王文清，后百余年而有王闿运、王先谦。四王俱治经史。王夫之，明末遗民，孤臣孽子，逃亡于山野之间，二百年后始有乡人邓显鹤、邹叔绩在曾国藩兄弟的赞助下，整理遗文，审刊全集。清末二王，或为名士，或臻高位。惟宁乡王文清乃乡曲老儒，著作等身而传世者绝少。《清史稿》亦未列传。仅《湖南通志》、《宁乡县志》、《湖南文征集》、《国朝先正事略》、《湘沅耆旧》、《清学案小识》以及李肖聃《湘学略》述其事迹与学术之梗概。

王文清（1689—1779），字廷鉴，宁乡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授九溪卫（今临澧县）学正，故人称九溪先生，转岳州府教授，乾隆元年（1738）举博学鸿词，旋召修三礼，与纂《律吕正义》，年59，以父老归养，应巡抚陈宏谋聘，主岳麓书院14年，陈宏谋曾勒碑所居（宁乡县油草铺），曰“经学之乡”。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寿92，附祀岳麓屈子祠，今存。

陈宏谋《经学之乡碑跋》说：“征君王九溪先生，予值史馆时，即耳其声望，而知其为积学士，丙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抚楚军，始得晤于岳麓讲席，相见恨晚。谈论微至，旁人不识也，予旋有秦中役，怅然久之。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再抚是军。癸未（乾隆二十八年，1763）专延至署，白头相对，形迹两忘。每乘公暇，相与商榷古今，予偶商著《典制》一书，征君乃出其手辑《考古源流》628卷相录，其书囊括渊博，洵为宇宙大观。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解任，别征君于铜瓦桥畔（按：今宁乡油草铺乡），留其家十日。子弟皆来接见，其成童，类已熟习十三经，其成人则举经义叩之，恒于注疏外，别有心得，理精识卓，能阐发前人所未发，余故表其乡曰：‘经学之乡。’并缀数语，勒诸贞珉，以志家学之渊源，王氏其方兴未艾也。”

民国三十年（1941）《宁乡县志》载：“乾隆初，文士承康雍余风，虽务博洽，而犹服膺宋儒。文清之学既淹贯，践履尤严，故梅毂成、方苞之伦，皆盛相推挹，著书几及千卷，毂成称其征引富，考核精，三礼诸书，不为异说，叙

明章句，以便蒙诵，诗文索胸臆而出，不事华缛，子孙皆服习其教，数世不衰，其铜瓦桥故居后嗣，至今耕读不替。弟子甚众，新建吕泰，尤有名，尝撰《十学薪传》若干卷，于文清学术源流，推阐至悉。宁乡经儒，自易绂外，莫如文清，然考古源流，既已灰烬，他书亦多不传。四库馆惟《周礼会要》人存目，读薪传序，亦足窥见崖略焉。”

吕泰者，长沙太守吕肃高之子，太守敬其宏通，遣子受业。吕泰《十学薪传》，第一次整理了其师的著述，将“九溪学术”分为十类：一易，二书，三诗，四礼，五乐，六春秋，七天文，八地理，九算术，十说文。

清人冯开之《岳麓书院记》：“先生教人，不徒以文艺相尚，崇朴黜华，循礼守约。每升堂讲学，凡四书、六艺悉博采群儒绪言，衷诸至当，下及诸子百家、诗古文辞，亦喜时与商榷，俱卓然示以指归。今先生主岳麓讲席时所订学约仍嵌于讲堂壁间。自是湖南士子，羞为八股试帖，相从于经世致用，其后曾左彭胡崛起中兴，盖先生已开其先河。”

船山、九溪皆致力于经世之学，其道德文章实可相提并论。船山卒后百余年，其遗书一刻于邓湘皋，再刻于曾国藩，而九溪著述已作星散，后进不知其名，正史不列其传，显晦迥异，遭时差隆，令人感慨不已。

前湖南文献委员会秦薰陶，居九溪故里，家藏九溪遗著甚多，痛先生遗书之不传，遂致力搜集，著有《二王学述》、《王九溪先生年谱》诸书，又与九溪先生六世孙赓猷（号子梅）、堃猷（号任远）昆仲刊刻先生遗书，于保存先贤学术，厥功甚伟。秦薰陶又作《二王异同辨》一文，见于《湖南文献汇编》，文中论述船山、九溪学术有三同四异：船山承晚明王学空疏之后，独尊濂洛关闽之绪，九溪于乾隆汉学昌隆之时，笃宗朱子，其同一也；船山考订群经，著述甚富，九溪经学，名重当时，其同二也；船山修永历志，于永历死难诸臣，阐扬备至，九溪纂《湖南通志》、《长沙郡志》等，于忠孝廉节，极为关心，一字之成，千金不改，其同三也。船山史论，议论高超，其《读通鉴论》、《宋论》诸书，卓越千古，首重华夷之辨，政事独尊儒术。九溪著《考古源流考》、《典制大义》，于古今典章文畅制度考据甚悉。一则尚论史实，见识宏通，一则考订典章，记问渊博，如鸟双翼，各足千秋，治史之法不同，治学之方亦别，其异一也；船山治经，好为创见，九溪笃守先儒之法，惟恐或失，不敢立异鸣高，其异二也；船山于诸经，精于《周易》，九溪邃于《三礼》，其异三也；船山著述，一百五十年后邓曾争刻，复见于人间，九溪一生精力在《考古源流考》、《典制大义》二书，因其卷帙繁重，无力付梓，吩咐子孙，迄今已散失无存，其已刻诸书，亦多为孤本，其异四也。

秦薰陶又著有《九溪先生著述要目》一文，收录先生遗著34种，然尚不

尽完备，且此文作于40年代，所述情况于今又大有区别。故今根据秦目，参考诸家所言，将九溪先生著述分曾刊行本、未刊行本两部分分述如下。

一、曾刊行本

九溪先生曾于90高龄时立一遗嘱，中述其生平，著述甚为详备，不啻为一自传，遗嘱真迹原有康有为、程颂万跋，后毁。然今仍能于民国二十年（1931）《宁乡王氏族谱》中见到全文，遗嘱中言：“凡所余官俸学俸，悉以置通族祭田……及刻手辑书。”若《周礼会要》，若《仪礼分节》，若《宋儒理学考》，若《考古原始》，若《读史纪略》，若《四书短篇稿》，若《天禄赋草》，若《锄经续集》，若《锄经文略》，若《寄生草》，若《风烛吟》，若《海内嘤鸣集》，若《九溪家训》诸篇，俱已刊布行世。

1.《周礼会要》，6卷，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三《经部礼类存目一》，侍郎刘亨地家藏本。是编以《周礼》注疏浩繁，但约括诸家，略疏字义，以便读者，其凡例称，经文一字不遗，亦一字不动，然叙官亦经文也，自五官之长外，余官则俱删之矣。乾隆二十八年（1763）陈宏谋捐俸锓板。陈序言：未见，予商著典制，征君乃出其《考古源流》相示，其书囊括渊博，洵为宇宙大观，但卷帙繁重，剞劂良难，姑取其中《周礼会要》一书读之。周礼者，千古典制之宗也。会要者，会其元而举其要也。据此序，则《周礼会要》原为《考古源流》中之一种。

2.《仪礼分节句读》4卷，光绪《湖南通志》作6卷，误。乾隆间湖南学史吴嗣富及长沙太守吕肃高刻。

3.《考古原始》6卷，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九《子部类书类存目三》，湖南巡抚采进本。明嘉靖中，桐城赵氏撰《古代原始》14卷，以历代帝王编年记载，各著其事所自始。文清以赵书原本自天皇氏至阴康氏，茫渺无稽，为之刊削，依圣经断自伏羲，并补正伪缺，讫明神宗而止。

4.《宋儒理学考》1卷。

5.《读史纪略》，一作《读古纪略》，4卷，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自序：“余自少时，极好读《朱子纲目》，展卷辄随阅随录，撮其要而取其精……裁为四言，协之以韵，而坊本之可采者，亦偶取其什之一二。”

6.《九溪家训》1卷，又收入《宁乡王氏族谱》中。

7.《锄经文略》6卷。卷首自记言：“文成数十卷，曩时故人邮索其本，谢去之。今耆矣，桑榆日暮，炳烛光微，同人固请受梓，且醵资以待，因检数十首付之。”

8.《锄经寄生草》1卷，王赓猷言：尝考九溪公生平所为诗，第一集为

《锄经诗草》，第二集为《锄经续草》，第三集为《锄经寄生草》，第四集为《锄经薤露吟》，第五集为《锄经风烛吟》，盖《风烛吟》为公最后之作。

9.《锄经风烛吟》4卷。

10.《海内嘤鸣集》6卷，为当时海内名士与先生赠答之诗。

11.《天禄赋草》，一作《天禄拟草赋》2卷，一作4卷。

12.《四书短篇稿》，一作《短篇文稿》若干卷。

13.《考古略》8卷，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类书类存目三》，湖南巡抚采进本，先生初著《考古源流》475卷，乃汇采《三通》、《玉海》、《册府元龟》、《通鉴纲目》、《大事汇》、《学海》、《津逮》、《性理》诸书而成，未及刊行，以书乃先摘其浅近切要者，辑以成编，故曰略。

14.《考古略补》6卷。

15.《锄经余草》16卷，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二》，侍郎刘亨地家藏本，此为先生所作诗集，前有论诗法十条，则其平生心得之语。乾隆五十九年刊。其时先生已卒。

以上诸书多刊行于乾隆年间先生在世之时，先生卒后，书板由其子孙保存于铜瓦桥故居，同治初元毁于火。因其时印数极少，虽民国年间尚有印本流传，而今湖南图书馆未曾收藏一种，文化凋落之速，可谓惊心动魄。

1934年，王赓猷曾于宁乡县扩大行政会议上，提议刊印先生遗书，未果，只得自行将《锄经余草》16卷，《续草》6卷合刊铅印，颜曰《九溪遗书第一辑》。

二、未刊行本

16.《三礼图》5卷。

17.《丧服解》10卷。

18.《祭礼解》10卷。

19.《乐制考》10卷。

20.《乐律问对》4卷。

21.《周易中旨》8卷。

22.《五代史考》，一作《五代史考证》，又作《校定五代史》，1卷，原书已佚，此为王赓猷自殿本《五代史》中抄出。

23.《考古源流》628卷。先生遗嘱中言，惟数十年，纂辑《考古源流》一书，凡正编、广编、续编、补编四篇共530卷，外有《历代诗汇》50卷，《诗文余话》5卷，《史事》4卷，《行己便记》4卷，原已附在源流中，今又抽出，另为别编，不入在内，又手辑《典制大义考》140卷，维此二书，亟一思

发刻。其自序又云：凡三十余年，稿始竣，为门二十，卷六百二十有余，合《三通》、《玉海》、《元龟》、《考索》、《衍义》、《典汇》、《稗编》诸本校之，则要义已著……囊空力绵，不能授梓，并难缮写装潢，姑即将书稿本，线订成帙。

24.《行己便记》4卷。

25.《随手杂录》20卷。

26.《谚语省心录》4卷。

27.《治生要术》4卷。

28.《医方小录》8卷。

29.《阴符经发微》1卷。

30.《寿世丛书》4卷。

31.《历代诗汇》50卷，光绪《湖南通志》作200卷，误。

32.《笔瓒》若干卷。

33.《典制大义考》140卷，《沅湘耆旧集》作200卷，误，此书与《考古源流》同为先生著述之最巨者。

34.《锄经文略》6卷。

35.《古今梓玉》10卷。

36.《诗文余话》8卷。

据王赓猷《重印九溪遗书第一辑跋》，则先生著述尚有《史事》4卷，《三礼图说》3卷，《经义文便录》若干卷，《文事日记》若干卷，《随便胜录》8卷，《姜氏注解三字经》一卷，《诗文话》6卷，《观其录》若干卷，《四六偶存》若干卷，《地理抄录》8卷，《分类三字经》1卷，《朱子性理吟》一卷，《麓山书院学约》1卷，《短篇宦稿》若干卷等。

先生著述凡五十余种，约千余卷，远较船山遗书三百余卷为多，先生著述尚有选入其他丛编者，如《湘水记》见于《小方壶斋舆地丛书》。1947年，宁乡县县长陈应龙搜集残余，尚得20种，其中如先生巨作《考古源流》、《典制大义考》等尚存残本，而今似皆灰飞烟灭，湖南图书馆未藏。

秦薰陶于1950年作古，有一女为东北铁法市离休老干，问及其父所收九溪著述，则已不甚知。王氏昆仲今唯堃猷已90高龄，尚居长沙，每言九溪遗事，则悲痛不胜。

以九溪著述之浩瀚，湖南图书馆亦仅藏《锄经余草》16卷、《续草》6卷而已。

过去先生因其著述浩繁，力不能刻，故分由子孙保存。当今国家安定，中央又提出弘扬传统文化，先生之著作，终当有整理付梓之日也。

左宗棠会见洪秀全的传说探疑

左景伊

先曾祖父左文襄公宗棠于清光绪初年，率兵西征，摧毁了由中亚入侵的英、俄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政权，收复了沦陷13年的新疆，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宗棠公年轻时是一名乡村教师，49岁才出任清军将领，参加曾国藩、胡林翼领导的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传说当太平军起事不久，他曾去谒见洪秀全，拟投奔太平军，因意见不合，乘间逃走。这虽然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说，但史书中屡见记载，如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据传说，左宗棠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立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第427页）

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记载："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第121页）

此外如萧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昀《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日人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在清末民初的笔记、小说中，更是绘声绘色。例如《洪秀全演义》（黄小配著）中有如下二段：

"胡林翼来请左宗棠出山……宗棠道：'洪氏以复国为名，其言甚正，吾辈拒之，实为不顺……待观洪氏法度如何，如其大势可成，吾必听之。'"

"当秀全初下武昌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书于秀全，力称秀全武装有余，文事不足；且称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秀全看罢，觉左宗棠此言有理，但由广西以来，相随者数百万人，皆皈依自己所说宗教，今一旦舍此，将来人心不可知……左宗棠知秀全起事以宗教引导人心，猝难改变，断难从自己之言。故秀全欲爵以大官，左宗棠已离武昌而去，遂就骆秉章所聘，继乃出仕为满人督兵。自秀全失一左宗棠，此后乃反增一劲敌矣。"

不论是史书或小说记载，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宗棠和秀全会见的时间是在太平军起事早期；地点有两种说法，长沙或武昌。至于谈话内容，都作了虽然

简短但突出的介绍，而且惊人地相似。宗棠想助太平军成功，他认为秀全信仰并提倡天主耶稣外教，排斥广受人民崇仰的儒、释，是不得人心的，是政策上的大失误。他的建议得不到秀全的采纳，因此失望而离去。

这些纷繁的传说，从内容看，似乎出自一个来源，也许是真实的，但却缺乏佐证。在资料丰富翔实的《左文襄公年谱》以及《左文襄公全集》、《家书》、《书集》之中，同时人胡林翼、曾国藩等的全集之中，都没有任何有关记载。当然，即使真有其事，由于明显的理由，在当时出版的文字中也决不会留下这一类痕迹的。也许这项传说是虚构，但即使是虚构，却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广大人民对太平军起义寄予同情，对秀全的一些政策却很不满，认为这些政策会导致失败。因则希望宗棠出来协助秀全，收拾局面，完成统一大业。人民选择宗棠，而不是国藩、林翼、鸿章，或其他人，也是有原因的。显然是考察了宗棠公一生的思想、行为，特别是他在太平军起义及参加清军前后的表现，因而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回事。

首先，从思想基础来看，宗棠公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纵观他的一生，年轻时就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著名对联，隐然以天下为己任。中英鸦片战争时，他不满30岁，写信给老师贺熙龄"论战守机宜"，并写了几篇抗敌、治国策略，还要求严惩"主和玩寇"的官员。他给贺熙龄的信说："仕风日下，思之令人心悸"，"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可知他对腐败的清政府是深恶痛绝的。太平军起事时是一股爱国力量，目的在推翻清朝统治。宗棠公和太平军的爱国思想是一致的。他有投太平军的想法和行动也是可能的。他决然不会立即站在腐朽的清政府一边。

从历史事实看，确也如此。太平军起事后，宗棠公徘徊观望约九年之久。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率领家人逃到"群峰错亘、山谷深邃"的白水洞中避乱。湖南巡抚张亮基几次派人来山中相请，他都予以谢绝。后因友人和兄长的多番相劝，才出参湘幕，自称是不得已，仅仅是为了"保卫桑梓"，却不提保卫清朝廷。在长沙只有四个月，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强迫他同去武昌。又几个月之后，张移抚山东，他就趁此辞归，在湘阴乡下住了半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知道他回湘，立即几次派人来邀请，曾国藩也来邀他，他都谢绝了，并宣称："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与周汝充书》）直到次年三月太平军再次进逼长沙，骆又再三相请，他才"不得已勉为一行"。此后留在骆幕五年，因樊燮勾结官文陷害，他辞了骆幕，以进京会试为借口，准备"退隐深山"，但胡林翼等劝阻了他，从此加入清军行列。

宗棠公这一段异乎寻常的表现，使史学家感到惊讶。那时清统治已二百

年，正统思想深入人心。造反和同情造反是要杀头灭族的。太平军造反，他却一再谢绝官方的邀请，就是在"不得已勉为一行"之后，也还三心二意，一再申明准备随时"更名隐姓"，"遁迹荒山"。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他明明采取中立、回避的态度，这和他一贯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截然不同。他的许多友人如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等都迅速站在清军一边。对他这种"乖逆"的态度，不仅亲友多次相劝，连清帝也起了疑心。咸丰帝有一次在养心殿就问郭嵩焘："左宗棠不肯出，系何缘故？"并谕知郭转告宗棠"当出为我办事"！宗棠公屡次以进京会试为借口，以摆脱各方邀请，这点连咸丰也不相信。他说："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一些史学家也注意到这段时期宗棠公的异常表现，如杨东梁说：左拒绝张骆礼聘，是"想再观察一下形势"，是在"反复思量，静观时局发展"（《左宗棠评传》第35页，第39页）。既然是在观察形势，那么遇有适当的机会，他去会见洪秀全就是十分可能的了。这显然是许多人相信左、洪相会的历史根据。

由此可见，这段传说不论是真是假，却说明了许多问题。它既表达了人们对宗棠公的期许和评价，也涉及对太平军政策的批评，何以严肃的史家竞相传播这则似无根据的传说？有些史家说这项传说"比较可信"，他有什么根据呢？如果说史学家是根据小说家言，空穴来风，那似乎不可能。

我们不妨查考一下，首先看看，宗棠公在九年观望期间，有没有与洪秀全相会的合适机会？根据前引传说，左、洪相会的地点有二：一是长沙城外，一是武昌。太平军围长沙是在咸丰二年七八月间（阴历，下同），张亮基奉命接替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到达常德后，即派人去湘阴请宗棠。八月十九日，张、左两人同抵长沙城下，廿四日，二人"由北门登梯入城"。宗棠在众多亲友敦劝之下，应张之约来"保卫桑梓"，在炮火弥漫的长沙城外，说他还会去找秀全谈话，于情于理于势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太平军于十月十九日由长沙撤围北上，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这时宗棠正在湘抚幕中。十二月廿一日，他还和曾国藩在长沙相会。太平军于次年正月初二日放弃武昌。张亮基已署湖广总督。正月十二日，宗棠公随张离长去武，廿二日到达。所以说宗棠在秀全初入武昌时上书会见，也是无稽之谈。

也许长沙和武昌是误传，有没有其他合适的相会时间和地点呢？从1852年9月左入张幕，到次年9月离开以及从1854年3月加入骆幕，到1859年12月离开，这其间他在武昌和长沙尽心匡佐张、骆对付太平军。洪秀全先率军由湘入鄂，后来定居在南京。左洪相会是没有可能的。1860年后宗棠公出任清军将领，更不会与洪相会了。惟有一段时间：1853年9月宗棠公离武昌回到湘阴，直到次年3月去长沙骆幕，这半年期间，他谢绝了"骆中丞及方伯、廉

访诸公书币见招"，并宣称从此要"匿迹销声，转徙荒谷"。这段时间究竟他干了些什么，在《年谱》和《书牍》中均是一段空白。如果在这段时间，他要去某个地方见见秀全或其他太平军首领，倒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段时间的《年谱》中虽没有宗棠公和秀全会见的记载，但是有一段文字，却非常令人生疑。原文如下：

"咸丰四年……二月，陷岳州，进陷湘阴。公居白水洞。寇扬言将入山索公。"又引这年的《书牍》、《与夏憩亭观察书》云："弟居距县城五十余里，当贼踞县城之时，游氛四出，谣言叠起。从城中脱出者，言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

这段文字很明白，"索"就是"寻找"、"搜索"的意思，太平军打到湘阴，要入深山寻找宗棠公。可以有好、坏两层意思，从坏处说，是务必捉拿归案；从好处说，要请这样一位人才出山，参加太平军。宗棠公自己所说将"得吾而甘心"，也可以有两种意思。其实，恐怕《年谱》作者罗正钧和宗棠公本人都还摸不清太平军的本意，《年谱》作者用"索"字，本身就含有深意。这段文字很突兀，也很令人惊讶。

也许有人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宗棠公是太平军的死敌，仅次于曾国藩。太平军派兵来捉拿他，是合情合理的行为。然而还不是时候。这时太平军初起事，宗棠公任清军将领是六年后的事，他成为名幕府，深受骆秉章信任，也只是在入骆幕一年以后，这时他刚离张幕，隐居山中。他虽然颇受一些亲友器重，但在社会上名声还不大。他协助守长沙有一定的功劳，太平军虽在长沙受阻，但撤围北上后取得不断胜利。太平军素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守住长沙也不是宗棠公一人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在当时宗棠公不可能是太平军的主要敌人，不至于派重兵进深山去追捉一个不起眼的幕客。那时太平军在天京定都不久，军事上节节胜利，正值全盛时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小人物的。

姑且假定太平军有捉拿宗棠公的理由，但所选择的时机也令人产生一连串的疑问，宗棠公当时已隐居深山将近半年，太平车怎能得知他的行踪呢？假定他们有一个完善的情报网，这个情报应该主要针对战场上的对手。如果针对宗棠公，应该是在长沙和武昌时出谋划策的他，而不应是退职隐居时的他。如果太平军的情报网完善，一直注意宗棠公的动向，他们自然会了解他在前一年9月离武昌回家的事，归途中悠闲自在，还在同事王柏心的家中度过了几天。如果那时太平军对他恨之入骨，必得而甘心，只须当时派一小队人马潜入湘鄂边界，要为难他是很容易的。当时不动手，为何却在半年之后再派兵寻拿呢？

而且，宗棠公此时是退隐在家，他回乡后一再谢绝各方邀请，并且声言从此匿迹销声，躲入荒谷，不再与尘世相接。这就是明白表示，今后不再与太平

军为敌了。太平军是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为何竟派重兵去捉拿一个藏在深山不与他们为敌的人呢？如果是好意去请他，事先也必应有联系。从史实上看，宗棠公得知太平军寻找他后，立即逃出山中，而且加入湘幕，说明此时宗棠公并不愿为太平军所用。

宗棠公是思想缜密、深思熟虑的人，他在张幕一年中的作为，自己当然很清楚，如他认为他的作为已引起太平军极大仇恨，必欲得之而甘心，他决不会回乡作“隐居”打算，一路上也不会那样悠游自在。胡林翼早就劝过他：“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他应该回乡后立即接受骆秉章之聘，而不至于在半年后太平军来捉他时，才去应聘。如果他认为他的作为不至于使太平军把他当作主要敌人，可以回乡“隐居”，但是太平军确实来找他了，这又如何解释？惟一的可能解释，是他在回乡之后这段时间内又做了冒犯太平军的事。但是史籍没有记载。

太平军是哪支部队来捉他呢？这支部队和他有刻骨仇恨吗？历史上未见有这类记载，难道是天京的领袖们指名捉他吗？这也很难理解。

宗棠公在这段时间前后表现的矛盾，也令人不免生疑，他离武昌时明白表示，今后回乡隐居，不再与闻时事。半年后突然就秉章之聘，此后五年一直尽心竭力协助骆秉章治理湖南。为什么他在半年前要申明隐居呢？为什么半年后又改变初衷呢？显然这半年间思想有一个突变，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在《年谱》中那一段短短的文字，骤看之下容易忽略，如果仔细思索，就会发现很多疑点，似乎在这期间曾发生一件宗棠公与太平军有纠葛的事，促使太平军来寻找他，也促使他的思想突变。如果将史书和小说中传说宗棠公会见秀全的故事安插在这一段时间内，那么上述一连串疑问都能得到妥善的解答。下面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太平军起事后，宗棠公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希望。他早就不满意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满人统治者对汉族的歧视压迫，企待有一个更好的政权来替代它。对于太平军，他也愿助一臂之力。所以在太平军起事早期，他决然保持中立态度，屡次谢绝官方邀请，以观察时局的发展和太平军的动向、得失。他在亲友强劝之下，短期加入湖南巡抚幕府，特别申明仅仅是为了“保卫桑梓”，同时也是为了锻炼自己处理军事和政治的才能。他在张幕一年，结识了不少官员，他和曾国藩“一见如故”，和胡林翼早有深交，对天下事也有默契。官方情况他已了解在胸，而且自信还有左右的力量，对于太平军他还很不了解。当时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并进行北伐和西征，正是一股欣欣向荣的力量。那时还未暴露出内讧和腐化现象，宗棠公一定已知道他们的一些弱点，但需要亲自去看看。可能的话，帮助新政权克服缺点，统一中原，励精图治，击退列强侵

略，他认为这时正是合适的时机，因此，可能在咸丰三四年冬春之际，他秘密到了太平军辖区，会见了洪秀全或其他重要人物。然而太平军是利用宗教起事，定都天京后，不热心统一中国的大业，却偏安一隅，养尊处优，滥封王爵，大造宫殿，广蓄后妃，逐渐丧失了当初的革命锐气；在用人方面，也局囿于由广西跟随来的一帮人，不能广纳人才。特别是洪杨推行宗教迷信统治，宗棠公却一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左洪会谈必然格格不入，如传说所载，宗棠发现“断难从自己之言”，太平军也断难成事，失望之余，于是乘间逃回家乡。

似乎《年谱》中缺少了上面一段史实。如有这段记载，所有的疑点都将消失。

原来宗棠公事先宣称将“匿迹销声”，是为今后行动作掩饰避免干扰。正如王柏心这时给他的诗说：“武库森然郁在心，归来云壑暂从容。”待时而动，并非真正打算隐居。

左、洪会谈内容，正如传说所云。稻叶君山源说：“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与左宗棠之性格”相符。

在时间上，也符合黄小配所记“遂就骆秉章所聘”，即会见是在就骆幕之前。

太平军虽然不能重用投奔他们的才智之士，但也不会容许背弃他们逃走，在和宗棠公会谈之后，他们知道了他的底细，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他，也决不能让他为敌人利用。因此，在发现他逃走之后，命令西征部队经过他的家乡时把他找回来，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态发展。否则，说不通为什么正好在这时太平军要去深山中寻找他。

宗棠公于是思想和态度有了突变。对太平军的失望使他进入骆幕。二年以后，他对太平军悲观的预测一一见诸现实。1856 年天京发生了大火拼、大屠杀，天国形势日蹙，洪秀全日益沉溺于荒诞无稽的迷信深渊中。天京变乱后三年，宗棠公被胡林翼拉入曾胡为首的联盟集团，与太平军一决雌雄。又隔五年，太平军政权覆灭了。一些有心人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如果左、洪相会是事实，洪能重用左，当是另外一番形势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个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左、洪相会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今仍有许多人对它感兴趣，但它只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根据《年谱》上一则可疑的记载，本文进行了分析探究，获得了一些新线索，但由于仍然缺乏确切的证明，它仍然还是一个谜。然而，有一段历史事实却是确实存在的：太平军西征部队在咸丰四年初，即天国成立不久，曾到湘阴去寻找隐居深山中的宗棠公，这是为什么？这确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

从“三二九”到“八一九”

——辛亥两役之比较

郭汉民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了可歌可泣的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集全党之精英殊死奋战，结果悲壮地失败了。然而不到5个月，八月十九日在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又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枪声，这次起义，虽然群龙无首，却赢得了巨大胜利。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这两次起义有何异同？在这两次起义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前者为后者的胜利提供了何种契机？历史向我们昭示些什么？本文拟略加探讨。

一

“三二九”广州起义和“八一九”武昌起义，都是有一定组织、计划、准备的反清革命斗争。在起义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都发生了意外事件，从而使预定计划无法实施，演变成冒险发难。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

“三二九”广州起义早在一年前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之后即开始酝酿和筹备。自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曾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均因“未有充分之筹备”，“仓促起事”[1]而旋起旋灭。有鉴于此，孙中山于1910年3月向黄兴提出了准备在广州重新发动起义的意见，得到了后者的赞同。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等革命党领袖在槟榔屿开会，部署广州起义工作。会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分别到美洲和南洋各地向华侨筹款；1911年1月底，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在继续联络新军、防营和民军的同时，将革命党的精英力量组成“先锋队”，即敢死队。经过数月的准备，800革命志士云集香港，广州也设立了30多处秘密据点。辛亥三月初十日（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分兵十路袭取广州，由赵声、黄兴担任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应该说，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武装起义。孙中山称“光复大业在此一举，固将尽倾吾党人材物力以赴之”，“破釜沉舟之

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

八一九武昌起义的组织、计划与准备也是周密的。湖北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的革命活动姑且不论，单是起义之前的半个多月，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为筹备起义而实现了联合，制定了中秋（10月6日）在武昌发难的计划，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指挥部，文学社的蒋翊武任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任参谋长。起义的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及炸弹制造等事，均有具体布置和安排，加上湖北革命党人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广泛和深入，组织工作比较细密和严整，革命力量比较雄厚等条件，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应当说是很好的。

然而，这两次有组织、计划、准备的起义均因偶然的、突发的、意外的事件而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

就在香港统筹部举行发难会议的当天，革命党人温生才“不谋之同志”而单独行动，在广州暗杀了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导致全城实行了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几处秘密机关相继被破坏，新军的枪支弹药亦被收缴。起义计划不仅未能如期实现，而且增加重大困难，致使参加起义人员锐减。黄兴不得不临时将原定十路进兵计划改为四路。而其中两路的负责人均要求暂缓起义。黄兴被迫下令各部迅速退散，而自己却决心以死相拼。他慨然表示：“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必死于此矣。”“战亦亡，不战亦亡，不如先发，纵然不成，尚足以谢天下，而激后起。”这样，一场有一定计划和准备的武装起义变成了少数革命党人“轻举妄动”[2]的冒险壮举。

与温生才暗杀孚琦影响了广州起义如期举行一样，南湖炮兵的暴动也几乎打乱了武昌起义的部署，发难日期难以确定。八月十八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内赶制炸药不慎而引起爆炸，制配好的起义旗帜、印信、文告及党人名册，亦落入巡捕之手。清吏在武汉三镇加紧搜捕。如果清吏按册拿人，长期积蓄的革命力量就可能会被一网打尽。这样，一场有计划有准备的武装起义同样变成了革命党人的生死抉择。诚如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刘复基生前所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蒋翊武也在踌躇中看到：“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

二

“三二九”广州起义与“八一九”武昌起义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有革命党领袖亲自领导并身先士卒地冲锋陷阵，后者在起义发生时却是群龙无首，一批不知名的新军士兵们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前者悲壮地失败了，后者光荣地胜利了；前者使革命者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悲观失望之中，后者却赢得了革命党人前所未有的殊荣。

广州“三二九”起义是由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领袖亲自策划、亲自部署，并由黄兴、赵声亲自组织领导的，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先锋队”，真正可以说得上是“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3]的伟大壮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起义过程中，黄兴身先士卒、努力杀敌的光辉形象，林觉民、方声洞等志士“为天下人谋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的伟大胸怀与高尚情操以及72烈士慷慨就义，“色不少变”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浩气长存，影响深远。孙中山1911年7月18日《复邓泽如等函》指出：“事虽失败，而其为影响于全世界及海外华侨实非常之大……弟敢决此次失败之因，必定生出他日成功之果也。”后来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截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是从积极方面对黄花岗起义所作的评价，自有其道理。

但如果我们直接地、客观地看广州起义的结果，就不能不说，它并未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多大的震撼，相反却使革命党人自己遭到了极大的损失。连孙中山自己也扼腕叹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黄兴致函海外同志说：“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因此亦损失殆尽。”作为广州起义的革命军总指挥，赵声忧愤成疾，他“痛大志未遂，精英全去……环顾党内人力财力都竭，来日举事大难，感愤之下，病更加剧”，不到20天，即于辛亥四月二十日长逝于香港。黄兴在失败后，一度滋生了绝望之感。他受伤脱险之初，曾欲跳河自杀；赵声死后，他更受刺激，决心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酬死者。当谭人凤、宋教仁等打算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推进长江革命并赴港与黄兴商议时，黄兴十分悲观地说：“同盟会已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自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4]为此，他数月之中“未尝与一友通只字”[5]。显然，他是十分灰心的。直到武昌首义前不久，他才放弃躬行荆、聂之念，抱着决死之志，准备踏上长江革命的新征途。

与“三二九”广州起义不同，“八一九”武昌起义却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先，蒋翊武等人曾派代表到上海商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到汉主持大计，然而却消息渺无。孙中山更是远在美国。为领导起义而组织的指挥机构因宝善里事故而陷于瘫痪，孙武住进医院，刘公匿居汉口，蒋翊武逃亡新沟，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革命骨干已被清吏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按预定计划打响起义枪声的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们，左队队官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起义士兵发挥了高度的历史主动性，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经过一夜战斗，先后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和湖广总督衙署，将一面事先做好的红

地十八星大旗插上了黄鹤楼，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武昌首义的成功只是一系列胜利的开端，在此后不到40天的时间内，就有14个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清王朝迅速陷入土崩瓦解之中。80天之后，辛亥十二月一日，即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自海外归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选首任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的日子“八一九”，亦即1911年10月10日从此永载史册，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日。

三

从辛亥“三二九”到辛亥“八一九”，前后不到5个月，为什么黄花岗起义悲壮地失败而武昌起义却能迅速胜利呢？以往人们多从革命党人主观的方面加以检讨，认为包括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历次武装起义都发生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地点的选择不及长江中游，都是以联络会党、新军或组织一支敢死队去袭取一个战略据点，希图侥幸获得成功，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主义。而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则归因于中部同盟会的长江革命战略和湖北革命党人曾做了长期艰苦的积蓄力量的工作，和其他地区相比，武汉革命党人的组织工作的确做得较为踏实，积蓄力量也较为充足。这自然有一定道理。因为革命党人的战略策略及工作情况等主观条件对于起义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起义的成败除了革命者的主观因素外，革命时机是否成熟、是否有利，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一再证明，当革命的对象还可以照旧统治下去而民众还可以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一个政权如果自己不孤立，不腐败，别人是打不倒的。作为一个政权实体，清王朝如果拥有军事实力、政治动员能力和民众的向心力，革命党人便不可能将它推翻。当年的太平天国曾拥有半壁江山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最终被镇压下去，表明那时的清王朝还有统治中国的能力。武昌起义时湖北革命党人论实力远不及当年的太平天国，之所以赢得胜利，归根结底乃是因为此时的清王朝已经众叛亲离，自己走到了垮台的边缘，丧失了统治中国的能力。只要有人向下一推，它就会跌进万丈深渊而不能自拔。“八一九”起义就属于这样的“一推”。

那么，从辛亥“三二九”到辛亥“八一九”，出现了什么样的历史事变使清王朝自己走到垮台的边缘呢？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建立皇族内阁，二是推行“铁路国有政策”。

辛亥四月初十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诏设所谓的“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劻。阁员13人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故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是立宪派人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人士和多数督抚大吏的共同要求。清政府压制国会请愿，镇压准备第四次请愿的东三省代表和天津的青年学生，已经引起了广大立宪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使这些本来属于支持政府进行立宪改革的人们产生了离心倾向。“皇族内阁”的成立根本违背了先开议院、后设内阁的立宪原则，清王朝的上谕公开宣布这个内阁只对君主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这是对立宪派政治理想的公然嘲弄。立宪派人士万万没有想到，多年的竭诚请愿居然请出了这么一个非驴非马的内阁。他们指责“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要求另选大臣充当组织内阁之总理。朝廷置之不理。到六月初，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19省咨议局议长及议员40余人联名上奏反对皇族内阁，又受到朝廷的严词申斥，上谕指其“议论渐趋嚣张”，令其“不得率行干请”。立宪派人士曾在失望中奋力抗争，而得到的是更大的失望。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布《通告全国书》，公开指责清政府“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并对皇皇上谕逐条予以批驳。显然，立宪派人对清政府已滋长着相当严重的敌对情绪和离心倾向。

立宪派是旨在通过和平改革在不改变君主“国体”的前提下实现“政体”改良的政治派别，既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又反对革命党人的暴动政策。他们认为革命是专制统治这座“工厂”制造的，改变了专制统治，实现了立宪政治，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政治改良了，革命就会自然消弭，社会也会获得进步。他们以立宪消弭革命的用意不是要维护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而是要求改变这种统治。这个政治派别人数众多，有企业家、教育家、社会贤达、留日学生，不少人既具有传统的功名，又具有现代意识，他们在官僚阶层中有自己的同路人，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是清政府与革命党这两极之外的又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向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对立两极的胜败。面对国会请愿的失败，他们曾密谋“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6]。皇族内阁出笼之后，立宪派对清政府已经背离并持敌对态度了，与此相适应，是他们对革命派产生了靠拢的倾向。梁启超写了《粤乱感言》，赞扬黄花岗起义的死难者是“爱国热诚、磊落英多之士”，说立宪派人本是非革命论者，素不赞成革命暴动之举，但政府之罪已上通于天，实在毫无指望了。革命诚然可能引起内乱和外国干涉，但除了革命已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尚可以于万死中求一生”，“犹可以冀免干涉于万一”。他强调说：“要之，在今日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圆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且不能自圆其说抑更甚。”他还撰文呼吁全国反政府各派“相互提携，捐小异而取大同”，“并力一致，攻

击恶政府以谋建设良政府”。这实际上是立宪派人倾向革命的公开宣言。毫无疑问，这对革命党的反清斗争是极为有利的。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即站在革命一边，他的这种态度对于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发布文告号召天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的过程中，立宪派的政治选择也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皇族内阁”引起的是立宪派人对清王朝的背离，那么“铁路国有”政策激起的反抗风潮更使清王朝人心丧尽而陷于空前的孤立。

铁道干线国有，作为一项政策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推出这一政策的是已经丧失了人心的清政府“皇族内阁”。这一政府要攘夺的是粤汉、川汉铁路的商办权，然后向英、法、德、美四国借款筑路。这就侵犯了经营这些铁路的广大绅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激烈的反对。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先后掀起保路运动，尤以四川保路风潮最为激烈，罢市、罢课乃至武装保路。人们指责清政府出卖路权，要求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继续实行商办。清政府不仅一意孤行，而且派兵镇压，从而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风潮。清政府从湖北新军抽调兵力到四川镇压川路风潮，从而为武昌起义提供了契机。保路风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导，“引起中华革命”，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综上所述，从辛亥“三二九”到“八一九”，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三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与离合。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使自己失去了立宪派人的支持，自我孤立，丧失人心，走到垮台的边缘。立宪派是清末促使社会有序进步的重要力量，当它倾向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而反对革命时，革命便不可能成功；当它对清政府产生绝望情绪和离心倾向，并因之同情和转向革命时，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尽管如此，清末革命党人毕竟是引导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没有他们先进的政治导向和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清王朝即使到了垮台的边缘，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武昌起义的枪声及时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正是辛亥革命完成了从君主制到共和民国的历史性飞跃。

注　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3页。

[2]《谭人凤集》第352页。

[3]《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

[4]《谭人凤集》第370页。

[5]《黄兴集》第65页。

[6]《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香港，1952年版，第16页。

黄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萧致治

（编者按：此稿发表于2000年8月。近期黄兴研究请参阅《文史拾遗》2004年第3期作者近著《五十年来中国大陆黄兴研究概述》一文。）

黄兴是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代伟人。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建立，首倡者是孙中山，协助孙中山完成这一个开创新纪元伟业的首推黄兴。90年来，关于黄兴的研究不断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成绩异常巨大。下面就对黄兴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点希望。

一、90年来黄兴研究概况

（一）1910—1949年的黄兴研究

早在1910年，黄兴的好友宫崎寅藏就在日本的《万朝报》与《日本及日本人》期刊上连续发表了《访革命领袖黄兴》，这可能是最早介绍黄兴革命活动的专文。1911年黄花岗起义后，黄兴以革命英雄名扬海内外。当年11月21日出版的《民国报》第1号，刊载了《光复伟人传：黄兴传》。同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刊载了有关黄兴的文章三篇，即：伊藤幸七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内田良平的《孙逸仙与黄兴之评论》；根津一的《孙文·黄兴·梁启超短评》。此外，伊藤银月还写了《孙逸仙与黄兴》，这年由武藏野书店出版；宫崎寅藏也写了《孙逸仙与黄克强》，同年由明治出版社出版。

1912年9月，黄兴应袁世凯之邀，紧接孙中山之后访问北京。9月12日，他在旅京善化同乡会欢迎会上讲述了他的革命经历，《申报》在9月28日以《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为题，摘要刊载了这篇讲话。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第一篇黄兴自述，为黄兴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14年，美国人林百克依据跟从黄兴赴美的随员提供的资料，写了《中国革命的启示》，书中2/3的内容为黄兴传记。这是涉及黄兴生平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至于黄兴本人的著作，他在世时出版过3种，即：吴砚云编《黄留守书牍》，上海新中国书局1912年

版；《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1914年旧金山华侨团编印；廖云祥编《伟人黄兴政见书》，1916年印行。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去世后，《黄克强先生荣哀录》曾被编印作为纪念。天忏生等还编了《黄克强蔡松坡轶事》，由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云南《国是报》辑录过《蔡黄追悼录》。《中国实业杂志》1917年第1期刊载了《追悼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详志》。这些都带有纪念性质。此后，逢黄兴逝世忌日，也举行过几次悼念活动，居正、张继、李贻燕均发表过悼念报告或文章。

从黄兴逝世到1949年，先后出版过几本黄兴传记：首先是刘揆一撰写了《黄兴传记》，1929年京津印书局印行。刘揆一与黄兴共事多年，书中所述，大多是亲见亲闻，较有价值。其次是何伯言写过一本《黄克强》，1945年由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国民党党史史料编委会也编辑过《黄兴传》，1949年印行。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真正的学术性研究很少，对黄兴的研究，尚停留在介绍和追述阶段，涉及范围限于黄兴的事功、爱国精神、对革命的贡献等。对于黄兴的地位与作用，还未能作出正确评价。研究成果不多的原因：一是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缺乏一个安定的环境；二是受国民党正统观念影响，重孙轻黄；三是资料缺乏；四是国民党政治上的干涉（黄兴逝世日是蒋介石生日），致使正常的纪念活动难于进行。

（二）1950—1979年的黄兴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时期。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全国各地开了纪念会，揭开了新时期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序幕。作为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兴的研究，开始提上日程。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增平写的小册子《黄兴》。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在武汉召开了规格很高的纪念性学术讨论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里面载有李书城、周震鳞、黄一欧等人回忆黄兴的长篇回忆录。第二年出版的第2集，又有两篇关于黄兴的回忆。在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1962年有3篇专论黄兴的文章发表。同年，中华书局也出版了常谊编写的小册子《黄兴》。这几年，《湖南文史资料》、《湖南历史资料》等刊物，也有多篇关于黄兴的回忆录及资料发表。总计30年间，共出版了2本小册子、3篇论文、10多篇回忆录与资料。湖南史学界在1962年还专门召开了评议黄兴的学术会议。

总的来看，这30年中，对黄兴的研究还只是起步。研究文章很少，与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有的论文，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

响，评价一般偏低。“黄兴是右派首领”的说法，就是这时期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其实，最早提出黄兴是“右派”的胡汉民，才是国民党内货真价实的右派。

（三）1980年以来的黄兴研究

1980年以来，国内对于黄兴的研究，称得上进入黄金时期，不但发表的研究成果大量增加，而且质量显著提高，内容扩及黄兴的各个方面。

1. 发掘了一批新资料。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扎实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近20年来收集发掘黄兴本人著作十分可观。湖南社会科学院编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黄兴集》，收录黄兴各类著作近600篇。其后，由于学者的努力发掘，又发现黄兴本人的著作近300篇。其中有些是私人收藏的，如《黄兴未刊电稿》，原件为薛君度收藏，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未刊电稿124件。大部分是报刊上搜集的，比较集中的有杨鹏程辑录整理的《黄兴佚文一束》，辑录黄兴1912年9月至1913年的讲演和函电共33件，都是从当年《长沙日报》查找出来的，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64号。还有《团结报》、《湖南文史资料》等报刊，均零星地披露了一些新发现的黄兴本人著作。这些，对推进黄兴研究极有价值。此外《经铿黄氏家谱》、《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的发现与出版，对研究黄兴均很有作用，非常珍贵。

2. 研究成果大量出版发表。从1980年至1999年，20年间，共出版有关黄兴的著作（包括黄兴文集、年谱、传记、论文集等）共16本，合计428万字，发表论文和资料、报道等386篇，其中研究性论文和考证等271篇（包括收入各论文专集而未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此外还有16集电视连续剧1部、小说3种、黄兴画册1本，故居纪念馆1座，黄兴事迹和书画遗物展览各1次。

3. 研究黄兴的学术空气活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突破旧的观念，敢于提出新的见解。以研究黄兴为主题的机构陆续建立。在薛君度先生倡议下，1987年首先在武汉大学建立了黄兴研究室；1993年，江汉大学又成立了黄兴研究所。今年10月，湖南还将成立黄兴研究会。伴随研究机构的建立，以黄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1988年，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黄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近百人（有来自日本、美国、丹麦的8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58篇。1992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和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台北举行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者50人，提交论文21篇，其中内地提交的论文7篇，有3位学者与会。这是大陆中国近代史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实现了大陆近代史

学者赴台的历史性突破。1994年10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黄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的4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8篇，就黄兴业绩、思想、品德等作了进一步研讨。

4. 研究内容逐步深入广泛。此前的研究，一般停留在黄兴的政治革命活动、是非功过，对黄兴的其他方面涉及很少。近20年来，对黄兴的研究已由政治扩展到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品德、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在研究的深度上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5. 研究队伍较前扩大。20世纪50—70年代，专门研究黄兴的研究者极少。近些年来，一批研究黄兴的新人正在涌现。他们思想解放，有干劲，敢于实事求是，陆续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这些研究者遍及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等地。有的是专家学者，也有的是文史爱好者，虽然大多不是专门研究黄兴，却对黄兴研究花了不少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台港地区及国外的黄兴研究

台湾在20世纪50—70年代，对黄兴的研究要比大陆重视。1956年是黄兴逝世40周年。台湾出版了《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共收文近60件，都是据国民党党史会所藏原件影印（1973年增订重印，扩大为89件）。罗家伦在《序言》中对黄兴的革命精神、品德、历史地位作了高度的评价。1966年是黄兴逝世50周年，台湾举行了纪念会，重印了刘揆一撰的《黄克强先生传记》。薛君度在台湾《政治评论》发表《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一文，对黄兴事功、风格、政论作了评述。1967年，左舜生撰写的《黄兴评传》在《传记文学》上连载，1968年又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对黄兴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了充分肯定。薛、左二人对国民党的正统观点均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1968年，罗家伦主编的《黄克强先生全集》出版，1973年增订再版，计收录黄兴演讲、函电、杂著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陆军部、参谋部颁行的一些规章制度等共615篇，是收集黄兴著作较完备的一本全集。同年，为纪念黄兴诞辰100年，国民党党史会出版了李云汉编的《黄克强先生年谱》、陈维纶著的《黄克强先生传记》、杜元载主编的《黄克强先生纪念集》、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黄克强先生事略》。此后，1980年，白慈飘著的《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黄兴传》由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杨恺龄编的《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1981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和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召开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出版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综计50年间，台湾省共出版了有关黄兴的著作12种（含全集、年谱、传记、纪念集、论文集），发表有关论文或回忆文

章约60篇。

综观50年来台湾省的黄兴研究，出版黄兴的著作比较完善；对黄兴的研究，范围也涉及黄兴的各个主要方面。不过，台湾省这时期的研究，主流仍是以孙中山为“正统”，不少文章明显受到正统观念的束缚。当然，也有些文章论证评价比较客观。总的来说，较1949年前大有进步。

香港对黄兴研究较少，除1980年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印行过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外，只发表过少数几篇文章。至于国外对黄兴的研究，日本如前谈到，起步最早，但后来趋于停滞。近20年来才有些文章发表。由于他们利用了日本的档案资料，足以弥补国内研究的某些不足。

美国学者对黄兴的研究，早期作者主要是林百克，他除写了《中国革命的启示》一书外，1915年还以笔名写过《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又写过《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这两本书中均有专章叙论黄兴。近50年来，美国的黄兴研究，主角是薛君度，他研究黄兴的动机也饶有意思。1949年，他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系就读，发现西方学者谈到辛亥革命，甚至连黄兴的名字都不知道，于是开始查阅和收集辛亥革命与黄兴资料，从此对黄兴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在大量发掘和采用西方50年来积累的有关辛亥革命与黄兴资料的基础上，1955年动笔写《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经过3年的辛勤笔耕，于1958年脱稿。1959年，又利用赴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做研究员的机会，查阅了该校胡佛图书馆所藏丰富资料，进行充实定稿。积10年之力，该书终于196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1968年再版。这本书引用中、英、日文资料达255种。引证翔实，言必有据，文字流畅，适合西方读者阅读。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计先后发表书评30多篇，在西方开了风气之先，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对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此后20多年间，虽然发表研究黄兴的论著很少，但有关辛亥革命及相关人物事件的著作则出了十多本，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近20年来研究的新进展

自1980年以来，由于推行改革开放路线，在黄兴研究中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促使黄兴研究不断深入，从而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兴家世与早年研究

黄兴的家世及投身革命前的情况，过去出版的传记很少涉及；即使谈到一鳞半爪，也有不少错误。如黄兴这一宗支何时由江西迁到湖南？陈维纶在《黄克强先生传记》中说是明末清初。随着《黄氏家谱》的发现，证明不是明末清

初，而是元末明初。又如以前许多黄兴传记，都说黄兴曾在岳麓书院就读。李云汉的《黄克强先生年谱》和陈维纶写的传记，甚至说黄兴从1888年入岳麓书院，直到1898年才离开，长达10年之久。可是，根据黄兴当年同学雷恺的回忆以及入岳麓书院的条件，黄兴根本没有进过岳麓书院。他就读的是城南书院。再如黄兴何时首次赴日本，过去有1902年、1901年与1899年三种说法。随着1900年黄兴给他老师黄绍箕的一封信的发现，联系黄兴本人的言论，证明这三个年份都不对，而是1900年4月。

（二）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个问题在早年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辛亥革命时就是孙、黄并称。孙中山是革命的首倡者，是精神领袖；黄兴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无论是革命组织的发展，还是武装斗争、革命宣传和革命力量的发动，多是黄兴在实际主持。诚如有人说的：“在精神领导方面，革命党人没有可与孙先生比的；在实际领导方面，革命党人中也没有可与黄先生比的。这是辛亥革命的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勋。”（任卓宣：《开国元勋孙中山与黄克强先生》，台湾《政治评论》1960年12月15日）后来，由于黄兴去世早，孙中山在黄兴去世后又领导了护法战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特别是国民党的正统宣传，黄兴的事迹由此隐而不彰，以致谈到辛亥革命，只知有孙中山而不知有黄兴。经过近20年的研究，黄兴的历史地位已有提高。去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刘英志主编的《孙黄共和时代》，就是按照孙、黄携手，共同缔造共和国这个基调写的。

（三）黄兴的军事斗争

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武装推翻清朝的军事斗争。这场斗争的发动者是孙中山，具体的领导和发动工作则主要是黄兴担任。近几年，有好几篇文章讲述了黄兴的军事思想和他领导的武装斗争。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开大学李喜所等著的《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对黄兴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领导过的历次武装斗争，均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把黄兴的军事理论放在由旧的封建的军事体系向新的近代的军事体系的变革中来考察，称赞黄兴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当之无愧的新式军事家，并且承前启后，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奠定了根基。

（四）黄兴与二次革命

多年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据一些名人事后的追述，逐渐形成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即孙中山主张宋案后立刻武力讨袁，黄兴坚持法律解决，以致坐失时机，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近年来，俞辛焞和石彦陶等人根据当时的日方档案材料等仔细进行研究，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武力讨袁有一个过程。

俞辛焞把宋案后孙中山的态度分成六个阶段，只有第三、五两阶段是主张武力讨袁的；另外，黄兴也不是单纯寄希望于法律解决，而是作了多种考虑和准备，对于武力讨袁，黄兴不但反复考虑过，而且作了多方面的努力，过去的评论是不正确或欠全面的。

（五）黄兴与护国运动

对于黄兴与护国运动，过去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由于黄兴远在美国，未及直接参加讨袁斗争，因而在护国运动中，黄兴的作用不大。近年来，有些学者经过仔细考察，认为黄兴寄居美国，并非企图躲避，而是多所作为，并且具体列举了他有四大贡献：一是揭露袁氏罪恶，开展反袁宣传；二是团结反袁力量，努力扩大反袁队伍，组成反袁联合阵线；三是筹款购械，支援护国战争；四是筹划讨袁全局，力主反袁到底。因此，黄兴不是作用不大，而是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六）黄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与品德的研究

在这些方面，过去很少探讨。近几年随着对黄兴研究的深入，对他的政党政治、建国主张、实业建设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均有文章评述。黄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革命家，对他的品德近年也有几篇文章评述。这些文章的发表，大大扩展了黄兴研究的范围，促进了黄兴研究的深入。

（七）黄兴人际关系研究

以往对人物的研究，就人物论人物的单线研究比较普遍。但是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常常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一个领袖再英明，如果得不到一大批同志的协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探讨人际关系应是黄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文章探讨了黄兴与各方人物的关系。由笔者主编的《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一书，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汇集。出版后，史学界评论它是“人物研究的新开拓”，“黄兴人际关系的生动展现”，使黄兴研究由个案研究转向多元群体研究，开辟了黄兴研究的新途径、新领域。

三、21世纪黄兴研究的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黄兴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仍有些不足之处，有些领域尚待开拓，即使研究较多的领域，也有待提高研究水平。

首先，从总体考察，成果尽管不少，仍然缺乏一本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评述黄兴一生的大型传记。大陆出版的黄兴传记，都是数万字一本的小册子。薛君度先生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左舜生的《黄兴评传》和陈维

伦的《黄克强先生传记》，是传记中分量较大的著作，但都是30年前写的，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自然不可能吸收。因此，编写一本全面、系统、客观的黄兴传记，既是当务之急，也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黄兴集》已出版20年，又新发现黄兴著作近300件，出版一本《黄兴集》增订本也很有必要。

其次，有些领域的研究亟待开拓。尽管20年来，黄兴研究的领域已有相当扩大，但仍然有些领域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如黄兴与美国、黄兴与华侨、黄兴的外交思想、黄兴的反帝思想、黄兴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主张、黄兴的书法艺术等，还很少有专文论及。黄兴10次出进日本，与日本关系最密切，这方面尽管已有好几篇论文发表，但黄兴与日本，仍然缺乏系统、全面研究的著作。

最后是发掘新资料，考订辨误，提高研究水平。黄兴只活了42岁，真正发挥历史作用的时期只有十五六年。从目前情况看，有关黄兴本人的著作，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可能不多了，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因此仍有继续挖掘的必要。研究历史，应该力求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但是很难完全做到，更不可能一次完成。所以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作些考订辨误，力求接近历史真实，仍待今后继续努力。历史研究又是一门常研常新的科学。尽管历史事实不能改变，更不容歪曲，可是，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在不断改善，各个时期的研究者，总是站在那个时代的高度来研究以往的历史与人物。这样，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理解和评价，自然会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加深。

熊希龄的历史地位

周秋光

对熊希龄的历史定位，涉及他人生的三个重要时期：一是他青年时代的湖南维新运动时期；二是他中年时代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的时期；三是他晚年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时期。以往学术界对于熊希龄在这三个时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予以否定的。那么，究竟如何给熊希龄定位？我谈点个人意见。

一、湖南维新运动时期

以往学术界在评论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维新派人物时，都明显地存在着扬谭（嗣同）、唐（才常），抑熊希龄的倾向。如有的论者将湖南维新派划为左、中、右三派，认为左派是谭嗣同、唐才常，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中立场坚定；右派是陈宝箴与江标，他们一旦受到攻击，便妥协调和；而熊希龄与梁启超被划为中派，他们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表现出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态度。不少论者在论述《湘报》时，也只突出谭、唐，对熊很少有具体论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提。认定谭、唐是《湘报》的主持人，而熊只是《湘报》撰述。有的论者以熊希龄在南学会的讲论会上强调对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为据，指责熊希龄等创办南学会的目的“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以上判断或论证，都是不确切的和不能成立的。首先，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决不是什么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中派人物。严格地说，湖南维新派内部也不存在什么左中右三派。谭、唐之被认为是左派，无非是因为他们在《湘报》上发表过一些言词激烈的文章，后来又杀身成仁。熊希龄的确没有写下像谭、唐一样激烈的文字，这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处境有关。他是刚刚中试不久的进士，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湖南多项新政的主要负责人。加之他处事稳重、干练，使他不可能像谭、唐那样无拘无束地发表激烈的言论和文字。他当时十分繁忙，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撰写文章，但这并不能说明熊希龄不激进。要知道谭、唐等的激进文章，正是在熊希龄主持的《湘报》上刊出

的。试想没有熊希龄的同意和支持，那些激烈的文章能够刊出来吗？

其实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熊希龄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谭嗣同与唐才常。熊希龄在维新运动初期以沉稳的姿态出现，但当斗争渐次升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他却是冲锋在前与反对派短兵相接的第一人，也是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斗争场地、一直斗争到底的人。为了与反对派斗，他甚至与妥协退让以求自保的湘抚陈宝箴闹翻了。1898 年 7 月 10 日，王先谦等上《湘绅公呈》给陈宝箴的第三天，即 7 月 13 日，他在《湘报》刊出了《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抨击。接着又在 7 月 15 日刊登《上陈中丞书》，揭露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种种不光彩行为和言论。他的这些过激行动，已经使他预感到，他与反对派的斗争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但他全然不顾。他说过这样一段话：“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箪人，生性最戇，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由是观之，熊希龄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谭嗣同与唐才常。本来他也有可能与谭嗣同一样在北京共事，一同流血。1898 年 8 月 19 日，清廷电令陈宝箴，传知熊希龄“迅速入京，预备召见”。当时与熊希龄同时奉命入京的尚有江标。两人相约同行。不料熊忽然大病一场，耽误了行程。及病好正要入京时，已是 9 月下旬，这时北京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遭御史黄桂鋆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其次，关于《湘报》的创办者和主持人是谁的问题。过去一些论著把《湘报》说成是由谭、唐集资筹办，把谭、唐说成是《湘报》的主持人，把熊希龄说成是《湘报》撰述，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谭、唐之于《湘报》，严格说，他们只是参与者和协助者，并非主持者。他们在创办《湘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不能与熊希龄相比。《湘报》筹划时，谭嗣同尚在南京，他是《湘报》发刊前 20 多天才从南京到武汉，再回长沙的，没有做筹创的具体工作，也没有担任《湘报》的主要领导职务（仅任董事与撰述）。唐才常在《湘报》筹建时正担任《湘学报》主笔，他亦无法分身为筹建作具体事情，并且筹建时熊并未请他作《湘报》主笔，而请的是戴德诚。后因戴德诚充南学会坐办，方改聘唐才常任主笔。唐才常在《湘报发刊词》中更是说得清楚：“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唐才质撰《唐才常年谱》，亦有“熊希龄发起《湘报》，亦公任总撰述”之语。这些言论，都表明了熊希龄在《湘报》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湘报》馆从创建到具体运作，都是熊希龄一手操办的。欲日出

《湘报》，就必须采用新式的机器印刷技术。为此熊希龄和蒋德钧二人专程赶至上海，通过上海《时务报》馆的汪康年购得了印刷机器和铅字，并请来了开机器和排字的工人。办报的经费，熊希龄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凡报馆内的设备（如机器、铅字等），由私人集资解决。熊会同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八人组成董事会，人人捐助。董事会外，有捐100元以上者可随时稽查馆中事务和参与制订条规；捐至10元者免费赠报。报馆的常年经费，则由熊希龄商诸陈宝箴，由省署每月补助200两，俟报馆"开通之后即行停止不发"。董事会公推熊希龄担任报馆的主持人，负责报馆的全盘工作。熊希龄为报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设立编辑处，聘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唐才常等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总撰述；设立收支处，由熊的同乡蒋绍曾负责；还设立排字处、印机处、管报处、校对处等；另以李维格任报馆西文翻译。为了统筹全局，各明职守，熊希龄主持制订了《湘报馆章程》，又为报馆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

再次，关于南学会创办的目的以及熊希龄所说"洋人不可与之开衅"是否应当指责和否认的问题。南学会最初创办的目的是要办成议院，或模仿成地方议会。但是南学会最终并没有办成议院，因为议院原本是为湖南作"亡后之图"的，是万一列强瓜分中国，为使湖南不亡所作的一项自立自保之策。而南学会设立之后，当时的中国尚未被瓜分，清廷还在。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湖南维新派怎么敢未得到朝廷允许便擅自设立议院呢？但湖南维新派仍然十分担心德国强占胶州湾那样的事件在湖南发生。因为湖南守旧势力十分强固，士大夫大多仇视外洋。所以在熊希龄看来，如何防范洋人入湘，是比设立议院更为紧迫的事情。那么应当如何下手呢？熊希龄认为只有赶紧"开民智"、"开绅智"，尽快将湖南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1898年4月25日，他在与谭嗣同、皮锡瑞等人商议保湖南之计时说："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致受其鱼肉。特不可以闹教，一闹则彼必至，我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因此，办南学会、开讲论会，正包含着"文明拒外"这个直接目的。有的学者对这一目的进行指责，认为"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笔者觉得这种指责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即使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应讲究策略，不应当盲目地、笼统地排外。如果那样，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后来的义和团，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这种指责也曲解了熊希龄等南学会创办者的初衷。因为熊希龄并非只懂得"文明排外"，也懂得"文明"的背后还需要有武力作为后盾。他在胶州湾事变发生后，就曾劝陈宝箴编练新军、设立枪弹厂、开办武备学堂，随时准备以武力对抗外国侵略者。

二、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

以往学术界否定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主要因为这样两件事：一是熊希龄担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期间，于1912年5月17日经手签订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1200余万两的合同，合同的借款条件开列了"由中国与银行团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一时招致舆论哗然，国人群起反对。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纷纷来电痛斥熊希龄卖国。黄兴本来与熊希龄私交甚笃，此时也特别激动，通电全国对熊希龄进行痛责。二是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期间，于1913年11月4日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民党的乱命上副署；次年1月10日，又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会的乱命上副署。此两次副署，在当时即物议鼎沸，后来也多遭非议，被指为随后出现的帝制复辟之厉阶。此两件事，要说指责和否定错了，当然也不是，笔者在此也无意为熊希龄开脱和掩饰。我要说明的是，以往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都过多地注意事情的结果，而不大深究事情发生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不出偏差，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笔者认为熊希龄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是有原因和苦衷的，我们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对他有一定的理解。

先说借款一事。把熊希龄推到财政总长这个位置，不是熊希龄本人的意愿。他曾三番五次地力辞，就因为知道民国的财政是一副烂摊子。当时除了借款，其实再无别的路可走，而借款，也还得别人借给你。在熊希龄就职之前，唐绍仪已经与银行团谈判多次，都没成功。熊希龄要想获得1200余万两的借款来解决民初财政的燃眉之急，就必须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舍此别无良策。黄兴当时倡议募集国民捐，可是在短期内能够募集到那么大的数目吗？熊希龄当时致电黄兴说："苟能设法自救，龄为晁错，亦所甘心，公等如能于数日之内设法筹定，或以省款接济，或以国民捐担任，以为外交之后盾，使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有恃无恐，即可将银行团垫款、借款一概谢绝，复我主权，天下幸甚，非仅保全希龄名誉也。"熊希龄并非愿意向外国借款，也绝非甘心要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他说："希龄自顾何人，敢以国家为孤注之一掷乎……龄等亦岂愿甘出此借款之举？"可是身为财政总长，别人只知道向他要款。特别是南北两军要发军饷，否则"哗溃之势，即在目前"。黄兴的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其5月15日的电文中并称，"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此后东南大局如有变乱，则兴不能负此责任"。黄兴不能负此责任，熊希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与此同时，沪督亦要求解汇欠款350万两，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安徽、浙江、湖北、福建等省都督都"飞电借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干脆到北京来"坐索"。然而款从何来？正是在这种万难

的处境下，熊希龄才不得不接受银行团的监督条件。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决不是熊希龄一个人的主意，而是唐绍仪内阁全体阁员的一致意见。对此唐绍仪在5月28日曾致电黄兴作了解释，说借款合同既经国务院全体阁员议决，自己也签了名，“决非秉一人之过”，外间揣测，“多有失当”，不可轻信，并陈述利害说，倘若借款决裂，刚刚到手的300万两“将成画饼”，后果不堪设想。外界不察，把借款的过错都归之于熊希龄一人，对之大张挞伐，可说是不公正的。学术界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不顾实际情况，不具体分析熊希龄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缺少对于熊希龄的理解，也是不很妥当的。

再说副署一事。熊希龄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可以说是熊希龄难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熊希龄自己也常常自责，引为终身憾事。可是笔者在这里也要说明的是，熊希龄这样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和苦衷的。这个难言之隐和苦衷，首先是袁世凯利用所谓的“热河行宫盗宝案”迫其就范。1913年，熊希龄当了半年多的热河都统。在此期间，他发现热河行宫的清宫故物管理不善，损失、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组织专人进行造册清理。在清理的过程中，淮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桂题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却被袁世凯抓住作为把柄，阴使人向熊希龄传言，说熊希龄在热河任职期间，有“盗宝”嫌疑，已有人向总统报告云云。熊希龄是个十分爱面子的人，生怕此事传到外面，难以说得清楚，内心很是不安。接着，袁世凯就布下圈套，对熊希龄进行挟制。经过大致是：1913年11月3日上午，袁世凯传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谒袁，袁就去接见外国公使，留下熊一人在总统办公室等候。这时熊无意中看到袁的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热河避暑山庄盗宝的案卷，案卷所指都关系到自身，立时面色苍白，极为不安。外使走后，袁世凯传熊到外室谈话，见熊神态，便以极为关怀的口吻对熊说：“秉三，你怕是因为公务繁忙没有睡好吧，不然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熊婉言谢过。袁即严词厉色地说，眼下国事不好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他想将国民党解散，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问熊的意见如何？熊处此情势之下，内心恐惧万分，迫于袁的威慑，只好听从摆布。袁见熊无异言，即将已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推出，熊即俯首签署。熊签署毕，已预在邻室等候的其他阁员都一一签署。翌日，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其次，熊希龄的难言之隐和苦衷还表现在他这个时候仍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因为仅仅凭袁世凯采取的一种卑劣的胁迫挟制手段，就居然使得堂堂的

“名流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就范，听从摆布而无所反抗，实际上也说不过去。这只能说明这个内阁在此时还对袁世凯存在幻想。此外，也应当包括进步党人想趁此机会排斥异己，打击国民党。他们天真地认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会重用进步党，会让熊内阁按照宪章法制推行民主政治，进步党人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推行立宪议会制的诚意。其实这才是最可悲的。因为解散了国民党，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资格，遂造成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的局面，国会也就名存实亡了。此后，袁世凯便另外组织“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取而代之，终于在1914年1月10日，根据所谓“政治会议的决议”，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迫于情势，内阁亦不得不副署。直到此时，熊希龄及其内阁的全体成员，才真正明白上了袁世凯的大当。从此以后，熊希龄算是真正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4年2月6日，他向袁世凯递交辞呈，与之分道扬镳了。他再也没有继续与袁世凯在一起，为袁世凯所用，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明白上当之后，就与袁氏脱离，应当说还是十分可取的。

三、投身社会慈善事业时期

熊希龄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之后，觉得在政治上难以有为，于是脱离政治，脱离袁世凯，另行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1917年发生在京畿一带的一场大水，使他走向了慈善救灾的道路。从此之后，他便以服务社会，从事社会救助和慈善教育事业为职志，创办了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孤苦儿童，使他们成材，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又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担任会长12年之久，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还从事国际赈灾。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社会，成为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家中，无论是办理慈善的时间之长，贡献之大，知名度之高，无人能够比得上他。在多灾多难的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只要哪里有灾，就会有熊希龄的存在，人们也就会想到他。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但凡发生了大灾，湖南省府当局也首先考虑到向熊希龄求助，熊希龄总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他逝世时，湖南省政府挂在他灵堂中的横幅书云：“霖雨苍生”。

可是学术界以往在评价熊希龄的这些行为时，都是一棍子打死。不但不称道熊希龄的慈善家行为，反而说他是“伪善”，是“沽名钓誉”和“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要知道，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社会灾害，将许许多多的家庭摧毁，一批批、一群群无父无母、无处栖身的苦难儿童，被抛弃在世上。一般人躲避尚且不及，而熊希龄居然将他们一个个地收容起来，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还对他们施以当时最好的教育。他

所收容的孤苦儿童先后达到 6000 多人，为了维持这些儿童的生存和让他们接受教育，他四处筹款，沿门托钵，历尽千辛万苦，垂十余年之久，直到将他们全部抚养成人，送上社会自谋生计与服务社会。难道他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吗？社会上实在太需要这种人了。

至于所谓“为统治阶级服务”，也是极不确切的说法。其实香山慈幼院的设立，没有任何统治者的授意，完全是出自熊希龄的个人动机。恰恰相反，统治者对香山慈幼院并不支持，甚至不希望它办下去。每当熊希龄向政府当局申请立案，请拨经费，当局者或是拖延，或是刁难，以至于香山慈幼院常常处于艰难竭蹶之中。例如北京政府原答应给香山慈幼院每月 1.3 万元的盐余拨款，1924 年 8 月以前尚能按月拨给，8 月以后，就失去了保障。从 1926 年 9 月至 1927 年 12 月底，财政部共积欠慈幼院的盐余拨款达 21.1 万元之巨。加上其他各种应拨而未拨的款项，截至 1927 年底，政府积欠香山慈幼院的拨款达 31.29 万元。这种情形，使熊希龄受尽了折磨，吃够了苦头。然而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响，依靠社会的捐助，还是将香山慈幼院维持下来了，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心力呵！所以这里谈不上熊希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相反，他对不关心民瘼的统治者是痛恶的、反感的。他服务的对象是贫民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

如果我们对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再作一番考察，就会发现这所慈幼院不仅补救了当时的社会和补充了当时的教育，而且这所学校的办学方式也十分独特，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谱写了崭新的一页。首先是它推行“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即学校、家庭、社会合而为一。与当时国内其他学校相比，它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一是教养兼施；二是孤贫儿童免费教养；三是有一个从婴儿园、幼稚园到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的健全完整的教育系统。其次，它贯彻为乡村服务、为平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在办学方法上特别讲求实用和收效，注重职业教育，注重实际训练，注重儿童社会化习惯的养成，注重学生能力和才能的培养。因而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

熊希龄还有两件惊人之举，是一般的慈善家难以做到的。一是 1931 年，在抗日救亡中，他在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为自己筑了生圹，用意是一旦在抗日救亡中上前线救护伤病员而不幸倒下，即埋葬在这里，这种做法很像湖南先贤左宗棠抬棺收复新疆伊犁那般的决心和勇气。生圹筑成后，前面竖立的是一块白色的无字碑。但后来笔者从熊希龄的档案里得到了他自撰的一篇墓志铭，其献身救国的精神清晰可见：“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二是 1932 年 10 月 15 日，他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集会，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第开办 12 项

慈幼事业（北京 4 项、天津 1 项、长沙 1 项、芷江 4 项、凤凰 1 项）。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的亲友 54 人组成一个董事会，制订章程 26 条，定其名称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了熊希龄捐献的全部家产，计大洋 25.52 万元，白银 6.2 万两。这是熊希龄一生的全部积蓄。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一个慈善家真诚无私的形象，活现在人们眼前。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1949 年 10 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这块碑石至今尚完好地镶嵌在北京西城区新文化大街第二小学的墙上（原名驸马大街 22 号熊宅后院）。

10 年前，笔者在湖南凤凰县举办的纪念熊希龄诞辰 12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曾经用“维新、济世、救亡”六个字概括熊希龄的一生。到今天，笔者仍认为，用这六个字为熊希龄历史定位，是十分合适的。所谓维新，是说熊希龄是个思想进步的人物，他称得上是个永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几乎一生都在探索真理，追求进步。戊戌年间，就因为倡导和进行革新，遭到维护封建旧秩序的一批人的极力反对，一夜之间忽被打入冷宫，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获谴后仍继续改革和振兴中国的实业和教育。民国初年他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大政方针宣言》，提出了一整套建立和健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法制，革除弊政，振兴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宏伟规划，只因为遭大独裁者袁世凯所忌，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辞职下野。所谓济世，是说熊希龄怀抱经国济世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振兴国家和民族极尽其所能。无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历经官场炎凉和宦海浮沉，并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但他并未悲观厌世，而是继续探索和奋斗，最后他找到了一条补救社会和福利人群的道路，这就是投身社会慈善事业，救济社会中的无告之民，特别是创办香山慈幼院，对贫穷孤苦的儿童实施救助和施教。他为此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所谓救亡，是说熊希龄一生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智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并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慈幼基金，以孑然一身，尽瘁国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熊希龄一生中的这六个字，到今天仍未失去意义和价值。当今的社会，仍然需要提倡和发扬熊希龄的这种精神，特别是济世的精神。1998 年的一场特大洪灾，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对慈善热心的人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熊希龄这样的慈善家，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正在做当年熊希龄所热衷的事业。看到政府和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重视，我们会感到熊希龄仍活在我们的身边。

韩长耕学术论文读后感

傅白芦

省文史馆馆员、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长耕先生辞世已近四年。他远行时，我因住院而未去送别，曾想写点东西以寄哀思，但迟迟难以落笔，至今引为憾事。

我与他相识于马王堆疗养院，时间是1984年的春夏之交。他重病在身，仍然勤奋不息，感人至深，由此而时有过往。

大概因为我曾在北京一家全国性的学术杂志任过编审，还在武汉一所大学兼任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湘潭大学来函将他的两篇学术论文交我提“鉴定意见”，好像是由于评定职称的需要。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学力不济，也只应勉力而为。

当时，听到确有其事的“传说”，有的专家学者在写此类“鉴定意见”时，常是粗粗浏览，大笔一挥，寥寥数语，真正是倚马可待的；我则自愧不如，还是编辑匠的老习惯，拜读再三，查阅有关资料，然后才慢慢写出一两千字，成为“读后感”了。

去年，韩夫人王瑞琪女士，以她选编得到文史馆支持、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韩长耕文集》赠我，翻开一看，第一篇《先秦石鼓简说》，第二篇《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正是我写过读后感的。由此追念我们之间的那番文字之交，惋叹未已。此时，检出底稿，将类似“程式”的那些前言后语删掉，寄送《文史拾遗》，也许可以算作对长耕教授的纪念罢。

——1997年2月

关于《先秦石鼓简说》

《先秦石鼓简说》的预期目的有二：一、“荟萃前修成说，参稽群籍，溯其源流始末，核其聚散异同”；二、“简陈陋见”，并且“综合略述其梗概”。它是从考察我国文字的发明和文献的产生这个角度立论的。

因此，对这篇文章的鉴定，就需要按照作者自己陈说的两个目的进行。

从第一个目的看，现在我所能找到的前人文章表明，它荟萃的成说可谓系统，参考的书籍可谓广泛，对于石鼓文的源流始末的叙述可谓有根有据，对石鼓十枚的聚散的考察可谓周详，它实际是一篇较为完整的先秦石鼓简史，其预期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

从第二个目的看，作者自谦的“简陈陋见”，实是他提出的自己的见解。比如，它明确指出：石鼓十枚现存北京孔庙旧址即现首都博物馆，以匡《辞海》所谓石鼓藏北京博物院之误；又如，它明确指出：“《史籀篇》其义即‘文字读本’，别无他意，更非人名”，以纠张怀瓘《书断》、许慎《说文》、清末周寿昌和王先谦、近人唐兰之讹，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作者达到了他预期的第二个目的。

作者学有根柢，能从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从事研究工作，很讲究言必有据，据必可信。一篇“简说”能够如此“综合略述其梗概”，是不可多得的。

——1984年8月

关于《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

《唐六典》是否确曾施行运用？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的确“未见发表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认识较为一致的缘故吧。从我接触到的资料看来，至少有两点看法是比较清楚的：一、《唐六典》的内容多能反映唐代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二、撰修于《唐六典》的制度规程未完全实行，但唐人及其后各王朝在讨论典章时，常加引用者不乏其人。这可能就使近代的讨论无由展开。同时，近代从事历史文献学或中国法制史等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似乎也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且有后继无人之忧。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中或者又志趣不在于此，因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就显得寥落了。《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的发表，堪称填补了多年来唐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值得重视的。

值得重视，是因为这篇文章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隋唐之世，对古代日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仅以唐律而论，日本著名法制史家中田薰曾经说，唐朝的律令，可以说是东方的《罗马法》；原东京大学教授、法制史家仁井田陞（1904—1966）认为，唐朝律令的结构和理论都非常严密，日本的法制受到它莫大的影响；1981年6月来我国访问的日本法制史专家代表团秘书长冈野诚更认为，古代日本的法典编纂是在隋唐法典的绝对影响下进行的；在考察日本律令制的传统时，其渊源也必须追溯到唐朝的律令。而且，在日本史学

界，致力于研究唐律、唐日律比较研究的学者也为数甚夥。由此可知，日本从事历史文献学、法制史学研究的专家们，对于《唐六典》这部长达30卷，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等为目，涉及职司、官佐、品秩等制度规程方面的“我国现存的最古最完整的政制官文书”，当然会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中国的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评价，其本身就特别值得重视。当然，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卓有成绩的。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字的理解，未必就比中国学者理解自己的国家以及自己民族的文字更为准确。鲁迅先生曾就中国文学史上的问题批评过日本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几年来，我国学者对仁井田陞和牧野巽合著的《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也进行了纠讹的工作。日本的这两位学者认为，现存的《故唐律疏议》，不是以《永徽律疏》为基础而是以开元二十五年的《律疏》为基础而制定的。这就是说，唐代不仅有一个《永徽律疏》，而且还有一个《开元律疏》。1978年，我国上海的杨廷福教授在《文史》第5辑上发表论文指出，唐代《律疏》的撰定，只永徽四年一次，开元二十五年是进行刊定，并没有什么《开元律疏》，日本的两位作者是没有把“撰定”和“刊定”搞清楚。现在，《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一文又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与玉井是博先生所著《宋刊大唐六典及通典》商榷，确认其正确的观点，纠正其错误的论断，有理有据，结构严谨，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这样的角度观察，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能进一步指明，玉井对“颁行”二字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对唐代历史情况还不够熟悉，是造成这种失误的另一方面原因，也许不是无益的。

值得重视，是因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是系统的，证据是可靠的，论证是周密的。文章在第一节“《唐六典》一书的性质、作用及其时代背景”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扼要介绍了唐初到开元这120年间的政治经济等历史背景，并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唐六典》的性质和作用，作为解开这一问题之谜的锁钥，表明了作者颇具史识；第二节“关于前人对《唐六典》行用问题争论的评议”，客观地介绍唐人、宋人对这一问题所持的否定或肯定的意见以及日本史学家玉井是博所采取的折衷说，并且评议了他们的得失，为作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开辟了道路；因此，在第三节“《唐六典》行用问题的历史真相”中，作者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旁征博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简言之，就是两句话：未曾“明诏颁行”，但又“确曾行用”。这个论断是并不矛盾的，是站得住脚的，是有说服力的。特别可喜的是，作者已经注意到，“《唐六典》自开元以来被人引据的材料”，“多属未受时代变异影响的部分上层建筑典制与规范”，“未曾有过涉及为田制、税制等一些带根本性问题的东西，也未曾涉及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了财政、政制问题的材料”，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时异事殊”，

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还有更深远的原因？比如说，是否还有李唐封建王朝制定的典章制度、法律、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维护和巩固其皇帝、皇族、身份等级关系及社会秩序这些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否还有封建道统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或矛盾是否也会导致典制的不变或变异……如果能在这些方面稍加论述，也许对提高学术著作的思想性不是无益的。

——1984年8月

试论我国传统诗词的色彩美

田翠竹

我国传统诗词的特点，即以其音乐美和色彩美的双重结构，千方百计、恰如其分地去表现其思想感情。音乐美具体表现在汉字的平仄、对仗、押韵上。而色彩美则借助于语言的精炼与词汇的丰富，从而去揭示、刻画、描绘思想感情的深度和广度。二者融为一体，才能五彩缤纷，赏心悦目，一唱三叹，余音绕梁。前者闻其声，后者观其色，声色并茂，始称佳作。

色彩美，不等于用红绿青蓝的字眼、漫无目的地去涂抹、敷陈或堆砌。也不是以典丽的词藻去装饰、修整或雕琢。那样做，将变成一个臃肿不堪的肥妇人或鼻尖上涂白粉的小丑。色彩美，是作者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法，巧妙地、充分地去表现作品的内涵，使其思想性、艺术性达到统一的高度。试举例说明之。

一、整齐美与自然美

杜甫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传统诗词的格律上说，七言绝句，不讲求对仗，但也不排除。杜甫是唐代大诗人中最擅长对仗者，由于他用惯了这种手法，所以一提笔，对仗随之而来。这首诗28字全对了，而且对得十分工稳，其色彩也十分浓厚。前两句用了“黄翠青白”四种色彩，其中有动物，也有植物。听树杪，有鸟声，看天上，有鹭影。后两句虽未用带色彩的词，但窗、岭、门、船都是物体，都有色彩，只是隐而不露，避免用词上的重复，妙在于此。在这里，可以远观西岭的积雪，近看门外的客船，一动一静。互为表里。诗人便如此整齐地用斑斓的色彩，绘制了一幅耀人耳目的画图，显示其心灵美。

与此相反，则是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同样是七言绝句，李白不仅不讲对仗，而且打破了惯用平仄的框框，像说话一样，流畅地一口气讲下去，形成一种自然美。诗中树立了一问一答两个人物的形象，不着一色，各自求之。表面上是“笑而不答”，实际上答了“别有天地”。全诗的色彩由一个“碧”字引出，可以想见其林泉幽美；又由“桃花流水”引开，可以想见其茅屋人家，自然景物在自然笔调下呈现出来，与杜甫的整齐美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种不受格律约束之作，自己的本领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若妄为之，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二、浓与淡的美

元稹的《行宫》五绝一首：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行宫，即指唐朝东都的连昌宫。“古行宫”，则是言其年久失修，陈旧荒芜了。看元稹对这首诗是怎样着色的。先用“寥落”二字，行宫进入人们的眼帘已是一片凄清了。但还不够，再着色：宫花虽红，却十分寂寞。还不够，再加重：出现了白头宫女。如此一层又一层地把色彩逐步加浓，一种落寞感，袭人心脾，多么沉重啊！试想：如果皇帝在位，谁敢把行宫糟蹋到这般模样！谁敢让白头宫女闲坐无聊，居然议论皇帝的短长！正因为这一“说”，才将李隆基在位时，由兴到衰的变化过程，娓娓地叙述清楚。然而诗人并没有笨拙地一件一件和盘托出，而是激起读者的联想。20个字，足以抵一部历史。

再读李白的《怨情》：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美人在诗人的笔下，着色较淡。先卷珠帘，露面而不绘其面。接着轻轻地以“颦蛾眉”、“泪痕湿”补充之，极力表现美人内心的怨恨。从这20个字中，可以看出作者超人的艺术手段。帘子串珠，豪华可想，自非寻常百姓家。美人露面后，凄然坐下，不用“静坐”、“闲坐”、“独坐”等词，而用“深坐”，一个“深”字，美人内心世界的活动，隐约可见，怨与恨随之欲夺胸膛而出。但作者笔头一转，反问一句：“不知心恨谁?”恨谁，恨皇帝把她们的青春、爱情甚至生命全剥夺了。如果作者采取直书的手法，大骂一顿，何异王婆骂街。纵

观两诗，浓也好，淡也好，都美。

三、凄冷美与炽热美

讲凄冷，莫过于柳宗元的《江雪》一章：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千山的鸟，万径的人，都无影无踪了，剩下来的是白茫茫一片，多么凄冷的色彩！多么单调的情绪！奇妙的是在这白茫茫中突出了孤舟、渔翁，居然在垂钓，一线生机，欲断未断，飘浮于江天一色中，象征着柳宗元永州十年谪居生涯的苦难与孤独，也象征他那倔强的性格与广阔的胸怀。我们绝不能把这首诗简单地当一幅画来欣赏。要深一层了解它的内涵，凄冷中也有炽热，即不懈地追求真理，向往光明。那就是他一颗不泯的丹心。

与柳宗元的凄冷相反的是白居易《问刘十九》一诗的炽热：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首诗在灰暗的寒冷气氛中出现了带温和的色彩：酒，绿蚁；炉，红泥所制。加上火，又涂上一层红色，气氛就炽热起来了。老友相见，把酒谈心，更加感到有点热乎乎了。如果酒酣耳热，共话谪居生活，又未免炽热中带上几分凄冷，事情总是带有两面性的。

白雪、红火，反映了两位诗人的素质：一片冰心，十分热情，给人的感受是色彩美和心灵美。

四、虚与实的对称美

先说虚，以王渔洋《过露筋祠》一诗为例：

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如烟。
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

相传一位漂亮的农村妇女，于暮色苍茫中迷路，步人深林，为歹徒追踪、迫害，女抗拒致死，暴尸林间，肌腐筋露。乡人感其贞烈，立祠祀之。

王渔洋论诗，标榜神韵，描绘事物，如香象渡河，无迹可求。这首诗便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观点和创作方法。全诗句句着色，字字生香。“翠羽明珰”，形容妇人的面貌美；湖云祠树，形容祠宇的环境美；“月初堕”，船系于湖滨；“开白莲”，花摇于风里，静悄悄的、水灵灵的江天花月溶在一起，美如白玉：

就这样衬托出露筋女人，不管是面貌、衣着、心灵全美了。而诗人却不曾明确地加一赞美之词，神韵也。

什么叫实？看袁枚的《过漂母祠》：

千金一饭寻常事，不肯模糊是此心；
我受人恩曾报否？荒祠一过一沾襟！

袁枚论诗，标榜性灵，这首诗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全诗着色，只用“荒祠”二字，其余都是议论，即不加藻饰地讲心里话。袁枚一生，颇具浪漫色彩，当时，不少人攻击他是“名教的罪人”。我却赞赏他不忘旧德这一可贵品质。袁枚上京会试时，试帖诗题为《因风想玉珂》。他写道：“声疑来上苑，人似隔天河。”主考官认为此人“轻浮”，不取。另一主考官尹继善则认为此人“想得妙”，应取。结果得中。对此，袁枚一生念念不忘，屡见于诗文。这对那些“得鱼忘筌”者来说，是一种讽刺。这首诗，淡化了物体的色彩，突出了感情的色彩。

两人用相同的七绝，写相似的题材，一以空灵胜，一以议论胜，而读者所感受的则是美。

五、欢快美与哀愁美

古人诗中，表现最欢快的要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章：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此诗，诗人一气呵成地写出，我们也一气呵成地读完，哀梨并剪，欢快的美感，虽人隔千年，事隔千年，而所得的享受则是不变的、一致的。诗人这种欢快感、这种美，是从多年流浪、十分艰危、极端愁苦中挤出来的。诗人的泪水，是从辛酸中、欣喜欲狂的交织中挤出来的，甘香中带几分苦涩，耐人回味。我少时读此诗，不解其内涵，为什么这么一件大喜事，反而涕泪交流呢？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到农村，我向全家人宣读报纸上日寇投降的电讯，一边读，一边哭，全家人无不泪流满面，至此，才体会到此诗的真实性及其惊人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在色彩上是欢快的跳跃，从形象到感情，从字句到全篇，无不流淌着跳跃美，狂是美，哭是美，做伴还乡的想像也是美。

李煜的《相见欢》一词，则是哀愁美：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在词中，作者先涂以阴暗凄冷的色彩：“无言”、“独上”。再加以沉郁之色：“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庭院深深，梧桐萧瑟，秋，本来是悲凉的。套上一个“锁”字，语意双关地把哀愁升到顶点，叫人如何经受得起！

李煜以当年的皇帝，作今日的囚徒，以金迷纸醉中的主宰者，一变而为丧失一切的可怜虫，他抚今追昔，哀如海，愁如海，是可以理解的。李煜是皇帝，更是词人，因此，他能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把愁写成万千缕柔丝：“剪不断，理还乱。”他能把哀愁写成有滋味的物体：“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还能在其他词中把愁的数量写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把愁和恨写成有色彩的东西：“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作为一个皇帝，一文不值。作为一个词人，虽弹出的是亡国之音，但千百年来给人们的感触，不是政治上的颓废，而是艺术上美的享受。

六、讽喻诗正侧两面美

诗中有讽喻，犹花中有玫瑰，虽带刺，却受其香，爱其美。讽喻诗又像一枚橄榄，愈噙味愈浓。讽喻诗往往与人民心连心，与时代脉搏同跳动。有正面的粉饰，如韩偓的《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春城飞花，是一种普通景象。而无处不飞花，则可想见春之热闹与城市之繁华了。寒食禁火，全城寂灭；惟独皇帝赐蜡烛给五侯家，一片轻烟，浮游天际，又可以想见其富贵豪华了。五侯，是一群擅权揽政、鱼肉人民的宦官。人民对之深恶痛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是公平的吗？诗人笔下涂抹一片太平之色，而骨子里却蕴藏着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火焰，使众多的读者一触及它，便心领神会，赞赏玫瑰花的带刺美。

另一种讽喻是侧面的敲打。刘禹锡的《乌衣巷》即是一例：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此诗着色之处，先点地址：朱雀桥、乌衣巷。再点物体：野草花、夕阳斜。真叫五彩缤纷，令人目迷。而着色最浓，也是全诗着眼点：燕子。从燕子的秋去春来，年年岁岁，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朝廷的更换，人物的兴衰，令

人凭吊、徘徊、咏叹。那高车驷马、豪华旷代的王谢之家归于何处？长期留下，禁得起风吹雨打的还是人民，诗人没有如实地交代这些情状，而读者所感受的却如此之深，如此之美。多么可爱的有刺的玫瑰。

七、色彩大师李商隐

李商隐的诗，几乎字字着色，首首生辉，有浓有淡，有艳有雅，东涂西抹，无美不备。他对诗的着色，不等于一个女人的涂脂抹粉，翠羽明挡，形成一种人为美，令人却步的美。他的着色，是把思想感情摆在第一位，有了深厚的基础，才凭借他超人的艺术手法，自然巧合地产生了美的形象。他把梦着色：“庄生晓梦迷蝴蝶。”这种色，五彩斑斓。他把心也着色：“心有灵犀一点通。”从丹心中露出这洁白的一点。他把爱情也着色：“一寸相思一寸灰。”一种灰暗阴沉之色。他把眼泪也着色：“蜡炬成灰泪始干。”眼泪在感情的迫使中变红了。

奇怪的是李商隐还把声也着色。如《蝉》一诗中“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多么巧妙的一个“碧”字，把蝉声染碧，碧得那么匀称，那么悠长。又如《北青萝》一诗中：“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初夜，即黄昏时，这磬声却带有沉郁的黄昏色彩。他还会把夕阳涂上忧郁的色彩：“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涂上欢娱的色彩：“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不愧为着色的多面手。因此，李商隐在唐代诗人中，别树一帜。历代有不少人学李商隐，只学其皮毛，成了雍容华贵的蜡制模特儿，不可不慎之。

八、对美的色彩变化与调整

以上是谈我读古人的诗的点滴体会。下面谈谈我个人创作的自省过程，酸咸苦辣，自知其味。我写诗在词汇的着色上是有调整和变化的。如在彭靖《泛舟沅沅二水》七律一首：

笑把吾诗写百蛮，人闲不让笔锋闲。
春融沅沅交流处，云缀林峦乱叠间。
游艇碧依高柳系，破扉红带落花关。
寻幽更向前村去，犹有襄阳未画山。

这首诗第三四句着色较浓，二水交流，清浊互见，融会一起，让春的情意、色彩，糅合得妩媚轻盈，不着痕迹。名之曰：“调整”。树林、山峦、白云，三者各为一体，句中用一“缀”字，将它们联系起来，组成画面，也叫“调整”。第五六两句则着色较为绮丽。木船，它的本色是灰暗的，但系在高大

的柳树下，却被柳阴染碧了，碧得那么娇嫩。破扉，它的本色是陈旧的，但风将落花吹上它的面部，却被花染红了，红得如此灿烂。这叫“变化”。结尾两句，不再作具体的描绘，“犹有襄阳未画山”，这是想像中的远景让读者去想，也叫变化。

另一首《访古夜郎郡、宿托口镇》：

渔樵多傍荻芦居，明媚春光画不如。
露顶涧松红独鹤，串腮溪柳白双鱼。
孤汀晚笛听时断，远水归船望渐无。
行遍村前村后路，碧天纤月展眉初。

此诗着色，先落在新生的荻芦上，那是一片青葱。柳串鱼鳃，松露鹤顶，把“白”和“红”二字作动词用，全局活了，色彩也鲜明了。这二句静中有动是鱼被人携，动中有静，是鹤窥松杪。综合起来，色彩纷披，染人欲醉。然后，近处有汀洲，芳草地传来晚笛，其声若断若续。远处则看到江上归去的小船，天水相接，船身隐去，若有若无。其色彩与三四句所敷陈之法又异，它归于淡雅。结尾则村前村后的小路、碧天、纤月、无一处不着色。全诗 56 字，我没有提出自己具体的感受，但读者可以在诗的画面中，和我一同愉快地步入那传说中的古老而又自大的夜郎国。

诗有完整美，又有破碎美。我写过《南湖所见》一绝：

玉样心肠雪样肤，邻娃十五影偏孤。
采菱归去桨声急，摇碎夕阳红满湖。

这是一幅画。15 岁的小女孩，心灵和肤色是第一层美。湖水、菱荇、小船融为一体，是第二层美。夕阳似火，湖波如镜，红光欲淌，是第三层美。而聪明的女孩，归心似箭，双桨如飞，把平坦的湖面打得粉碎，使夕阳、波纹不断地荡漾、跳跃，从而达到了美的高峰。1983 年秋，我为筹建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去北京拜会王朝闻先生，写出这首诗，要求他以美学的观点给予评价。他说：“美！只是‘满’字欠妥当。”我当时没有与之争论。事后王先生来信说：“满字不可易。”我感到欣慰。

本文到此结束。我很惭愧，没有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没有把零散的东西组成系统的东西，此即肤浅之处。王老倌卖瓜，只说自家瓜好，这似乎是一种惯性。但卖瓜人又是种瓜者，必然了解耕耘的辛苦，随便谈诗，难免有自夸之嫌，那就有待于专家、读者的指正了。

儒家气象吟客情怀

——《天岳山馆诗存》序

李　锐

《天岳山馆诗存》为平江李元度（1821—1887）的未刊诗集，他的后人嘱我作序。自顾于诗词虽有爱好，并不当行，本不应在乡先贤诗集前放肆，继而想到他是清同治本《平江县志》的主纂，我也忝为今本《平江县志》的总纂，有此一种同为乡邦文献尽力的“渊源”，也就勉为其难了。由于时间较紧，为求评价恰当，特请周笃文诗家（《中华诗词》副主编）通读全部诗稿，写出意见。这篇序言如尚称得体的话，实周君之功。

自幼就听到“李次青”（李元度的号）这个名字，家乡人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谈到他的，即以平江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自豪吧。现在从他后人写的日记与颜震潮的《年谱简编》，才对这位乡先辈一生行藏功业多一点了解。

李元度幼年在家苦读，23 岁中举，30 岁时，同曾国藩、何绍基等即有文字交往，颇以文才自负。他入曾国藩幕，也是由一篇数千言论兵事书而引起的。郭嵩焘《李次青六十寿序》说：“君少负干才，又勤苦力学，多知古今沿革损益之宜，慷慨激昂，喜任事。”“君在军久，亦思奋起立功名，不乐以文章自见。创立平江勇营，以兵事始终。”李元度同太平军打过恶仗，有战功，官至布政使，但仕途很不平坦，曾因徽州失守，被曾国藩参劾罢官。他精通史地，这方面的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有《国朝先正事略》60 卷，前些年湖南岳麓书社将它重印问世，从中足见其史识史学史才。郭嵩焘称赞此书：“识者谓为一代人物朝章典故所系。而其文高雅纯悫，比之欧阳文忠公《五代史纪》，亦无愧焉。”这部书是他在贵州军营中写成的。因此，郭嵩焘将他同曾国藩相比：“文正公学行武功，震耀一时，君从事最久，受知亦最深，规模气象，仿佛近之，亦唯其文之足自显著以扬于无穷也。”此书序言是曾国藩写的，曾这样评价作者：“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1854—1855）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

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郭嵩焘却不是这样看的，此种是非，我们可不必论及。但李元度主要是一位儒者，是“长于文史”的“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清史稿》433列传）。这应当说是定论。《平江县志》中还说他：“雅善诗对。性诙谐，乡里至今流传其轶闻趣事甚多。”李元度确实是看重自己的文章的，生前曾刊行《天岳山馆文钞》60卷；而他的《天岳山馆诗集》12卷则未刊行。可惜的是，百余年来迭经丧乱，12卷现存者不过十之一二。《诗存》中《六十初度感怀自述》云：“越裳贡使酬佳什，日本新编采旧诗。敝帚粗成三百卷，更谁来看豹留皮。”可知作者诗文流布，早已远及日本、越南。即使是这些剩简残篇，自有其史料价值和所具艺术特色。其诗歌的风格，大致仍属宋诗一路，笔墨洗练，下语谨慎，工于事典，力戒空滑之习。然而又并不拘于宋诗的范围，而能上探三唐，颇有宏肆之作。读了以后，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首先是诗境雄奇。如写洞庭遇风：“顽云陡起天西北，黑焰遮空晦如墨。狂风恶浪腾万怪，舵折疑漂罗刹国。……白鼋喷血老蛟赤，龙骧万斛半空掷。浪花倒射岳阳楼，打碎君山一拳石。”（《洞庭遇大风作歌》）写海上日出云：“星沉月黑迷长空，俄惊一线飞霞红。金波闪烁光熊熊，阳乌跃出随飞龙。鲸宫贝阙看蒙胧。寥天一镜磨青铜，三神山路疑可通。”（《登澄海楼观日出》）皆瑰伟雄奇，独具面目。其平常酬赠之作，亦时有杰思。如“摩岩凿险剔苍苔，……垂天翼恰抟风倦，返岫云经作雨来。”（《呈海琴》）“芸生面能教杰笔开。……垂天翼恰抟风倦，返岫云经作雨来。”（《呈海琴》）“芸香好辟寻仙蠹，藜杖何须照字萤。羡尔研朱楼上客，独穿月胁注羲经。”（《步韵和彭丽生》）皆骚雅清壮，令人神观飞越。

其次，是胸次高旷。李元度虽两度统军，戎马半生，但不改其书生本色。虽遭曾国藩的严劾罢官，复出之后，仍笃好文学如故。对于仕途的浮沉，人生的险峨，看得很淡。出处进退，儒雅从容，颇有一些儒家气象。比如，他免职还乡时，许多人都为之不平，他却襟怀坦荡，从奉母读书中自得其乐。其《园居即事》云：“牙签三万邺侯家，环渚儒宫水一涯。白社不辞陶令酒，青门时卖邵平瓜。”另《山中游仙》云：“仙山楼阁倚崔嵬，瑶草琪花手自栽。好把前溪云塞断，怕教渔父问津来。”真有一种超脱尘凡的意度。他退居林下，不是沽名的矫饰，在他看来，“读书原匪营温饱，道味能回太古春”，是对道心的一种体认与参悟。所以当他平定黔乱以后，以功超拜按察使时，毅然谢绝，重返山林，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其《五十述怀》云：“晚从黔东役，瘴江涉澜瀚。犁庭剿兼抚，南人不复叛。惠未流羊杜，忌或招绛灌。翩然投劾归，通退出内断。平生马少游，梦寐还款段。”这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那蝇营狗苟的官场，无疑是一道清风，值得尊敬的品格。

感情悃挚，是李诗的又一特点。人们常说“生非情种莫耽诗”。的确，一个感情冷漠的人，是很难与诗结缘的。李元度笃于友情，集中怀人、伤逝之作甚多，无不一往情深，令人感动。比如他同曾国藩的关系就很特别，早年蒙其提携、驱遣，后来遭其参劾，革职查处。但都出以公义，并不影响感情。当曾去世，李写了一组挽诗，如“薄海未苏息，余波尚沸腾。知公忧国泪，泉路尚沾膺”；“记人元戎幕，吴西又皖东。……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以及“青史无遗议，苍生竟述哀。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皆极哀恸悲怆之至，可谓君子之交，死生不渝了。其别内诗：“活至高堂添白发，夜深呜咽各沾巾”；《过南皮怀张振之先生》：“西州谢傅生前屋，东海成连梦里情”等，都是感彻肺腑的至情文字。

生活面广，史料性强，是李诗的又一特色。现存的600多首诗，时间的跨度，历道咸同光四朝，长达40多年，涉及的人物多达140余人，不少是政坛诗苑的要角。即使是寻常酬唱，也清言娓娓，殊有情致。如《步何子贞先生韵》：“卜居恰傍文冢旁，结欢喜缘无烦恼。往来谈笑皆鸿儒，搔痒似倩麻姑爪。”另《韩淦泉属题李香君遗像》云：“一幅崔徽海内传，惊鸿照影尚翩翩。美人名士皆黄土，犹占风情二百年。”辞情两胜，令人爱不忍释。在他的朋交中，颇有一些“特殊”人物。越南的鸿胪寺卿阮云麓就是他的域外知己，彼此互酬诗章，一时传为佳话。还有一个马棻斐，是他在江西俘获的太平军官吏。他爱其才具，资遣离去。20年后，马当了陕西的知府，他写诗为赠：“提师旧驻蠡湖限，邂逅惊逢不世才。庾信悲哀江左路，杜陵辛苦贼中来。凤麟固自非凡种，猿鹤何殊堕劫灰。莫怪九方青眼具，渥洼驹本异驽骀。”仁心慧眼，跃然纸上。还有一位被朝廷通缉的“长毛状元”王韬，与他也交谊不浅。诗中盛赞王：“一舸曾驰域外观，奇文披腹尽琅玕。永康高论陈同甫，辽海孤踪管幼安。蛮触纷纷惊世变，乾坤落落见才难。越吟庄舄无人识，留取千秋壮士肝。”（《题天南豚叟诗文集》）为一个亡逋大声叫好，这是需要勇气的。

作为一个学者，李元度对于乡邦文物自然格外关心。他不惮劳苦地考订出杜甫卒于平江小田，并为其立祠修墓。集中最长的一首诗，就是《新建小田杜工部墓祠落成纪事》。诗中详细论证了这一点，用百韵长诗来作考据，而且写得这么动人，可说是诗坛一奇。

当然李元度的诗也有其不足（他自己就认为诗不如文，而未予刊行吧）。比如好用典故以及和韵之作偏多。这是不是有一点矜才恃博之弊呢？像《南旋述事步杜工部北征原韵留别黔东士民》，和得那么古奥，一般人很难读懂。至于对太平军的态度，处在他的地位和历史局限，自然无法公允。总的来讲，这部《诗存》，不论诗艺造诣和史料价值，都是值得问世的。

最后想提及的是，我这位乡先辈生平最关注的，还是国家命运、民族兴亡。1852年出游东北，莅奉天，“揽边关形胜，陪都锁钥之重，以关东天下根本……慨然怀澄清天下之思”（见郭嵩焘文）。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应彭玉麟之邀，往广东办理防务，因建议堵塞虎门海口（见《平江县志》），“其辟台湾疆略曰：台湾在明为日本所据，荷兰夺之，郑成功又夺之。康熙中始入版图。其地土产繁盛，可富可强。沈葆桢开辟一府四县，未竟其功。其实生番之地，可尽辟也。今法人曾踞鸡笼（基隆），日本狡焉思逞，则台湾实必争之地。应敕议，令福建巡抚专驻台湾，将台北一律开辟。可为东南重镇”（见《清代七百名人传》）。

李元度说这番话，百多年过去了，台湾还有待统一，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1995年12月15日

记钱基博先生在国师教陶诗杜诗

曾仲珊

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于1938年创立于湖南蓝田（今涟源市蓝田镇），为全国惟一的独立师范学院。当时国土沦陷，国内著名学者教授，纷纷来学院讲学。院长是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博士。教授如钱子泉（基博）、钟钟山（泰）、李剑农、孟宪承、马宗霍、席鲁思、钱默存（钟书）、高觉敷、郭一岑等先生，都曾先后在蓝田国师任教。而钱氏父子，那时一个（基博先生）是国文系主任，一个（默存先生）则是英语系主任。1944年，日军入侵湖南。国师迁往溆浦。这时钱子泉先生已不任国文系主任，只担任教授。国文系主任是马宗霍先生。抗战胜利后，国师于1946年迁往南岳。钱基博先生没有去南岳，离开了国师，去武昌华中大学。钱先生在湖南期间，在国师任教一共有8年多。

钱基博先生为著名学者，江苏无锡人，生于1887年，1957年去世。来国师前，曾担任过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教授等职。先生治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钱先生《自传》）。著作甚富，主要的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骈文通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及《近百年湖南学风》等。

我于1941年考入蓝田国师国文系，在校时曾听过钱先生讲授“陶诗”、“杜诗”和“诗文习作”课。先生主张多读古籍原著，所以教陶诗、杜诗。以引导我们读作品为主。陶诗选读了如下篇目：

《形影神三首》、《九日闲居》、《归园田居五首》、《移居二首》、《和郭主簿二首》、《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责子》、《饮酒二十首》（选教“衰蒙无定在”、“积善云有报”、“道丧向千载”、“栖栖失群鸟”、“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青松在东园”、“清晨闻叩门”、“有客常同止”、“故人赏我趣”、“幽兰生前庭”、“子云性嗜酒”、“羲农去我久”诸首）、《拟古九首》（选教“荣荣窗下兰”、“迢迢百尺

楼”、“日暮天无云”诸首)、《杂诗十二首》(选教“人生无根蒂”、“白日沦西河”、“昔闻长者言”诸首)、《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选教“孟夏草木长”、“精卫衔微木”)、《拟挽歌辞三首》。共 42 首,占陶诗五古总数的 37%。

杜诗五古选读了如下篇目: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卫八处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一首》、《北征》、《羌村三首》、《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佳人》、《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写怀二首》。

另外还选读了杜甫一些七言古诗和五七言律绝。

先生这种主张引导学生多接触原著的思想是一贯的。1933 年,先生草拟的中文系课程设置改革方案,把课程分为三种:一是诵读学程,二是整理学程,三是训练学程。诵读学程即强调多读原著。这样可以避免浅尝辄止、浮光掠影的毛病。

先生教陶诗、杜诗很重视引导学生诵读。一般教一首诗,先作精要讲解,然后把讲解内容写在黑板上,带领学生诵读几遍,读到精彩的诗句就要学生在句旁打圈。先生诵读有疾有徐,声调抑扬顿挫。我们在课堂内跟着吟诵,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先生教诗文重视诵读,源于我国传统的学习古诗文经验。古诗文是古典书面语言,学习这种语言,只有多诵读才能把握语感,熟悉它、精通它。钱师在《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中发挥了桐城学者“因声求气”之说。认为:“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于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钱先生认为《朗诵法》是“当代之绝学”,必须大力提倡。

钱师集部之学,海内罕对。读古今诗文集最多,何啻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因为用功深,所以评论能切中肯要。所教诗篇,多有板书。我当时抄下的笔记,至今还保存一部分。现把它写在下面(题目和标点是我加的)。

*****

钱基博先生评杜诗

总评

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琐语,皆著不得。陶渊明诗能著细字琐语,而限于田园,未能振奇于市井游侠,以力破余地。独杜甫抒所欲言,意到笔随,人则文武旦丑,事则朝市户庭,景则田园山水,物则虫鱼鸟兽,殚见洽闻,以尽天下之情事,泛应而曲当,遇物写难状之景,抒情则难说之意,习俗之所共见共闻,而古诗之所未说未写,借古的确,感时深远,继往开来而为诗宗。其后韩愈、黄庭坚得其拗强,白居易、苏轼得其疏密,杜牧、李商隐得其赡丽,皆衍甫之一体。

陶渊明诗吐属天成,意思安闲,无意于为诗者也。杜甫诗局阵严整,匠心经营,有意于为诗者也。读陶诗须玩其不经意而自然雅练,以自然为雕琢;读杜诗须玩其用力而自然浑成,以雕琢为自然。

陶渊明诗只有四言五言,而杜甫则五七言古、五七言律、五七言绝无体不备。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赋也。意韦左丞必尝以甫之才诵言于执政,而莫之许,逐决计远引,而奉赠以告别也。气调岸异。通篇自抒平生,而奉赠韦左丞意只入后一点。无端感喟,破空而起,而笔力横绝,贯注篇末,全体振耸。以赋起而以比结。以白鸥没浩荡自况,真有昂头天外之概。遭际尽管蹭蹬,而辞亦不乞怜。韩愈三上宰相书,跌宕俊迈,其文虽雄,为词哀而志气以摧沮。而甫此诗沉郁顿挫,其遇尽困,陈义高而风骨甚隽上。杜诗韩文,韩却输杜也。

《赠卫八处士》

赋也。写久别相见之喜,而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起,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结,亦写喜事带泪眼之一例也。悲喜交并,情景如绘。深情挚语,不假雕琢。若不经意,而自然渊永。亦学陶。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赋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就题布局,以咏怀起,以咏怀终,而以自京赴奉先县穿插中间。起“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二句,揭明咏怀之旨。“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而杜陵布衣,许身稷契,独“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此所以为“老大意转拙”也。感慨而出以悱恻,跌宕而不失爽朗。似乎放笔为直轩,而千回百绪,无语不顿挫。字字如履危岩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

《述怀》（"去年潼关破"）

赋也。述怀与咏怀不同。咏怀者，非所得怀而咏也。述怀者，所得怀而述也。咏怀以忧国，述怀以思家。"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此所怀也。"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此所以怀也。无一句闲语，只平乎说去，而有声有泪，悱恻动人。情真挚而语朴老，气浩直而笔拗蟠，沉郁苍凉，最是杜公所长，非古人所能到。

《北征》

赋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皆以长篇夹叙夹议，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通体议论而以叙事穿插，《北征》一路叙事而以议论为辅。盖曰咏怀，自以议论为主；曰北征，自以叙事为主也。省家，本事也。忧国，本怀也。以省家为经，以忧国为纬，错综成篇，分四大段。第一段（珊按：自起句至"忧虞何时毕"）叙将北征，于全篇为题前文字，而全篇神情已倒掇而出。所以北征苍茫问家室，而时遭艰虞，乾坤疮痍，忧何时毕，见得国事多艰，不遑将家，直贯篇末，以祝太平之曰至。第二、三两段（珊按：第二段自"靡靡逾阡陌"至"残害为异物"，第三段自"况我堕胡尘"至"生理焉得说"）叙北征以交代题面，而第二段叙北征之在途，第三段叙北征之到家。第二段承第一段"乾坤含疮痍"句，写沿途所见。第三段承第一段"苍茫问家室"句，细意描绘。第四段（珊按，自"至尊尚蒙尘"至篇末）从到家而回忆远照"忧虞何时毕"，以祝太平之至。尽是直起直落，而千回百折；高睨大谈，不漏细碎；痛哭流涕，杂以诙诡。于文章可比太史公，沉郁苍凉，开诗家未有之境。

《羌村三首》

赋也。而第一首第三首托兴起，朴而隽，以真挚见风趣。亦是陶意。惟陶出以闲适，而此则为苦语。陶诗抒悲愤多带笑容，面冷而心热；杜诗写喜乐每带泪眼，情深则语挚也。

《新安吏》

赋也。起处不叙初选正丁，突提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见丁已无壮可抽。先以人民之怨恫告君上，次以在上之恩情慰征夫。所谓宣上德而达民隐也。"《小雅》怨悱而不乱，"愈慰藉而意愈沉痛。沉郁浏亮，得未曾有。

《石壕吏》

李固笃曰：响悲意苦，最近汉魏。

赋也。《新安吏》前半记事，后半记言。《新婚别》通体记言。而此则首尾各四句叙事，中间记言。托老妇口吻，挺身应役，老翁首尾一见，而中段老妇口中，逐个家人一一数说而无一字及老翁。然则前云："老翁逾墙走"，后云："独与老翁别"，明明有一老翁而匿之。盖翁不匿则老亦不免，妇出应则走乃可脱也。偏云力衰备炊，偏不告哀祈免，而挺身以出，隐情难说。辞愈抗爽，意愈沉痛。看似直书其事，而中有难言之隐。调响而意迫。鲍明远有其警挺而无此古直。

《新婚别》

赋而比也。比体起比体结，而中间正文写一新嫁娘心事，忽自抒悲愤，忽致怨父母，忽勖慰夫子。心绪纷乱、含羞难言之情，而出以放声长号：尽情抉露之词，而不碍新人羞口。笔力矫健，笔情警细。

《垂老别》

赋也。与《石壕吏》用意相反而相形。石壕之妇以智脱其翁；垂老之别以愤舍其家。《石壕吏》之意哀，《垂老别》之气激。而振笔直书，以古直发警挺，亦正异曲同工。

《无家别》

赋也。《新婚别》妇语夫，《垂老别》夫语妇，尚有家可别也。无家可别，只有自言自语。前半写无家可归，后半叙无家可别。而入后"虽从本州役"六句为一篇之眼，言远去固迷于近行，而内顾无携，孑然一身，等是无家，则亦远近非所计矣。久乱回乡情景如绘。此笔人人所无，此境人人所历，难在极凄寂之境写以极浩落之笔。

《佳人》

赋也。以史传为诗篇。静女如姝，自然爱好，乃知曹子建《美女篇》故作身份之不免诲淫。第二句"幽居在空谷"领起全篇。"那闻旧人哭"以上叙所以幽居在空谷之因由。"在山泉水清"以下叙如何幽居在空谷之情。在山清、出山浊，语带比兴。以下融情入景，凄神寒骨，想见其人。此感实有之事以写寄慨之情。

《前出塞九首》

赋也。事赋征兵，意讽开边。第一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亦何多"，第六首"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前后映带，乃九首寓讽本旨。意谓兵以戍疆，匪以开边；战为防卫，不为侵略也。其中第一首应征，第二、三、四三首上路，第五首入营，第六首失志。未涉行军临阵之事，先写杀敌致果之志，军情警拔，局势开张。第七首行军出兵，第八首临阵有功，第九首有功不录。九首一笔驶转而意境层出，忽喜忽愤，忽悲忽壮。第一首悲，第二首壮，第三首悲而转壮，第四首悲而转愤，第五首苦而欲振，第六首壮而自励，第七首苦而思家，第八首壮而逐北，第九首愤而明志。随笔曲注，神理都悲，笔力以雄直而见高深，笔情以委曲而为萦带。用心入细，放胆为文。是融曹陈王之浑古，鲍

明远之警道，而别出手眼、自成家数者。

《后出塞五首》

《前出塞九首》写一征兵勉强应征，起第一首写得悲；《后出塞五首》写一志愿兵自起应募，起第一首写得兴会。须玩其各如其身份，各具神理。

赋也。写一逃兵以应募始，以脱归终。五首浑灏流转，作一笔书，而意有转而无竭。笔以拗而得雄。第二首与第一首意正反相生，第四首与第三首意正反相生。第一首写应募时之豪情胜慨。而第二首入后著“壮士惨不骄”五字，便觉锐气挫。然大将得人，尚可依随建功。故卒之曰：“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振提一笔，束上起下。第三首一则曰“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再则曰“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似乎庙算将略，君臣一德。而第四首入后称“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乃成骄将跋扈，道路以目。然后第五首折到逃归故里，但有空村，恶名仅幸脱免，而穷老无儿孙。跃马二十年，不知所为何来，一场成空，索然气尽，前后反映，惊心动魄。《前出塞》末一首以有功不录而安固穷，其志嗷然，已为动心忍性。《后出塞》末一首以骄将孤恩而幸脱身，其意蹙然，更为操心虑危矣。《前出塞》交河之役，其情苦，故叙别家之在路特详；《后出塞》蓟门之役，其气壮，故叙跋涉行程较略。

《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赋而比也。满腹块垒，消释不得，而任性自然，出之有意无意之间，是学陶而得其神者。朱子所谓看似平淡，豪放得来不觉。疑其时忧谗畏讥，托病杜门，有感而作。“畏人嫌我真”五字立一篇之骨。入后“飞来双白鹤，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损伤已露筋”，此雄即自比。而曰“一步再流血，尚惊矰缴勤”，矰缴以喻谗讥而为“畏人嫌我真”之畏字写照也。按古乐府《飞鹄行》曰：“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我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我欲负汝去，羽毛何摧颓。”实为甫诗“飞来双白鹤”所本。惟古乐府为人担忧，而甫则自抒愤慨，同其物而异其意，可谓用古之法。

《写怀二首》

赋也。跌宕昭彰，以旷放为牢骚，的是学陶。

杜诗重古体而轻近体，诗格尊五言而卑七言。杜甫间以七言近体供戏笔。至于五言，则如礼法之士，冠佩端绅，动作不苟，无疾言急调，无弛筋懈骨，厚重有古大臣风。前人言匆匆不暇草书，如杜可言匆匆不暇五古矣。最轻易是七绝，以供戏笔。七律间为吴体。七古别有崎岖拗折之调以叙俗情。盖七言最为后起近诗，故可游戏出之。至于五言，则篇篇庄重，不肯一字轻佻，于体裁上煞为认真。

钱先生对杜诗的这些评论，发抉文心，议论精当透彻，读者自能知之，无烦赘言。听说钱先生耗去几十年心血的五百多大册日记（其中有许多是读书提要），在十年浩劫中全部焚毁，这实在是文化学术界不可弥补的损失！我这里记下的只是一鳞半爪。谨以此纪念钱先生。记录如有错误，请当时听课的还健在的学长纠正。

诗钟漫谈

吴容甫

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唐诗、宋词、元曲是三颗明珠，而骈文和散文则是两株玉树。骈文和律诗派生出对联，至今流传未衰。而由七言律诗派生出的另一种艺术形式——诗钟，则已近于绝迹了。这真是非常可惜的事。

诗钟其实简单易学。你会作对联，会作七言律诗，就会作诗钟。诗钟不过是限时限题作出一首七言对联，即七言律诗中的颔联和颈联。

诗钟的限时是用一炷香系在一根线上，线下缀一铜钱，再承以铜盘，香燃线断钱落，铿然作响，即是时间到。这也是命名为"钟"的由来。

诗钟的命题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嵌字体，一种叫分咏体。

嵌字体先要确定所嵌之字。上联一个字，下联一个字，由参与作诗钟的人当场随意指定，但必须一个是平声字，一个是仄声字。其次要确定所嵌之字的位置。如指定嵌在上联和下联的第一个字，谓之"一唱"或"七·一"。嵌在第二个字，谓之"二唱"或"七·二"。余依此类推。后来有人又为从"一唱"到"七唱"加上一个美丽而形象的称呼，依次为：凤顶、燕颔、鸢肩、蜂腰、鹤膝、凫胫、雁足。

下面举一些例子：

《人·石》（凤顶格·一唱）

人海归来空有梦　石城游后怅无诗

《女·花》（燕颔格·二唱）

神女生涯原是梦　落花时节又逢君（集唐）

《静·希》（鸢肩格·三唱）

万物静观皆至友　四时希冀在长春

《蛟·断》（蜂腰格·四唱）

射虎斩蛟三害尽　房谋杜断两心同

《京·者》（鹤膝格·五唱）

数推亿兆京垓外　文尽之乎者也中

《两·空》（凫胫格·六唱）

忽听猿声啼两岸　又闻人语响空山

《岳·卢》（雁足格·七唱）

忠推南宋将军岳　诗爱中唐户部卢

以上例句，或口碑流传，或散见于一些笔记、报章、杂志中。作者构思之巧，体物之精，用典之确，属词之雅，对仗之工，命意之奇，令人击节称赏。如"两"、"空"二字，属对颇不易，而作者用李白《下江陵》及王维《鹿柴》诗中名句，稍加运作，即成妙对，且又流转通畅，意境高绝，叹观止矣。又如"蛟"、"断"二字，词性截然不同，且又处于七言对句中的第四字位置，简直令人无法下笔。然而作者用周处除三害事，嵌一"蛟"字，用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房谋杜断"这一成语嵌一"断"字，"三害尽"对"两心同"，"射虎斩蛟"仅除两害，而周处在其中，故为绝对。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也。再如"京"、"者"二字，"京"为实字，"者"为虚字，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大约作者首先联想所及，是"之乎者也"这四个最普通的文言虚字，再联想到"京"可作为数量词，古者十亿为兆，十兆为京，十京为垓，"亿兆京垓"与"之乎者也"相对，于是这一绝妙诗钟就出笼了。

也许是一些喜欢玩诗钟的文人学者认为从"一唱"到"七唱"这种嵌字体的形式太呆板了，玩腻了，于是便花样翻新，另创新格。他们将一字嵌于上联之首，一字嵌于下联之末，谓之魁首格。一字嵌于上联之末，一字嵌于下联之首，谓之蝉联格。一字嵌于上联第五字，一字嵌于下联第四字，谓之卷帘格。一字嵌于上联第三字，一字嵌于下联第四字，谓之辘轳格。再进一步，他们又突破了只嵌两个字的局限，再发展到嵌三个字、四个字，甚至五个字。将三个字错综分嵌在上下两联中，谓之鸿爪格。在一联的首尾各嵌一字，在另一联的中部嵌一字，谓之鼎峙格。将四个字分嵌在上下两联的首尾，谓之双钩格。将四个字错综分嵌在上下两联中，不连不对，谓之碎锦格。将五个字错综分嵌在上下两联中，不连不对，谓之杂俎格。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的题目，一般都用词、词组、成语、短句，而不用不相连属的字。现在举一些例子。

《玉佛寺》（鼎峙格）

寺号戒珠存古佛　山名怀玉驻高僧

戒珠寺在浙江绍兴，怀玉山在江西玉山附近。上联头一字为“寺”，末尾一字为“佛”，下联第四字为“玉”，合为“玉佛寺”，故谓之鼎峙格。

《大江东去》(双钩格)：

去日儿童皆长大　江天劳燕各西东

上联首尾两字为“去”、“大”，下联首尾两字为“江”、“东”，合成为“大江东去”，故谓之双钩格。

《张三李四》(碎锦格)：

四壁图书三尺剑　半肩行李一张琴

上联第一字为“四”，第五字为“三”；下联第四字为“李”，第六字为“张”。“张三李四”四字，错综分嵌在上下两联之中，既不相连，又不相对，故谓之碎锦格。这首诗钟为我们湖南的“龙阳才子”易实甫所作，当时脍炙人口，流传极广。因为他不仅非常巧妙稳妥地将“张三李四”四个字，分嵌在上下两联之中，而且还通过这首对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落拓不羁，能文能武，风流儒雅的知识分子形象。

诗钟还有另一种形式，即分咏体。所谓分咏体，即要求一首诗钟的上下两联分咏绝不相干的两件事物，但不能犯题面字。举例如下：《八股文·杜鹃》

能使英雄皆入彀　可怜帝子已无家

上联用唐太宗语，下联用望帝事，皆熟典也，然浑成自然，贴切之至，且吐属不凡，隐含兴亡之感，妙品也。作者汪笑侬。

《苏东坡·燕子》

七月黄州游赤壁　六朝朱户伴乌衣

上联出于赤壁赋，当然非东坡莫属。下联用刘禹锡《乌衣巷》诗，“燕子”藏其中矣。上中两联对仗极其工稳。黄、赤、朱、乌四颜色字，穿插其中，形象鲜明，浑然一体，亦妙品也。

《二月·十二》

红杏枝头春意闹　碧阑干外绣帘垂

此一题甚有难度。盖“二月”为一特定月份，而“十二”则为一空泛之数量词，乍见之，大有无从下笔之感。然作者似毫不在意，举重若轻，顺手拈来宋祁词中名句作上联，则“二月”在其中矣，“二月杏花八月桂”是也。下联则作者又拈来韩偓《已凉》诗中第一句，与之成对，“阑干十二”为诗词中习惯用语，则“十二”亦在其中矣。且上下合璧，构成一旖旎温馨之生活环境，

春意盎然，风华绝代，艳而不俗，叹观止矣。

1944 年我就读于国立师范学院。当时因日寇入侵，学院已由蓝田迁至溆甫。元宵节学院举行灯火晚会，宗子威先生出一诗钟题：《李斯·琴》。我作了一首：

断腰犹挂千行泪　挥手如听万壑松

宗子威先生奖给我一册他自己的诗集《燕游剩草》，并指出：我的这首诗钟，下联作得好，出自李白的五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现成而贴切。上联“断腰”切李斯被腰斩事，亦好。然“千行泪”则露斧凿痕矣。事隔 50 余年矣，行文至此，因记之，作纪念也。

诗钟的分咏体较之嵌字体有更为广阔的联想余地，比较容易作。因此文人聚会作诗钟，以用分咏体者居多．后来有人想将分咏体与嵌字体合二为一，于是又创造出两种新的格式，一种叫合咏格，一种叫笼纱格。

合咏格是上下两联合咏题中一个事物，但禁犯题中字。另外任意指定一个字作为嵌字，目的是防止宿构，但嵌字的位置不作规定。举例如下：《咏马·嵌“嫁”字》

驮出王嫱悲远嫁　堕来孙寿绾新妆

上联用昭君出塞事。“驮出王嫱”，当然是用马驮出王嫱，故是咏马，但未犯“马”字。下联中的孙寿，为东汉权臣梁冀之妻，传载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故下联也隐一“马”字。上联最末一字为“嫁”，即题中规定要嵌之字。所以这种合咏格既有“咏”，又有“嵌”，是一种新的格式。

笼纱格与嵌字体相同的地方是任意指定两个字作题目，不同的地方是这两个字不是嵌而是咏，即上联与下联各咏一字，条件是不得犯题中之字。但题中这两个字又一定要隐含在上联和下联之中，使人一看就心知肚明，故谓之曰笼纱格。举例如下。《本·崔》：

辟佛我思欧作论　登楼人仰颢题诗

欧阳修写了一篇辟佛的文章叫《本论》，故上联隐一“本”字。崔颢在黄鹤楼上题了一首诗，李白为之搁笔，传诵千古，故下联隐一“崔”字。

合咏格、笼纱格和前面所讲到的鼎峙格、双钩格、碎锦格等一样，把创作诗钟的难度加大了。想出这样花样的人，他们也许认为这是诗钟的发展和创新，但是他们不知道，恰恰是这些花样，是使诗钟变得更加曲高和寡，很难普及，而终至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管怎样，应该承认诗钟是我国古典

诗歌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是文人学士聚会时一种高品位的文化娱乐活动。一首好的诗钟，不管是别人作的，还是你自己作的，都会使你产生一种审美的愉悦，其味无穷。

文章开头，我曾说诗钟很容易学，其实这话只讲了一半，应该说易学而难工。因为诗钟限时限题，这就大大地束缚了你想像的翅膀。其次，虽然诗钟只有两个七言句，但却要求典雅、贴切、工稳、精炼。最难的是两句之间要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从而构成某种特殊的意境，超脱于本题之外。所以不具备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不具备比较熟练的诗歌创作技巧，不具备敏捷的思维，不具备出众的才华，就不可能创作出令人叫绝的诗钟。

诗钟究竟产生于何时，没有人得出过确切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可以断定清代乾隆时期还没有诗钟。理由简单极了：就是《红楼梦》中没有诗钟。伟大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古代文化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诗、词、歌、赋、禅语、对联、灯谜、酒令，什么都写了，就是没有写诗钟，原因是他根本还不知道什么叫"诗钟"。乾隆时期还有几个大文人，纪晓岚、袁子才、郑板桥，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无只字提到过诗钟。乾隆以后，生活在嘉庆、道光时期的林则徐，却写过一首诗钟：

《陈·人》（凤顶格·一唱）

陈迹浑如牛转磨　人情几见雀衔环

由此可见，诗钟大概兴起于嘉庆、道光时期，全盛于同治、光绪时期，民国初年余波犹在。我的老师宗子威先生清末民初就曾参加过开封的梁苑诗钟社、北京的寒山诗钟社以及福建的一些诗钟社。抗日战争开始，诗钟就绝响了。

以上是我个人对诗钟的发展、消亡过程的一些看法，特提出来，供有识者参考。余不多谈，就此打住。

——1999年12月于湖南师大

诗钟小识

宗子威遗著　吴容甫整理

诗钟为近代文人集会觞咏之流行品，结社既多，嗜痂者众，报章征题，亦数见不鲜。但作者依样葫芦，苦无专集之研究，阅者亦徒赏词藻属对之工，互相传诵而已。近时所见刊本，如沈太侔辑录之《诗钟鸣盛集》、沈洞石之《鹤和集》、秦肤雨之《百衲琴》、《古今文艺丛书》之《樊山五日战诗记》、《文艺全书》之《诗钟》一门、《庸言报》所载易实甫之《诗钟说梦》、杨味云在山房画刻之《诗钟随笔》，与北平寒山诗钟社之《甲乙丙集》、潇湘鸣社之《诗钟选》各种，类多选录佳联，供人吟赏，而于体格作法，概从略焉。余少时，见无锡刘石香所录诗钟，皆分咏格，心窃好之，今已忘其集名。后于吾邑虞社诗钟，尝试为之，屡冠其曹，然非即席为之也。嗣游开封，入梁苑诗钟社，获与当代士大夫游，如丁霓仙、刘剑侯两观察，祝竹廷、黄山宋、黎太初、景学石诸公，即席挥毫，亦稍稍露头角。民国初年，橐笔旧京入寒山社，其时名流荟萃，宴集频数，始觉所学之不逮，乃退而肆力于读书，知非储才不足以应用也。士隔三日，刮目相看，虽不敢云登峰造极，而无役不从，每战必捷，所诣乃骎骎乎日进矣。嗣人稊园诗钟社，偶入闽社，亦始终其事，寝馈垂二十年。兹略经验所得，信笔书之，补谈诗钟者所未备，藉存鸿雪云尔。

诗钟之制，于古无征，相传出于闽人，顾其初不曰诗钟，而曰改诗。樊山序寒山社诗钟云："粤人属对，闽人改诗，风气既开，寖成嗜好。"余初不明改诗之说，时亦未及详询樊山。及读闽县王贡南遗著云："改诗者，取古人诗与吾所嵌之字合者，就其上下句中之字，点窜涂抹，缩成七字一联，较原句特见研练，所谓改诗是也。"故改诗为诗钟之祖。又云："改诗十四字，字字须从古人句内割裂而出，不容以己意参加，要在错综变化，使人一望即知其出于古人某诗，斯称上选。"是改诗者，诗钟嵌字之权舆也。王益吾督学江苏时，提覆一试，有以"风来山树飞动，雨急溪水奔腾"十二字命题，不拘五七言，作律句一联；又以"诗律总持，醉乡管领"八字命题，作七言律二句，殆近此意。盖犹诗钟之变相也。孙丹五《余墨偶谈》云："闽俗，士林好为诗会，每拈二

字不类者悬之，俾成七字二句，刻香为限，有捷才者，寸晷可得十余联。岁暮尤盛，务闲故也。他如分举不类两物，撰成二语，名九宫格。”此则嵌字、分咏二体，昭然具矣。李孟符《春冰室野乘》云：“诗钟之作，近世极盛，有笼纱、嵌珠两格。笼纱者，取绝不相干之两事，以上下句分咏者也。嵌珠者，任取两字，平仄各一，嵌于第几字者也。笼纱易稳而难工，嵌珠难稳而易工。”所谓嵌珠，即嵌字；笼纱，实即分咏。然笼纱别为一格，与分咏似有不同。曩尝书与孟符论及之，而难易工稳之说亦不尽然也。徐颂增序沈锽《鹤和集》云：“以绝不相类之题，成七言偶语一联，即建除诗、八音诗、十二辰诗之类，俗所谓搭题诗也。每见作此题者，支对虽极工整，而语多蹈空。是集纯以古事裁剪而成，无一字无来历。其杂体若干条，尤觉勾心斗角，如刘舍人所谓贵在精巧，务在允当者。”今读其集，一曰分咏，一曰杂体。分咏与上述同，杂体以两字对嵌，及蝉联、魁斗、鼎峙、碎联各体属之。然则徐序之所谓建除、八音、十二辰诗者，指分咏一体言，而概以嵌字为杂体，当时审体未精故也。分咏者，赋物体之一格也，建除各诗者，则嵌字体也，沈集犹未备具也。又有称为折枝诗、百衲琴者，简称之皆诗钟而已。

然则曷为以钟名？盖诗钟以敏捷为贵，命题时，爇香一炷，相距寸许，墨识其虚，以弱线缀金钱而悬焉，下承以铜盘，香燃及线，线断钱坠，铿然作声，如钟鸣然，即一律撤卷，枚速者，或屏风十联，马尺者，或不着一字。凡文人宴叙，藉以争胜为娱，殆刻烛击钵之遗意欤！嗣后撤香不用，而代之以时刻，庶稍减入社攒眉之苦矣。

阅卷唱榜之法各有不同。旧时完卷后，将纸投入筒中，上次取录榜尾者，抑为誊录，分誊两纸。主司二人，分阅两榜，以上次得状元者充之。如两榜得元为一人，则以榜眼代之。分为两榜者，一主司因己所作者，回避不取，而又一主司，仍第其高下，俾免向隅也。阅毕，推上次得传胪者唱名，自第五名起，唱至榜尾，作者以次应名，然后唱传胪，逆推至状元。同人凝神静听，无一喧哗，致足乐也。逊清时，余在开封梁苑诗钟社，犹用此法。闽人法又不同。投卷截止后，莅社各人，将卷分抄一纸。例如有一百卷，则十人各录十联，录就后以次传观。一人阅定一榜，各将拟取录者另录一纸，不令人知，惟有至少作若干联之限制，自作几卷，则录取亦限几卷。此法后亦变通，唱名则阅卷者各人自唱，自第五名起，如前例。又有元、眼、花、胪外，取四名或六名，定名曰录，再取若干名，定名曰斗，或取后一名，定名曰殿军，所作亚于状元，取其足以压榜也。自油印法兴，省分写之繁琐，投卷后，即举付写官，印成若干份，以全卷投主司，糊名易书之，法一也。闽人分阅各唱，最费时间。旧京寒山社则以四人为主司，较两人阅卷，略少遗珠，较各人分阅，藉省

繁赜，此法行之最久。稊园社仿行，有时参阅闽法，从其适也。若计联积分之法，假如第一名五分；二三名，三分；四名，二分；五名以下一分。统计某联共得若干分，则以联占优胜。或某人共取几联，共得若干分，则以人占优胜。此亦藉增兴趣之一助。有时配置彩品，如字画、书籍、古玩各种，即所谓君子无争，必也射乎意也。

命题之法，如嵌字体之两字对嵌法，预拟乎仄若干字，分投两筒，题为第几唱，任由两人分拈两字，拈出后，无论难易，不得更换。或随意取一书，一人说第几页第几行第几字，一人检录于纸，第二字如平仄不协，可以重检。若蝉联、魁斗、鸿爪、双钩、辘轳、卷帘、碎锦、五杂组各题，各人按题字之数，分书若干纸，作拟题，题每采用成语，分投于筒，拈出一题。咏物体之命题，亦仿此法，惟分咏题则或人或事物，分置两筒，两人分拈，如对嵌例。合咏题则二人拈之，如题限某字，可随时指定，不拘此例。又如对嵌之预定作四题、五题、七题者，可取成语及诗句，不对而平仄相协者，按字数为题，闽人多用之，如四字之上有飞瀑、眠琴、绿阴是也。此又一法。

诗钟体格，大概不外嵌字、咏物二体。其始以两字嵌于两句第几字，命名为建除体，即鲍照用建满平收除危定执等字分嵌于诗句之首是也。又以两物或一物一事一人，极不相类者，分咏两句，命名为咏物体。此例最早，相传名句，多啧啧于人口。兹先述建除体：拈取平仄各一字，分嵌于第一字者，曰凤顶，亦曰一唱；第二字曰燕颔，亦曰二唱；第三字曰鸢肩，第四字曰蜂腰，第五字曰鹤膝，第六字曰凫胫，第七字曰雁足。二唱以下递推，此常格也。厥后争奇斗胜，花样翻新，由嵌字而衍为各体，如两字，一嵌于上句之尾，一嵌于下句之首者，曰蝉联格。一仄一平，或两仄不拘。两字一嵌于上句之首，一嵌于下句之尾者，曰魁斗格。一仄一平，或两平不拘。两字一嵌于上句第二字，一嵌于下句第三字者，曰二三辘轳。两字一嵌于上句第三字，一嵌于下句第二字者，曰二三卷帘，均平仄不拘。一二三四类推。鸿爪格者，以三字分嵌两句，题字不连不对，亦曰鼎峙格。或有上句一、七嵌两字，下句第四字嵌一字者，上句第五字嵌一字，下句四、六嵌两字，作三角形排列者，则更难配置，然不尽拘也。勾股格者，以三字分嵌两句，题中以两字作对，余一字不连，随意可嵌，对字亦不限地位。碎锦格者，以四字命题，分嵌两句，一句中或两字，或三字，或一字，不拘；题字亦不连不对，与鸿爪格同。近每以三字分嵌为碎锦者非也，亦曰碎流格。有两句但分嵌而不属对者，则失之太易矣。双钩格者，以题字四字分嵌于上下句之首尾，题字颠倒不拘；亦有按题字次第排列者，则更难焉。如“白雪阳春”四字，“白雪”二字嵌上句之首尾，“阳春”二字嵌下句之首尾是也。以五字命题，分嵌两句者，曰五杂组。题字连对不拘，

但题中字本相连者，必须拆开。如“鸟生八九子”，“八”字可以对“九”字，“八”、“九”连用则不可也。“生”、“八”即可以连用。亦有限不连不对者，则体例更严。又有押尾格，以相连之三字限用于下句末，两句可以不对，以见其诗意如何联属。或两句相对，以见其对属之工。嵌字一体，尽于此矣。

咏物体以分咏为最先。凡一事一物及人名地名，择其轻重宽狭，雅俗虚实，最难配置者命题。题字不可显露，与嵌字迥别。前人所作，此格最多。然由咏物而屡变其格，支流亦繁。有以两字命题，不论虚实，两句各咏一字，使人隐约可见，如歇后句者，曰笼纱格。与分咏似同而实异，有谓分咏即笼纱者非也。盖题仅一字，如语助词类，亦可为题，分咏无此例也。如仅命一题，作一联对句者，曰合咏格。此格必于题外限用一与题无关之字，因难见巧，否则与律诗对句无异矣。又有限两字为第几唱者，则合咏兼嵌字矣。有赋物兼嵌字者，曰晦明格。如以两字命题，一明一晦，晦如笼纱，明即嵌字，但不限地位耳，此皆咏物之支流也。诗钟虽小道，而体格繁多，不明体例义法，如入五里雾中，故一一为之分类说明，以下再逐条举例，以见大凡。

诗钟作法，大概分为闽粤两派，湘派与粤派相近。粤派尚典实，闽派尚性灵。典实派简称为典句，性灵派简称为白句。尚典实者，率诋闽派为空疏。尚性灵者，率诋粤派为板滞。实则源分流合，各有专长，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非定论也。王贡南谓：“典实浑成为上，亦须超脱；性灵超脱为上，亦须浑成。”又云：“刻烛摊笺之会，撑胸万卷，数典何难，妙手拈花，说空匪易。”个中人讵不识其甘苦耶？樊山谓：“空灵之至，非不典也，看似寻常，而具有故实，如水中着盐，有味而无滓，此闽派之妙也。花当叶对，玉质金相，妙造自然，无牵合饾饤之迹，此粤派之上乘也。”准于前说，固分之则二，合之则一也。虽然，流派既分，风气自变，夸多斗富，争胜出奇，亦必然之势也。

诗钟既始于闽人，当夫草创之初，以诗为钟，但取其诗句之工，积之既久，写景言情，俯拾即是，始以为清词丽句者，继以为浮烟涨墨矣，始以为一夫善射者，继以为众口雷同矣。其弊也失之浅滑，非真性灵也。于是典实派如异军特起，连夺名城，其卒焉征典务僻，使事贵新，割裂强为求工，附会全非载实，羊质虎皮，蛇神牛鬼，妲己竟赐周公，昌黎误认熙载，其弊也失之穿凿，非真典实也。不知性灵之中，有典实焉。凡古人一事一言，各有来历，不能全凭耳食，我但节取其事与言之配置相称者撰为对句，或全取古义，或独运新机，不着痕迹，使精神跃然纸上，如水中见月，谓为非月不可也。北史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人不觉，如胸臆语。”祖孝征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用事耶？”按坡诗“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乃用嵇康、王烈事，则“崖倾石髓”，非不用事也。《诗人玉屑》已述其概矣。蔡絛《西清

诗话》曰：“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诗家秘要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其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捕风捉影，岂有迹耶？闽派诗钟亦然，浅者但知其用事造句俱有所本，但袭其貌，所以失也。典实之中，有性灵焉。所谓典实者，非堆砌故事，搬运僻书，徒以争奇炫博也。隶事须称，属对贵工，选材必精，造句要活。妃青俪白，其色彩也。选字遣词，其结构也。王世懋《艺圃撷余》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勃牛溲，咸成郁致，于是诗之变极矣。子美之后，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拳，以当市肆万人之敌，必不能也。”此论作诗之当用典实，即可移赠诗钟。且能用典实，贵在储材。李商隐作诗，喜用故事，号为獭祭，一篇之中用事极多，而不觉堆砌。《诗人玉屑》云：“凡作诗须预储材料，传称任昉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余谓昉诗所以不能倾沈约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过。坡集有全篇用事者，曷尝不流便哉。”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黄庭坚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赵翼《瓯北诗话》云：“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又曰：“坡公借稗官脞说遣闷，不觉阑人用之，而不知已为后人开一方便法门。”此即后人逮事选材之法也。

诗钟隶事选材之法，粤派尤难，最上者须无一字无来历。葛立方《韵语阳秋》曰：“王荆方公（容甫按：“方”字疑衍）尝有诗云：‘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或谓公曰：‘萧何万世之功，则功字固有来处，若恩字未见有出也。’荆公答曰：‘韩集，斗鸡联句，孟郊云受恩惭始隗。’则知荆公诗用法之严如此。《曾□斋诗话》误为用隗始二字，不及恩字。惟此类故实，虽出一事，而后人但知本典，阅书不多，此最容易不经心者。余按汉成帝窥浴饼金事，饼金二字不见《飞燕外传》，而沈括《梦溪笔谈》载之。潘岳面城，管宁藜床，文人常用之。而岳赋则曰通郊后市，宁传则曰常坐木榻。面城藜床见于庾信《小园赋》。”略举一二，以见梗概。《韵语阳秋》又云：“钱起送屈突司马曰：‘星飞庞统骥，简发鲁连书。’人多称其工。余恨庞统骥出处无星字，而鲁连书有箭字也。是恩从隗始之恩有出处，故对功字为的，此星字无出处，故对箭字即偏枯耳。”诗钟亦最忌此病，而于题字尤甚。又唐彦谦汉高祖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如移作诗钟，咏剑字土字则可，咏汉高庙而无剑字土字则不可耳。耳闻眼见，尤空泛无当，《石林燕语》纠其失，不啻为诗钟发也。再属对造句，但矜字面之工，不知易生弊病，当分条举例以明之。盖七字中，援引典实，其间串插组织，最见功夫，无勉强凑合之迹，则以

我使事，不至我为事使。庶几典实之中，具有灵机，非天资学力兼胜，曷克臻此，诗钟岂易为哉！

且粤派以典实为工，闽人亦非屏典实而不用。典实二字，包含至广，凡古人之诗文语言，当时或无所取材，后人用之，即为故事，固不必明用典实也。典实既兴，用法宜慎。一对仗必工。若用经语，对诗词语，秦汉对近代事，则草衣卉服，登清庙明堂；市井屠沽，杂冠裳剑佩，太觉不伦。虽不必如王荆公云用汉人语，只可用汉人语对，对以异代语，便不相类，然亦不可不选择良材。例如东坡惠州白鹤观新居将成诗："佐卿岂是归来鹤，次律宁非过去僧。"一用薛用弱《集异记》，一用郑处诲《明皇杂录》（又见柳子厚《龙城录》），皆属唐人笔记，斯为善焉。一材料必精。王贡南谓："陈陈相因谓之腐。"诗钟尤忌俚语。又曰："稗官小说，一字不可犯，犯则俚。"斯说诚然，然亦有别。王世懋云："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易经》可以入诗，而诗钟则嫌板重。唯取古人引经之语点缀而成，则腐而不腐矣。稗官小说，惟俗语演义语不可用。古今说部，记载至夥，上自《汉书·艺文志》所录，下迄《四库书目》，皆列小说一门。《西京杂记》为《汉书》所采之录，《世说新语》亦晋书所据之本。六朝唐宋异闻杂事，允为艺文之渊薮，少陵东坡多采稗官脞说以入诗。虽雨丝风片，渔洋用《牡丹亭》语，落凤坡，用《三国演义》语，世或讥之，然传奇入诗，固可议，而诗钟则绝妙好辞也。演义不可入诗，并不当入诗钟，然用渔洋故事，固典实矣，非可一概论也。若闽人恶男女人名相对，是亦太苛。采其事入联，非取其人以相偶也。冒君鹤亭尝持此说人，固有所本，如天然巧合，不能不用。固未足为病。若用周公孔子，而对以红拂绿珠，岂特男女不相称哉。至人名，闽人少用则有之，与粤派之必点明人名者不同，亦非忌而不用也。唯闽派参用人名，句必放活，粤派则遇隶事生僻者，苟不揭出人名，则不知为何典。樊山谓："天然凑拍，至当恰好者，以雷同见抑。故征典务僻，用事取新，然过于险僻，阅者不知其来历，则不敢取。故每征一事，必人名地名书名时代详核于十四字中。或又病其质直处多，清虚气少，此其所以难也。"其深得此中甘苦者也。

诗钟作法既如上述，然仅赅括言之，而未及分体言之也。兹先述嵌字一体。嵌字体以两字对嵌为正格，如一唱至七唱是。周而复始。社集必有此题，两字一平一仄，一唱三唱，亦必分明，不可以其可以互用而忽之，从其体也。有定所嵌二字上下句不能倒置者，亦有可以倒置者，视其社例耳。按拈出二字，最宜一虚一实，如一为名词，一为动词、形容词、接续词、副词类。题字为题中之珠，须支对匀称，方见警切。如虚实不侔，最难配置。最要者，在题字上下相连之字，属对工稳，轻重停匀，如屋之栋梁既建，其余藻饰雕琢，自

易施工，否则色彩鲜明而骨干脆弱，未有不蹶者。如嵌字一为动词，一为名词，以动词对名词，必求其可假为名词者用之；以名词对动词，必求其可假为动词者用之。此严格也。设无此天然对偶，则全在上下之字着力，工整而不牵强，新颖而不僻涩，斯为上矣。然亦不尽拘嵌字不相类者，能用人名亦取巧之一法，唯粤派居多。或借字面成语之巧对，用人名对事物者，如黄子久对紫丁香，人人皆能言之。且题字与所连之字，无论闽粤，必须有来历，其余字亦求一气相生，与题所用之字不至旁生枝节，妙造自然，斯为最胜。唯闽派多隐用，粤派多显用，闽派多活用，粤派多实用耳。或题字既安置妥帖，辅佐诸字，一句有好材料，而一句无巧对者，亦不妨旁求他索，本句姑从割爱，要当视其组织之功如何，否则宁使割爱，切勿勉强。明乎此而弄题如丸，得心应手矣。魁斗、蝉联、鸿爪、双钩诸格，皆嵌字之支流耳。又题字之外，必须选择题材，支对工致，七字皆有声有色，使阅者刮目相看，则同时用典，而他人望尘不及矣。蛮布弓衣，旗亭书别，韵事留传，盖有以也。

赋物一体，既无题字位置之束缚，而取两事之绝不相类者撰成一联，先求配置稳惬，再求裁对工巧，更求精警夺目，令人掩题即知其咏某人某物，最为上乘。然熟典宜避，亦不宜过僻。过熟则摇笔即来，令人生厌；过僻则牛鬼蛇神，令人不解，均非夺标圣手。又赋物亦有粤派闽派之不同。余谓闽派如谢灵运之初日芙蓉，天然可爱，又恐失之滑易；粤派如颜延年之缕金错采，又恐失之僻涩，是所不同耳。又如分咏题句，虽取径不同，断不可露一题字。又无论嵌字赋物，不可用拗句。偶有天然巧对，不能不拗，是变例也。

王昌龄与芙蓉楼

刘果毅

唐代的龙标，即今湖南黔阳县黔城镇。这里有一座久负盛名的芙蓉楼，是纪念“诗家天子”王昌龄的古建筑，文采风流，照耀今古，名闻遐迩。

王尉其人

王昌龄的生平，据《辞海》：生卒“约698至756年”；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他的籍贯，有三说：《新唐书》载为江苏江宁人；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云陕西长安人；《辞海》：京兆长安（今属陕西）人。王昌龄字少伯。开元十五年（727）37岁登进士第，在同榜士子中年龄大，兄弟辈排列在前面，人称“王大”，后来任江宁丞、龙标尉，世称王江宁、“江宁大兄”、“诗家夫子王江宁”、王龙标、“龙标诗天子”，盛唐诗坛上一位“位卑而名著”的杰出诗人。诗作原有集，唐有五卷，宋有四种版本，均已散佚。明人辑有《王昌龄集》。

王昌龄家境贫寒，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父、祖几代，未闻有何宦迹。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青年时期从军征戍，对八年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会，其诗着力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激励士气，征戍之情，深切动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军行》和《出塞》两组七绝。例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出塞》之一，为王昌龄代表作品。杨慎：“此诗可入神品。”李于麟：“唐人绝句当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

王昌龄个人边塞生活平平，不受上司重视，终于发出“万乘旌旗何处去，平台宾客有谁怜”（《梁苑》）的慨叹！写下“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从军行》）埋怨上司对其

功未报，因此转而走科举途径，开元十五年，年已37岁登进士第，授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后，授汜水尉，汜水县属都畿道河南府辖，玄宗经常巡幸地方，仍属京官；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罢相，他打抱不平，遭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打击排斥，触怒玄宗获罪，被贬流岭南。开元二十八年冬，王遇赦北还后，任江宁丞。天宝七年，他已年过半百，以所谓“不护细行”，据湘黔边境民间传说，他因写《梨花赋》，再贬龙标尉，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的天宝十五年离开龙标。他虽然终生沉沦下僚，屡遭打击，但壮志不衰，一生心系国事，渴望为国输诚效力，诗作中累有抒发。安史乱起，他已年过60。北归途中，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害，以悲剧告终。

王昌龄博学多才，漫游各地，喜交朋结友，与李白、孟浩然、王维、常建、高适、岑参、李颀、王之涣、崔国辅、裴迪、储光羲、张九龄、王缙、綦毋潜等诗人都有文学上的交往。他和李白、孟浩然的交谊很深，也极为动人。他一生经历极其丰富，仅遨游于诗国里的作品，有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五言古、五言律、五言排律、七言律、五绝和残句等多方面的成就，但更擅长七绝，在这一诗体的发展上有其特殊的贡献。由于李白和王少伯等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唐诗中七绝的数量蔚为大观。王的七绝，题材广阔，善于概括和想像，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将丰富的内容熔铸于短小的形式之中，加之语言流畅，深入浅出，明白如话，不事雕琢，音调铿锵，富于民歌气息。因此，广为流传。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世作者所宗仰。

龙标诗作

王少伯由汜水尉贬流往岭南，路经湖南巴陵、长沙、衡阳、郴州……均有诗作；大赦后又经湖南到江宁任职。晚年再贬为龙标尉。诗人逆长江而上，越洞庭，走沅水，经西溪、辰溪、溆溪、雄溪直到渭水、沅水交流汇合之滨龙标任所，沿途会亲访友，观山赏景，有感而发的诗作累累。清道光十九年（1839）黔阳县知县龙光甸及其子道光二十年辛丑科状元、江西布政使龙启瑞，本着“匪存一邑之风骚，更助千秋之凭吊”的旨意，查书找据，将王昌龄在龙标和湖南所作的佳作共29首，其中龙标诗作15首，定名为《王少伯宦楚诗》。龙光甸为“宦楚诗”作跋，龙启瑞用魏体书写跋文和诗，刊刻于芙蓉楼内诗碑墙，书法工整，厚重雄劲，有大家风，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物。

诗碑首篇就是《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此首为王昌龄的重要作品，作于江苏江宁，抑或作于湖南龙标？各种版本注家，均说在江宁所作，而龙氏父子见解独特，认为是龙标作品。《全唐诗》“吴”作“湖”。“入吴”或“入湖”，乃从楚山送客入吴，即从沅水乘船达洞庭，转长江而入吴。《王昌龄诗注》注者李云逸先生：“楚山，润州（含镇江）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属楚。此句‘楚山’仍指送客之地，与上句之‘吴’同义而互文。”此说若与诗碑《别皇甫五》中“溆浦潭阳隔楚山”相对照，两个“楚山”同是楚地之山，无疑为龙标尉时所作。王昌龄汜水尉是九品，大赦后任江宁丞，从八品，更无需托人向洛阳亲友表白自己的冰清玉洁。笔者以为两处地方都有密切关系，两地都纪念缅怀是可以的。跋的全文如下：

唐诗人王少伯以相如题柱之才，抱贾傅怀沙之恨。初由秘书而尉汜水，枳棘空有鸾栖；复自金陵而谪龙标，雪泥偶经鸿踏。从来迁客，不废啸歌；自古逐臣，偏工怨诽。盼雁影于衡阳烟外，人远长安；听猿声于湘浦月中，梦怀乡国。况橙黄橘绿，一年多好景之时；芷白兰香，三楚本骚人之地。宜其艳分屈宋，挥毫而珠玉随风；秀挹沅湘，落纸而云山增色者矣。

无如劫灰久冷，断碣难寻。访送客之江楼，朱阑藓没；问乞诗于蛮洞，锦字烟销。天客到孤山，问讯遁翁之遗稿；人登岘首，摩挲叔子之穹碑。今无以传，后将何述。

爰检全唐之集，摘录尉楚之诗。川原则信而可征，情事则慨焉如见。东方朔吟哀时命，不无落拓之怀；陶渊明赋《归去来》，大有逍遥之致。

高楼既筑，乐石斯镌。匪存一邑之风骚，更助千秋之凭吊。庶使贞珉耀彩，山巅之明月齐辉；妙墨流香，江上之芙蓉共艳。诵刘梦得竹枝之词，雅韵犹留；登白太傅琵琶之亭，流风未坠。聊存梗概，敢云探得骊珠；用志遗踪，亦愧窥见豹管。

道光十有九年，岁次己亥重阳日，知黔阳县事桂林龙光甸撰，男启瑞编次并书。

名楼钩沉

芙蓉楼何时始建无考。唐天宝年间，诗人谪贬龙标后，在诗作中多次写到“楼”，大概就是芙蓉楼的雏形。《李濯游江东》五律中，有“离时便千里，远梦生江楼”。《送魏二》七绝中，有“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嘉庆重修一统志》：“芙蓉楼，在黔阳县境，唐王昌龄有《芙蓉楼》送辛渐诗。”旧址荒废。清同治十三年（1874）《黔阳县志》：“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叶梦麟于东城外建芙蓉亭。”嘉庆二十年（1815），因芙蓉亭倒塌，且原址“无山

水林木之美”，又非“唐时之旧”，知县曾钰另择西城外香炉岩建芙蓉楼。县令曾钰撰的《新修芙蓉楼碑记》石：

今黔阳县治，梁至唐曰龙标。唐开元（笔者按：应为天宝）间，江宁王少伯由中秘谪迁斯尉，因以龙标名县，有楼曰芙蓉，相传少伯送辛渐赋诗饯别其中，文采风流，照耀千古！楼在县境，本朝一统志载之，不言其他，莫或知其处所。

乾隆间，前令叶公梦麟于郭东筑亭仍其名，旋圮。流俗相沿，遂指为楼之故迹。

余思黔阳自汉置镡城县迄今二千年，官于斯者不知凡几？少伯之前未闻有为之先者，少伯之后未闻有为之继者，而少伯独以龙标名，是龙标之地以少伯而彰，则少伯遗迹之在龙标者，乌可听其湮没而不传！

岁癸酉，余承乏兹邑。莅政之暇，与二三都人士谋复建之，寻前人之植亭废址，低洼迫隘，无山水林木之美，既非唐时之旧，而蕞尔之土又不足以著名胜、惬游观。爰改卜于城西香炉岩，其地背廓临江，依林踞阜，轩豁呈露，洵胜境也。

佥议曰善，遂捐廉为倡，邑庶士闻之，咸踊跃乐输。鸠工庀材，诹吉始事。余亲为经理，因地势之高下，准布置之疏密。正者为楼，高者为亭，拱而翼者为廊，缀其旁者为室，缭以长垣，固以石阑，层磴穿云，飞甍插汉。登眺则群山拱翠，仰视则万木交阴，沅水自北来环其下，澄潭委波，惊涛涌雪，帆樯出没，洲屿萦洄，为一邑之巨观，复千载之古迹，使昔日之文酒清歌，流传宇内，旗亭画壁，著为美谈，焕然复见于今。虽少伯之风流余韵，足以感动千百岁后之人心，而邑之人士能醵金助力，趋事赴功，以克成盛举，又以见黔阳民俗之厚，为能不忘其初也！

楼成于嘉庆乙亥孟秋之望，县令闽南曾钰为之宴饮以落之，并记其事于石。

为庆贺新楼落成，曾钰除撰碑记一篇外，自为七律四首以纪其事。并于当年重阳日召集幕僚子侄及本邑诗人墨客，举办登高之会，数十人参与传抄唱和，得诗若干首，汇为一帙，以志一时唱和之盛。教谕黄本骥作《芙蓉楼唱和诗序》，付梓刊印。

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龙光甸（又名龙殿）重修，一家三代人投入建设。亲自设计，主楼下为龛，厅中祀王少伯，左、右分别立前邑令曾钰、雷铎牌位。龛外龙知县儿子龙启瑞集王昌龄送辛渐诗末句七字，“一片冰心在玉壶”，篆合成一把壶状镌于石上，名“玉壶碑”，构思巧妙，令人赞叹！龙殿母

亲黎太夫人，能诗善画，绘“芙蓉楼全景图”和“王少伯送客画”。今日游人步入园门看到门楣上的大型泥塑“王少伯送客图”，就是以黎太夫人画为蓝图，经她亲自指导雕塑的，线条柔和流畅，人物情趣盎然。

龙光甸还邀请书家、良工钩刻米襄阳《石山书院碑记》、雕刻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颜公“浮玉”和岳飞“墨庄”大字，武陵女史陈梅仙篆字16镶，曾钰、黄本骥、龙殿、龙启瑞等人题诗、作词、撰联碑刻60多块。草、隶、行、魏、楷多种字体俱备，翰墨流香。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国民党湖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黔阳县县长张其雄再次小修。名楼历经沧桑，早已破烂不堪。解放前夕，匪首潘壮飞率匪众千多人洗劫黔城，虎狼横行，一刹那两条大街浓烟蔽天，成了废墟，芙蓉楼也险些付之一炬，部分文物遭致抢劫或捣毁。

1959年1月，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芙蓉楼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年浩劫期间，将文物古迹作为“四旧”横扫，颜碑“青山明月”四字被砸坏，石狮脑袋被敲烂，石刻诗碑推倒埋入泥土，一些珍贵木联及文物也散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南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整修，恢复原貌，并新增一尊千年梓木特大型树根雕，置于主楼一层正厅，倍添光彩。

1985年正式对外开放。

胜地漫游

诗从景出，景以诗传。人品与诗作同彪炳，楼名与诗名共显彰。仰慕、缅怀诗人，以及芙蓉楼的吸引力，致使游人纷至沓来。我曾先后往访四次。

20世纪70年代末，枝柳铁路通车，我从怀化乘火车到黔城，找到了芙蓉楼址。但见诗碑推倒不少，个别石碑还被砸坏。断壁残垣破窗，野草丛生，满目荒凉。

三年后来芙蓉楼，只见工人们正在雕刻窗棂花格，整理扶正碑刻……

芙蓉楼修复后正式对外开放，恰巧黔城乡正式划入洪江市管辖。1986年4月10日，洪江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离休老干部春游，看得比较细致。

芙蓉楼依林踞阜，背郭临江，隐现在绿阴之中。楼前沅水长流，江旁有钟岩、鼓岩、香炉岩等陪衬风景。岩石起梅花纹，怪石林立，树林葱茏，环境优美，不愧为“楚南上游第一胜迹”。

我们一行经过古木参天、野花夹径的送客亭。沿着约两丈高的青砖围墙前行，围墙向河岸边倾斜了两尺多而不倒，乡长说，这是芙蓉楼建筑艺术上的奇观。

正门门楣上书“龙标胜迹”四字横批，围墙壁上一幅“王少伯送客图”的雕塑，线条流畅，人物传神。门楣两边，根据王昌龄诗意，绘有壁画。

观其整个建筑，正者为楼，高者为亭，拱而翼者为廊，缀其旁者为宇，周围绕以青砖高墙。围内主楼，雄伟壮观，端庄典雅，结构严谨，技巧精湛。围中鹅卵石曲径串连着各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

我先向颇为雄伟典雅的主楼走去。这是一座古典式的歇山顶两层阁楼，全系优质木结构，色彩浓郁，屋顶为重檐，檐瓦为琉璃瓦，檐下无斗拱，代之以卷棚，两层重檐八个角脊高高翘起，中脊四龙戏珠，古香古色。一层四周护以石栏，二楼走道系木质栏杆。楼上最高处正中巨匾上“芙蓉楼”三字黑底隶书金字，光彩夺目。主楼门两边悬挂着一副木质楹联：

天地大离亭，千古浮生都是梦；

芙蓉空艳色，百年人事尽如花。

一楼正厅，陈列一尊千年梓木特大型树根雕。这根雕最大直径1.89米，高1.54米，重约1吨，木质优良，芳香四溢。树根上雕有“芙蓉楼山水图”，整个雕刻突出体现“芙蓉仙境”，雕刻30多个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计有100多个传记人物和150多个精禽怪兽。美人英雄，别具情趣，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飞禽走兽，或飞腾奔走，或怡然自乐，传神逼真。“刀头夺取千般态，眼底惊收万种情”。参观者称之为“三绝根雕”：超大型芬芳四溢梓树根雕，实属罕见，人称一绝；根雕人物传神，细腻精美，又是一绝；根雕作者洞口县74岁老艺人傅根源和他的26岁儿子傅昭槐，匠心独运，技艺高超，穷数年时光雕成，再称一绝。“三绝根雕”实为一件稀罕珍品。根雕两边壁上悬挂一副木刻篆字楹联：

名花好与题诗句；

寒雨曾经迎客来。

二楼正厅两侧木柱上，悬挂着清代嘉庆年间制作的对联：

楼上题诗，石壁尚留名士迹；

江头送客，冰壶如见故人心。

站在高楼上，凭栏远眺，清冽的㵲水在楼前经过，汇入沅水，㵲水对岸，座座高楼，掩映在柑橘绿林的深处，铁路、公路蜿蜒于青山秀色之中，黔城人民绘出的壮丽图景尽收眼底。

下楼到楼后正中，看“芙蓉池”。池中假山怪石，柑橘、石榴并生石上缝隙中间。相传“芙蓉月夜吟诗弄洞箫”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池侧广植芙蓉、石榴、万年青、月季。“芙蓉池”与“半月亭”紧紧相邻，有一副写“芙蓉池”的对联挂在“半月亭”木柱上：

鱼在水中寻朗月；
树生石缝柱青天。

“半月亭”为似半月形的长亭，走廊两旁置木质长靠椅，游人可坐可靠。芙蓉楼资料一文中说，“半月亭”原有副联语：

风梳三径草；
月浸一池花。

从“半月亭”上“玉壶亭”，欣赏道光状元龙启瑞将“一片冰心在玉壶”七字篆成一把壶状的“玉壶碑”，妙趣盎然，令人遐想。“玉壶亭”悬挂木联：

风动铃声穿槛去；
月移塔影过江来。

沿卵石小径到“三角亭”、“耸翠楼”。“耸翠楼”形似湘西民间二层雕梁画栋的吊脚楼，柱上两边有一楹联：

径曲尚余寒雨润；
楼高直与白云齐。

它坐落在大树葱茏之中，左侧有两块大石碑，一块刻先贤石像，一块镌八龙浮雕，形象生动，游人喜爱在此处取景摄影。右行即进入碑林，可读到刊在墙壁上的70多块诗碑、联碑和欣赏颜、黄、朱、岳诸名家墨宝。联碑中有两联颇引人注目。一联云：

过客离亭千古思；
清风明月一江楼。

另一副署名“翰城王继贤”，两颗篆字印章，行带草体楹联：

妙图鸿戏秋江水；
佳句风行晓苑花。

王继贤系黔城乡长坡村人，由廪贡生赴京都进国子监深造，留京任京宫中书达14年，道光时外放山西宁州知州，生平长于书法，当时在京享有较高声誉。高丽国王（今朝鲜）派使臣前来求字，王书“继美凌烟”四字，得赠纹银4 000两，誉为“一字千金”。

今日黔城，交通十分方便，枝柳铁路经过此地，公路四通八达，航运畅通无阻，循沅水经洞庭湖到长江，如果王昌龄在世，从江宁乘船来龙标，肯定路途行船时间不需延挨好几个月。

袁大胡子

黄粹涵

1930年春，我考入长郡中学初中，每周有一节习字课，由许君曜汝赓先生任教。许师是名书法家，板书点画勾折同墨笔字一样有棱角筋骨，极为漂亮，横看去成一条线，直看去字成行，好像写在方格里似的又整齐又悦目。相对语数英来说，同学把习字看成杂课，课间休息时早把墨磨好，许师进入教室，值日生一声“坐下”，大家就在九宫格本上写起来。一页32字，不一会写完，收拾笔墨，把字送到讲台上，向先生一鞠躬，便离开教室玩去。大概当时习惯如此，许师也不禁止。

第二学期第一堂习字课时，校长王季范师陪着一位古怪老头来了。看上去约摸有70多岁（实只62岁），满脸大胡子，又粗又密又乱。架一幅铜框老花镜（当时老式铜框镜已很少人用，大多是玳瑁框的了）。戴一顶青西瓜皮小帽，陈旧不堪，又没有顶珠；穿件老蓝布长袍，那袖口周径足有两尺大，袍腰也宽大得可以再容一个人。穿一双双梁布鞋，白大布袜。走进教室，值日生喊“起立、敬礼！”这老先生还有一只脚没踏上讲坛，右手就伸出食指指着一个同学骂道：“那伢子怎么不行礼呀？”老师才见面就骂人，真有些怪。季师在黑板上写了先生的姓字，然后说：“袁老先生是书法家，他早已不教课了，是我几次去请，他老才肯来的。名师难得，你们要用心上课。”说完便退到教室后排的空处，挺直地站着，一直站到下课。

季师治校严，同学稍有不规矩，轻则当面教训，重则教训之后按校规处罚（挂牌公布），当要开除就开除，不讲情面。他自称是“一言堂”，有时甚至用扇或几何尺打手心。同学最怕他，私下叫他“王老虎”。季师站着不动，同学没得皮调了，只好规规矩矩听课。顺便提一句，以后袁老上课，季师只要在校，必定陪伴来，直挺挺地站在教室里，站到下课，同学们非常不自在。

老先生首先讲了来上课不是为赚钱的，讲好只教义务课，是因为王校长再三再四请他，被王校长培育人才的一片诚心感动了才来。如果送薪水，他就不教了。然后讲习好字的重要，习字时坐的规矩，执笔的要求，悬腕的姿势，然

后让同学写字。他一口保靖土话，我们年纪小，听来十分费力，经常有一两字吃不准，又不敢问。他讲完之后，同学开始写字，他就在行子中间来回穿，看到有坐得不正，执笔不如法，笔杆不端正，腕没悬起的，便一个个给矫正，做到正确才罢。有个同学一页字写完了，送上讲台，向老先生敬个礼，要出教室了。老先生又把他喊回来，说："写完字要坐在位子上看帖，不下课不准走。"我们当时并不懂帖怎么个看法，不让走，只好坐下，心里在唱埋怨歌。

这堂课似乎时间特别长，好容易下课铃响，季师陪老先生休息去，同学们才七嘴八舌议论开来，有的说他严，有的说他怪。

第二周上课老先生讲写字用具。要青石砚池，不准用砂石砚池，砂石磨进墨太粗；墨要现磨，不准用陈墨，也不准用墨盒。纸要用九宫格，粗纸，不准用竹纸、汀贡纸，纸薄而光滑，练不好字。帖要用唐朝以前的，宋朝以下的帖不准用。帖不好的到玉泉街（当时旧书铺集中地）去买，就说"袁吉六教来买的"，让老板拿石拓的好帖（当时珂罗版帖尚少），不要木刻版的坏帖。老板听到袁吉六就会知道，一定不会卖坏帖给你。你们准备好，下回要查。

第三周袁老下讲台查了。当时同学中学赵孟頫、何绍基、黄自元、陆润庠的都有，学钱南园的更多，有帖的并不想去要什么唐朝以前的帖，想马虎了事。先生看到这些帖，便拿起来撕成碎片。同学叫苦不迭，却吱声不得。我当时用的是叔祖父铭功枰斋先生写的一个范本，先生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阵，问："这是哪个写的？"我照实回答了，他没吱声，放下帖，过去了。我真捏了把汗。

青石砚池墨不容易研，写完字又教看帖，不准先走，又有"老虎"在后面压住阵脚，于是习字课由杂课变成了苦课。

有几次上课遇上雨天。老先生打一把头号大红纸伞，不搁在休息室里，提到课堂来放下。足上穿一双蚌壳式的底上钉了铁钉的油皮鞋，走起来的嗒的嗒地响——这鞋乡下常见，长沙只有下苦力的劳动者还穿，一般市民全改穿套鞋了。腰上系一根草绳，把棉袍前后的下摆折成三角形，把角提上来纳在草绳里，裤子就全露在外面——农村人雨天怕袍子沾上泥浆，也是这样扎衣的，但捆腰总用布带，进屋了将三角形拉下。这扎衣式样在长沙市民中已经少见了，而老先生上讲台后也一直不将三角形放下来，神态自如地只顾讲课。同学们想笑，却不敢笑，只是相对挤眉弄眼，做个鬼脸。

每次的习字老先生都看了。很不端正的字用朱笔作了改正，写得好些的在字旁给个红圈。

老先生给季师写了一幅八尺大屏，字有尺多大，行书带草，两侧还写了较长的跋，季师将它张贴在办公室门前供大家鉴赏。有几个草字当时我不认得，

记不出屏语的原文了。只觉得势如奔马，气魄惊人，笔力挺拔，但还不能领略全它的妙处。虽然领略不全它的妙处，同学们却心服了，这位老先生道高艺高，确实有一手。初中二年级以上没有习字课，季师还特地请袁老在大礼堂上了一晚夜课，让全校高初中学生共听，全校老师也都来了。讲的是"永"字八法。老先生用飞白体熟练地在黑板上勾了个大永字，然后指着讲什么"勒、啄、磔"。这些名词就很怪，我并没全盘听懂。

此后，不见老先生再来，我却在曾文正公祠（现在中山路的船山学社）碰到了他。当时我父亲从芜湖回长沙，住曾祠，我去，正碰上袁老在骂他的工友，原来他就住在另一房内。父亲的工友告诉我："老先生住了40多天了，工友都不如他的意，换了几次人。他教工友来看你父亲在家没有，工友说出去了。刚才他见到你父亲，回头就骂工友先头撒了谎，你父亲是刚回来的呀。说又说不清，只好听他骂去。"父亲告诉我，袁老和他在一师同事，很熟；老头是个学者，他编的国文讲义很精到，家里有，你可以看看。后来我在家里找到了讲义，是讲文字源流的，有些地方还看不懂，只好搁下。

哥哥当时在湖南大学读书，说湖大同学给袁老送个绰号，叫"博物馆的陈列品"。这雅号似乎兼有两方面意义，一指他精通炎黄文化，一指他服饰陈旧过时，显得奇特。其实，当时中国拖着长辫子的遗老遗少还不少，湖南大学就有一位（恕我不敢点名），服饰陈旧，也值不得大惊小怪。

解放后看《毛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谈到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经历说："学校里有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我又记起了袁老先生，深恨自己当时年龄太小，虽亲聆过先生的教诲，却没能全部领会。

袁老正名士策，学名仲谦，字吉六。祖籍新化，清初迁保靖，他生于1868年，应该算保靖人。1897年丁酉举人。1914年后，先后在长沙任教于一师、一中、长郡、明德诸校，以后参加筹建湖南大学，并在湖大任教。平生著述甚多。1932年逝世。

1950年，袁老的继配夫人生活无着，托人写信给季师。季师将信转呈毛主席，并在信后题了四句："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枝。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毛主席阅信后，即关照湖南当局作了照顾，夫人得以安度晚年。

记祖父朱德裳

朱运

先大父，讳德裳，字师晦，自名其斋曰“九还”。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卒于民国二十五年。吾家世居湘潭北乡之罐子窑。太高祖讳铭鼎，字建中。高祖讳登瀛，字仙舫，以附贡生纳资为衡州学训导，有集曰《东滨录》。曾祖树之，字印潭，县学生员，早卒。曾祖妣徐，抚孤成立，教导有方。公年少峥嵘，文彩炳蔚。张燮均督学湖南，公与试，试卷已点定，次名二十，榜发竟屈落，莫知所由。公乃就亲友贷金，市图书数百卷归，键户诵习。曾祖妣徐至破产偿书价，吾乡方言，“输”“书”音同，遂讹传徐太夫人破产为儿偿博负云，时光绪十六年也。二十九年癸卯，公以第一名中试湘潭县学生，食廪饩，同年中选留学日本官费生，湘人同与斯选者，凡三十四人，其著者：长沙杨昌济，善化陈家瓒，湘阴仇亮，宁乡廖麓樵，湘乡萧仲祁，邵阳石醉六，新化陈天华、曾继梧，衡山刘揆一，同邑李傥、胡迈、杨仲子。

公既东渡，习警政，与黄兴、蔡锷友善，入同盟会。学成归国，主办湖南警政学堂。长沙周介祹，即其著籍弟子。时戊戌维新既败，孙黄革命之说大张，而吾湘犹倡守旧，盖长沙王先谦、湘潭叶德辉、蔡与循实主张之。公乃与同邑易味腴、曹毅亭倡新学相排抵，且撰湘潭县人士驱逐叶德辉檄文，版印数千百本流布，新旧学之争，壁垒森严，于是民间遂有“易曹朱，黄叶蔡”之谣，盖湘潭方音，黄王无别，他字亦取谐音，谓“一槽猪势吞黄叶菜”耳，其慷慨激越之概，今犹仿佛见之。

浏阳唐才常，谋覆清社，组自立军，公与焉。旋入都，官警视厅右丞，阴为革命党人内应。宣统二年，补民政部签事，花翎三品衔，特旨加随带四级，兼北京官医院监督。公在官时，属僚某，属稿不善，公涂改不少假借，某衔之，投书密告，指目公为革命党，公乃避难走天津租界，其忠于革命如此。辛亥十月，清社终屋，政肇共和，公任交通部签事。其在官医院监督任内，羡余万数千金，悉以移交，丝毫无所取，其廉又如此。公官京师，同邑齐璜白石，善绘画、金石篆刻，顾士林未之重也。公与义宁陈师曾衡恪旧交，介璜与之交

友，师曾遂为璜延誉，名乃大噪，璜为公治印，镌边款云：余由师晦，得识师曾，师晦有命，无不从也。其宏奖风流又如此。袁世凯图复辟。蔡锷以计脱走，出都时，至余家易服，公以三十金赠之。与黄兴交尤笃，先妣语余，黄兴返长沙，各界集会欢迎，我则弹风琴。盖当时以此为奏乐也。宁乡周震鳞道腴，尝语余外子湘阴易祖洛云：“汝妇祖朱师晦。与克强交最密，时称为黄兴之副官长云。”余忆公诗集中，有九君咏之什，九君者，张鹤龄、善耆、黄兴、蔡锷、仇亮、范静生、陈师曾、叶德辉、梁辟垣也，其拳拳于友朋之谊又如此。

公年五十不仕，时先考供职山西运城盐务局，迎养梓舍，日以临池吟咏自娱。公与康梁政见不同，而独服膺有为之学，以所为并州杂诗为贽投有为，有为详为评改，称其诗老苍而秀发云。公博学多通，所著者有《六书哲学》、《管子注》、《三十年闻见录》、《续湘军志》、《诗集》、《文集》、《日记》各若干卷，遗稿盈笥，先考以畀外子宝存。

岁丙午，家藏残书并遗稿，荡然无存，唯《续湘军志》清稿，以王先生季范借去，幸存于京师，近袁鹤皋先生从长沙市第三中学拾得癸卯日记一卷，刘焜先生拾得文集一卷，皆烬余也。

无私无畏

——先祖父黄兴言行片断

黄曼西

今年是先祖父黄兴（克强）诞生120周年，回忆先祖父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感受极深，谨记先祖父言行，以资纪念。

先祖父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青年时期即怀抱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宏愿。1903年，先祖父从日本回来，在长沙发起创立华兴会。当时革命经费极端困难，先祖父变卖了凉塘的300石祖业田，捐献作为革命经费，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华兴会的干部虽然比兴中会多，但先祖父仍推孙中山为总理，自己居于协助地位。最难得的是，当孙中山被迫离职，接受日本政府及私人若干旅费未经公告而引起一些人的误会，且有改推先祖父为总理之说时，先祖父顾全大局，力排众议，由香港致书东京同志云："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应倾心拥护。"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在日本东京的同志，消除了同盟会内的隔阂，维护了这个新兴革命组织内部的团结。先祖父还提议原为"华兴会"刊物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因该杂志同人半数已入同盟会，可将此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出版。众皆拍手赞成。杂志改名为《民报》出版，极受民众欢迎。

先祖父常说："我们都有一死，让我们死得勇敢。"他作战极为英勇。1911年，先祖父从南洋赴广州部署军事起义时，曾于4月23日早晨向南洋党人写了表明牺牲决心的绝笔信："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达了他誓死推翻封建统治的坚强决心。黄花岗之役，他面对强敌，以寡敌众，毫不畏惧，身先士卒，在战斗中打断了右手中指和食指。武昌辛亥首义后，祖父在汉阳督战，先父黄一欧担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参加进攻南京之役。一天收到了先祖父从汉阳前线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只写了："一欧爱儿，努力杀贼！"八个字。先祖父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坚守汉阳一个月，得各省响应宣告独立。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

公举先祖父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敦促他赶快去南京就职，他在预定动身去南京的先一天晚上（1911年12月23日，农历月初四日）忽然决定不去了，大家感到很突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答道："刚接到孙中山先生发来的电报，他已经动身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没有回国，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如果抢先一步去南京就职，将会使他感到不快，同志们也会发生猜疑。"

清王朝被推翻后，祖父力主建立共和民主制度，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图谋称帝，李烈钧宣布独立讨袁，袁世凯派兵南下，步步紧逼，战局紧张。这时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来上海向先祖父密报说：朱卓文从上海带两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旅长后宣布独立，树起讨袁的旗帜，请先祖父去南京作讨袁总司令，待南京独立巩固后，再请孙中山先生去组织政府。先祖父听了以后，认为如果第八师先自投入战斗，势将破坏大局，因此决定自己去南京主持讨袁军事，留孙中山先生以任大事。先祖父还经常对敢死队成员说："我们革命党，并无多大的本领，敌人所怕我们的，是我们的手常放在刀锋之上，很迅疾的预备同敌人决死，打仗不是作乐，打仗本是危险的事情，打仗总不免你死我活，我活你死，免不了一方面要死。我们同敌人战斗，自始必要先存了死的决心，就可以不死，即兵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先要自置死地，然后人人自然都有决死之心，并且这样的死，虽死犹生，我们能够存死心与敌人争生死，必能致敌人于死地。我们攻击敌人，总要施展出十三分的力量，予敌人以重伤，使我们的胜利，可操左券。现在我们知道，敌人是比我们强大得多，敌人人众，我们人寡，所以我们要比敌人格外的勇敢，动作要格外的迅速，我们要把握好机会，才能够战胜敌人。"正如人们在孙中山先生传记中所评价的："克强先生是一个不息的战士，永远是急切于作战的，他从经验上得到深的谋略，到了使用他勇敢的本性时，常常预备把生命冒险。孙中山先生用演说激励万人，克强先生带了被激励的万人，振臂一呼，攻击堡垒，流血疆场，毫无惧色。"他的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诚可以廉顽起懦。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任大总统，先祖父任陆军总长，旋派为参谋总长。当时日本明信片刊孙、黄半身像，先祖父的手书"无我"、"笃实"等照片。"无我"、"笃实"四字反映了先祖父为革命舍生忘死、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和诚笃踏实的优良品质。先祖父从不争领导权，与孙中山先生合作无间，自始至终拥护中山先生的领导，维护中山先生的威信。他常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则功成而不居"，并以此为处身立世之道，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生淡泊名位，危难不惧，谤生不辩，功成不居，盛德大量，与世无争，当时国民党内外人士，亦多在其涵育之中而浑然不觉。

时序如流，值先祖父120岁诞辰之际，回顾历史，我们伟大祖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辈毕生奋斗的革命事业，今天已远远超过他们当年的理想，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知灼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越了前人，改革开放的浪潮，把11亿人民不断推向了富强康乐的境域。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我们纪念克强公120岁诞辰，当发挥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作者系黄兴先生孙女，本文写于1994年）

话说杨度

杨第甫

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薛华立路的寓所里，57岁的杨度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溘然长逝了。临终前，他极其郑重地向妹妹少姬口授了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接着，召来学生董建吾，托他将一笔钱捐给"中国互济会"，作为自己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交代这两件事后，他面带安详的微笑入睡，再也没有醒来。

一、书生意气

杨度，字晳子，号虎公，湖南省湘潭县姜畲乡石塘村人，1874年农历十二月八日诞生在一户种田兼当吹鼓手的农民家庭，是这家的长子。杨度6岁时，父亲杨懿生去世了，他被送到伯父杨瑞生家抚养。当杨瑞生以总兵镇守归德时，杨度兄妹随署读书，成了总兵的侄少爷。

杨度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加之读书刻苦，20岁就中了举人，平坦的仕途展现在他眼前。然而，他所处的时代却不容任何有血性的中国人沉湎于书斋，苟安于宦海。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社会日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杨度中举的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了，他出自爱国豪情，毅然放弃读书仕进，上书清廷请缨杀敌，但未获批准。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签字的警钟，震撼了他的心灵。他愤懑填膺，谋求救国图存之道。他回到了家乡，投师于著名学者王闿运门下治帝王之学，希望将来能辅佐圣主明君，既可拯救国家，又可一展爱国的抱负。他豪爽任气，才华横溢，"一言既出，四座生风"。当时他书生气十足，王闿运老师常疼爱地骂他："书痴自谓不痴。"胡汉民也说他"读书甚勤"。杨度则自谓："书生襟抱本无垠。"1903年春，湖南派出第二批留学生赴日，杨度在欢送会上即席演说，申述他的反帝救国主张，他谆谆告诫大家："夫西人何爱中国而保全之？中国而听其保全也，则命悬于西人之手矣！"他勉励留学生努力学习科学，而"科学之中，以自然科学为要"，不发展自然科学，"则一切种种，皆留声机器

耳”。他还指出，留学生如果不为国家、集体谋公益，则个人学问也无足贵。

1903年，他怀着忧心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次年作《黄河歌》。前者对激励全国，尤其是湖南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起了积极作用。胡敬思《退庐奏稿》卷四奏折中说：“候补四品京堂杨度所作逆书甚多，业经传播，确实可据者如《湖南歌》。”后者于民国初年谱为歌曲，在学校中教唱，激起了一代青年的爱国豪情，至今一些老人犹能诵唱（如1983年何长工同志在湖南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曾放声高唱《黄河歌》，可见影响之深）。杨度在青年时期鄙视邪恶，追求正义的言行，闪耀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异彩。

二、君宪之路

维新思潮的兴起，激发了杨度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他广泛阅读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书，产生了民主政治思想，并成为梁启超的好友。但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使他又一次警醒，他开始意识到靠和平手段不能促使清政府改革现行制度，必须使大众觉醒才能救国。1902年，他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希望以此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当时杨度的思想十分活跃，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涉及各个领域。在军事方面，他号召“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文学方面，他提倡写近于口语的“小说文学”；政治方面，他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过如家庭制度”，要求“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他猛烈抨击清朝的专制制度，主张通过“骚动”来争取国家和社会进步。可是，在他同黄兴、陈天华等交往中，却认为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破坏性太大，会造成天下大乱，给列强以可乘之机。加之他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以来，在不长的时间后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感到中国可以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将君主制度变革为君主立宪，可在改革的道路上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孙中山到日本同他反复谈论革命的必要性时，他说：“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已疲弱，不堪服猛药，以召速亡。英、日都以君主立宪而强，满族虽不足有为，倘待有为者出，则事半而功倍矣。”因此，他虽然痛骂清王朝昏庸腐朽，顽固保守，却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逼迫下，只要清王朝认真实行立宪，就可以实现自己“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的抱负，因此不必推翻它。

1903年，杨度回国应试经济特科，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但因在试卷中大谈新学，遭到清廷通缉，再度出走日本，一住五年。他广交风云人物，东京阪田町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孙中山、黄兴、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和熊希龄等立宪派人士都是座上客，因此被戏称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宋教仁、刘揆一、杨笃生、蔡锷等湖南同乡更是经常集会于此，因此又有“湖南会馆”之称。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杨度激昂的爱国热情和才华横溢，赢得了广大中国留日学生的尊敬。1904年，他当选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旋被推举为出席国内护路运动的总代表，次年又当选为留日学生总干事长（即会长）。他创建了《中国新报》，自任总撰述员，还组织了政治调查会，自任会长。

此时，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信念也更加坚定，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明确地分离了，但对孙中山、黄兴的主张并不反对。1905年，他对孙中山说：“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不妨碍各行其道，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对前途都是有利的。”

可是当孙中山力劝他加入同盟会时，他不肯参加，却将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1906年11月，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演讲，成为同盟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12月，杨度创办的《中国新报》上连续刊载他自己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从他在“政治革命”一节所列举立宪派与革命派主张、方法比较看来，该文也可以说是向革命派应战之作。他的金铁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能与列强角逐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其基本内容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他主张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他主张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自由人民。他认为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工商立国是富民的具体途径。杨度从当时国际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提出了救国之计，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政治热情。他认识到经济战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金铁主义是以此立论的。他言行一致，一面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一面热衷振兴实业，于1909年在长沙与同县梁焕奎创办了民族资本的华昌冶炼公司（后来杨度遭通缉时，他的股金为谭延闿等人吞没。公司在美国的经销人李国钦以不正当手段将中国的公司财产变为他私人财产，在美国创办了华昌贸易公司，发展成国际性的炼钨大财团。美国政府为奖励李对美国的贡献，将其姓氏刻在纽约港的自由神像基座上。由此可见华昌冶炼公司的规模）。

在如何处理满汉关系问题上，杨度认为：“满族实为中国领土上之人民，不过与汉族为同国异种之民耳。”因此，他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认为以清代明，“是以朝姓之迁移，而与国家之存亡毫无关系”。汉族百姓不能认为“亡国”。他不赞成“内除鞑虏”的主张，认为“如持民族主义（指‘大汉族主义’），则必五族互排，终至瓦解，外人乘之”。

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现已由瓜分领土的政策变为保全领土的“机会均等”政策，不仅各国以此为图我之一重要政策，即吾国亦当以此为自

存之一重要国是，以此维持现状，姑保其国，乘此之时，急谋自立。否则“国内分立，必召领土瓜分之果”，“故吾谓今日之中国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唯政体可变”，“即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是也”。他没有把满族统治者清王朝的权贵们与满族人民区分开。当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人民工具的时候，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朝政权，必然与全国人民为敌，欲使中国民富国强，非推翻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朝专制政权不可。杨度在观察满洲贵族掌握的清政权与全国人民包括满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时，陷入了极大错误之中，走到君主立宪的歧途上去了。

1907年，杨度回国了，由于他在1905年应熊希龄的约请，为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代撰了“宪政考察报告”，受到张之洞、袁世凯的赞赏。1908年，他们两人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杨度被清廷以四品京堂擢用，参与立宪活动。不久，杨度参加起草所谓《钦定宪法大纲》，力主限制君主权力，受到参劾，被罢官。他依靠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的设想失败了。

三、帝制祸首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使杨度希望清朝实现君主立宪的想法成为泡影；而袁世凯的崛起，又使他看到新的海市蜃楼。早在杨度从日本回国之初，野心勃勃而又惯于网罗人才的袁世凯就拉他入幕，奉为上宾。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在杨度眼中成了能以铁腕把持局面，进而实现中国富强的理想人物。袁世凯对杨度也倍加赏识，亲笔赠杨度“旷代逸才”匾。杨度感到平生所学有了用武之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军阀弄权，民生凋敝的现象却愈演愈烈，使他对民国感到失望。他没有意识到中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没有意识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现状正是因为袁世凯等军阀倒行逆施所造成。相反，他认为这是没有君主统治下的强大中央集权所致，更担心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争夺统治权会导致国家分裂。他想通过恢复帝制来维持统一。这种见解，恰好被袁世凯称帝的私欲所利用。1915年8月，杨度发起“筹安会”，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拥戴袁世凯称帝。

然而，历史车轮岂容逆转，洪宪帝制仅维持83天就土崩瓦解了。新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明令通缉帝制祸首，其中头一名就是杨度。他只得逃往租界避祸。杨度拥袁称帝，尽管动机是为了统一，但毕竟充当了为帝制鸣锣开道的工具，加以惩处是可以的，不过将他当作头名祸首则不可。洪宪帝制时的活跃人物中，除杨度外，尚有杨士琦、梁士诒、段芝贵等。杨士琦是袁世凯的主要智囊，帝制的幕后策划者；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伪造民意，直接拥

戴袁世凯坐上龙庭，又发放内债、举借外债为帝制筹措资金，人称“梁财神”；段芝贵则是袁的干儿子，手握兵权；在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杨度比这三人，就瞠乎其后了。可是通缉令中却没有这些人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的有军权，有的有财权，新上台的军阀还得借重他们的实力，自然不敢为难他们，而一介书生的杨度，却自然地成为“祸首”蒙羞难白了。

四、走向光明

洪宪帝制的短命，使杨度开始认真思考君宪救国的道路是否可行。1917年，张勋复辟，顷刻间成了过街老鼠，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这一事实，促使杨度的猛醒：君主的幽灵不允许再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了。于是，他通电反对复辟，要张勋和康有为“及早收束，速自取消”。此后，他对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政治主张进行了深刻反思。《江亭词序》中写道：“予浪迹东西，飘零江海，中经特科之举，台谏之劾，名捕之讨，虽避地于日本，见国之益危，乃昌君宪论……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止矣。”下定了同君主立宪主张一刀两断的决心。但要使中国富强，到底要走什么道路呢？他在逃避通缉隐居津门时，曾借学佛以求索。

杨度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志士，学佛的过程中，他没有沉浸于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的追求，而是全面总结了十多年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悟出了一些救国救民的真谛。他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中说：“余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亦无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己，其法唯有无我主义。”“欲求无我主义，盍于佛法中求之。”他参悟了“随缘人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遍医众疾”。他的自我改造进入了较高的境界，决心淡化个人得失，为国为民做有益的工作。他进而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了形势，得出“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杨度与夏寿田的谈话）。他开始阅读各种进步的刊物，同胡鄂公等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交往，从中摸索正确的救国之道。

1922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陈炯明乘虚发动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屯兵衡阳，准备配合陈炯明夹击孙中山。黎元洪也准备正式任命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或粤军总司令兼省长，如果成为事实，那就是陈炯明讨伐孙中山了。孙中山请杨度帮助他解脱困境。杨度利用曹锟不愿吴佩孚坐大的心理，通过同学夏寿田的关系，说服曹锟作出“不可援助以下犯上之小人”的决定，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黎元洪也因此不敢任命陈炯明了。孙中山感激地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然而当孙中山邀请杨度参加国民党，说：“以哲子

的才气纵横，学识渊博，在我党党内当然要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却遭到杨度谢绝，杨度说：“我不要做北洋军阀的官，也不做国民党的官，让我以普遍平民的身份做些革命工作吧。”杨度为什么不愿加入国民党呢？一是因为以高官厚禄相许同他当时“无我”的思想境界相径庭；二是他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挫折之后，不愿再轻率地接受一种政见，参加一个组织。他觉得三民主义还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国民党也不是自己强烈向往的那种政治组织。何处才是自己的政治归宿呢？他还要继续求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感触很深。日本明治维新后侵略中国，俄国革命胜利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对比之下，他开始考虑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俄国人的道路。1922年，杨度在上海孙中山的家里结识了李大钊，经过长谈，李大钊重新认识了杨度，杨度也进一步了解到有关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经过帝制失败的教训和学佛的思考，又经历了五四运动，杨度终于在李大钊等的影响下，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1924年他在《系统进化哲学》序中说，由于贫富、贵贱之“不平等，而制为伦理、政治、法律、教育等等，以维持贵贱、贫富之不平等，而社会争食制度愈以确立”。他说阶级社会是“尚在兽道主义之时代，而未进入人道主义之时代。自今以往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他认识到凡是“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庶几平等共食之社会，始能出现于世界，而人道主义之道德、政治、法律、教育亦必随之而生”。他特别指出：“欲救今日中国，亦无逾于此义。”他深信这是“物理之必然”，“人事之当然”，又有“谁能阻我”。经过曲折的道路，杨度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终于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写出了“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的诗句，豪情满怀地走上了光明之路。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并暗中反对北洋军阀。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串通帝国主义者要逮捕李大钊，杨度闻讯后即告诉了北平的中共党组织；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利用他与北洋军阀过去的关系多方设法搭救，本来已有一些眉目了，可惜因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使李大钊等二十几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绞杀了。杨度又为了抚恤烈士遗属筹措经费，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李大钊等21人的死，使杨度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更看穿了，为了全力从事革命工作，他把母亲和妻子送到湖南和苏州，自己则根据党的意图迁居上海，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以援助受难的革命同志及其家属。不久，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见到了周恩来。听了周恩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后，他茅塞顿开，对比自己曾经接触过的各类政治主张，觉得这才真正是能使中国避免动乱和分裂，走

向富强的道路，于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度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近十年的思想准备，到此实现了认识过程中的飞跃，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此后，他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他以“帝制余孽”和杜月笙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出入龙潭虎穴，搜集情报，多次将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用火漆打印的大信封装好，要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他还同柳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起义。

五、盖棺论定

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位卓尔不群的政治人物。由于他前半生经历坎坷曲折，晚年埋头为党工作，不计个人毁誉，以致他生前和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般人心目中，被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客，恶事传千里，好事却晦而不彰。十年动乱期间，他的遗孀和子女被抄家批斗，罪名是“反动官僚的家属”，一些书籍称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余孽”。

其实，党的领导人是非常称许和关怀杨度的。1948年章士钊到西柏坡见毛泽东主席，毛对章士钊说：“杨度算不算大知识分子？”章说：“杨是‘旷代逸才’，当然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说：“你的好友杨度，就是共产党员。”1949年，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从海外归国探亲，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兴奋地叫人拿来葡萄酒，热情洋溢地同她碰杯说：“向杨先生在天之灵致敬！”1976年周总理逝世前几个月，特地派秘书关照王冶秋，要他告诉《辞海》编辑部，在杨度“词目下要写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可惜这些事实被封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阳光照到了九泉之下。王冶秋、夏衍等同志纷纷撰文，据实写出了杨度为党工作的事迹。他的功绩得以公开，心迹得以剖白，逐渐得到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毋庸讳言，杨度一生中犯过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他的风范更是典型足式。首先，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杨度从反满到鼓吹君主立宪，到拥戴袁世凯称帝，到帮助孙中山，到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个大的转折，但无论从哪个阶段，持何种政见，他思想上始终贯穿着一条为了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主线，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也是他后来之所以能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条件。其次，他具有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的高尚精神。他1928年入党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却不顾杀头、灭族的危险，毅然加入。他利用和杜月笙的关系做地下工作，奔走于大流氓门下，连女儿都很不齿，但他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向家人和其他人暴露过真正身份。他没有固定收入，有时不得不靠卖书画维持用度，但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毫不吝惜地解囊输将，甚至“毁家纾难”。其三，他追寻真理孜孜不倦，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由于历

史的局限，杨度式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发现真理，掌握真理的。可贵的是，他一生都执著地追求，不达彼岸，决不罢休。其四，他襟怀坦荡，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度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深知老师的儒家观点，但他总是当面大谈新学，不惜同老师造成分歧。当日本宏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攻击中国国内民主革命时，他是学生，不顾同学劝阻，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进行辩论。即使在拥戴袁世凯当皇帝时，他也一定要在写给袁看的《君宪救国论》上指出："实行君主必须真立宪，万勿再蹈清末假立宪之覆辙。对宪政必须诚实，不可欺民。"

杨度等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参加革命，不只是挣脱了身上的锁链，同时也丧失了比较温饱甚至舒适的生活（杨度在华昌炼锑公司就是拥有21万银元的大股东）。如果他们不是胸怀爱国主义，向往某种理想，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不可能做到不辞艰险，置生死于度外。从大的方面讲，是为了爱国爱民，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最终成为共产党人。

唐群英

——南社女社友之杰出者

胡遐之

唐群英（1871—1937年），湖南衡山人，是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著名掌故大王郑逸梅曾在《南社丛谈》中评价唐群英是"南社女社友之杰出者"。南社女社友颇众，诸如"不愿做男子的俘虏"的张默君，奋不顾身安葬秋瑾侠骨的徐寄尘，萍醴起义、丈夫下狱愿以身赎的张汉英，被龙榆生目为近300年间词家殿军的吕碧城等，都是吟坛健将、女界豪雄，为何郑老先生独推许唐群英，我想首先要弄清南社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才能解答这个问题。如果把南社看成一个单纯的诗词组织，唐群英虽是诗人，南社挥笔如林，相对地说，唐群英尚非压倒群芳的翘楚。但如果把南社看成一个比诗社范围更加广阔的革命文学团体，不但是文学的，而且是政治的；不但是宣传者，而且是实践者，那么结合南社发展的历史来看唐群英，就会觉得郑老先生的话并非溢美之词了。

唐群英在南社发展史中，并不是主要角色，其原因：一是南社雅集，多在江浙一带举行。唐群英时而京湘，时而海外，未能参加；二是她在《南社丛谈》上发表作品也不够多；三是她的主要活动，辛亥前，从事同盟会的实际工作；辛亥后，又全力倡导妇女运动，办报刊，创学校，解决妇女职业问题，没把精力放在文学团体上来。但唐群英于南社来说，又是一个忠实地、模范地履行南社宗旨的女社友，而且曾为南社争取过莫大的荣誉。一，她是辛亥初秋在东京经傅熊湘、阳惕生介绍，与其挚友张汉英同时加入南社的。据《南社社友姓氏录》所著，编号为193，在女社友中虽较编号为11的徐寄尘晚了些，但比其他许多女社友为早。从整个南社说，辛亥前的社友均属早期社友。二，她虽很少参加南社本身的活动，但她的主要活动，无一不和南社宗旨契合。三，她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性。辛亥革命中，她曾在江浙组织"女子北伐队"，率队参加攻克南京的战斗，立马横刀，冲锋陷阵，直似古之花木兰。民国建立后，为倡女子参政，见宋教仁，以政纲未列男女子权一项，力掴宋颊，震惊海

内。四，她的诗文，《南社丛谈》所录虽不多，但散见于海内外报刊者，则常为南社同人所称道。她所创办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就备受宁太一的赞赏。宁氏在《留日女学界之新刊》一文中说该刊“大旨在提倡职业，尊重人权，输灌德育。其《女权正说》、《女子复权论》诸篇，尤为全书精神所在，谊正而词明。前此诸女界杂志，得未曾有，足为全国二万万女同胞下一当头棒喝矣”。郑逸梅亦认为“她的诗才，民初各报副刊纷载其诗，亦不类巾帼口吻”。五，民国元年，她与张默君、程颖、陈鸿璧代表“上海女界协赞会”赴南京晋谒孙中山，孙中山称誉唐群英为“巾帼英雄”，授予“二等嘉禾章”。南社之女社友张默君、张汉英等莫不视此一殊荣亦为南社之光荣。

唐群英是位杰出的女权运动先驱，并不以诗名世。但她从小就奠定了传统文化的较好根基。年甫12，其七姊诗：“千古多才惟谢蔡，于今愧煞女中无。”她读后即以为应该改成“于今莫道女中无”，已征幼有大志。15岁始作诗，处女作《晓起》有“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之句，乡中士子，诧为奇才。1896年（清光绪廿一年）26岁，在湘乡荷叶塘曾姓婆家，结识了秋瑾，一见倾心，成为挚友。彼此之间，时有唱和。当秋瑾随夫赴京时，唐有赠别诗，最能体现两人之间的感情与抱负。

“荷叶花开秋复秋，西风不识自登楼。孤灯瘦影难成梦，冷月寒霜不胜愁。易髻而冠谁解恨，如蚕作茧我何忧！生为人杰岂无路，且许芳馨结伴游”。

不久，秋瑾背叛了封建家庭赴日留学，唐群英旋即步其后尘，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东渡，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与秋瑾同窗攻读。在那，她先后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赵恒惕、黄兴、宋教仁、张汉英等人，并由黄兴、赵恒惕介绍加入华兴会，为该会惟一女会员。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7月，又由黄兴引见，拜会了孙中山。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唐群英是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个签字的女会员，且旋与冯自由介绍秋瑾加入。唐群英深敬秋瑾为人，诗风豪放亦多受秋瑾影响。在那人讴皋羽之歌、家抱所南之痛的年代，唐群英山陬仗剑，泽畔行吟，写过绝句八章，刊于黄兴、宁太一、傅熊湘等所创办之《洞庭波》上，传遍革命党人，有如鼓点，有如号角，向人们昭示：“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她誓言：“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她相信“撷得罗兰真种子，灵苗催放九华巅”的日子终会到来。其诗真可“侠气豪情鼓大千”了。

她由沪返湘舟中过小姑山，与张汉英和诗三首，其中“枫叶经霜贮满酣，谁能夺得小姑山！恨无长剑斩蛇虎，敢效须眉不逾闲”，阳刚之气胜于男辈。又如《舟泊岳州城下登岳阳楼晚眺》：“君山突起水潆回，山色湖光照眼来，不访纯阳大仙吕，何当共我醉三回。”何等气派！她与南社老友陈汉元亦相常唱

和，写过《归舟遇陈汉元有赠》：“百战归来剩此身，同舟犹话劫余尘。老陈不是寻常客，曾率诸侯讨暴秦。”诗中末句乃指（陈汉元）讨袁之二次革命也。又《由都返湘值陈汉元联句》：“小艇如囚渡岳州（唐），歌声人语杂江流（陈）。十年忧愤怀秋侠（唐），百战功名笑楚猴（陈）。回首燕云增黯淡（唐），伤心边谟费筹谋（陈）。不堪九死逋亡客（唐），犹得生还话旧游（陈）。”这已经是1917年之作了。南社正苦于某些社友处于醉生梦死的状态，其作品多系靡靡之音的时候，而唐群英、陈汉元这样的老社友，却仍在关心国事，凭吊亡友，回首燕云，殊多感慨。这正是南社一股健康力量的代表，戛然巨响，堪以启聋振聩。尔后，唐群英回到家乡，仍然关心妇女问题，鼓励妇女进祠堂，反对族权；又于长沙、衡山两地创办多所女子学校，让女子与男人享受同样的教育权；五四时期，她还在家乡组织群众开展“抵御外侮，内惩国贼”的游行示威。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唐群英在诗歌上继续有所创作，如《女子放脚歌》曾传遍乡里。1935年，唐群英病逝前两年，她有《金陵访旧有感》一诗：“纷纷姊妹尽华裙，顾我何忧彻骨贫。不见梅花婷婷立，西风岭上好精神。”绝笔之诗，仍以不惧寒风的梅花自况，豪气不减当年。

唐群英素以有丈夫气见称，妇女而须眉，自是奇女子。但不能忽视的是唐群英依然保持了妇女皆具的一颗母性的爱心。她内于父母兄妹，外于同志朋友，都是非常看重感情。她的母亲曹氏病故，她便回乡构筑“云在庐”守墓，以报慈晖。秋瑾绍兴就义，闻耗悲痛失声，作挽联云：“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沉郁悲壮之气，充满字里行间。她还与张汉英多方奔走，经湖南督军谭延闿认可，在湘中建立了“秋瑾烈士祠”。不久张汉英又病逝，她即驰书柳亚子，请其为这位老社友作传，以光彤史。为争女子参权，曾与宋教仁有过一次极不愉快的争论。但当宋教仁沪上被刺，她却在长沙亲撰诔词，进行遥奠。“伤哉公仇，今谁与雪？伟哉公抱，今孰与洁！”表示了她对宋教仁的极度崇敬与对被刺一事的极度悲愤。而她对革命领袖人物黄兴、孙中山的先后逝世更以诗联表达了自己的哀忱。《哭黄公克强》诗云：“昔抱钧天志，东瀛幸识荆。雄风驱鞑虏，建国赖长城。民失擎旗手，我悲引路人。千秋遗爱在，遥奠泪沾巾。”《挽孙总理中山先生》联云：“上下五千年，独国民党能隳专制；纵横八万里，唯华盛顿可比斯人。”《哭孙总理中山先生》诗云：“愁云惨雾瘴京衢，日落星沉万物芜。岛国投旌陈肺腑，金陵请愿见乘除。授勋感愧时时悚，赠句供吟字字珠。苦雨凄风漫漫夜，挑灯重读龙蛇书。”这些诗联，表述了一种高尚的革命情怀与友谊。

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南社的兴衰，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文化在历史巨壁上的一个回响；而其成员的演变，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浪淘沙的一个历

史折射。唐群英，一个辛亥革命的女界先锋与民国年间女权运动的先驱，无疑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正面代表，因此到了解放后还被康克清誉为“一代女魂”。而唐群英作为南社的一个女社友，也以自己独立特行的人品与大气磅礴、不类巾帼口吻的诗作，为南社以至新南社的宗旨作了生动的阐述；并且充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诗化的内心世界与人文精神以及文化灵光，因此，“南社女社友之杰出者”的美誉，唐群英是当之无愧的。

教书匠·学者·教育家

——回忆任凯南老师

黄粹涵

1936年秋我进湖南大学肄业。时湖大为省立，经费人才名望均不能跻于名大学之列，同学吁请改国立甚力。1937年秋改国立实现，皮宗石皓白先生任校长，任凯南戆忱先生（1884—1949）任教务长，新聘来何之泰、蔡乐生、杨树达、曾星立、刘仙舟一些一流教授，北京上海来借读的同学又大批涌进，古老的岳麓山顿添生气。同学们兴高采烈，希望学校一步登天。

教国际公法、外交史的是新来的吴世英老师，政治系二三年级合听。吴老师才二十几岁，初上讲坛，神态有些拘谨，手足若无所措，说话不自如，又没有板书。上过两周课，同学们感到不理想，议议论论，大家签名报告，请求换人。

过几天，来了口头通知，要同学晚上去教务长处谈话。

教务长室在半学斋，室外有间大客厅，中央摆一张特大条桌，周围有木靠椅，空空荡荡。不一会戆忱先生出来了，两手向两边一摆，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就坐在条桌当头。

我叔祖枰斋先生有《送任凯南留学日本》的诗，我父亲与他稔熟，我哥哥格非读湖大时他是校长，他的名字我早耳熟，这却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本人。

先生五十多岁，身材十分高大，有点显胖，长头发向后胡乱拢着，有些桀骜不驯，方大的脸上架一副老花镜，上唇蓄了弧形短髭，嘴紧闭着，神态非常严肃；身着深色布袍，衣宽袖大，行步迟重。我暗地很不恭敬地想：真像民间传说里的窑神。

戆忱先生环视同学一周，说话了：“你们的报报报……告我看过了。你们讲讲讲……看。”他口吃，长沙夹湘阴（汨罗）口音。

一个同学发言了，吴老师如何怎地，说得有板有眼。

话没说完，戆忱先生突地把老花镜摘下掴在桌上，右手指乱抓头皮，抓得又重又快，像有虱子咬着似的，然后把头发胡乱向后拢了一把，两肘撑在桌

上，人稍稍前倾着，把右手五个指头伸开，手掌向外一推，说："不要讲了。"那同学只好停止发言。大家静坐着，气氛有些紧张，因为同学事前商量好，舌战不行，就闹一下，要让吴老师知道，自动走路。

沉默了分把钟，大概是戆忱先生在控制着自己不光火吧，他开口了：

"吴老师是清华高材生，公费留英的。在伦敦大学专攻国际关系，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论文在伦敦大学学报上发表，不说内容有许多创见，光说文字，我们中国人写英文大多是 Chinesstyle，他写的是 Englishstyle，道道地地的英文，这就很了不起。现在中国教国际法是首推周鲠生先生罗。周先生看到他的文章，认为极有创造性，有卓见，下了聘书请他到武大去接他的课．因为皮校长离开武大，周鲠生先生接手教务处，没时间教课了。暑假在庐山开会时，皮校长和我跟周先生商量，请把这个人让给湖大。周先生不肯。我们说：'我们去湖大，也要两块盖面肉呀！'周先生被缠不过，最后才让。我们是费了大力气争来的呀！这样的老师还要不得，叫我到哪里去请老师？我这个教务长就不晓得如何当了！"

"你们说吴老师教得不好，他才开始教课，还不熟练，没有经验，得有个培养过程，不能急呀！中国教国际法只有一个周鲠生，分不开，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周鲠生，要时间。你们说我的课教得好，我教了几十年了，我有经验。我讲过一阵课，不必提问，把眼睛这么一望，就知道你们听好没听好。没听好，我可以再换个办法讲。这没什么巧，教久了自然会到这一步。但是，不管我教得如何好，我只是个教书匠，就像木匠砌匠一样，只照师傅传授做工，做得熟练，但是，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创造，没有自己的东西。吴老师不是教书匠，他是学者，他是学者呀！教书匠与学者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要把湖大办成名大学，就要有许多学者，有许多湖大的学者。光有教书匠，没有学者，是教不出好学生来的。你们懂么？你们应该懂得这一点。"

"好，不要再谈了，好好去听课。"

没什么谈的了，大家只好散。

这次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现在事过五十多年，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我第一次听说学者与教书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确是一个重要又重要的分别。遗憾的是，五十年后，我既未能成为学者，也未能成为教书匠。

吴老师经过一段历练之后，课果然教得很成功，显示了深厚的修养。1938年8月，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9月，英法德意签署慕尼黑协定，事出意外，很多同学对苏联与英国的行径大惑不解，政治系请吴老师作了一次英国的外交政策的学术讲演。吴老师深入阐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源流与现实背景，论证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必然性与暂时性，英国终将奋起反对希特勒

的最后结局；并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只是一种假象，希特勒进攻苏联迟早要动手。当时大部分同学不以为然。1939年9月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事实的发展正如吴老师所预料，大家这才佩服吴老师的远见卓识。戆忱先生识才爱才，也能养才。

戆忱先生非常刚直，容不得半点不合理的事，碰到不合理的事，口吃更厉害，讲出话来也一句千斤，牛踹不烂。1939年暑假，电机系一个班出去实习：一部分去安江，有旅费补贴，一部分就在辰溪电厂，只离学校三里，没有补贴。有同学请一律贴补，以示平等。戆忱先生十分生气。只说："好，你你你们去，我我我我拿轿子来接。"李毓尧是湖大矿冶系老人，出任金矿局长，把矿冶系另一教授胡伯素拉去了。戆忱先生很不满，说："他自己要做官犹自可，还拉走学校的人，拆学校的烂污！"不久李毓尧路过湖大，托人向戆忱先生打招呼，说"肇堂（李字）来了，想来看你。大家都老朋友了，希望你不再生他的气"。戆忱先生说："叫他不要来；来了，我就是两个嘴巴（耳光）！"李卒不敢见而去。这些事也许是可以推给校长去管的，先生总是挺身而出，从不往校长身上推。要管，话也许可说得委婉一点，免得伤人树敌；但先生生成直性，就这一副面孔，不会委婉。

先生清末参加同盟会革命，民国成立，又在汉口办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声讨袁世凯。袁密令武汉当局搜查报社捕人。先生正赤膊撰写，闻声塞稿入口，持馒头，摇起蒲扇，泰然出后门。逻守者呵问："干什么的？"答曰："伙夫。"逻守者见其赤膊赤脚极鞋，以为真伙夫，叱之去，遂免。留英归国后，先生专心教育事业，不参加政治活动，尤嫉言做官。一次校务会议上忽触及公务员范围问题，有人据行政法令，说教授亦公务员，属官之列。先生大不以为然，说："教务长果真是官，我就不当教务长了。"薛岳主湘，聘先生为参议员，不应。当时讲经济学，"南任北马"。马寅初先生抨击独裁政治、官僚资本，受蒋政府迫害，声望亦益高；先生则不讲演，不著论，不参与社会活动，一心教育，绝口不谈政治。是不想说？不屑说？不忍说？先生亦不表白。虽然不说，仍有迹可求。1937年深秋仇鳌先生来湖大，戆忱先生特请他向政治系同学讲演。仇老讲了两个小时，中心在阐释民主，反对独裁，说执政者应该向人民负责。戆忱先生坐在学生席上，谛听两小时不倦。他当然清楚仇老的这些主张，可以推想先生是反对独裁，主张政治民主化的。在学术上，先生主张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他自己是讲正统经济学的，却聘请了讲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樊弘（止平）老师来教学，相处得很好。

先生长教务，仍主讲高等经济学。经济系同学说，先生讲得极精粹，说英语亦流畅自如，不口吃。不念讲稿，不付印；周世升同学曾借抄，稿用文言，

简赅精辟，篇幅短而内容充实，惜抄本未能保全。先生于经济学有专攻外，于中国百家之书无所不窥，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他出版了郭嵩焘的《史记杂记》；郭焯莹（嵩焘长子，延十太爷）的手稿交由他保存，是有深意的。

先生毕生教学俸人颇丰，而自奉极俭。经常布袍一袭，不带家眷，不置田产，所入除资助子侄入学，捐献大麓中学（长沙市九中前身，先生所创办）外，全以购书，聚书几万卷，多精本。在湖大时将大部分书捐赠湖大，一部分捐赠大麓。几经沧桑，不知尚存得几多？

抗战中汉阳兵工厂迁辰溪，敌机常来轰炸。湖大1938年亦迁辰溪龙头脑，裸露于几个小山上，非常显眼，也几度被炸。每警报发，师生都疏散四野，先生独留在校中，躺藤椅上，酒一杯，书一卷，泰然自若。

我和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人接触，又没听过先生讲课，于先生学术成就了无所知。但耳闻目睹，于先生之勤于治学，识才爱才，勇于任事，刚正无私，急公好义，达死生，坦坦荡荡，体会甚深。先生既是学者，也是教育家。

王季范先生传略

易祖洛

湘乡王先生，学名邦模，字季范，以字行。生于1884年，卒于1972年7月11日，终年88岁，骨灰存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先生家贫，肄业省垣时，暑假返家，曾宿农家扮桶中。自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历任中学、师范学校学监、校长等职，尤以任长郡中学校长最久，作育英才众多。先生终年住校，家在城中，屡过门不入，年节亦不一归。每日朝会，勉励学生明大义、有专长，以抢现成之钱为大诫。日寇侵华日亟，先生知民族将有大难，校印《孙子兵法》等书颁发学生，讲求救国御倭战略，寄望学生能文能武，为国干城。1932年夏，先生命题《抗日应有之考虑》，凡三百题，令全校学生作答，由初中毕业班学生李饮和整理成册。1933年春，高中入学国文试题为：《明戚继光御倭而大胜，清李鸿章御倭而大败。试究当时得失之由，并筹今日制倭之策》，题乃先生自拟。时抗战尚未展开，足证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爱学生厚而治校风严；学生有过失，循规处罚，又垂涕而诲教，于权贵子弟，亦不宽假。故一校整肃，欣欣向上，敬爱先生，有如严父。学校教师，极一时之选，如袁吉六、杨卓新、彭沛民、周正权、李肖聃等，皆任教大学，为当代硕学名流，先生躬身礼聘，或三请四请而从聘致。而莘莘学子，则为长沙府诸县之品学兼优者，仪型先生，刻苦力学。历届毕业生多能升入大学，不少成为专家。故当时学子以能就读长郡为荣，家长亦寄厚望。

先生又创办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先后兼任专任校长，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达三十余年。校设长沙兴汉门，校舍、师资、教学设备皆充实可观。其绣品曾荣获万国博览会特等奖状，负有国际声望。南洋诸国华侨归国就读女生甚多。湘绣蜚声海外，衡粹立功为多。其绣品独具风格，在国内绘绣艺术中，有衡粹之称。

倭寇侵华，逼近湘境。1938年长沙火焚，衡粹仓皇迁徙，仅将部分图书、仪器、教具迁出，余皆化为焦土。先生素贫，学校经费拮据，仍勉力为之，于湘乡东台山麓九亩陇税屋，继续开课。迁校后学生才百余人，每期学费收入折

稻谷仅百余石，教职员工待遇微薄。三年后，先生独子德恒，自陕北抗大学习归来，任教桃江修业农校，惨遭暗杀。先生不以哭子过哀，坚忍办学。全校师生员工，皆为其精神所感召，同心协力以赴。

门生钟兴宜亦在衡粹执教，忆及于九亩陇时，深夜，先生叹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盖已深知当时政府之不可为，而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胜利，早寄厚望。先生不计一身一家之困顿，更不忧伯道之无儿，而目睹民族气节之沦丧，则不能容忍。其孤忠义愤，每借史事发之。钟君曾侍先生至张家渡附近之望南庵，瞻仰明末遗老江西巡抚郭天门公神主。先生告曰："明末清兵南下，江西沦没，郭公深夜逃回益阳，儿女闭门不纳，遂隐于望南庵为僧，即今之凛然在上者也。"明亡，其门生洪承畴，访求山林隐逸至此，求见，公嘱僧童以病辞。翌日，洪排闼直入，执弟子礼。问："先生患何病？"曰："目疾。"复问："病从何时起？"乃曰："自我识尔之日，即双目失明。善哉！尔今已为明清两朝元老矣。"洪大惭而去。先生推崇郭公，盖以痛诋当时汉奸汪精卫之流，其意深远矣。

1944年6月下旬，倭寇逼湘乡。煤城各校解散。先生乃紧急措置无家可归学生，由非难区学生各领1人，余13人，并校印档案，交钟君护理。教师王萍麓先生夫妇，有病行动不易，坚持守校。将缝纫机头、图书，移藏牛滑坑农家，钢琴及校具等，急遽间尚无法抢救。人甫离校，湘乡即陷敌手，学校财物，遂荡然无存。王萍麓夫人投井全节，王先生自杀获救。余人虽侥幸脱险，而先生惨淡经营三十余年之衡粹，惨遭毁灭，良可慨矣。

湘乡棠佳阁文氏，一女适本县王姓，生子即季范先生；一女适湘潭毛姓，其一子即毛泽东主席。先生执教省立第一师范时，毛亦随往读书，与同学从事革命，事泄，先生遂将堂弟某开除，使毛获免。

1951年，先生应邀赴京，历任国务院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凡事关国计民生者，均及时提出，或径致书毛主席，唯言不及私。在京不出入官府，而与当代鸿硕章士钊、黎锦熙、齐白石诸先生交往。

先生生于清末、民国扰攘之世，志行高洁，识量宏远，爱国忧时，毕生精力尽瘁于教育事业。虽著述未及船山，而品德之高、教泽之盛，足与并美。表彰盛德，即所以励末俗而振人心，立懦廉贪，百世而下，倘有闻者，莫不兴起焉。

毛泽东与韶山籍湖南文史馆馆员的交往

唐振南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录了毛泽东在1915年到1958年期间写给韶山亲友的书信95封。在这些书信中有20封是给韶山籍的湖南文史馆馆员文运昌、毛宇居、李漱清、李贡人（即李道桢）的。这些书信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故乡及其亲友的眷念、关切，同时又有严要求、讲原则，体现了他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

文运昌（1884—1961），字咏昌，今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托人，毛泽东的表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同学。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回忆："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注了册。"文运昌早年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在乡任小学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农民运动，任湘乡县凤音乡农民协会秘书。建国后，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入毛泽东致文运昌信4封。

第一封是1915年2月24日写的。"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毛泽东读《盛世危言》是在韶山读私塾的时候。看《新民丛报》是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期间。毛泽东归还这些书的时间，据收信人的回忆是1915年古"正月十一日"，是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回韶山度春假清理旧书时归还的。

第二封信，写于1922年11月11日。那时，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住在长沙市小吴门外清水塘。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爱人杨开慧，堂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赵先桂都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或学习，毛泽东负担很重，生活艰苦。文运昌对于这些情况是不知道的，以为毛泽东在外做事，可以介绍一些人找个饭碗。毛泽东复信说："运昌姻兄：来信接读。刘君实在无法安置，

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同日，还给舅父母信一封。

第三封信写于1937年11月27日。那是抗日战争初期，湖南许多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也有一些亲友，想去找生活出路。毛泽东的信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毛泽东写道：“运昌吾兄：莫立本（注：即方克，湖南桃江人，1937年去延安。解放后曾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工作）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毛泽东热爱家乡，眷念亲友，充满了阶级感情；同时给乡亲指明，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才有生路；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党员没有个人私利，只有国家民族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他自己唯有为国家、民族、工农阶级的利益奋斗，作为眷念亲友及一切穷苦人的情谊，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一切劳动人民。他在这封信里再三表示“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

第四封信是1950年4月19日。文运昌曾去信，报告解放后家乡巨变，亲友翻身的喜悦，也谈了地方党政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复信：“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从这信的字里行间看，他们又有十余年未通信了，毛泽民（1896—1943）、毛泽覃（1905—1935）牺牲还是首次告知。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录致毛宇居的信11封，基本内容有：怀念亲友，以自己的稿费帮助贫困乡亲；为了解农村情况，邀请毛宇居、邹普勋、李漱青等乡亲赴京畅谈；应故乡人民的要求给湘潭大学题写校名。

毛宇居（1881—1964），亦作蕊珠、禹居，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是毛泽东的房兄和私塾老师。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设便宴招待乡亲。毛泽东给毛宇居敬酒，宇居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扶宇居坐下，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宇居在1915年参加过护国战争。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韶山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曾协助韶山党组织照顾毛泽东的侄

儿毛楚雄。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38年5月10日，毛宇居曾寄毛泽东信，介绍毛泽覃儿子毛楚雄在韶山学习生活情况，推介毛宇居的亲戚谭秀余（谭想去延安谋事），并告知毛楚雄的舅父一家居住在上屋场，照管毛泽东的故居等情况。5月26日，毛泽东复信：“谭秀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信尾附言：“远耀等在此甚好。”毛远耀是毛宇居的侄儿，当时在延安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

1949年11月28日信及1956年4月20日信，均是对毛宇居赠寄的律诗和书信的谢意，“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1951年4月5日的信，就毛宇居所撰《毛主席轶事》的函复：“宇居兄，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毛主席轶事》记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热爱劳动，关心农民疾苦和勤奋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很谦虚、谨慎、求实，不希望别人宣传他。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疾苦。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就毛宇居反映农村情况，特别是毛泽东邻居邹普勋重病情况作了关切的回复：“宇居兄：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之。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同日，又给邹普勋一信：“普勋兄：5月7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领袖与人民心连着心。不久，毛泽东给邹普勋寄来了医药费，并多次写信，嘱咐：“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毛泽东经常给贫苦的故乡人民赠送医疗、生活费用；毛宇居、周世钊都承担了反映情况，代理扶助的任务。1952年10月2日给毛宇居的信记载曾寄500元，请毛宇居分赠给毛泽连200元治病，100元给六婶安葬费，200元给毛泽荣“助其家用”，并在信末特别注明“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毛泽东一生，未曾动用过一分钱公款资助亲友、同学，也未耗费国家一分钱接待过乡亲。韶山亲友来去北京，费用都由本人支付，毛泽东以稿费补助。仅《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记载：毛泽东资助贫苦乡亲的现金有7次，计1650元，邀请乡亲去京反映农村情况有18人次，其中去过两次的仅有邹普勋、毛泽荣，他们一个是赤贫的邻居，另一个是一贫如洗的堂弟。

毛泽东与农民有血肉联系，渴望家乡人民时时给他提供农村的真实情况。他为了听到人民的真实呼声，多次邀请故乡人民进京，或者请他们写信，通报

实况。1951年9月4日，1952年7月11日，8月21日，1953年8月27日致毛宇居的信，都是调查乡间情况的信件和邀请书。1952年7月11日信："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随时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同日，给邹普勋信："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

毛泽东深知农民的封建落后思想，"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总想攀大树，求得一官半职，或"吃伴饭"，享清福。因此，他在乡亲去京时，先要约法三章：一是"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到两个月"，不能长住，更不能要求安排工作；二是来回路费自己负担，他以稿费给予补助，不能向当地政府伸手；三是以邀请者为限，未邀请者"不要来"。1951年9月4日、1951年8月21日信，就是申明这三条。毛泽东为充分地了解乡情，还要求被邀者作好调查研究，带上亲历、亲闻、亲见的真实可信的资料。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录致李漱清的信4封。

李漱清（1874—1957年）系乡村教师，是当时韶山冲较进步的秀才，曾在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懂得一些法律和维新的知识，毛泽东在家乡读书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回忆："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大革命时期，李漱清曾去广州协助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后在湖南省农民协会清理逆产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返乡，继续执教。建国后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0年，李漱清给毛泽东信诉说别后的思念和艰难历程，并呈请协助作出适当安排。毛泽东于8月23日复信，对他的生活窘境"极表同情"，并将"尊件转寄湘潭县人民政府酌量办理"。湘潭县又将此件转给省安置。这是李任职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来历。

李漱清是位进步、正直、支持革命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为革命献出了三个儿孙。长子李耿侯是毛泽东介绍吸收的共产党员，曾任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中共韶山特别区组织委员，韶山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1928年在湘南牺牲。三子李贡侯（1906—1929），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江西崇义县委宣传委员。1929随红军大队行动时在崇义作战牺牲。孙子李德深（1905—1928），是李耿侯的长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暴动，1928年随红军大队行动时在湖南耒阳作战牺牲。湖南省政府鉴于李漱清本人的革命事迹和教养儿孙、培养革命人才的贡

献，对李漱清晚年的工作与生活，作出了上述适当安排。

毛泽东对牺牲的烈士甚为敬仰。1950年11月12日，又亲给李漱清复信："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书，请持此信往湘潭县府洽办。"不久，湘潭县政府给李漱清家挂上了"烈属光荣"牌。

毛泽东对同情革命、坚持正义的知识分子非常关注器重。给李贡人的信就是一例。李贡人（1877—1960年）又名李道桢，是韶山市杨林乡纯和村人，后迁居湘乡金石镇。李贡人是前清副贡，长期在长沙的中学或专门学校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李贡人于1952年9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因生活困难，想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请求毛泽东将其介绍给程潜省主席批准。9月17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程主席酌处。"同日，毛泽东还亲笔复信："贡人先生：惠书敬悉。嘱件已转程颂云主席酌处。此复，顺致教祺。"程潜接信后，迅速办妥了这件事。

综观《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字字句句充满了毛泽东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高尚品德，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精神，是当今提倡艰苦奋斗，反腐倡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建议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此书，以正党风。

杨遇夫与张舜徽的交谊

张君和

1992年11月，张舜徽先生猝然病逝。湖南省语言学会周秉钧、李维琦、王大年等先生所赠挽联的全文于下：

是许学名家，约注新成，足传千古；
痛湖湘耆硕，积微长逝，又失斯翁。

挽联中的“约注”是指张舜徽先生的著作《说文解字约注》，“积微”是指湖南学者杨树达先生，他的书斋名曰《积微居》，自号积微翁。

这副挽联把两位同为湖南籍、都在学术研究中涉足过语言文字学并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联在了一起，表达了挽联作者对他们的怀念和对他们先后逝世的痛惜。

然而杨、张两位先生的关系又不止于挽联所表达的这些，他们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和很深的交谊。

杨树达先生，字遇夫，1885年生，1956年卒，湖南长沙人。张舜徽先生，1911年生，1992年卒，湖南沅江人。遇夫先生比舜徽先生年长26岁，是舜徽先生的前辈。在舜徽先生困苦自学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遇夫先生都曾给予过诲导和奖掖。舜徽先生自学的第一阶段，是在家乡，在父亲淮玉公指导下进行的。16岁时，父亲去世，他因世谊和姻亲的关系，应四姑夫余季豫（嘉锡）先生之招，前往北京，住于其家，开始了自学的第二阶段。一方面每日赴北海图书馆读书，日有定程。另一方面，因为季豫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留寓北京的不少通人硕学，经常向他们请益问学，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遇夫先生。舜徽先生20岁时，回到湖南，执教于长沙的几所高级中学，授课之余，学而不倦，开始了他自学的第三阶段，得到了不少湖南前辈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其中也有遇夫先生（遇夫先生后来也回湖南教书）。30岁以后，到各大学任教，他与遇夫先生仍然在治学上保持着联系，直到遇夫先生逝世。

自学出身的舜徽先生，对于前辈学者给自己的帮助和鼓励，念念不忘。70

岁时，曾撰有《湘贤亲炙录》，把“湘中诸老，惠我尤多，以为孺子可教，相与奖掖而诲导之”的情况记述了下来（同时，计划另撰《海内知音录》，把“数十年间，旅食四方，所识通人俊彦”的情况综述之，可惜因为猝然离世，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在《湘贤亲炙录》中，对遇夫先生有长段的回忆。以后，在1982年，他撰写了《奖掖后学循循善诱的前辈风规——回忆杨树达先生二三事》；而在1983年的《说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章中，特别介绍了遇夫先生在语言文字研究中重视《说文》的情况和经验；1985年，又撰写了《缅怀当代卓越的文献学家杨树达先生》一文，并以此为题在湖南纪念杨树达百岁诞辰大会上做了报告。此外，在1960年左右，撰写了《积微君文集别录》。多次对同一前辈学者撰写回忆文章，对舜徽先生来说是少有的。在撰写《清人文集别录》期间，为主要学术成就产生于辛亥以后，逝世才几年的现代学者的文集撰写别录，则是惟一的。这些，都反映出遇夫先生在他心中有特殊的地位。

在舜徽先生的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得出他对遇夫先生的敬佩。他写道：“（先生）读《汉书》至精熟，讲诵如流，不复持本，成《汉书补注补正》”；“先生素以精于《汉书》名于时，当时学者推尊为‘汉圣’。我于趋谒时偶以汉事为问，先生背诵《汉书》，不复持本，始终无一字跳脱。大抵班书重要篇章，十九皆可成诵。其他故书雅记，莫不融会贯通，讲习极精。故每说一字，明一义，莫不繁征博引，证明确当。彼皆由一生勤于治学，锲而不舍，故能积微末以致高大，自非庸常所可及，私心尤景仰不已。”又说：“先生一生以教学终其身，亲从受业者遍及全国，讲授之余，述造不倦，誉望日隆，一时尊为大师，世称显学。”“平生所识老一辈的学者名流，算来不是太少。而亲炙最久，感慕最深，治学著书最勤的，首推杨遇夫（树达）先生。”

舜徽先生还记述了当年他向遇夫先生请益问学，遇夫先生循循善诱，乐于与之讨论，常寓教诲于奖励之中的情况。他写道：“舜徽北游时，以乡后进礼谒见先生于旧刑部街寓庐。时先生方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日有定程。知舜徽亦有志于从事于此，每有新悟，辄为舜徽言之，津津乐道，不以舜徽年犹未冠而轻易之。”“先生举列新悟声训之理为我言之，切理餍心，惊其卓见，自是相从请益。或多日不造先生庐，先生则于晚餐后通电话以近日所得相告，或径来姑夫家与共谈议……先生以为孺子可教，愿与往复论学，至于如此，老辈遗风，令人感慕。”“迨舜徽南归，常通书问，凡有质疑，未尝不答也。”“后舜徽滥竽大学讲席，先生闻之而喜，常寄书奖励之。”“先生草《论语疏证》初成，以油印本嘱舜徽为校补其阙遗。籀绎既竟，因举《荀子》、《逸周书》、《两戴礼记》中足以证发《论语》者共十数条以献。先生则大喜，悉采录之，虚怀

若谷，至为感人。”“先生循循善诱，每寓教诲于奖励之中。所以虽不列门墙，亦多承启迪。即以我而论，自始相识以迄其终，二十余年间，每相见必问近读何书？有何述造？每闻舜徽自道所学偶有新悟，辄叹赏不已，此中即有鞭策之意。闻其奖许之言，益自奋励，不敢怠逸。”

还记载了邀请遇夫先生等几位前辈学者到自己任教的大学讲学，居留月余，朝夕聚谈，极一时之乐的往事和遇夫先生邀往湖南大学任教的盛情。

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舜徽先生在全面地分析了遇夫先生的治学规模和学术成就以后，首先指出了国内外学术界推崇遇夫先生为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这固然合符事实，但遇夫先生的成就又不仅止于此而已。“因为遇夫先生治学规模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专心力以研究金文、甲骨文，这是他 40 岁以后的事；40 岁以前，也由小学以治经、治史、治诸子、治文言语法，都取得了成就。著述很多，成绩是多方面的。”并列举了遇夫先生在经学方面著有《周易古义》、《春秋大义述》、《论语疏证》；在史学方面，著有《汉书窥管》；在诸子之学方面，著有《老子古义》、《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由此可知遇夫先生学贯四部，并不专限于语言文字之学。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舜徽先生肯定遇夫先生是如钱大昕那样的一代通人、博学大家，是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

应该说，舜徽先生能从这样的角度高度评价遇夫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他自己在治学上赞赏通人之学，主张走博通之路是有关的。他本人也在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之学、学术史、古典文献学等多方面有所研究和著述。

遇夫先生晚年根据自己的日记选述而成的《积微翁回忆录》中，有关于舜徽先生的记载十数则，现摘抄其中的几则于下（引文标＊号）。

＊1932 年 12 月 25 日。席鲁思见示张舜徽来书，论《小尔雅》，不慊于宋、葛、胡、王四家之疏。谓其不能求本字，如：“盖，覆也”；“曙，明也”；不知即《说文》之“盇”“睹”。不能通《诗》训，如：“几，法也”，不知本《楚茨》之“卜尔百福，如几如式”；“顺，退也”，不知本《女曰鸡鸣》之“知子之顺之”，与“知子之来之”为对文。不通声训，“颁、赋、铺、敷，布也”；“勿、蔑、微、曼、没、末，无也”；不知其为一声之转，是也。所论颇确当。舜徽年少，循此不懈，可望有成也。

（笔者按：舜徽先生时年 21 岁。遇夫先生不仅长段抄录其来信中之观点，而且给以“所论颇确当”的评定，和“舜徽年少，循此不懈，可望有成”的预言。）

＊1942 年 7 月 23 日。陈子展昨来电请任复旦大学教授，今日复书辞不能往，介绍鲁实先、张舜徽二君。

（笔者按：舜徽先生时年 31 岁，无文凭。）

＊1946 年 4 月 1 日。张舜徽寄所著《广校雠略》来。

＊1946 年 4 月 13 日。应张舜徽之约，赴民国大学讲演。

＊1946 年 4 月 18 日。舜徽出示所著《三礼郑注义类》及《郑雅》初稿。取郑君群书笺注依《尔雅》类列之，颇便学者。体例盖取之陈奂《诗毛传义类》及朱骏声《说雅》也。

＊1946 年 4 月 22 日。舜徽以所著《扬州学记》阮元篇见示。舜徽谓苏州之学专而固，徽州之学精而狭，扬州承吴皖之后，独得其通。如高邮之王、仪征之阮、江都之汪、宝应之刘皆其选也。所见至确。

＊1946 年 5 月 20 日。张舜徽为余撰《论语疏证序》来。

＊1947 年 2 月 22 日。昨日张舜徽从兰州寄《汉三老掾赵宽碑铭》来。

＊1947 年 4 月 24 日。张舜徽寄所著《积石丛稿》来。

＊1955 年 3 月 29 日。张舜徽寄示所著《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及其读法》论文。阅之，文亦极好，足为古代史研究者之南针。

《积微翁回忆录》中 1955 年 3 月 29 日日记，是遇夫先生日记中关于舜徽先生的最后一则记载。同年 11 月，舜徽先生出版了解放后的第一部著作（即一生中的第三部著作）《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然而样书到翌年春天才得到，其时遇夫先生已因病去世，不可能读到此书了。自此以后，舜徽先生的研究工作和著述出版都渐入佳境，30 多年间陆续出版了 20 多部书，如小学方面有《说文解字约注》，经学方面有《郑学丛著》，周秦诸子之学方面有《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诠》，文集笔记之学方面有《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史学方面有《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人民通史》，学术史方面有《清儒学记》，古典文献学方面有《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等，总计 800 余万字，蔚为大观。

回顾遇夫先生在与舜徽先生相识后不久的 1932 年（当时遇夫先生 47 岁，舜徽先生 21 岁），就在日记中预言：“舜徽年少，循此不懈，可望有成也。”而在以后的年月里又不断地对舜徽先生给予帮助、鼓励和提携。人们不能不佩服遇夫先生在发现人才方面的有眼光、能知人、善预见。而他对后学循循善诱、鼓励奖掖的态度，更是十分感人。

遇夫先生谢世已经 38 年，舜徽先生也逝世两年了，他们所留给后人的，不仅有他们各自的丰硕学术成果，而且有两辈学者之间深挚交谊的佳话。而舜徽先生的子女则宝藏着遇夫先生 40 年代赠送给父亲的长篇书法，装裱精致，书法秀劲，美意盎然。同时，也珍藏着舜徽先生 1947 年初写给遇夫先生长信的复制件（原件藏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内容是讨论汉三老掾赵宽碑的。时舜

徽先生 35 岁，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得见该汉碑原物。信全文约 1500 字，写满四张信笺，书法工整古朴，显示出当年这位青年学者的老成持重。

忆程潜与陈明仁

程　杰

程潜的一段简短历史

程潜 16 岁考中秀才。他看到当时中国国难当头，乃弃文学武，考取武备学堂。由于学业超群，被保送进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由陈英士介绍结识了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先生对他很器重，使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日本学炮兵 6 年，中山先生命他回国去四川任上校参谋官，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他在黄兴领导下，参加武汉保卫战，任武昌龟山炮兵指挥官。随后历任湖南军事厅长、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次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国民政府参谋总长。建国后，任湖南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均在他的部队当过兵。他是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元老。

程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几件事

1935 年，程潜在上海已过寓居生活近 7 年。当时，蒋政府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程当年的同僚和部属，深切盼望他东山再起，共赴国难。如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长杨杰对蒋介石要求，如再不请程潜出山担任要职，他就不再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蒋介石迫于形势，同意请程潜出山。程于 1935 年冬出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此前参谋总长由蒋介石自兼。

蒋介石在 1936 年正月初一清晨电话通知程家，告知：上午 9 时蒋定来程官邸拜春节。而程家因守岁通宵刚睡，接电话，忙起床，打扫庭院，迎接不寻常的贵宾来拜春节。蒋和夫人宋美龄准时来到。蒋介石穿长袍马褂，宋美龄着皮大衣旗袍，在厅堂向程潜夫妇恭恭敬敬地行了一鞠躬后进入客室。蒋见客室挂着有黄兴、蔡锷的字画，话题落在这字画上面，开始颂赞程一番。这下把程潜往日满肚子的恩恩怨怨驱得烟消云散了。

蒋安排程潜由参谋总长调任河北，接替蒋介石兼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在他管辖指挥下的山东省省长兼陆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把他从一个文书上士一手提拔起来的。日军入侵山东时，他不但不阻击，却暗中与日军勾结。他拥兵自恃，不听命令，且横行霸道，贪恋女色，与蒋介石中央政府闹分裂，程潜的指挥他更不买账。抗日战争吃紧时期，他率部一退再退，擅自行动，以致使各路友军蒙受重大损失。

程潜、冯玉祥、白崇禧命令他到徐州参加会议，他则提出要在他乘坐的专车上开会。程潜为不打草惊蛇，都依照他的意见办，当他乘的专车一进站，紧急警报大鸣，有人请他下车改乘另一小轿车离开车站躲避敌机轰炸，韩一上车，便给他扣手铐，直押武汉。他随身所带的一车警卫部队，则令其后退离车站 4 公里。此时，白崇禧于事前布置了两师埋伏，一枪未放，便把这团警卫全部缴械。

第二天在武汉，蒋介石召集有程潜、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参加的紧急会议，程潜提出应严惩背叛国家的民族败类大汉奸韩复榘，大家一致要求立即枪毙，遂将大汉奸韩复榘枪毙于武汉。这下，民心为之大振，抗日救国正气大张。

程潜出山，蒋任命他担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当时的蒋政权四分五裂，行将瓦解。两广势力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与蒋介石政权如同水火。蒋派程参谋总长和刘斐副总长去言和，一致抗日。李宗仁、白崇禧忆及七年前蒋把程打下，在上海过寓公生活，而他不计往日私怨，以国事为重，前来言和，共赴国难，深受其感动。程潜甚至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也心甘情愿。"李等同意言和，程喜出望外，可说得上是马到成功。他此行，对国家乃是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蒋介石对程潜说："国家不会忘记你，人民永远感激你。"

陈明仁长沙布防

1949 年 7 月 15 日下午，我接到由军部转来白崇禧下达的在长沙布防命令，感到很突然。16 日清早，我去省政府，将该命令送给程潜主席看。他刚起床，接过命令看后对我高兴地说："这是假的，不会有仗打。你这个团，防守黄花至永安市的这段阵地，是陈明仁和我商量决定的，虽然是搞假的，但比真的防守战还难，因白崇禧把他的桂系几个兵团，西线已退到常德市以南，东线已退至醴陵以南的攸县、茶陵，命陈明仁部守长沙，同时还要迫我去邵阳，我不离开长沙，他不放心。明天我就动身，到 7 月底才回长沙。我离开后，你专听陈明仁指挥，军里和师里仍要假戏真做，相机应付。这比真的打仗还难啊！你回去，陈子良会详细与你谈的。"

当天下午 5 时，陈明仁就给我来电话，头一句便问我是否见了颂公。我在电话中如实告诉了他，并说："颂公说了，共军于 21 日就可能与你的部队接近，注意要一枪也不能放呀！"陈明仁在电话里告诉我："明天清早你团在五里牌集合出发时，我来对部队训话，但事先你不要告诉他们，就像是路过，顺便同他们讲话。"

五里牌有一块高地，原是老百姓做红砖的一块平地，我事先砌了一个讲话台。陈明仁司令官上午 6 时准时到达。他穿着下级干部服装，领章符号均未佩带，由侍从副官潘机质开一辆小吉普车，下车后直奔集合场。他首先把我跟随他的历史向部队介绍："你们团长跟我南征北战，打过许多大仗，很有作战经验，是我手下一员战将，北至东北松花江，南到缅甸，他早就升任副师长，现在是少将副师长兼团长。这仗打完，准升师长。新成立两个团，你们大家都要升官。不过，打胜仗惟一的秘诀就是要绝对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命令你们进，你们就进，命令你们退，你们就退，他命令一枪不放，你们就一枪不放。这就是孙子兵法，指挥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会百战百胜。这仗打胜了，保卫了长沙，长沙人民会感激你们。我祝你们胜利。"我命全体官兵鼓掌向司令官致敬！

待我命部队行动，他拉我到一个小高地席地而坐说："仗是不会打的，但对军、师、团还没有通气，你要应付他们，有问题随时告诉我，随时会有指示给你，到 7 月底就会向他们公开。到时颂公仍须等我的通知转回长沙，李明灏会到长沙和颂公见面。一切都就绪了，颂公会向全省人民宣布起义。"

陈明仁要我保护程潜

1949 年正月初一，我偕妻子向程潜拜年，他不接任何拜年客，在省府客室接待了我俩，开口便问："你当了团长，读过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吗？"我说："我当排长时就读过。""你执行过三民主义吗？我带兵打仗就是执行三民主义。你跟陈明仁在四平街打仗是什么主义？"我被他问呆了。"拿着美国枪炮屠杀中国人民，这算什么？蒋介石就需要你这种糊涂虫为他卖命。共产党的部队里的士兵，个个都懂得他们的主义。你打仗打死了，你还是一个糊涂鬼。我今天对你俩讲话，不要外传。"我们出了省府，我妻王乃君问我："颂公为何痛骂蒋委员长呀？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谈这番话。"

先是，1948 年秋，程潜要我担任他新成立的新军团长，尚未到职。陈明仁任命为白总部副长官兼武汉警备司令。我问程潜："我想仍到陈明仁部队去干，你老人家同意么？"他思考片刻，答复说："可以，忠于旧主是美德，好，好！"

到汉口，陈明仁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住在大川旅社，和杨文榜、刘勋浩同住一起。有人向我传说："良公有意升你当副师长。"一个星期的一天上午，陈办公室请我去见陈明仁，陈明仁扁着嘴巴很久不说话，我也感到奇怪，陈对我一本正经地说："你还是回湖南到颂公部队去。"我带气地回答："我特来追随您，难道您把我多年跟你出生入死的感情也丢了吗？"翁太沫忙制止我发怨气："你是个聪明人，良公还有内心话未说，我来说明一下。白崇禧是广西部队，他是利用良公这位英勇善战将领为他卖命。良公说他也会带部队回湖南跟颂公，决不会为桂系利用。这话回去密告颂公，对任何人不把今天话传给他人。"他还送我一笔车旅费。我将这些情况如实告诉了程潜。

1949 年 2 月，陈明仁率部回湘，首先去拜望程潜，和程潜互相达成默契。陈明仁对程潜叮嘱说，今后我是站到白崇禧一边讲话，有时还会和您唱对台戏，免除白的怀疑。所以他大叫大喊要把长沙打成第二个东北的四平街，弄得程的身边一些亲信深为不安。程潜要我到织机巷耕耘圃陈家走一趟，探听陈究竟如何。陈明仁送我下楼，到堂屋中，细声对我说，他和程潜两人达成的默契没变，叫颂公安心。他叮嘱我，不要常去他家，都知道你是颂公侄孙嘛！现在越来越紧张，白去了衡阳情况会大变，你要好好保护颂公。

唐醉石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美］唐达康

先父唐醉石是一个朴实无华、勤勤恳恳，在篆刻、书法等艺术领域里辛苦耕耘、颇有影响的艺术家。

父亲原名唐源邺，字李侯，小字蒲佣，号醉龙，别署醉石山农。祖籍湖南长沙，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里，自幼父母早逝，备受族人欺凌，因此，从小就对封建礼教的黑暗深恶痛绝。后来老外公李耀辅宦游杭州，父亲乃往相依。此后，再也没有回老家定居。

父亲自幼聪颖过人，深受老外公疼爱。他常常深情地回忆说："你老外公是前清翰林，学识渊博，对诗书画印无不精通，尤其擅长汉隶，他的老朋友也多为浙中饱学博雅之士，经常一起切磋，我伴侍其旁，耳濡目染，得以受传其学。"父亲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逐渐与金石书画结下不解之缘的。在这段时期，他刻苦研习，探本求源，临流借鉴，每有不解之处即多方询问，从不轻易放过，因而对民族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特别对篆刻、书法酷爱无比，他的作品颇具大家风范，为当时名家所肯定。

"醉石"之由来

当时江浙文人多喜玩石，父亲尤有石癖，每遇佳石便把玩不已，如醉如痴。老外公见此情景，印书隶体横匾"拜石"二字相予。父亲对此匾极为珍视。从此"拜石"和数不清的各种石头伴随他度过了漫长的一生。记得小时候他指着"拜石"二字向我说："石是自然之物，虽不能语，然质坚挺，处劣境不卑不屈，却又自甘寂寞，我最崇此性灵，故自号'醉石'。"他以"醉石山房"为书斋名，并多次刻成印章以自喻。

这是与先父同创西泠印社的好友王福厂先生所治印。王福厂，浙江仁和人，名寿祉，浙派名家，他于甲寅（1914 年）中秋前一日（10 月 3 日）在长沙为先父作序说："光绪甲辰（1904 年）夏余于西泠印社，获交醉龙，以印学

相切磋，事后东劳西燕，聚合不时，庚戌（1910 年）秋日，醉龙出此索刻，殊不称意，拟重刻……未果。今夏余游湘，晤醉龙于桐荫堂（即今迎宾路桐荫里），复嘱补款。夫吾两人之交谊，先后离合已十余年，拳拳之意金石不渝，鸿爪留痕，亦所宜也，因志数语以归之。”

发起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在杭州，现为西湖名胜之一，她的声誉早已远播海内外。

1904 年左右，浙派篆刻名家丁辅之、王福厂、吴隐、叶品三及父亲等 5 人在杭州发起创建印社，当时父亲年仅 19 岁。他们的创议得到老外公李耀辅先生的赞助，将其西湖孤山上的一座别墅赠为印社社址，因旁倚西泠桥，故取名“西泠印社”。父亲为印社书写社名《斯文窦》隶书题额，并刊于石，至今仍保留在印社。它是我国近代印人自发创立的第一个以印学为主，书画为辅的学术性组织。一时间金石书画界名士竞相入社，规模日趋壮大。他们本着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以沉雄博大的汉代艺术为楷模，以气魄恢弘的“浙派”为旗帜，以继承祖国印学为宗旨，使杭州“西泠印社”名声大振，为海内外艺术界人士所瞩目。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现代篆刻第六集》就将父亲的篆刻作品作了专集介绍。

父亲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与丁辅之、王福厂等人相交，他们都对清中叶以前弥漫于画坛、印坛的保守、俗弱之风极为不满，而对上溯秦汉，力挽狂潮，使濒临危机的印坛得以回生的浙派印学深为佩服。艺术见解的一致，又都抱着继承、发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意愿，凝结了他们之间数十年始终不渝的友情。父亲和王福厂先生共事最久，过从最密，二人虽同宗浙派，却各有千秋。时人将他们二人治印的风格比作工笔和写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身陷囹圄

老外公去世后，父亲北上京华。由于父亲博古多识，精鉴赏，秦石汉碑，一经过目，真伪立辨。北京故宫博物院初创时，聘为顾问，参与鉴定古代文物。工作之余，继续从事书法、篆刻艺术活动，又结识了顾颉刚、胡佩蘅、余绍宗、马衡（建国前后均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等众多京华名流。不久，因应聘担任国民政府铸印局技正，南下金陵，与王禔一同主篆“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并监督玉工陈夔之镌制。

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带领一家人逃难到重庆。南京沦陷，父亲收集的文物字画及印稿被日寇洗劫一空，终日痛心疾首。当时重庆有爱国志士发起支持抗日的募捐活动，被国民党顽固派下令禁止，父亲极为愤慨，痛斥顽固势力倒行

逆施，因而遭到嫉恨。父亲不堪忍受，遂决然弃职而去。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以“异常叛逆”为名，将他逮捕入狱，关进上饶集中营。在狱中父亲惨遭残酷折磨，使他进一步认识了顽固派凶残反动的本质。后经亲友多方营救，方得出狱，定居上海。从此，就以鬻书、治印抚养八口之家。虽生计贫困而终不悔，曾刻“不为五斗米折腰”一印以自嘲，又书“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积德子孙昌”的横幅以自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派人邀父亲重进印铸局任职，他坚拒之，并以“休景斋”号其书屋，以明其志。

1949 年全国解放，随着人民政府的建立，社会秩序安定，生活日新月异，我们一家从困窘中摆脱出来。父亲对新社会满腔热情，充满喜悦。在上海解放初即支持我四哥达孝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不久，抗美援朝开始，又支持我五哥达宁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父亲积极送子参加革命军队的行为，一时沪上传为佳话，受到政府和群众的表彰，上海《解放日报》还作过专题报道。

也在这时候，早于 1937 年参加革命的五叔唐亥，随解放大军进入武汉，工作于中南军政委员会，为发展中南地区文体事业邀请父亲去湖北工作。父亲欣然同意，立即只身前往武汉，担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不久又担任了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从此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父亲常感慨地说：“想不到花甲之年还能为国家、为人民出力，真是幸运！”他满怀对党的感激，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文物收集、保护工作，不顾年老体衰，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曾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土改保护文物的条例。1954 年荆江分洪工程中挖掘出大量古代珍贵文物，父亲欣喜异常，以 70 高龄之身随省委领导同志亲赴荆江分洪第一线，参加对抗洪军民的慰问。在这一时期，为国家鉴定收集散失民间的珍贵文物和文史资料共 1 000 多件。这些工作为后来建立湖北省博物馆打下了基础。

为董老治印

父亲对新社会的热爱，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仅就我回忆到的，就刻过“庆丰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共产主义是天堂”等大量印章，还刻过毛泽东诗词印章，并以各种书体写过许多毛主席诗词，有的被印成中堂发行，深受群众喜爱。他曾计划用刻边款的单刀法刻全部毛主席诗词和革命烈士诗钞，为此他特地托人到浙江青田买了许多青田石板，可惜由于十年动乱他的计划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解放前后所作未发表的印章、墨迹连同印稿，以及抗战中劫余的文物、印章等物在十年动乱中全部被

抄，至今没有下落。父亲对我们国家领导人怀着深深的热爱之情，在董必武同志80寿诞前夕，他精心刻治了"董必武八十岁以后所书"的印章赠给董老。董老曾为此专派秘书前往致谢，并探询有何困难或要求。父亲笑着回答："我给董老刻印，是我一点心意，没有别的意思，我现在一切都很好，请转告董老，请他放心。"

超脱的艺术

父亲一生廉洁正直。他在收购文物时总是认真考查鉴定，辨明真伪，根据文物本身的价值定出合理的价格，决不以权营私。有些不法古董商曾多次托人甚至亲自上门向父亲进行贿赂，都被严词斥责，使古董商以赝品冒充文物，骗取国家钱财的企图无法得逞。父亲为人谦逊，待人和善，同志们求他写字、刻印，不论职位高低他从不拒绝。对艺术界同人不论年长年轻，他都十分尊重，从不背后议论他人是非，善与人团结共事。

由于父亲在艺术上的成就，求教者甚多。父亲对后学循循善诱，他不仅教人治印，还教人做人。他常说，中国的艺术和人格互为表里，书、画、印旨写心、写性灵，即写人也。试想人格不高何以言美？所以格调第一。他还说，一个艺术家凡事要超脱些，做到这一点颇不容易。唯心中无私方可于方寸之间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其艺必然磊磊落落，如金石坠地铿锵有声，豁然大度，吞吐大荒。此中道理不独治印始然也。父亲推崇汉代艺术，他说，世人皆以汉铜印斑驳为美。其实汉铜印的妙处在于浑厚，看似乎平，而内美其中，韵味无穷。年轻人血气方刚，病在外露，我年轻时也是霸悍过人，慢慢才领悟到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道理。湖北省文史馆所编《唐醉石治印选集》一书"前言"中，总结父亲治印："上窥秦汉，下法浙宗，大刀阔斧，于稳健苍莽中，复具清新活泼气息，变化亦多，识者尊之。"我以为这一评说是中肯的。已故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金石家谢梅奴就出自其门下，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书法家、华中师大教授谷有荃，湖北省博物馆馆长陈上岷和钟鸣天等都曾从父亲学印，是当年父亲座上的常客，他们都深感教益匪浅。已故的知名书法家、华中师大教授翟公正先生曾感慨地说："可惜我遇到唐老太晚了，否则我的书法和治印绝不是现在这个水平。"正是父亲的为人使人心折，他在湖北30多年，除了他的老朋友、著名的藏书家徐行可等人外，还有一大批书法篆刻界的同人，如该省知名的书法篆刻家邓少峰、徐松安、黄亮、黄松涛、曹立庵等。父亲和他们一起，早在60年代初期就使湖北的书法篆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父亲忙于具体的日常工作，始终没有时间将他在艺术上的心得整理成篇。仅在1962年为辅导华师金石书画小组，匆匆撰就《治印浅

说》一文发表于《湖北日报》上，这是他难于瞑目的生平遗憾。

心潮逐浪庆丰收

1963年，杭州西泠印社终于在党的关怀下恢复活动。这年是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父亲怀着兴奋的心情亲自参加了盛会。我陪同前往。其时父亲已是78岁的古稀老人，然而他精神焕发，步履稳健。无论是书画交流，还是游览西湖、参观新安江水电站等活动，始终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时值中秋，是夜，我陪他漫步在"平湖秋月"。一轮明月映在寂静的湖面上，而父亲的心情却如奔腾的钱塘江潮，回到寓所，他奋笔写下革命烈士熊亨瀚的遗诗："昨夜洞庭月，今宵汉口风。明朝何处去，豪唱大江东。"借以抒发他的情怀。这次会上父亲介绍了他在湖北美协领导下创建"东湖印社"的经过和开展艺术活动的情况，受到与会艺术家的交口赞誉。他们说，唐老早年创建了"西泠印社"，晚年又创建了"东湖印社"，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衷心地祝愿东湖印社为振兴中国的印学再建新功。会上张宗祥提出："唐老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是唯一健在的元老，应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但父亲婉言谢绝了。

不幸的是正当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他晚年的艺术实践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东湖印社被迫停止了活动。父亲也成了"横扫"的对象。当父亲听到洛阳白马寺被烧的消息，捶胸顿足，为祖国文物遭此厄运痛苦万状。从此他沉默了，终于中风不治，于1969年4月8日溘然长逝，享年84岁。他的一生，有如他的篆刻艺术一样质朴无华，也恰似他的隶书那样浑圆方正，其间洋溢的是天地间至大至刚的正气，这也正是他毕生追求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可贵气质。

陈寅恪先生的家世与湖南

张志浩

陈寅恪先生祖孙三代，与湖南的政治和人事有极深厚的历史渊源。他的祖父陈宝箴，早年曾入安庆曾国藩幕；1875年（清光绪元年）署湖南辰沅永靖道（治凤凰厅）；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授湖南巡抚。两度居官湖南并寓居长沙历时近10载，对湖南的风土民情极熟稔，是湖南近代史上首开风气的大人物，治绩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他的父亲陈三立，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长期随侍父于官署。眷属长期留寓长沙。寅恪兄弟姊妹8人，多出生于长沙，在长沙度过童年。寅恪晚年曾写信给杨树达说："我出身于长沙周南女中刘蜕故宅，此地风水不恶。"由此可知他老年还怀念出生故地。

（一）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生于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少年英俊，抱负不凡。21岁举于乡。时太平军声势鼎沸，他从乃父办乡团，父死后率义宁团练与太平军作战，1860年（清咸丰十年）入京会试，不第。留居京师三年，与四方隽雅之士往来，与湖南汉寿易佩绅（易实甫之父）、江西武宁罗享奎最相得。后与易、罗来湖南，参加果健营，与太平军作战，屡有功。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屯军安庆，盛召天下贤士为幕友。宝箴往投，曾待为上宾，称为"海内奇士"。旋赴江西随席宝田。席为湖南东安人，时从刘坤一和江忠义佐军。太平军人江西，曾国藩调席宝田增援，宝箴主谋，屡以奇策决胜。席宝田一再叙保宝箴为知府，不就，重回曾国藩幕。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调直隶总督，宝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回到长沙。此时郭嵩焘自广东巡抚罢职回湘，与宝箴时有往来。郭认为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说："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郭嵩焘日记》）

1875年（光绪元年），陈宝箴署湖南辰沅永靖道事。湘西接近贵州边陲，地处万山中，民无所资生，遂教之植茶种竹，多种红薯，刨丝晾干为粮。明年10月，宝箴以母丧去职，居长沙；葬母于平江。

1880年（光绪六年），陈宝箴丧除，改官河北道（治河南武陟县），三立随父赴任。郭嵩焘与湘中绅耆赋诗饯行，郭有《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序云：

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信而从之。所谓智、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作也，充乎其气而不慑也。……而君之去人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徬徨太息于君之行也。（《郭嵩焘诗文集》）。

郭长宝箴13岁，可谓忘年交，而推崇赏识，信非偶然。

陈宝箴在河北道3年，多有建树。1882年（光绪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去杭州上任。几月之后，因开封狱事罢官。事属诬枉，宝箴抗疏申辩。因察问者首鼠两端，宝箴只得投闲置散，返回长沙，自放于山水间达4年之久。1886年（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调，宝箴到广州任缉捕局，治理盗贼。不久黄河在郑州决口，清廷诏宝箴助李鸿藻塞河。1889年（光绪十五年）秋，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抚，力荐宝箴可大用。翌年，授湖北按察使，一度署布政使。时张之洞为两湖总督，谭继洵为湖北巡抚，都信任宝箴，并倚之为助。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调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奉命督东征湘军转运，驻天津待命。战败后屈订《马关条约》，宝箴痛哭流涕，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陈宝箴授命湖南巡抚，再回湖南，时年已六十又四。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说：

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利病，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间，为士民所信爱，尤其与搢绅先生相慕向。平居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

陈宝箴奉命来湘时，正值湖南饥旱，赤地千里，受灾达20余县。宝箴急电各行省大力相助，顷间集济资数十万，得以安定大局，人民免于流亡。

湖南当时以保守和排外著称。甲午之战，湘军在辽东溃败，湖南有识之士，翻然思变。陈宝箴就任后，与学政江标协作，因势利导，推行新政。在经济方面，开通航运，架设电线，铸银元，设矿务局、机器公司、火柴厂，向现代化建设迈出第一步。陈宝箴曾赴湘南观察过水口山，该矿由廖树蘅父子经营多年，是当时少有的盈利甚丰的官办企业，至今仍是湖南的大矿之一。在文化方面，考秀才时加试时务，促使全省士子学习新知识。当时，谭嗣同等在浏阳兴办算学馆，陈、江全力支持。1897年创办《湘学报》，由唐才常主编，"立

论处处注射民权”，与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鼎足而三，在全国均有重大影响。陈宝箴在3年中创办的各项经济事业，都得到全体士绅的支持，民风士气为之一变。

原来清廷准备修建粤汉铁路，因湖南风气闭塞，恐遭绅民阻难，计划绕道江西。这时湖南民气大变，又经陈宝箴等力争，乃决计直通湖南。仅此一事，即可知陈宝箴改革的远见。粤汉铁路之取道湖南，对湖南经济的发展，关系何等重大。

1897年冬，黄遵宪任湖南长宝道，兼代按察使。由徐仁铸继江标为学政，谭嗣同应邀由南京回湘，皮锡瑞也由赣回湘讲学，梁启超应聘来湘主讲时务学堂，“群谋大集诸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有时务学堂、《湘报》、南学会、湖南保卫局诸新政。时务学堂讲求变法之道，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新式学堂，虽然学生不过百人，办学不到一年，却培养了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优秀人才；《湘报》与天津《国闻报》齐名，是当时力倡变法的两家日报。南学会原拟办成地方议会的雏形，经常由名人讲解国内外大势，影响重大。陈宝箴在一次讲学中说：“丧权辱国，日趋衰弱，实为国人大耻，应积极图谋自强，彻底清除康、乾以来士大夫的‘不务为实学，以虚美相高’和困于‘八比试律小楷卷折’而不关心国家社会，以及空谈道学、矜夸欺世等等积弊，以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道。”(《湘报》第一号）保卫局首创警察制度，亦著成效。这几项新政相互配合，新思想迅速传播，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同时也成为新旧思想斗争最剧烈的一省。省内有王先谦、叶德辉肆意攻击，武汉有张之洞横加干涉，北京有湘籍京官徐树铭等提出弹劾，梁启超等先后离湘，《湘报》一度取消论说，南学会亦停顿。但陈宝箴仍苦心维持，并向光绪保荐康有为等。他这种改革精神是何等坚定，他这种宽宏气度是何等博大！

戊戌政变后，陈宝箴父子均被革职，湖南新政，除经济事业外，均被摧残。宝箴父子归南昌，筑室西山下，名曰“崝庐”，“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宝箴以忧愤卒，享年70岁。八指头陀有挽诗云：“功罪一时原不定，春秋千古岂能私。”百年之后，中外史家公认他是湖南革新的开拓者，而且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

(二)

陈三立，寅恪之父，字伯严，号散原，1854年（清咸丰四年）出生于义宁本籍。早在陈宝箴治湘西时，三立夫妇已随侍官署。三立长子衡恪，即出生

于凤凰官署。1886年（光绪十二年），三立成进士，授吏部主事，不屑浮沉郎署，仍随侍父侧。尝慨然曰：“举五千年之帝统，三百年之本朝，四万万人之性命，而送于三数昏佞大臣之手。”(文廷式《闻尘偶记》）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三立更为其父左右手，湖南的诸多新政改革，可以说是他们父子的合作。他与湖南人士如曾广钧、瞿鸿禨、谭延闿等均有深交。政变后，三立亦遭革职。侍父归南昌，旋移居南京，以吟咏自适，不再过问政治，自号“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是清末“同光体”诗坛的领袖。他厌恶当时诗坛流行的纱帽气、馆阁气，独创自己的风格，取境奇奥，造句瘦硬，炼字精妙，其佳处可以泣鬼神。梁启超对他十分倾倒，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他的《散原精舍》诗集文集，都是珍贵的文学遗产。

陈三立的继配俞夫人亦能诗，是俞明震（恪士）之妹。俞明震是曾国藩的孙女婿，鲁迅的老师，在清末是一位开明人士，在查处《苏报》案中，曾尽力开脱革命派，使章士钊出走日本。其子俞大维是著名的军工专家，与陈寅恪同时留美、留德。他们有双重戚谊，既是中表，又是郎舅。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

三立有子5人，女3人，寅恪行六。这里先略述其七。

长子衡恪，字师曾，出生于湖南凤凰，为元配罗夫人所出。5岁丧母，自小聪慧，宝箴尝于宾客前夸此长孙。27岁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通师范和湖南第一师范，后去北京在教育部任职。是著名的画家、诗人、金石家。他与齐白石交谊极厚。1917年齐第二次到北平卖画治印，师曾见到他刻的印章，大为赞赏，到法原寺白石居处拜访。白石拿出《借山图卷》求教，师曾说：“你的画格很高，但还有不够精湛的地方。”即在画册题诗，后两句说：“画吾自画自今古，何必低首求同群。”白石接受了他的意见，力求独创，并有诗赠师曾云：“槐堂六月爽如秋，四辟嘉陵可卧游。尘世几能逢此地，出京焉得不回头。”(槐堂，师曾斋名）一生对师曾都是感激的。可惜师曾早逝，年仅48岁。

次子隆恪，字彦和，出生于长沙。1904年与寅恪一同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在财经界工作。解放后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能诗能文，有《同照阁诗钞》。1956年逝世于上海。

四子方恪，字彦通，出生于武昌。上海震旦学院毕业后，任中华书局杂志部主任。解放后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在南京图书馆工作。长于诗词书法。

五子登恪，出生于长沙。1919 年北大文科毕业，赴法国巴黎留学，研究法国文学。1949 年后任教武汉大学。1974 年去世。

长女康晦，1916 年与张宗义结婚于上海，1961 年卒于南京。在世时生活困难，寅恪常予接济。

次女新午，与俞大维结婚。

三女怵余，嫁薛琛锡。1923 年母俞夫人、长兄衡恪相继去世后，以忧伤卒。

陈家三代，英才济济，洵不多见。

（三）

陈寅恪的学术和人格，举国同钦，本文着重谈他与湖南的关系。他于 1890 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在长沙通泰街刘蜕故宅，以寅年生，祖母命名寅恪。他 9 岁离开长沙，直到 1916 年秋回过长沙一次。他的二哥隆恪比他先到，有诗相赠，题为《长沙将见六弟于旧抚署，计侍先祖去此二十一年矣，抚念今昔，怆然感赋》，诗曰：

风云开济几人存，万古灵标照棘门。
落眼楼台温梦寐，攀天双桂拾秋风〔1〕。
廿年兴废供弹指，往事迷离共断魂。
改服康屯知继起，两山葱郁护朝暾。

——见《同照阁诗钞》

旧时湖南抚署在今长沙市中山西路青少年宫那一片，长沙人过去叫“辕门上”。

1917 年秋天，寅恪又回了一次长沙，住在寿星街雅礼学会。据他侄儿封怀（衡恪长子）的《回忆录》：“第二次和六叔在一起是南京，他刚从长沙回来。”1951 年寅恪在广州作《寄瞿兑之》诗也提到这次长沙之行。诗云：

独乐园花入梦秋，诗筒惊喜见公休。
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园沅湘总泪流。
此日人天无上策，旧京宫苑有边愁。
论交三世今余几，一别沧桑共白头。

——《陈寅恪诗集》

首句下自注：“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也。”“文慎公”即指瞿鸿禨。瞿兑之是瞿鸿禨的儿子，陈、瞿是三代通家，世谊极

厚。因寄寓瞿家旧宅，故以司马光洛阳的独乐园相比。“儿郎涑水”句将瞿兑之比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家园沅湘”自然是回忆祖父任湖南巡抚时的情景。第七句的“边愁”是指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以三世交情作结。用典精确，情意遥深。

瞿兑之在上海，有《陈六兄寅恪自广州寄诗见怀杂述答之》七绝 13 首，选录 3 首如下，以见他们的世家交谊。

至计匡时召谤伤，中丞新政满三湘。
未胜竹马来迎拜，远侍吾亲在暨阳〔2〕。

首两句追忆寅恪祖父在湖南推行新政事。

去日懵腾似梦中，岁时家国感无穷。
斜阳南去秋笳里，记伴诸孤拜殡宫。

回忆 1937 年寅恪父亲散原老人辞世于北平，瞿去长椿寺与遗体告别。

手将文褓裹诸郎，宦辙章怀及大梁。
旧事两家谁最悉？孙家婆子鬓如霜。

回忆寅恪祖父在河南武陟居官时，雇了一位孙姓老妪，保育寅恪长兄师曾，后来又到瞿家保育过兑之，所以孙妪是最了解陈、瞿两家情况的。瞿是文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1973 年遭“四人帮”迫害致死，享年 80 岁，与寅恪巧合。

寅恪最后一次到长沙是 1937 年冬。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先生于料理父亲丧事后，携家仓皇逃离北平，几经辗转艰困，得至长沙。”当时清华、北大、南开均迁长沙，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寅恪一家于当年 11 月 20 日到达，住在亲戚张宅。临时大学旋又迁云南，寅恪一家也匆匆离长南行。先到桂林，转梧州，乘轮经虎门直达香港。时寅恪夫人心脏病突发不能再走，留下。寅恪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达云南蒙自。从北京出发时，将大部书籍装箱托运长沙，人到书未到，托亲戚取回保管。1938 年长沙“文夕”大火，全部损失。直到晚年，犹不胜惋惜。

寅恪晚年与湖南友朋诗札往来不断，如刘永济（宏度），是刘坤一的后代，著名词学家，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杨树达（遇夫），著名文字学家，1926 年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与寅恪同事，后任湖南大学教授。1944 年杨有五十自寿诗五首寄陈，陈即赋一律祝之，后两句有“莫道先生贫胜昔，五诗犹抵万黄金”。

1956 年 8 月，章士钊赴港，途次羊城，专程到中山大学康乐园拜访陈寅

恪，并有诗相赠，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章与陈家三代均有交谊，1897年9月，陈宝箴在湘推行新政，创办时务学堂，章士钊时年16，应试落榜，在试场见到陈宝箴，章交卷时，陈"诏语移晷"，使章感慰难忘。章的外舅吴保初与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交谊极厚。陈三立寓居金陵时，章常往请谒。寅恪之弟方恪，与章同为当时诗坛俊秀，方恪逝世后，所有诗词遗稿均寄存章士钊处保存。章晚年所著《柳文指要》采录了陈寅恪的一些说法，他们之间的交往已非一般，故赠诗末句有"儿时肮脏未能忘"之句。陈寅恪的《论再生缘》稿本，是章士钊带到香港才公开发表的。

曾昭燏（女），曾国藩的后人，考古学家，曾任南京博物馆馆长。1963年到广州去看望陈，适陈住医院，有七律一首纪之；1965年2月，曾逝世于南京灵谷寺，又有诗寄挽，表达"论交三世旧通家"的情谊。长沙王啸苏，名竟，清华研究院第一届毕业，湖南大学教授，论辈分应是寅恪的学生。1957年有《答王啸苏》七绝三首，第三首云：

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
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

——《陈寅恪诗集》

寅恪自1898年祖父罢官离长沙，到1957年恰是60个春秋了，60年间，多少沧桑变换，诚不免有"泪与湘江一样流"之感。

1928年，寅恪39岁，与唐晓莹结婚于上海。晓莹，广西灌阳人，清末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洞房所悬《齐眉绥福红梅图》为衡阳曾熙（农髯）所绘。曾熙是著名诗人和画家，时寓沪上，寅恪的父执。寅恪晚年竟两次回忆这件事：1954年有《甲午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红梅图>一律》，1966年元月有《又题红梅图一律，图为寅恪与晓莹结缡时曾农髯熙所绘赠，迄今将四十年矣》。这不过生活中一小事，而再三致意，一说明夫妻恩爱老而弥深，一说明怀念湖南乡谊之情至老不衰！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寅恪一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1958年学术界批判厚古薄今，陈也受到批判，不再上课，专从事著述。时陶铸任中南局书记，出于对陈的尊敬与爱护，时到中大去访谈，嘱有关方面给予照顾。由于陈双目损坏，陶亲自关照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还嘱咐在他的

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后来寅恪右腿骨折，住进医院，陶铸又嘱医院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并由广东省委送去电唱机1台，唱片32张，因为他喜爱听京戏。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当时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这也算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分吧！

寅恪先生一生学问、道德、文章，中外学术界已有高度评价。吴宓教授1961年到广州去探视他时，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以时俗为转移。"而寅恪也这样自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平生为人治学，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他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

周一良（寅恪的学生）教授论义宁学说之精髓说："先生为人为学，约而言之，盖有三端：一、史家学识；二、儒生思想；三、诗人气质。义宁之学博大精深，浩无涯，其探赜索隐，深钩致远之收获精湛绝伦矣。岂无一以贯之之精髓，类乎画龙之睛、探骊之珠者欤？一良妄加概括，窃以为即对立统一之规律，即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之辩证观点方法也。"在现当代历史学家中，寅恪先生可谓独树一帜。

注 释

[1] 此句下自注："东西内院各植桂树一株，大可合抱，童年常与诸弟嬉游其下。"
[2] 此句下自注："戊戌先公在江阴，散原丈随中丞公在长沙。"

杰出的女教育家曾宝荪

吴为廉

据长沙的老人谈，20世纪30年代初期，长沙北门左文襄公祠（旧址今工人文化宫）女青年会内曾有一个“儿童保健科”，是长沙专办儿童保健事业之首创，起过一些好作用，颇受各界欢迎。1938年长沙大火，左文襄公祠被毁，女青年会西迁沅陵，“儿童保健科”也就停办了。

“儿童保健科”是谁发起创办的呢？是湖南杰出的女教育家、当时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女士发起创办的。曾宝荪，字平芳，号浩如，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乡（今属双峰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生，系清代名臣太傅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国藩）之长曾孙女。祖父曾纪鸿英年早逝，祖母郭筠持家，题所居为艺芳馆，并有《艺芳馆诗集》行世。父曾广钧（重伯），23岁举进士，膺居翰苑，负有文名。祖母具有进步思想，对宝荪备极钟爱，亲课经史，兼习诗文。宝荪年16岁时，命其入杭州英国圣公会冯氏高等女师，以成绩优异，见赏于校长英人巴能义女士。1911年巴校长返英，携女士随行。旋入伦敦大学西田学院修生物，获理科学士；继入牛津及剑桥大学，研究哲学教育。1918年学成归国，立志教育救国，先在西园龙宅，后选长沙小吴门正街曾文正公祠（今中山东路船山学社处）后之浩园（局关祠，今实验中学，原十四中旧址）为校址，创立艺芳女校。校名艺芳，所以纪念祖母教诲之恩。奉准试办六年制中学及大学部，自任校长，从弟曾约农主持教务。是年9月开学，仿照英国西田学院学制，实行不监考，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之荣誉教育制度，人才辈出，成绩斐然。抗战期间，艺芳一度停办。她在二三十年代还先后受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今稻田中学）校长及湖南省高等检定考试委员会委员。她严于律己、公正无私、生活俭朴，工作认真负责，爱护学生如同家人，深获学生爱戴。她虔信基督，于1928年曾出席过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议，次年又受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深感国势积弱，常存忧国忧民之志。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之一，

并历任湖南省第一、二届参议员，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等职。但终不能展其教育救国之志。1938年冬，长沙“文夕”大火，女士姊弟随家人离长，避难于香港。1948年冬，辗转去台湾。她协助其弟曾约农在台北创办东海大学，在办学上仍贯彻其“西方科学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并重”之主张，故东海大学成为今日台湾省有名的学府。

曾宝荪女士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深为湘人所称道。她是独身主义者，又是基督教徒，编校过《新旧约圣经提要偈子》。岳麓书社曾编印《曾宝荪回忆录》问世。曾宝荪于1978年秋在台去世，终年八十有六。

倾洋涤宇宙　重建此乾坤

——回忆先父罗学瓒烈士

罗立洲

我爹爹罗学瓒的一生，是勤奋学习、勇于追求真理的一生。

1894年1月31日，他出生在湘潭县马家河乡一个农民家里，幸运地成为家中第一个有文化的人。他眼见祖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进高小后就毅然立志，为救国而读书。他常对人说："受教育的人就应当是救我们国家的人，这是责无旁贷的。"

高小毕业后，他冲破家庭阻挠，与毛泽东一道考取省立第四师范，随后又转入一师第八班。他们在这里读了五年半书，勤学不倦。

他在学习中写了一首偶感诗："读书行乐处，作事养心时。世事浮云过，艰难我不知。"的确，他以读书为乐，什么艰难也不知道。但坚持了两年之后，由于运动量小，身体日渐衰弱，常闹感冒，眼睛高度近视。他觉得自己读书不休止，固然增长了知识，但不好运动，损害了身体，也不可取。他说："一个人意志不强，不足以成事，身体不强，担不起重任。"同时，他见许多高年级同学，由于不好运动，身体极差。于是他开始注重校外活动，加强身体锻炼了。他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近数周来，于下午与同学远游三四里，或临山，或眺水，觉心志愉快异常，真大有益处。"

"今日（星期日）与郭君自存，族叔敬清同游岳麓山。遍访名胜，至日西沉始归，复与毛君泽东等十六人，租二小舟，环水陆洲一周，清风明月，醉酒歌诗，亦甚乐矣！"

他们当时吟出了许多壮丽的诗篇，以抒发各自的怀抱。先父这次吟了两首，一首是这样写的："龙蛇争大地，虎豹满寰瀛。蹂躏无余隙，巢空草木惊。安得异人起，拔剑扫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一同登乐国，万世庆升平。"原来，他们自己就是一群"拔剑扫妖氛"的异人啊！

他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觉得一个人要有经寒耐暑的体魄和意志，他说："今日之不畏寒暑，即异日之不畏大敌，其事甚微，其关系甚大。"他把身体的

锻炼同意志的锻炼结合起来。除了积极参加学校打球、植树、打拳、击剑等活动外，还经常跟毛泽东一道，在寒冷的天气去湘江游泳。他的日记这样记载："今日在水陆洲头游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我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我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已痊愈。复与毛泽东等往河里洗擦身体一番，大好畅快。他的家与长沙相隔百余里，寒暑回家及假后返校，都不坐车船，自己挑着行李步行，以锻炼体力及意志。"

他除了坚持学好规定的课程外，还跳出课堂，涉猎很广，求学、立身、交友，都一一探讨。但研究的中心，还是救国救民。他坚持学以致用，认为："圣贤豪杰，别无过人处，只在能行所知而已。""学以求其方，守以定其志，富贵利达，非所问也，生死存亡，非所知也。"这几句豪言，成了他终身实践的座右铭。

在一师期间，他由家中包办与我母杨全贞结了婚。毕业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长子传益，两岁时不幸夭折。他为此事，感触很深。他怨家中不该信神，孩子病了，求神问卜，病情恶化了，又急请庸医乱投药，一误再误，把一个天真的孩子断送，他很痛心。认为孩子的死，完全是社会陋习所造成。他一时想得偏激，甚至主张废除医药。他写了一篇文章猛烈批评庸医误事，并极力提倡曾国藩的主张，"以不药为药"。

他很重视交友，认为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广交朋友，否则孤陋寡闻，难以立足。但交友又必须志同道合，不可轻率。他定了三不交的原则：一、有势利的人不交；二、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三、好谄媚逢迎的人不交。对那些有才能，有志救世救民的人，主张同他和衷共济，不可嫉妒。因此，他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李维汉等有志之士结下深厚的友谊，经常在一起"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积极探讨救国真理，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他和这些学友一样，是一个有理想、志气，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对有益于社会改革的道理，他都认真去探讨。而且"一事不达不休，一理不明不置"。当时，人们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他都认真探讨过，还写了许多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但在探索中，敢于否定错误的见解，不断探索新的问题。比如他曾赞成过"教育救国"，并写文章阐述其道理。写信给家乡父老，提倡办乡校、族校，指出普及教育的途径。同乡村私塾商讨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等等。但后来发现教育救国搞了十多年，却不见成效。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不良的阻力，社会不改造，所谓教育救国，只能是纸上谈兵。就这样，"教育救国"论被他否定了。他否定了各种错误的看法以后，并不因此灰心，而是把它们当做一种借鉴，一种动

力，继续不断地探索、前进。他认为："人不为颓俗所移，遂可以转移颓俗。"他和毛泽东等一批好友，通过多次交换意见，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前途，认为时局太危急了，有急需结成团体的必要。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下，终于组成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的战斗团体——新民学会。他在给祖父的信中，陈述他参加新民学会的想法时写道："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辟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之起死回生。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我出身之志愿也。"很显然，他已把国家之命运，与身家之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加入新民学会，已不是为了"改革学术，砥砺品行"，而主要是为了救国救民。

1918年，父亲在一师毕业了，他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的祖父不同意他出国，也不肯给路费。他写信把此事告知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以他长于教育，写信劝他不必去法，宜从事教育，担负起为新民学会培养人才的重任，以免后路空虚。他自己则认为：赴法可以考察强国的经验，见见大世界，寻找中国富强的道路。他的想法得到蔡和森的支持，立即回信给他，愿为他解决赴法经费问题。于是他同毛泽东一行20余人到北京参加留法预备班学习。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19年9月2日到达法国，被分配到克鲁佐地区施乃德钢铁厂做电工，走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工读并进，每天八小时劳动后，坚持学法文、阅读报刊，参加体育文娱活动。还研究马列主义，与朋友讨论社会改造等问题，生活过得很充实，很愉快。他写信给毛泽东说，"人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最为快乐"，"我觉得近数年来的生活以在此地为最好"。对他这种"奋勉之志"，毛泽东很敬佩，建议他对法国社会"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一面与产业工人一起劳动、生活，使自己的感情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面对工人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他利用做电工可以轮流在各车间劳动的方便，经五个月的了解，写了一篇长约16000千字的调查报告，题为《法兰西工人》。这是他开始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考察社会的尝试。在"工人生计"一节里，详细分析工人光靠罢工手段不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种种理由。并指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改造着手，就是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公有制，一方面都有工做，一方面都有财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我解放。同时指出："法国工人痛恨战争，痛恨资本家剥削，多表同情于苏联共产党，说'布尔什维克好'。"这说明他此时的观念，已有了根本的转变。他从小读的四书五经，深受孔孟之道熏陶，曾表示要"一心学孔孟，悲天而悯人"。而现在却猛烈批判"克己复礼"、"纲常名教"等，认为这些旧观念，"把人们的生活气息，断丧已尽"，他与传统观念决裂了。正因为有这种

思想基础，1920年7月，当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上提出中国要激烈革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革命之路的主张时，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是他多年探索所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从此，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

当时，爹爹很关心我妈妈的进步，他觉得我妈妈是个聪明贤惠、能说会道的女子。但因出自农家，没有文化，怕她跟不上时代。因此，决心要她去勤工俭学，学习文化，见见世面。当时，向警予正写信给她的女同学，动员一批女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就立即托向警予，如有女同学赴法，即邀我妈妈一道。并写信回家告知其事。但遭到我曾祖父的反对，认为妇女不应出国。我妈无奈，只好与女儿金兰照了张相片寄去，并写信说明自己不能赴法的原因。爹爹深感家庭束缚太多，在给毛泽东信中说："近来为家庭的缘故，每日萦环我脑中几次，恨不得抽刀斩乱丝，一下解决。"

在法国，爹爹就开始了战斗生涯。他和蔡和森、李维汉组织工学世界社，领导数千名勤工俭学学生开展"二八求学"、反对北洋军阀卖国借款及占领中法里昂大学等一系列的斗争。当他和蔡和森等104人被法国关押兵营，强行押回国之后，他们没有气馁。回到上海，立即与蔡和森、李立三等一道加入共产党。回到长沙，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任湘区党委委员，省工团联合会部主任，以教育为社会职业，为党培育人才。为便于深入工农群众，他把我妈妈接到长沙，住在望麓园一号，安排她在纱厂做工，学点文化，帮助照料家务。于是，他白天在学校教课，晚上和星期天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做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他主要负责人力车工人运动，这是最艰苦最分散的一个行业。他深入下去同工人一起劳动，拉人力车，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夜校，串联发动。在建立党支部、组织起人力车工会之后，就率领2700余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向业主、赵恒惕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抗争，赢得改善工人待遇的胜利。他任湖南省青年救国团的主席，发动学生、工人分赴街头，查抄和焚烧日货。暑假期间，组织学生宣讲团，分赴各县进行爱国反帝宣传。他自己亲率一个无声电影队，深入乡村，于夜间开群众大会，一边放无声电影，一边宣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

他任醴陵地方委员会书记时，一开始，就率领农民群众以武装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这时，我姐姐已上学读书，妈妈带着两岁的我来到醴陵，我们一家住在先农坛一间平房里，面积狭长，两头架着宁波床。后来毛泽东来考察农运也是同我爹爹住在这房里。当叶挺率领北伐军来到醴陵时，当地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大会是晚间在一个大草坪举行的，搭了个主席台，用竹篾簟子围盖着。一时，人山人海，灯火辉煌，彩旗缤纷。我妈妈抱着我站在人群外观看。

一会儿，只见爹爹身着蓝布长衣，戴着眼镜和礼帽，走出台来，高声致词，不停地做着手势，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又有人接着演说，阵阵掌声不绝。他们是谁、讲些什么，我全不懂，只呆呆地望着主席台，看着喧嚷的人群和迎风招展的旗帜，这盛况，在我的脑海中永不灭。在醴陵，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一天傍晚，我独自在草坪玩耍，不慎跌了一跤，手掌碰在瓷片上，划破了掌心，鲜血直流。我哭着跑进寝室，见了爹爹妈妈，我哭得更凶了。这时，爹爹正坐在灯旁，凝思着什么。一见我这等模样，急忙站起，将我抱在身上，安慰了一番，又将手掌上的鲜血洗净，包扎好。我这才停止了哭声。这件事不仅记忆犹新，而手掌中的创痕，至今还隐隐可见。

1926年7月间，我妈妈病重，爹爹因农运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只好送她回胡家坪老家。记得动身的那天，妈妈躺在床上呻吟。爹爹在另一床上给我换上一条新印花布裤子，我高兴地问："爹爹，我们到哪里去?"妈妈在另一床上望着我微笑道："走人家去!"我乐了，于是手扶着爹爹的肩膀，蹦跳起来。

那次我们是坐火车回家的，乘的是统厢，没有座位。妈妈躺在藤椅上，用被子盖在身上。爹爹在一旁招扶着。我就在旁边玩耍，车厢人群拥挤，妈妈着急地说："二胡子，要好好照顾洲儿，莫让人把他挤坏了。"爹爹就立即把我拉近身边。我的家乡，喜称男人为胡子。我爹爹别名荣熙，在大家庭中排行第二，乡邻称他为荣熙二胡子，也呼他为贵二先生。我妈妈则简呼他为二胡子。爹爹将我母子送回家，安置好以后，很快就赶到醴陵，开展暴风雨般的斗争去了。毛泽东来醴陵考察农运时，对醴陵农运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赞扬。

9月间，我亲爱的妈妈因难产逝世。她是死于农村无知的接生婆之手。爹爹闻讯后，星夜从醴陵赶回家来，揭开棺盖，一手摸着我妈妈的脸，顿足痛哭，他深痛自己从此失去一位贤惠能干的内助。而我当时尚不懂得死别的哀痛，手牵着一只小猫，痴痴呆呆地望着妈妈，我还以为妈妈在睡觉哩！直到夜晚，我去睡觉时，不见亲爱的妈妈，才放声哭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而且瞪着大眼，通晚通晚地哭着、呼唤着，一连好几夜都是这样的！

爹爹料理好我妈妈的丧事之后，请了一位婆婆带着我，他又含悲回醴陵继续战斗。当许克祥叛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马日事变）时，他挺身而出，配合柳直荀组织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并亲率湘东赣西两万工农义勇军来到株洲，在易家湾与许克祥部展开激战，赢得三战三捷。

在浙江被捕入狱后，爹爹不仅不为敌人严刑屈服，且以监狱为学习和战斗的新战场。他组织同牢难友学习革命书刊，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亲自讲授《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以激励战友们的斗志。他常常鼓励难友说："革命者的悲剧，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精神的萎靡，意志消沉，对革命丧失信心。"

又说："坐牢，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地磨炼……为将来更好地工作。"他与徐英等组织狱中党支部，多次领导绝食斗争。他们向敌人提出十大要求，要求改善伙食，反对打骂，反对用脚镣手铐等。敌人不答应，就坚持绝食。敌人又急又恨，多次想用重刑拷打来镇压，他们宁死不屈，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所提条件。

爹爹就义后，到现在整整60年了。这60年中，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血与成千上万先烈的血，汇成波澜壮阔的巨大革命洪流，冲垮了三座大山，涤荡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新中国诞生了，走上了日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先烈的精神，光耀千古！

风云变幻见忠心

廖汉生

那是1933年的12月。

风雪严寒袭击着湘鄂西连绵起伏的群山。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湘鄂西的革命斗争受到了惨痛的挫折，丧失了红军和广大群众多年来用鲜血和生命创建的根据地，把红三军带进了一个空前困难的境地——他们周旋于十几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天天行军打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伤员无处安顿，弹药无法补充，人越打越少。四顾茫茫大地，处处烈火浓烟，苏区人民正经历着空前的大灾难。这一切都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血泪控诉！对于错误路线，贺龙等同志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在错误路线的高压下，正确的意见不仅得不到采纳，而且遭到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斗争。面对这种景况，贺龙同志是多么愤慨而又痛心啊！

但是，贺龙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错误路线一定会被纠正，相信革命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一定会被克服。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当时极端困难的处境，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红三军为了重建新的根据地，贺龙同志带着部队从鄂西的利川出发，经湘西，向黔东开进！

贺龙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迎着风雪，行进在部队中间。他身穿青灰色的单薄的军装，扎着绑腿皮带，脚穿草鞋，背着斗笠，即使在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严格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威严的气质和仪容。他一边走，一边爽朗地笑着，在那风尘仆仆饱经风霜的宽阔的脸膛上，流露出刚毅的豪气。他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斗，自信而又兴奋地和身边的战士们交谈着，他说：“现在的艰苦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决干呢。1928年春，我们来了七个人，不几年的时间，湘鄂西根据地不是开辟出来了吗！”说到这里，他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同志们，困难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山鸡要有个山头，白鹤要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不行，现在敌人太多，我们可靠的根据地还是在脚板上。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苏区的经验，去创建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到黔东，我们一定会很快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贺龙的话就像一团团烈火，驱散了红军指战员们心上的寒冷，燃烧起战斗的热情，在大家面前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前景。

就在这样紧急的关头，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派来了反动政客熊贡卿，妄图对贺龙同志进行“游说”和“策反”。贺龙同志在红军和革命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影响，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以为，能把贺龙拉过去，对共产党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以为贺龙正处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迫以重兵压境，诱以高官厚禄，“劝降”的阴谋是可以得逞的。即使不成，也可以摸摸红军的底细。

熊贡卿为了探听虚实和贺龙的态度，先派了梁素佛来联络。梁带着熊贡卿以昔年好友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和贺龙叙旧，并愿意竭诚帮助贺龙解脱困境。

贺龙和熊贡卿并非知己朋友。1924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熊贡卿来找过贺龙，仅仅是相识而已。十年之后有什么旧好叙呢？没有。贺龙同志立即猜中了熊贡卿的险恶用心：是替蒋介石做“说客”来了。一股愤怒的火焰烧红了贺龙同志的脸颊，嘴上的浓髭在气愤中抖动起来，两眼闪射出令人生畏的光芒。“劝降”，这对贺龙同志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极大的污辱！依着他的脾气，立即从卫兵身上抽出马刀，把这个坏蛋一劈两半。但是，他是共产党员，他用极大的忍耐克制了冲动的感情，当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

湘鄂西中央分局研究了这个情况，并做了一个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军。

敌人是狡猾的，也是愚蠢的。他们不能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贵的品格。他们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南昌起义之后，谭平山和周逸群介绍贺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参加了为贺龙举行的入党仪式）。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潮州、汕头失败后，贺龙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11月到了上海。当时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贺龙说：“中国字我都认不了几个，恐怕学不了俄文，党相信我，还是让我回湘西搞武装斗争去吧！”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他和周逸群等七个同志到湘西去开辟根据地。

贺龙回到湘西桑植后，他的家族和亲友中，就有人惋惜而又埋怨地说：“现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共产党）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你是有前程的，你当共产党落了个啥？脱下将军服披粗

布，脱下皮靴穿草鞋，你图的是什么？”

这些貌似关怀的规劝，把贺龙激怒了，他红涨着脸，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那些大清皇朝的遗老遗少和缙绅名流，激忿地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我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你们看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蒋介石一定会垮台……”

此后，贺龙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为榜样，在湘鄂西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气势磅礴的武装斗争，按照中央苏区的经验，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壮大革命武装，到1929年夏就创建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到1930年7月，革命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红二军和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当时湘西有17个县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这样的大好形势，被后来的错误路线破坏了。贺龙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无论在对强大敌人的斗争中，或是在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日夜操劳，奋不顾身，历尽了艰难困苦，为夺取革命胜利，立下了卓越的功绩！

熊贡卿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怀着痴心妄想，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了红三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接待了熊贡卿。部队在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休息三天。

在这个期间，贺龙跟熊贡卿进行了接触。熊贡卿虽然老奸巨猾，但在贺龙机智的交谈中，终于透露了蒋介石的秘密。贺龙得知，敌人已经派了四个人（其中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敌人在中央苏区也进行多年工作，这些人都是作上层收买工作的，妄图打进我军领导机关中，用种种卑鄙、毒辣手段，破坏红军。

贺龙获得了重要情报，任务完成了。翌日凌晨，部队从茨岩塘出发，贺龙命令警卫班去逮捕熊贡卿。

当时熊贡卿带来的二十多名随从，早已置于军部警卫营和特务队的控制之下，熊贡卿就睡在军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

警卫班的同志进去后，熊贡卿还睡在床上打呼噜，做着他的“马到成功”之后升官受奖的黄粱美梦。

警卫班的同志一把掀开他的被子，厉声喊道：“起来！”

这个反动政客猛然惊醒，睡眼惺忪地问：“你们干什么？”

警卫班同志严厉地说：“逮捕你！”

熊贡卿穿着白棉毛衫，从床上坐了起来，疑惑而又惊慌地问：“你们误会了吧？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快起来，少废话！”警卫班的同志们，用枪指着他，命令着。

“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熊贡卿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的命令来的！”警卫班的同志告诉他说。

“啊！”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筛糠似的发起抖来。

警卫班的同志们给熊贡卿戴上了手铐，提着他的小皮箱，把他押到特务队去了。

这时部队已经出发。在从茨岩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山垭口，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愤而又洪亮的声音，压倒了山风的呼啸，在群山中扩散开去。他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个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贺龙同志的声音更大了，有着撼天动地的气势，他把手臂猛力一挥，使人感到斩风劈浪的力量。

部队沸腾起来了，大家高呼着口号：

“不怕一切困难！坚决革命到底！”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气壮山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群山间回荡，使人感到世上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这支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

接着，贺龙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负责执法。一声枪响，宣告了敌人阴谋的破产，宣告了革命者的胜利！

兔死狐悲。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给他的走狗熊贡卿签发了一项抚恤的训令，恰像是他阴谋失败后的几声哀鸣！

熊贡卿被处决了，蒋介石的阴谋被粉碎了，射向熊贡卿的这颗子弹，既凝聚了贺龙同志对于敌人的强烈憎恨，也饱含了贺龙同志对于党，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34年10月，红三军（后又改为红二军团）在四川酉阳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新阶段。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建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军委的领导。消息传到二、六军团的时候，贺龙同志是何等地喜悦和兴奋啊！危害革命的错误路线终于得到了纠正，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真诚而又恳切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是，

我拥护他，因为他是完全正确的！”

1935年11月15日，红二、六军团在中央军委电令下，由湘西桑植出发，英勇地突破敌人的澧水、沅江封锁线，胜利地进入湘中广大地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长征。从此，贺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的。”

周总理的悼词，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说出了亿万人民对贺龙同志的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怀念！

柳森严的暴发与覆灭

刘乐扬

阴魂不散千年祸害

20世纪20年代末至解放前的20余年间，长沙社会上群魔乱舞，丑类横行，除了军阀官僚党棍之外，还有在他们呵护利用下的一群流氓恶霸骗子和特务，他们无恶不作，残害人民，败坏风气，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就是柳痞子。

柳痞子即柳森严。这个兵痞出身、给人看家护院的无名之辈，在20世纪30年代初忽然一夜之间暴发成名，充当了反何（键）运动中的一名政治打手，被反对何键（湖南省主席、军阀）的甲派（CC）势力和失意政客官僚运用野鸡小报吹捧为“峨眉剑侠”、“武林豪杰”，具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功能。柳森严横行长沙廿年，罪大恶极，罄竹难书！解放后不久被公安机关收捕，1951年5月依法处决。

关于柳森严的种种神话，本来早已戳穿，无人相信。1932年的擂台比武，柳森严被湘南武士宁德生一拳打倒，什么峨眉剑侠，什么特异神功，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但他党羽众多，反何势力的小报多方加以回护；乙派（何键）报纸则奉命息事宁人，不予揭穿张扬，所以仍有不少市井平民被其愚惑，阴魂不散，至今留有影响。柳森严的奸淫成性、摧残妇女，本为武林大忌，为社会上人人所痛恨，但他有CC及中统特务机关作后台，加以长沙沦陷两年，人事变化极大，故亦长期没有人敢出来伸张正义，加以声讨。至其特务罪行，则是解放以后才有可能全部清算，也不是一般群众所完全了解的。另有个别曾经与柳相识而不知其底细、后来移居台湾的人士，在港台武打神怪影视片风靡一时之际，犹以为柳乃一代豪侠，忆往怀旧，将柳加以吹嘘美化，不知柳已伏法40多年了！为了澄清是非，矫正视听，作为长沙社会上的一页稗史，把柳森严的真面目再加勾画清楚，也许是有必要的。

两股黑潮一夜暴发

柳森严是个略识之乎的文盲，自幼长得牛高马大，膂力过人，兼又禀性乖戾，因此恃强逞恶，好勇斗狠，常在乡里间欺压善良，强取财物，专耍无赖。尚未成年，便在长沙干杉、长桥柳氏宗族中成了有名的“柳痞子”。这种人自然不能见容于闾里。为了生计，他选择了当兵吃粮的道路，十七八岁便进了四川军阀队伍，成了兵痞。他在川西结交袍哥，学了几套拳术；又同一个采药道人相识，认识了不少中草药物，学了一点治疗跌打损伤的外科医疗技术，还得到一些泡制补酒、研配春药的秘方。这都是他后来冒称峨眉剑侠和开设森济医院的本钱。

他在四川大约混了10年，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回到长沙。没有正当职业，经人推荐，到彭允彝公馆当了一名看家护院的保镖，人称“教师爷”。彭允彝是曾任清朝官僚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两朝遗老。地方官对于这种具有某种潜势力的人物，轻易是不愿得罪的。但是不知何故，湖南军阀何键对他不仅趋奉不周，便是一年三节送礼，也不比别的官绅丰厚。彭因此对何极为不满。他本来家财不丰，仇怨很少，用不着雇用保镖。其所以豢养柳森严，是要将柳当花枪准备随时跟何键捣乱、开玩笑的。这是柳森严突然暴发起来的一个重要契机。

柳森严在彭允彝的一计之下（详后），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夜之间成为名震长沙的“峨眉剑侠”、“武林豪杰”，不到半年，便收徒成千，敛财上万，起了公馆，坐上包车，当了院长（森济医院），这又完全是时势造成的。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湖南政界、社会上便泛起了两股黑色逆流，“时势造英雄”，也造成了柳森严这个恶棍！

第一股黑色逆流是何键的“四勿政策”与读经复古、提倡国术。何键于1928年以三十五军军长回师湖南，当了“清乡会办”，1929年初利用桂系之力，取代鲁涤平而擢任湖南省主席，集全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此将湖南完全视为私人地盘。他是醴陵人，全省各级机关大小职务，都由他的醴陵亲友同乡担任。除了党务系统尚有甲派（CC）势力与之抗衡，文化教育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岗位不可任意更换取代之外，所有衙门都成了醴陵人的世界。反何人士采用《论语》中的四句话加以诅咒，形容湖南局面是“非醴（礼）勿视”、“非醴（礼）勿听”、“非醴（礼）勿言”、“非醴（礼）勿动”。概括之为“非醴勿用”。一时之间，醴陵人养尊处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人人侧目。

何键上台之后，即提倡读经和打拳，下令初中以上都要开设《论语》、《孟子》课程，体育课必须有两小时“国术”。大约在1929年，即已设立“湖南国

术馆”于协操坪，旨在招收学员，训练国术教师，以备派往各学校教拳。第一任馆长是受过现代体育训练的体育科学家万籁声，他不满何键的腐朽迷信思想和大官僚架子，大约一年便辞职走了。第二任馆长是号称“北派”的顾汝章（非顾裕章），此人确有几套硬功，1932年春曾应邀到第一师范礼堂表演“铁砂掌”（一掌将两块叠在一起的红砖劈成两截）和“铁布衫”（将两三寸宽一分厚的钢板在手腕上绕几圈），并无虚假作伪之处。顾汝章表演后对学生说：“这类功夫是从小练起，至少也得三五七八年才能练成，没有什么巧妙，我们安徽河南十几岁的小孩，也练得出这种功夫。难就难在要天天练，练到老，不练，功夫就废了。一个人哪能一世天天练这个呢？”顾汝章说他没有见过什么剑侠，也不相信能飞能变。他又说：“武艺高强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练的人少了，越往南走，高手越少，来湖南后一个也没有遇见。”这些话被视为狂妄傲慢，目无湖南武林。反何势力乘机发难，教唆柳森严向顾挑战比武，借以掀起一场反何闹剧。

第二股黑潮是电影《火烧红莲寺》引起的社会轰动及反科学的迷信思潮。当年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明星公司将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电影脚本，名曰《火烧红莲寺》，一连拍了十几集电影（那时还没有“电视连续剧”这个名词与剧种），推向全国。不肖生向恺然是湖南平江人，《江湖奇侠传》一开头又是以长沙为背景，从箩码头的械斗写起，首先推出了一个出家为僧、坐关十年的“柳迟”，更使长沙人倍感亲切，完全相信那些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剑侠们都是真的，甚至就在他们身边。柳森严向顾汝章挑战的消息一出，长沙人认为他就是“柳迟”，而柳森严则大耍滑头，既不承认，也不否定，故作神秘；不过，长沙群众后来也相信被宁德生一拳打翻的柳森严绝不是“柳迟”，因为平江不肖生笔下的“柳迟”是19世纪清代末年的传奇人物，长沙箩码头搬运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也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柳森严并未生活在那个时代。解放后，向氏曾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员，每对人言：小说人物往往出于虚构，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作《江湖奇侠传》的时候，并不知道柳森严其人。由此可知，有人误信“书中大侠柳迟即为柳森严”，纯系穿凿附会。不过，这种无稽之谈，确实给了柳森严冒名顶替的机会，使之乘潮而起，名利双收。但柳森严是已经伏法40余年的刑事罪犯，真人真事，不可继续以讹传讹，是应该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政治闹剧何键设擂

顾汝章关于“南派无人”、“还没有见过湖南武林高手”的谈话传出之后，湖南国术馆的受训学员（都是湖南人）极为不满，认为顾汝章和教官中的北派

武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1932年春初的一天，柳森严和他的几个拳脚朋友也在彭允彝公馆的外客厅议论开了，他们指责何键只用北派武士当教官，不用一个湖南人，这跟他的“非醴勿用”政策完全一样。何键目中没有湖南武士，顾汝章才敢口出狂言，藐视南派。柳森严说：“我去国术馆看过顾汝章教拳，研究了好久，这个人除了铁砂掌功夫过硬，拳路不难破他；铁布衫功夫深些，但是刀枪可入，也练不到阴门上去；只要避开他的铁砂掌，专攻下三路，是可以打赢他的，老子就不信邪!”这些话都被在庭前走廊上漫步的彭允彝听到了，他立刻迈进客厅，劈头就问柳森严：“你敢不敢向顾汝章挑战比武?”柳森严说：“只要你老人家助威撑腰，我拼命也要同姓顾的比试一下。”彭允彝说：“好！先礼后兵，我来替你起草战书。别怕，撑腰的不止我一个老朽，还有许多人会来助威；大家早就要同姓何的较量了。比武不比武，你不用操心。”

彭允彝以柳森严的名义写好战书，由柳的一个党羽送往国术馆面交顾汝章之后，立即通知了甲派首要人物和一些小报记者，要他们吹嘘柳森严是当今峨眉派剑侠，下山来长期隐居观变，已有好几年了。他介绍柳同新闻界来往，利用甲派报纸，拉拢小报记者，向他们介绍武林奥秘，故作诡异姿态，好让小报宣传。他吩咐柳森严立即离开彭公馆，以后绝对不要提起两人之间的关系。柳必须自立门户，马上到北门外的平浪宫和南门的天心阁两地设厂授徒，先弄几千万把块拜师钱到手上来，同时募捐，迅速创办伤科医院，熬膏药、制药酒，挂牌治伤，把声名传开去。柳森严依计行事，不数月间便收了一两千徒弟，诈骗到几万元光洋。接着便立了公馆，买了包车，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彭允彝还告诉柳森严：顾汝章收到战书之后，不会应战，因为何键将不同意。所以，不要真的去找顾汝章打架。但是要把弓拉开，“引而不发”，时不时放出空气，要顾定期比武。柳森严因此乘机展开活动，除了同小报打交道，还挤进了富商豪绅贵官的门户，赌钱打牌嫖妓宿娼，无所不为。平日奇装异服(上身西装、绸衫而脚穿草鞋，挟油纸红伞)，坐着包车招摇过市，对穷人耀武扬威。长沙当年有十数家大小报纸和通讯社，何键一律发放津贴，但是反何派拿了津贴，依然要作反何宣传。而柳森严是能够吸引读者的头等题材，只要他招待那些小报记者一顿，他们就依照他的吹嘘、暗示，用《火烧红莲寺》、《江湖奇侠传》的手法来制造柳森严的神话。

彭允彝为柳森严起草的挑战书，报上不敢公布，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封假借驳斥顾汝章狂妄自大目无南派为名的痛斥何键“四勿”政策的檄文，将何键和醴陵人骂得狗血淋头。顾汝章将战书呈交何键，何一看便知这不是柳森严要来挑战比武，而是反何势力同他捣乱。何键吩咐顾汝章：姓柳的是被人利用的小丑，不足挂齿；既然下了战书，就不怕他暗算；你无须回书应战，只用口头传

话出去：“我顾某是客卿，也是何主席的部属，比试与否，应当听命于何主席。我与柳武士没有任何个人私怨，实无比武的必要。平日不善辞令，有时言语失慎，但是自幼习武，深知武林高手众多，甘愿领教，绝不敢藐视南派，无礼冒犯。如果能够邀集全省武林前辈聚集长沙，切磋武艺，情愿受教，甘拜下风。现在何主席已经决定秋季举行湖南全省国术比赛，规定每县均须有人参赛。还要邀请全国各门派领袖人物来湘指导，担任评判。届时如果柳武士报名参赛，同襄盛举，就可以在台上相遇，向柳兄请教了!”何键旋即下令定于是年秋季举行全省国术比赛，各县均须提前做好选拔工作，届时以公费保送来省。湖南国术馆在何键掌握之下，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教育厅和体育界积极参加。

一拳倒地丑态毕露

被称为“打擂台”的全省国术比赛于1932年秋间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湖南70余县，每县至少有1至4名武士被保送前来参赛。打擂台采用单循环淘汰制，名次以胜负场次多少为准，败者即被淘汰，只能在场外等待放榜，不许再比。胜者继续打下去，直到被人打败为止；如果全胜不败，那就是冠军了。

顾汝章以长沙市普通武士身份报名参赛，也没有以省国术馆长资格担任评委和场上裁判员。柳森严也报了名，他的几个党徒辛衡若等多人也被允许报名参赛。长沙群众都希望看到柳森严和顾汝章比武，要求他们当众见个高低。但是比赛筹备处及裁判委员会没有专门安排顾柳二人比试的项目，而是要让他们打败别人之后，在场上遭遇。那就是要他们各自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之后，才能冤家路窄，作冠亚军之争的最后决斗。如果有一个中途被人打败，就永远不能相遇，到时，二人的胜负高低也就见分晓了。结果正是这样，柳森严被宁德生打败而遭淘汰，不可能与顾汝章在台上遭遇。但至今还有人宣称柳森严打败了顾汝章，是完全不合历史事实的。

柳森严之败是败得丑态百出、十分可耻，被长沙人同声咒骂的。原来打擂时，顾柳交叉上场。顾汝章接连打败四人。而柳森严打胜两场之后，第三场只打了平手。第四个与柳交手的是湘南武士宁德生。柳森严及其党羽先一天对宁德生作了一番观察、调查，并未弄清宁的底细。第二天场上比赛开始，柳森严两手五指撮拢，作老鹰展翅状，伺机扑向宁德生。宁则双拳紧握，岿然屹立，目光如电。这样互相环伺、默默相对地过了一两分钟。台下观众很不耐烦，有人大喊“柳大哥快攻呀!”“柳侠客动手呀!”吼声未停，宁德生突然一跃而起，一拳就将柳森严打倒了！接着一个大胖子跳出来，骑在柳森严身上挥拳就打。台上台下顿时大乱，有人高喊“宁德生两个打一个呀!”宁德生冷笑不动，只

轻轻说了一句："我哪要两个打一个？我半个就够了！"

治安警察把胖子抓走了。当天晚报消息：何键亲自审问了胖子，查清他叫辛衡若，是柳森严的党羽，诡称他扑到柳森严身上去一是查看柳森严是否中了暗器？二是为柳揉伤。其实是柳森严事先安排他出来捣乱的。柳方党羽宣称宁德生使了暗器，比赛结果无效。何键被迫指示裁判宣布宁柳不分胜负。宁德生一气而去。柳森严当众出丑，原形毕露，只好退出比赛。顾汝章不战而胜，也退出比赛；并且鉴于湖南环境恶劣，恐遭柳的暗算，不久就辞职走了。何键将国术馆先后交给唐徽典、李丽久、陆占三、王润生等人负责，不让柳森严沾边。厚颜无耻的柳森严此后不敢再以"峨眉剑侠"招摇撞骗，但他吃上了中统的特务饭，更凶狠了！

艺人控诉血泪斑斑

柳森严横行长沙廿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强奸和淫乱妇女的罪恶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不到两三年内，柳就有了六个老婆，其中有强奸后霸占过来的良家妇女，有强行占有的红牌妓女，有又做苦工又做老婆的贫苦女子。这一群妇女被他严加控制，如同囚犯。森济医院的女病人，如果富有而又漂亮，他就要假借医疗手段，加以强奸、玷污，不准声张。他还经常到"美西司"、"天乐居"这些著名的大旅社去物色身家自由的红牌妓女，强行奸宿，不予任何代价，甚至还要敲她们的竹杠。长沙小报不敢予以抨击，但常以曲笔作为"风流韵事"加以记述，马上传遍全市，引起咒骂！

1940 年春节前夕，柳森严采用了一连串凶恶残暴的手段，喝倒彩、砸舞台、开枪威胁，强行占有湘剧青年女演员尚星云为"妻"，又在逃难途中乘尚星云大病垂危之际，将她抛弃。抗日战争胜利后，尚星云想回长沙唱戏，柳扬言尚如回长，就要断她的"六根"。

政法机关于 1951 年依法处决柳森严之前，召开了控诉、宣判大会。湘剧女演员尚星云作为受害的典型代表，到会控诉了柳的部分罪恶。尚星云后来写成回忆录，在 1987 年 1 月出版的《湖南文史》第 24 辑发表，读者查阅便知其详。

中统特务　害人无数

柳森严有手枪，是中统特务机关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发的。柳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被甲派（CC）势力吸收为中统特务，到 1939—1940 年之交，便当上了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的行动队（组）长，专门负责抓捕地下共

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的顶头上司，先是省调统室主任陈杏庄，1940 年是陈的后任韩中石。这两个人都是没有骨头的叛徒。陈杏庄解放后为我公安部门控制使用，有立功表现，未予公开镇压。韩中石则于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柳森严因道德败坏，名声太臭，终被中统抛弃，在长沙搁浅。

1939—1940 年间，国民党发动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长沙及湖南其他市县，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反蒋分子，不计其数。长沙的一个临时拘留所（设于第一师范）里，就有数百名！这些人都是柳森严的行动队抓来的。

柳森严不仅疯狂反共，而且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使许多无辜者倾家荡产，人财皆空。柳被处决时，布告上宣布了一条他抓捕共产党员易秀娟的罪行，下面就谈谈这个具体的事例。

易秀娟是长沙榘梨人，省长女校（古稻田二女中）高中毕业。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小学教师为谋生的社会职业。1940 年初因受他人牵连，暴露了党员身份，被柳森严带领小特务将她从榘梨博益小学抓到长沙市关押。当时，易秀娟兄长刚去世不久，寡嫂才生下一个遗腹子未过半岁，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易的母亲已年逾花甲。她们除了两间破房，别无财物。老小三代五口，全靠易秀娟当小学教师的微薄薪水为生。被捕之后，这一家人不得不谋求保释，希望她能在春季开学时回来继续教书，否则全家都要饿死。当时为易秀娟担任铺保的有两家，一为其堂叔所开的"易天宝银号"，制作银器饰物的手工业作坊，一为"袁麓生单车行"。铺保的责任是以身家性命保证被担保者服从政府命令，不得违抗，随传随到，不许自由行动、逃走和隐藏。否则惟保人是问。易出狱后只三四天，柳森严就跟踪而来，命令易秀娟从此"必须接受中统任务，为特务机关工作"；首先交给易一张名单，要她将每个人的地址供出来或者查出来，剋日完成。名单上开的都是共产党员。

易秀娟未予理睬，也不顾铺保了，她连夜逃离榘梨，辗转到了衡阳井头江清潭小学，改名刘克静，受到清潭校长、地下党支部负责人熊子烈（原特科工作站的重要人员）的掩护。柳森严发现易秀娟逃走之后，便每隔三五天去找易天宝老板要人，敲诈勒索，数千元资本两三个月就被诈光，什么都没有了！易老板破产之后，大病不起，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柳森严又转过头来敲诈袁麓生车行。袁麓生只有几部单车，靠出租单车及修理包车为生，本钱很小，实在经不起柳森严的诈索，他只好携带妻儿逃往桂林谋生，以避魔掌。袁妻多病又怀孕在身，经不起长途跋涉之苦，竟在湘桂车上中途流产，几乎死于非命！

易秀娟现为离休干部。袁麓生于解放后参加工作，50 年代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担任医疗器材厂（公司）的党委负责人，退休后现仍健在。他们都是最有力的活的见证！

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于1932年成立后，即不断地、密切地注意着柳森严的活动。抗战前的三四年间笔者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多次有幸瞻仰过“柳大侠”的“丰采”，自然记得很清楚。易秀娟也不会忘记那副凶横的面孔。1949年冬，笔者与易秀娟均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一天忽然发现柳森严还骑着单车在行人中穿行，一派满不在乎的神气，我们就不能不告诉公安厅的同志请他们注意。柳森严这鲨鱼既然搁浅，自然就逃不脱了。

忆我的公公周谷城老人

徐克瑗

去年11月10日，由女儿、女婿送我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回沪治病。一天的劳累加剧了病情的发展，整整一夜不能安眠。第二天晚上突然从电视中传来老父逝世的消息，像一个炸雷震撼了我整个的心灵。父亲的音容笑貌，以及许许多多的往事不断地在脑海里萦回，我这一生再也见不着这位铁骨铮铮、高风亮节的老人了，怎不令人泪下！

回忆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时代，他是那样的坚贞不屈，矗立有如青松不为狂风暴雪所动摇。“文革”末期，“四人帮”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到处拉人为其摇旗呐喊，挥舞着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迫使就范，可是父亲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义凛然。“四人帮”虽恨得牙关作痒也无可奈何。父亲相信群众，相信党，拒绝任何劝他向“四人帮”投降的主张。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也哭过、哀求过，他非常温和的对我说：“不行啊，我要不来两面派，就是再讲好话，言不由衷，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人家也不会相信的，还是不会放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也不会阿谀逢迎，我也不会要两面派，只好默默无言地谅解。

有一次我叔父要我劝他：“现在局势已经稳定了，大家出来凑个热闹岂不更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新事都会得到成功的。”听了这席话、父亲严肃地对我说：“转告你的叔父，凡是历史上不符社会发展的新事，在任何朝代都注定要失败的。”（叔父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授，父亲的得意学生）这些话深深地嵌入我的心，使我也懂得怎样用历史观点来分析问题，分析事物，不误入泥淖。

父亲素来是公私分明毫不含糊的，例如从不利用公家的车子办私事，也不准家人使用他的汽车，他说：“车子是办公用的不能私用，更不能用于兜风游乐。”因此，当他私事外出时宁可叫出租车也不坐公家的车子，这个作风在上海如是，在北京亦复如是。他也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家中儿孙图谋任何福利，一家在“四人帮”残酷的迫害之下，弄得惨不可言，他也不吭一声，当然，也

无法吭声，直至“四人帮”倒台后，我哭着对他说：\“进楷去世了（进楷系周谷城的儿子）。‘四人帮’欺孤虐寡，把大女儿分到东北，二儿子分到西北，小女儿才15岁插队到安徽，独自一人受尽苦难，三儿子留在身边也被整得左右不是人，要我长期忍着生离死别的痛苦，我是多么孤立无援啊！”他也很伤心，无可奈何地说：“你去把他们搞回来吧！任何办法我都不管。”得到了他的首肯，我才敢向各级领导呼吁求援，把孩子们从各地调回来。

当他到中央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按例是要配给警卫班的，但他坚决拒绝说：“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的，门禁森严，使人看了害怕，不肯接近，就失去了代表人民的意义，这种惯例一定要取消，一定要打破。”上级只得按他的意愿派给一个警卫员了事。

父亲治学严谨，对家中儿孙也不例外。他说：“写文章要和讲话一样，要简洁，要条理清楚，要言之有物，不要泛泛而谈，空洞无味。不要摆花架子，形容词一大堆。讲话不简练，噜哩噜苏没有人听，文章不简洁，条理不清，章法不明没人看，你们都要记住这点。”我平常喜欢写点诗、词之类的东西。他饶有兴致地说：“拿给我看看。”于是拿起笔来圈圈点点，“啰！这句要不得，平仄用错了”，“这句应该颠倒过来才对”。对于写得好的批上“这首写得不错”。最后来个总批，句子很好，平仄不合。仔细思量，我今天在文坛能勉强站得住脚，是和父亲悉心地教导分不开的。

感谢他老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们是会永远珍惜的。

先师马宗霍先生二三佚事

胡渐逵

早几年，我在《书屋》上一连读了两篇怀念马雍的文章以后，终于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要操觚写一篇怀念衡阳马宗霍先生（1891—1976）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其一，马宗霍先生是马雍的父亲，儿子既已有人写了两篇怀念文章，焉有不写怀念其父的文章之理！其二，马老是我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时的老师，且又多承亲炙，素所敬仰，故而甚觉有事可写；其三，这些年来因工作关系，我从校勘角度研究的船山（王夫之）学，正是马老精研而勤治者，故而值得一写；其四，几年来竟无人写怀念马老的文章，看来此文已非写不可了。

光阴荏苒，事隔多年，我写马老的什么呢？斟酌再三，我决定写他的二三佚事，因为，虽是佚事，却颇能体现马老的独特个性。

记得还是1956年初秋刚开学不久，其时我正在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五五级学生开始学中国古典文学，当同学们听说《诗经》、《楚辞》由马宗霍先生讲授时，人人都欣喜异常，奔走相告。因为大家都知道，马老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后期的大弟子，是曾任教于多所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而于经学、小学尤有研究，有皇皇大著《中国经学史》、《音韵学通论》、《文学概论》、《文学学发凡》及《说文》系列丛书等，蜚声学界，真是大名鼎鼎，景仰久矣。

马老给我们授课的日子终于盼来。那天，秋阳灿烂，气候宜人。第一节课预备铃刚刚响过，教学中楼一楼的大教室里，同学们早已正襟端坐，恭候马老大驾光临了。上课铃一响，马老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从容稳健地走进教室。他中等偏矮的个子，身材略瘦，年近60，没留须发，清癯矍铄，神采奕奕，穿一件浅灰短绸便衫，显得格外朴素淡雅。他示意大家坐下后，用清晰的衡阳话说：“谢谢各位对我的热情欢迎！经系里决定，你们的《诗经》、《楚辞》由我来教。大家知道，《诗经》、《楚辞》是难懂的，我将力求把它教好，希望你们认真学习。须知，要学好一门功课，首先必须虚心。只有虚心，才会下苦功把

它学好。你们虽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但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于中国古代文学还不知道什么。如若不信，我随便写个最简单的汉字，你们就不认识。”紧接着，只见他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字，继而反问道：“这是什么字？谁认识？”略停片刻，见大家一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地一时都傻了眼，他颇为得意地说：“怎么样？不认识吧！课后去查字典吧！所以，我奉劝大家千万不要骄傲。现在言归正传，讲课……”马老就是这样用当头一棒的方法赠以见面礼而使我们深受教育的。

这堂课下课后，我走到马老面前，恭敬地问道：“马老师，您刚才考我们的那个字不是读 gǔn 么？”马老蓦地睁大似乎有些惊异的眼睛望着我说：“对！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答道：“上下相通。”他又问：“你怎么认识这个字？”我说：“小时候，外公曾教我读过《说文》。”“你外公是谁？”“张恩海先生。”“哦！张老，《说文》他的确很熟。那你刚才为何不当堂作答？”我说：“我不敢以此哗众。”他听我这样一说，即微笑着点点头，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继而用鼓励的口气说：“看来你还不错。虽然这样，你还是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啊！你的基础较好，那么你对中国古代文学就必须比别人理解得更深些。以后多用功吧！”马老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学生的。

当马老正式给我们讲授《诗经》、《楚辞》作品的时候，他再三强调必须背诵原文。他说：“《诗经》、《楚辞》，我的老师（他没说是哪一位）能背注疏，我却只能背原文了，我要求你们必须背我教的这些代表作，这个要求总不算高吧！请注意，我是要检查你们背诵作品的情况的。”马老既然如此要求，于是乎大家就一股劲地读呀、背呀……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当晨曦初露之时，宿舍旁的林荫中，几乎到处是一片“关关雎鸠……”、“帝高阳之苗裔兮……”的琅琅读书声。马老住在河东，只有讲课才过河西来。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们见马老在课堂上既不抽查我们背诵作品，课后也不派助教检查大家背作品的情况，于是，有的同学对背原作也就渐渐地放松了。谁知到期终考试时，马老出的一道试题，竟是《论〈离骚〉的爱国主义思想》，且要求于两小时内闭卷作答。这样一来，能背诵的尚可论述，不能背诵的就只得搔首咬笔而暗自叫苦了。考试结果，全班 156 个同学，竟仅有 5 人打了 5 分（其时以 5 分为满分），我是其中的一个。马老就是用这种考核的方式来检查学生背诵原作的情况的。

马老讲课很能吸引学生，他讲《诗经》、《楚辞》，都是用自己编写的讲义，他诠释作品意蕴，虽多采前人研究成果，但疏通证明，却不囿陈说。讲课得意时，往往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甚至置讲义于不顾而阐发己意，而对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等诸家异说，则时以实证指陈其失。听马老讲课，简直可说是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

马老其时住在长沙市河东北门余家塘一座陈设简朴的旧式房子里，离我家住地晴佳巷很近，先父有猷先生与他过从甚密。每当我追随先父去马老处请益时，他总是热情接待，耐心指教，其岂弟之德，至今仍使我难忘。他曾恳切地对先父说：“令郎聪颖好学，成绩可嘉，但今后仍须继续努力，决不能以此自满。”先父连连点头称是。今天回忆起来，其谆谆教诲之音仿佛犹萦耳际，真使我终生受益，永志难忘。我因能牢记马老的教诲，并能按他的要求背诵其所授的《诗经》、《楚辞》，又由此而对各篇作品认真钻研，故后来任编辑时，审读新整理的魏源《诗古微》及王夫之研究《诗经》、《楚辞》的五种学术专著，均大受裨益。这怎能不使我衷心感激马老的教诲之恩呢？

1957 年下学期开学不久，马老为比我们低一年级的五六级学生讲授《诗经》、《楚辞》。其时，我国各大专院校刮起了一股学生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狂风，有几个无知的学生写了几张批马老的大字报。马老过河授课，得知此事，连大字报也未看，即到中文系办公室写了一张“吾去也”的三字便条，签上姓名时间，匆匆拂袖而去。等到中文系负责人见到马老的留言条向院领导汇报并赶往马老家中时，他已应聘去北京中华书局任编审去了。其后他一直住在北京，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6 年下半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曾纷纷传闻北京将有地震，一时弄得北京市民惶恐不安。其时马老已年届八十有五，已是高龄衰体，因避地震而搭篷宿于户外，不慎偶感风寒，加之，清早起来练八段锦，踩在废弃的空酒瓶上，摔了一跤，卧病不起，一代宗师竟因此而溘然长逝，痛哉！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一次我偶然在一本书法论著上看到一位书法家盛赞马老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大著《书林藻鉴》，我才知道马老是一位书法名家，难怪他的板书那样挥笔自如，飘逸洒脱。这时我才追悔当年未曾请马老赐以手迹留作纪念，此诚憾事，惜乎！

缅怀先父吕振羽先生

吕　坚

吕振羽，1900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县溪田山村农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和开拓者。1926年他于湖南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参加北伐军。30年代初在北平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是著名的红色教授。1935年中共北方局委任他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卢沟桥事变后，受党指派回湘创办并负责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旋又创办有“西南抗大”之称的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负责主持全院工作。塘院遭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封闭后，吕振羽奉周恩来电召赴渝，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理论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后曾在复旦大学任教。皖南事变后赴苏北新四军军部，曾任华中局编审委员会委员，并在华中局高级党校任教。1942年随刘少奇自华中行军万里回到延安，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学术秘书。在延安还曾任中央马列研究院特别研究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热西地委副书记、解放区冀察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主持分会工作）、安东省委常委（主持城市工作）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共中央历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顾问。先后任过大连大学（今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0年因心脏病突发于北京逝世。

吕老去世后，夫人江明同志秉承吕老生前一贯廉洁奉公精神，把夫妇俩数十年来节衣缩食从全国各地精心选购的25000余册珍贵的古今藏书及北京私宅19间（这是一座古朴幽雅的四合院）全部无偿捐献给吉林大学，以繁荣发展我国的高教事业。吉林大学为弘扬吕老夫妇的无私奉献精神，除在长春校园内设立吕振羽藏书纪念室、在文科设立吕振羽奖学金外，并决定在北京吕老故居设立吕振羽纪念室，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同意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但

在北京某些部门进行的“旧城改造”中，这座吕老在此生活战斗、呕心著述达数十年之久的故居被拆建，尽管有不少有识之士、学界硕彦力主保护，但最终未能如愿，至今犹为之痛惜。新建的吕振羽纪念室设置在故居拆除后改建的一所楼房里，位于中南海府右街西侧。1993年8月30日吉林大学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吕振羽纪念室揭幕式和吕振羽史学研讨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学术界知名人士张爱萍、胡绳、段君毅、张致祥、王国权、史立德、王忍之、李锐、李普、黄葳、廖盖隆、王子野、刘大年、吴泽等近百人出席。著名军事家、原中顾委常委张爱萍老将军作了即席发言，他深情回顾了自抗战时期在华中战场与吕振羽同志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情及其后数十年间向吕老探求史学亲聆教益的难忘历史。他说，建立这个纪念室很好，我们今后一定要很好地学习并继承吕振羽同志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大力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教育科研事业。著名历史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对吕老在革命事业和史学理论研究工作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吕振羽同志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是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的，解决了中国革命斗争急需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吕老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也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和内容。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代表国家教委对吕振羽纪念室揭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吕振羽同志自30年代起就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长期从事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吕老、江明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高尚精神正是现今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吕振羽纪念室应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

吕振羽纪念室揭幕以来，已接待过全国各地来访人士。黑色大理石上金光闪闪，由张爱萍老将军题写的吕振羽纪念室名，书法苍劲豪迈。吕振羽纪念室第一部分是吕老生平事迹陈列。前言楷书严整，高度概括了吕老一生，着重指出他“为新中国的学术和文教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勇于探索，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其高风亮节和治学精神，永远垂范后人”。第一层室内陈列着吕老自20年代起在湖南大学求学直到1980年病逝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其中有刘少奇同志于1947年批准吕振羽准备去湘西南开辟工作的亲笔指示墨迹照片。展柜中，分别陈列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吕老主要著作及手稿。吕老一生，共出版有学术专著17种、史学论文集5种及其他史学论著计500万言（所编各种大学讲义、讲稿、报告、讲话等未计入）。陈列中有30年代初北平出版的《中日问题批判》（孤本复印）、《最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上海出版的《殷周朝代的中国社会》，40年代延安出

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是吕老著作中的早期珍贵版本，还有不同时期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等，生动反映出这位史学大师漫长崎岖的治史道路和著述宏富的一个侧面。陈列中还有我党创始人之一李达、著名学者范文澜、田汉、翦伯赞、孙冶方、华岗、王学文、胡风、尚钺等和老战友张爱萍等于不同时期给吕振羽的书信。范文澜等人书信，虽多属切磋学术，也涉及个人生活、思想感情，如实反映了当年这些文化战士风雨同舟的战斗生活和情谊。张爱萍的书信写于1949年我大军渡江之前，其中关于全部战略部署和渡江战役的预见深具远见卓识。上述信件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和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历经四五十年的风雨之后，片羽犹存，弥足珍贵。有的专柜陈列着吕老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黄克诚、薄一波、江华等送献花圈和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照片和名册；学术界十余年研究吕振羽史学的部分成果，如刘茂林、叶桂生著《吕振羽评传》、朱政惠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两部专著，在全国各报刊上陆续发表的有关回忆、研究论文、诗词近百篇。第二室展柜陈列着吕老的有关证件，如吕老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证等。另一专柜陈列着吕老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如在解放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军用皮包、建国后一直使用的公文包、出狱时张爱萍同志赠送的棉衣和手杖。还悬挂有宋任穷、张爱萍、周谷城、曹瑛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为纪念吕老的题词手迹。著名史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周谷城在题诗中称：

> 吕振羽先生，学术界先锋。
> 治学以致用，教学为人民。
> 著作既丰富，说理更精深。
> 方兴正未艾，岂期大寿终！
> 后起幸有秀，庆得接班人。
> 先生之功绩，发展当无穷。
> 忝居旧友列，俚语献衷心。

总之，通过生平事迹展览，集中表现了吕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尤其是展柜里还陈列有吕老晚年蒙冤失去自由时写在旧报纸上的诗词、论文手迹及亲手缝补的衣袜等。令人回想到那段被扭曲的历史，每每感慨万分，徘徊不忍离去。

展室第二部分是吕老书房和卧室陈列。具体而微，一如吕老生前原状布置，朴素而庄重。卧室中吕老生前使用长达数十年的旧木床，上设简旧而整洁的卧具，余则与书房无异。环壁而立的数十个硬木书柜、樟木书箱陈列着吕老

夫妇收藏的上万册古今中外图书，可谓琳琅满目。建国以来，吕老夫妇精心收集的大量藏书，历经“文革”尚存25000余册，其中颇多珍善本。有元、明、清的刻本、抄本、稿本及金石拓本等。线装书计有17000余册，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古籍，其中有大量稗史、杂记、游记、随笔、日记和地方志等古籍及甲骨金石、考古、民俗、社会调查等图书文献。在藏书中很多都有吕老生前阅览时留下的批点题跋，反映了吕老博览群书、嗜学如命的性格和治学精神，也是今后学术界研究吕老史学思想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吕老全部藏书中的大部分已在长春吉林大学图书馆辟专室陈列。这些珍贵的图书文献，已在吉林大学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来校访问的国内外学者得以浏览。国家领导人李鹏、李铁映等到吉林大学视察工作时，也曾到吕老藏书纪念室参观并留言留影。现存北京吕振羽纪念室书房的主要有各个时期版本的吕老全部著作；明清善本中《止斋文集》、《唐柳先生集》、《江魏诗纪》、《龙川先生集》、嘉靖袁氏嘉趣堂刻《文选》、乾隆武英殿本《西清古鉴》，以及《四部丛刊》、《九道》甲骨金石等；精平装图书包括有马列经典著作、近现代文、史、哲书籍及各种期刊杂志等。书房南侧临窗陈放着吕老生前常和江明同志对坐工作的大书桌，桌上放着吕老的文稿、眼镜、放大镜、端砚、笔墨等。当吕老的老战友和学术界同道走进这书房之中，仿佛又像过去到了吕老家中，倾听他浓重的邵阳乡音，在一起促膝长谈的情景。

近代以来，湖湘革新志士、学术硕彦可谓层见辈出，吕振羽是其群体中优秀代表之一。钟灵毓秀的湖湘山川和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人民，孕育了吕振羽倔强求真的气质、深邃多思的头脑。究其成长环境与历程，离不开湖湘文化的熏陶、革命风雨的洗礼，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武装。由于公务繁忙等原因，吕振羽建国后虽只回过家乡两次，但他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在他的遗诗中随处可见；而家乡的父老乡亲始终没有忘记他。“文革”浩劫中，邵阳县档案馆想方设法保存了吕老回乡的珍贵照片。吕老亲手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遗址列入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夫人江明同志捐款给吕老家乡，金秤市建立了邵阳县第一个农村图书馆，家乡人民为纪念吕老夫妇，特命名为“振羽图书馆”。今年10月，将在邵阳市举行吕振羽学术研讨会，届时来自祖国各地学者济济一堂，将就吕振羽生平事迹、历史地位，特别是吕振羽爱国主义思想、吕振羽对创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贡献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对今后吕振羽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对青年人求益的影响将拭目可待。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北京吕振羽纪念室也由衷欢迎今后三湘学术界人士和朋友、乡亲到京时来此参观访问。

深切怀念五叔钱歌川教授

［美］钱去非

钱歌川教授1903年5月14日生于芷江，1990年10月13日卒于美国纽约。思往事，忆当年，无限悲伤。

五叔原名慕祖，字次逖，后来自己更名歌川，以笔名味橄为字，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平生勤于治学，著作等身，是名闻中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终年88岁。

我父居长，受到五叔的尊敬。1989年3月五叔寄回“怀念无咎兄长”一文写道：“森哥比我大17岁，视之如父亲一般，对我的教育方针和决策，都是他一手所指导。他攻读诗古文辞，斐然有成，后以国学大师名世。从那以后，也就以教育为终身事业，毕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所以也算是湖南的一位老教育家。”后来五叔也从事教育工作，到70岁才下讲坛，可能是受我父的影响。

五叔比我大10岁，他的智慧过人，不仅精通中西文学，还对书画、篆刻、音乐、戏曲都有研究，刻了一颗“钱后人”图章送我父，可惜“文革”中抄失；赐我的“美意延年”横幅，今尚保存。他多才多艺，我很钦佩。20世纪30年代初我求学上海，叔婶分别在中华书局及教育局工作，周末去赫德路寓所得以亲近，两老对我的照拂和教诲是难忘的。五叔曾教导我说：“如中文无根底，外文也是学不好的。”我牢记在心，并以之教导我的子女。“一·二八事件”发生，我辞别叔婶回长沙转学湖南大学，长时期隔绝，直到中美建交后，两老首次从美国归来，才得重相聚。

五叔一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

第一，身居异域几十年，热爱祖国，关怀家乡，始终不渝，是一位具有拳拳故国情的爱国者。

五叔17岁就离开湖南，漂流在外，很少再回，在日本、英国、新加坡计20年，退休侨居美国，瞬又18载。有的人一心想做美籍华人，但五叔一直不入美籍，仍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叔婶都在日本留学，那时被日本人看不起而受欺侮。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叔任中国驻日代表团主任秘书，进驻日本，他当时不胜感慨地说：“平生扬眉吐气，莫过于此时。”

1938年五叔还在英国，欧洲战云已弥漫，上海也沦陷。他决计回到战火中的祖国尽匹夫之责，经越南入昆明而去重庆。郁达夫告知国内时有被日机轰炸危险，嘱其加倍小心。抵达重庆，又从潘家洵、施蛰存、黄公度等处了解一些情况。四川大学之聘未就，被武汉大学截留任教，与李伦勉、朱光潜交往甚密。期满即去英国新闻处及美国翻译中心，从事中日英文翻译工作，并主编英国的《世说》周刊，与两个盟国配合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他在渝还创办《中华英语半月刊》与《新中华杂志》，又出版《巴山随笔》等散文集，再利用闲暇在东吴、沪江、元江联合大学教课，其精力之充沛可知。

中美建交后，五叔在纽约参加一次国庆纪念盛会，报纸发表新闻及参与者姓名，翌日即接到恐吓信。他不畏惧，仍偕五婶首次归国观光探亲。到京沪苏杭等地，见祖国的伟大成就和亲友们都健适，既高兴也欣慰，返美将其所见所闻写了一本《祖国的召唤》出版，其中“会亲记”谈到与我及其他亲属会晤情况。我见两老仍健康如昔，而我则已两鬓斑白。在五婶病逝纽约之后，五叔每四年仍归国一次，每次都写报道和观感，或出书或写文在报刊发表，起到相当的宣传作用。而且每次都率领在台湾成长的两妹及在美出生的侄辈同来，其用意使他们加深对祖国的认识，不忘是炎黄子孙，虽然人多费用大，五叔不惜。五叔原安排1990年回湖南，不料1989年春节在纽约路途跌倒，伤面部断牙三颗，从此体质日衰，不便远行，再次回国之愿未能实现，我也无缘重见慈容。

当叶剑英委员长生前对祖国统一提出的九点意见在报上发表后，五叔即来函索阅。我寄去多份，他除转送在美亲友，还托妥人带交台大教授凌碧如舅，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全部接受，使祖国能早日统一。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发生，国外谣传纷起，五叔为了祖国的安定和统一，多次来信询问，我也立即报告情况并剪附报纸，使他安下心来，从而向各方解说，澄清谣传。五叔对桑梓的文教事业同样关注，1986年省政协等单位举办首届海内外老年人文艺作品展览会，我寄去应征专函，他即寄回亲笔书写新作古诗条幅送展。五叔的著作以前大都在国外出版，有的国内也曾翻印；后来能在国内出书，我曾介绍在北京等地发行。有次写的散文集命名《楚云沧海集》，因自己是湖南人，交代一定要在湖南出版。经我征得湖南人民出版社同意接受，共在湖南出书三本。五叔虽未在湖南大学读书和教书，但对湖南这所高等学府有所认识，并捐赠8000美元给湖大作为奖学基金，以每年美金利息奖励优秀学生。此外还有两件小事，也可说明五叔是爱国的，他的教书和稿费储蓄都存入中国银行，回国所带照相机仍是原有的上海产品。

第二，一生未离书本，读书到老，教书到老，写书到老，自命为奉行“三书主义者”。五叔对此已完全实行。在读书方面，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学诗词从这时开始；随之从私塾门下学，奉袁逸甸、龚佛斋、徐桢立为师，学文学、书画、雕刻，然后又从东洋学到西洋。他的书房堆满了书，到88岁入医院前还未丢书，真是学而不厌。在教书方面，大陆教过书，台湾教过书，新加坡也教过书，教到70岁才退下，真是诲人不倦。在写书方面，更是笔耕未停，中英文著作达百十余种，出版的小册子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不可数计，由此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退休后侨居纽约宁娜妹处，这时已成为自由人，仍不愿闲居，专事著作，常寄回文章在各处发表。他的英文著作早在香港出版英文丛书；25种散文单行本汇编为《钱歌川文集》，精装四巨册计300万字，1989年由辽宁大学出版，向海内外发行，了却他一大心愿，也给予无限的欣慰。文集的出版是湖大同学潘力生一手促成。随后潘又购置百部赠送我们亲属及各大学图书馆。潘力生及夫人成应求均湖大同学，居住纽约，经我介绍而相识，同是湖南同乡，又是年过古稀的文人。他们奉五叔为师，过从甚密。五叔逝世，潘的挽联为：“而今问字无师表；幸有鸿文著典型。”又代湖南同乡会所作挽联为：“世事无常，兰言犹在耳；音容何处，楚些痛招魂。”由此可见与五叔交谊之深。还有在美的湖大同学姜逸樵、尹梦龙、罗武子等，或去医院探望，或来函悼唁，或寄美国各方报道资料，均应感谢。

五叔每年寿诞，在美的弟妹及侄辈均聚会祝贺。他86岁时，我请同学曾玉衡用筷子书写贺诗一首祝寿，五叔很赏识，并发表一篇“论筷子”的文章。五叔87岁和88岁时我又寄奉一幅牡丹图和大寿字中堂祝贺，都是湖南著名书画家作品，五叔均甚喜爱。他秉性真纯，出污泥而不染，一生荣为中国人，更值得我们后人很好学习。

忆沈从文师

谭　蔚

回忆总是充满了人生的五味，有时还可窥见斑驳绚丽的人间色彩。从圣人学者到愚夫愚妇，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恐怕概不能例外。现在，沈师的墓木已拱，沈师母三姑却还矍铄健在，所以每当信手翻及那些著作或墨迹时，许多值得咀嚼的往事便又浮上心来。

关于沈师和三姑，从现在尚执教于天津大学的三姑内侄女以瑛在50多年前所告诉我的，应该不完全是传说。说的是当年中国公学有名的校花“黑凤”张兆和，有一天突然把一叠厚厚的信笺交给了校长胡适。胡博士一看，原来全都是任教的沈从文给她的。信中当然是充满了说不尽的仰慕和对爱的渴望。开放的胡适当时非常器重沈从文，于是这场牵线搭桥的喜剧便命定似的由胡适担任主角了，这便是沈师和三姑这场姻缘的始末。青年两情绵绵，从来是不足为三人道。有一次当沈师午睡的时候，我坐在沈师的书房里，三姑进来了，我故意问她，当年沈师在青岛大学的时候，每到黄昏，海滩上便画着一只大眼睛，底下总是他留下的那五个大字“你认识我吗？”我说这是不是沈师在追忆中重写你们的罗曼史？三姑一笑：“可见连你也没有看懂沈先生的书。”这个时候，沈师和三姑的婚姻实际已步入了“钻石婚”阶段。

又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询问沈师：“你平日的文章三姑都看过没有？”沈师笑指着面前的三姑说：“我的文章，许多的青年都爱读，就是我们的三姐最不喜欢。”然后两手合十放在胸前，“三姐呀，她是我们家里的‘黑’林斯基”。我一下就悟到了，原来沈先生的文章肯定三姑都要过目的，不然怎会把她与批评家“别林斯基”并提呢？现在想来，一对爱侣，经达半个多世纪的偕行，从“黑凤”变化到“黑林斯基”，回首这段人生的旅程，当有多少的花草果实，但也有多少的风雨坎坷啊！

我第一次借住在沈师家里，正是民族危亡，多灾多难的抗日岁月。沈师执教西南联大，而家却住在海子旁边的桃园，得乘滇越铁路的小型火车摇摇摆摆经大半个小时的路程。那窄狭的小屋，一间是两夫妇卧室，一间是龙龙、虎虎

的卧室，还一间是四壁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巢，中间一张小行军床，我歇在那里。每天晚上，沈师总要送来一盒火柴，一枝蜡烛，说是“你如果半夜醒来要看书，你就随便看吧。我是十多年来就这么一个坏习惯，夜半一醒就睡不着，我就看书”。生活既非常艰难，有时还薪水不继，沈师还真的带着龙龙、虎虎到外面去拾落叶枯枝，以红薯大米为炊，大家一面美美地吃着，一面自得其乐地说：“这是维他命饭。”在三姑的眉宇之间，从没有缺少过微笑。

沈师是一个有至情的人，他的至情不但表现在琴瑟之好，还表现在棠棣之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遭日寇轰炸，沈师的妹妹身为图书馆的职员，虽得幸免于难，但从此精神分裂，不理人事。医疗不足，只好由沈师来亲自进行精神治疗。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三，沈师抱着那一蓝布包袱的讲义到联大去上小说史课，晚上歇宿在联大那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几乎是通宵达旦陪伴着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妹妹。从现实生活到各种宗教神话，从人生的情理到各种世事的变化，启迪她开导她，引导她进入人生的妙悟。随着岁月的变迁，她终于康复而成了一个生活完全自理，文静而理智的常人。

沈师的记忆力特强。凡经他过目的文章连同作文的人，虽数十年之后，重提起来依然如昨日事。1982 年，我去京城，在崇文门那幢公寓楼上，他问我到天津看以瑛没有，我不觉一惊。40 年前，他在昆明介绍我认识这位大革命时期烈士的女儿，40 年过去了，他居然还那么清晰地记忆着。第二天一早我真的去了天津，以瑛告诉我：“三姑爹（沈师）正准备给我父亲写传哩！”他所准备的也就是他的记忆。从天津返回，临出北京，沈师问我还到哪里游历游历没有，我说夏天已小住了一回井冈。沈师立刻告诉我 1960 年他也上了井冈。并掣纸挥毫，录下了他当时缺少文房四宝而只用了一支几毛钱一管的毛笔，用一只碗底当端砚即兴写成的井冈诗。落款的时候，三姑在旁还喝了一声：“别又把人家姓名写错了呀！”“他现在呀，老把人家姓名记错了！”那亲昵怜爱之态可掬。其实沈师的记忆并没衰退半点，他那手常常自诩“就是不肯卖字”的妩美的章草也一如当年的纯正而有骨气。150 字的长歌一口气默出，怎能说记忆不强！

沈师的至情至性不但表现在活生生的人事上，而且还几乎全面地表现在几十个小说集子中所有的主人翁身上，从《边城》的翠翠到《湘西行》桃源路上那“狗入的”“带水獭皮帽子的商人”之类的人身上，字里行间无不洒满了他的感情。在同辈的作家中我听得较多的是对巴金、田汉的友好的称许。据说曾经有人推选沈师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虽没成功，但我想，即令舍掉了 1939 年之后到 1946 年之间某些被人认为不合时宜的评论和杂文，单以他这一些充满乡土气息和朴质粗犷的而又清莹明秀的小说随笔，也足以与世界每一个著名

传世的作家相媲美了。

沈师不是佛教徒，但深深表现出那种悲天悯人的气质；他没有丝毫两晋名士的派头，但那愤世嫉俗之情，有时又几乎与嵇康、阮籍有酷似的内涵。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到我手上只剩下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的批判》，他微笑着谈了很久有关德国的哲人，我当时怀疑他对尼采、叔本华不免带点儿欣赏味。果然，不久我到宿舍里去，他正午睡起来，顺手递给我他的一篇刚刚问世的《英雄崇拜与崇拜英雄》，接着便让我翻阅了几本小小的《战国策》。那正是鼓吹霸力、天才、领袖的陈铨、施蛰存先生之流主编的。我只想，先生不仅是一个有至情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有至性的人。也就是在那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读到了他的油墨未干的七色魇中的《碌魇》。在那一段时间，我总片面地设想，沈师不服膺《四书》、《五经》，然而他那种精神虽不是孔子讲的“衽金甲，死而不变”的北方之强，但却确有那种“温柔敦厚，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者的风度。也就是《中庸》里特别称赞的“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派吧！是的，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个孔老二说的“择善而固执之”者。在昆明的“一二一事件”中，开始有些过激的学生居然把个别的静观教授骂为“衣冠禽兽”，大喊什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后大批教授拍案而起。所以一时之间，另一种声音，什么“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等等可怕的帽子满园飞起，可他们依然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就连田汉先生也作出了对四烈士的悼诗：“素车白马吊来迟，且向刀丛觅小诗。冷问萧街民亦泪，秋风碧浪海频嘶……”当时四烈士中的潘琰是以瑛的同学，以瑛嘱我代她作两句挽语，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几句胡诌的话去见沈师，刚念到上半截“风雨同窗，看来都成了残烟往事，早慕范希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到如今，万古精神应并乾坤不朽……”沈师轻轻地笑了，从他的表情上我隐隐觉得带一点儿静观的寒气，我便打住了。但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鲁迅所点出过的“文学青年”的怀疑病。不过我始终觉得沈师确是一个有至情至性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有过多次机会改善他那经别人几度争执才得到的副部级的享受，他并未因此而腾云驾雾。他两次和我提到当年那“固一世之雌也”的女皇屡屡邀他入彀，但沈师只是说：“我要搞我的研究，写我的文章，哪有工夫跟他们去争名夺利呢？”因而始终守志不移。

我最后一次在北京去见他时，带给他一点自制的菌油，他约我星期四去吃晚饭，桌上只有他、三姑和我三个人，他点着中间一碗菜说：“这是三姐今天亲手给你做的湖南口味红烧牛肉。”接着又说：“你那天带来的菌油真好，我多年没吃到过了。”我当时一惊，可惜就那么一小罐，居然得到沈师这样的欣赏。同时我立刻记起，1955 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初回湖南，住在当时的交

际处，即今天的湘江宾馆。清谈到快晚上9点钟，他突然邀我说："我们到外边吃甜酒冲蛋去"。沈师为东，这一毛五分钱一碗的甜酒冲蛋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当时他还笑嘻嘻地说："田汉每次回湖南来也是要吃甜酒冲蛋的。"美不美，乡中水，我当时真一下想起了见秋风而思莼鲈的张季鹰。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倒真愿永远做一个怀土的小人。沈师就常说："有时候假君子还不如真小人可爱。"

古滇的月应该还是那么高，那么亮，滇池的水应该还是那么的清，那么的净，相映着凤凰城下沈师墓地的霁月光风，我想起了《诗经》里的"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我很想借用范仲淹总结严子陵一生的话说一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笔挟风霜的严怪愚

周文从

1980年，我在兰州参加一个新闻学术讨论会，有一天和钱辛波谈到严怪愚。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他说为了"抢救"新闻史资料，有些人要抓紧采访他们，或是请他们写些回忆录，比如长沙的严怪愚。

严怪愚是邵阳人，20世纪30年代湖南新闻界的老将，1984年谢世。解放后，他任省农民报《大众报》副社长，不久，转入出版界、教育界，1958年错划为"右派"。新闻界没有忘记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新闻学会与记者协会请他当顾问。他在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后，健康情况已经很坏，不久就重病缠身，没有可能写出多少新闻史料，《湘江文学》发表过他的少量记者生活回忆片断。我留有他几首怀念范长江和高天的旧体诗，这是没有发表过的手稿，看得出写字已经相当费力。他十分敬佩范长江。抗战初期，他参加青年记者学会，是长江介绍，以后又同在徐州前线采访。1939年春，他最先在邵阳《力报》捅出汪精卫和敌人签订卖国条约的消息，也是长江在重庆向他提供的材料，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严严实实地捂着这件事。

严怪愚谢世后，省内外、香港、大洋彼岸，都有人写文章悼念他。现在很多人谈起他来，各人心中的"剪影"并不一样，有人说他潇洒、超脱、浪漫气质很重，早年流传于湖南大学的诗，"一路轻烟归去也，麓山到处有麻纱"可以作证；有人说他诙谐，妙语如珠；有人说他一身傲骨，粪土人间万户侯；有人说他"乐天"，居陋巷陋室，不改其乐，他在长沙通泰街的居室，即是民国"封疆大吏"鲁涤平当年停放轿子的杂屋；有人说他爱在浪尖上翻滚，为办报坐牢，坐了牢又办报。有个故事说来很有趣：抗战期间，邵阳有人在雪峰山遇匪，匪徒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结结巴巴地说，他去找一个办报的严怪愚，"盗亦有道"，匪徒把他放了。这"匪徒"大约是严怪愚的读者吧，因为严怪愚在30年代，写过不少反映底层穷苦人民生活的特写，其中包括贩夫走卒、拖黄包车的、流浪汉子……笔墨中饱含着深情。

他的朋友确实不少，从学者、教授、名记者、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知名度

甚高的民主人士到靠拾破烂维持艰难生计的倒霉文人，那是一条很有观赏、探索价值的“风景线”。他谢世时，全国正在大力落实“拨乱反正”政策，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堪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出主持单位的意外。他的讣告上并无任何富有吸引力的闪光头衔，连职称都无从安上。他在当年错划右派之后，曾经很严肃、很迷惘地问我：“我明白，我是真正落后于时代了，说是不合时宜显然太轻。但是，我没有一句说得对头的话吗？有些思路，是否也有属于‘超前’的呢？”我望着他，怎么回答？他不是说，我跟他是“同榜进士”吗？他去世前一年，有时老僧入定似的木然坐在窗前，陷入沉思，平时给人诙谐、浪漫、几分超脱、满不在乎的神情在他脸上找不出一点影子来了。有一次，他把玩着一支老牌黑色钢笔，说：“委屈它了，我用它写过多少万字的检讨与交代，我要不要另买一支金笔，让这支笔永世万代退休？”

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新闻界，一直热爱共产党。他一生最得意的，是去南京梅园新村采访周恩来，尤其是中共上海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时，他斗胆跑去送行。他在湖南新闻界第一件影响大的事，是与“壶公”持续近一个月的笔战。那是1936年11月，鲁迅逝世后，他在长沙《力报》连续出了几期纪念特刊，而省政府的《国民日报》则由总编辑罗心冰（笔名壶公）出面，写了一篇杂文，把鲁迅的遗嘱与段琪瑞的遗嘱对比，说鲁迅是如何平凡、渺小，而段却“功在民国”，何等伟大。严怪愚立即回敬一篇，说他最佩服鲁迅的没有媚骨。壶公张口结舌，从正面说不过严怪愚。严在文章中说壶公是乞乞科夫，罗也弄不清乞乞科夫出自何典？于是祭起红帽子，说严怪愚是领卢布吃黑面包的，严怪愚则直斥他为告密者。这样，尽管是在反共与复古空气最浓的长沙，报官罗心冰竟一败涂地。

1939年，在捅出汪精卫叛国新闻之后，严怪愚又发表《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文，借用韩愈诗句，揭穿桂系自吹广西为“模范省”的内幕，这使白崇禧极为恼怒。十年之后，白崇禧兵败长沙时，下车只一阵子，就问严怪愚这人何在？

解放前，严怪愚是湖南几家进步报纸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如《力报》、《中国晨报》等。解放前夕，他是长沙《实践晚报》社长，这家报纸是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新闻工作者创办的，曾两度被查封。第一次封而复启，是蒋介石宣告“退隐”溪口，李宗仁为表现“和谈诚意”而启封的全国六家报刊之一，复刊不久又被查封。1981年，湖南日报新闻研究室的同志，在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发现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内政部命令湖南省政府彻查《实践晚报》发行人有无匪嫌具报”的电令存档。我把这件事告诉严怪愚，他说：“没想到，他们这样‘关心’我。”

严怪愚在新闻界是我的前辈，也是几十年的朋友。近几年，我总想写点文字纪念他，提笔就泫然惆怅，不知道怎么写。他的学友易祖洛，曾经赠他一副对联：“笔挟风霜名记者；胸无城府老书生。”大体概括了他的一生。

忆故友罗暟岚教授

［美］柳无忌

罗暟岚，湖南湘潭人，生于 1906 年，即旧历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学名正晫，笔名暟岚，后以暟岚闻名中国教育界与文坛。其他笔名甚多，如岂凤、山风大郎、山风、石敢当、石君、项雨、溜子、鲜苔、飞来客等。在乡肄业小学、中学。1922 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读中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1926 年夏，奉父母之命，返家成婚。正值国民党自粤兴师北伐，大江南北沦为战区，交通阻隔，遂辍学留家乡一年，目睹当时地方上骚扰不宁之情况，笔之于小说创作。翌岁，返清华复学，续读高等科一年，大学一年，于 1929 年毕业，赴美留学。

前在校时，暟岚对文学有兴趣，参加清华文学社。社员年级较高者有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琇（一樵）、孙铭传（大雨）、谢文炳、林同济；前后同时者有柳无忌、陈麟瑞（林率）、陈铨、陈嘉、水天同、罗懋德（念生）；新制（1925 年清华改制为大学）学生有李健吾、李维建、曹葆华等，人才济济，而小说创作则暟岚独树一帜焉。1927 年蛰居湘潭家中，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苦果》，抵清华后继续撰写，翌年完成，得 20 万字。教授吴宓（雨僧）、毕树棠（图书馆馆员）、朱自清、俞平伯或为审阅文稿，或为作序、题签。亦曾与鲁迅通函，寄去短篇小说《中山装》，后者盛称其文字“辛辣之处”，但无法为之在所编《语丝》刊出。此时撰短篇小说问世，有《疯婆子》一篇，与《招姐》、《六月里的杜鹃》二集，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矣。

留美五年，专修英国文学，得斯坦福大学学士学位（1931），继而选读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课程，皆美国闻名之最高学府。1931 夏至加州去纽约，与罗念生、陈麟瑞、柳无忌创办《文学杂志》，推罗念生任编辑。时柳无忌已毕业耶鲁大学，将去欧洲，即请其父柳亚子在上海介绍开华书局出版。此为二罗一柳（陈麟瑞后为柳之妹婿）文字合作之开始。《文学杂志》共出四期，发表暟岚之作品多篇。1934 年初，在纽约闻朱湘投长江自杀噩耗，撰文追悼，寄柳无忌于其所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登出。同年放弃硕士学位，出

游欧洲。

是年夏，自美学成归国，柳无忌邀去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任教，同事三年，在回忆中二人均以此为一生最美满之时期。南开英文系在敌人炮火威胁中（日军驻南大附近之海光寺兵营）成长，至 1937 年为敌人炮火所摧残。此三年中，系务蒸蒸日上，柳、罗外有司徒月兰、梁宗岱（1936 年来系）、刘荣思、曹鸿昭诸人，教员阵营齐整。师生组织人生与文学社，出版《人生与文学》期刊，印行丛书。罗念生时在北平任教，亦加入此文学社团，重温二罗一柳之友谊。暟岚旧作《苦果》于 1934 年 11 月—1935 年 3 月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连载，颇受读者欢迎，轰动当时文坛；1935 年 6 月作为《人生与文学丛书》印出，畅销全国各地，以其盈余弥补另一部丛书《朱湘书信集》（罗念生编）之亏空。抗战前夕，暟岚所撰第三册短篇小说集《红灯笼》出版。在南开教学时循循善诱，师生感情融洽，经时间之考验而益深厚。半世纪后，王慧敏为其昔日教授逝世七周年撰文纪念，题曰：《我愿永远做罗暟岚老师的好学生》。

卢沟桥事变发生（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战争开始，南开大学首遭海光寺敌军破坏。暑假中师生咸离校，暟岚亦挈眷返湘，幸免于难，惟书籍衣物则全部损失矣。南大与北大、清华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校本部在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设南岳，罗、柳偕往，相聚 80 日，握手道别，以后各在天之一涯，未再重晤，不通音讯者亦 40 载（1939—1979）。西南联合大学（临时大学改组）在昆明开学，暟岚留湘未往，去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一年，南岳湖南工业专科学校任教三年。日军侵占湖南，狼狈逃难，仅以身免。抗战胜利，湖南大学在长沙岳麓山复原，暟岚返校在外语系授课。1953 年院系调整，留新成立之湖南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在中文、历史、教育三系讲授世界文学课，自称“单刀匹马，同时唱三台戏”。1957 年恢复外语系，教高年级阅读、翻译等课，而主要仍为英美文学，凡 20 余年，以至退休（1977）。复六载，以 78 岁高龄卒于 1983 年 3 月 27 日。

柳无忌曰：我友罗暟岚教授一生，前半世与后半世迥然不同，而八年抗战实为二者之分界线。前者届少壮之年，生活多兴趣，前途有远景，不论在读书、讲学、创作方面，精力充沛，咸以全力为之，成绩卓著。所撰短篇小说三集，长篇《苦果》一部，均于此时问世，蜚声文坛。此亦长留在我记忆中之清华同学、南开同事、南岳同居一室之故人罗暟岚也。后自中年跨入暮年，虽仍能守住教学岗位，保全品格，但在风云变幻中际遇不佳，以致“饱经忧患，历尽沧桑”，自谓“苟延残喘到今天”。此 30 余年甚少写作，并无丰富之文学遗产传世，盖亦环境所使然也。倘得置身于百花齐放之园地，使暟岚能挥其多姿

多彩之妙笔，秉其天赋、自修之才学，凭其往昔少壮年代辉煌之成就，安知不能于今日留下灿烂之果实，在小说界与茅盾、巴金诸大家相抗衡也？呜呼惜哉！或有劝其在退休后重整创作事业，则感叹曰："一部不成东西的《苦果》害得我这20多年来一再交代，不时检讨，已'苦'不堪言，还来种新的《苦果》吗？"晅岚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我在海外未能想像，亦不愿探问和重述。所幸者，在其死前四年，得与隔洋笔谈，恍若往日听其娓娓有人情味之亲切谈话，如他自己所云："仍然是当年在百树村（南开大学教员住宅），叼着烟斗，一杯清茶，同老朋友对坐，无所不谈，悠悠然自得的神态。"怀念晅岚时，此神态依然活跃在我脑子内。哲人已逝，十年前尚有"二罗一柳忆朱湘"，今则二罗已相继伴朱湘在冥冥中等待与一柳重聚矣。

1991年5月5日

美国加州孟乐公园

附记：此文资料，除凭我的记忆外，取材于罗念生编《二罗一柳忆朱湘》（1985年出版时晅岚已仙逝），晅岚与我的27封信件（1979—1983）以及他死后我怀念他的文章。念生于1990年逝世，我曾撰文追悼，其中一句略为改动后在此引用。

娃娃教授

——鲁实先

萧重周

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青年，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留学国外，完全依靠刻苦自学，居然在史学研究领域，驳倒了洋权威，29岁就受聘为大学教授，成为精研史学、历法与古文字的著名学者，这人的名字，叫做鲁实先。

一

1913年，鲁实先出生于宁乡县麟峰乡傅家湾。父亲鲁渭平，是国民党陆军少将旅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伯父鲁涤平，也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鲁实先天资特别聪颖，自幼好读书，有惊人的理解和记忆能力，8岁就能援笔写文章，虽然满纸稚气可掬，但也言简意赅，文理清晰。12岁就能批阅《荀子》等书。生长在这样一个声势煊赫的官僚地主家庭中，在一片夸耀奉承声中，自然也形成了他目空一切、桀骜不驯的性格。

1928年，鲁实先15岁，考入长沙市明德中学，这是由湖南著名教育家胡子靖先生创办的一所学校，以教学质量高而驰名，素具"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美誉。但鲁实先却感到"学校课程浅杂濡缓"，不能满足自己旺盛的求知欲，因此，课堂上常因质疑问难而与教师顶撞，校方便以侮辱师长，破坏校纪为理由，勒令退学。这一来，气坏了他的父亲鲁渭平，认为有辱门第，丧失体面，震怒之下，罚他回乡看牛；幸而母亲周元瑛心疼儿子，从中劝夫教子，要鲁实先在家看书。

家里藏书多，鲁实先17岁起，便潜心系统地自学，觉得比在学校学得更惬意。他阅读能力强，不到两年时间，便读完了全部二十四史。家里藏书毕竟有限，乡间书籍也非常匮缺，正当他无可奈何的时候，恰好其父到杭州赴任，他跟随到了任所，进了文澜阁看书。文澜阁与镇江的文宗阁、江都的文汇阁称为"南三阁"，是中南方藏书最丰富的书阁之一。这里是书的海洋，知识的海洋，鲁实先游弋在这海洋里，欢腾跳跃，贪婪地读书，平均日读十本，速度惊

人。潜心地读了三年，将文澜阁旧藏四库全书的重要部分，都已读完。他读书只观其大略，发现问题，便穷源究委，并勤做笔记。偶有心得，便用纸条记下，粘贴在书页上。鲁实先在这凝集着先贤诸哲智慧的书阁里，深感知识的海洋是那样广阔无垠，想想自己先前那股桀骜不驯的气派，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于是，他又到了北平（京），到北京图书馆读书，还去开封洛阳等地访读公私藏书。这样潜心治学又是四年，终于为他渊博的知识，创立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二

鲁实先精研史学，尤爱研读《史记》。

《史记》是一部学术和文学价值都很高的著作，它上贯群经，下通诸史，历代许多学者在呕心沥血的研读之后，曾写下了许多研究著作。明代有位学者凌稚隆，将诸家的评注，搜集整理编著了一本《史记评林》，便成了一本研究《史记》最好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史记》也是国外尤其是日本的许多汉学家所推崇的一部著作。20世纪初，日本著名汉学家陇川亀太郎据说花了20年的功夫，在《史记评林》的基础上，广泛搜罗古籍资料，写作出版了一本书，名《史记会注考证》，风行中外史学界，公认为是权威著作。鲁实先也读了这本书，不读则已，越读越觉得该书许多疵误，于是奋然拿起笔，写起驳议来。他从该书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等几个方面的事实，洋洋洒洒写出了一篇题为《<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的论文，寄给日本东京一家影响较大的学术刊物，论文很快被编辑部看中，采用发表。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鲁实先的这篇论文，在中外史学界立刻引起震惊，公认为内容翔实，立论有据，驳议有力中肯，国学大师杨树达读后，拍案叫绝，认为论文把《史记会注考证》批驳得"如秋风槁叶，分归陨落"。郭沫若更是兴奋不已，盛赞鲁实先"在研究《史记》方面显露出来的杰出才华，不让日本学者妄自矜夸，为中华民族争来了荣誉"。还填了一首《满江红》寄赠鲁实先。词写道："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洹水遗龟河洛文，流沙坠简《春秋》笔。看缉熙日日迈孙（诒让）章（炳麟），前无匹。泷川注，夸劳绩。鹏鸟赋，难分析。赖发蒙千载，庚辰元历。衡岳精灵撑突兀，潇湘风韵瓷扬清激。料方壶定一声雷，震遐迩。"就是那位泷川亀太郎先生也颇具"洋教头"风度，读了鲁的文章，马上写信给鲁实先，深深敬佩这位"秀才"的才华，对鲁给予他的著作的批评，表示感谢。

鲁实先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当时他还只有24岁。

三

1942年，抗战已进入到第五年了，复旦大学早已由上海迁到重庆北碚，鲁实先由杨树达先生推荐，到这所著名大学任教。开初，复旦大学聘他为中文系的讲师，但中文系系主任陈子展先生看过他的著作，又深入课堂听课，觉得他是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任讲师实在是屈才，论学问完全可以任教授，而且远胜那些抱残守缺、无所建树的教授先生。陈子展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把中文系办得虎虎有生气，于是破除陈规，向校长力荐，鲁实先可聘为教授。鲁实先要学历没学历，要资历没资历，陈子展先生要把这样一个毛头小伙一下子擢为教授，当然引起校园里"满城风雨"。但陈先生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后来在教授会上，通过鲁实先著作时，一些人才深深折服。少数老教授还不服气，悄悄去听鲁实先讲课，只见鲁实先博闻强志，左右逢源，连最枯燥乏味的，被教授们视为畏途的古文字课，他却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得不从心眼里佩服。最后，校长决定正式聘鲁实先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一年，鲁实先才29岁！

29岁，还是个青年哩，于是人们戏呼鲁实先为"娃娃教授"了。

四

解放前夕，鲁实先离妻别子，到了香港，不久，便到了台湾，鲁实先再也难回到故园，领略那草长莺飞的田舍风光，与温馨家庭的妻室儿女团聚了。有一次在台北市戏院看戏，恰遇一位也是流落在台北的乡亲老友，他无限惆怅地说："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园，再看靳江河里乌舡船，再抽道林牛舌烟，再插几行直序子田……"说着，不禁泪如雨下。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得强捺下万斛乡愁，拼命的教书和写书，先后在台中农学院、东海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国文研究所任教授，出版了《殷历谱诉纠》（1954年台中中央书屋出版）《历术卮言证舛》（1960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刘歆三统历谱证舛》、《卜辞姓氏通释》、《殷契类选》、《殷契新诠》、《殷周金文汇纂》、《说文证补》、《周金疏证》、《假借溯源》、《转注释义》，准备出版的尚有《史记广注》、《文字析义》和有关尚书、训诂、卜辞、彝铭、历术等方面的著作。他工作辛忙，精神抑郁，终致心神交瘁。1977年12月19日因脑溢血逝世，就倒在台湾师范大学宿舍的书桌旁，卒年64岁。两千多他的学生和在台好友执绋送葬。有一幅挽联是："一袭青衫，浩荡师恩同日月；连宵绛帐，阑干血泪尽江河。"最说明当时追悼者的心情了。

1986年7月，长沙岳麓书社再版了他的著作《〈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他的名字，收入了198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林增平教授的人品和学品

杨慎之

这是我于1992年11月23日在"林增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次研讨会是为庆祝林增平教授70华诞、执教45周年而举行的。也许因为筹备工作繁忙紧迫，会议的主持人一直到22日上午会议开幕前才通知我，要我作总结发言。其时，增平教授正患晚期胃癌，但他仍然扶疾和与会同仁见面，满面病容，满腔热情，谦虚地接受大家的热烈祝贺。22日晚，无边痛苦咬啮着我的破碎的心，辗转反侧，不能入寐。我披衣起坐，展纸握管，打算写一篇比较详细的发言稿。结果是笔端枯涩，艰于为文，草草写了一个提纲，东方天际就泛起了鱼肚白。我的发言就是按照提纲的思路，随兴联系实际讲的。《文史拾遗》希望正式刊出，为了存真，我打开记忆的仓库，按照讲话的语气整理成文，另加标题发表如次。

1992年12月27日7时20分，增平教授以厌疾所侵，遽归道山。惊闻噩耗，悲恸难宣。增平兄！您真的走了吗？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了吗？有没有可能再见呢？我揣想，有可能的，那就是："梦中地下更来生！"现在已是午夜，窗外北风凛冽，雪花漫天，伴着孤灯一盏，我让心尖上的滴血和笔尖上的点墨搅和在一起，缀成诔词，敬献于挚友增平兄在天之灵。

钜人长德，霁月光风。孜孜学问，湘岳维崧。满园桃李，细雨花秾。

何以俊人先萎，愚骏犹雄？应是天公懵懂，阎王瞆聋，判官乱法，小鬼欺蒙！

今兹永诀，涕泣沾胸。

"林增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开了两天。与会代表将近百人，其中从外省怀着火热诚挚的友情，不辞严寒赶来赴会的专家学者有18位，会议收到论文近10篇，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的有21人次。大家对林增平教授的通体透明、冰清玉洁的高尚品质，正派谦和、团结容人的优良作风，不事喧哗、勤奋治学的严谨态度，对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领域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作了动人的介绍、精辟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一)

做学问难，做人更难。增平教授是一个大学问家，是一个用大写字母书就的人，更是一个具有"独立根性"、独立文化人格的人。

人品和学品、心术和学术、作风和学风，一般来说，总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分裂，甚至分裂得十分严重。阮大铖有才，汪精卫有才，周作人有才，这是世所公认的；但他们的人品、心术、作风十分不好，大节有亏，两者分裂之至，也是世所不齿的。我们提倡两者和谐地、高度地统一，因为这是两种素质的合成，即道德节操和业务知识的合成。古人把"道德文章"并提，道德领先，学问殿后，其间就包含了这层意思。我们当然要按古训办事，不"因人废言"。对于阮、汪、周这一类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所作出的颗粒贡献，还是应当承认的。这里，不妨拿陈垣教授和周作人教授做一个粗略对比。这两位教授在各自学术领域中的造诣和他们拥有的声誉，是不相上下的，他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环境和机遇基本上相同，日本侵略者想把他们拉出来当大学校长，威胁利诱，手法如出一辙。但是，周作人终于做了汉奸，陈垣则通过《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表微》和一系列宗教史著作，和日本侵略者及民族败类展开了顽强的、长期的斗争。一个是软体动物，一个成为不屈、不移、不淫的大丈夫。原因何在？我们当然要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去考察（例如，他们各自家庭成员的构成，他们所培育出来的学生群体对自己的影响，他们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渊源，他们和抗日根据地以及未沦陷的国统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等等），但也要从他们心理上的、性格上的弱点和误区，去寻找产生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同样，对于阮大铖、汪精卫这一类人身上所发生的严重裂变现象，也只有科学地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个人品格素质中去探索原因，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求后人向阮、汪、周这一类人表示尊敬，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我看来，我们尊敬的林增平教授，可以称得上是把人品和学品、心术和学术、作风和学风浑然天成地结合起来的完美典型。

增平教授处世为人正直、明朗、谦和、俭朴、醇厚、热情，但其最突出之点则是温和厚道。他对待前辈、同辈如此，对待后辈亦复如此，总是化雨春风，深藏若虚。和增平教授接触过的人，大都会有深刻印象，他襟怀坦荡，心口如一，从不懂得狡黠欺诈为何物，真正保持了书生本色。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诚恳谦逊的笑，衡量别人时总是那么心存恕道，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未凿的童稚情趣，他和我讲过：如果先把人看成好人，后来发现此人并不怎么好，甚至是坏人，那也不要紧，顶多上点小当，改变看法也就行了；如果先把人看成坏

人，那就是唯心论，一开始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后果不堪设想。我认为，增平教授之所以令人倾倒心折，他的周围能够团结那么多性格迥异、档次不同的人，是和他这种忠厚长者之风密不可分的。

在那场为万邦唾骂、给子孙贻羞的“文化大革命”中，整整十年，增平教授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横蛮霸道的大字报围攻；被强迫发配到花垣、平江等地长期劳动改造；有人在批判会上大打出手，打掉了他的门牙；有人穷凶极恶，率领暴徒刨挖他的祖坟。对于这些痛苦的往事，增平教授总是三缄其口，滴水不漏。我和他交往20年，可算得是无话不谈，但我很害怕撩拨这根敏感的心弦，引起朋友的痛苦，从不和他主动谈这些事情。偶尔涉及，增平教授也只是不着痕迹地改变话题，喟然长叹：“过去了的事，就让他永远过去吧！唯一无法挽回的是，白白浪费了十个春秋！”我想，一个人如果没有一颗能够包容天地的、金子般的心，是很难这样开朗豁达的。

增平教授之所以能够这样温和厚道，是和他不争名利、自甘淡泊的品德密切联系着的。大家知道，增平教授60万言的专著《中国近代史》，是建国之后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用分期方法，全面、系统、完整地叙述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通史著作，被国内许多高等学校列为教材和参考书，自1958年初版到1984年第四次印刷，总共发行了11万册，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新体系确立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但是，在1958年初版本的《序言》中增平教授却说：“本书体例、结构、取材等问题的处理，总起来说，都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得出的成果所赐予。”有鉴于此，他坚决不同意署“林增平著”或“林增平编著”，只署“林增平编”。1982年这部专著第三次印刷本问世，他赠给我一套，在扉页上写着：“聊供覆瓿”。我凝视着这四个字，透过熟悉的笔迹，辨识了增平教授学问和人格的亮度！前人说过，名心重而巧伪生，利欲昏而神智冥，则其学必难以自立，亦无以谕之于人。这一类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丑态百出的现象，近年来我们真是见得太多太多了。增平教授坚决摆脱名缰利锁的困扰束缚，达到了学术上的深湛造诣，创造了教学上的卓越成绩，这种砺薄俗、祛邪秽的风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增平教授从事教育工作45年，他用自己的品德和学识，细雨无声、潜移默化地哺育了好几代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大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科研和教学骨干。昨天，就在这个地方，几十位中青年“林门弟子”向增平教授祝寿，他们健康的、诚挚的脸容，“敬祝恩师长寿！”的祝辞，增平教授憔悴的、诚挚的脸容，略微低沉颤抖的“谢谢！”答辞，使我感动得老泪纵横，不能自已！这是一种最崇高、最美好的感情，只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才能、才配享受和接受这种圣洁的感情。人老了，教授老了，学者老了，如何实现自

己的价值？增平教授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尽量扶植后一辈，让他们登上讲台，让他们在学术活动中显露身手；为他们的书稿写序，和他们合作编书；替他们讲话，争取合理的学术职称；介绍他们结识更多的学术界前辈，广泛吸收营养。变红花为绿叶，甘为“人梯”——这就是大学问家林增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有一部《曹孟其日记》手稿，其中在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徐特立时有这么一段话：“懋恂终岁勤劳，从年初至除夕，皆为他人谋幸福，大禹墨翟，无以过之。以余耳目所及，友朋无第二人。”毛泽东颂扬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朱德戏称徐特立“是一个老怪物”，是“当代一圣人”。从教育的角度来考察，增平教授确实是在追随徐特立的高风亮节，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他人谋幸福”。称他为“圣人”、“哲人”，是当之无愧的。借用曹孟其的话：“以余耳目所及，友朋中无第二人。”

“圣人”和“哲人”，都不是一桶糨糊似的“老好人”。在原则问题上，增平教授总是旗帜鲜明的。1988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史学界代表大会时，大家都在认真讨论如何摆脱史学危机、走出史学低谷的问题，有一位代表忽发奇论，在讲台上说：“有办法，我们承担整理了全省乡镇企业的历史资料，赚了一笔钱，走出低谷！”平素温和的增平教授听了之后拂袖离座，用很高的嗓门对我说：“混蛋！这叫什么走出低谷？庸俗低级！”中国有真性格的知识分子大多脾气倔强，有点孤傲，他们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的出版而上下其手，四处钻营，曲意逢迎，更不能忍受侮辱人格尊严的无端伤害，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增平教授也有这种类似的性格，但他并没有焚稿，仍在尽力之所及。《熊希龄集》出版过程中，增平教授通过左宗棠的第四代曾孙女左犹麟女士，向现居台湾的熊希龄先生遗孀毛彦文女士进一步征求佚稿。他还几次和我商量，如何采取正当途径，借重毛彦文女士和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之力，搜集更多的熊希龄文稿信札。对于现时出版物的粗制滥造、借人捉刀、剽窃抄袭、冒充“通人”的丑恶现象，增平教授深恶痛绝，我们每一谈起这个问题，他就表示，要像对待伪劣商品一样，把伪劣书刊抖搂出来曝光，儒不必坑，书可以焚，不要让那些不学无术的文化掮客亵渎了神圣的学术事业。

（二）

光有人品行不行？当然不行。增平教授是我所见到的品学兼优的十分突出的学者，称得上是“又红又专”。不过，我在这里讲的“红”，和时髦词汇的“红”不同。时髦词汇的“红”诸如红海洋、红卫兵、全国一片红、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类，寒森森的，望之可畏；增平教授的“红”，是对人民事

业的热爱、忠诚和默默无私的奉献，暖烘烘的，近之可亲。

增平教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丰碑。他的名字，将辉煌地载入中国史学的长卷之中。

增平教授在学术上的造诣，在座的朋友比我更清楚，朋友们昨天和今天的发言中都曾详细谈到，增平教授的高足迟云飞副教授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文中，还开列了"林增平教授代表作目录"。增平教授自己说，他并不是禀赋特异的"神童"，读中学时还留过级，以后做学问能有所成，主要依靠两条：一条是勤，时时记住"业精于勤"的古训；一条是边读边想，思有所得，就记下来，不断地积累卡片。说到勤，使我想起了老报人徐铸成在《旧闻琐记》中提到的一件事。当年《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曾对徐铸成说：新闻记者最根本的职责是"记"，当了老记者，如果忘记了"记"，那就只剩下"老者"二字了。张季鸾在临逝世前的几个月，还扶病为新创刊的桂林《大公报》撰写重庆专电新闻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那些崭露头角的新闻界后起之秀。《大公报》涌现了一批才气逼人的新闻战士，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大放异彩，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按照张季鸾先生的逻辑来推论，我认为："老学者"的天职是"学"，如果不学，就只剩下"老者"二字；"老教授"的天职是"教"、是"授"，如果不"传道、授业、解惑"，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老"字了。增平教授一生勤奋，一生在学，一生在写，一生在教，从未懈怠，一直到发病前还在赶写文章准备出席广州的学术会议，还在为湖南师大博士点的工作擘画筹谋。春蚕吐丝，至死方休，这种精神的确是很感人的。

在学术研究方面，增平教授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那就是，从史实和国情出发，充分占有材料，鉴别真伪，就像食笋去箨一样，舍弃枝枝叶叶，紧紧抓住最本质、最精粹的东西，进行历史思辨，然后著文立论。和许多前辈一样，为了弥补自己在学生时代的缺憾，解放后，增平教授一直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能够取得重大成就，和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深厚功力是直接联系着的。在这里，请让我再一次提到中国近代的世界型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经历，来做一点说明论证。解放以后，1949 年 4 月陈垣教授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不谈政治，只谈治学。信中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见解，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双重任务。"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全国各报转载，国外报纸也译载。《进步日报》还发表了专论，认为

知识分子应该走陈垣之路，不要走胡适之路，影响很大。1990 年 12 月，在广东江门参加"纪念陈垣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归来，我在广州和陈垣教授的大弟子刘迺和教授有过一次长谈，她告诉我："这封信的大旨是陈垣老讲的，由我执笔。胡适读了这封公开信以后，声称这不是陈垣的手笔，有点像巴金的文风。垣老说：'凡是按照我的授意，经过我审阅，用我的名义发表，即使是请别人代笔，也是我陈垣的东西。'"义正词严，不假颜色，显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风骨品德！1951 年，在参加四川巴县土地改革后，他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谈思想收获："读历史传记诗文的时候，如果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读，就会颠倒是非，但也不是说，所有的文字记载都应当一笔抹杀，而是说，要重新估计。""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正确地批判。"1959 年，年近八旬的陈垣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不能掌握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史学家来说，实际上是最大的苦恼和不幸，思想局限，目光狭隘，脑子里常常萦绕着许多'不可解'的问题。因为没有指路明灯，虽然苦心孤诣地千思万想，还是惶惑不解。"陈垣教授沿着他自觉选择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解放以后，在史学研究和教育行政领导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垣教授的晚年，真是金光璀璨，红霞满天。我想，对于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都应该像增平教授一样，学习陈垣老衷心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把它渗透到自己的科研实践中去。陈垣老和增平教授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做学问的命根子。听说，有些并未经过慎重思考的人打算另外找命根子。这条路，恕我直言，恐怕是很难走得通的。

在研究方法方面，增平教授走的一条路子是：由博返约，厚积薄发。他从宏观进入微观，通过微观研究的不断积累，展拓思路，进入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性的理性思辨，最后把研究重点落实到辛亥革命上面。1985 年，增平教授在《求索》召开的青年作者座谈会上自我介绍说："我选择中国近代史这个课题作为专业，最早是 1948 年在江西中正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开始的。初期，教课之余，我狼吞虎咽，倾全力搜集和阅读资料，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才有了《中国近代史》这部书的出版。以后，我逐步把研究的口子缩小，把研究的重点，从中国近代通史转入辛亥革命，由辛亥革命转入同盟会及其领袖人物，随后又转入对改良派、立宪派的研究，最后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进行探索，综合分析，做比较深入的钻研。"他在作自我介绍时朴实无华，虚怀若谷。但是，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很艰苦、很复杂、很有特色的研究历程，从《中国近代史》上、下册，到《辛亥革命史》上、中、下册，再到《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等专论，就是这个研究历程的学术纪录。完成这些任务，需

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增平教授平日十分谨慎，他人情练达，处世有方，说话行文，都力求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约含蓄，点到为止。但他在学术问题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不随风飘荡，无所凭借。1988 年他的《近代湖湘文化初探》一文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反响很好，但有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持有不同看法。我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他认真地说：“我愿意是‘初探’，多少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各人所见不同，欢迎各写各的文章，真理愈辩愈明嘛！朋友们的文章如果说服了我，我当然服从真理。”另一方面，增平教授又讲究“双百”之道，特别注意发扬学术民主。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在学术研究中，他主张宽松一点，宽容一点。对此，我是从内心佩服他的远见卓识的。宽的对立面是窄，是偃狭；松的对立面是紧，是张；容是气量，有容乃大，没有容，眼睛里就容不下一粒细砂。如果取消宽松和宽容，那不就是提倡狭窄、紧张和鸡肚肠的气量么？这样能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吗？

学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人品和学品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而增平教授亮晶晶的人品，则是通过学品（优良的学风和深湛的造诣）而闪闪发光的。

（三）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好的时代。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一个大好机遇，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做好工作，就有可能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抓紧把经济搞上去。在国内，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今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特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精神，从战略和理论高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党如何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道路继续前进，作出了明确有力的回答。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表达了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决心，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走向更加成熟、走向繁荣昌盛的契机。英国著名新闻评论员莫洛勋爵以预言家的口吻宣布了他的预言：“中国 50 年后将成富国。世界经济中心平均每 50 年左右便出现一次转变。1900 年，伦敦是世界经济的首都；1950 年，纽约占据了伦敦的地位；2000 年，预料此地位会由东京取代；而到 2050 年，世界经济之都可能是香港，或是上海、浦东及中国大陆某城市。”莫洛的预言，决不是依据“世界经济中心每 50 年变化一次”这个“规律性”现象演绎推论出来的，他指出的由伦敦至纽约再至东京的 100 年的变迁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

的；他对未来 50 年的预测，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作出来的。但是，预言毕竟只是预言。要使预言变为科学，变为现实，仍需我们自己努力。“一百年不动摇”深入改革开放，扎扎实实地做工作。

在大好形势下，我们的历史科学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机遇是，现实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令人目迷心醉，它折射出来的光柱照亮了我们的昨天、前天和明天，使历史科学有可能获得新生和繁荣。挑战是，对我们的历史科学如何为现实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握机遇，坚定应战，是当代历史科学工作者的职责。这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文章，需要所有历史科学工作者的淬砺奋发。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也遇到许多困难和困惑。

困难和困惑首先是“物质匮乏”。国家财政拨给社会科学研究、教学的经费，毕竟太少，少到某些专职科研人员和高等学校人员一年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都阮囊羞涩，张罗乏计。从整体来说，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人员的工资待遇，毕竟过低，低到某些人为生计，不得不另操“副业”（我当然不反对兼课、写稿、编书、办班、提供咨询，甚至办可行的、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实体，我并不把这些纳入“副业”之中）。

困惑主要是指一些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对稳定队伍提高素质极为不利。

例如，有人在上海一家大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自然科学是“超前”的，社会科学是“滞后”的，因此，社会科学理当受到冷遇。这个说法，恐怕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 ABC！革命的理论是报春的雷声，一般来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它总是领先的，怎么变成“滞后”了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中国共产党是靠社会科学起家的嘛！不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但是说到底，说得全面一些，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出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会有人民共和国吗？会有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怎么，一个依靠社会科学起家的党，竟会把自己的老祖宗忘掉而报之以冷遇？

又例如，有人在某地方大报上发表文章，打着批判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旗号，说中国长期落后，就是吃了只讲“谊”、讲“道”而不谋利计功的亏，所以今后要专门讲“利”，一切向钱看！中国究竟吃了什么亏才长期落后，是不是董仲舒一言可以决定，这类基本问题，历史早有回答，姑不申论；但这种极端片面的理论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又例如，不少人用各种形式宣传很难令人信服的“下海”、“闯市场”行

为，把大学教授摆地摊、科研人员进出跳蚤市场，说成是“更新观念”，是学习和了解市场。如果有人指出，大学教授撂下自己心爱的专业，投身市场，有着更深刻的原因，立刻就会有人起而反驳：这是放不下架子的表现。而且说：这种事情早先就有过，20世纪40年代初，大诗人、名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就靠雕刻图章弥补收入。这种强词夺理和不伦不类的对比，只能令人啼笑皆非。殊不知，时下某些教授摆地摊，和半个世纪以前闻一多教授刻图章，是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出现的某种类似的社会现象。闻一多是被迫的，对当时的反动政权来说，闻一多的行动意味着一种严峻的抗议！我拥护“更新观念”，我拥护加强商品、市场经济意识，我更拥护共产党人学会做生意，但我不主张抛弃或者妨碍专业去“下海”、“闯市场”。在商言商，在学言学，挟着陶朱公的算盘，而又想潜心研究历史，一只手想抓两条泥鳅，怕是难得办到的。结果可能是：商不商，学不学，岁月蹉跎，时光老人，商不致富，学不成器，对人民，对自己，都将造成难于弥补的损失。

再例如，有人在咏叹“学问无用”的新腔，重弹“读书无用”的老调。上半个月，有一个搞历史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和我神聊，他感叹地说：“现在对人的评价不同了，只要你打得开局面，能够赚大钱，就算是有本领，有知识，领导上就另眼相看，大力提拔。什么学问，什么学历，都是空的。”我听了这番高论，为之一惊，立刻想起了那位文坛怪杰辜鸿铭。此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张之洞手下做幕僚近20年，写了一本《张文襄幕府纪闻》，这是一本奇书，其中有一则题为《倒马桶》的纪闻，为了传神，照抄如下：

> 丁未末（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余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辜鸿铭有万千怪论，但这一则“纪闻”却讲出了一点道理。我当时本想拿这则“纪闻”回赠来访者，终以语多尖酸刻薄，有欠厚道，“将欲言而嗫嚅”。其实，辜鸿铭讲述了一个真理，世界上要办好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学问的。倒马桶是一种简单劳动，用不着高深学问，但是，如何倒得干净，如何节约用水，如何不发出噪音干扰邻居，如何避免臭味污染空气，这当中还是大有讲究，或者说大有学问的。把搞活市场经济理解为“只要能赚钱，不要学问”，那是在糟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爱读书，没有学问、斯文扫地的民族，是文化赤贫，是精神侏儒，是没有前途的。一时候刮起“书读得越多越蠢”之

风，砸烂“师严而后道尊”，为“白卷英雄”唱赞歌；一时候掀起“文凭热”的浪潮，片面追求高分数、高升学率；一时候又践踏知识和学问，把拜金主义奉为人生不二信条。这样做的恶果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教训，难道不应该刻骨铭心地记取吗？

我对困难和困惑讲了这么多也许是不合时宜的话，可能有人责备我自命清高，故示矫情，但我管不了这些，我讲真话，只是在奉献出一颗不说谎的、诚实的心而已！我坚决相信：党和政府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缓和、解决这些矛盾。

联系到增平教授的人品、学品，和我们当前碰到的某些困难和困惑，我想用下面四句话来概括增平教授的风范，并愿和朋友们、同志们共勉：

坐冷板凳，过清贫生活；做硬功夫，养浩然正气。

周光召

——一位核子能的先锋

汤毅强译

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时，很多人这样问道："他是谁？他是否有资格名副其实地符合这一卓著的称号？"

在和他升起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蘑菇云相联系的朋友和同事中，这一回答是肯定的。他在公众眼内消失了几十年，正说明他不为一般人所熟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震撼了世界！工业落后又无外援的中国怎能制造得出原子弹呢?！许多人时至今日依然还有些迷惑不解。

周谈到主要负责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说制造原子弹宛如挥毫写一部惊险的电影小说。

在他大边眼镜后面那副平静表情中，他还谦虚地说到他个人不过是这一伟大工程（作品）中10万名共同创作的作者之一。

1929年，周出生在湖南省一位工程师的家庭。他发展了他自己所喜爱的一种风格，并从中学时代就培养了物理学科上的独立思考。有次考试，没有按照老师指导的方法作答，他想一定会失败的，可是发回的试卷上获得优分，从那时起他就常用不同寻常的路子解决面临的问题。

1947年，他进入清华大学，跟随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彭恒武、钱三强学习。1951年，从清华转入北京大学，成了彭恒武教授的研究生；彭教授是引进量子力学到中国的学者。1954年，周参加了北大教师行列。

1957年春，受国家派遣到莫斯科近郊杜布拉核子联合研究所，那儿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和东欧国家的物理学者正在巨大加速器面前进行研究核子反应，周就是当时中国代表队的队长。

四年杜布拉的研究中，他在这些物理学家中，名声荣升到惊人的高度。是他，对高能和核子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50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从而赢得国际上巨大的重视。

但是，幽静如画的杜布拉森林，美丽的伏尔加河畔，作为年仅30岁的理论物理学者，其光辉前景再也不能身藏象牙之塔了。他得知苏联领导人尼·赫鲁晓夫1959年6月撕毁中苏条约，撤回苏联核子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突然终止。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离开中国时，告诉中国核工业部长说，"别担心，我相信你们有周光召和王淦昌，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你们自己的原子弹。"

在杜布拉，周召集我国科学家同时讨论两个问题：一、没有外援，中国能发展原子弹吗？二、在杜布拉期间，我们应该做什么？会后，周和同仁联名向核工业部写了汇报信，请钱三强前辈带回国。信中周表示了中国一定能够制出自己的原子弹的信念。他写道："作为成长在新中国的一代科学家，我们准备放弃基本理论研究，承担祖国庄严号召的任务。"在杜布拉剩下的岁月中，他集中自己精力全神贯注地研读流体力学和爆破力学。

1961年，他回到中国，与妻子、独生女团聚没有耗费更多的时间，便搬进了高度警戒的原子武器秘密研究所驻地。从此，这位物理学上的新星不为人知地度过了他一生中19年的青春时光。周来到这绝密的研究所，极大地鼓舞了老一辈物理学家彭恒武和王淦昌，他们对这位青年物理学家心甘情愿地当无名英雄印象极其深刻！32岁，他被任命为研究所理论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承担原子弹的设计，彭恒武与王淦昌也是这个部门组成人员。在这个代号为"596"的庞大计划里，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596"是指1959年6月赫鲁晓夫作出了对中国停运原子弹模型的决定）。

周参加这一计划之前，彭恒武和邓稼先已经作了大量爆炸力学、核子反应、中子物理和其他问题的理论计算，但对某些主要数据，他们还未能估计其结果。仅靠四台机械计算机，周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成只花费了2年零7个月。周和邓稼先及一批从大学分配来的青年物理工作者，对原子弹每一个理论方面的问题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周回忆说，"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从未离开实验室和办公室，甚至中国农历除夕也无例外。"就是那些充满紧张气氛的日日夜夜，周领导并亲身参与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中子物理、计算力度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帮助了中国科学家了解到核武器机制，奠定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基础。"一位中国科学家说道，"它们也同时提供了中国第一颗氢弹设计和中国战略核武器的科学基础。"

周自己专心工作竟达到这样程度：一天，他为气喘病所袭倒，被送入疗养院急救。国家领导极大地关怀他的健康！一天晚上他发现了床头上由聂荣臻元

帅送的苹果，他深深意识到党和国家对他的工作抱有多么巨大的希望！于是次日一早，他坚决告别了医院。

周恩来总理当时曾出席过草拟原子弹试验计划的会议。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飞赴试验现场进行视察。一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到研究所视察时，深情地询问道："我们希望你们迅速完成原子弹，那时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工作应会更容易。"

试验之前，周和他的同事计算了爆炸过程中每一时刻和每一细节的数据。1964年10月15日，试验的前一天，进行原子弹发射试验开始倒计时了，但是，一个试验现场的加急电报送到北京中央控制室："如果辐射出现怎么办？"坐在中央控制室的周，又进行了仔细的计算，然后坚定地对试验场回签："这次试验成功率肯定为99%，我们主张原子弹按原计划日程进行！"

第二天，难忘的16日，原子弹爆炸在中国西北部沙漠地区。靠了周光召和邓稼先等的智慧和领导艺术，中国完成了一些外国人曾认定没有外援必须至少20年时间（而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竟只花两年半）才能完成的制造原子弹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在中南海邀请周光召、邓稼先、彭恒武、王淦昌、钱三强和朱光亚（参加者还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共集一堂举行国防科技历史性的庆祝！

周总理在与原子物理学家亲切握手时祝贺道："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和国防工业其他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总理还告诉他们："毛主席对这件新闻感到特别高兴！主席还说我们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勋章，向他表示感谢。"全场听到总理的话都为之大笑！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语重心长地要求他们再接再厉加速氢弹的试验。

在国外科技出版物上根本找不到氢弹设计的一个词。作为国家核武器理论研究所的主任，周终于独立地对于氢弹的理论设计和战略核武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试验。

1980年春天，在广州举行了一次粒子物理的国际会议，在灯光辉煌的会议大厅里，差不多与世隔绝20年之久的周光召第一次出现在各国科学家的面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介绍周光召时说："他是中国最突出的科学家之一。"接着海外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说道："如果周君在60年代继续他的理论研究，他本来就可以是来自新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首次回国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

振宁就极欲会见这位物理学新星周光召。

周光召是受邀访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新中国第一位科学家，也是被邀请出席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高能物理会议的头两位中国人之一。

由于他这种高度机密的工作，他几乎对所有的邀请和询问都一概未予作答。有个时期，国外谣传因敌对国家施诡计不使中国发展核武器，他在一次飞机坠毁中遇害。

1980年秋，他访问了美国，受到美国物理学界热烈欢迎！为了庆祝新中国物理学青年新星的到来，美国物理学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诺贝尔桂冠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斯温伯格和希隆庇亚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欢迎词。周用随后两年时间在美各地讲学，也和妻子进行游访。

57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他也阅读德语和法语。也许是为了消遣吧，他个人常阅读一些不为一般人感兴趣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英语小说。

（译自《中国日报》）

国师硕彦录

伍大希

1938年创建于湖南蓝田（即今涟源市）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是抗日时期一所很有名的高等学校。到1950年合并于湖南大学，为时仅12年。就在这短短的12年里，它为我国教育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名教师。人们一致赞誉“国师无废品”，正反映了对它的仰慕之忱。这成绩的取得，是与当年在此工作的济济一堂的名流硕彦分不开的。

我在国师只读了一年，即1942—1943年。但这一年正是日军压境，战火濒临，国师播迁的前夕，无论师资队伍与教学设备，都是国师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因而我也就有幸获睹一代名流的风采。

首先谈谈我们国师的创办人、院长廖世承先生。

廖院长是一位教育专家，他曾在美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从他那严肃不苟、要言不烦、步法有度、目光炯炯的仪表神态中，可以看出他忠于事业，坚忍不拔的气质。我们每天清早举行朝会，他都是衣冠楚楚而来，从不迟到，从不缺席。这一行动本身就给我们一种律己甚严、以身作则的教育。他对国师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礼贤下士，网罗了一大批名师。他任人唯贤，用人唯能，不讲派系，不拘门户。从政治上讲，有封建型的，有资本主义型的，也有少数秘密信仰和宣传共产主义的。从留学的国家讲，来自英、美、德、法、日的都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可以说是继承了蔡元培当年主持北大的遗风。所以尽管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但国师的学术空气仍然是比较浓厚的。几乎每周都有各式各样的讲座。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大后方的教授们都转徙流离，不安于位；而国师地处穷乡，工作生活条件都非常恶劣，却能有那么多名流学者愿意到国师来，而且依依不肯离去，我们的廖院长是起了磁铁般的作用的。

按照国师的规定，新生入学要安排一周的新生训练，各系的负责人都要给新生讲一次话，各自介绍本系的情况，发表他们的主张。我们这一届第一个给我们讲话的是国文系系主任马宗霍先生。马先生是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第四号弟子。他身材瘦小，风骨嶙峋，一种抑郁不平、孤芳自赏之气，洋溢乎谈吐之间。他这次讲话从我们的国文试卷谈起。对有些考生用白话文作文大为愤慨。他认为一个大学生不能做文言文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就讲起一段往事：当戴季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请他主持高考（即县长文官考试），马先生首先提出：“白话不阅。”戴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便拂袖而去。马先生说：“戴季陶自己也写不通文章。大家都以不通为通，所以我们的国家才弄得不可收拾！”这确是惊人之论，我们听了都不禁为之吐舌。

当时就有一位留美的哲学教授黄子通先生同马先生唱对台戏。黄先生与胡适同属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得力传播者。他著有《儒道两家哲学系统》一书，用资本主义的哲学方法来剖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马先生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在讲台上对此痛加抨击。而黄先生也就同时在隔壁讲台上奚落马先生，说马先生是“打着章太炎的牌子吃饭”。我们两边都听到了，感到啼笑皆非。平心而论，这两位先生在学术上都有造诣，各有千秋，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当时国师的国文系集古典名流之大成。如经学大师钟钟山，古文桐城派殿军钱基博，子史专家席鲁思，辞赋专家骆鸿凯。钟钟山名钟泰，南京人，温文尔雅，羽扇纶巾，长袍修髯，恍如谪仙。他对儒家经典如数家珍。他讲起《四书》来声调铿锵，抑扬顿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一字一顿挫，一词一板眼的吟诵给我印象最深。我们就从吟诵中领会其神韵，简直使人陶醉，令人神往。

钱基博先生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是当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父亲。父子两人都是国师的教授。钱老虽只50多岁，却显得老态龙钟。上讲台时，一人搀扶，一人搬太师椅。他讲《昭明文选》，眼不看台下，一坐下来，助教把文房四宝一摆开，他便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一面吟诵，一面圈点。我们也跟着他、模仿他亦步亦趋地吟诵圈点，往往一节课不讲一句话，就在这悠扬起伏的吟诵声中过去，我们也似有所悟，感到是一种享受。

钱老是古文界一大文豪，声称“手批唐宋八大家，非两汉以前之书不读”。他曾做过一次学术讲座，题为《五十年文章做到老，学到老》。他最赏识他的学生石声淮的才学，留他当助教，并把最钟爱的女儿嫁给他。为此他写了一篇《金玉缘谱》以纪其事，文坛传为佳话。1943年，国师举办了一次学生作文选优评比，由钱老主持，他在我一篇题为《读〈西铭〉》的作文上写下了苍老遒劲而又有点歪斜的八个字的眉批：“抑扬爽朗，笔有回澜。”先生论文以“气”为主，这八个字正体现了先生着意处。我把先生的翰墨视为至宝，珍藏了很多

年。直到1957年才被付之一炬。40年后，我去华中师院看望石声淮先生，谈起此事，都不胜感慨系之。

我们史地系有一位主讲中国经济史的老教授李剑农先生。李老是邵阳人，早期的英国留学生，德高望重。所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被推为史坛名著，现仍在继续出版。我同一位来自四川的地下党员同学李荣福（后来我在昆明受闻一多先生之托请他去办《民主报》，他改名李旭、李耀九。不幸于1948年因组织人民武装暴动壮烈牺牲），出于一种仰慕的心情，经常去听他的课，受益匪浅。有一次，李老在讲完一段历史事件之后，突然深有感慨地说："我读了一辈子历史，发现古往今来一直贯穿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旧的失败了，新的胜利了。"下课走出教室，老李对我说："李老这话是不同凡响啊！他并不是一个唯物论者，今天却说出了一条唯物论的真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学者，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实践所得出的结论。"而今不同凡响的李老和评价李老的老李都已作古多年，言犹在耳，能不怆然！

讲到不同凡响又使我想起另一场讲座，主讲人是教育系董渭川教授（建国后曾任北师大教务长）。讲题为《贤妻良母和贤夫良父》。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标题。当时一般时代女性对贤妻良母这个词非常反感，认为这是把妇女打入厨房的口号，而董先生却男女并提，算是为女性扬眉吐气，因而吸引了广大的女同学。

在国师诸教授中，有一位储先生。储先生在国师任教时不过30多岁，从英国回来不久。他虽然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主笔，但他并不是国民党的宠儿。他身材魁伟，潇洒豪迈，主讲各国政治史，纵横捭阖，旁若无人。听说当时正在与作家端木露西闹离婚（注：端木当时在附中教英文），家庭生活并不十分幸福。离开国师后，他到上海创办《观察》杂志，为中国民主化呼号，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国师在蓝田时，教育系的名教授特别多。如主讲教育哲学的部聘教授孟宪承，西方心理学史权威高觉敷，留德七年并最早介绍德、俄两国心理学来中国的格斯塔派心理学家郭一岑，当时人手一册的英语教材《New China》的作者朱有光，伦理学权威谢扶雅。高先生解放后执教南京师大，1983年我去看他时他已年近90，精神抖擞，仍在编书。谢先生几十年来旅居海外，1991年他百岁大寿时，国内同学都纷纷为之祝寿。他得以乐享天年。唯有一代名师孟宪承先生60年代执教华东师大，"文革"狂潮，当者灭顶。温文尔雅的孟老以古稀之年，含冤去世，这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当时国师的外语系有三大巨头，最早的系主任是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的不到30岁的教授钱默存（钟书），继钱任系主任的是法国文学博士汪梧封，再继

任的是留英的沈同洽。可惜我都没有听过他们的课。我只听别人说：钱先生少年气盛，风度翩翩，讲起课来，引人入胜。每次下课，总有一大群人跟着他，都想从他那里取得点什么。他很自负，专找权威挑战，权威都畏而远之。有天晚上，学生请几位教授演讲，他要大家把灯熄掉讲，以此向大家挑战，当时只有法国文学博士汪梧封敢应战。与他的父亲钱基博也互不相让，古文家的父亲当然没把洋博士放在眼里，儿子也要学生不要听老头子的。现在钱先生年过80，在北京深居简出。

我在国师一年，除了接触过上述这些名流硕彦之外，还私自追随过两位当时并非硕彦而后来却成了权威学者的青年教师。一位是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回国的28岁的哲学教授刘佛年先生，另一位是当时连讲师职称都还没有取得的中国文化史教员熊德基先生。

佛年先生是湖南醴陵人。他在伦敦博物馆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他在国师讲课是十分隐蔽含蓄的。他把唯物论改称物质论，把辩证法改称有机论。称马克思为卡尔，称列宁为伊里奇。这就可以避免那些不学无术的特务们的注意。在有一次题为《一个现代人的哲学》的讲座中，通过对怀特海历史哲学的批判，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发现了他的思想进步之后，便通过他一个和我们同班的妹妹光年带我们去他家求教。当时，他租住的是一所民房，内外都粉刷得雪白，戏称为 White House。在这所民房里，他利用星期天，悄悄地给我们讲《资本论》、《费尔巴哈论》。他不主张我们去看那些通俗读物的小册子，而要我们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去啃大部头的原著，而且最好读原文，因此要求我们学好外语。他噤口不谈政治，不触及现实，止于一种纯学术性的探讨。我们当时很幼稚，不理解他的苦衷，背后笑他是经院派，学究气。但也幸亏在他这学究气的严格要求与循循善诱下，逼着我们扎扎实实地读了一点书，使我们在后来同敌人的理论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83年我到华东师大那座仅有60平方的校长楼去看他，谈起40年前在"白宫"的这段学习生活时，70岁的刘校长仍报以谦逊的微笑。

熊德基先生是江西人，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中共地下党的总书记。后来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便随皮名举教授从昆明来到湖南。皮先生受聘为国师史地系系主任，他便教我们的中国文化史。在讲课中，我发现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歌颂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这在当时不啻空谷足音。于是我很专心听他的课。后来他抽查我们的课堂笔记，认为我的记得最好，甚至连他讲得不够完全的我都补记完全了。这样我们师生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默契。一年后我转学去昆明，他千方百计地为我找关系，介绍师友。熊先生的这番努力为我后来在昆明立足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他从福建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所长。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又恢复了联系。他每信必复，还寄来他过去的一些诗稿。他两次应邀来湘讲学，一下飞机就要把我叫去。记得他最后一次给湖南师大历史系讲课，对学生提出了一个起码要求，要他们至少读完一本古代史原著。这和当年刘佛年先生对我们的要求是如出一辙的。1987 年，我一年没有接到他的信。一个不幸的消息竟从《光明日报》映入我的眼帘。我惶惶不知所措，但已没法赶到北京去瞻仰他的最后的遗容了。

以上我写到的这十几位先生，除了外语系的之外，都是在当年亲自追随过，请教过的，有的只是旁听过一两堂课的老师。事情已整整过去了 50 年，今天当我吮笔疾书时，他们每个人的形象竟还如此鲜明，使我如坐春风，如亲謦欬。他们形象之所以鲜明，是由于个性的鲜明。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风格。把“各有千秋”四个字用到他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另一方面，他们都“思以其道易天下”，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对自己的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满腔热情与无私奉献，则别无二致。这又是他们的共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结合，便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怀念弥久弥深的原因。蓝田光明山，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哺育了国师好几年。国师也用它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块土地，为蓝田增添了光彩。50 年物换星移，事已早成陈迹，但是这一段峥嵘岁月所创造的百年树人的业绩是与日同辉的。

湖湘历代科技成果举例

刘　旭

湖湘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研究湖湘文化诸问题，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振兴湖南经济，使世界了解湖南，让湖南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仅就几个侧面对湖湘科学技术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蔡伦和“蔡侯纸”

蔡伦，东汉桂阳郡耒阳县（今属湖南郴州市）人。明帝永平末年，到宫廷做宦官。章帝建初中，提升为小黄门。和帝即位，转中常侍，开始参与国家大事。蔡伦很有才学，敢于直言，即使皇帝有时不高兴，他也要进谏。平时休息，就闭门读书，或下乡考察。后来加封尚方令，主持宫廷的器械用品的制造。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蔡伦奉命监造秘剑和诸器械，件件精工坚密，为后世所效法。安帝元初元年（114 年），经邓太后提议，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封为长乐太仆。元初四年（117 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派通儒谒者刘珍和博士良史加以校订，特任命蔡伦监典其事。蔡伦曾经参与谋害安帝祖母宋贵人之事，安帝亲政后，对此事加以追查。蔡伦不愿受辱，建光元年（121 年）饮毒而死。

蔡伦一生中最大的事是发明了造纸。当时，社会上盛行竹木简和缣帛做书籍，既笨重又昂贵，并且很不方便。针对这一情况，蔡伦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为原料，试验造纸。经过多方努力，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蔡伦试验造纸获得成功。从此，蔡伦所造的这种纸，很快被推广开来，并逐渐取代竹木简和缣帛，成为通行的书写和印刷材料，史称“蔡侯纸”。

然而，造纸术不是蔡伦发明的。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1957 年西安灞桥出土了公元前 2 世纪的古纸，经鉴定，是用大麻和少数苎麻纤维为原料制成的，其制作技术原始，质地粗糙；1977 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出土了两块麻纸，经考证，大概属公元前 1 世纪中叶时的遗物；1978 年陕西扶

风出土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期的麻纸等。这些纸张，总的来说，制作技术落后，质地粗糙，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这样看来，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发明了造纸术。但是，西汉的古纸或麻纸，纸质粗糙，用它来书写或印刷，很不方便，且欠美观。到了2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蔡伦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为原料，采用比较先进的工艺，制造出了比古纸和麻纸更为优良的纸张，并且广为推广，成为我国唯一的书写和印刷材料。这个进步蔡伦是功不可没的。《后汉书》唐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蔡伦舂纸臼也。"《大明一统志》也记载曰："蔡伦故宅，在（耒阳）县治西南，内有蔡子池，池南有石臼，即蔡伦舂纸臼。唐别驾李孙以臼入贡。今池与宅皆废。"人民怀念蔡伦，在其家乡设置造纸设备和器具，以资纪念，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二、杨幺农民起义军和"车船"

南宋初年，战争频繁，赋税沉重，广大贫苦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揭竿起义。洞庭湖区的农民在钟相的号召下，于建炎四年（1130年）举起了义旗，向官军开战。起义军建立"楚"政权，钟相自称"楚王"，建元"天载"，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钟相牺牲后，杨幺接过义旗，在龙阳（今湖南汉寿）继续领导洞庭湖区的农民起义。杨幺自号"大圣天王"，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起义军利用水寨，创建了"陆耕水战"的耕战形式。水寨以原村落为基础，实行平等互助，兵农合一，劳武结合。"春夏则耕耘"，"兵夫"协力"作田"。〔1〕"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载老小于船中"，兵士则四面出击敌人。〔2〕在水战中，起义军普遍使用一种科学技术含量很高的"车船"，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车船"，即在船身"夹三轮踏水，翔水彭浪，疾若挂帆席"，这早在唐代就有了，但未引起人们的重视。〔3〕到了宋代绍兴元年（1131年），由于洞庭湖农民起义兴起，车船之事重新被提起。宋朝官吏程昌寓按照图纸，造八车船样一只，船两边设有防车板，踏车激水，往来行走十分快利。程昌寓企图以车船制胜杨幺农民起义军，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水军，以覃敌为统制，率领车船水军直扑江口夏诚大寨。但事与愿违，官军与农民军一交战，官军大败，车船尽为农民起义军所俘获。农民起义军缴获车船后，为了更好地发挥车船的优势，对车船进行了改制，制造出了更为优良的车船。"杨幺打造'和州载'二十四车大楼船，杨钦打'大德山'二十二车船，夏诚打'大药山'船，刘衡打'大钦山'船，周伦打'大夹山'船，高癞（子）打'小德山'船，刘诜打'小药

山'船，黄佐打'小钦山'船，全琮打'小夹山'船，两月之间，水寨大小车楼船十余艘，制样愈益雄壮。"〔4〕这种经杨幺改制了的车楼船，其形制更科学，性能更优异，共有三个特长：其一，速度快。这种车楼船一般有二层或三层，两边有护板，前后设踏车，"踏车回旋，其速如飞"，进退自如，来往如梭。〔5〕其二，设有撞竿。这种车楼船前后左右均安装有撞竿，其战斗杀伤力极强，"官船犯之即破"。〔6〕其三，设有拍竿。这种车楼船上还安装了拍竿，拍竿长十余丈，下安辘轳，顶端系绳索，遇到官船，刚一接近，即倒下拍竿，将其击得粉碎。洞庭湖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依照这种改制了的车楼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水战的胜利。

三、罗洪邹氏与舆地学

清新化罗洪（今属湖南隆回县）邹氏，自嘉庆以来，世代精研舆地学，成绩斐然，闻名全国。

第一代舆地学精研者是邹文苏之妻吴瑚珊。吴瑚珊，字季瑚，嘉庆时期人。她通晓古今舆地知识，帮助其父撰著《地理今释》，该书不少章节就是出自她手。吴氏生有六子：长子汉纪，二子汉璜，三子汉勋，四子汉嘉，五子汉章，六子汉池。幼年时代，他们就受到母亲地理知识的熏陶，为继承母亲的舆地事业而奋斗。

第二代舆地精研者是邹汉勋等六兄弟。邹家六兄弟长大成人后，都继承了母亲的遗志，成为精研舆地学者，并且都有舆地学著作问世，其中第三子邹汉勋的成就尤为显著。邹汉勋，字叔绩，舆地学著作甚丰，撰著有《六国春秋》、《读书偶识》、《左氏地图说》等，又参加《新化县志·物产志》、《宝庆府志》等的编修，还为魏源《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与魏源一起撰著《尧典释天》。此外，邹汉勋对经学音韵和历法等也都有很深的研究，是当时成绩卓著的有名学者。

第三代舆地精研者是邹代钧。邹代钧（1854—1908），字沅帆，又字甄伯，光绪初年补县学弟子员。光绪十三年（1887年），邹代钧从刘瑞芬出使英吉利、俄罗斯。出使期间，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向刘瑞芬提出了很多建议。特别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侵占印度，并妄图吞并哲孟雄（今锡金）地区，邹代钧引经据典，以充分的理由说明哲孟雄不是印度的领土，英国完全不应该强占，迫使英国放弃侵占计划，最后以租借形式解决哲孟雄问题。同时，邹代钧利用出使机会，做了两件事：一是制成中国第一把舆地尺，使绘制地图有了准绳；二是每到一处，均留意西方人所绘地图，并设法进行译印。此外，还绘成中国各地详图200余幅。在这个基础上，编成卷帙浩繁的《中外舆地

图》。光绪十五年（1889年）回国后，到湖北省主修湖北省地图，深得张之洞的好评，并在武昌创办"舆地学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邹代钧由湖北返回湖南，先后被任命为湖南矿务总局提调、《湘学报》舆地编辑、时务学堂舆地教习，为湖南的维新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邹代钧调往北京，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并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邹代钧充《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邹代钧病逝于武昌舆地学会，享年55岁。

第四代舆地精研者为邹永萱、邹兴钜父子。邹永萱，字焕庭，原为缝纫工人，后被其堂叔邹代钧收留作书童，将他培养成绘图专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邹代钧死后，邹永萱筹资在武昌开办"亚新舆地学社"，后改称"亚新地学社"，逐渐扩大成几百人，设备技术都较先进，并在南京、广州、成都、长沙等地开设分店，编辑出版各类参考、教学、游览、历史地图，继承和发展了"舆地学会"的地图事业。

四、丁取忠与《白芙堂算学丛书》

丁取忠（1810—1877），字肃存，号果臣，一号云梧，清长沙县高塘岭（今属望城县）人。"少喜步算"，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始"习算"。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师事贺熙龄，尤醉心数学，学业大有长进。咸丰十年（1860年），丁取忠到武昌，入胡林翼幕，但仍坚持钻研数学。他常常节衣缩食，广求数学书籍，友人赠送的书籍也以数学书籍为多，购书藏书成为其最大的爱好。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他积极从事数学撰著。丁取忠的第一部数学专著为《数学拾遗》，同窗好友邹汉勋作序，该书"多发明古今算家未尽之旨"，同时还提出了三元一次不定式方程组整数解的新方法。第二本数学专著为《舆地经纬度里表》，该书根据魏源的《海国图志》，运用三角知识，计算出各地至北京的距离及所处方位；但是，由于《海国图志》本身的误差，其推算"未尽精核，然足备参证焉"。第三本数学专著为《粟布演草》，该书"原为商贾习算设也"，故"以发商生息为题，汇集各家术草，以明开方之术"，也就是讨论用高次方程解整存零取的复利息问题，因此，这是一本关于商业的数学专著。丁取忠在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著述中，一方面，与当时国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吴嘉善、徐有壬、时曰醇、邹伯奇等都有交往联系，互相商榷，解疑问题；另一方面，与来华的外国耶麦会传教士也有联系，解答难题，切磋问题。由于这样，对当时国内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能吸收和借鉴。到了晚年，丁取忠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整理刻刊数学书籍上。他与自己的学生黄宗宪、左潜、曾纪鸿等人通力合作，完成了《白芙堂算学丛书》的刊刻

工作。

《白芙堂算学丛书》，始刊于同治十年（1871年），光绪三年（1877年）全部刊刻完，整套丛书共收录数学书籍23种，85卷，共32本，其目次如下：

李治（元）：《测圆海镜细草》12卷
李治（元）：《益古演段》3卷
朱世杰（元）：《四元宝鉴》3卷
张敦仁（清）：《辑古算经细草》3卷
李锐（清）：《天元勾股细草》1卷
李锐（清）：《开方说》4卷
吴嘉善（清）：《算书廿一种》21卷
张作楠（清）：《八线对数表》1卷
徐有壬（清）：《务民义斋算学》11卷
时曰醇（清）：《百鸡术衍》2卷
夏鸾翔（清）：《少广缒凿》1卷
李锡蕃（清）：《借根方勾股细草》1卷
邹伯奇（清）：《格术补》1卷
吴嘉善（清）：《割圆八线缀术》4卷（附左潜：《补草》）
加悦传一郎（日）：《算法圆理括囊》1卷
丁取忠：《数学拾遗》1卷
丁取忠：《舆地经纬度里表》1卷
丁取忠：《粟布演草》3卷
黄宗宪：《求一术通解》2卷
左潜：《缀术释明》2卷
左潜：《缀术释戴》1卷
曾纪鸿：《对数详解》5卷
曾纪鸿：《圆率考真图解》2卷

从收录的目次可以看出，《白芙堂算学丛书》主要是整理中国古代数学遗产，"裒然成艺圃之巨观，风行海内，遂为畴人家必读之本，厥功不甚伟欤！"但是，外人著作，仅收录日人一种，其他一概未加收录，这反映出作者"其时其地限之耳"。〔7〕

注 释

[1] 岳珂.《金陀续编》卷五.《再据刘愿申杨幺徒众连结作过省札》.
[2]《中兴小记》卷十八.

[3]《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
[4] 岳珂.《金陀续编》卷二三.《阁学刘先祖襄阳石刻事迹之二》.
[5][6] 岳珂.《金陀续编》卷二三.《阁学刘先祖襄阳石刻事迹之二》.
[7] 诸可宝.《畴人传三编》,《畴人传》(八)，第 821～822 页.

湖南书法篆刻源流史略

陈 琢

书法，是以抽象的墨色点画及其独特的组合形态而反映形象构造和运动规律所蕴含的意象美的艺术。书法中对立统一的内容，例如点画方面的“方折与圆转”，笔法方面的“露锋与藏锋”，墨法方面的“浓墨与淡墨”，结体方面的“外拓与内擪”，章法布局方面的“守黑与布白”等，在书法艺术中多方位多层次地体现出来。中国书法根本依据是汉字，而文字则起源于原始先民们的生活与劳动；而共同汲取的精神养分，则是历代人民对大自然的实践。中国汉字的起源，自上古的“结绳而治”到出现简单符号，从刻画符号转化为原始图画，由象形字进化成甲骨文，经过了一段悠久的历史时期。然而从商代甲骨文演变到汉代末年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基本齐全，共经历了大约 1800 年的过程。自魏晋以来，各个朝代也对五种字体不断进行完善、定型和美化，直到今天，恰恰又是经过了 1800 年的时间。这是华夏民族古代祖先和后代人们总体智慧的结晶（以上论述，据董友知《书法理论与书法百家》)。从历史上看，甲骨文、金文（钟鼎文)、石鼓文及秦篆刻石文，既属于文字体制，又属于书法艺术，两者是无法断然分割开的。古文字在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上，仍旧具有生命力而不失其存在的意义。

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制的标志是活跃着奇幻人格神的青铜器。湖南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皿天金作父已尊彝”、“父乙用亨”和族徽“大禾”“戈”、“癸举”等，是湖南现存最早的书法艺术——金文书法艺术。金文亦称钟鼎文，今统称为大篆。殷代金文书法，其横直线条多于斜曲的书风，和甲骨文一致；因为刻在铜器上，字体也大些，笔法也较有轻重之分，可以看出运笔的一些起笔落笔的方法。两周金文书法，大体上有“楚派书”（风格参差)、“鲁派书”（风格圆曲)、“齐派书”（风格整齐)。湖南的两周金文书法属“楚派书”一种，颇假《大盂鼎》风格；在笔法上是方圆笔法并用，但起笔每用方笔，收笔时每用煞刀，好像捺笔一样，笔势凌厉，笔力雄强，如“楚公冢秉戈”等。湖南春秋战国的金文笔法，有越王句

州铜剑上的鸟篆、十八年铜戈上的“急救篆”、《缯书》（我国最早用毛笔和彩墨书画在绢上的珍贵图书资料）上的楚文字书法等。

湖南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玺印约30枚（大部分已收录在《湖南省文物图录》中），是湖南现存最早的篆刻资料。这些玺印以铜印为主，个别为玉印、骨印和琉璃印；其特点是，白文多边栏，朱文印仅总数的1/3；官印大小不等，而私印一般为一厘米见方；圆印一般略小；以上玺印按性质不同可以分为符节印、官印、姓名印和独字印，此外还有肖形印和火烙印。

战国中期的长沙兔箭毛笔的发现对“文房四宝”之一的中国毛笔的发明是一个最重要的证明，其时代比相传的“蒙恬造笔”早了两个世纪，它被誉为“天下毛笔第一枝”。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书法变革最有成就的时代，汉隶已从秦隶躯壳中演化成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草、行、楷三大书体也从篆隶书体系统中繁衍齐全，逐渐摆脱了象形象意体态而进入了点画多形结构的艺术领域，为后代书法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2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为“书法”，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书法”一词，即是起源于此。湖南的秦汉书法颇具特色。长沙秦墓出土有“吕不韦铜戈”，其铭文为秦篆。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和“遣策”简牍，全部是手抄墨迹，共13万余字，字体有秦篆、秦隶（古隶）、汉隶和草书，真实地反映了秦汉书法的真面目。特别是秦隶（如帛书《老子》甲本）的产生，在我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大篆，下启汉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秦隶圆笔环转减少，方笔折转增多，体形偏扁，横画延长，出现稍许波尾，开始了向汉隶的演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轪侯之印”、“长沙丞相”、“利苍”等汉印及“轪侯家丞”封泥，方正平直，布局谨严。长沙陡壁山汉墓出土的三方汉印，其中有“曹嫇”缪篆印，其文屈曲缠绕，颇具绸缪之意。

魏晋是书法发展史上繁花似锦的时期，篆、隶、草、行、楷五体已基本齐备。三国时，诸葛亮曾以军师中郎将使督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他工篆隶八分书，有草书《远涉帖》。三国时湘籍书法家零陵人刘敏擅长草书。湖南耒阳县蔡侯祠内的三国吴“九真太守谷朗碑”，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碑刻之一，字体由隶书向楷书演变，开辟了后来楷书的法门，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有重要价值。两晋书法讲究神韵，谓之“晋人尚韵”。晋代湖南书法家汉寿人伍朝“临池学书，水为之墨”（《常德府志丛谈》）。晋室东迁之后，南北朝书法出现了两个流派，遂有南朝“帖学”与北朝“碑学”之分。南齐书法家王僧虔，是“书圣”王羲之四世孙，他曾以尚书令兼湘州刺史寓长沙，其书法首当影响长沙。

唐代的书法，可说是中国书法的“文艺复兴时期”。“唐人重法”，书法讲究笔法。书法蓬勃发展并且获得辉煌成就，书法大家辈出，竞相变创体裁，五种书体，各臻佳妙，特别是促进了楷书、行书、草书的共同繁荣。湖南唐代的书法，有独特的光辉。唐代湘籍书法名家有临湘（今长沙）欧阳询、欧阳肃、欧阳通，长沙怀素，益阳齐己等；流寓湖南的书法家有李靖、褚遂良、李邕、张旭、司马祯、徐安贞、杜甫、颜真卿、李泌、柳公绰、韩愈、柳宗元、杜牧、白居易、李商隐等。“唐代六大书法家”中的欧阳询、褚遂良、李邕、颜真卿四位在湖南活动过。长沙籍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工书，创“大小欧阳体”，欧阳询的长子欧阳肃工草隶，亦为时所重；褚遂良曾任潭州都督寓长沙，留下“褚公书绝伦”之佳句；李北海的《麓山寺碑》，其碑文、书法、镌刻三妙绝，被誉为“三绝碑”；颜真卿首创颜体楷书，他寓湘时书写的《大唐中兴颂》擘窠大字，庄严肃穆，为湖南祁阳县浯溪碑林之佼佼者。浯溪为唐代文学家元结故居，浯溪碑林保存有元结的“三吾石刻”。元结任道州刺史时作《阳华岩铭》刻于江华沱江镇回山的岩上，铭文用古篆、小篆和隶书三种书法刻写，今保存完好。流寓武陵的唐代狂草书法家张旭，人称“张癫”，颜真卿曾向他请教笔法。唐代长沙籍书僧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法，而以狂草得名，谓“以狂继癫”，并称“癫张醉素”，一颠一狂，是唐代狂草的“书坛怪杰”，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长沙窑是中国釉下彩的创始地，釉下彩绘首次用文字装饰，使诗歌艺术、书法艺术和装饰艺术融为一体，获得珠联璧合的效果。唐代诗僧益阳人齐己工书擅行书。流寓湖南的五代前蜀书画家诗人贯休，本姓姜，字德隐，工篆隶，尤善草书，时人比之为阎立本、怀素，有“姜体”之称。

宋初首创刻石印帖的风气。宋太宗于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下旨将内府所珍藏的以前各代名家手迹，令善于书法的大臣与精于刻石的名匠模勒钩摹上石，印刷成帖，名之曰《淳化阁帖》（简称“图帖”）。故宋代刻石印帖的风气甚浓。长沙书僧希白，曾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入“二王”等帖，摹刻于潭州之斋壁，世称《潭州帖》，石在长沙，故又名《长沙帖》。到了宋仁宗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渐趋繁荣，随着宋词绘画等文化的兴盛，书法艺术也得以继承。最突出的特点是行书有了空前发展。“宋人言意”，书法追求写意，以气韵为胜。宋代湘籍书法名家有：北宋长沙希白、衡山梦英、长沙从密、华容率真、道州周敦颐、长沙刘次庄、武陵柳拱辰、长沙周与权和汤正臣、沅陵单炜、衡阳陈湘（女），南宋零陵李挺祖、衡山赵葵、柳州雷应春、平江颜耕道、攸县冯子振、湘阴大椿等；“宋四家”中有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三位流寓湖南。北宋《苏轼荔子碑》在零陵县永州镇柳子庙内，该碑韩愈文、苏轼书、

柳宗元跋，世称“三绝”。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石刻在郴州市苏仙岭，该碑秦观词、苏轼跋、米芾书，亦称“三绝”。黄庭坚曾泊舟浯溪，寻元结遗迹，至浯溪碑林的颜真卿《大唐中兴颂》摩崖下，留宿三日，赋诗题壁，后人谓之曰黄庭坚《浯溪小摩崖诗刻》。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曾知潭州兼湖东路安抚总督，其草书融合了怀素的草书，飞舞无滞，颇具儒将忠义风范。南宋朱熹曾讲学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又除潭州安抚使寓长沙，工书，师从颜体，真、行、隶、草书兼优，大、中、小字皆宜，擅长题额榜书，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四大字石刻，相传出其手书（也有说是文天祥写的）。武冈县资江南岸法相岩有南宋吴中的隶书《法相岩金刚经偈语摩岩石刻》。宁远县九嶷山王琯岩上有南宋零陵人李挺祖所书汉隶碑刻蔡邕文《九嶷山铭碑》。

元明时代的书法多仿前人，主要是继承晋唐帖学。“台阁体”使明初的书法家比较沉闷，中期开始有了起色。“明人论姿”，书法讲究姿态。元代、明代的湘籍书法名家有：元代武陵冷谦、朱俊卿，浏阳欧阳玄、汤炭，茶陵宋祁、易履、刘三吾；明代茶陵李淳、李东阳、张治，湘阴夏原吉，清泉谢宇，汝城朱守孚，华容刘大夏，永兴曹连，湘乡曹亮，澧州孙承恩，醴陵徐一鸣，善化熊宇、黄学谦，武陵陈绅，长沙王五常，邵阳车大聘，武陵杨昌、杨鹤，益阳郭都贤，宁乡陶汝鼐等；元代浏阳人学者欧阳玄，为欧阳修之裔孙，他的书法，《书中会要》称“行草略似苏东坡，而刚劲流畅，风度不凡，未易以专门之学，一律议之”。其书迹有《春晖堂记》。明代茶陵籍诗人、书法家李东阳，其草书笔力矫健，自成一家；小篆清劲入妙，有“阳冰再生”之誉。“明画四家”之一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曾游祝融，涉洞庭，穷研造化，其书法恬淡萧散，清隽畅达，态势自然，有画家风韵。

清代进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书法演进情形，反较元明时代为盛。清代前期，由于屡兴文字狱，科场取士实施“乌方光”的规矩，所以形成了“八股文”和“馆阁体”风气，字体柔媚少骨，俗气满纸。然而“物极必反”，文人一经榜上有名，便抛弃了板滞的“馆阁体”，各自创立新的书风，故此掀起变革热潮，由宋元明三代的“帖学”风气，转化到“碑学”的道路，书坛活跃，人才辈出，被称颂为“碑学中兴”时期。“清人取势”，书法讲究笔势。清代早中期的湘籍书法名家济济，他们之中，以长沙罗源汉、易文基、刘权之，善化唐仲冕，宁乡陶汝鼐，湘潭黄周星、王岱、陈鹏年、寄尘、李在清，湘乡易祖栻，衡阳王夫之，衡山法智、欧阳正焕，祁阳陈率祖，道州何凌汉，武陵髡残，澧县陈尊宜，零陵圣诚等为最著。清初书画家僧法智，衡山人，号破门、石浪，南岳七十二峰老人，其书画与石涛、石溪齐名，有“三石”之称。石溪即湖南武陵人髡残。《广阳杂记》评法智书法云：“师能诗善书，书法为湖

南第一。”又云：“临智永千文，深入晋唐门奥。”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云：“破门和尚狂草，高处落墨，远处养势，怀素之嗣响。”长沙罗源汉，为雍正进士，《长沙县志》称其“诗文雍容端雅，书法襄阳米芾，苍古遒劲，卓然自成一家”。书画家张照寓湘期间的书法作品，有《岳阳楼记》木雕屏。岳麓书院“整齐严肃”四大字石刻，为衡山书法家欧阳正焕所书。乾隆年间湖南巡抚刘墉为“翁、刘、梁、王”四大家之一，其书法精华蕴蓄，劲气内敛，肥厚古朴，见重于世。乾隆年间湖南学政钱南园，书法直追鲁公，垂老无间，是以颜楷专精，有“鲁公再生”之誉。嘉庆年间以员外郎典试湖南的伊秉绶，其书法“尤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其“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褚如简”。

清代末期湘籍书法篆刻名家，其中以善化唐鉴，长沙周寿昌、徐树铭、张百熙、汪鋆，醴陵吴德襄，湘乡曾国藩、曾纪泽，平江李元度，湘阴左宗棠、郭嵩焘，新化邓显鹤，安化罗绕典，永绥张世凖，安化黄自元，沅陵丁可钧等影响为大，而以道州何绍基为最杰出。道州何绍基为清末著名的碑学大师，独创“何体”，真、草、隶、篆、行书无所不工，取法甚广，熔碑帖于一炉，其行草为一代之冠。湘乡曾国藩，书法遒劲俊逸，能合南北自成一家。湘阴左宗棠精小篆，笔力雄健，结体朴逸，人称“左篆”。著名篆刻家长沙汪鋆，尝以丁黄印谱摹刻为帖，并旁款均不差累黍，名曰《寿石山房印谱》。沅陵丁可钧工篆刻，有《馈石斋印存》。安化黄自元擅楷书，有《黄自元楷书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该帖字体规矩，为自习“黄自元体”者描摹临仿之范本。光绪年间湖南巡抚吴大澂撰《说文古籀补》，开近代中国考证大篆类书之先河。他是清末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书画篆刻家，他书写的大篆，更多秦诏版的篆意。工篆刻，辑有《周秦两汉名人印考》一册。

民国时期的书法，解脱了封建桎梏，已不再局限于碑学的秦篆、汉篆、汉隶、比碑与帖学的魏晋书法，而增加了甲骨、钟鼎、章草。书法自由的风气大开，且可随心所欲地崇仰学习各派书法。然而，民国后期的一切官方及民间的文字应用，逐渐少用毛笔，来往文件，多用简便的钢笔及打字机，书法之道几乎淘汰到只作为艺术之欣赏，这是书法不及以前时的上下风行的原因。民国时期湘籍书法家，以道州何维朴、衡阳曾熙、衡山向樂、茶陵谭延闿、谭泽闿，长沙彭汉怀、郑家溉、周介禂、唐醉石，湘潭齐白石等为最著。道州何维朴是清末碑学大师何绍基之孙，书摹其祖，颇具功力。衡阳曾熙精北魏楷书，书法承石鼓及碑学，自号“南宗”，与曾寄籍长沙的李瑞清齐名，海内并称“曾李”。著名画家张大千曾拜“曾李”为师。衡山向樂篆写《盂鼎》，方拙入古。茶陵谭延嫼、谭泽嫼兄弟所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端严雄秀，一如颜帖，

为习颜书者两大手笔。长沙彭汉怀工书画篆刻，名震三湘，所书大篆《大同篇》，融两周金文“三大书派”风格于一篇，笔调圆润古朴，勾勒凝练，隐约显现出一股森然的庙堂气象。湘潭齐白石把木工凿斫的表现手法放入了自己的篆刻艺术中，刀法大胆泼辣，气魄雄伟；所刻“中国长沙湘潭人也”巨印，笔力杠鼎，奇崛多姿，这是他几十年匠心独运“胆敢独造”的结晶。著名浙派篆刻家长沙唐醉石，“博古多识，精鉴赏，秦石汉碑，一经过目，真伪立辨”，“先生治印，上窥秦汉，下法浙宗，识者尊之”。一生好石成癖，他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民国时期，他的篆刻作品有《唐醉石印存》和《醉石山农印稿》。1924年湘潭黎泽泰在长沙城创办“东池印社”，编印了《东池社刊》行世。1929年“潇湘书画社”在长沙成立，该社是以研究中国传统的书画篆刻为主的美术社团，集中了湖南省内一批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如粟谷青、彭汉怀、张一尊、毛凤祥等。

艺术的发展演变，永远与历史背景条件密切关联，这条件包括艺坛风尚与社会风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法篆刻艺术亦随着新的艺坛风尚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然而，“当代书法的格局风调，从整个来观察，其用笔方法，其规模意度，都还是明清的遗风流韵，还未能摆脱它的影响”（周汝昌：《当代书法大观》序）。自1949年至1979年书法篆刻界湘籍名家以湘潭齐白石、毛泽东、黎泽泰，长沙唐醉石，浏阳娄师白，衡阳马宗霍，醴陵徐鑫龄为最著。白石老人是一位放牛娃、乡村木匠出身的诗书画印俱精的艺术巨匠，他于1953年被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并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首任理事会主席，1955年获国际和平奖金，1963年被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196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辑有《白石印集》四册。著名浙派篆刻家长沙唐醉石于1962年首任武汉“东湖印社”社长，并著有《治印浅说》。1990年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编辑《唐醉石治印选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发行。湘潭毛泽东于1961年为橘子洲头题写的草书《沁园春·长沙》词碑，熔王羲之、怀素、黄山谷、岳飞之草书笔意于一炉，如惊蛇走虺，骤雨狂风，逾行越格，颇具儒将风范。湘潭黎泽泰工书法篆刻，书迹有“古麓山寺碑”小欧楷书石额和“长沙湘江大桥”隶书石额；其篆刻师法黄牧甫，方平正直，布局严谨，朴厚苍浑，刻有《毛主席诗词印谱》。书画鉴赏家衡阳马宗霍著有《霎岳楼笔谈》。书画史家醴陵徐鑫龄著有《湖南书画篆刻家汇传》。著名书画篆刻家浏阳娄师白为白石老人的得意弟子，有《怎样刻印章》一书行世。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湖南的书法篆刻出现了百花争艳的空前繁荣局面。作品有时代特色，富有创新精神，把篆隶楷行草融于一篇之中的“破体”书法以及“硬笔书法”，以一种

崭新的风貌，呈现于社会。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在北京开幕，湖南有周昭怡、谢梅奴等的作品入选。同年6月1日“湖南省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长沙开幕，共展出书法作品133件、篆刻作品31件；这次展览是湖南建国以来第一次全省规模的书法篆刻的盛会。1984年10月26日至30日，湖南省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成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自协会成立后，举办了多次展览和评奖活动，学习书法艺术蔚为风气，展现了书法艺术的多样风格和流派。谢梅奴所刻“和平万岁”篆刻作品，1986年被国家选送联合国参加“国际和平年美术、摄影、书法作品展览”。

总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书法篆刻界名家辈出。他们以风格各异的作品展现于书坛。随着湖湘翰苑对青年之培育，不少人才在国际大赛中崭露头角，振兴翰苑的“湘军”，呈现出“笑舞东风，松梅竞秀；喜沾春雨，桃李争妍”的新气象。

苏东坡佚文的发现与考证

——浏阳谢氏族谱钩沉

谢文耀

中华姓氏族谱散存民间者总在百余万部以上，迭经历代战乱，损失殆尽，“文革”动乱中复遭焚毁，今存于世者不足万部矣！笔者近年从事族谱文化的研究，广搜谱牒。1991年秋，曾返祖居浏阳，访得《谢氏四修族谱》一部，线装40余册，民国二十九年庚辰浏阳古港熊忠恕堂刊本，保存得很是完好。族谱卷首有宋元祐五年孟冬月，龙图阁学士眉山苏东坡《原叙》一篇，经笔者仔细校读，并查阅《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本），见该序没有收入，原是苏东坡的一篇佚文。现将全文标点分段，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苏东坡《谢氏族谱序》

山敦艮主静，然而蜿蜒迤逦，静而有动者存；水流行主动，然而澄潭汙渊，动而有静者存，心窃嗜焉。益州余生长之乡，岷山锦江诸胜概，已勤游赏。及长，宦游所经，如赤壁、锺山，凡储灵异者，靡不登临，穷其险怪。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得观钱塘潮汐，西湖花柳，及杭所属名山佳水之胜，绍兴与杭接壤，尤多奇岩秀谷，急欲攀寻，以豁襟怀。因判杭未久，徙居密州。越岁余，庶政粗理，扁舟至绍，登会稽，拜禹穴，憩山阴，观兰亭，并访越王勾践困栖、晋太傅隐居遗迹，太傅后裔多绅士，遮道迎余，登其堂则江左江右，青豫闽粤，谢氏贤俊咸在焉。谒见毕，知为会修谱牒萃也。既而，请余序以弁诸首。

余思谢氏自申伯得姓后，如汉谢夷吾，晋谢安、谢奕、谢玄辈，后裔如谢灵运、谢惠连、谢瞻、谢览辈，将相公侯，文人学士，奕世蝉联，难更仆数。然而在国则彪炳汗青，在家则照耀谱乘，本毋庸余序，余亦别无所藉以序。

惟思谱系乃木本水源所由纪，非泛常卷帙之可比也。而且祖宗之盛德大业，武功文德，俱于是乎载。谱既成，后人披而阅之，知某祖为汉元龟，某祖为晋太傅，某祖封康乐，某祖封望蔡，某祖某帝嘉为凤毛，某祖某帝叹为芳

兰，岂不绳武之思勃然兴起，族姓子弟用光先绪之宝欤！

爰书其概，附于简端，谢氏诸子体予意，践予言，则人杰地灵，益增名山佳水之胜。

宋元祐五年孟冬旦，龙图阁学士知浙江杭州眉山苏轼东坡顿首拜书。

这篇苏东坡先生写的《谢氏族谱序》，笔者作了个考证：

一、从作序的时间和署衔看，谱序末尾载有“宋元祐五年孟冬”云云，据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神宗熙宁四年辛亥（公元1071年），苏氏以获罪王安石，“乞外避之，除通判杭州。至熙宁七年五月，乃有移居密州之命”，这是苏氏第一次在杭州任职。18年后，至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公元1089年）“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学士……”三月，内累章请郡，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以元祐六年辛未三月九日被旨赴阙”，离开杭州。这是苏氏第二次在杭州任职。这篇谱序实作于第二次来杭后之第二年旧历十月。《苏文忠公全集》卷十四《杭州上执政书二首》，所署全衔是“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军州事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亦与谱序所书暗合。

二、苏东坡《谢氏族谱序》云：“越岁余……登会稽，拜禹穴，憩山阴，观兰亭，并访……晋太傅隐居遗迹，太傅后裔多绅士，遮道迎余……”这说明当年谢安后裔，闻苏东坡老人过访，是非常欢迎的；而东坡老人对谢氏先辈的“武功文德”，也赞扬不已。如苏氏《王进叔所藏画跋尾》云：“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答子勉》云：“惊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处士还清节，滑稽安足雄？深沉似康乐，简远到安丰。一点无俗气，相期林下风。”《书黄于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都对谢康乐等的诗作及其为人评价甚高。苏东坡好游山水，其在杭州游踪经查与谱序有关，有苏氏著作可考者，如《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禊亭》云：“曲池流水细鳞鳞，高会传觞似洛滨。红粉翠蛾应不要，画船来往胜于人。”按：禊亭即会稽山阴之兰亭，也叫修禊亭。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阴历三月三日谢安、谢玄、王羲之、孙绰等名士共41人，曾宴游雅会于此，成诗一卷，王羲之于卷首挥毫作序，即著名的《兰亭序》。苏东坡《宿九仙山》云：“风流王谢九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馀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按：九仙指左元放、许迈、王谢七名士（包括王羲之、王凝之、王献之、谢奕、谢安、谢石、谢康乐等），山上供奉有祠宇香火。《游东西岩（即谢安东山也）》云：“谢公含雅量，世运属艰难。况复情所钟，感慨萃中年。正赖丝与竹，陶写有馀欢。常恐儿辈觉，坐令高趣阑。独携缥缈人，来上东西山。放怀事物外，徒倚弄云泉。一旦功业成，管蔡复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弹。挽须

起流涕，始知使君贤。意长日月促，卧病已辛酸。恸哭西州门，往驾那复还。空余行乐处，古木昏苍烟。”这说明苏氏在杭州任职期间，登会稽，观兰亭，访谢太傅隐居遗踪，是确有其事的。

三、从《重刊苏文忠公全集》部分诗篇可以看出，苏氏在杭期间，与谢安后裔往来密切。如《次韵子由送赵屼归觐钱塘遂赴永嘉》云：“归舟转河曲，稍见楚山苍。候吏来迎客，吴音已带乡。言从谢康乐，先献鲁灵光……”当他离任杭州前，谢家子弟与时贤刘景文、马忠玉等还在西湖设宴饯行，席间唱和，依依话别。如《次前韵答马忠玉》云：“坡陀巨麓起连峰，积累当年庆自钟。灵运子孙俱得凤，慈明兄弟孰非龙？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从。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原来他们在杭州还结过诗社，平日互有酬唱呢！离杭后，苏东坡回到京师，接着又先后调任颍州、定州、惠州、儋州，几经沧桑，还经常眷念在杭州任内“风流王谢之间，啸歌自得”的悠闲生活。而且在其所作的一些诗歌里面，感叹兴怀。如《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云：“俯仰东西阅数州，老于岐路岂伶优。初闻父老推谢令，旋见儿童迎细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远思颜柳并诸谢，近忆张（子野）陈（令举）与老刘（孝叔）。……忆昔湖山共寻胜，相逢杯酒两忘忧……”《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云：“江令苍苔围故宅，谢家语燕集华堂。先生笑说江南事，只有青山绕建康。”又《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云：“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上述这些诗句，字里行间充满着眷怀谢奕、谢安后裔的情思。因此，当年苏氏为《谢氏族谱》作序，绝非偶然。

四、谢氏祖先多为客家，讲客家话，其后裔敬宗收族，极重族谱、家谱之纂修，谱志之保存最为完善。按谢姓开族和国内许多氏族一样，源于周宣王大封功臣。据历史记载：公元前 827 年（即周宣王元年），命申伯、韩侯、仲山甫等经略中原，申伯即徙邑于谢（即今之河南省唐河县南一带），其后以谢为氏，即为受姓开族之始。《诗经·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诗传》云：“谢，周之南国也。”从周宣王算起，至现在最少也有 2700 多年的历史了。这 27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大地曾发生过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谢氏自申伯受姓之后，历 36 世至晋谢衡，大唐初年（约公元 281 年）官国子祭酒，值永嘉之乱，由陈留阳夏避地于越之始宁，至谢安出生时，谢氏一族已流寓江南，散居江苏南京、浙江杭州一带，其后有一部分后裔又迁往福建、台湾、广东嘉应州（即今梅县），谱志记载甚详，斑斑可考。浏阳谢氏为谢衡次子谢裒的后代，分奕、据、安三公世系，清康、乾间由广东梅县陆续迁来，迄今已有 300 余年的历史。如笔者即为谢安六十世孙。浏阳

《谢氏族谱》从清道光十八年一修以后，至民国庚辰曾历四修，每届族谱续修均有序言、考据，同时并将苏、杭、闽、粤旧谱部分旧序也保存下来，刊入新谱。因此，苏东坡氏所作谱序，得以留存至今，是很不易得的，确为苏氏原作无疑，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由此，笔者感到：发掘中华族谱文化，利用族谱里面的遗文轶事，以补国史、文物史和各家已出版的诗文集的缺漏，还大有工作可做。

古夜郎故乡

——且兰与牂牁考

弘　征

自拙文《怀化西部——古夜郎发源地》于去年12月8日《湖南日报》刊出后，引起不少同志的兴趣。同时也有读者提及，最好能再探讨一下且兰与牂牁的问题。因为前引《后汉书》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牂牁。"夜郎、且兰、牂牁这三个名称已经紧密地连在一起。(《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均作"始楚威王时，遣将庄蹻"，似与时间不合。已撰《读史献疑两则》一文辨正，刊于2001年5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

一、古且兰究竟在何处

不仅古且兰今日不知何处，连西晋时所置的且兰县治，现在几种重要辞书上的说法皆不相同。《辞海》说："在今贵阳附近，一说在今凯里西北。"《辞源》说："地在今贵州福泉县。"《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说："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

考楚将庄豪（或庄蹻）率军登岸的这个且兰，必须是在沅水之旁而又非楚国当时的辖地（所以才须征伐）。从屈原在公元前296年遭放逐，溯沅而上，至辰溪，"入溆浦余儃佪兮"，可知楚军此时要"从沅水伐夜郎"之起点，必然是在这以上的今中方与黔城一带。沅水及沅水的支流㵲水（古时亦每将此当成沅水），在这一段正好流经丘陵地带，河道逐渐开展，很适合"椓船登岸"。加之凡属好地方必定人烟稠密，乃一地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为兵家所必争之地。现中方县荆坪的对岸就已发现夯土的古城墙遗址，其地距黔城、安江、芷江、鹤城区（今怀化市所在地）均为约60华里，故名曰中方，足可证曾经是一个大部族的都会。由于这一带河槽沙洲很多，河湾凸岸都被沙滩覆盖，水流清浅，很可能在当时被人们称作"出滩"（已出险滩）；再一种可能便是当时当地民族语言的音译，后来在文人笔下就成为文绉绉的"且兰"了。

若说楚将庄豪"出沅水"登岸的且兰是今贵州的福泉县，则不仅所有的江源水流皆小，并处崇山峻岭，就是长江的源头也难以逆向行船。㵲水仅自湖南芷江以上，河谷便多穿插于坚硬的板岩和冰渍地层，每每构成长长的峡谷，如新晃与芷江之间的江口至长坪、白马渡至蟒塘溪，全长约38公里，就有57处险滩，两岸高山皆在百米之上，除了山民分段放木排、竹筏，楚军的大船队要逆流而上是不可能的，若要更从以上去寻找一个能系船登岸交战而又能击败守敌的地方，就愈加难上加难了。

其次，拙文曾论及今湖南怀化西部是古夜郎的发源地，并不是说当时的夜郎只局限于这一块地方而不及今贵州境内的㵲水上游。实际上夜郎本是一个多部族的联盟，难以定其域界，域界并常变化（流动性及又联合了新的部族），加上在古代的所谓南蛮之地，无大道行车马可助行役，较大的流动尤其要靠取水路乘木排、竹筏和小木船。高山大峒不仅攀缘困难，而且常常无路可循，迁徙后的耕作、生活也必须傍水，因而今贵州境内的㵲水流域必然是夜郎最初向西南发展的活动地区。今贵州福泉县罗福塘是㵲水的源头，黄平县亦属于㵲水流域，所以西晋时曾在这一带置且兰县以示夜郎故地，新版《辞源》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的说法是合乎情理的。但无论其治所在福泉还是黄平，皆属于夜郎国灭亡后的朝廷建置，不是楚军登岸的那个且兰。

二、牂牁原本不是地名与江名

牂牁原本不是地名。《广韵·歌韵》云："牁，所以系舟。"颜师古《汉书注》及孙奕《履斋示儿篇·字说》云："牂牁，系船杙也。"裴松之注《三国志·常林传》引《魏略》云："吴使朱然、诸葛瑾攻围樊城，遣船兵于岘山东，斫材牂牁。"可知其本义是指树桩或引申为指江中突出的岩石。(《水经注》曰："牂牂牁亦江中两山名也。")楚将庄豪于江边植下一批树桩系舟登岸打了胜仗之后，便命名其地为牂牁以纪其功，他走后这名称也就随之消失。至于最初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所见到的"牂牁江"，按理本该是庄豪将且兰改名为牂牁因而连"沅水"的江名也同时改了才对，但司马迁所记的却是他同时代唐蒙"风指晓南越"的道听途说："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今广州）城下。……夜郎者，临牂牁江。"这就给后世带来考证的麻烦了：沅江固不能直达今日的广州，今贵州境内也没有一条江可达，因而疑是沅江、北盘江、黔江、红水河、寻江、西江、都江、濛江、乌江……者众说纷纭，但都难以自圆其说，原因是根本就没有这条江。要之不过是当时的一种泛称，称有牂牁可系舟之江段而已！

另有一说谓牂牁乃古国名，源出于《管子·小匡》篇中的一段话："桓公

曰：‘余乘车之会六，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如果真是这样，则牂牁国早在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之前就已经有了，比庄豪伐夜郎要早300多年，且兰不是改名而是恢复原名了。为什么在《史记》诸书中对此均一字未提？就是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只见有“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语，系本《国语》而来，而无“北至”、“西至”、“南至”之类。问题就出在《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本人所作，乃战国时代至秦汉人互加编缀而成。纪昀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有云：“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尤非一时之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清代学者姚际恒在所著《古今伪书考》中特别指出：“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我们且细读这篇《小匡》，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文字完全是抄袭自《国语·齐语》的，只不过稍加改头换面而已！以这一明知有伪的文字来作为古有牂牁国的孤证，是完全不可信的。

牂牁之按传说正式命名为郡，是汉元鼎六年（前111年），那已经是距庄豪从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近200年之后了。

女书及其文字源流探讨

周硕沂

女书流行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一带，是一种记录当地方言的特殊符号，是祖国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其源流，却一直未能找到有关史料的具体记载。

近代以来，根据甲骨文的出土，一些人认为：我国文字的普遍形成，似乎始于商代。而西周到春秋的文字，当以金文为代表。及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分立，形成了《说文》所谓“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至秦统一，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淘汰了各色各样的地方文字。但毕竟不可能彻底干净。如《孝经》、《左传》以及《尚书》、《礼记》的重新出现于汉代，使许多学者恢复了古文字的传授。而西晋的汲冢竹书，也将大量战国时代的文字流传到后世。

根据以上情况，故李学勤先生曾在《历史知识》1984年第10期发表《古文字十二讲》，其中说：“曾有一段历史时期，有人认为：战国时代的文字，既存在着不同钟鼎款式，不同《说文》篆体的缺点；再加上这些文字的形体变化特多、结构形式不严以及普遍使用同音假借，故又存在着难以辨认等许多毛病。有的甚至怀疑出于杜撰，以是注意的不多，而研究者更少。”

又据元曲描写宋代某些有才学的女子常用一种“蚊脚蝇头”小楷，如元曲《明珠记》“蚊脚书”注云：“有一种文字，仄纤垂下，称为蚊脚书。”在女书流行地域，很多人一直认为女书方言文字的笔画确实很像蚊脚，故把这种文字称之为“长脚蚊字”。有个从当地被选入宫作为宋哲宗妃子的胡玉秀，恰恰使用过这种文字修书探亲，寄回家乡后一直被人传诵，说明了当地向来流传这种文字绝非偶然。从至今搜集到的所有女书资料来看，其“字体变化特多”、“结构形式不严”以及“普遍使用同音假借”等现象均与上述李学勤先生提到的情况相符。

又据所有女书都必须按其用字的土话语音诵读，才能理解它的内容，这就说明：这种文字确实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地方文化。然而，这种文字究竟是怎样

产生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女书文字很可能是由南方越人创作出来以记录当地方言的稻作文化。诚然，所谓稻作文化，实际上也就是远古时代南方越人拥有的一项部落文化。而在上古时代，一些部落，虽然各自具有他们的语言，并具有足以记录其语言的文字，故在不同的部落之间确实形成过一些不同的部落文化。可是，这种部落文化，除供每个部落内部使用以外，却不易为其他的部落理解。然而，在部落与部落之间，亦必须交流思想。故任何一个部落，在与另外一个部落交流之际，便要使用一种共同理解的语言或文字当作交流工具。像汉语实际上就是我们祖国自古以来许多部落都能理解，并足资共同使用的一种语言。再加上由于很早就逐步形成了用以记录汉语的文字，更能用作交流工具。而现在所有的女书方言文字，通过仔细考察，实际上本来就是古代用以记录汉语的文字。也就是由于在原永明县这个地方的这个部落，在接受理解了汉语及其文字以后，用能将汉语文字记录的语言翻译成当地土话，并同样能够用这种文字记录土话。这就是女书为什么只能用土话法读才能理解其内容的原因。

因为在女书使用汉语古文字记录土话的时候，往往只以谐音为主，不但省去了许多同音字，并普遍采取通假借代的办法，形成了至今沿用的这么一套类似表音符号，实际上都是利用借代手段形成的写作形式。致使不少喜欢研究女书又不懂土话的人难于理解，甚至常有误解的现象出现。

以上情况说明：现有的女书方言文字，确实是一种尚未通过秦政改革便一直流行在现江永县上江圩一带的地方文化。然而，唯独在这里能够形成这么一项奇特的文化，并得以代代传承，其原因何在呢？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察，特别是80年代中期，通过文物考古普查发现：江永县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说明了这里的文化早在部落时代及商周时期都与中原一带不相上下，也可能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使用汉语古汉字记录当地方言，形成了这种至今保留着原来面目的女书方言文字。

有关女书方言文字的考察概况，1989年10月8日的《湖南日报》报道略谓：我省考古学者，为了考察女书文字的源流，跑遍了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十来个省，查阅并选择了各地近年出土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陶器残片刻画纹饰，用其中的600多个符号同女书单字进行对较研究，发现女书很多单字都与刻画符号相符，足见女书文字很可能与甲骨文同步，甚至更古，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代仍然使用，至今保留着原来面目的南楚地方文化遗产。

这则报道，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女书方言文字在很多方面确实与商代以前的刻画符号类似。那么，这些符号是如何能够在当地流行并得以传承到现在的呢？笔者于2000年9月参加在宁远九嶷山举行的舜文化研讨会后，有如下一

些体会。

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在他死后，他带来的所有部下以及拥护他跟着南下的许多群众，都留在这里定居下来，成为当地的老百姓。像徙居到女书流行地域和原永明县境内的南下之人，还曾经在舜帝栖息过的地方——层岩，盖起了舜庙，以表达他们缅怀舜帝之情。于是，舜帝南巡带来的这批部下和群众，在这里留下定居以后，便把他们使用过的文字带了过来，并在当地原有的百姓接受后得以代代传承，利用这种文字来记录当地的土话。再加上当时所有从外地迁徙到这里定居的人，亦很快地接受了当地包括讲土话的种种习俗以后，使当地得以形成这么一种文字记录方言的特殊文化现象。像后来的宋哲宗妃子胡玉秀，即是来自外地，其祖辈系山东人，在唐代时随军镇压六州之乱，平叛后奉旨军屯于此，通过与当地群众同化，致使玉秀亦能用方言文字修书探亲，并使其探亲书得以被人传诵。

那么，原永明县上江圩一带的这种方言文字，却为何未被淘汰，却沦落到专为妇女们使用，形成女书呢？

我以为秦政统一文字，在我国文化上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这确实是应该肯定的。但秦代的统治维持不久，即使影响再大，20来年的工夫，要彻底消除社会上一些根深蒂固的影响，如包括消除上江圩能用以记录方言的这种文字，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原永明县上江圩一带的这种方言文字，根据始皇文字改革精神，也应予淘汰。就是由于秦代的统治维持不久，影响不够，特别像原永明县这样的偏僻山区，祖龙鞭长莫及。这或许就是当地这种文字未能被淘汰的原因之一。

诚然，在始皇统治时期，由于有了统一的文字，便绝对不允许习文者再去学习或使用地方文字。更兼当时在社会上从事有关文化活动者皆以男子为主，也就是由于重男轻女这种意识偏向的形成，打破了过去在上江圩一带男女共同拥有文化，包括当地男女共同使用方言文字的局面。习文者皆为男子，而男子所习者当然只有通过秦政改革的汉文。实际上，当时的男人们为了从事文化活动，若有人再去学习或使用地方文字，不但没有出路，甚至会触犯刑律。所以，在原永明县上江圩一带，这种方言文字，通过秦政改革，同样从这地方的男人们身上被淘汰了。

就因为男尊女卑，妇女们地位低下，只有男子可以学习文化，妇女们没有这种资格，更没有当官或从事社会文化活动的任何机会。但不能否认，她们同样具有对文化的迫切需要。而她们早在秦政统一文字以前就跟随男人们共同掌握着当地的方言文字。因此，她们在没有资格参与学习秦政改革以后的文字的情况下，便只有把固有的文字沿袭下来，以满足她们根据一些传统习俗开展文

化活动的需要。这应该就是原永明县上江圩一带的方言文字为什么会保留在妇女们手里的重要原因。上江圩一带的妇女们用方言文字创作女书，又与当地传统风俗习惯关系至为密切，所以能够代代传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现仅择其贺三朝一例，简介如下。

贺三朝一类，是目前搜集到的资料当中为数最多的作品。因为贺三朝是当地一种普遍流行的传统礼节。所谓贺三朝，指的是当地年轻妇女出嫁后的第三天，其娘家亲眷、姊妹及要好的女友，都必须写一封女书到男家去向新娘祝贺。其他地方虽也有贺三朝这种礼节，但都没有修书祝贺的。妇女们没有资格学习文化，无法用秦政改革后的汉字去创作贺三朝这种贺信，便只能用原有的方言文字书写。为了见习这种文字，每逢三朝之际，新婚男家的妇女宾客便皆齐集一堂，等待着三朝贺礼的到来，皆以能够抢先拿到贺信来读为快。善于女书者，固然可以藉此欣赏人家的作品，不善女书者，便趁此通过听诵，并请能认读者指教学习女书。由于贺三朝这种女书作品，对于出嫁的亲人确实具有极度关怀之处，其内容往往对新娘有不少的怜惜、歌颂、祝福、思念、教诲之词。因此，一个青年妇女，在出嫁后的第三天，如若没有亲友修书前来祝贺，便会被人家看不起。故凡有亲人出嫁，即使自己不会写，也得备些薄礼去请人代笔。而善于女书者亦因此能够得到大家尊敬，并经常能够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致使女书得以代代传承。只是到了全国解放以后，这种礼节才被取消，包括废弃了多种多样有关传承女书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不少的所谓革命派，竟把人家保存的贺三朝书信和其他女书作品，视为封建遗物，大部分被搜集起来一把火烧掉了。还有不少喜欢开展女书诵读活动的妇女被拉到斗争会场上去受过批判。故自此不复有人再写女书。

湖湘数学著述钩沉

许　康

数学是儒家文化（礼、乐、射、御、书、数）的一部分，清代经学大兴，乾嘉学派及其流衍，均有不少人研究数学。但一般人很难见到湖湘学者的数学著作，本文从宋元明清史料和数学书中作一番钩沉。

一、丁易东和他的《大衍索隐》

丁易东，字汉臣，号石潭，自序“武陵人”，一说为龙阳（汉寿）人，南宋咸淳四年（1268 年）进士，充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枢密院编修官。元初隐居常德郡东龙阳坡，筑“石坛精舍”，“远近来学者众”。郡守李彝宪荐举他为官，不应，遂名其精舍为“沅阳书院”，尊他为山长。著《周易象义》（一说《周易传疏》），又作《大衍索隐》三卷，传播钻研易学的心得，成书不晚于 1300 年。后书共收 11 个“纵横图”（西方称为 magicsquare，幻方），其鲜明特征是基于“河图”（“大衍之数五十”）、“洛书”（“其用四十九”），造法十分巧妙，最高方阵达到 9 阶，仅次于与他同时（远在杭州）的杨辉“百子图”（10 阶），但构图法各不相同，为独立创造。他们的成果在当时世界“组合数学”领域居领先地位，值得我们珍视。

二、难可称述的元明两代

丁氏之后，元明湖湘著作中的数学史料，迄今尚感甚微。但有一人值得探究，即元末明初的贾亨，字季通，长沙人，著《算法全能集》，是被辑人《永乐大典》（1404 年）的 10 部算书之一，共收 126 个经济数学问题，反映了当时数学的商业化、应用化，也可窥见湖南经济和管理的长足进步。

三、丁取忠与《白芙堂算学丛书》

丁取忠（1810—1877），字肃存，号果臣，一号云梧，长沙人（现望城县高塘岭），名诸生。1837 年，他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与同学邹汉勋

(1805—1853)、黄朗轩(?—1840)共同钻研数学,得到贺师的理解和支持。1844—1845年又与李锡蕃继续在这里研讨数学,后来形成《数学拾遗》(1851年初版)、《舆地经纬度里表》(1852年出版,曾得邹汉章、汉勋之助)。他的长兄丁叙忠(秩臣)后来任求忠书院山长,他也常驻该书院,并在近旁的"古荷池精舍"(现长沙荷花池路长沙师范校园内)编辑《白芙堂算学丛书》共23种(32本,成于1870—1877年间,是晚清流行最广的数学丛书,上海等地均几次翻刻)。求忠书院本是为了培养湘军子弟而建,所以丁取忠的这套丛书与胡林翼(早年赠丁"买书之资",移作刻书经费)、左宗棠(专赠300两银刻书)、曾国藩(其子曾纪鸿回长守制时参加编著工作)、郭嵩焘(与丁取忠交密)、王闿运(丁死后,负责丛书最后一本《格术补》出版)等都有关系。另外,丁取忠对岳麓书院也怀着深厚的感情,例如向刘琨修复之后的岳麓书院赠书。笔者十年前在其家乡调研时,还听到群众中有"三书院(按:指岳麓、城南、求忠),两丁公(按:叙忠、取忠)"的口碑。丁的表弟李锡蕃(字靖夫,1823—1850)世居望城县大湖乡杉木桥,其三弟李寿蓉(字篁仙,1825—1894)是进士,为"肃(顺)门六子"之一,以《天影庵外集》和联语享盛名,是谭嗣同岳父。李锡蕃的《借根方勾股细草》,是湖湘学人最早将天元术与西方早期代数相沟通的著作。

四、"长沙数学学派"其他成员

当时从丁取忠研讨和编著的,还有左潜(字壬叟,左宗棠侄)。他是廪生,1874年急病去世,否则也是长沙、湘阴等地书院的拔尖人物,他曾将自己编写的《割圆缀术》(徐有壬初稿)捐给岳麓书院。黄宗宪(约1845—1910?),字玉屏,新化人,他是丁取忠最杰出的弟子和助手,其《求一术通解》和《古琴古砚斋算率》是晚清第一流的数学成果。后在郭嵩焘、曾纪泽属下出使英、法、西班牙,可列为近代最早赴欧的中国数学家。1987年笔者在新化调研时,知道他与资江书院很有渊源。殷家隽,字竹伍,湘阴人,候选同知,著《克念斋算草》,1881年起在郭嵩焘主持的思贤讲舍主讲数学。王闿运曾简介他,"(殷氏)音元之旧族也……尤喜制器……以此蠹其家……唯予友丁取忠颇奇竹伍之术,名稍稍闻诸生中","湘军兴始务造炮,立长沙公私二厂……竹伍不在选中","长沙黄冕""欲倚以造留防军械",也不见用,"则贾生之流也"。黄传祁,长沙人,字少溪,同治举人,有《白芙堂丛书札记》稿,并有少量成果附于著名数学家吴嘉善《分法》、华蘅芳《开方古义》书后。更有名的是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曾国藩幼子),他受曾国藩幕下的李善兰、华蘅芳等的指教,又通英文,曾将《大英百科全书》的"代数学"改著为《对数详解》,

又创造计算圆周率π的无穷级数新公式,成《圆率考真图解》(1874年),将圆周率计算到一百位数字,在当时整个亚洲居领先地位。

五、许氏父子与湖南财政

许清渠,祖籍浙江杭州,随其父来湘"传钱谷刑名之学",落籍长沙。咸同年间任布政使李榕幕宾,手订《交代章程》,整顿了湖南财政。幼子许准吾,继任布政使幕宾20年,编订财政《条例》,得大学士阎敬铭赏识,推行各省仿行。他"精算学",能由两名助手宣读不同账册,他左右开弓运珠如飞,"不爽铢黍",是"算学用之既久,而神明变化无不可者"的突出事例。他们是笔者祖先,引语见《沧江先生诗文钞》。

六、湘水校经堂的数学教育

该堂由阮元门生、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道光十三年(1835)创建于岳麓书院内(后迁出),仿阮元的诂经书院、学海堂例,不课举业,专课经史。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中,"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光绪二十三年学政江标还在院内设立了算学等学会。丁取忠之友杜贵墀(巴陵人,举人)曾任山长,学生中有周采之(广询,湘乡人)著《算学入门》,为陈宝箴招致求贤书院讲课时(1896年)所作。

七、廖嘉绶与图们江勘界

廖嘉绶(一作家绶、家寿,字子忠,长沙人),1860年生,"见知于南昌梅小岩中丞启照,荐入江宁算学书院"。1880年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廖有"求志书院季课、算学(著述)各种,本在上海算学局"。1883年,廖"应边防大臣吉林将军希元之聘,为吉林表正书院算学教习"。1886年他被钦差大臣吴大澂委以与沙俄代表会勘吉林边界重任,能运用精确的数学测量使俄方无所施其狡计,争回百余里领土,还立铜柱铭文:"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是民族功臣。他著有《廖氏算书》(含勾股术多卷,《炮法》4卷,《测圆海镜翼》20卷,《对数较表》等)。

八、晏孝儒与浏阳算学社

晏孝儒,字壬卿,新化人。笔者调研时知其出身资江书院和城南书院,戊戌维新初应聘到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等倡办之浏阳算学社(馆)任教,是从书院到新式学堂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九、刘铎与《古今算学丛书》

刘铎和刘钜兄弟均善化人，中举，授学。他们都与城南书院有渊源。刘铎在戊戌维新时期在上海设算学书局，刊印《古今算学丛书》共97种，计1008卷，是我国数学出版史上空前的巨制，当时《湘报》多次为其刊登广告。刘铎字振愚，家居长沙上黎家坡，还著有《若水斋算学书目》，也很有名。为刊印“丛书”，家产耗尽。刘钜曾任星子（景德镇）知县，后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十、许兆魁与时务学堂

许兆魁（字奎垣，湖北黄陂人），两湖书院及自强学堂毕业，戊戌维新时应聘来常德德山书院主讲数学，“从学者已二三百人”；后任时务学堂格算门教习，数学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都堪称湖南最新式的；维新失败后，继续在求实书院（1899）、省城大学堂（1902）、湖南高等学堂（1903，已与岳麓书院合并）、优级师范学堂（1908，后也迁入岳麓书院）任教，影响深远。

十一、曾广钧与无穷级数

曾广钧，字重伯，是曾国藩长孙，曾纪鸿长子，光绪进士，号称“湖南四公子”之一。他爱好数学，“做了很多无穷级数题目”，著《曲线洛罪级》（石印本）。

十二、黄钟骏父子与《畴人传四编》

黄钟骏，澧州人，率子伯瑛等，编成《畴人传四编》11卷，（1898年刊刻），补充了阮元、罗士琳、诸可宝前三编的遗缺，是湖南人对中国科技史的重要贡献。黄伯瑛在1902年还由澧州荐举人湖南省城师范馆，黄钟骏还著有《留有余斋算学》四种。

十三、赵缭与《数学辞典》

赵缭（1878—1952，字赋箴，长沙人），岳麓书院读书时适逢戊戌维新，成为王先谦批准新设的“算学门”仅有的两名学生之一。后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湖南分会会长。北洋军阀乱湘期间，他到上海，编译微积分及中等教科书，其于1914—1922年成书的《数学辞典》（1923，群益书局），是我国早期大型数学工具书。他还写有组合数学如“黑白图”等论文，载《学艺》杂志。他教子有方，如赵方民等，都是著名的教授、人大代表。

十四、王正枢与《立庵算法》

王正枢，字立庵，浏阳人，著名电影演员王人美之父。他曾在第一师范任教数学，毛泽东即其学生。其清末所著《立庵算法》，竹纸印刷，可作教科书。

十五、清代湖湘其他数学家题名录

常宁段巘生，康熙进士，通天文星历、地理堪舆、勾股算法等；长沙余廷灿，乾隆进士，与戴震、纪昀切磋天文、律历、勾股、六书之学；道州何绍业、湘阴左宗植、新化邹汉勋，举人，通天文、算法；溆浦陈棠，著两种《四元消法》（四元代数方程组解法，难度很高）；宁乡杨之培，著《椭圆正论》、《微积新术》、《玉吟细草》、《算草》等；新化李固松，著《算数名数释例》（数理备旨、曲线求幂、数名释例）、《算学识别》；湘乡王宗文，著《算法通》；长沙何维棉，著《百鸡术演代》；沅陵李玉如，著《代数易知录》；湘阴周丰干，著《天元开方补表》；湘乡彭聘求，著《算法九章解》；长沙黄渌为，著《算学正宗》；湘潭黄远植，著《算学答记》；新化欧阳俊，著《嘉量细草》；湘潭蔡秉钧，著《数根简括明便日新表》；桃源聂祖订，著《游艺录算术》；溆浦舒鸿钧，著《代数纪闻》、《平面几何纪闻》；桃源龙棻，著《数理根方启秘》；清泉谭学元，著《九章算法适中》、《三角形纲目》……真是惟楚有材，清代大盛，湖湘数学文化，蔚为大观。

魏源故居探访记

汤策程

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人。他曾长期居于江苏，或给陶澍、贺长龄等做幕僚，或在兴化、高邮、东台等地为州县官。因此，他留有邵阳、南京、扬州三处故居。前不久，我们沿着魏源的足迹及仕宦行踪，走访了邵阳、南京、镇江、高邮、兴化、东台、扬州等地，所获甚丰。

邵阳故居

魏源的出生故居在今邵阳市隆回县金潭乡学堂冲魏家塅沙洲上。这里青山环抱，阡陌纵横，风景优美。明代以前，这里是瑶人聚族而居的“世外桃源”。明初设宝庆卫，建隆回巡检司，以统治瑶人，移江西民屯田戍守。魏源之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写道：“先世江西太和县人，于明初迁湖南邵阳之金潭。”

魏源所在时代，金潭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村。农民以耕种水稻为主，兼产棉花、苎麻。中产以上人家，塘里有鱼、埘里有鸡、圈里有猪、缸里有酒，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魏源诞生在这个淳朴的自然环境中，从小就喜爱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

乾隆中叶，魏源父亲魏邦鲁与兄辅邦各建一座砖木结构的住宅于沙洲上。两宅都是两正两横，规模及布局大小一致，中间仅隔一条小石径。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 年 4 月 23 日）；魏源就诞生在这座住宅里。嘉庆十八年（1813 年）魏源在这里与严夫人结婚。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魏邦鲁住宅毁于火灾，全家寄居魏辅邦家。次年，魏源侍母携妻举家迁居江苏。道光十九年（1839 年），魏源 46 岁时回家扫墓，仍居魏辅邦家。今天我们看到的魏源故居，即为魏源父亲魏邦鲁之兄魏辅邦故宅。

现在的魏源故居，除左侧楼房及朝门已经拆毁外，其余两正一横保存完好。1983 年 9 月 10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邵阳召开纪念魏源诞辰 2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已仿照原貌修复，并于 1996 年 11 月被国家文物局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魏源故居现有两正两横：后进为正堂，祀列祖列宗，两侧为正房；前进为厅堂，宴接宾客，两侧为客房。两楼为楼房，上楼下仓。现右侧木楼为魏源童年时代的读书楼。魏源 7 岁时从塾师欧阳炯明在此楼读蒙书；后又从塾师刘之钢在此楼习举子业。厅堂前有坪地，坪地前面为朝门，筑墙包围整座院子。大门上有楹联：

沙洲回碧水；
朗月照金潭。

南京故居

1819 年魏源第一故居——金潭故宅毁于火灾时，魏源父亲魏邦鲁正在江苏荆溪（今宜兴）县张渚任巡检。1820 年，魏源携妇侍母迁居江苏父亲的任所。1825 年起，魏源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并于淮北试行票盐法。此项改革使政府每年增加税银数十万两，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源本人也由经营票盐而致富。

南京是魏源幕僚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魏源入幕南京后，购得乌龙潭湖干草堂“以为别业”。至道光十一年（1831 年）其父逝世后，才扩建湖干草堂，自题名为“小卷阿”，举家迁居南京。这就是魏源南京故居——今南京市城西龙蟠里“小卷阿”。魏源南京故居原有三进房子，占地 500 余平方米。现已冷落成了大杂院。我们到“小卷阿”时，龙蟠里正在拓宽马路，人流熙攘，吊车、挖土机轰鸣。魏源故居与马路另一面的水科院都是临街建筑，不拆这方就难免要拆另一方。经过研究，城建部门作出决定：舍魏源故居，保水科院。理由是魏源故居已较残破，而水科院至今还常进行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的试验。魏源孙女魏韬的邻居薛世霆老人，在“小卷阿”住了 40 多年，他说，昔日门楣上还有魏源亲笔题写的“小卷阿”三字，可惜“文革”时被红卫兵“破四旧”铲去了。现在，故居前房子因扩改马路已被拆。老人指着天井中魏源亲手植的那株腊梅树，激动得声音有些沙哑地告诉我们：“要不是马路往外稍微弯了点，这株腊梅树就难保住了。”据悉，在薛世霆老人向新闻媒体求助下，经过《金陵晚报》连续多次追踪报道和市民广泛参与讨论，城建部门最后修改原规划，采取了折衷的方案——即全拆改为拆前进房子。

“小卷阿”是南京市 1982 年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魏源曾孙女魏昭、魏韬姐妹生前一直住在这里。姐姐魏昭在“文革”期间去世，妹妹魏韬直到 1992

年才病故。我们这次在南京博物院有幸见到了魏韬生前捐献的图章、字画及魏源重订的《书古微》部分手稿。关于"小卷阿"的产权归属问题，自魏韬去世后，产权归南京市房管部门。魏氏宗裔、南京航运学校魏建华先生自费经过5年多的诉讼，将产权从房管部门过户到文物部门，他与薛世霆老人一样，是南京魏源故居的自觉的守护人、保护者。但在南京街头，我们也看到了"热了香君，冷了魏源"的景象。现在"小卷阿"是南京市四中临时宿舍，里里外外住了几十户人，房屋结构大都为居民改变，已成了不折不扣的大杂院，如果不是门楣上还有些石雕，谁也想不出这就是魏源故居"小卷阿"。这样一所破旧的住所，显然不能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香君楼媲美。难怪魏氏族裔、魏光焘之孙、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魏荣爵博士也慨叹"不能热了香君，冷了魏源"。

扬州故居

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记载：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陈太恭人（魏源母亲，笔者注）春秋高，思所以尽其欢，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栽花，养鱼饲鹤，名曰絜园"。园在扬州新城仓巷（今扬州市广陵区新仓巷37号）。

我们这次到扬州，正值扬州市"烟花三月经贸洽谈会"，有关"扬州八怪"的宣传随处可见，而与魏源有关的扬州絜园、旧盐运使司衙署和淮北盐场等，则知之者甚少。我们在扬州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复印了《江苏省文物古迹调查表》内关于魏源故居絜园的部分资料，才按图索骥找到絜园。

园是魏源养亲、居住、读书写作和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他自办刻印工场，自费刊印《圣武记》、《海国图志》和《古微堂集》等著作；在这里，他曾往京口（今镇江）与奉旨流放伊犁的林则徐会晤，四眼相对，双泪长流，"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便是当时写照；在这里，他曾与来此小住的龚自珍、何绍基、邓显鹤等同道名流一道诗歌酬唱，忧国忧民。据《江都县志》卷十三《古迹考》载："絜园，邵阳魏明府源寓庐，在钞关门内仓巷，有古微堂、秋实杆、古藤书屋诸胜。龚无靴，假于魏，魏足大而龚小，一日客至，剧谈大笑，龚跳踞案头，舞蹈乐甚，洎送客，靴竟不知所之，后觅得于帐顶。当双靴飞去，龚不觉，客亦未见。名士风流，至今传为佳话。……园毁于洪杨之乱，今惟大门外影壁尚存。"

我们看到的絜园虽已破旧不堪，但依稀可见当年轮廓。那是一所园林住宅，南为花园，北为住宅，建筑面积500m²。现存院墙大门、照壁（砖刻门楼已毁）。南部花园遭毁，金鱼池在"文革"中被覆土作过防空洞；另残存石桌、

石凳、太湖石、黄石及古井，其余建筑大都改建、重建。客厅为抱厦式建筑，面阔3间，位于园西北角，客厅正面屋尖上有砖雕。另存建筑5间，位于园北面，基本保存原木架结构，室内存浅刻竹石格扇五扇（南桥绘），仍被用作居民住房。若不控制园内的添、拆、改建和对尚存房屋的装修、破坏，则仅存遗迹亦将日见毁亡。

在絜园访问时，新仓巷37号共住16户人家。很多居民不知魏源，不知絜园。后在老居民高征德的陪同下，找到絜园遗址。在遗址拍照时，我们巧遇热情而知情的扬州市歌舞团一级演员、民进扬州市文艺支部主任戴若云。戴大姐陪我们察看遗址，为我们介绍絜园布局，并慨叹世事沧桑，了解关注絜园的人太少。在故居客厅拍照时，恰遇一初二女生，我们问她知不知道魏源这个人，她说知道，我们又问，你是否知道你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就是魏源故居，她说不知道。事实上，新仓巷37号16户人家又有几个知道？此外又有多少人知道？让人顿生苍凉之感！

科举时代的湖南状元

王启初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于隋，至唐乃逐趋完善。

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改由诸州岁贡三人。至炀帝乃置进士等科。唐代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50余种。故曰科举。明清虽仅有一科，但仍沿昔称科举。

自隋唐至明清，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吏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和任用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兴高采烈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科举制度规定，每届三年，召集诸生（士子）于各省省会举行考试，故称"乡试"，考中了的乃称"举人"，而第一名者称"解元"。明、清两代规定，凡举人进京会试，中试者为"贡士"，其第一名则为"会元"。贡士经殿试赐出身者为进士，殿试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为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

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乃科名中最高荣誉。因是殿试一甲第一名，故又称"殿元"。唐代则名"状头"。

中国历史上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状元孙伏伽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届状元刘春霖止，共有状元592人（此中不包括武状元以及张献忠大西国、洪秀全太平天国开科取士选拔的一批状元）。

历代状元，大多有真才实学，是封建统治的合格人才。如唐代王维、常衮、柳公权、孔纬，五代十国的王溥、王朴；宋代的吕蒙正、孙何、李迪、郑獬、张九成、汪应辰、王十朋、陈亮、文天祥；明代的曾棨、曹鼐、高轸、彭时、吴宽、谢迁、王华、康海、吴楠、杨慎、李春芳、焦竑、文震孟；清代的傅以渐、徐元文、韩炎、钱维城、梁国治、毕沅、王杰、戴衢亨、潘世恩、姚文田、吴其濬、张之万、翁同龢、王仁堪、张謇等。

历代科举中，湖南自宋至清，共有5名状元，他们是宋代的王世则和王容，明代的黎淳，清代的彭浚和萧锦忠。

王世则：北宋长沙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癸未科御试，以《六合为家赋》获进士第一名。雍熙元年（985年）官右正言。后出知蒙州。至道二年（996年）任永州太守，淳化元年（990年）正月尝出使交趾（今越南），至淳化二年六月返回汴京，将其年半的出使见闻写成文字，呈奏宋太宗赵炅。此奏文收刊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宋史·外国传》等书中，成了今天研究中越关系史和越南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他还工楷书和行书。

王容：字南强，改字希颜，号南涧，南宋湘乡人。青年时从张栻学于岳麓书院。淳熙十四年（1187年）丁未科殿试第一名进士。为南宋第20名状元。夺魁后，赋诗一首，进献孝宗赵昚，诗云：

天上催班晓色晴，五星伏尽极星明。
奎章读罢三千字，胪唱传来第一声。
名实两言虽朴语，始终一节悉真诚。
圣恩深厚难图报，愿罄愚衷毕此生。

授官秘书省正书，负责校正典籍讹误。旋升秘书省校书郎，掌校雠典籍；擢秘书省著作佐郎。嘉泰二年（1201年）进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兼修国史。开禧元年（1205年）出任镇江知府。累官至礼部侍郎。曾疏陈御戎之策，深切时务，孝宗帝召对东阁。奉敕撰《光宗日历》300卷、《宁宗日历》510卷。后因上书言事，力主用兵复仇，为主和派所忌，贬为绍兴签判。既卒，理宗赵昀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待制。有《王光禄集》传世。

黎淳（1423—1492）：字太朴，号朴庵，明华容人。天顺元年（1457年）丁丑科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预修《大明一统志》。成化元年（1465年）充经筵讲官，修《英宗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累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其性格耿介寡合，尤好直言，生活俭朴。对当时奢侈之风，身体力行地加以制止，家中红白宴席皆从简处理。所居黄洋渡，积涝难涉，人以为苦，乃捐资筑堤40丈，民以为利。平生好著述。其诗文典赡雄伟，且精楷书。有《龙峰集》传世。卒谥文僖。

彭浚：字映玙，号宝臣，清衡山人。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科殿试第一名进士，系清代第68名状元。例入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历官翰林院侍讲，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屡掌文衡。一生以培育人才为务，分校会试卷，五鼎甲皆出其门下。视学奉天，裁革陋规，捐薪添置考棚，集诸生讲解经义。置义田，赡养亲族。置学田，资助邑中士子会试，为时称颂。自奉俭朴。为官数十年，寒素仍如未第。卒年65岁。工书法，善论文。曾见其为兰九二

兄行书七言绝句诗轴，诗云："龙团小茗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辞。风定晴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书出赵松雪，笔法遒媚，结构整密，温润闲雅，风神朗发。惜墨迹传世不多。

萧锦忠（？—1854）：初名衡，号史楼，清茶陵人。家贫力学，勤做笔记，日数十张。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改名锦忠。客居京师十余年，词翰精妙，名噪一时。道光廿五年（1845年）乙巳恩科殿试第一名进士。任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不久回里省亲。以亲老留侍，不复为官，闭门著述。所著有《舆地汇参》、《自然斋时文诗赋》及《孺庐集》等。工书，有欧阳率更之风。咸丰四年（1854年）冬，因天寒烧炭取暖中毒而卒。

参考书目

《湖南省志》、《明清进士题名录》、《中国状元传》、《辞源》等书及墨迹。

清末湘学数则

张舜徽

魏源之奋发有为

当乾、嘉朴学极盛时，湖湘学者之风气，与江、浙异趣，大抵以义理植其基，而重视经世济民之学。嘉、道间，若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皆其选也。魏源稍后起，亦以致用自期，感事忧时，思有以转移一世之士。尝助贺长龄辑《经世文编》，复博考东西洋诸国地形事状为《海国图志》，使学者于中国之外，知尚有列邦，实足以开拓士大夫之眼界与心胸也。余尤喜诵其《古微堂内集》中《默觚》上、中、下三篇。分条说理，语多名通。体虽颇似语录，而无虚浮之气，所以启示后学者尤为深远也。观《默觚》上，《学篇》二所言人贵早起一条，可知其一生振作精神，奋发有为。故虽未登耋耄，而著述甚多，成就甚大，非偶然已。

曾国藩读书录

湘乡曾氏既殁之后，其门人东湖王定安就其家取所藏手校诸书，甄录其眉端批记之语，厘为千卷，名曰《求阙斋读书录》。凡读经二卷，读史二卷，读子一卷，读集五卷。计所收三书，经部有《周易》、《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国语》、《谷梁传》、《尔雅》等8种。史部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鉴》、《文献通考》等6种。子部有《管子》、《庄子》、《淮南子》等3种。集部有《楚辞》、《陈思王集》、《阮步兵集》、《陶渊明集》、《谢康乐集》、《鲍参军集》、《谢宣城集》、《李太白集》、《杜少陵集》、《陆宣公集》、《韩昌黎集》、《昌黎外集》、《柳河东集》、《白氏长庆集》、《李义山集》、《杜樊川集》、《嘉祐集》、《元丰类稿》、《东坡文集》、《东坡诗集》、《山谷诗集》、《剑南诗集》、《朱子文集》、《元遗山诗集》、《阳明文集》、《望溪文集》、《孙文定集》、《文选》、《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30种。四部之籍，共47种，皆常见书也，而以集部为最多。盖其纂录《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

诗钞》时，涉览及之者广也。综观曾氏批记诸家文集，以《韩昌黎集》为最详最备。知其寝馈于韩文者甚深。故其为文气积势盛，直逼昌黎之室，非偶然也。选录入《经史百家杂钞》者，亦以韩文为最多，可以觇其学文趣向矣。

曾国藩论文语

曾氏论文之语，见于文集、书札、家书、日记中者甚多。自抒所见，时有嘉言。即如《求阙斋读书录》卷十《阳明文集》条下所云："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夫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此段识议，非有卓见真知不能道。盱衡古今，论得其要。所言"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学术"，自是不易之理。非深造有得者，不能知也。不然，何学者如牛毛，而成者如麟角乎？曾氏乃近代不废之家，宜其论文之言，独有窥悟也。

湘报类纂

《湘报》创始于戊戌二月，终于戊戌五月。为时甚暂，而于启迪民智，大有关系。如事者又为编辑重要文字，以成《湘报类纂》。都为六集：甲集曰论著类，凡论、说、叙、启、辨、议、书后均隶焉。乙集曰讲义类，凡南学会之讲义均隶属。丙集曰问答类，凡南学会之问答均为隶焉。丁集曰章程类，凡一切章程均隶焉。戊集曰公牍类，凡奏疏、禀稿、咨文、告示、批词均隶焉。己集曰杂录类，凡原本所录中西各报名著及要事均隶焉。壬寅之秋，上海六马路中华编译印书馆铸版印行者也。清季维新之说，发自康、梁，而吾湘首起应和。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主持于上，而士大夫之视听一变；江标、徐仁铸两学使又先后倡导之，而学子之耳目一新。其时作新民德之具有三：一曰学堂；二曰学会；三曰报纸。所以风厉而鼓吹之者，至周至密，不可谓非有心人也。今虽时移世异，而此书究不可废。以其备载旧事，足以考镜当时议论行事，与叶德辉所编《翼教丛编》，势同对垒，并为究心晚清学术思想者至为重要之书。

皮锡瑞论学语

《湘报类纂》以乙集讲义类为最精，几乎篇篇可诵。而皮锡瑞12次讲义，

悉在其中，尤为精粹。一曰，论立学会讲学宗旨；二曰，续论讲学；三曰，论朱陆异同，同归于分别义利；四曰，论学者不可诟病道学；五曰，论交涉公理；六曰，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七曰，论圣门四种之学；八曰，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九曰，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十曰，论胜朝昭代之兴亡原因；十一曰，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十二曰，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拒之法。精义粹言，不能悉记；择其尤雅者，录之下方：

学宜通达，不宜狭隘。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九流之学，无所不包。今之学者，有汉学，有宋学。讲汉学者，有西汉今文之学，有东汉古文之学，讲宋学者，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平心而论，汉学未尝不讲义理，宋学未尝不讲训诂。同是师法孔子，何必入室操戈。即学派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妨有异同，不可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践者无用。莫读无益之书，方有实力读有益之书；莫讲无益之学，方有精力讲有益之学。（上为第二次讲义中语）

程、朱以为学当先知后行，陆、王以为学当知行并进。譬如两条道路：一从大路，计程稍远；一从小路，取径更捷；只要肯走，都走得到。释氏谈禅学有顿渐两义：忽然大悟，谓之顿悟；积久生悟，谓之渐悟。渐悟，则天分稍次，皆可悟道；顿悟，非天分绝高不能。朱子所说，近于渐悟；陆氏所说，近于顿悟。朱子教人之法最稳，陆子教人之法最捷。从朱子之说，中材皆可勉为；从陆子之说，必天分绝高方可。道学有真有假，于何别之？义与利而已矣。不读书不明理之人，不知有义，只知有利。读书明理之人，虽知有义，而不能见利思义，其弊在于见理不透，立脚不稳，操守不坚固，心迹不光明。明知事不应为，而不能瞻顾利害；明知财不应得，而不能不利欲熏心。以致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如晋之王衍，能清谈，负重名，口不言钱，自以为高。至于国将危亡，犹为三窟之斗，死于石勒，身名俱丧。明之胡广，当清难兵至，与友人约共死节，慷慨激昂。乃归家而问饲猪否？闻者已知其不能舍一猪，安能舍命？卒之不死而降。此等人非不知义利之分，其见义不为，由不能忘利。（上为第三次讲义中语）

人皆疑宋儒迂阔，此大不然。朱子历官皆有声绩，提举浙东，孝宗谓其政事可观。其居乡行社仓法，正值青苗法弊之后，朱子变通其法，不以为疑。后又奏请通行，至今犹沿其制。其在长沙，得赵汝愚密书云：将内禅。朱子知将有赦书到，先取狱中死囚数人斩之，此皆非迂儒所能办。元兵方急时，金仁山上书请由海道出师取燕，以攻其所必救，宋不能用。元灭宋，得其图，以兴海

运。图之水道曲折，无一不合。金仁山乃朱子门人，其图舆之学，如此有用。是讲道学者，不皆迂儒。（以上为第四次讲义中语）。

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勘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搜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宋以前著书讲考据者，如《颜氏家训》、《匡谬正俗》之类甚少，至宋，此等书极多。《容斋五笔》、《困学纪闻》最有名。他如《梦溪笔谈》、《野客丛书》、《考古质疑》、《能改斋漫录》、《学林》之类指不胜屈，是考据一家始于宋儒也。古无刊板，故无校勘；至宋乃有宋公序校《国语》，三刘校《汉书》，是校勘一家始于宋儒也。古无目录之学，至宋乃有《崇文总目》、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高似孙《子略》，是目录一家始于宋儒也。古无金石之学，至宋乃有欧阳公《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氏《隶释》、《隶续》、娄氏《汉隶字原》，是金石一家始于宋儒也。古无搜辑佚书之学，至宋乃有王厚斋考《三家诗》、辑《郑易注》，是搜辑古书一家始于宋儒也。汉学专门精到之处，自视宋儒所得更深。然觞源导自前人，岂宜昧所自出。以此推论，则汉、宋两家之友哄，夫亦可以解纷矣。（上为第七次讲义中语）

按：校勘之业，刘向、郑玄已为之最精；目录之学，亦刘歆《七略》、班固《艺文志》已开其绪；二者皆汉师导夫先路，不得谓如于宋人也。皮氏论此，偶失察耳。由此可见，皮氏之学，通达不党，实是通学门庭。近人目为专治今文学言而深诋之，盖均未窥其蕴奥也。论其湛深经术，在湘学中，实远轶王闿运、王先谦之上。而后之纂《清史稿》者，列二王于儒林，独不为皮氏立传，非也。

清末湘学

昔长沙罗庶丹先生论及晚清湖南学术，最推服皮锡瑞，谓其今文之学，确有汉师家法，非近世浅薄之高树名义以哗众者可比也。王闿运以文学名，他非所长；王先谦纂述虽勤，而寡心得。曾国藩、郭嵩焘名能古文，然近世所谓古文，凡略读理学书，敢为高论者，皆能为之（见李肖聃《星庐笔记》）。余每叹其知言！顾曾氏之文，自是名家，不可与郭并论。近人章炳麟论及清末之能文者，辄谓曾国藩能尽俗，王闿运能尽雅，信不诬也。二王于经史朴学，造诣不深，徒以早达致高誉，遂为晚清湘中大师，著述虽多，可传者少。若论悃愊之士，奋起清寒，笃志力学，暗然日章者，若曹耀湘、阎镇珩、胡元仪、孙文昺诸家，特立奋起，卓然有成，信为湘学后劲也。

湘潭孙氏之学

清末湘潭有胡氏之学，而元仪为之魁；复有孙氏之学，而文昺为之魁。余少时尝执贽于孙季虞先生（文昱）之门，从问声韵之学，服其精博。因得知其兄文昺学问之高，而深仰慕之，后得读其所撰《宋书考论》，始略窥其涘。文昺字蔚邻，后改名彪（音斑），清季举人，长于训诂考订，所著书自《宋书考论》外，尚有《战国策校义》、《战国策札记》、《禹贡锥指订误》、《水经注札记》、《十七史商榷辩呓》、《湘潭王志商存》多种。为人严毅诚笃，清介自守。当袁世凯以国史馆长位置王闿运时，王初辞之。为其门人所胁迫，以重金贿其侍妇挟之以行。至湘潭，乡人饯之，文昺与焉。时大风雪，因从容问闿运曰："此时何如齐河道中?"齐河者，王氏赴礼闱，至其地值大风雪，赋诗而返。今复举此询之，盖讥讽之也。其于出处之际，不苟如此，故为人所敬重。后应当道之聘，出讲学于京师大学堂，未久即还，高隐以终。其子鼎宜，学行亦优，尤精医理，尝校注古医书，复自抒所得，成《孙氏医学八种》，刊行于世。其族人楷，有《秦会要》，亦绩学士也。吾师季虞先生，湛深小学经学及天文算法，早岁得兄弟讲习之益，自不浅也。

清末二王之学

王闿运与王先谦，同为晚清湖南耆硕，海内多称其学术之大。然细按之，实不尽然。闿运著书甚多，裒为《湘绮楼全书》，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周官笺》、《礼经笺》、《论语训》、《尔雅集解》多种，是群经皆有笺注矣。旁涉《楚辞》、庄、墨、鹖冠，皆有新释，见者以为博及四部矣。然其说经之书，儒林早有定评。叶德辉斥其"笺礼补诗，抹杀前人训诂，开著书简易之路，成末流蔑古之风"（见《经学通诰》）。梁启超复谓"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见《清代学术概论》）。则众口同轻，公论有在矣。余观其所注《墨子》，着墨无多，不异白文钞本。盖王氏一生勤于动笔，以钞书为日课，群经诸子，多有钞本。间附笺释，便成著述。为之也易，则传之也难。后之治群经诸子者，鲜齿及之，要非无故也。

王先谦著述亦富，不外续、纂、选、辑四类。如《十一朝东华录》，乃续蒋氏之书；《清经解续编》，乃续阮氏之编；续《古文辞类纂》，乃续姚氏之作。《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皆选也。《五洲通鉴》、《外国地志》、《日本源流考》，皆纂也。《荀子集解》、《庄子集解》、《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集注》、《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释名疏证

补》，皆辑众说而成者也。其自抒心得、独著一书者，则未之见。要之，二王于晚清虽为老师祭酒，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余虽乡人，不能为之曲护也。

士有真才实学终必见列于世

名者实之宾，有其实必获其名，此常理也。亦有才高而名卑，不见重于俗论者，遇一知己，则赫然传矣。举清末湘士言之，若刘霞仙（蓉）之散文，赵伯藏（于密）之绘画，在俗士眼目中，初不见重也。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言及《养晦堂集》可诵，而刘之文辞为世所重矣。沈曾植《海日楼题跋》中言及赵疏庵画，定为海内第一，而赵之绘画为世所尊矣。人之遇知己与否，固不限于朝夕相处、周旋征逐之三数人也。康成所云："显誉成于僚友。"特就其大者论之耳。吾家旧有《养晦堂全集》（内有文集、诗集、奏议、思辨录、疑义诸种）。余少时取其文读之，爱其气积势威，有阳刚之美，不忍释手。尝钞其名篇而时诵习之。吾家旧藏赵疏庵画迹不少，运笔高雅，不落恒蹊。其大幅虽早散亡，今行笈犹存其为先祖先伯所画山水扇面数帧，风格与八大、石涛为近。余虽赏重而钦服之已久，然未得名家品评，初亦未敢自信所见之有合也。

清末湖南二才子

易顺鼎，字实甫；曾广钧，字重伯；其家世门第，人尽知之。幼而早慧，王闿运名易为神童，名曾为仙童。当其少时，人咸爱重之，所共目为祥麟威凤者也。二人童龄即喜详检类书，熟记僻典，发为诗词，惊其长老。易尝师事张之洞，之洞教之治朴学，授以乾、嘉诸儒书，于是闭门修业，著有《经义筳撞》、《淮南略诂》数卷。后乃舍弃，放浪形骸，喜作漫汗游，弃官如敝屣。居母丧，恸甚，因自号"哭庵"，欲哭之以终身。王闿运贻书戒之，谓有父健在，必不可称"哭庵"，竟不之从也。曾则席丰履厚，处境尤优，少时亦倜傥脱落，不自谨饬，王闿运亦以书规之，谓贵人镇俗，宜以瞿、张为法，戒其与浪子游。所谓瞿、张，乃指瞿鸿禨与张百熙，但少年早达，而持躬端肃，有名于时，故王氏取以勉之，亦未能尽从也。二人负绝异之资，未能自加爱重，专精读书，竟碌碌无所成就。世人论及之者，但自为一时之才子而已。人固贵有聪明子弟，若不导之以教厚崇礼，俾能纳于轨物，鲜有不取败者，古人云："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又称得千才人，不如得一朴士，皆有所见而道也。大抵聪明人不肯做钝拙工夫，故不能沉研于学，惟以雕虫末技相高耳。

才士亦知尊重朴学

昔余游燕市，尝于琉璃厂书肆得易顺鼎所著《经义筳撞》、《读经琐记》、

《读老札记》、《淮南许注钩沉》诸种。皆其早年伏案读书，沉潜朴学之所撰述也。其所为《经义筳撞》自序有云："清言名理，流宕而少归；高谈心性，虚悬而无薄；侈语事功，浮游而不根。三者于学，似俱足以开虚伪之风而长浮薄之气。自魏、晋以至宋、明之季，通弊皆然，此汉儒朴学之所以不可及也。余于朴学未涉藩篱，遑论堂奥。窃欲（借）以此自收其放心。盖日有常业，则邪僻之心无自而生。而其为学也，虽浅近必有所据依焉，则亦可免于躐等求进，穷大失居之弊矣。"此乃有识之言！自题光绪十年甲申九月。时年二十七耳，盖自悔少时所学不实，有志发愤读书。余览其《筳撞》、《琐记》，考证经义，语多足征。《读老札记》尤饶心得，余往撰《老子疏证》，多采其说。以其潜心伏案，复善思考，偶尔为之，所造便卓。使能竭数十年之岁月，以肆力于学，必能特立拔起，有大成于当时也。然而，学问之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屏绝所好、自甘寂寞者，而后能坚持终始，以获成功，易氏畏其艰难，浅尝辄止，故论者惜之。

梁启超题“时务学堂故址”始末

陈先枢

长沙市今黄兴北路沿线靠三贵街口的陈云章先生（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宅院，系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故址所在地。时务学堂故址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片瓦不存，今唯一见到的时务学堂痕迹是陈老立在宅院内的梁启超亲笔题“时务学堂故址”碑刻及李肖聃等人题写的碑记。

1897年维新运动期间，熊希龄等开明士绅创办“添设时务学堂”之议，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寅恪祖父）、按察使黄遵宪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全力支持。巡抚随即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开办，择期办学”，并拟在北门外侯家垅兴建校舍。在校舍未建成之前，委熊希龄寻找临时校舍。熊先准备租用小吴门衡清试馆，但因试馆过于狭小，不宜办学，遂找到自己的同榜进士、益阳翰林周桂午（周谷城先生叔祖父）租得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三贵街口）一套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五进宅第，权作校舍。周宅非一般民居，它的原主人是清乾隆嘉庆年间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授太子少保衔的刘权之。刘权之是清代长沙城最早登上尚书官位的进士，“三贵街”即由他而得名。1897年9月24日，时务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录取蔡锷等40名学生入学，熊希龄任提调（校长），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由沪抵湘，亲自制定了《时务学堂学约》。梁每天授课4小时，还要批改40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卷都写批语，有的长达千言，常彻夜不眠，直到1898年2月病倒离湘。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改成求实书院，迁至落星田。1903年求实书院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

时务学堂停办后，小东街校址屋归原主。周桂午的儿媳将宅第租予湘潭人言清华，办起了“泰豫旅馆”。1922年，时任金陵东南大学教授的梁启超应邀来湘讲学，8月30日抵长，省长赵恒惕和省教育会代表到车站迎接。梁下榻赐闲湖对面的省教育司（今教育街省民政厅），次日，在李肖聃（李淑一之父）的陪同下专程去寻访时务学堂故址。李肖聃1913年任过梁启超秘书，时为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教员。梁当年在时务学堂任教时风华正茂，年仅24岁，26年

后旧地重游，已年到半百。世事沧桑，他百感交集。梁启超在学生蔡锷住过的宿舍内伫立良久，竟泣不成声。旅馆言老板已恭候多时，早已摆好笔墨纸砚。待梁心情稍定，即请梁挥毫留念。梁欣然提笔，写下了“时务学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讲学处 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汹记 梁启超”。据书法行家讲，这是梁任公遗墨中书写最好的一幅。9月1日梁启超在长沙作“奋斗之湖南人”和“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两场演讲，当晚乘车赴武昌。

言老板偶得梁任公题墨，将其视为珍宝，装裱悬挂于中堂，以招徕生意。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开始疏散住户，言老板将梁书带到湘潭老家。第二年旅馆在大火中荡毁，梁启超墨宝却完好如初。其时，陈云章先生居沅陵，任省立第九职校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返长创办中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周桂午后人购得小东街大片地皮，在时务学堂废墟上建起了三层楼房和“松坡读书处”等小景。陈云章先生知梁任公题有“时务学堂故址”墨宝，恰好泰豫旅馆言老板的儿子言泽坤与陈是湖大预科班的同学。陈遂从同学手中以40石米（约合200多银元）买下了这一瑰宝。后又请老师李肖聃及衡阳李况松题写了碑记。1948年陈云章先生又在宅旁筑林翼堂，以为旅长益阳同乡集会之所。其父陈天倪先生喜而赋诗：“邑子筑堂我作颂，江汉常武考新官。正神为人如可作，神州万里托帡幪。”可见陈氏父子对时务学堂故址呵护有加。1954年除留宅院外，陈将公司大部分楼宇让售给省粮食厅。

解放后，陈云章先生在湖大任教时，住在岳麓书院一个四合院内，他感觉房内湿度较大，不利于墨宝的保养，便将其寄存至校图书馆。1958年，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参观湖大图书馆，见到梁书，惊奇不已，连呼“国宝、国宝”，并建议将其转存省博物馆恒温室保管。于是，梁任公墨宝被同行的蔡季襄先生带到了省博物馆。“文革”结束后，墨宝又回到陈老手中。陈老毫无条件地把这一珍藏捐给了母校——湖南大学，又请泰籍好友罗武子先生捐资在岳麓书院建起了美轮美奂的“时务轩”，与唐李邕北海碑亭相映成辉。

近日，凤凰籍著名画家黄永玉造访已90高龄的陈老，见到曾任过民国国务总理的同乡熊希龄创办的时务学堂，尚有梁启超亲笔题墨传世，喜出望外，顿生重建时务学堂故址之遐想，并表示愿承担故址建成后的全部陈列项目。当晚，黄永玉就将其想法报告省委书记杨正午，杨书记深为赞许，当即指示长沙市妥办此事。时务学堂故址一旦得以恢复，长沙城又多了一处纪念中国民主政治先导者的景观。那时，我们得衷心感谢陈云章、黄永玉两先生的功德。

湘剧在长沙最早的戏班子和戏园子

黄曾甫

清代光绪以前，长沙市只有湘剧戏班的组织，没有戏园（剧院）的名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最早的戏班是在清代康熙三年（1664）成立的福秀班，以演唱弋阳腔（后来湘剧称为高腔）为主。随后乾隆年间，有大普庆班，传说来自北京，以演唱昆曲为主。到了道光年间的仁和班，则以演唱乱弹（湘剧称为南北路）为主。清同治五年，长沙就有泰益班演出（见《郭嵩焘日记》）。到了宣统元年（1909），长沙城内，已有仁和、庆华、春台、仁寿、同春五个湘剧戏班。演出高、昆、低、乱四大声腔的剧目。这些在老廊庙梨园公所过去的《红簿》上面，都可看到痕迹。

过去戏班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更谈不上有正式营业的剧院。演出是藉酬神还愿的庙台戏和豪绅巨室的堂会戏为谋生之道。戏班在清时分民班和官班两种。民班由衣箱业主（亦称本家）和艺人组成；官班则由权贵经营，门首挂有红黑纱帽和乌梢鞭，气派与官衙相似，故名"官店"。后来，凡是艺人宿舍及联络接洽业务之所在，都称为"官店"。

湘剧之能嬗递几百年而不衰，除有专业戏班之外，还有科班之设，作为培训后继之所。最早的科班，是清代乾隆末年（1795）在长沙设立的九麟科班。从咸丰元年（1851）至解放前的近百年以内，长沙地区先后设有科班28年，开科60多期，分布在长沙、湘潭、浏阳、醴陵、茶陵等地。其中开科最长的是同治初年（1862）由豪绅杨某在化龙池起科的五云科班，历时60多年，培养艺人400余名，其后有三元科班。最后一届男科班是起科于清代宣统二年（1910）的华兴科班，1930年散科，培养艺人70余名。今之仅存者如周华福、王华运、蒋华金、王华泰、黄玉梅、陈楚儒几人而已。最老的是华兴一科的杨华筠，年已84岁，不能行动了。1922年（民国十一年），长沙湘剧艺人陈友才、郭茂生、徐茂林、罗裕庭、梁荣盛、陈锦山、黄玉桂、黄元才8人，发起创设福禄坤班，这是培训女演员之开始。未久，因意见不一，黄玉桂、陈友才、黄元才另组福寿坤班，黄元才又另组九如坤班。从此，男艺人逐步凋零，

女艺人人才备出。及后孔青玉、朱早云、黄益政等，又随班设科，培训演员不少。湘剧设立剧院（戏园）之始，是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个姓沈的下江人，仿效北京戏园的做法，在太平街孚嘉巷设立"宜春茶园"，延聘湘剧班演出。当时是一边卖茶，一边看戏的营业方式。园内设方桌甚多，一桌三面设座，一面向台，不收门票，只收茶资，故名茶园。据说，沈某与长沙县知县有同乡之谊，始获批准开业。惟以场地小，方桌占地多，观客有限，获利不丰。当时长沙豪绅叶德辉颇思染指，乃将自己苏家巷怡园私宅的后园，邻近织机巷的隙地，辟建一所同春茶园，由耕耘圃巷出进，即长沙大火前万国大戏院的前身。叶德辉亲笔写副对联悬之舞台，联曰："同声歌绛树；春色望青葱。"叶德辉为清进士，官吏部主事。亦官亦商，亦绅亦贾，其先人是苏帮经营酒酱业的。为坡子街"三德"之一（即余太华管事谢老德，劳九芝堂老板劳老德，玉和酱园老板叶德辉），叶德辉同时又和王先谦、孔宪教三人并为湘绅反对新政的三大巨头。惟湘剧戏班之健全，湘剧戏园之革新，叶德辉当时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叶本人并未出面，罗致湘剧老艺人名小生李芝云为首，组织大批名艺人，设立"卅一堂"，不仅角色行当齐全，而且成为艺人联合组班的创始。由"卅一堂"出面，承租同春茶园开业。这是晚清宣统二年（1910）的事。抗战前，我曾在老艺人陈绍益处，看过"卅一堂"同人签订的合同字据。后来改名同春园，废方桌为条靠长凳，并设有包厢。民国三年（1915）柳介吾与李芝云不和，退出"卅一堂"，另与黄六神仙合组湘春园于高井街。民国十一年（1922）福禄坤班成立，在箭道巷创寿春园。未几，福禄班又分裂为福寿，另在西牌楼江南会馆设景星园。及后，同春园改名万国大戏院，演出京戏。育婴街新舞台继之而起，演出湘剧甚久。据1934年邹欠百主编的《长沙市指南》的统计，当时长沙市有湘剧剧院八家：计育婴街的新舞台，高升门的湘春园，吉祥巷的吉祥戏院，皇仓坪的远东戏院，营盘街的中华戏院，太平街的景星园，西牌楼的百合湘剧场，鱼塘街的世界戏院。据我回忆，还有小瀛洲的江南戏院和大西门中国饭店坪台，大火后有又一村民众二剧场，南门外的城南剧院，先后都一变作为湘剧演出场地。

湘剧剧场票价，历来不高。犹忆1926年，北伐军入湘以后，又值孙中山逝世，全国一度停止娱乐，剧场上座率低落。乃由湘春园倡议，将每日演出时间，改为三场，每场演出折子戏四句，日中二场，每场仅收铜元60文（折计银元壹角）。各剧院争相效仿，业务大振，票价低廉，剧场增多，演员则有供不应求之势，乃有一人而兼二、三处演出者。因此著名演员如欧元霞、吴少芝等人，每月收入，可获60～80元之多。长沙大火之后，许多剧场被毁，湘剧剧场业务又一度衰落。

“缯书”:得而复失的国宝

金 式

人类以文字和图画表达心声，是继拇指与手掌分离而使用工具，从而促进大脑之发达，产生思维之后的又一里程碑，是人类文明的始基，也是祖先藉以留传给后人的“地球文化”；这些遗迹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古罗马的城堡上都有。我国各民族的文化遗址都陆续发现了各种图腾和文字；尤其是汉字，早就考证于上起殷商、下迄秦汉的卜筮、祭祀、婚葬等器皿上，成为镌、铸和书写于甲骨、钟鼎和竹简及至纸张上的各种文字。不但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且经我国与国际（主要是日本）间历代汉学家的探微、钩沉，著述甚丰，蔚为大观。但是书写在“缯”上的，只在我国湖南发现了一件，其时亦近在半世纪前，尽管此“缯书”出世较晚，但亦弥足珍贵。

缯（zēng）（《辞源》）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已能生产了。但写在这种丝织品上的文字，全世界迄今仅发现此一件！特别是这件国宝始则出世于偶得，终竟遭致诓失，故至今不存于我国，却在异文殊俗的美国，这两件事又都发生在湖南省博物馆已故馆员蔡季襄先生一人身上，就更是极有况味而发人深省了。

一

蔡季襄出身于“多财善贾”的商业世家，其远祖于清中叶从祖籍苏州来到长沙创业，以开当铺致富，到清晚期，住宅和各种商店的铺面已延绵长沙市皇仓街的半条街，遂以“蔡百万”的绰号名冠省垣。“蔡百万”的子嗣分为四房，蔡季襄出自长房，是同辈四兄弟中最小的，故称“蔡四”。先生自幼敏慧好学，且兴趣广泛，对文史更酷嗜成癖，20 年代中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毕业回湘，任《小小报》记者，与湘剧著名女生角黄福莲结为伉俪，真是郎才女貌，一对璧人，当时有“黄连配白菜（蔡）”之称。蔡季襄既有城北徐公之貌，又具江南袁氏之才，原可在报界驰骋一番；但他从小酷爱史学，乃潜心于考古与金石之研究。历有年所，便在鉴识文物和考证古籍方面造诣日深，且多有创见，遂

于 30 年代中期被聘为南京紫金山博物馆馆员。

六朝古都，金陵胜地；蒋山翠微，秦淮风韵。蔡季襄在充满传统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从事古文物的研究，大有“水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之概！讵料 1937 年“七七”卢沟桥炮声刚起，“八·一三”淞沪战局又开，且急转直下，危及南京！国民政府仓促南逃，其中一位长沙籍尉官，与蔡常有过从，仓促间来约蔡从速随他南撤；但蔡认为自己是做学问的人，日本人也许会尊重汉学，总不会对自己怎样，便婉谢了对方的关怀，安之若素地厮守着身旁的古籍和文物。南京沦陷时，紫金山博物馆因偏处山隅而幸免于兵燹，蔡季襄正在庆幸之际，被日军首领召见。当得悉他是位考古学家，又是留守该馆的高级专职人员，便欲委以紫金山博物馆馆长之重任；蔡始则婉辞，终至严词拒绝，但仍不免下狱。幸亏他在治学之余替当地的古董商鉴定过文物，颇有知名度，文物商人中的厚道重义之辈便向日军为他说情，说他是个书呆子，除了钻故纸堆，别无所长，无多大用处云云。日酋便将他放了。他出狱后扮成商人模样，挈妇将雏，辗转回到了长沙。

二

蔡季襄回到长沙，已经是“文夕大火”以后。经过这次焚城自溃劫难，蔡家已元气大伤，诸昆仲各自为家，自顾不暇，他便离开了世居的皇仓街，在走马楼赁宅而居。他因多年来为古董商鉴别文物，获酬甚丰，且出于爱好与研究的需要，自己也择优收买一些盗墓者的文物，日积月累，颇具规模。为了不让别人捷足先登，他广泛结交“土夫子”，即搞盗墓的工头，以便掌握信息，不致隐于被动。1942 年 8 月某日，他从某“土夫子”处获悉长沙市东郊盗掘了一座古墓，便匆匆赶到现场，只见其中器皿多被盗走，残片零乱地掺混在腐烂的棺木和尸骸中，便觉无甚可取了。正转身瞬间，瞥见坑沿有一团状物，看似泥土但又不如泥土之粘润，且有折纹和隙层，忙拾起一看，原是被揉皱的纸张。专业的敏感使他揣度起来：即变成了近于泥土的深褐色，则必是年代久远的随葬品，便将其拾起，用手帕包好，带回家中，当他匆匆用过晚膳，在灯下略一审视，不禁大喜过望！因为凭着多年鉴赏文物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使他从这张残页依稀可见的漆写字迹上，辨识出文体之古拙，当可追溯到秦汉以前；待再审视质地，原来并非纸张，而是产于晚周的丝织品——缯！这个发现的意义和价值恐不亚于裴文中之鉴定周口店猿人头骨！这一晚，蔡季襄兴奋得彻夜不眠，并从翌日起，除了确有相当价值的考证、鉴定之外，其他的业务和应酬都一概谢绝，而用大部分时间专心致志于“缯书”的考证。可是由于长沙地处粤汉线之要冲，日寇不但进犯频仍，且常有敌机侵袭、轰炸，致

使蔡季襄的研究工作进展缓慢。如此时作时辍，竟经历了第二至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两个年头，才初见端倪。

1944年暮春，蔡季襄应邀去上海替金明记古董店鉴定一批文物，顺便为自己购置考证“缯书”所需的古籍，不觉多盘桓了几天。待其由沪经浙、赣回到长沙，行装甫卸，即突遇长沙第四次会战，仓皇间随手捡携一些细软，并带上几件最珍贵的文物，吃力地挑着，与爱妻黄福莲和女儿匆匆出城南逃。可怜的文弱书生和妇孺之辈，又在猝临危难、惊慌失措之际，竟慌不择路而与日军队伍遭遇。日寇狞笑着扑来，黄福莲带着女儿纵身跳入身后的湘江，蔡扑救不及，跌倒在堤畔，昏厥过去。待醒来时，日寇已去远了；他强忍妻女惨死的悲恸，挑起担子，失魂落魄地夹在难民群中，风餐露宿，好容易挨到了桥头河的蓝田镇（今涟源市）。

当时的蓝田是湘西重镇，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都麇集于此，商业很繁荣。蔡季襄便在临街的一家民宅租住一间小楼房；白天靠刻图章和替商贾鉴定文物糊口，晚上则在昏暗的油灯下研究“缯书”。他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要把字体描摹下来，但在时难年荒的当时，我国不能生产或无进口透明塑料纸，蔡季襄便把糊窗户的皮纸涂上清油，使晾干后就透明得能映出字迹来。就这样，他苦心孤诣地自制土“玻璃纸”，一笔一笔地把“缯书”上的字迹临摹下来；然后与已见诸文献与时人著作关于殷商之甲骨、商周之钟鼎及竹简上的古文字的各种体例及其诠释，进行对照、辨析。他逐渐发现，这种漆写的字体上承钟鼎文，又有所嬗变而自成体例；其字形与指意则与孔老夫子读得“韦编三绝”的竹简字体颇为近似。再从书页的质地上看，既是晚周已经盛产的“缯”，则将该随葬品的时代定于晚周是至当无疑的了。特别是这样以缯为书写品的古文物实为迄今所仅见，确是旷古珍品，堪称国宝！蔡季襄越是取得进展，越接近这个结论，便越感到惊讶和兴奋。他把妻女惨死之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焚膏继晷，潜心著述，三易寒暑，力抵于成。

三

1947年夏，蔡季襄携专著《晚周缯书考异》赴南京，进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原以为即使不能作为如古代所艳称的“进宝状元”而“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只要能让自己的作品得以发表，也就如愿以偿，并可告慰妻女在天之灵。谁料得到的答复是：“国府当务之急，在于戡乱，连华罗庚的《堆垒数素论》都不能付梓，你这个翻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的作品，就请免开尊口吧！”这一次打击决不轻于当年丧失亲人之巨创，蔡季襄的坚强的自尊与自信，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学术上的执著探索、追求，使他愤然倾其所有，自费

出版了《晚周缯书考异》，当即在国际汉学和考古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日本的汉学界却提出质疑，要求看“缯书”的原物——至少要看影印件。如前所述，那件“缯书”已历时两千余载，变成了深赭色，上面的漆字很难辨认得出，一般摄影和洗印术是难以奏效的。为解决此技术难题，蔡季襄专程到上海，得到古董商金明记等友好人士的帮助，想在当时我国科学最先进的大都会里，得到象《密勒氏评论报》的印刷厂和柯达胶卷公司等外商单位的协助，给予摄影、制版。这些厂商虽然设备精良，能摄印彩色图谱，但对于年代久远的赭底漆字的“缯书”却无能为力，朋友们都为之同声一叹，蔡季襄只得黯然神伤，颓然而返。

但强烈的意志与愿望，使蔡季襄不甘就此功败垂成。当其“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际，蓦地想起史学界的挚友，时任雅礼中学历史教员的钱无咎。钱为古钱币专家，其所著《古钱币史话》印制极为精美。急忙去专访钱，倾诉苦衷，央求惠助。钱无咎介绍说，他的古币都是历时千百载的铸件，且淹埋甚久，锈蚀斑驳，其所以能制印出清晰的图像，实得自湘雅医院的美籍医师、兼任雅礼中学学监柯克斯·巴拉的高超技艺；并慨然承诺，亲领蔡季襄去与柯克斯晤谈。柯克斯听过蔡的叙述与要求，一面表示同情，但又面有难色地说：“钱无咎的古钱虽斑驳模糊，却是个由凹凸构成的铸件，用高精度的摄像技术可拍出较清楚的轮廓与纹理来；而这件‘缯书’的深赭底色与漆字，暗度非常接近，又是平面的，即使用我们医学上穿透力最强的X射线，恐也拍不出理想的效果来……”蔡闻此言，不禁嗒然若丧，惴惴然问道：“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柯克斯狡黠地答称，办法倒有，只是要以互惠的条件为前提，那就是由他将“缯书”原件带回美国，用紫外线摄影、制版，与文章一并发表；作品署名蔡季襄原著，柯克斯·巴拉翻译，定可取得国际效应。为昭信誉，柯克斯向蔡立付稿酬美金1000元，并亲书字据，保证出书后再补寄9000美元给蔡。

国宝在握的蔡季襄，深知上述条件有乘隙而入、唾手得利之谋；且原件远去异国，自己干系重大，不免有些犹豫。对方见状便欲擒故纵地表示，既然有顾虑，就各自请便吧！蔡经此一着，便想到：原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好容易盼到这“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裹足不前，让良机失之交臂，岂不可惜？！何况作品能在国外发表，一举而名利双收，是多么富贵尊荣啊！加上中美既是盟邦，钱无咎又是自己与柯克斯的好友与中介人，当能起到保证作用的。在此急功近利又转予信赖的思想支配下，善良的蔡季襄竟将国宝“缯书”托付给柯克斯·巴拉带出了国境。柯克斯回到美国，将所译蔡文独署自己的名字，由此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博士的殊荣；该“缯书”原件则被陈列在美国华盛顿艺术博物馆里，被诩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证物”。蔡季襄遭此诓骗，

痛失国宝，悔恨交加，向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但被以“恐有碍盟国邦交”为借口而拒不受理。蔡季襄投诉无门，只得又求助于钱无咎，并一起去找柯克斯的继任者——美国牧师俞道存交涉。俞假惺惺地对他表示同情，一面却密函柯克斯，嘱其采取对策；因若事态扩大，激起我学术界公愤，则柯难免陷于被动。柯便通过俞道存给蔡回信，诡辩说原许诺的万元美金，是蔡向其售出“缯书”和文稿的价款，故蔡已丧失版权了。现既要诉诸法律，则连所欠的 9000 美元也干脆不履行前诺，分文不给了！蔡再次遭此跌宕，不啻雪上加霜，悲愤交织，大病了一场。当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时，每念铸此大错，即感负疚良深，愧对国人！

四

蜗居斗室，病榻愁颜。蔡季襄的困窘得到亲友们的同情与关爱，便替他物色一位贤内助，不久便燕巢重筑，鸳鸯再合。蔡季襄抱定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宗旨，在家里读典籍、赏古玩，夫妻俩相对厮守，共度时艰。到了 1949 年 7 月下旬，长沙已临近解放，俞道存提醒蔡季襄说：“那件‘缯书’是贵国的国宝，由于阁下的过失而远去异国，要是让共产党知道了，你还有命吗?!”蔡本来就负疚已久，经他这番危言耸听，更是惶恐不已，便携妻室和襁褓中的幼儿，带上心爱的文物逃到广州，仍以治印与鉴定文物谋生。但客居甫二月许，广州也解放了，蔡因上述诸多隐衷，仍想出境香港去美国，找到柯克斯索回“缯书”；然而，毕竟祖国似母怀，实难割舍，加上“明人不做暗事”的直率秉性，使他不愿“惶惶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离去，离穗前便在泮溪酒家设宴，向容庚、陈寅恪等学术界好友暨相契的古董商们挥泪告别。恰好是这个告别宴会使自己天机泄露，广州市公安局以“走私文物，企图外逃”的罪名将其逮捕，递解回长沙，被关押在臬后街市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蔡自忖：此番定死无疑了！当首任长沙市委书记曹瑛从听取汇报中得悉此事，便批示公安局长王丕敏，不要草率地下结论，待调查证实后再说。果然蔡妻恳请蔡的友好、文化界耆宿陈浴新、黎泽泰等面谒曹瑛书记，备陈原委，请求“从宽发落”。曹瑛书记便接见了蔡季襄，严肃而恳切地指出：对共产党不了解而想离境，是可以理解的，但匿藏文物带出国去，便成了走私越货——何况还是贵重的物品，那是非法的。公安部门逮捕你是基于这个法律准则。不过，幸亏是谋而未遂，即不构成犯罪，只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故不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宽大释放。望扪心思过，好自为之。谈话之后，便批示公安局派车将蔡送回走马楼寓所。

险作阶下囚，愧为座上客。蔡季襄喜出望外，不但与妻儿破涕为欢，额手相庆，更逢人遍告曹瑛书记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念念不忘这位共产党首长“高

抬贵手，赐我一线生机”的恩典！不久，得到通知，被安排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得知又是曹瑛书记推介时，便进一步体会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英明宽厚，不由得产生了感恩图报之情。当穿上新制的干部服到省文管会去上班的时候，蔡季襄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珍贵文物的清册，毕恭毕敬地呈交给领导，表示将其无偿地献给国家，这就是我省博物馆的首批藏品。当时省文管会设在中山路船山学社内，我在省文化局艺术科工作，听图博科杨其昌科长谈及蔡先生的身世，觉得颇具戏剧性，便由他引见，拜访这位长辈，一席谈遂成忘年交。

正当蔡季襄从头收拾、新猷待展之际，厄运又向他悄然袭来。原来当年在广州被捕、长沙被囚之时，所审讯的是匿携文物、走私逃港一案，公安部门并没有发现——他本人也没有交代有关“缯书”的问题。讵料到了 1951 年夏，开展了宗教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美国牧师俞道存被以帝国主义分子的名义驱逐出境。公安局从收缴俞的文件中，发现了他与柯克斯的通信，蓦地“拍案惊奇”。于是，蔡季襄又被隔离起来，反省、交代“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特务大案”。这个“重要发现”，很快就成了《考古学报》上的爆炸性新闻。蔡季襄先生虽精通文史，但对英语却并不擅长。在征得监管人员的同意后，央请我替他翻译俞、柯的往来信件。经过将英文信件译出，按通讯日期先后排列、对照来看，便看出柯克斯要俞道存从中周旋、劝说，甚至不惜采取恫吓手段，要蔡季襄罢讼和不将真相公之于世；并要俞先以“时局紧张、联系不上”，继以“美中断交”为借口，赖掉那 9000 美元的欠款。特别是蔡的手头保存着当年柯克斯以合作出书名义写给他的字据和信件，更合符节地与柯、俞之通讯从正反两面证明：蔡季襄确定是受了诓骗，而绝非“明知故犯”、“里通外国、盗卖国宝”。至此，一场“杯弓蛇影”式的“国际特务大案”终于查明，实事求是地作了了结。临别时，公安人员亲切地叮嘱他“回家后多休息几天再上班”。

经过审查，又一次化险为夷，使得蔡季襄如释重负。于是重新振作起来，为楚文物的发掘、整理献智献力，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曾根据蔡老始则喜得“缯书”，终被诓骗而告失的经历写成《野水朝宗》剧稿。原湖南省话剧团刘高林团长认为是写知识分子的好题材，有典型性，唯感国宝“缯书”未能回归祖国是件憾事，嘱我不要被原事件所范囿，可把结局写得多一些亮色。我正拟重新构思，进行改写时，即逢“文革”浩劫，资料丧失殆尽。待噩梦醒来，蔡老已作古多年。每思夙愿未偿，实感遗憾。今作此文，聊寄对蔡老的缅怀之情。

凤凰南长城考

向宽良

凤凰县南长城，是今年“中华炎黄圣火”火炬传递活动点火地之一。8月21日由一对苗汉结合的新婚夫妇，在该县永兴村烽火台，击石取火，然后点燃火炬接力传下去。这段南长城，过去被当地人称作“边墙”，是我国古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南长城——“边墙”的由来和演变及对凤凰的影响作一些考证。

凤凰在湖南西部边缘，地处湘黔要冲，东控辰沅，西连云贵，南接麻靖，北去永顺、保靖、龙山、桑植。这里崇山峻岭，连绵千里，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便于人们休养生息。秦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建为36郡，凤凰就成了黔中郡的中心腹地。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从麻阳划出设渭阳县，从此，凤凰这地方，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据考，这里自古以来住着两个民族，一个是土家族先驱巴人，一个是苗族先民“三苗”集团。据《尚书地理今释》记载，“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也”。华族南侵征剿三苗，“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疆”。汉时“武陵蛮”相单程起义，光武帝派刘尚率兵“征剿”，被相单程打败。次年单程等顺江南下败陷临沅（今常德），朝廷震惊。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等率军马四万南征武溪。当时武溪各族联合作战。“乘高隘守”，阻马援八个多月，马援死于军中，无力攻击，迫使朝廷实行招抚政策。唐时对武溪掠夺有增无减，激起湘黔边界各族的反抗，黄巢起义时这里积极响应。宋朝先时严厉“捕捉”，后又“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五溪地区暂时稳定，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到了明朝开国不久，就向西南各地派兵镇抚少数民族。“筑城建卫”，“设屯兵、立卫所”。在卫所制的控制下，大部分苗族逐渐归附，取得了民籍，成了汉族，只有崇山卫（今大庸）辖地仍属苗族聚居地区，拒绝归化。为了加强控制，于是撤去崇山卫，设崇山军民千户所，但广大西部地区还鞭长莫及，后来撤崇山军民千户所，设镇溪（今吉首）军民千户所，隶属辰州卫。这样，就加强了对保靖、古丈、泸溪、凤凰、乾州、永绥等地的控制。在凤凰、永绥、乾州、古

丈等大片地区修筑了一座蜿蜒360余里的长城（当地人称“边墙”），用以防止和镇压湘西苗族和各族人民的反抗。但控制越凶，反抗越烈，嘉靖年间湘西和黔东、川东各族人民多次起义攻州掠县，捣毁“边墙”。清兵入关后，对各族人民实行武力征服，富有斗争精神的湘西各族人民宁死不屈，奋起反抗，斗争不息。为了强化统治，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074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制度，裁去镇溪与竿子坪五寨司，建凤、乾二厅，与永顺厅，为犄角之势。为了巩固流官在苗、土区域的统治，特别加强了军事设施，设辰、沅、永、靖兵备道，置道署于凤凰厅。派道员、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高中级将官司于凤凰，重兵屯防。并将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修筑的“边墙”进行整修和扩建，形成这堵跨山涉水、绵亘三百余里的苗疆长城。这就是“边墙”的来历。

“边墙”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重大的军事行动）的产物。明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来，多次大规模的对湘西苗疆征剿。宣德五年（1430年），竿子坪长官吴毕郎与贵州铜仁苗酋石鸡娘率领湘黔边界苗族反抗征剿，总兵萧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堡垒战术进行防御，在以湾溪为中心的凤凰、乾州比邻地段“筑二十四堡环守之”。这就是修边墙的根由。嘉靖三十一年（1552）总督湖广、云南、贵州、四川军务的张岳，统领20万大军平定了苗疆，朝廷委任为三藩总督，驻新开的沅州府（今芷江县）镇抚苗疆。他上奏朝廷改二十四堡为十三哨，每哨有数百兵丁把守，强化对苗疆的统治。万历三十六年（1608）兵备道袁应文在凤凰县内增设盛华、黄会两大哨，同时在小坡防区内增设水塘坳、清水塘、十八坪、杜壤等四个小哨，进一步延长和加固了防线。此时驻哨兵丁达7800余名。加上镇竿参将、乾州守备、镇溪千户所，及辰沅二卫特派的“分班屯戍之兵”，共有一万二千兵将，每年耗费的白银不少于4万两。这样庞大的阵势还是不能抑止苗族的反抗，使得戍边兵将“虽疲于奔命亦不能自保”，迫使镇边主帅“不得已更筑边墙以制之”。

万历四十二年（1615）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的蔡复一，驻节沅州，巡历边镇。目睹营哨散布而苗路崎岖，认为营哨实在难以遏制苗族夺取失地而作的冲击，便请求朝廷从国库拨4.3万两白银来修筑“边墙”。这堵“边墙”西起与贵州铜仁交界的黄合营，北至乾州之镇溪（今吉首）。天启年间（1624）辰沅兵备道胡一鸿派游击邓祖禹从镇溪朝东延长至保靖的喜鹊营（今吉首市），增加60公里。蜿蜒曲折，绕水跨山，绵延180多公里的边墙基本形成。“边墙”高2.3米，底层基宽1.7米，顶宽1米。因此墙沿山历涧，修筑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近石则以石垒砌，远石则以土填心夯实。“边墙”修成后，又将原来的营哨移至墙上，派兵不分雨晴昼夜，巡防把守。对封锁苗疆确实也起

到了一定作用，但也表明征苗政策的失败，引起苗民不满，在此期间曾多次发生苗民起义，攻州夺县、捣毁边墙，反对明王朝统治。这堵“边墙”几经沧桑，延至明末，多已倒塌，所存无几。

清王朝对湘西苗疆征剿更有过之，特别是乾嘉之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图“一劳永逸”之计，曾多次派员实地考察，提出“重修边墙”，终因国库不济而告终。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永顺厅黄瓜寨的石三保，乾州厅平陇的吴八月，凤凰厅鸭保寨的吴陇登，松桃县的石柳邓起义，声势浩大。东至沅江，西至贵州铜仁，南到麻阳，北至永顺，攻州夺县，威慑清廷。清王朝急调云贵总督毕沅等七省18000万兵力，由福康安为帅，和珅为副帅，分东西南北四路合围起义军。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义军创造了“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略战术，击毙清军高、中级将领220多名，坚持斗争12个春秋，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内部出叛徒，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嘉庆五年（1800）凤凰厅同知傅鼐向湖广总督姜晟、湖南巡抚祖之望汇报沿“边墙”旧址修建碉卡的情况，在《禀沿边各路修建碉卡一案》中说，嘉庆二年（1797）后，苗族起义的烈焰已被抑制，但尚未平息，鉴于各路大军已经撤出，必须“固我藩篱，严其防范”。傅鼐这个浙江山阴人，因参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有功而擢升，被皇帝称为“杰出之才”。他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一面推进“设屯养勇”、“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一方面雇募匠夫，劝谕丁勇，沿明代边墙遗址，修复边墙筑碉建卡，掘壕设关。择其高处建立哨台，取其险处建立关门，在其要塞之处建立炮台，将苗疆禁锢如铁桶一般。

哨台是巡逻瞭望之所，其视野要开阔，多建于关墙之间，一般分上下两层，下层高2.7米，宽5.3米，四周石砌，中心筑土；上房排墙垛口，高2.7米，宽5米，中空3.7米，墙面留枪眼两个，共8个，上立屋盖瓦。

碉卡是为战守而建，其布局成品字形或一字形，也有梅花形，无一定规格。碉楼分上、中、下三层，均系石砌。下层高2米，宽5.3米，中层高2米，宽5米；上层排墙垛口，高1.7米；中空3.3米，顶宽4.7米，立房盖瓦。各层之间铺有楼板，架有木梯，可供上下。每层有8个楼眼，共24个，枪眼外宽2寸，内宽2尺。

关门是用以严守过墙重要设施，建在险要地段，沿山历涧，封锁要塞。如凤凰城北的靖边关，它横跨在擂草坡山坯凤乾道上，是进凤凰厅的咽喉要地。关门分上下两层，宽9.8米，进深3.6米，高6.2米；下层仅留3米宽，高3米，进深3.6米的关门道，可供行人出入。设有两扇大门，可以启闭。通道两侧是实心基础，用经过细钻的朱红条石浆砌四周，中心填土夯实，上层砖木结构，竖有三柱两挂房三间，青瓦盖顶，青砖封砌四周，对外一面有四个枪眼，

可以屯兵把守。

炮台是堵截攻战之所，择其地势要冲而立，一般高5米，宽5米，用石砌筑，中心用土填实，上建炮楼，排有垛口，其上立屋盖瓦。

边墙通过清朝如此配制，并按照五里一碉十里一卡（哨）十五至三十里一汛（营房）的布局，真是关卡林立。据统计，关门、碉卡、哨台、炮台等就有800余座。并挑选丁壮4000名，练勇1000名驻守，真可谓屯堡碉卡，星罗棋布，遇有警讯，数百里柝声相同，咸知戒备。

清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的征服、控制，使凤凰这位于湘西、黔北、川东角隅上的小县成了“苗疆咽喉”、“靖边重镇”，驻有镇台大员总理“边务”，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大兴土木，复边墙，建厅城、官署、衙门、兵营、关卡、碉堡、哨台等军事设施，“屯兵养勇”，统治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兴寺庙，建祠堂，借助神权，以维护社会秩序，仅傅鼐任期内修建寺庙28座，一个小小的县城寺庙达56座之多。在厅城建造了敬修书院，在得胜营、同全城、得家卡等地建义学24馆。这样一来，边墙在客观上也有某些积极作用。从当时看，它调节了民族关系，形成了各守疆界，维持了一个时期稳定。为苗汉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空间。加之很多外地官兵、工匠、商人进居凤凰，带来了文化技术，发展了商品经济，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乾嘉苗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传入内地，由于凤凰当时处于湘西统治中心的特殊地位，不少人都非常重视子女的读书，为后来凤凰人跻身于士林，报效于国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近代各个历史时期，凤凰都不乏知名人物，熊希龄、沈从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长沙师范学校创始考辨

张　兴

关于长沙师范学校的创始，历有三说。

一说为"长邑小学堂及高等小学堂应为长沙师范之肇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长沙县知事徐本麟所撰《兴学记》碑文开篇就说："长邑高等小学之设，俞山阴抚湘时，就古㴩潭寺略加修葺，设额四十名，为之嚆矢。"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下册《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报告书》中亦云："本校原系长邑学堂，中华民国始改今名。"

清末，科举废，学堂兴，湖南率先成立的长沙县小学堂，择定"地势甚开廓"的"㴩潭寺改建"（笔者注：即今长沙师范校址所在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学"（光绪二十五年第187号《湖南官报》和民国二十二年《湖南年鉴》均有上述记载）。愚以为，以长邑小学堂作为长沙师范的前身，无非是在㴩潭寺这块土地上首先兴办的是这所小学堂，故以其"源"溯之。

二说为："本县晚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曾办简易师范于荷花池之㴩潭寺，主其事者为余君子昭。民元，并长沙、善化为一县，改称联合师范，徐君特立任校长，旋又改称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民国二十一年《长沙县教育概览》）此说无讹，然鲜为人所究诘。自1985年以来，我因受命撰写《长沙师范学校校志》，多方查阅资料，意外地获得佐证上述说法的如下信史。

其一，彭汉怀撰写的《余君肇升事略》有云："乙巳（1905年），任学署课长。君念兴学莫迂于桑梓，诱民莫先于小学，适长沙古㴩潭寺广有隙地，于是因寺设'长沙师范'，以储城乡小学师资。"

其二，1986年5月16日在长沙师范音乐大楼基建工地发掘出的长沙县知事徐本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癸巳月（4月）所撰《兴学记》碑文，记载尤详，兹择要录之如下：

岁乙巳，长白端公（注：即当时任湖南巡抚之端方）称节湖南，慨然以兴学为首务，麟适权斯邑，不得不力任其艰。

适奉明诏，停止科举，多办学堂。邑绅又有开设师范学堂之请，设额百二十名，就邑学之右，大加营造……

惟是经费缺如，除邑绅提学宫卷费二千余缗外，麟亦捐漕余银四百金……另外，余尧衢、陈伯屏、朱雨田等捐足纹银三千五百两、银洋三百元。

时值余君肇升东游回国，为之监督，条理秩然；又得张君祖同为之总理，主持全学，以楷多士；刘君高熙之督工改建，除旧布新，始合程式……

自去年七月经始，今春二月落成，纵五十余丈，横二十余丈，总计礼堂二，教授室四，自学室六，其余寝室、食堂及应有之室，一律齐整。

开学之日，长官临视，长少咸集，彬彬雍雍，悉娴进退升降之节……

上述录要，充分说明了长沙县师范的建校背景，所耗经费及来源，何人主持营造，营建时日及校舍结构，开学时间与盛况等等。

其三，《乙巳年终在省各学堂职员教员调查表》载有："长沙县师范、高等小学堂总理张祖同，师范监督及小学堂堂长余肇升。"根据"其二"史料，该年冬长沙师范尚未开学，但建校已近竣工，职员教员亦已配齐，故该调查表将其列入，是不悖情理的。

根据上述三项史料、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长沙县师范创建于1906年，3月开学，总理为张祖同，余肇升为监督。民国元年，长沙、善化并为一县时，改称长善联合师范，徐特立于此时任校长。继更名长沙府公立师范学校，旋又改称长沙县立师范学校。至于1906年到1911年6月间的办学规模、课程设置、主事人员等尚未发现可考资料，有待后来者继续查觅。

三说为"长沙县立师范学校于民国元年由徐特立所创办"。此说资料甚繁。例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上期《长沙师范校刊》第一期《本校沿革》就有这样的表述："民国元年，县教育界人士姜济寰咏鸿、徐特立懋恂两先生，以学校初兴，师资缺乏，倡办师范，为发展全县小学教育事业之基础，遂收长沙、善化两中学，于出入是门善化学宫善化高等小学堂旧址开办师范学校……徐特立先生任校长，于三月初开学，是为长沙师范设立之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散见于报章、杂志，特别是长沙师范学校的诸多文件中，全以此说为准，且泥于此说。

诚然，徐特立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对长沙师范学校的建设与关心，素为长沙师范生所称誉、所景仰。但该校是否由他创建，却有必要查实。

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成功，长沙、善化两县并为长沙县，姜济寰首任该县知事，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决心为民众办点好事。姜济寰与徐特立曾于1907年同学于宁乡中学附设速成师范班，过从密切。据说，姜济寰曾向徐特

立提出拟在长沙兴办一千所国民学校的设想；确实，姜济寰在两年的任期内，通过提倡、支持、扶植，县内兴起了办学热潮。据《湖南省各县调查笔记有关教育史料》（注：该笔记现存湖南省图书馆）记载："民国成立，公私学校之设立，风起云涌，是时姜济寰宰长沙，鼓吹尤力，乡镇私校多有补助，初等小学合计达一千五百余校。"为了解决大办小学所需师资，徐特立应县知事姜济寰之请，衔命主持长沙师范校政，艰苦办学，为发展长沙县小学教育事业奠下了师资基础。无怪他在《六十自传》中曾这样说："长沙县（含长沙市）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都有。长沙一共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六十自传》中所指的"办了男女两师范"，"女师范"指的是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回长，于 1924 年 9 月由他倡导创办、1926 年 10 月并入长沙县立师范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男师范"则是县知事姜济寰委他当校长的长沙县立师范。无疑，长沙县立师范在开办前或办学初，徐特立曾参与筹划并艰苦创业，立下了功劳，但愚以为，校为"县立"，创办者当是长沙县政府，而不是个人，徐特立不过被委为首任校长。其见当否？尚祈明者赐教。

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始末

邓晏如

抗日战争进入到 1938 年秋季时，全国人民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上海、南京、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已先后沦陷，大片国土和各族同胞遭受日寇的蹂躏，近百万同胞被屠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呻吟。继而日寇以海陆空军围攻武汉，袭击南昌，进攻湖南。在中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彻底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念，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抗日持久战的总方针，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寇战斗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共湖南省委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于 1938 年 8 月 13 日发表了《保卫湖南宣言》，号召"全省三千万同胞紧急动员起来"，"到军队去，到游击队去，到前线及围绕前线胜利的各个方面抗敌战线上去，一致为保卫中国，保卫武汉，保卫我们湖南而战"。在此紧要关头，为了很好地贯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适应抗战需要，省委便在武冈县塘田镇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以培养抗日骨干。

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创立

1938 年 6 月，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决定由吕振羽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吕振羽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拟定筹备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塘院是当时湖南地下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冲淡学院的政治色彩，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赞助和支持，以取得合法地位，使学院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吕振羽、翦伯赞同志便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经过一段努力，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同意任塘院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同意任塘院董事会董事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刘岳厚（子奇）同意任董事会董事。7 月，振羽同志去邵阳走访第六区专员李琼和保安司令岳森，经过洽谈，他们都同意任塘院董事会董事。接着，振羽同志和雷一宇同志

去塘田寺察看院址和对筹备工作进行具体布置。有关行政事务性的筹备工作委托吕遇文（政三）同志负责。在塘田寺对河借用了席宝田的庄园为塘院的院址，这里共有一百多间长年失修的房子。前面有一条河流（夫夷江）呈半月形围绕着，右边是彭石潭和彭石岭，左边和后面是吕家村、周家村以及大片稻田，可说是山清水秀，环境幽静的好地方。8月初，振羽同志回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徐特立同志汇报筹备情况。省委同意覃振任塘院的院长、赵恒惕任董事长，并以覃、赵的名义，向同意任塘院董事的人发出聘书宣告塘院董事会成立。同时，还发函征求新的董事，由覃院长和赵董事长亲自写信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和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将创立塘院的缘起和宗旨告诉他们，并请其担任塘院的名誉董事。张治中回信表示谅解和同意，朱经农因要阻止塘院的创立，回信拒绝。针对朱经农等人的阴谋，省委和徐特立同志指定聂鸿钧、王凌波同志与振羽同志共同研究，遂决定塘院按原计划继续筹备。8月底，塘院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振羽同志和大部分教职员以及各地的学生先后到达学校，9月15日塘院正式开学。

组织机构和教师队伍

塘院成立了董事会，赵恒惕任董事长，张治中任名誉董事，刘岳厚、李琼、岳森、林拔萃（武冈县长）、吕惠阶、李心徐、李梯云（均当地绅士）、李荣柏（大革命时期湖南土地厅负责人）任董事。除董事会外，院有院长、副院长、教务长，院下设研究部、补习部、学生生活指导部、事务部、院长办公室等机构。院长覃振、副院长吕振羽（兼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务长先是张天翼（兼教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1938年11月张调《观察日报》工作，由曹伯韩兼任（教政治经济学），后又由陈润泉兼任（教自然科学）；研究部主任李仲融（教哲学）；补习部主任先是雷一宇（兼教日语），后是陈啸天（教国文）；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先由雷一宇同志兼，后是游宇（兼教俄语）；事务部主任是吕遇文，院长办公室秘书是王时真（江明）。塘院的教职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文艺教师王西彦、国学教师吴季甄、游击战术教师杨卓然和王煜、音乐教师林居先和周白、国文教师徐昭和王时真、军事教官李华白、三民主义教师廉叶（国民党派来的）、地理教师姜国杰（研究部的学生）、历史教师高剑莹（研究部的学生）、体育教师薛夏（研究部的学生）。还有教务部的工作人员陈璧登和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许钟谋、杨染香同志。绝大多数教职员，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认真教学，积极工作，受到全院学生的信赖和尊敬。

办学宗旨和院训、院歌

塘院办学的宗旨，概括地讲，就是"树文化据点于农村"，"建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抗战时期，由于日寇的残暴，民族文化备受摧残，广大青年失学，彷徨四顾，亟须探求前进的方向。同时，游击队的发展与民众的组训，在城市与农村、前方与后方都需要许多青年干部去开展工作。因此，塘院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适应战时的需要，实施战时教育方针，除了让学生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还要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抗战形势，具备政治军事常识，开展民众教育，参加救亡工作，以农村为阵地，按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宣传抗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塘院的院训，开学之初，规定为"忠诚勤敏"。1938年12月19日又规定"精诚团结"、"英勇活泼"、"紧张严肃"12字为院风的准则。当时塘院定的院训，是旧瓶装新酒，是想把它发展为救国的道德，就是要求全院师生员工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抗日救亡的战斗中作出积极的贡献。

塘院的院歌是："我们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

教学方针、内容和方法

塘院的教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各样的干部，为民族解放输送人才。学院第一学期设3个班，即：研究部第一班、第二班，补习部1个班。共有学生120余人，有的是各地党组织介绍来的，有的是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推荐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慕学院和老师之名而来的。1939年2月，研究部第3班和第2班各招新生50名，研究部第1班、第2班和补习部第1班各招插班生10名。学生以本省武冈、邵阳、新宁、东安、祁阳、湘乡、湘潭、宁乡等县为最多，也有来自江西、福建、湖北及东北各省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少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其中有一名姓陈的尼姑）。新生报到后，经过测试，按文化程度编班。各班的课程如下：

研究部第1班、第2班的课程：中山学说、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现代哲学思潮、军事常识、国际问题、文艺（选修）、外语（选修）。

研究部第3班的课程：中山学说、哲学概论、社会科学大纲、经济地理、抗战常识、文艺（选修）、外国语（选修）。

补习部第1班、第2班的课程：中山学说、国文、地理、历史、自然、社会科学讲话、抗战常识、英语（选修）、数学（选修）。

上述课程，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延安日报》、《新华日报》、《观察日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书报编写讲义进行讲授的。每周振羽同志还利用周会或座谈会对"中国革命运动史"和国内外形势发表演说，游宇、曹伯韩、雷一宇、阎丁南等还组织了"抗日民族战争讲座"。

塘院的教学方法是：教学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在这里既要学习，也要工作，学习和工作是为了民族生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

学生自治会和课外活动

塘院有学生自治会组织，在学院和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推动学习，维持治安，管理学生生活，开展课外活动。学生自治会主席先由王时真担任，后由高剑莹同学担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民众教育部、生活指导部、总务部、体育部。各部的负责人，有郑圭田、姜璟、姜国杰、雷震寰、薛夏等。有的部还在下面设队或组，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宣传队、歌咏队、壁报组、戏剧组、访问组、募捐组、膳食组、治安组、妇女组。队和组的负责人有我和吕健云、刘儒风、周持中、王翼飞、曹力进、申苏民同志等。每个学生要参加一至两项工作。塘院的学生，生气勃勃，非常活跃。他们经常召开和参加各种会议，如各工作部门的业务会，各种课程的研究会，分析国内外形势的讨论会，解决青年切身问题的座谈会，等等。特别是生活检讨会和文娱晚会，大家更加重视和更有兴趣。生活检讨会是不定期的，大约半个月开一次，主要是围绕工作、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充分发扬民主，谁对学校行政、学生会的工作、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工友们的私生活有什么意见，都可提出批评和建议。晚会表演的节目有故事、笑话、山歌、渔鼓、大鼓、平调、地方戏、抗战歌曲、外国歌曲等花样繁多。同学、先生、工友、附近的农民欢聚一堂，十分融洽，这是一般的学校少有的。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以便战火蔓延到附近地区时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学院通过学生自治会，以大量的时间组织和发动学生常

到附近村庄去访问、宣传和教唱歌曲，还在学校内办了儿童识字班、成年识字班和妇女识字班，吸收附近的农民及其子弟参加。同时，还在对河街上办识字班，在水溪唐家（离学院七里）、油塘（离学院五里）办民众夜校，帮助当地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和民众夜校的课本是在通俗读物专家曹伯韩老师的指导下，由王时真等同志编写的，内容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单字造句到叙事，由群众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生活和抗日救国的大事。学生自治会还经常派宣传队、歌咏队、戏剧组到金秤市、白仓司、回龙市、塘渡口等集镇去进行宣传和演出，受到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通过宣传演出，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战时教育。有次我们去白仓司演出，观众达四五百人。他们对剧中难民流离失所的遭遇伤心流泪，对汉奸的卑鄙行径切齿痛恨，对游击队的机智勇敢拍手称快。学院和学生自治会还派王翼飞（建中）和我分别与土匪部队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以便将来开展游击战争时加以利用。还派人去水溪唐家、塘渡口帮助办织布厂和缝纫训练班。后来还派遣邵阳、武冈、新宁、东安、祁阳、湘乡、城步、绥宁、洪江等地的同学回本乡，以小学校为中心，办民众夜校，组织救亡室、读书会、歌咏队等，建立抗日救亡活动据点。1939年初，雷一宇老师和申苏民（剑涛）同学去邵阳县廉桥、水东江、两市塘、宋家塘、范家山、火厂坪（现在这些地方属邵东和新邵县）一带组织青年抗战服务团，先后成立20余处宣传站、民众夜校、民众阅览室，大力宣传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塘田讲学院的斗争历程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师生，坚持按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努力工作和学习。塘院第二学期于1939年3月开学。在此前后，有些人怀疑塘田战时讲学院是"南方抗大"。他们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一个青年，甚至以前不大懂事的青年，在塘院进步那么快，学习半年，就知道那么多事，懂得许多理论，能提出许多问题？""塘院的教师，大都是学者、教授和作家，他们往常可以拿几百块钱一月，为什么在这里过艰苦生活，每月拿几块大洋，毫无怨言，难道他们都是傻瓜吗？""为什么塘院只注重社会科学，而不像别的学校那样有物理、化学课程？"为了争取塘院能长期地办下去，振羽同志针对以上情况，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议上一一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解答，他说："第一，把学生进步快作为怀疑的理由，实在太幼稚了，只有自身力量的快速增长，只有作为抗战中坚的青年的飞跃前进，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因此，在我们看来，学生的进步还不够，还太缓慢了。第二，塘院的教师愿拿微薄的生

活费，丝毫不足奇怪，在进行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今天，只要不是汉奸，就得认清自己的责任，站在应站的岗位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神圣的抗战，就应选择最能打击敌寇和最能贡献自己力量的岗位努力工作，而决不应该谈金钱禄位。第三，我们是不是不注意自然科学呢？不是的。我们的课程表上有数学，有自然科学概论，而且在教学上，常常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我们注重社会科学，也注重自然科学，尤其重视三民主义。我们不只是教育青年投身抗战，而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坚定青年对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念，这难道不对吗?!”振羽同志义正辞严的讲话，表达了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心声。

1938年11月，又有少数人在学院散布说，“塘院是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吕振羽是共产党员，不要上他的当”。有的人甚至逼迫覃振院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话，企图以此来影响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声誉。长沙文夕大火以后，张治中省主席被免职，学院的处境更艰难。1939年2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置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之后，国民党湖南省当局指示：“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南方抗大，宣传错误思想，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追究。”湖南第六区专员李琛、保安司令岳森于1939年初转令武冈县长林拔萃查处塘田学院一事。林便以电话约吕振羽同志去武冈，说“有事急待面商”。吕到武冈后，得知湖南当局奉令停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感到情势紧张，回院后，一面派人向省委报告，一面决定派陈润泉去长沙找赵董事长，必要时去找覃院长。希望调解继续办好学院。4月份，湖南省当局严令第六区选派干员率兵前往塘院“勒令解散”。第六区奉令派军队至塘田学院，张贴勒令解散布告。全院师生员工在吕振羽同志的领导下，成立塘田结束委员会，认真清理财产，妥善安置师生职工。一部分党员干部留下在湘中南建立党支部外，还有一部分党员和学生撤至桂林，一部分回家或介绍工作，副院长和部分老师、学生留下办理结束工作。6月底，全院师生员工安全撤走，塘田战时讲学院完成了省委交给的各项任务后结束。作为塘田战时讲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中共党员的吕振羽同志，在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整个过程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党外朋友，争取他们的支持，依靠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使塘田学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振羽同志治学勤奋，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作风民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师表，其高尚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铭记不忘。

沅陵《力报》杂忆

冯英子

1943年我初到沅陵之时，沅陵当时有三家报纸：一家叫《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社长吴忠亚；一张叫《前卫日报》，是第六战区所办之报，社长常健；还有一张叫《中报》，社长匡文炳，是中央社沅陵分社的社长。除《国民日报》是对开以外，其他都是四开报纸。朱德龄先生先前也办过一家四开报，名为《卡麦斯》，以《凤凰山有凤来兮》那篇文章透露了张学良关押在沅陵的消息而名重一时，这时他也停办了，后加盟到《力报》。

《力报》原先在长沙出版（1936年9月创刊），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迁到邵阳，1940年5月为国民党查封，并且抓了康德、严怪愚和我三个人去。所以我们相约，《力报》如能复刊，不管千山万水，都要前来同甘共苦。严怪愚在沅陵找到《力报》复刊的机会，写信告诉我：“邵阳之约，不可爽也。”这八个字，成为我到湘西的契机。

就因为这点历史因素，我对《力报》有割不断的感情。当时我在江西，有好几个地方要用重金礼聘我去，国民党的江西机关报，不仅要我作总编辑，而且还给我弄了一个保安司令部的少将高参。可是我还是悄悄地离开了江西，来到湘西。

沅陵《力报》是1943年9月出版的，出对开一大张。我们用的是邵阳《力报》的报头，自称是邵阳《力报》的继承者。我去桂林拉来了不少文章，柳亚子先生也写一首二十韵的长诗送我，我自己也雄心万丈，以为真可以一展身手，“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了。

沅陵《力报》得到同业的很多支持，吴忠亚、常健、匡文炳各位，同我合作得很好。沅陵《力报》一炮打响，在沅陵风靡一时，同他们的合作是分不开的。今天，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这几位先生还存活在这个世上的可能性是太小了，回想当年那段生活，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了！现在我着重介绍当时的几位同人。

小记李宗理

李宗理先生是湘潭人，湖南大学的学生。他原在芷江一个什么补训处工作。他有一个哥哥叫李宗溥，沅陵统税局的局长，此人挥金如土，忽然得急病暴死，大家不知道他亏空了多少钞票，谁也不愿去接他这个遗缺，于是把这个税务局长交给李宗理了。不料这个税务局长，是一个大大的肥缺，李宗理一上任，就发了大财，一下成为沅陵的首富。

40年代初期，严怪愚到了沅陵，提出了邵阳《力报》在沅陵复刊的方案。李被严说服，投资《力报》，成为沅陵《力报》的董事长。沅陵《力报》之能够出版，同李宗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虽然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把《力报》交给朱德龄独自去经营了，可是却引起了李宗理对办报的兴趣。他建议严怪愚和我同他合作，办一份将来在全国发展的报纸。这个"全国发行"打动了我，我和怪愚离开了《力报》，去创办后来以李宗理为社长的《中国晨报》了。

《中国晨报》1945年先在晃县，后在辰溪出版，当时被读者认为是湘西的《新华日报》，湖南大学和蓝田师院都不许学生阅读。但那年8月，日本投降了，我们决定把报纸搬到汉口去出版。我在辰溪买了一个木排，把全部生材装在木排上，顺流东下，打算一到汉口，卖掉木排做开办费，就可出版报纸。我把此事交给了黄达三先生，自己先往上海采购报社器材。不料等我回到汉口之时，形势大变，原来在此期间，李宗理利用《中国晨报》这块牌子，拉上了王耀武的关系，他到王耀武那里去做什么机要室主任，也准备将《中国晨报》作为向王耀武送的一笔大礼了。

我们当然不同意李宗理这个作法，在长沙来来回回磋商了几个月，最后决定《中国晨报》停办，人员各自走路。李宗理则到青岛去为王耀武经营他的"机要"去了。后来李宗理在长沙北门外上麻园岭造了一幢洋房，真的成为长沙的暴发户了。

因王耀武的关系，后来李宗理"竞选"到了一个"立法委员"，后来又逃到香港。渡江战役以后，他同44个"立法委员"在一起，宣布起义，投向人民了。

1949年，我在香港看见李宗理一次，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听说他夫人和他离了婚，又听说他上了骗子的当，但究竟怎么样，却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我认识李宗理是1943年，不过七八年光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当年沅陵首富，而今安在哉？

崔兰传奇

沅陵《力报》的出版，当时在湘西是很有点声势的，不仅吸引了不少读者，更有意思的是吸引了不少青年投奔我们。

我记得《力报》在沅陵出版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叫崔兰的青年来信，他说他是泸溪县的一个警官，要求到《力报》来工作。当时一个县的警官，收入是不差的，警官是介于督察长与派出所所长之间的职位，而《力报》的一个编辑和校对，收入远不及他。我写信劝他不要来，说我们的生活太苦。不料他不怕吃苦，竟然丢掉了他的职务，到《力报》来作校对了。

这位崔兰先生先是从事校对，后来作了编辑。《力报》迁回长沙以后，他也到了长沙。有一次过早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国民党要抓他，他没有办法，留下遗书，假作投江，悄悄地跑回上海，改名换姓，生活下来了。

这位崔兰先生，现名王敏，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那段《力报》历史，很有点传奇性的。

还有一位王星池先生，是沅陵的商业工作者。《力报》出版之后，他一定要来参加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拒绝他的好意，把他安排在营业部工作。1946年，他也来了南京。那时从湖南来的一些小青年，大概都是我用各种方法介绍出去的。听说这位王星池先生后来入了党，参加了革命，那么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

朱德龄先生

我到湘西认识的人，第一个是朱德龄先生。朱先生是长沙的老报人，长沙大火之后，他流亡到沅陵，办了一个叫《卡麦斯》的小报，也办了一个群力印刷厂，设有铜模和铸字等车间，对支持湘西文化印刷，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我们在沅陵复刊《力报》，他大为赞成，把他的印刷厂加盟《力报》，因此大家推他为《力报》的社长。我那时还不到30岁，而朱先生已经40出头了，在我们一批人中，他是长者。而朱先生也确有长者的风度，他沉着寡言，与人为善，待人宽厚而律己极严。

《力报》出版了一年多，由于经济问题同李宗理的关系闹得很糟，后来李宗理建议，把《力报》交给朱德龄去办，严怪愚和我一起退出，去经营一份《中国晨报》。朱先生也同意去独立经营《力报》，他要求我挂一个副社长之名。我当时一时脱不了身，也姑妄应之。其实我后来的时间，主要去筹备《中国晨报》了。

大概是1944年的秋天，我去衡阳、桂林为《中国晨报》购置机器和铅字，渡过沅水，到南岸去乘车。那天凄风苦雨，朱先生一定要送我过沅水。在渡河途中，我很有点凄然之意，朱先生的殷殷之情，至今难忘。那一天，我给朱先生吟了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句，朱先生叮嘱我：

"你不要忘掉，只要《力报》存在一天，你始终是她的副社长。"正是如此，抗战胜利后，《力报》迁回长沙，我一直挂着这个副社长的名义。

朱先生凭他的群力印刷厂的基础，终于把《力报》支持下来。后我因《中国晨报》的失败，不想再留在湖南，借了盘缠离开了长沙，回到南京工作。朱先生到南京来看我，我请他在夫子庙的六华春吃了一顿饭。他告诉我，《力报》的编辑崔兰，警备司令部都要抓他，他假作投河自杀，才逃出了虎口。可见搬还长沙的《力报》，还能保持在沅陵时的立场。其实这位崔兰先生，就是沅陵《力报》留的班底。

想不到那次我和朱先生的碰头，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碰头。中国这时进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解放不久，朱先生即因病去世了！遥想当年在湘西共事之情，常常不禁悲从中来。

"晦庐"在否

沅陵《力报》出版时，我们的总经理叫陈永言。陈先生身长玉立，极有富态。他是沅陵民众大戏院的老板，也是湖南大学的毕业生。

在旧社会里，开戏院这类的营生，不大容易，因为他首先要有一套压得住当地地痞流氓的手段。陈先生是湖大学生，哪来这套本事？原来他的母亲，是凤凰县里的凤头大姐。凭这点声望，他的民众大戏院，流氓地痞连正眼也不敢觑他的。

陈永言办报当然是外行，但也管得有条有理，发行有发行的一套，广告有广告的一套。问题是不管如何多才多艺，报纸要赔本却是没有办法的。《力报》的经济后台是李宗理，一赔本，向他要钱，钱要多了，不免闲言闲语，脸色难看。而陈永言先生却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听不得半句闲话，受不得半点委屈，话一多，他唯一的办法是掼纱帽，不管了。他一撒手，我可不能不管，编辑部里的七八条枪，眼睛都是盯着我的，我只好去同宗理打交道。好在我这个人从小在苦水中泡大，一向一个铜板当作两个铜板用，李宗理对我也比较放心。这样牛牵马绷，维持了《力报》一年光景。

陈永言先生掼纱帽以后，在龙头井附近盖了一幢平房。他搞建筑极有经验，《力报》在校场口的那幢平房，就是他的大作，虽然材料不好，外形却很漂亮。龙头井那幢房子造好后，他说要在这里韬光养晦了，要我起个名字。我说不如就叫"晦庐"吧。他欣然同意，过了几天，就请人写了"晦庐"两个大字，刻在门上。永言与我年龄相仿，那时大概也不过30岁左右。悠悠半纪，思念常在，不知晦庐主人，今日情况如何矣?!

长沙黄氏音乐世家简记

朱立奇

一

从古城长沙的经武门出城，沿着长岳古道向北走约60华里，来到一处叫上湾的地方。上湾离古道一箭之地，有一处清康熙年间修建的住宅。这座住宅坐北朝南，三面环山，虽是砖木平房，却也高大轩敞，两进三重，大小厅房40余间。大门朝向西南，前坪宽阔，坪前一汪鱼塘，清波荡漾，一望便知，不是官宦门第，也是诗礼人家，但已经破落了。那是光绪五年，这家黄姓人家落到了最低水位，单传一个儿子这年死了，过门不到两年的媳妇，才19岁，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不满周岁。房舍萧条，门前冷落，寡母孤儿，何以为继?又值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英法俄美等帝国主义肆意侵凌，民不聊生，饥民四布，盗贼蜂起，这个家呀，眼看就要拆卖典当一空了。

幸亏这位年轻的寡妇，也出自诗礼人家，知书识字，贤惠聪颖，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她受聘待嫁的时候，就已知道黄家的底细，丈夫既逝，她决心勇敢地挑起守家抚孤的重任。孝服未除，就打起精神，操持家务。节衣缩食、料理庭园、种菜栽花、养鱼课子，偌大一个宅院，凭着她和一个老妈子摆弄得井井有条。但到夜晚，这片宅屋里显得格外空荡寂寞，只有小儿子的鼻息声，给她一点安慰和鼓励。她意志坚定，心窍空灵，喜听音乐。娘家陪嫁一座八音钟，嘀哒之余，又奏出一曲悠扬旋律，消散她的愁烦，荡平她的心绪。

孩子取名黄伟，从小叫做"东儿"，长大了就以晓东为字。生得十分聪明，课以诗书，转眼成诵，教其写字，笔法流利，还喜作画，又常常搬弄母亲的八音琴，随曲哼唱，音色洪亮有韵。稍长，母亲就给他买了一支洞箫，略加指点，居然成曲。附近将军庙一巨富是黄家的族叔祖，让黄伟去他家从琴师学琴，又得到湘剧名鼓师春玉的指点，十多岁就会了各种传统乐器。难得寡妇母亲愿意发挥儿童的天性，依着黄伟的兴趣爱好，还让他跟和尚张少雪画师学画，甚至让他跟着钟表匠学修座钟，让他跟着郎中学开药方，期望孩子能有点

技艺，懂些偏方，也能方便一隅，交好邻里。黄伟20岁的时候，竟然诗书通顺，琴棋书画，多艺多才。这时，长沙省城办了一个官立高级优等师范学堂，这个没有父亲的孤儿就以黄晓东的名字考取了。

黄晓东先生后来成了长沙各学校的音乐美术名教席，娶妻衍后，竟得子女8人，孙辈30余人，包括各自的配偶，共有音乐教师、教授、校长、专家、留美硕士、国家乐团演奏家等30余人。110年前上湾这个几乎解体了的黄家，竟然在一位19岁的寡妇的操持教育下，发展成为湖南一户出色的音乐世家。祖国妇女的这种传统美德，不能不使后人引以为荣。而这位默默奉献的寡妇，已经逝去了近70年。她在台湾的孙女黄源兢女士，也已88岁高龄，去年来信，念及“祖母十九岁守节抚孤”，却还不知道祖母的名字哩。

二

孔子订制的礼乐制度纯正而规整。例如：天子的乐舞有舞生八行（佾），横直每行8人，形成一个64人的方阵，进行歌舞。乐队也是与之相协的。即64个乐生，演奏金（钟）、石（磬）、土（埙）、革（鼓）、丝（琴）、木（柷、敔）、匏（笙）、竹（箫）等八类材质的乐器，各有八件。乐生舞生的服饰，也规定了青、赤、白、黑、黄五个正色，所谓“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规格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但是，当时就有个季大夫，竟然在厅堂里搞“八佾舞于庭”，这超越身份的排场，是个原则问题。所以孔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到了20世纪这些仪式乐舞的规定，不仅早已乱了套，而且由于西风的侵袭，那些“大风”、“南薰”等古曲，也很难看到听到了。长沙这座古城却得天独厚。那时全国只剩下两支这样的乐舞演出队伍，一支在山东曲阜的孔庙，一支在浏阳的文庙。所以，每年古历八月初九孔子诞辰的这一天，长沙南门的文庙里，还能把浏阳的队伍调来，进行一次具有天子规格的乐舞祭祀仪式，使长沙人一饱眼福、耳福。但是，指挥这种规格乐舞的礼官，却不容易找了。他既要有标准儒生的功名资历（职称），又要熟悉古典音乐，在当时长沙各学堂的音乐教席中，黄晓东先生竟然中选，当了祀礼乐舞的总指挥。这在当时湖南的老音乐家中，也算是一种殊荣了。

黄晓东先生于辛亥革命前后，任长沙师范、长郡、周南、修业等校的音乐图画教席，他不仅熟悉古乐和民乐，且学会了刚从日本输入的新乐简谱，能奏风琴。他用传统的五声八玄十二律结合西方的大小调式，向学生剖析音乐理论，并具体运用于当时流行的各种乐器，从理论到实践，给学生传道授业，确乎是当时长沙音乐界的佼佼者。

黄晓东先生19岁奉命完婚，与秀才张念龙的侄女张荃小姐结为伉俪。岳父少读诗书，长从商业，家产甚丰，可惜岳母早逝。张荃从小失母，无人照顾，自幼缠足而不得法，双足变得半残废，扶墙摸壁，来到清苦的黄家。虽有陪嫁丫环为伴，侍奉婆婆，蒸茶煮饭，整洁门庭，生儿育女，她都亲自为之。她不负婆婆期望，一连给黄家生育了六男二女。十余年间，改换了这家孤儿寡母的门庭。

黄晓东先生侍亲重孝，长沙教书以来，购置了不少的座钟、挂钟。他自己又会修理，邻里的钟表请他帮忙，来者不拒，家里常有十几座自鸣钟。星期假日回家，向母亲请安后，第一件事就是摆弄钟表，一时丁东交响，八音齐鸣，母亲特别开心。

儿女稍大，即购置各种乐器，教他们弹奏。不久，八音钟声就改换成小乐队的齐奏。《苏武牧羊》、《梅花三弄》、《二进宫》、《夜深沉》等乐曲，弥漫于翠林修竹，梅香荷芳之间；他常引吭高歌，依声而唱，“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清操十九年……”的歌声，特别能愉悦寡母的心怀。

长子黄源澄，聪颖好学，跟随黄晓东先生到长沙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长郡中学。因家庭经济有限，毕业后即在长沙县立小学执教，19岁完婚，娶杨永曦为妻。晓东先生体会母亲礼乐传家，敦睦邻里的教导，腾出西屋一间厅房，作为教室，办起一间私立小学，叫卷石二校，晓东先生自任校长，由黄源澄具体负责，广收乡里学生，因材施教。从此琴声之外，黄家宅第里又充满了琅琅读书声。

这时，19岁守寡的母亲，已60多岁。眼看自己存亡继绝一手建设的家园，不仅人丁兴旺，两代成材，书香四溢，邻里称赞，而且山有树木参天，池有鲤鲢腾跃，东园蔬菜时新，西圃花丛吐艳。春花夏荷，秋菊冬梅，抒四时之美，桃梨梅李，石榴枇杷，尽八果之鲜。琴棋书画，时蔬猪鱼的田园家风，使她得到了人生的满足。有一天，孀居多年的八叔祖母远道来访，她老欣然陪同参观一遍，当晚即卧床仙逝。

三

晓东先生常年在外教书，以微薄的薪水维持大家庭的支出，而实际主持教学和家务的责任，落到了黄源澄这个青年的肩上。

五四运动新思潮在他的脑子里激荡。他是个品学兼优，志向远大的青年，眼看他的同学，有的去东洋，有的去上海，而他不仅无钱升学，反被捆缚在这个传统家园里。体弱的母亲，众多的弟妹，还加上五六十名学生，按照传统的观念，这众多人的担子，长子乃是责无旁贷的。他承担了，并让自己的妻子杨

永曦和二妹黄源兢去长沙衡粹女校学习音乐绘画。指望三弟黄源汉稍长即可接他的班。不料将军庙的愚一伯母膝下无子，按照传统族规，将源汉继承出去（源汉后来学农，成为湘春农园的主人）。眼看一生摆脱不了家庭束缚，壮志难酬，血气方刚的黄源澄，竟然自杀。他祖母辛苦建设的传统理想家园，遭到了时代思潮第一次冲击。

黄源澄死后，老二黄源兢从衡粹女校毕业回家，主持了一段学校和家务，成为一位优秀的教师。后被附近神塘的张副军长家聘为家庭教席，又随张家迁去汉口，介绍去武昌省第十小学教书，并和张自强先生结婚。解放后去了美国，现在台湾养老。这位老二 1930 年回家省亲后别去，也就没有再来过上湾了。

老五黄源湘从长沙师范毕业后，回家接替了大哥的遗缺，一直主持学校和家务，到解放后，卷石二校才和其他公立学校合并迁走。

老四黄源洛早于老五一年，毕业于长沙师范，他的音乐天分，似乎比哥姐更为突出，师范毕业后，考取了上海美专音乐科。他治学勤谨，同时在上海音专从黄自先生学理论作曲。1931 年回长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赛过了乃翁当年在长沙音乐界的地位，成为 30 年代长沙各校的音乐名教席，当时的湖南广播电台破天荒地聘他播教小提琴。他还组织了大时代音乐社，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的音乐青年，他的原配夫人就是当时的一位社员。1933 年参加当时教育部举办的“中华庚款征歌评奖”比赛。全国音乐名家不少参加比赛的，结果，他的老师黄自先生的作品取第一名，他的作品取第二名，获得一架钢琴的奖品。

老六黄源澧，资质不让乃兄，高中毕业时，在五哥源洛的指导下，苦练钢琴，练得手指滚烫，在冷水中浸泡一会，又继续弹练，后由五兄资助，考入上海音专为插班生，以大提琴为专业。四、六两兄弟后来走进了国家高层音乐界，也没回过家了。

老七黄源健，老八黄源淮都成长在抗日战争年代，都当了小学音乐教师。源健后来结婚外适，一直在长沙教书，1990 年以 72 岁高龄去世；源淮是老满，抗战以后另有一番作为。

1948 年黄晓东老先生说：“抗战以来，骨肉离散，老伴体弱，51 岁就病逝了。”时代的冲击，上湾这个老家，这时只剩他老人家和老五源湘夫妇子女五个人了。老先生《七十自题小像》云：

弹指光阴七十年，今朝故我尚依然。
眼看瓜豆明因果，身历沧桑感变迁。
济世乏才援陷溺，匡时无策计安全。

优游且足林泉乐，不问苍生只学禅。

老先生的感叹充满传统儒家的谦逊之词。其实，他老种的“瓜豆”，硕果尚在后头哩！

四

1938 年文夕大火，古城长沙付之一炬，居民四散，学校迁移，黄源洛先生顿时失业。这时，黄源澧先生已经加入中华交响乐团，信告四兄源洛，于是，兄弟双双加入中华交响乐团，兄拉中提琴，弟拉大提琴。中华交响乐团是当时唯一的国家级音乐演奏团体。晓东老先生的音乐家传，在这里初步得到展现。

黄源洛先生随乐团流亡重庆，受聘社教学院执教。日寇飞机频繁滥炸，毁掉了源洛先生的寓处，不久幼儿病逝，妻子离异，国难家愁，孑然一身。就在这种处境中，他和陈定、李嘉两位先生，根据《大公报》上一篇反战报道，策划创作大歌剧《秋子》。李嘉先生因故退出（现李先生在日本），和诗人臧云远先生继续合作。《秋子》总谱完成后，得到当时重庆文化界全力支持，由中国实验歌剧团担任演出，中国电影制片厂导演王沛纶和王瑞麟、史东山、李嘉、吴晓邦、马彦祥、陈鲤庭、贺孟斧、谢绍增、应云卫等名家组成导演团，吴晓邦先生执导，谢绍增先生负责声乐指导。黄友葵教授推荐国立音乐学院在校两位高才生莫新桂和张权担任男女主角。演出顾问还有司徒雷登、李抱忱、马思聪、黄友葵、郭沫若、杨仲子、阳翰笙、罗学濂等社会名流。

1942 年 1 月 31 日，中国创作的第一部国际规格的大歌剧《秋子》在重庆国泰戏院隆重上演。郭沫若陪周恩来同志莅临观剧，给予积极评价；重庆各大报纸，天津《大公报》、美国《舞台艺术》杂志都发表了评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还保存着记录。《秋子》在重庆和成都共演出 40 余场，场场满座，反映热烈。

这是黄源洛先生为中国歌剧历史写下的光辉一页。随即被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聘为音乐教授，长沙籍老外交家李铁铮先生的女公子李馥小姐，音干班的女高音高材生，后来就成了黄源洛先生的夫人。

日本投降后，著名声乐家、湖南桃江县的胡然教授特邀源洛先生返乡；1947 年由源洛先生一手操办，在橘子洲上创立了当时全国的第四所音乐高等学府湖南音专。胡然先生任校长，源洛先生任教务长，1946 年继任校长，在这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现在约略估计，副教授以上的学生达 50 余名。

长沙解放后，源洛先生举家参军，任海军政治部文工团音乐教授，曾计划

再创作一部大歌剧《郑成功》，因故未能实现。“文化革命”中曾被贬到浏城桥下街道上监督劳动。拨乱反正后回到北京，扶病写作，1988年逝世，留下遗著《民族调式与和声》，约百万字。所遗两位女公子皆为钢琴教师。

五

黄源澧先生到重庆后，1945年即受聘到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现为二级教授。为了培养音乐演奏人才，在重庆时新办起少年班，解放后调配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957年成立中央音乐学院附属音乐中学，源澧先生任校长。这所学校已培养出音乐家一千余人，不少学生在国际上获奖，不仅国内，就在国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源澧先生还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领导十余年。是中国大提琴教育事业的创始人。现已退休，仍担任中国大提琴教师学会主席和中国大提琴学会顾问，曾被聘为英国普茨茅斯国际弦乐四重奏评委，是北京市高校职称评委和中央音乐学院职称专家组成员。

源澧夫人王辉庭女士是钢琴家，他们有二子一女及女婿四人是中央乐团的演奏家，有一子是音乐附中的管乐教师，有一女是军艺音乐系钢琴教师，最小的儿子在美国迈阿密大学音乐学院进修硕士。

老满黄源淮先生教音乐多年后，仍升学湖南音专师范科，1951年调整到湖北教育学院音乐科毕业，分配搞戏曲音乐。现为副研究员，湖北汉剧音乐专家，有汉剧音乐著作及汉剧剧目编曲多部。夫人冯庆吟女士系中学音乐教师。他们的一位女公子虽没有搞音乐专业，却也是一级业余歌星。

这个音乐世家的成员，哪怕是出继出去搞农业的老三的女儿黄远英女士，也是湖南音专的毕业生，是群众音乐工作专家。

黄氏一家，温良恭俭让，源洛先生夫妇是笔者的老师，源淮先生、远英女士是笔者的同学，关于他们家里的种种事迹，从未谈及，解放以后，又隔别近40年。前年为一篇纪念老师逝世周年的文章，从李馥女士那里要了点材料，才发现黄家竟是这样庞大的一个音乐世家。后来又向源淮先生要了一点材料，但他是老满，对于祖母及父兄辈的业绩，不甚了了。他给我搞来了台湾二姐的两封信，弥足珍贵，却也语焉不详，今据手头有限材料，勉强成篇，无非是表达一个音乐工作者对黄氏一家给音乐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崇敬之心而已。歪曲、错讹、疏漏之处敬希黄府诸公指正。

戥子桥二号沧桑史

魏　方

一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址设在戥子桥二号，戥子桥现已为偏街小巷，过去却是长沙市的最中心的街道之一。曾国藩的行馆在其南，刘长佑、郭嵩焘的宅第在其北，清末民初湖南公私立法政官绅学校就设在这里。戥子桥附近的望麓园，原是宁乡试馆，辛亥以后为宁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同志曾在那儿住过，刘少奇同志曾在那儿读过书。每当我来到戥子桥二号时，总不免有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就在这儿工作，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锻炼。50年了！戥子桥二号，你经历了多少风霜啊！

二

戥子桥二号这所房子原是我堂叔魏先朴先生（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解放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房子。抗日时期，因敌机轰炸，许多学校迁安化蓝田，他也随学校西迁了。空下来的房子便慷慨地让给了《今天十日》刊。他的女儿魏泽纯是我的堂妹，仍留住在这里，他的独生子魏泽馨在对河清华中学教书，间常回来。这么一来，这栋房屋，我就成了临时主人了。

原来的戥子桥二号的地盘，没有现在这么大。那时，东边的这些房屋地原属戥子桥一号，那是湖南省政府主计处。大门朝西南方向开着，里面很宽敞。因那是政府机关，有人看门。在我们年轻人眼中总是庄严肃穆，从没进去过。但从大门口向内望去，前面是个相当大的天井，里面是一些木结构的平房。现在，大概就是我们的宿舍，办公楼东半截和后面住房杂屋这些地方了。我尽量思索、察看，希望找到一些旧的痕迹，确实一点也找不到了。

至于原来的二号呢？就是现在文史馆的大门、传达室，到车库的这块地方。那时，头门向西开着，垂直的对着麻石小街。门框是用大块麻石砌成的方

拱形，门片是用很厚的木头做成，门斗用铁皮包着，开门还得用点力气，门斗摩擦得唧唧作响。

进门要下几个石阶梯才是过厅，过厅正对着一个长方形的天井。靠右边前进，便是一栋南向的四开间的正屋，面对着天井。中间是厅屋，分前后厅，厅的东西两侧各四间住屋。房子起得较高，楼上也勉强可以住人，但现在全空着。在楼上走动，似乎全屋都在轻微颤动。正屋隔天井的对面，便是一排杂屋，也有楼房，不过比正屋矮小些罢了。因为房子比街道低，有些潮湿，加上有旧式走廊，显得房子里很暗。我们只有四个人住着，紧邻的主计处，里面也很安静，总觉得有些阴森森的。我、廉叶、正坤，还一个小伙子同住在这里几乎有一年，直到长沙大火才离开。《今天十日》刊迁到重庆继续出版。

三

1937年，抗战爆发，我刚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政学院，回到了长沙。那时满腔的爱国热忱，与大学部同学陈和煜、廉士聪等办起了《今天十日》刊，投入抗日的战斗。开始，在崇圣里（现民主东街一条小巷）佃了一间楼，十多个人挤着睡在地板上，写稿、采访、编辑、校对都在这间房子里。一大碗青菜就可吃下几大碗白米饭，如果一周能吃上一顿肉，就认为是极大享受了。大家手中钱都不多，有的靠家里接济，有的在机关当一名小职员，将节省下来的钱来办刊物，所以尽量节省用。但大家爱国热情非常高，精力非常旺盛，思想也特别乐观，总觉得前方将士流血牺牲，我们呆在后方吃点苦不算什么。长沙连遭敌机轰炸，更激起了年轻人的愤怒，后来，我们这伙青年一个个地走上战场去了，不到两个月，社里连我这个编辑在内，剩下来的不过三四个人了，编辑、校对、跑印刷厂、发行等全都包了下来。

四

在戥子桥二号这段时间，给我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它的后厅，是我们的图书室，有着“丰富”的图书。虽然我们只有四五百本新书，但都是生活、新知等书店出版的左翼理论书籍，这在长沙却是很少有的。中苏友协地址在邻近我们的荷花池，这里，集聚进步文化名人，例如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曹伯韩等，但藏书也没有我们多。所以我们不仅感到“丰富”，还有些感到骄傲。我们用仿宋字刻了一颗长方形的“今天十日刊藏书”的橡皮图章，在每本书上用蓝色印油盖章，白纸蓝字格外显眼，我们非常珍爱它。长沙大火前夕，吕振羽到武冈去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特别到这里来告诉我们：“我去武冈，一无所有，希望你们的支持。”那时，长沙正在危急中，

我们也准备后撤，便决定廉叶随吕到塘田去教书，并慷慨地将这些珍爱的书籍全部运往塘田。后来，国共摩擦加剧，塘田学校被解散，不少青年被杀害，而盖有“今天十日刊藏书”印章的图书，便成了我的罪证，遭到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通缉，被迫抛妻别母逃亡桂林了。

它的前厅是我们的会议室。在这里，我们举行过多次座谈会，徐老（特立）、吕振羽有请必来。《今天十日》刊上有几期刊载了座谈会人的名单。吕振羽是左翼文化人，写了真名，可以扩大影响。徐老是共产党的老人，他老对我说：“不要把我的名字登上来，这将会吓退一些赞成抗战而又害怕共产党的人。”他还说：“你们的刊物，应该站在革命立场，多载国民党将领抗战的事，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我们的刊物便是遵守这个方针办的。

在这个前厅，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便是十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集会。他们是《今天十日》刊的读者，他们痛恨当局腐败，反对法西斯独裁；他们是中央军校毕业入机械化学校高级班的学员，随着机械化学校迁来长沙黄花的。国难家仇一齐涌上心头，使他们决心去西安。我特地向徐老介绍，徐老同意送他们踏上革命征途。匆匆一别，几十年未有一人见面，料想他们应该都成了党的高级军事骨干了，而且现在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了。“文革”中，我仅仅是在外调人员来时，写过几回材料。当时，我不敢向外调人员询问其情况，大概他们也受过磨难。但他们当年英俊、热情，对革命忠诚的形象，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这个屋子里一同工作的几个人也是值得怀念的。廉叶随吕振羽去了塘田战时学院。他读书认真，写东西很扎实，说话比较木讷，是一个具有北方人性格的天津人，翦伯赞的《唯物辩证法教程》，就是在《今天十日》刊上发表的。塘田学院解散后，他到处漂流，最后到中央研究院任历史研究员去了。庄坤当时是个初中毕业生，逃难来湖南的未成年人，仅十多岁，写文章、搞校对等，整天跟着我们一道奔忙。抗日战争进入武汉外围战后，我将他介绍给徐老送延安学习。就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几乎彻夜长谈。送了他一些衣服、旅费，次晨，亲自送他坐上北上的火车，叮咛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一别30年，全无音讯，我却时时在怀念。三中全会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告知我，他在内蒙曾任内蒙古日报社长，省出版局局长等职。我去信查询，他回信说“当时去延安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早两年曾来过长沙，遍寻你无着”等。信中的感情极为诚挚，后来还约我去内蒙一游。前年忽接讣告，已溘然长逝，不禁令人怆然神伤！

另外，那个忘记了名字的青年人，他怎么来到《今天十日》社的呢？一点也记不起了。临走时，他说，要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同廉叶为他饯行，还热

情地送给他一套军服，去后，也是消息杳然。五年之后，我到了重庆，廉叶告诉我，他是个军统特务，令人捏了一把冷汗！好在当时徐老要我留在党外，可以广泛联系各界。所以，这个特务只知道我们思想进步，而找不到我们有任何秘密组织关系，最后，也就悻悻然离开了。不然，我的年轻、天真，不知将使多少人头落地。

望麓园的楼阁

孙　燕

每当我经过幽静的望麓园时，就情不自禁地仰望那横跨小街的楼阁，总感到是那么亲切。妈妈曾不止一次给我叙述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楼阁上拨亮油灯，工作至深夜的许多故事。妈妈受到革命熏陶的一些难忘的往事，现在似乎还历历在目。

那是1926年深冬，我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同志应大会邀请，从武汉来到长沙，居住在望麓园。在此期间，他经常接待一些前来汇报工作的同志，审阅大会文件，还经常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当时开慧同志身怀有孕，家中还有年幼的岸英和年老的杨母，家里需要人照料，急于请个人料理家务，经人推荐了我妈妈。腊月的一天上午我妈妈来到望麓园一号，黑漆大门紧闭，她叩了两下，出来一个年轻妇女，她就是杨开慧同志，面带着笑容。妈妈连忙问道："请问这里住着姓杨的人家吗？"开慧同志从妈妈朴素的装束，有礼的言词中，已猜着了几分来意，马上说："是的。"并将妈妈迎进屋内，温和地对她说："我们家姓杨，请你来我们家帮忙，是吗？"妈妈点点头。开慧望着这个衣着朴实，留着短发，一双大脚的农村妇女，感到很满意（当时妇女都是留长发，裹小脚）。开慧同志亲切地对我妈妈说："到我们家帮忙，不分彼此，和姐妹一样。"这时妈妈看见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和一个头扎毛巾农民装束的人讲话，并站起身来准备送客。开慧同志向妈妈说，那高个子男人是她丈夫毛先生。开慧同志见主席送客，一边留客人多坐一会，一边给主席介绍说："这位同志姓孙，是来我家工作的。"毛主席打量着我妈妈，风趣地说："你思想还蛮解放啊，头发也剪了，和开慧一样。"还指着妈妈的大脚说："人家妇女都包小脚，你为什么一双大脚呢？"妈妈想，他为什么要责备我不包脚呢？便理直气壮地说："包了脚我怎么能走远路来长沙呢？"毛主席听了说："你还蛮有反抗精神啊，能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妈妈一听心想："他和我想到一起了。"毛主席接着又说："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主席和开慧同志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在她有生以来，很

少听到，她的胆怯、拘束心理，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在望麓园期间，主席去乡下考察农民运动，有时好几天不回来，在家里也是忙不赢，总有客人来找他，有时候常三五个人在楼阁上开会。会前，主席总是先跟妈妈打个招呼，要她注意外面来客。一天，他们正在开会，一个人在外面敲门，妈妈开门一看，见这个人东张西望。妈妈严肃地问他找谁？那人回答找姓毛的。妈妈道："这里没有姓毛的，只有姓孙的！"这个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妈妈告诉毛主席这件事时，主席夸奖她，说她很机灵，以后还有过几次同样的事，妈妈都将来人打发走了。

主席和开慧同志把妈妈当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和她讲穷人要翻身的革命道理，妈妈的思想也慢慢和他们融化在一起了，妈妈对他们也格外照顾和体贴。一次，我家亲戚郭婶子送来一只母鸡，妈妈好高兴，她当即宰了，并到街上买了一包红枣，炖熟给开慧同志补补身体。开慧同志很感谢妈妈，想要说留给主席回来吃，妈妈心领神会，即留了两个大腿和鸡头给主席。第二天下午，主席果然回来了。妈妈好高兴，连忙到后面厨房把鸡热上，不一会，将一碗热喷喷的鸡腿，鸡头端出来摆在主席面前。主席高兴地说："怎么用这么好的东西招待我呀！"又开玩笑地说："我不在家你们就吃鸡呀！"坐在一旁的开慧同志解释说："这鸡是孙嫂的亲戚送的，还给你留下了你最爱吃的呢！"主席一边吃着又香又肥嫩的鸡腿，一边说："孙嫂看我专门到乡下去，让我吃鸡腿子有劲走路吧。"

1927年初春，为了革命需要，妈妈和主席全家离开长沙前往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毛主席白天在中央农民讲习所讲课，晚上在家伏案写材料，比在长沙更忙了。不久，杨开慧又生下了毛主席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妈妈也更忙了，她和那里的革命同志亲如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八七"会议后，妈妈随同主席一家回到长沙东乡板仓。1930年10月，与开慧、岸英一同被捕入狱。开慧同志牺牲后，还带岸英在狱中关了几十天，后经革命同志和开慧的亲友多方营救出狱，回到板仓。由于敌人多次追捕，妈妈被迫于1931年春天离开了开慧同志家，回到老家宁乡。

解放后，妈妈特别怀念在望麓园的日日夜夜，一天清晨，她寻到望麓园的旧址，毛主席当年在楼阁的煤油灯下埋头写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教给她革命真理的情景，立时浮现在眼前，她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1950年初夏，毛岸英回到长沙，受父亲之托在长沙找到了我妈妈，他们在一起深情地回忆了在长沙望麓园等地和监狱中度过的艰难岁月。岸英带来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安排了妈妈的生活。

1957年夏天，毛主席把妈妈接到北京，在中南海他的住所长谈。事隔30年，毛主席还记起妈妈留鸡腿给他吃的旧事，主席说："我现在还记得你留给我吃的鸡把子的香味，我这次就没有鸡把子招待你呀！"1958年初春，毛主席把我接去北京，他问我："你知道长沙的望麓园吗？"我回答道："有这个街道。"他深情地回忆说："你妈妈初来我家时就住在望麓园，小街过道上有个别致的亭子，我们常在里面开会，接待客人，那是巷内一个较隐蔽的地方，也较清静，隔壁有个宁乡试馆，里面住着宁乡来的人。"30多年前的往事，毛主席还记得那么清晰。

毛主席于1976年与世长辞，我妈妈也于1981年去世，他们都先后离开了我们，但妈妈讲述望麓园的往事和主席深情回忆望麓园的情景，常在我内心翻腾着，每当经过那张黑漆大门时，我就情不自禁地仰望那依然挺立的跨街楼阁，我似乎看见那煤油灯还在闪着光芒，照亮着整个望麓园的街道，照亮人们前行的路程。

往往在这时，一串串晶莹的泪珠总是浸湿了我的衣襟。

修承浩与民国《沅陵县志》

刘国强

湖南方志馆最近在清理藏书中，发现一套民国19年（1930年）《沅陵县志》稿本，毛笔工楷书写，迄今已届70年，弥足珍贵。此志稿主编为蔡锷将军聘任的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修承浩。

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沅陵县人，晚年自称“柘园老人”。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秀才后，赴长沙岳麓书院深造。光绪二十八年参加乡试，中壬寅科举人。入京会试不第，分发广西省，以候补知县身份任用。光绪三十年，在广西抚署巧遇蔡锷，结为金兰之交，秘密参加同盟会。尔后，出任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因审理山神一案政绩优异，擢升广东阳江厅同知。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省都督，修承浩奉调云南都督府秘书长。在振兴军队，训练军事人才中，付出了辛劳。嗣后跟随蔡锷将军入川，历任四川省永宁、川东道尹，四川省政务厅厅长等职。

1916年蔡锷病故后，四川军、政各派明争暗斗，情况复杂，战争一触即发。修承浩自愧无力挽大厦于将倾，厌恶官场角逐，遂于次年（1917年）乞假省视归里。以后，湖南、湖北二省曾请其出任省政府秘书长，四川田颂尧、邓锡侯等人亦联名电请回四川主持省政，他都一一谢绝。

修承浩身材魁伟，性温雅谦恭，长衫绒帽，嗜好水烟，爱书画，尤工诗文，著有《柘园诗草》1卷。乐善好施，喜勤恶懒。城乡当事者有困危难断之事，都乐请翰老调解，尊称为“修公公”。

1921年沅陵大旱，饥民云集县城，嗷嗷待哺。修承浩建议县知事“以垦代赈”，从殷商富户中筹得银元1000块，稻谷5000担，在城后鸳鸯山等地设置灾民垦工场，按劳动量发给报酬，人心稍安。他亲自负责鸳鸯山垦殖场事务，将场地划分若干垦殖区，分类进行技术指导，实行林粮结合，林菜结合，营造经济林千亩，义务经营5年方离去。

1926年，贺龙率师北伐，途经沅陵，与修相交甚厚，行前赠宜兴花钵一对，现存沅陵县博物馆。1927年5月25日，继长沙“马日事变”后，沅陵发

生“宥日事变”。国民党驻军大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城内枪声大作，市区顿乱。时值修母去世，数名革命志士疏散不及，权充吊丧者奔入修家。修承浩立即热情照护。出殡时，革命同志人人身着孝服，夹入送葬人群中出城逃脱。在被捕的进步人士中，修承浩设法营救出狱的有特派员、妇女常委等6人。

1929年，沅陵县政府纂修县志，县长罗亨衢延请修承浩为修纂。当时经费紧张，修志三易其地，最后定于天宁山的庙观内。修承浩除负责全志修纂外，还撰写户口、食货、风俗等4个大类和11个目。经两载笔耕，35卷县志乃成。

民国《沅陵县志》脱稿以后，一直未能付梓，以手稿的形式由编修者修承浩收藏。全国解放后，修承浩先生被推选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趁长沙开会之机，将手稿郑重地交给当时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程潜。1958年6月，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程潜将此稿本移交给负责省志编修的省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谢华同志。

民国《沅陵县志》手稿共6册，封面有“谢华赠”三字。册一为首奉、疆域；册二为户口、赋税、食货；册三为建置、教育；册四为职官、人物；册五为人物、事纪；册六为风俗、艺文。该志稿从资料占有、体例完备以及资治、教化、存史三大作用上考察，都应首屈一指。志稿的目录，虽也袭用旧式名词，而各类子目则变旧志老例，其内容着重经济门类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记述，较好地反映了沅陵县幅员辽阔、多山多林以及连年遭受兵匪蹂躏，人民负担畸重，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实际。对民国时期的各种弊端，沅陵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此外，志稿记录了“辰州教案”、“辛亥革命”等等在沅陵近代历史上的大事变，编者作为当时的目击者和直接参与者，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为了挖掘历史信息，让更多人能读通致用，时隔60余年之后，沅陵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沅陵县志》稿进行整理出版，并委托史志办主任张先一先生等人进行策划、点校，对冷僻难懂的词句，紧贴志稿加脚注300余条。此《沅陵县志》点校本于1999年8月内部出版，发行500册，受到读者好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沅陵，进驻县城时，纪律严明，市井不惊。修承浩感慨地说：“尝闻鸡犬不惊，秋毫无犯，今日所见，真人间奇迹。”1950年10月，他出席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省主席王首道设家宴款待，共商根除湘西匪患和社会“三害”（鸦片、娼妓、赌博）事宜。会议期间，他向《新湖南报》记者发表谈话，拥护人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自家田产均已造具清册，随时准备点交。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湖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同年底，他还响应人民政府号召，亲自送两个孙子修泽宜、泽霆参军，赴朝作战。

1953年10月28日，修承浩因病在沅陵县城逝世。享年78岁。

新圆圆曲（有序）

伏嘉谟

吴梅村先生所作《圆圆曲》，诗境颇高，新腔古体，佳句流传，允称绝唱。唯梅村作曲，正吴三桂极盛之时，虽讽其不忠不孝，隐比夫差，霸业不终，已悬炬眼。然未至盖棺论定，措辞仍多忌讳。余既观陈圆圆一剧，复于上庠授《圆圆曲》有年，不禁重有感焉。乃搜罗史实，步其原韵，缀拾成篇；偶有警句，非敢差肩昔贤，唯有汗流籍泥，望其项背而已。且其微旨在明夷夏、辨忠奸，俾读者晓然民族大义，寓灵均忠爱之思。梅村生易代之秋，平生以不能殉明为恨，词客有灵，当不河汉予言也。

新圆圆曲（次吴梅村先生韵）

名将何辜弃世间，专征箫鼓镇榆关。江山不幸争豪杰，欲火偏难脱玉颜。玉颜烽火无情恋，悲剧离奇成喜宴。揖盗开关日已昏，汉奸青史羞相见。脱颖圆圆歌剧家，春风豆蔻艳如花。许将南国佳人调，等取高华七宝车。九畹芝兰芬梓里，缓歌妙舞怀纨绮。二八年华艺早精，梨园一曲欢声起。翩翩公子冒侯（冒辟疆）才，舟中絮语春江水。

省亲有约去如飞，谁料春迟别载归。茑托不关红拂夜，岂须雄服换罗衣。芙蓉出水春宫掖，少年金缕凭谁惜。一枝红杏锁烟霞，巧笑明眸笑上客。美人未必伤迟暮，客虽惊艳情谁诉。孔武干城意气豪，军书旁午殷勤顾。量珠慷慨定终身，谁阻红墙银汉渡。有负长城倚旧君，岂真祸水宗邦误。误国滔天报国难，烂柯犹欲保偏安。可怜重色冲冠怒，不作黄龙痛饮看。戎狄豺狼亲不得，故家乔木意将阑。若绳夷夏春秋义，胡忍滇池刃帝还。名花巧语晨昏进，氍毹演出忠奸定。劫后重逢复凯歌，无边春色心心印。墨绖哀军泪万行，熏天气派车千乘。老大归依谢作妃，荣华洒落心如镜。十年衣锦欠还乡，饮水源头露欲霜。教曲妓师琴亦老，红桑沧海树成行。君亲有愧偏安富，未扫高冈听凤凰。复明倘有苞桑愿，争奈三藩自帝王。野心狼子终为黑，帷幄无人乖气致。皓月中秋婿倒戈，惊呼仆地哀弦细。错倚蛾眉救国危，阴风满室胡天地。由来福慧损倾城，一代红妆薄幸名。醇酒岂真蒿壮志，露桃无语亦深情。芳华毕竟先春歇，不比延平照汗青。

君不见珠还合浦河洲宿，锦灯张宴新欢足。青磬红鱼老梵音，横塘洱海波空绿。乐极悲生四海愁，梅花万点殉扬州。五湖不泛西施舸，日夜江声咽恨流。

注：梅村以圆圆比西施，以三桂比夫差，故《圆圆曲》即吴宫曲，然西施毕竟为爱祖国之成功者，此何以说耶！

新曲释析

关于陈圆圆出身，梅村及电视剧，均以圆圆为一平民美女，而由采莲选美，一步登天，变为凤凰，如西施、杨妃者然。殊不知圆圆年少，已是苏州名歌伎，其歌艺为名公子冒辟疆所醉倒，陈欲嫁之。故新曲补叙“舟中絮语春江水”，“谁料春迟别载归”数句，此不同于原曲所引者一。

吴曲隐喻圆圆、三桂，将如西施与夫差，以荒淫败亡；而不知西施巧布美人之计，缓兵助越复兴；终得拾欢范蠡，湖上逍遥，为一爱国女郎，此圆圆望尘莫及者。新曲中有“五湖不泛西施舸，日夜江声咽恨流”数句，正所以反击吴曲者，此不同于原曲者二。

新曲直指满清为戎狄豺狼，呼三桂为汉奸；以三桂引狼入室，复追弑明帝于滇缅边境而焚其尸，其罪直上通于天！安可用“破敌收京”（郭汾阳收复西京故事）赞语，安可比作赤壁周郎，又安可叹为英雄多情也耶？（清儒潘耒谓曹孟德、司马懿之奸谲，不配称英雄）此不同于原曲者三。

新曲之于圆圆，褒多于贬；褒其美艳绝伦，且富机智；竟能不以荣利熏心而剃度为尼，妇人有此远见，诚属难得。反观吴曲激越浣纱女伴，羡煞封侯夫婿，殊嫌尘俗陋见。故新曲用“青磬红鱼老梵音”，“繁华洒落心如镜”等句以美之。此不同于原曲者四。

新曲高潮在补叙“皓月中秋婿倒戈，惊呼仆地哀弦细。错倚蛾眉救国危，阴风满室胡天地”一段史实，及“芳华毕竟先春歇，不比延平照汗青”，“梅花万点殉扬州”数句。强调民族大义，以反衬主题，收笔似较吴曲为有力。此两曲不同者五。

新曲劈头便说：名将何辜而遭惨戳，盖为熊廷弼、袁崇焕呼冤。致令守土无人，而以不学无术之少年三桂，镇守榆关，导致明亡加速。思宗躁莽，选将非人，铸此一代伤心史，盖慨呼其言之矣。与吴曲之无端突起，扬为“破敌收京”抑为“红颜一怒”者有别矣。三桂无父无君、亲弑明帝，任令骨肉成灰，何曾有丝毫君亲再见之情乎？此起首不同者六。

吴梅村卒于康熙十年，吴三桂则于康熙十七年中秋日忧愤暴毙。梅村作曲，当在康熙初年，正三桂为平西王气盛之时，距今盖三百二十余年矣，史实虽旧，而时代背景，则完全不同。

综观上述，新曲之所以为新，盖亦持之有故矣。

《宁乡县志》序

周光召

案头，一摞《宁乡县志》审定稿，把我带回到遥远的孩童时代。

童年的记忆真不少，山肴野蔌、溪蟹塘菱、村烟渔火……而常在心头流淌的，第一要数沩江。她是宁乡河流的主轴，湘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宁乡西陲。少时，我与村童们常在双江口那段沩江边戏水、摸鱼。在沩江边听到的故事很多，比如，煤炭坝的煤，要供半个湖南烧火；草冲的仔猪，宋朝就出了名，畅销邻近几省；还有沩江源头的沩江毛尖茶，明、清时候推为贡品。的确，宁乡这块宝地开发很早，物阜人宁，文明进步，在古代就是著称的。在这个不到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址，发掘出惊动世界的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吸引过胡宏、张栻、朱熹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来办书院或听讲。宁乡留给我的记忆，永远是美好的，不能忘怀的。

文明是正义之根，伟勇之母。正是这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在近代神州陆沉的危急关头，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数以千计的英雄儿女的血肉之躯，孕育了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竖起了一座惊天动地的丰碑。伟人之风，先驱之业，山高水长。

我不到十岁离开宁乡，沩江水送我入湘江。当时烽烟四起，那场景，还真担心再也不会回到宁乡，再也见不着那些总角之交了。没想到50多年以后，我会因公来到魂萦梦绕的沩江边。宁乡变了，到处可以感觉到现代化的节律，繁荣景象远非昔日可比。经过解放后40多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乡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志稿所载，1990年，宁乡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近十项经济指标进入湖南省前十名，粮食总产量和肉类总产量均居于全国百强县行列，出口乳猪为全国十强县之一，宁乡，已成为湘中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在1988年冬回宁乡的时候，县志还处于征集资料的阶段。据我所知，他们的工作条件并不怎么好，没想到这么快就成稿付梓了。筚路蓝缕，辛勤耕

耘，确实不易。

地方志是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我虽然是搞自然科学的，但对于老家的这一社科成果感到特别欣慰。几番阅读，更是感触良深。全志上下断限凡150年，仅100万字，事丰文约，统合古今，而且经济内容比重较大，注意突出人民群众和科技进步的作用，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明显。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本《宁乡县志》，共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将与日俱增。凡有阅读能力的宁乡人，都应认真看看这本属于自己的志书，她作为系统调研的信息库，对于掌握县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教事业，尤其有着特殊的意义。

现在，我们正接近21世纪的门槛。下个世纪，人类将走向宇宙，将实现信息传递、生物工程和人体生命科学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科学技术将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我衷心祝愿，一个更加开放、富庶、文明的宁乡崛起在芙蓉之国。

遵嘱，权为之序。

《晚晴诗文集》序

汤可敬

王子羲先生《晚晴诗文集》凡23万余言，其中诗词300首，论文13篇，书信7篇，序跋21篇，杂体文8篇，演讲词13篇，回忆录1篇。这是先生心血的结晶，这是先生人生的缩影。

先生是一位永不休止的战士。先生出身农家，自幼聪慧，深谙民间疾苦，常为贫苦农民抱不平。不到而立之年，主长益阳龙洲师范。嫉贪如仇，忧黎心笃；奖掖进步学生，掩护地下活动。年近不惑，设讲席于长沙市五中（今雅礼）。为迅速建成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殚精竭虑，谋大计，绘宏图，以铮铮铁骨，放朗朗诤言，虽遭厄运，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旋即发配农村，流放山野。时值“左”风猖炽，其糟糠之妻，无辜受害；先生日出而作，背朝青天，口咬黄土；日入而不能息，煮草烹菜而充饥，抚儿育女兼为母；路漫漫其修远兮，先生为求生存和发展而上下求索。刚过耳顺之年，恰逢盛世，先生重操旧业，执教于益阳师专中文系，以劫后之余生，上下联系，四方奔走，缔造益阳民盟，创建会龙诗社。岁近古稀，时见沉渣泛起，陷害忠良，“文革”遗风，屡煞不止，先生则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痛加揭露，严加批驳。直至耄耋之年，窃权篡位之辈，贪官污吏之流，望先生之项背而披靡。

先生一辈子献身教育，是一位业绩不凡的教育家。由小学而简师，而中师，而普高，而大学，不论是身为一校之长，还是位列一班之主，都极受学生爱戴。龙洲师范本是一所简易师范，先生长其校，即首倡扩展中等师范，不久即成。这是益阳第一所全日制中等师范。先生为提高益阳师资层次，为提高益阳人民素质，立下了汗马功劳。先生的教育实践是可以名垂青史的，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可歌可颂的。在宏观上，先生认为：应根据当代中国实践的需要，抽绎出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来教育学生。先生反对清静无为，提倡积极向上。先生向我们指出：每个青年都应该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界观中得到启示，树立好当代中国青年的伟大理想；都应该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伦理观中汲取营养，建设好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规

范。在微观上，连大学中文专业的古典文学的教学，先生也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益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发表的《对于师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之我见》一文，即是代表之作。

先生是一位整理古籍的学者。不少出版社慕先生道德文章之名，延聘先生整理古籍。廿年来，先生校点汤鹏《浮邱子》、校点并总校《陶澍集》共达130万字，注译《史记》、《汉书》、《后汉书》共达90余万字。有些篇目，如《五行志》、《律历志》之类，很难找到参考文献，没有先生极为深厚的小学根底和丰富的学识是绝对做不到的。先生早已是古稀之年，每天伏案十来个小时，先生将自己晚年宝贵的生命默默无声地赋予了艰难的古籍整理。

先生是一位造诣很高的诗人。先生创作的传统诗词，风格多样，技巧娴熟。或清新自然，意境高远；或典雅古朴，蕴藉深沉；或描形状物，淋漓尽致；或写意抒情，绘声绘色。它是坎坷身世的投影，它是斑斑血泪的衍化，它是愤世嫉俗的流露，它是豪情壮志的抒发。无虚情，无假意，无无病呻吟，无忸怩作态；去陈言，去空话，去雕饰，去堆砌臃肿。先生不仅有品位很高的诗作，而且还有独树一帜的理论和见解。1990年《湖南诗词》上发表的《论传统诗词的格律和用韵》，1994年3月17日在《山西日报》第四版上发表的《读臧克家先生（有感于改诗）有感》，1997年1月《湖南诗词》上发表的《也谈诗词的俗和雅》，就都是其代表作。先生主张：格律诗必须坚持格律，没有格律就不是格律诗；根据读者有低、中、高三个文化层次的实际，诗家应该分别创作出通俗作品、次雅作品、高雅作品，既不要排俗崇雅，也不宜排雅崇俗，而要使平民雅士各有所赏，最终达到雅俗共赏的地步。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当代中国传统诗词理论中的最好运用。这一切都证明先生的创作和理论已达到极崇高的境界。先生在当代中国传统诗词界应有一席不可忽略的地位。

战士，是先生的品位；教师，是先生的职业，长期跟青年打交道，就能使自己永葆青春而不知老之将至；整理古籍，能让先生细细咀嚼中国传统文化，把自己永远向上的战斗的根牢牢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情动于中，化而为诗词，战斗的诗词又反过来陶冶战士的情怀。这就是子羲先生的立体塑像。

战士的光辉，教育家的光辉，学者的光辉，诗人的光辉，这些无比明亮鲜艳的光辉，集中投映在先生的著作之中，先生的著作光彩照人，先生的生命将与不朽的著作同在。

左宗棠轶事二则

廖楚强

一、左宗棠与福建文化

左宗棠从幼年时代起就重视“闽学”。据他自己写给杨雪沧的信中说：“紫阳学统，弟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他六岁读朱熹的《大注》，而以后对以朱熹为首的“紫阳学统”（世人或称之为“闽学”）十分景仰。在清朝康熙年间，福州刊刻过一套《正谊堂全书》，大部分都是“闽学”名家著作。这些刊本早就流传全国。所以左宗棠的青少年时代，就在湖南故乡读过许多“闽学”刊刻名著。遗憾的是，这些刻本当时已有许多遗缺，一直耿耿于怀。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督闽时，便在福州亲自筹办一个新的“正谊堂书局”，召集福州的名人学者，搜罗版本，重新开雕刊印一套新的《正谊堂全书》。这对福建的文化事业实是一大贡献。福建经过鸦片战争以后，兵荒马乱，文化衰退。现在重新设局印书，使福建的文化事业得以振兴。不久，左宗棠离开福建。临别时他赠给正谊堂书局的一副楹联云：“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善哉斯言，左公之后，福建的确出过不少出类拔萃的文人学士。

二、左宗棠不买洋人的账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衙门官吏，见了洋人都是奴颜婢膝，出尽了洋相。但左宗棠却有些不同，他并不买洋人的账。当他督闽时，在福州的英国领事有雅芝归调离中国，而接任的英国领事名叫贾禄。当贾禄来福州赴任时，左宗棠对待他以平常的信札来往。接见时也用和中国同等级别的官员礼节接见。这就使贾禄很不高兴。他向清朝总理衙门告状，说左宗棠没有礼貌，对待英国领事不用“照会”，而用“札”。接见英国领事没有开中门，没有鸣礼炮。而那些外国领事们，在上海、广东等地，都受到“照会”和“礼炮”的接待；唯独福建不然，对洋人十分无礼等等。当时左宗棠立即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说按照

外交惯例，大使级的官员，才能使用"照会"，而一个区区领事，充其量不过和中国道员平行，用"札"来往就够了。至于说什么要对领事开中门，鸣礼炮，我福建从来没这个规矩。在左宗棠的强硬态度之下，贾禄之流也就无言可答了。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上疏中说："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在腐朽的封建官场中，左宗棠还算是一个有骨气的人。

闲堂自述

程千帆

一、家世与经历

我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40（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系我曾用诸笔名之一，现在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但上代已迁居长沙。1913 年 9 月 21 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我家境清贫，但数代以来就有文学传统：曾祖父名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我 3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1923 年左右，因军阀混战，在长沙不易谋生，我家迁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家里。在武昌住了五年，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伯父名士经，是大叔祖的长子，以早慧知名，20 岁以前，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他是我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启蒙老师。1928 年秋，我赴南京，考入金陵中学初中三年级，从此接受了 8 年正规的现代教育，1936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避难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就在那里和沈祖棻结婚。1938 年春，辗转回到长沙，在益阳龙洲师范学校教了一个多月书，又因生病离开。其后，为了逃避日寇及糊口，曾流转于武汉、重庆、康定等地，在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中任一小职员，直到 1940 年才重回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担任国文教员，生活稍为安定。可是因种种关系，工作单位仍屡次变迁。1941 年到 1945 年，先后任教于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 年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武汉大学，一直延续了 32 年。

1957年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到1975年才摘掉帽子，而得到彻底改正；摘帽后，我就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1977年，沈祖棻在一次车祸中逝世，又给我一次极大的打击。在划为右派分子的18年中，参加过各种繁重的劳动，承受着难堪的侮辱。这些，我并不怎么在意。所感到惋惜的，乃是在我年富力强，学问稍有基础的时候，工作机会却长期被剥夺了，以致一生成就很少，否则，也许能为祖国和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

1978年夏，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聘请我这已经65岁的街道居民为南京大学教授，从而开始了我新的学术生涯。翌年，和陶芸结婚。在初到南大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夺回失去了的时间。12年来，我带出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著作、编辑、整理了十多部书籍。在还想继续前进的时候，年龄已达77岁，心脏病更使我精力日衰，便在1990年5月退休了。对于没有能全部夺回被浪费了的时间，我始终感到很深的遗憾。

二、学习与师承

我所受的教育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在君硕伯父办的私塾“有恒斋”里专门读古书，后一段是在现代大中学校里研习各种课程。1923年到1928年在武汉，我先后两次随伯父读书约三四年，同学十余人，都是同族兄弟和少数世交。伯父对我们要求很严，虽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少年，但学习的起点很高。他认为当时一般私塾常读的书如《古文观止》等都是俗学，而教我们学习的则是为打好国学基础所必读的一些经典著作。因此我那时就通读了《诗经》、《左传》、《礼记》、《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显然并不可能全然了解）作为正课。此外还泛览了许多书籍，甚至像吕坤的《呻吟语》、陆陇其的《松阳讲义》、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家书》、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之类，也曾认真看过。每天写大小字、作日记，每周作文，也有严格规定。这几年的学习是刻苦而乏味的，同时是有益的。它成功地培养了我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并使我初步接触了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些非常美妙的事物（当然其中也有糟粕）。这对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好处极大。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4年，多方面接触了现代科学。进入金陵大学以后，除以中国文学为专业外，也还读过文学以外的哲学（特别是逻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外历史）以及文科以外的数学、生物学等课程，这种安排不仅使自己的知识更为丰富，思想变得开阔，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进而具有带实证性的理解。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过我教益的几位语文教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

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便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三年级的课时，一个学期就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了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现在张、黄两先生已逝世了，林先生还健在，我祝福他健康长寿。

30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翟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便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50多年过去了，除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商锡永先生还健在外（我同样祝福他健康长寿），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声音笑貌，却一直不可磨灭地留在我这个年近80的白发门生脑中。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确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容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我在几个大学工作期间，也有几位同事是我所极为尊敬而事以师礼的。四川大学的赵少咸（世忠）先生、庞石帚（俊）先生和武汉大学的刘弘度（永济）先生对我教诲、提携、鼓励是多方面的。我有问题请教他们，无不获得详尽的解答；稍微作出了一点成绩，都获得过分的奖饰。他们的指导使我在各方

面都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原有的知识。在同辈中，殷孟伦、徐复、孙望、陈孝章、刘君惠、周勋初诸先生，还有沈祖棻，也都是生平畏友，益我甚多。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受哪个老师的影响最大?"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其长处，而他们的长处我都想学到，虽然事实上，我也明白，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杜甫"转益多师"之说，确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三、学术次第与著述

衡如先生给学生讲授目录学，兼及版本、校勘，事实上即校雠学。他首先强调这门学问作为治学门径的特殊性质和重要意义。我信受奉行，所以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我认真学习过由《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诸家著作，后来并长期讲授这门课程。在这方面，除发表过若干单篇论文外，我和弟子徐有富同志合著了《校雠广义》一书。该书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第一次全面地概述了自西汉刘氏父子创建，历代学者共同发展，至清儒而益臻完备的这门我国独有的自成系统的科学。现在版本、目录两编已经脱稿，余两编在撰写中，希望早日完成出版。

文史兼治，是我国古典学术的优良传统。文和史，源合流分，又始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我的家学和师承使我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贯文史并重。发表的著作虽以文学为多，但这些研究文学的著作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的。当然，我也注意到了，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

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就曾对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两书，下过较大的功夫。对于《史通》，我有《史通笺记》一书问世，对《文史通义》，也曾详注数篇，后为亡友叶瑛教授《文史通义校注》全部收入。对于这两部书的钻研，增强了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识，提高了自己的思辨力。

我在文史兼治方面的另一实践是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了综合研究，比较深入地考述唐代进士在考试之前行卷这一风尚及其与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发展的关系。对于史学来说，这属于科举史的范围，而对于文学来说，则可以归入背景研究吧。友人傅璇琮教授在我出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个小册子之后，写出了非常全面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其成就远远超出了拙著。

因为长期担任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课程，我曾编写过几种讲义，但正式出版的，只有近年与吴新雷教授合作的《两宋文学史》一种。在结构的安排与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它与其他同类作品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显示了我们不

完全同意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那种将文学发展史理解为文体变迁史的简单化说法。因此，在叙述宋代文学时，不但较为详细地写了有关戏剧、话本部分，而且也没有忽略当时的传奇和四六。

我还始终认为，叙述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的文学史与叙述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文学理论史（或批评史）不应当是相互隔绝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同步发展的。研究文学历史的人，不能不将文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来考虑，反之亦然。由于是这样理解问题的，所以我研究、讲授文学史，总是注意那些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我还曾短期讲授过古代文论这门课程，并笺注了十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了一部包括所注《文史通义》数篇在内的名《文论要诠》的书（重印时，改名《文论十笺》）。

在我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在古典诗歌方面花费的时间最久，用力最专。诗本是我的家学，先辈能诗有集的人不少，已见前述。先父穆庵先生，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顾先生的诗集就是先父编印的。先父专攻宋诗，尤精后山。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于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眠之思，可与学诗"。这些过倩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我关于诗方面的著作可分两类：一是评选，二是论述。选本从晋宋以来，便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它标举篇章，评量优劣，指示风尚，区别异同。我因讲授历代诗选、专家诗（主要是杜诗），曾不断地对前代名篇进行选择、评论和注释。已出版的，有《宋诗选》（与亡友缪琨合作）和《古诗今选》（与先室沈氏合作）。此外，为了探讨中国文化对邻邦的影响，曾与亡友孙望教授共撰《日本汉诗选评》一书，以介绍日本历代汉诗作者的高度成就。

上述这三部书对诗篇的选择和评注，表达了我对古典诗歌的某些观点和理解，我对它们的历史认识和审美情趣。但我对诗歌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用论文形式发表的。除了在《两宋文学史》中对宋代诗词作了概略的叙述外，还有《古诗考索》、《程千帆诗论选集》及《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三部论文集。前两书分别有周勋初教授及弟子张伯伟所作后记，《诗世界》专论杜诗，是我与弟子莫砺锋、张宏生合撰的，也有他们写的后记。这些后记对三书内容及使用的方法都有所评述。

大体说来，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

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在过去，人们大都认为：文学事业，应当知能并重。所以，诗论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诗人，而诗人对于诗当然也都有其各自的见解，虽然这些见解没有能全部流传下来。严羽是位有成就的诗论家，他的诗存下来的为数不多，却是很优秀的。伟大的李白和杜甫给后人留下辉煌的诗篇，而他们对于诗歌的精辟见解也是人所共知的，不可忽视的。诗来自感。作诗，必须对外物有其独特的感受；评诗，也要对作品有其独特的感受。单靠理性思维，不但无法作诗，也难以对诗有真知灼见。当然，如果只凭感情，也是无法从事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基于这种感与知在心灵活动中互相依存渗透的不可分性以及文学史上诗论家无一不能创作（当然其成就大有高低）这一事实，我多年的认识和体验是：从研究角度来说，创作实践愈丰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愈加深刻。

正由于此，在我多年来研究诗也为学生讲诗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我的创作。抗日战争以前，和汪铭竹、滕刚、常任侠、孙望等结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可惜这个小小刊物，由于战争爆发而停顿了。其后几年也还在写。40年代起，以教授古典文学为职业，于是又将多年搁笔的古体诗拾了起来。写诗寄托了我的悲欢，也深化了我对古代诗人的理解。十年浩劫。诗稿丢失大半，反复记忆搜集，还存了近200首，现编成《闲堂诗存》一卷，附在《诗世界》之后，自跋说：“才地既弱，格局亦小，过而存之，聊以自道其哀乐，诗云乎哉?”这是实情。但我希望有人知道，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是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但我既做了半个世纪的教书匠，自不免和青年人多所接触，谈过不少问题。陶芸将其中有关如何做学问的一部分辑录下来，出版了一本名为《治学小言》的小册子，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聊供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

程千帆　杨翊强

湖南省城由德润门直上坡子街，商贸四五百户，为省城繁富之区。其间牌记最久者如西协盛、东协盛、劳九芝堂、詹文裕、詹有乾、詹彦文等，远者二百余年，近亦百数十年。到叶公和、余太华以下，百余年、五六十年者尤不可缕述。内而外府、厅、州、县，外而北京、上海、汉口、川、广、闽、浙、两江、云、贵，往来邮信，无不称曰坡子街某号某商，此商场地名断不容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者也。

德润门：即小西门，在湘江东岸坡子街口。旧时水路运输船只多从此处起货上岸，通过坡子街，到黄兴南路（今改步行街）进入市内。

坡子街：西起湘江东岸小西门，东达黄兴南路的一条街。旧时为水陆运输重要通道。街市繁华。

会城：指长沙。长沙为湖南省会。

西协盛、东协盛：药店名。旧时长沙有四大药铺，名曰东协盛、西协盛、南协盛、北协盛。南协盛原址在南正街（即黄兴南路今改步行街）。北协盛在北正街中段，今仍旧名。东协盛在坡子街口，一说在东茅街。西协盛原在坡子街，解放后搬到西长街，改名西长街药店，80年代又改回原名，仍在西长街。

劳九芝堂：药店，今名九芝堂，迁到了黄兴南路。

詹文裕、詹有乾、詹彦文：均为笔墨铺，今已不存。

叶公和：叶德辉家所开酱园店名，今不存。

余太华：旧时长沙最有名的金号。今不存。

两江：指江南和江西。今江苏、安徽两省地，清初为江南省，设江南总督。康熙间分为两省，而江南总督之名不变。后兼辖江西省，改称两江总督。

去年秋间，上将黄兴回湘，一二无知鄙夫，狐媚贡谀，突然改德润门为黄兴门，改坡子街为黄兴街。当时各商号抗不允从，虑者咸以军士退伍之时，恐其别引乱机，迁就寝议。当事遂以白布为地，以棉花染绿，撮成“黄兴街”三

字。世俗讳绿而忌白，不知其义何居？黄兴招摇过市时，目若无睹，然则黄兴不以街名有无为荣辱，断可知矣。

去年：指1912年（民国元年）。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民元］十月二十五日。［黄兴］由上海乘舰经鄂返湘……三十一日返抵长沙。"

迁就寝议：停止议论。这也绝非事实，群众对革命欢迎之不暇，怎会对改名"抗不允从"。

以棉花染绿……世俗讳绿：这句暗骂黄兴是戴绿头巾的乌龟。从汉代起人们即以绿帻（头巾）为贱者之服。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元明时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梁同书《直语补证》引明人《杂俎》："［娼妓］隶于官者为乐户，又为水户。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世俗因称妻有外遇者为戴绿头巾。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八："吴人称人妻有淫行者为绿头巾。"

以白布为地……世俗……忌白：这也是暗骂黄兴的。世俗办丧事用白，故忌白色。说当事者以白布为地，暗示像这样改为黄兴街，不是办喜事而办丧事。文中说"世俗讳绿而忌白，不知其义何居"，实则点醒读者：绿指绿头巾，白指丧事。

考西洋各国，惟美国以总统华盛顿名号其都城。彼盖以其禅让功成，事属创举，后人思其遗爱，永矢勿谖；又以新立之国，本无旧名可凭，因以人名为地名，而究之华盛顿始意不如此也。中国禅让之事，真者尧、舜、禹，伪者新、魏、晋、宋、前后五代，而汉哀帝乃至以断袖之好，欲法尧舜禅董贤，其见于中国列史，本不足奇。即令改称，亦当改之于京城，且当属之第一次之袁世凯氏。黄兴即有临时总统之日，已断无改都城之期，此固可以不盖棺而论定者也。

永矢勿谖（xuān）：永记不忘。《诗·卫·考槃》句。

伪者新、魏、晋、宋、前后五代：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表面上是由四岁的小皇帝孺子婴将帝位让给他的。东汉献帝刘协于220年让位给曹丕，建国号魏。265年魏元帝曹奂传位给司马炎，改号晋。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传位给刘裕，史称刘宋。前后五代：前五代指宋、齐、梁、陈、隋。宋即前述刘宋。公元479年，萧道成取代宋顺帝刘准。建立南齐政权。502年，萧衍取代齐和帝萧宝融，建立梁朝。557年，陈霸先取代梁敬帝萧方智，建立陈朝。581年，杨坚取代北周静帝宇文衍，建立隋朝。后五代指唐以后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公元907年，朱全忠取代唐哀帝李

柷，建国号梁。923年，李存勖（xu）取代后梁末帝朱友贞，建国号唐。936年，石敬瑭取代后唐末帝李从珂，建国号晋。947年，刘知远取代后晋出帝石重贵，建国号汉。951年，郭威取代后汉隐帝刘承祐，建国号周。以上这些朝代的更替，在当时均称作禅让，实际上都是对前一代政权的篡夺，不同于上古尧禅舜、舜禅禹那样真正的禅让，故称之为"伪"。

汉哀帝……断袖之好……董贤：西汉末年皇帝刘欣（哀帝），公元前6至前1年在位。董贤，西汉云阳人，美丽善媚，为哀帝所幸，行卧不离，封高阳侯。年二十二，官至大司马、卫将军。汉哀帝宠爱董贤，同起同卧，形影不离。有一次睡午觉，董贤身子压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要起床，董贤还没醒，哀帝不忍惊动董贤，就剪断衣袖起床。后世因称男宠为断袖之癖。

昔清世祖人关定鼎，师至顺治门，喜其语之吉谶，后遂建号曰顺治。维多利亚，西洋美大之名花也，英主取以为名，是皆一代尊严之君主，犹且以人合物，不闻以物合人。黄兴果为中国伟人，于此等吮痈舐痔之细人，方且唾斥之不暇，何为庞然自大，居之不疑如此耶？况即改名，当援顺治英主之例，呼黄兴为坡子街，不当改坡子街为黄兴，此亦理之易晓者也。

定鼎：夏禹铸九鼎，历商至周，并为传国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后人因沿用为建国定都之称。这里也指清世祖率师入关，奠定了大清王朝的一统局面。

吉谶：吉祥的预兆。

维多利亚：victoeria，睡莲，花作白蔷薇色，象征美好和胜利。英语victory（胜利）一词即由此词根而成。

吮痈舐痔：用嘴吸脓疱，用舌头舔痔疮。指不避污贱以媚悦权贵的卑劣行为。《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汉书·邓通传》："文帝尝病痈，邓通尝为上嗽吮之。"

或曰：古有明妃村、莫愁湖、薛涛井，类皆以人名为地名，似可以相比况。不知此乃绝代佳人，后人致慕致爱，故以当时之产地，慰万古之相思。黄兴须眉丈夫，何乃齿之于巾帼？黄兴而司马懿也，则妇人之饰可以受之，无如其自命为豪杰也，是岂可以妇人女子待之乎？

明妃村：汉元帝刘奭的宫女王昭君，湖北秭归人。后远嫁匈奴。晋时避司马昭讳，改曰明妃，其秭归故里因号明妃村。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莫愁湖：相传六朝梁代有女子卢莫愁，美艳绝伦。梁武帝萧衍有诗曰：

"江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今南京水西门外莫愁湖，相传即其故居所在。

薛涛井：唐时名妓薛涛，字洪度。知音律，工诗词。当时士人韦皋、元稹、白居易、杜牧等皆尝相与唱和。侨寓成都百花潭。家旁有井，水极清冽，人称薛涛井。

黄兴而司马懿也……：诸葛亮出兵伐魏，在五丈原与魏都督司马懿对垒。诸葛亮屡次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就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女人的头巾、衣饰等物以示辱，并修书一封讥刺之，想激怒司马懿出来应战。司马懿忍怒收受了巾帼妇人之饰，还是不应战。此事《晋书》卷一"宣帝（即司马懿）纪"有记载，《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十回有描述。

或曰：今本省之朱张渡、宗伯师臣，一则以宋朱张二子讲学城南而得名，一则以明庄天合故居而立号，又何论于黄兴？不知此陈人也，其人已死，后人追思其迹而称之。黄兴发名于明德学堂，生长于善化金坑，是宜改明德学堂为黄兴学堂，称金坑为黄兴坑，不当扰及坡子街也。

朱张渡：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和他的朋友张栻，曾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朱张渡是因他二人而得名的湘江东岸渡口。据光绪丁丑（1877年）《善化县志》卷二十九载："朱张渡亭，初呼古渡，又曰中渡，又曰灵官渡。乾隆八年（1743年）巡抚阿御史胡巡抚蒋溥捐修，有记。"灵官渡为通过水陆洲到对岸岳麓书院的渡口。后人在其上游建亭，号曰朱张渡。今仍旧名，在北的叫灵官渡，在南的叫朱张渡。

宗伯师臣：四字为纪念明学士庄天合而立的牌坊上所刻的横额文字，在北门，民国初年拆城墙时一并拆除。庄天合，字德合，长沙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侍讲筵，晋官僚。以端谨受知于太子。曾为南畿乡试主考官，又分校会试卷，所拔擢者如左光斗等，皆有名于时。后官至少詹事，卒赠礼部侍郎，有《庄学士集》8卷行世。光绪丁丑《善化县志》卷二十九年载："明学士庄天合墓，在八都新开铺石人冲。"

明德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的一所学校。创办人胡之俊，字子靖，以字行。黄兴于1903—1904年在明德学堂教体育、博物，兼速成师范班主任。辛亥革命后明德学堂改明德中学，解放后改为三中，80年代末又改回明德中学原名。

善化金坑：善化，旧县名，宋置。明属湖南省长沙府。清与长沙县并为长沙府治。民国废，并入长沙。金坑：黄兴"先世乃中原望族，绵延繁衍，扩展至江西等省，均以耕读传家。至明末，海内多乱，先祖金铿公昆仲三人，景慕

湘儒周敦颐濂溪先生昌明理学遗风，因由赣迁湘，卜居长沙府皇仓街。其后户口增繁，乃分居善化（今长沙）县凉塘"（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第1页）。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十六日（1874年10月25日）黄兴诞生于凉塘。长沙黄姓聚族而居，共分四支，皆冠以地名。曰丁垅黄、捲石黄、河图黄、经铿黄。经铿在今长沙县双起乡。光绪年间，黄姓建石桥于该乡的金坑河上，树碑曰："黄氏经铿桥"，俗称"金坑桥"。桥旁有屋，亦名"金坑桥"。

或曰：今俗地名如鸡公坡、鸭婆桥、马王街、牛角巷、螃蟹井之属，或为禽，或为兽，或为水族，皆可以为地名，黄兴名街何为不可？然考鸡公鸭婆之名所由起，乃当时祝鸡放鸭者相聚而居，故相沿以物名之，马王则营中所祀之马祖，牛角螃蟹则像其形。黄兴人也，胡为以毛羽虫介之族相拟乎？

鸡公坡：长沙旧地名，在黄兴南路大古道巷内，只一小段，下接县正街，今已不存。得名由来并非如叶文所说是养鸡者相聚而居，而是有一个神话传说：古时候，有一位仙人利用一个老太婆富养成多年的大公鸡，飞到天上去啄食了要来残害生灵的蜈蚣精。

鸭婆桥：长沙旧地名，原址未知在何处。郊区马王堆汉墓遗址西边有地名曰鸭婆墩，不知与文中鸭婆桥是一是二。

马王街：在黄兴南路以东，建湘南路之西，南北走向。马王应当是指五代十国时楚国开国君主马殷。马殷当时据有湖南全省及广西东部之地。后梁太祖朱全忠立，马殷遣使修贡，受封为楚王。长沙有马王宫、马王堆、马王街等遗迹。叶文说马王指"营中所祀之马祖"，按马祖是马神名。《周礼·夏官》："校人掌马王之政……春祭马祖。"叶文以马祖释马王，又并之于鸡、鸭、牛、螃蟹等禽兽类，是为了狎侮黄兴。

牛角巷：在浏城桥下复兴街中段。

螃蟹井：在城北清水塘。

祝鸡：呼鸡。"祝祝"，呼鸡声，本作"喌（zhōu）喌"（见《说文解字》□□（xuān）部），亦作"朱朱"。

或曰：黄兴之不可名街，既得闻其说矣，德润门名黄兴门可乎？曰，此境外事，余不得知。然余苏人也，苏州有胥门焉。考之载籍，为伍子胥伏属镂以死，后人哀之而名其城门，然则不祥甚矣！黄兴年方强仕，富贵熏蒸，善颂善祷者，固当急去之以祝其长年，而乃不谙典故如此，余何问焉！或去，因并余说记之，是为光复坡子街地名记。

境外事：指德润门在长沙市外。

载籍：犹言书籍。书是用来记载事实的，故云。

属镂：剑名。吴王夫差拒子胥之谏，使赐之属镂以死。以剑自刎叫伏剑，“伏属镂”即以属镂剑自刎。

强仕：40岁。《礼记·曲礼》：“四十曰强，而仕。”古人认为人到40岁，身体强健，志气坚定，一切成熟，可以出来做官了。后因谓40岁为强仕之年。黄兴回湘这年是38岁。

富贵熏蒸：熏，火烟上出。蒸，气上出貌。这明说黄兴的富贵荣华正如火之上升，气之蒸腾。即蒸蒸日上，前程无量之意，但语中暗含讥刺，和下文称“善颂善祷者”的用意一样。

后记

叶德辉，江苏吴县人，清末进士，做过吏部主事等官，后定居长沙。其人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特别是版本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乏卓见。但政治上始终反对晚清以来的革命举措。戊戌政变时，是维新派谭嗣同的对头。辛亥革命，他痛恨革命党。他在长沙置房产，并店铺，收藏图书字画古玩，以尊孔为名把持学宫财产。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他在湖南办筹安会，自任会长，称臣劝进。张勋搞复辟，他也通电捧场。1927年，湖南工农运动高涨，叶德辉反对不遗余力。他曾做了一副对联，文云：

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额：斌尖卡傀。

此联首嵌“农运”二字，咒骂农协会会员是杂种、畜生。横额意为“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非人非鬼”。他对农运的仇恨之深，可见一斑。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打击破坏活动，决定镇压，密令省农协派队拘捕，交特别法庭公审。1927年4月10日夜，农民自卫军在坡子街叶的一个姘妇家将其抓获。次日10时，在教育会坪召开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动分子示威大会，到会省、市、县、郊各党派团体代表及群众十万余人，由省特别法庭公审叶德辉。当宣布其罪状后，省特别法庭判处叶德辉死刑。

《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是叶德辉1913年写的一篇文章，借坡子街改名为由，对民国元勋黄兴施行攻讦。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25日，黄兴由上海乘舰经鄂返湘，31日返长沙。当时长沙市民万人空巷，争欲一睹这位开国元勋的丰采。都督谭延闿亲率各界代表到江岸迎候，不下七八万人。湖南各界为纪念黄兴开国勋绩，特改德润门为黄兴门，坡子街为黄兴街。

下午1时30分，舰船抵岸，舢板鸣礼炮21响，谭延闿等登船迎接，上岸时群众欢呼，在教育会坪召开盛大隆重的欢迎大会。

当时是辛亥革命后的头一年，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领导下，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气象更新，人心振奋。黄兴在开国元年回到故乡长沙，长沙人民景仰开国元勋，欢庆革命胜利，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却触怒了叶德辉。他于次年即写了这篇文章，对黄兴侮蔑戏弄。

首段叙述德润门、坡子街及其诸多商号的历史源流及当前繁富情况，声言几百年的老街老名，“断不容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者也”，这就给文章定下了基调。

接下来说去年黄兴回湘时，“突然改德润门为黄兴门，改坡子街为黄兴街”，把出于敬仰之情而改街名的人民群众诬为“无知鄙夫，狐媚贡谀”者流，并造谣说什么“以白布为地，以棉花染绿，撮成黄兴街三字”。他惟恐别人不知其真意，明知故问地说：“世俗讳绿而忌白，不知其义何居。”

下文笔锋一转，中外举例：美国有华盛顿是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也有真禅让、假禅让之别。他的潜台词是：你黄兴一不是皇帝，二不是总统，又不在你手里改朝换代，有何资格改地名为己名！

叶氏又说即令改名也当“以人合物，不闻以物全人”。他举中国的顺治皇帝和英王维多利亚为例，说他们以一代尊严之君主，犹且如此，你黄兴要改，也只应把自己改名“坡子街”。此语可谓戏弄至极。

以上是文章的前半部。后半部仿古代赋体论难的方式，设为四个“或曰”。一则把黄兴贬为被人玩弄的“妇人女子”，还抬出诸葛亮以妇人之饰戏侮司马懿的历史故事来类比。“黄兴须眉丈夫”、“黄兴而司马懿也”这类语句，其讽刺挖苦之意何等明显！二则把黄兴比做鸡鸭马牛螃蟹等“毛羽虫介之族”。在解释这些地名时，他明明知道“马王街”的“马王”是指五代十国时楚国开国君主马殷，史称马殷为人谨厚，在位时卖茶铸钱，国称富饶。叶德辉却硬说“马王则营中所祀之马祖”。马祖虽然是神，毕竟还是马。《周礼·夏官·校人》的疏文说：“马与人异，无先祖可寻……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叶氏便以之连同鸡鸭牛螃蟹等来比拟黄兴。“黄兴人也……”这个设问句的本意就是说黄兴不是人，是“毛羽虫介之族”。14年以后，他撰写反动对联骂农协会员为杂种，为畜生，和这是一脉相承的。最后更以“德润门名黄兴门可乎”这一设问句作结，说改城门只有伍子胥被吴王赐死后苏州有胥门之设，并惊呼“不祥甚矣！”说明他对黄兴痛恨到了极点，恶之欲其死！这个结尾还和文章开头“以白布为地”影射改名是办丧事那段文字相照应，有起有结，以死起以死结，叶德辉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他对民国元勋黄兴的仇恨。

其实，就在黄兴返湘后不久，即于11月20日“致函谭延闿辞谢将长沙小

西门坡子街改称先生名号”（《黄克强先生年谱》），可是叶德辉到了第二年还是写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一文，并广为散发。

此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史料之一种。程千帆保存有叶当时沿街散发的原件，现已捐赠湖南省图书馆。时隔80余年，见此文者已不多。例如杜迈之、张承宗两位先生所著《叶德辉评传》第30页，即将这篇明明白白的散文误称为“骈体文章”，并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误称为《坡子街光复记》，可见他们只是听说，而未亲见此文，所以其所云“对黄兴肆意诽谤”，也就是想当然的片面之词，似乎没有对史料审查及运用采取负责的态度。

叶德辉其人其事

颜震潮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晚号郎园。在我们湖南地区20世纪初的历史上，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祖籍江苏吴县，因其先人在湘经商起家，遂寄籍我省湘潭，后移居长沙。家固富有，且多藏书。叶氏本人系前清光绪壬辰（1892）进士，以殿试二甲官吏部主事，不久即乞假归。大半生过着他的遗老、寓公、名士生活。其间曾寓居其原籍苏州有年。在金阊门外赁屋十余间以贮存他所收藏的古玩、名画、碑帖以及世间稀有的秘籍珍本。日对名姬美酒，著书啸傲其间。其为学一宗许郑，精通文字学和目录学。于经学训诂奥蕴，尤多发挥。对于金石、碑版、占卜星命诸杂家之学，也皆有其独特造诣。闻其每次外出时，经常将《说文解字》及《四库书目提要》二书带在身边。尝言“为学之道，非识字无以通经；非通经无以治群言之庞杂，使归于纯正。顾非兼览博涉，又无以穷经之流派”云云。其生平著述甚多，当不下数百种。自刊有《郎园丛书》。诗词为其余事。但由于他的阅历丰富，学力深厚，故于诗艺方面，仍时有佳构传诵士林。只是伤时感旧之作居多。如七律《寄怀松畸柔甫长沙》二首之一云：

湖上分襟又一年，
井闾犹未息烽烟。
传闻环海争秦鹿，
独向空山听杜鹃。
退笔好寻刘蜕宅，
投诗曾吊屈平渊。
澧兰沅芷全消歇，
新长萑蒲绿满天。

又如《壬戌元日》云：（按壬戌为1922年）

十年改步再逢壬，

但觉乾坤浩劫深。
故国觚棱天上梦，
私家函史井中心。
魅多岂畏桃符禁，
客至聊将桂醑斟。
但愿南天烽燧尽，
此生安隐老山林。

又如《日本盐谷节山温道经上海回国寄怀松崎鹤雄》云：

我是前朝未死人，
道穷无怨只伤麟。
喜闻槎客尝通汉，
那有桃源可避秦？
去国可随朱舜水，
结园初访有巢民。
海滨气候应相似，
禾黍离离正早春。

从以上这些录存的诗作中，不难看出叶氏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坚持他的清朝遗老立场，对当时现实是颇为不满的，终因此而招来了杀身大祸，1927年被当时省农民协会拘杀于长沙。对于他的死，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当时文坛上，曾一度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如当时著名报人、掌故家郑逸梅（1894—1992）在上海《海天》报刊上，即曾撰文推尊叶氏为“湘中一代大儒”，惋惜他“死于非命”。我省著名诗人、湖大教授刘天隐翁同时亦写有吊叶一诗云：

招尤乱世头皮险，
免祸危邦口颊难。
君本文坛挝鼓手，
疏狂宜作正平看。

正平即三国时祢衡的别号，因“气刚傲物”而被曹操遣送黄祖，终被黄祖杀害。刘诗后面还附有一注：吏部（指叶）有鹦鹉洲吊祢衡诗云：“乱世才人刀俎物，不因挝鼓误平生。”谈者以为诗谶云。

当然，所有以上这些悼唁叶氏的诗文评价是否恰如其分，还有待史学专家的深入探讨，暂时可以不论。但仅就叶氏所遗留的众多著作来看，其中却仍有

很多是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掘的珍贵资料。如他的《双梅景丛书》，就是经过他十多年辛勤钻研，并冲破了与他同时代的一班所谓卫道者们的纷纷责难，顶着“名教罪人”的谩骂声而完成的一部有关我国古代性医学的巨著。据考证这部书系叶氏根据10世纪日本一著名汉医学家丹皮康赖所著《医心方》一书中的第二十八卷所引用我国早已失传的《素女秘道经》、《素女方》《彭祖养性》、《序房内秘术》、《玉房秘要》、《养生集要》等几部我国古代性医学古籍的残留片断，使其恢复原貌。同时并增加了在《唐书·艺文志》中曾提到的《洞玄子》一书的内容。使这部书不仅广泛涉及性的宇宙意义和对人类健康的密切关系，而且对一些有关性知识的传授以及如何实施胎教、优生等秘方秘法，均无不有较为详尽的阐述和记载。真可谓是我国近世纪开始研究古代性医学而取得巨大成果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由于时间的推移，有关叶氏这一巨大贡献，或已鲜为人知。为了不因人废言而使其湮没无闻，特摭述于此，以备有关史学家的拾遗与参考。并愿就正于有关专家学者。

张学良与文明书院

谭金刚

文章千古事；明德万年馨。

这是原文明书院大门的一幅嵌字联。张学良将军当年被囚禁在这座书院时，特别欣赏这副对联。

文明书院坐落在湖南省永兴县油市乡京广铁路和107国道旁，是清嘉庆十年（1814年）当地名士陈肇溢、刘映龙两人捐款修建的，光绪年间改为民立文明小学堂，今为油市中学校址。抗日战争期间，张学良将军曾在这里度过一段囚禁生活，给这座普通书院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从此这座书院便更有名气。

西安事变后，由于日寇节节进逼，张将军被国民党辗转监送到各地监禁。1937年10月，张学良被押送到郴州苏仙岭的“苏仙庙”中监禁，1938年清明前后的一天，张学良到苏仙岭下的郴县县城一家浴室去洗盆浴，在街上突然遇到他的一个部下（炮兵中校）给他行军礼，张学良感到突然，负责监视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见此情况，也非常震惊，立即电告重庆蒋介石，惟恐那个炮兵中校知道张学良的住处，会发生意外，于是采取紧急行动，把张学良移禁到离郴州30公里的永兴县油榨墟文明书院。这座书院坐落在永兴、耒阳、郴县三县公路交叉处，有十几间房子，成井字形架构，背靠青山，面临小河，环境清幽美丽。

随员实际上是戴笠派来监视张将军的特务负责人刘乙光（后提为国民党少将），因他是永兴县高亭乡人，熟悉永兴的情况。事前他曾来书院看过房子，当时适值书院放清明假，经与书院负责人协商，让学生搬到书院附近的曲江村上课。张将军来书院有一百余名宪兵和便衣警察护送，戒备森严。书院周围都有人站岗，就连距离书院十数里的高亭司汽车站和郴县栖凤渡汽车站都派了岗哨。

清明节前后的又一天近午时分，一队车辆驶到书院门前，从一辆小车中走出一位身材魁梧，身着西装，外披大衣的人，接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簇拥着

他进入书院大门。同来的两部小车，一部停在当地农民彭华明家门口，一部停在刘良重家门口。停在彭华明家门口的那部小车就是刘乙光所称“张大老板”的。

张学良将军过软禁生活已经两年多了，这次又突然被转移到文明书院，自然是感到闷闷不乐。他来到书院后，除了经常在住房中度日外，有时站在书院的文峰塔前不时欣赏那副耐人寻味的对联：

文章有骨方为贵，
人品无求始算高。

张将军为解心头烦恼，有时还到文峰塔下的小河边钓鱼。这小河中有质好味鲜的鳜鱼、鲤鱼。他学着老百姓的钓鱼方法，用泥鳅鱼做钓饵，每次都能钓上一二斤，及至返回路过村庄时，就把所钓的鱼全部送给贫苦农民。有一次，可能是因心境不佳，他把钓竿伸向堤下的河中，由于钓饵太轻，水流又急，钓饵总是沉不下去，他便摘下手指上的金戒指套在诱饵上，钓饵终于沉下去了，但钓丝又被急水冲下的茅柴缠住扯断了。刘乙光看见他回来，忙上前问道：“张将军，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出了什么事？”张学良沉默不语，刘乙光紧跟在后不断询问，张将军便把钓鱼失落金戒指的事说了，刘乙光半解释半责备地说：“姜太公稳坐钓鱼台，是在平缓的水流中钓鱼，可你是在急水滩上钓鱼，真是太性急了。”张将军一听，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怒火，大声地对刘乙光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你们竟用几十个人，十来部车伴随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人和车开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呢！难道你就不性急吗？”刘乙光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尴尬地走了。

张将军对人挺和气，也很体贴老百姓，他与驻地居民关系也十分融洽。当地老百姓经常把鳅鱼、黄鳝、新鲜蔬菜送到书院，张将军总要大师傅加价收买，小小一扎豆芽就给五毛钱。

张将军一行在文明书院住了不到一个月，便又经衡阳转到沅陵凤凰山去了。

章士钊填词赞拉琴

唐泽明

1941年，我就读于周南女中。这年暑假，同窗好友蒋荣美邀我到桂林她家度假。

到蒋家后，我见到一位长者。蒋伯母介绍说："这是章老伯。"章老伯满头银丝，面目清秀，谈吐文雅，行止庄重，令人肃然起敬。他老说的是地道的长沙东乡话，更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章老伯虽客居桂林蒋家，但所带的书籍有几十种，全是线装书。他老嗜书如命，我只见他不停地翻阅书籍，手不释卷，如痴如醉。他看书时口里念念有词，且随看随放，所以床头、桌上、椅上、茶几上，甚至花钵上，满是书籍。我和好友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遵照章老伯的吩咐整理书籍，按朝代先后上架，便于查找翻阅。那时，桂林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士前来求教者络绎不绝，其中青年居多。他对每位客人都待之以礼，坦诚随和，娓娓而谈，求教者总是满意地离去。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不知道章士钊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从未向他请教过，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悔之晚矣。

章老伯的夫人会唱京戏，她听说我会拉京胡，便特地来找我："唐小姐，听说您京胡拉得好，能给我伴奏吗?"她说的是一口纯正的京腔。我简直受宠若惊，忙说："哎呀，我只是拉着玩玩，恐怕配不上您!"她浅浅一笑，说："来，试试看。"我于是调弦，拉了一段四平调。章夫人拍手叫道："哟，挺够味儿的嘛！我这就唱了——"章夫人学梅派，对梅兰芳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嗓音圆润，唱起来还真有梅派端庄典雅、优美俊秀的风韵。从此，每天下午，好友全家和章老伯都坐在客厅里，听我伴奏章夫人的京剧清唱。其时，章老伯总是眯缝着眼睛，手指熟练地敲着节拍，不时地点着头，忘乎所以。客厅宽敞，共鸣度高，唱腔和琴声格外清脆悦耳：

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哇）玉兔又东升。

唱腔婉转哀怨，如泣如诉。一曲《贵妃醉酒》，使大家都陶醉了。

后来我发现，章夫人的记性不大好，演唱中常常忘词。而那些唱词我却背得出，因此总是由我来给她提词。章夫人有次对我说，她想学荀（慧生）派唱腔，特别想学荀派著名唱段《钗头凤》（系陆游所填《钗头凤》词），但一直没有找到人教。说来也巧，我也喜欢荀派，而且对这段唱腔滚瓜烂熟，便一句句地教她。她的悟性极好，一教就会，很快就唱出了荀派低回婉转、秀俏妩媚的味儿。于是，客厅里不时有新腔出现，章老伯更是又得意，又高兴。

一转眼，暑假快要结束了。章老伯提议照相留念。我便和蒋家、章老伯一家都合了影。章夫人把我看成她的忘年知音，特地邀我一同合影。

有一天，章老伯叫我去，拿出一张条幅，说："你的京胡拉得好，我送你一首词。"我喜出望外，忙将条幅展开，是一首字迹俊秀潇洒的《临江仙》：

凤拨翘翘依左肘，鲲弦右手匀抛。频低慧眼看檀槽，朱唇如欲动，罗袜又轻摇。　　绣幕飞声莺燕静，全殊江上嘈嘈。闻歌车到不回朝，闺房深处闹，场屋定来娇。

临江仙咏拉胡琴

泽明女士清赏　辛巳秋　孤桐章士钊

我拉琴时喜欢注视运弓，同时，轻声地跟着唱，脚也不停地打拍子。我这个习惯被章老伯抓住了，这就是词中的"频低慧眼看檀槽，朱唇如欲动，罗袜又轻摇"。记得我将这首词带回学校，同学们见了，无不惊叹："哎呀呀，写你拉琴硬是死火（'死火'，长沙话，'绝了'之意）。"词的下片是对我拉琴艺术的夸奖，我明知是过奖，但仍然受到莫大的鼓舞。当我接到条幅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便向章老伯深深地鞠了一躬。章老伯连连点头答礼，满面笑容，眼里闪着惊异、赞许的光，问我："你一个十几岁的妹子，何理晓得那么多戏?胡琴的过门那么长，你是怎么记住的?"我告诉他："我是个京戏迷，但是嗓子不好，课余就练拉京胡，跟着留声机上的唱片学。有的过门很长就用谱子记下来，天天听，天天练，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也就记住了。"章老伯满意地点点头，可仍然惊异地感叹着。临别前，他送我一本他客居桂林时写的诗词集，指着其中一首《钗头凤》对我说："这首词，也是写你的。"可惜那本诗集早在抗日战争逃难时丢失了。那首词也忘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两句："风流女，殷勤谱。"写的就是我记谱练琴的事。

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章老伯给我写的条幅历经战乱沧桑，我一直珍藏着。每当我看到它，仿佛看到章老伯满面笑容，眼里闪着惊异、赞许的光……

彭德怀湘潭农村调查纪实

龙正才

1961年，全党响应毛泽东关于希望1961年成为全党调查研究之年，实事求是之年的号召，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征战一生的彭德怀也实在过不惯在吴家花园的那种隐居生活，他说："我不能老呆着，我还得工作！我不能脱离实际只读书本！"因此，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做调查研究。请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明年春天再去太行一带"。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11月1日，彭德怀高高兴兴地和中央办公厅临时派出的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等来到了湖南。

1961年，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折腾后开始全面调整的第一年。虽然党中央从1960年下半年起已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纠正大跃进以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影响，但国民经济尚未恢复，人民生活仍然比较困难。他惦记着乡亲，挂念着农民的冷暖，在长沙与湘潭及省、地、县委领导作过简短交谈后，便急匆匆地赶回了乌石寨。

"彭德怀又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不一会儿，彭家的堂屋里、地坪里都站满了人。尽管彭德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但他们却不管这些，仍然把彭德怀视为革命元戎、故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还是用出自肺腑的热诚，像三年前那样迎接着他。男女老幼，喜笑颜开，有叫伯伯的，叫舅舅的，叫阿公的，也有叫彭元帅、彭部长、彭副总理的。

彭德怀心情十分激动，多么淳朴、可爱的人民啊！他满面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打着招呼。他对乡亲们说："以后你们不要喊我彭部长了，我犯了错误，不是部长了，我回来就是乌石人民公社的社员，生产队也要安排我出工。"

尽管保密，但彭德怀重返故里的消息还是很快传开了。从第二天开始，附近的大队、公社的群众来访，紧接着，邻近的湘乡、株洲、宁乡、长沙、湘阴等地的干部、工人、教师、农民也络绎而来，平均每天要接待100余人，以至

离彭家围子20多里地的石潭镇上的旅店住满了人。他们还是把彭德怀当成自己忠实的代言人，长途跋涉来找他倾诉自己的苦难和要求。有的冒雨而来，满脚泥水，身上透湿，久坐交谈，舍不得走。

关于当时的场面，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

那次，彭总的调查遇到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就在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的时候，便听到外头人声嘈杂，原来是群众听说彭总回来了，都要来看他。执勤的干部不让群众进屋，说要请示。老百姓才不听这一套，自己闯进来了。头批还没走，后头的又挤上来了。彭总只好来到屋外禾场上同乡亲们谈话。群众围着他，七嘴八舌的，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一整天，彭总没有坐过。我给他端了一条板凳去，却怎么也不能叫他停下来落座。有个白发老人，一边往禾场上走来一边喊："德怀，德怀，你回来了！你在哪里？"他见了还不算，还要摸摸他。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对群众说："乡亲们！大家歇会儿，让彭总把饭吃了再说话吧！"乡亲们听懂了，说："让他吃，让他吃，我们等他吃了再说话。"

彭总回到屋里，坐在桌边，哪里吃得进去，彭总问他的侄儿："他们吃饭了吗？"侄儿答道："好多人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的，半夜就起身了，哪里吃饭？可是这么多人，我们家也招待不起呀！"

彭总为难了。他想了一阵，向地委的一个同志提出，能不能帮助买一点粮食，让他招待远地来的乡亲吃一顿饭。

这天下午，从远地来的一部分留下吃了一顿饭，用了100多斤米。第二天、第三天，来看他的人更多了。几天吃米500斤。后来，饭是招待不起了，但人群还是不断地涌来，有许多人是几百里外的其他各县赶来的。彭总只好同意派人到半路上去劝阻。可是劝阻不住，有的还吵了起来。

人们都知道彭德怀1958年回家过后，为老百姓说了话，所以"犯了错误"，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和同情。尤其是那些1958年无所顾忌地向他反映了"大跃进"中许多问题的那些儿时伙伴，更是深感歉疚。一位人称"胡四老倌"的老人，眼泪汪汪地拽着彭德怀的青布袄说："都怪我们前年不该和你说那些话，把你给连累了，对不住你啊！"彭德怀安慰这位当年最要好的伙伴胡月恒说："你们讲真话冇（没）得错！只要群众生活好，我犯错误不要紧。"

彭家围子堂屋里天天坐满了人，彭德怀一张口说话，大家就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听，有时，彭德怀打趣地说："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们不怕我放毒吗？"憨厚的人们报以信任的笑声："我们不怕，我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有一顶烂草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倾心交谈。有的干部因在过去顶"五风"挨了斗

争，有的社员在刮“五风”时挨过某些干部的打骂，有的社员被拆了房，砸了锅，至今无房安排，无锅煮饭，都来向彭德怀诉说，都请彭德怀做主。彭德怀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啊，那时‘五风’刮得太大，谁能顶得住呢?”他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了笑说：“我想出来顶一下都冇顶得住哩!”善良忠厚的人们还把从1958年至1960年各生产队粮食产量、口粮分配实情，都一五一十地讲给彭德怀听。

一天，旗头大队一个老倌子来问彭德怀：“‘五风’中我的屋也拆了，办公共食堂饿得要死，我多久就要找你老人家，我就要问一下：中央的政策农村里搞得咯样子，到底是中央要咯样做的，还是底下搞的咯家伙?”彭德怀说：“是走了些弯路啊，现在颁布了《六十条》，就按《六十条》办了。”

在彭德怀回乡的第六天，彭家围子来了4个妇女，她们是湘潭县碧泉公社新开大队红星生产队的社员。她们结伴而来，是要向彭德怀反映口粮情况。她们说生产队原定基本口粮是300斤，现在因为减产，只给148斤，从8月10日至11月初已吃去75斤，剩下的要到明年2月份才发给。4个女人愁苦着脸说：“彭元帅，你看看么，这会饿死人去!”

彭德怀让秘书金石马上去查访，那里确有10%～20%的人家已经接不上顿。

夜里，来人散尽，屋里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彭德怀一会坐下，一会站起。回乡几天来，他一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这时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咆哮起来：

“北京尽听这样好，那样好，有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不下来听听!”

“现在有人吃不上饭啦，我们对得住群众吗?”

“有人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回去要报告中央，我不怕!”

彭德怀那天晚上大发雷霆，给秘书金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还说，那是他随彭德怀回乡调查中“唯一一次看到彭老总大发脾气”，“一次好大的火”。

从11月3日下午到15日，彭德怀除了有一天到乌石大队部听取汇报，和大队干部谈贯彻《六十条》搞好退赔问题，了解农村征购任务，并到乌石水库参观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在家里接待来访群众。据秘书金石当时的统计，来访者累计约2000人次。彭德怀细心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农村的情况，但来访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他只好离开彭家围子外出调查。

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而去。有一天，湘乡县的七八个社员，步行几十里来到彭家围子，要见彭德怀，而彭德怀那天到骑头大队调查去了。他们硬是追到骑头大队，把想说的话对彭德怀说了才回家。

从11月15日到12月9日，彭德怀到过石潭区委和乌石公社、黄荆坪公社、景泉公社、石潭镇、严冲公社了解情况或参加有关会议，听取汇报，并深入乌石公社的乌石大队、骑头大队、金星大队、狮仑大队、新坪大队、景泉公社的珍珠大队进行调查，亲自在乌石大队的为民、胡家冲、红旗、大湾、凤露、子坪等6个生产队召开了座谈会。他详细向基层干部和群众了解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也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他看到当时仍有不少干部热衷于阶级斗争，对为什么要着力发展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不足，大声疾呼：“现在该是清醒地认识必须认真地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他要干部们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说：“斯大林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改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讲得多好哇!”

他反复同干部们讲，搞社会主义经济，就要讲计划，讲价值法则。他看到金星大队办的集体猪场，不讲弄钱，不搞自负盈亏时，说：“不搞经济核算，倒要赔本增加社员负担，那有么子搞场?”

他认为农村的生产方针应该是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开展多种经营，以粮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对大炼钢铁时乱砍乱伐造成对森林的破坏很不满意，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指着光秃秃的山头对大家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被破坏了。我过去到沿湘河、梅林巷一带打脚车子过身，两边丛林茂密，晒不到太阳，如今光了，真可惜!”他说，要下决心抓林业生产，湘潭有广阔的山地，可大量种植油桐、油茶、核桃等经济林和用材林，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改造自然环境，改变生产条件。他买回一些果树苗，分送给乡亲们，在自家坪里也栽了几棵。他还带领侄儿与警卫参谋垦荒造田，给基层干部做思想工作，召开手艺工人座谈会，到附近的黄荆坪墟场调查。

一天，他去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了解情况。这个大队党支部班子比较强，生产抓得好，他很高兴，表扬了这个大队的干部。下午，又步行到狮仑大队调查，这是个有名的三类队。他走了三个生产队，没看到一个出工的。到几家人家里坐坐，得知几个队都口粮不足。他严肃地批评了这个大队的干部：“解放十几年了，群众连肚子都没法吃饱，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做什么?!”

晚上，他睡不着觉，顶着寒风在坪里踱来踱去。侄儿彭鹏要他莫在外面吹风，快进屋去。彭德怀将他在狮仑大队看到的情况同他说了。彭鹏想安慰他，便说：“伯伯，我们这里还好一点哩！听说响塘那边遭受‘五风’的破坏还要严重，损失更大，有的公社群众生活比我们更苦。”彭鹏这一说，彭德怀又产

生了要到响塘那边去看看的念头。他戴着老花眼镜，抓紧时间，将自己查访到的情况，在彭家围子的煤油灯下，写成了《乌石公社乌石大队的调查材料》、《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今年全面增产》、《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新坪、乌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的情况》等四个调查报告。他把这些调查报告和给中央办公厅的信交给在县里当干部的侄儿彭鹏看，征求他的意见。彭鹏心想，伯伯这次回乡，一言一行都有人注意，逐级上报，在这种情况下，还写什么报告啰？但又不好明讲，装作淡然地说："伯伯，那都是一般情况，不要向中央报告了吧！"彭德怀回答说："情况是一般情况。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把情况反映上去，叫党中央、毛主席参考参考也好嘛！"

"我是明人不做暗事，有话就要说！"彭德怀将信拿过来，在后面加了八个字："如有错误，归我负责！"

彭德怀完成在老家乌石的调查以后，又于12月12日来到湘潭县响塘区作了半个月的调查。

12月中旬的湖南，寒风刺骨，小雨连绵。彭德怀不顾年事已高，顶风冒雨，脚踩烂泥，先后两次到黄龙大队、三次到鹤岭大队、三次到陈蒲大队调查。步行走访考察了八个生产队，上门访问了二十多户社员。到了生产生活比较好的、中间的和差的三个生产队的农户家里了解情况。

一天上午，彭德怀再次来到鹤岭大队，在瓦子生产队，他走进漆匠萧十聋子家，见他一家老少七口，挤住在一间大瓦房内，忙问："你家怎么住得这么紧？"萧漆匠回答："就是搞'五风'那阵，把我家的房子拆得冇一点。搞得现在房子冇得住，饭也冇得吃。"彭德怀问他有没有向上级反映情况。萧说："情况反映过多次，横竖冇得答复。"彭德怀安慰了老人几句，心情沉重地告别了萧家，又去看望了另外几家社员。后来，他对大队干部说："'五风'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的损失根本不是用金钱能赔偿得了的，就是能退赔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退赔得清。我在黄龙大队调查，这个大队因平调应退赔社员20379.4元，只退赔了4247.27元；共拆掉房屋214间，更是一时建不起来的。我们当干部的，一是要认真吸取教训，二是要诚恳地向群众讲清楚，求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搞好党和群众的关系。要关心群众吃的、住的，麻雀子也有只竹筒眼啊！"

在陈蒲大队调查时，他走进白泥冲一户社员家里，见他们正在准备午饭，就直朝他家的厨房走去。揭开锅盖一看，只见锅里是用细糠拌蔬菜和野菜煮成的一锅糊糊。女主人请彭德怀尝尝。彭德怀尝了一下，紧锁着眉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一阵才叫同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也尝一口。景希珍回北京后说："那东西真吃不下去。"彭德怀见还有人在吃糠咽菜，心像刀捅了一样疼痛难受。后来，他批评当地干部："你们能睡得着吗？我是三晚冇睡得着觉。"他又说："那位大嫂要我试糠粑粑，我心里明白，她是认为我吃得好，她吃得差。要我也试试糠粑粑是什么滋味。""我也在中央工作，也有责任。这次下来，才晓得你们只吃咯点米一天。下乡40来天，才真正掌握了农村实际情况。"

根据调查到的情况，彭德怀又写了篇关于陈蒲大队严重减产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

陈蒲大队严重减产，社员生活极端困难的严峻现状，引发着忧国忧民的彭德怀不尽的思考，深入、细致调查得来的一串串数字，时时在他脑海中翻腾。他深切感到党对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还没有很好落实，尤其是粮食征购政策没有得到正确执行。

他反复对社、队干部说："征粮要绝对固定。购粮也要相对固定，有丰收年，也有歉收年，丰收年成适当提高点，减产年成酌情减少点。要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你们口里喊不购过头粮，实际上都购了过头粮。"

他还认为，粮食征购政策不能得到正确贯彻，有下面的问题，也有上面的问题，首先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督促下面正确执行政策。如果政策制定了，又不严肃认真执行，就等于言而无信，会损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长此下去，党就会失掉民心。他想起在乌石时，一位老人对他讲的话："老彭啊，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我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毛主席知道吗？"彭德怀曾安慰那位老人："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情况，我要给毛主席报告的。"彭德怀决定再起草一个报告，向中央反映情况。

但在这时，彭德怀由于连日在外调查，工作劳累，加上湖南冬天恶劣的气候，外感风寒，发烧、咳嗽、病倒了。随行工作人员请他卧床休息，不让他再出门。但他哪里肯休息？不是爬起床来看文件，就是整理调查记录。招待所服务员小朱给他端去药水，见他还在工作，劝他好好休息。彭德怀笑呵呵地说："我没出去，就是休息。"

他请戴鼎代为起草这个报告。因秘书金石去参加地方的一些会议，彭德怀请湘潭县委派一个干部帮助他完成在响塘区的这段调查。县委即选派了县委办公室干部戴鼎前往陪同。彭德怀把戴鼎叫到身边，说："戴鼎同志，请你写篇文章，我要拿回去与粮食部、财政部打官司！"20出头的戴鼎虽然从跟随彭德怀的这段日子里，深感彭德怀品德高尚又平易近人，但他一听要他写个报告，却又感到十分吃惊和为难，他从来没有写过送中央的材料，更使他害怕的是彭德怀要拿这个报告去"打官司"，真不知惹出什么事来。

彭德怀见小伙子半天没有作声，便叫他坐下，同他详细谈了起来。他说：我们国家要心想农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国家这一头，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几亿农民的大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脱胎出来的，解放才12年，很多农民生活仍然困难。

彭德怀告诉戴鼎，写这个材料要从历史的、外国的、现实的情况去认识。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农业搞过井田制，井字分九格，农民耕耘周围八格，自种自收，中间一格大家耕耘，收入上交国家，农民作田有奔头，国家不多要，农民很放心。

彭德怀还说，外国也有比我们现在的办法好的。说他那次到苏联，赫鲁晓夫陪他到集体农庄参观，说他们的国家征收农业税是合同定购制，国家向农庄定产定购，一定若干年，超产不要，鼓励农民耕种积极性，国家收入稳定，农民吃了定心丸。我们国家现在的征购政策，是叫做"水涨船高"。政策时时变，增了点产，国家就要征购超产粮。征了过头粮，要农民如何吃得饭饱？尤其是那些浮报高产的队，打肿脸充胖子，卖空了仓，吃足了亏。

听了彭德怀的这一席话，戴鼎深深感到他老人家摆的是事实，想的是农民，讲的是真理，于是去掉了顾虑，按照彭老总的思路和要求，写了一个2000多字的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材料，让他带回了北京。

彭德怀在湘潭县响塘区调查时，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前往锰矿招待所看望他。在与华国锋的交谈中，得知中央即将于1月10日召开扩大到全国县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认为中央这个会很重要，为党能够进一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庆幸，便和工作人员抓紧整理材料，于12月26日赶回北京。

离开锰矿招待所之前，他把响塘区委书记熊桂森请来，商量如何适当统销一点粮食给陈蒲大队社员，以解燃眉之急。彭德怀后来又将调查的情况先后与湘潭县委、湘潭地委及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并将所写的调查报告送省委领导参考。他的务实精神使各级干部深受教育。湘潭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彭德怀反映的情况，立即拨给响塘区一些返销粮，重点解决严重缺粮户，仅陈蒲大队就返销了粮食两万斤以上。农民展开愁眉，情不自禁地歌唱："搭帮彭德怀，粮食运了来；搭帮彭德怀，炉锅子饭煮起来！"这首民谣，至今在群众中流传。

一个多月里，彭德怀冒着寒冷，走村串户，踏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给群众带去党的温暖与关怀，带来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彭德怀又要走了，他要把农村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他的心情极不平静，家乡人民更是恋恋不舍。景希珍在他的《在彭总身边》里是这样叙述的：

临行的那个晚上，彭总把我和老赵叫上，打着电筒去看了看他的亲戚、邻居。每走一家，彭总先把老老少少都看看，再望望缸里有米没有，床上有被没有。对缺东少西的人家，他都留下一点钱。挨家挨户走了十多家，天就快亮了。到动身回城的时候，群众又赶来送他，有的拉住他的手，有的牵着他的衣角，恋恋不舍地让他上了车。车缓缓地开出老远，我回过头去，还望得见乡亲们一动不动的身影。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我对彭总这次回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深深地激动。

李立三回乡探亲纪实

廖新民

"国家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来南方视察，顺道回醴陵看看，请作好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

喜讯由省公安厅传到醴陵。那是在1954年10月的金秋季节。醴陵县公安局长李文魁，召集政保股的唐大先、廖新民等一起积极进行了准备工作。

中旬的一天，秋阳高照，金风送爽，早在火车站迎候的县委书记赵凤祥、县长刘德仁等一行人，心情格外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

"呜……呜……"当火车徐徐进站时，大家都把目光注视着每一节车厢，火车停稳后，一个年轻干部眼尖，最先发现从尾端专厢里第一个走出的就是李立三同志，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注视着他，他伟岸英武，年约50多岁，穿一身派力司中山服，满面笑容，正高兴地和他的秘书一道朝前去迎接的醴陵县委负责人走来，赵凤祥快步上前自我介绍："我是中共醴陵县委书记，叫赵凤祥。这位是醴陵县县长刘德仁……热烈欢迎首长回家乡视察指导。"李立三笑着说："我就不要介绍了啊。"说完亲切地与前去迎接的干部一一握手问候。"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全然没有一点架子。与大家在一起的亲热劲，简直就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同志们由衷地赞叹着，原有的紧张感，早已一扫而光。

当时醴陵的交通闭塞，全县没有一辆汽车，正当县委因没有小车接客倍感焦急时，驻醴部队十八陆军医院分配来一部旧吉普车。赵书记请李立三同志上车，李立三说："我家就住在福建围，走路去吧！"说着，就踏上去老家的山乡小道。这时路上有个肩扛锄头，衣衫破旧的农民在仔细打量着他，李立三急忙迎上前去，大声喊着他的小名，这位农民还来不及揩去手上的泥巴，两双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李立三关切地询问他的生产和生活情况，问寒问暖，还鼓励他勤劳致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农民感动地说："隆郅，您已是共产党的大官，还记得我们老百姓啊！"李立三大声笑着说："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李立三的故居坐落在阳三石附近的福建围，是一栋20多间土木结构保存

完好的瓦屋，前面有一张槽门，槽门进去就可看到"芋园"二字，四周是土围墙，里面是李立三的弟弟李隆汉在居住。当时李隆汉在长沙市法院工作，家里就是他爱人和儿女，大女李北北在一中读书，儿子李人扬，年仅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这里。

李立三踏进槽门，见屋里的门关着，原来是弟嫂外面搞劳动去了，他趁人喊弟嫂回家的机会，就在屋前屋后察看了一遍。随后弟嫂赤着脚回屋来了，李立三笑嘻嘻地迎上前去喊了一声："老弟嫂，你出工来呀！好嘛！劳动光荣。"弟嫂热情地把他和县里的领导一齐请进屋里。一进门就搬凳让座，递烟泡茶，忙得不亦乐乎。李立三一边喝茶一边询问离家后家里的情况。弟嫂诉说着大革命失败后醴陵的情景，李立三没有等她说完就插嘴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吧，现在就好了，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大家都能过着和平幸福的日子。"离家前，他叫秘书将从北京带来的二丈士林布交给弟嫂说，这次回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只是给北北买了二丈蓝布做身衣服。告别了弟嫂，离开了家门，慢步走到阳三石乘车至县委会。几个搞保卫工作的同志骑自行车尾随而去。一路上大家议论着，一个共产党的部长回家探亲送两丈蓝布，要是国民党的一个部长回家探亲，东西要用汽车拉呀，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县委会当时在伍家巷，解放后接收的复兴银行内，李立三住在二楼北边的第一间房，室内设备简陋，仅有一张老式床，一张书桌，几张凳子，一只衣架，只是床上添置了一套新铺盖。服务员递送了茶，李立三端着这碗茶，一边喝，一边风趣地说："家乡的茶好香，家乡的水好甜呀。"赵书记看到李立三同志长途旅行劳累，便说："客听主安排，你几十年没有回家，要多住几晚，今天下午的安排就是休息。"李立三说："回到家里好说，你们工作忙，就忙去吧。"下午二时左右，李立三便把秘书叫起来说："来一次醴陵不容易，机会难得，我们还是到街上溜达溜达。"说罢两人就往中兴街走去，几个搞保卫的也就随即陪同去了。走到北正街，他在这个货摊上问问，那个货摊上摸摸，边走边说，现在的物价确实稳定，群众的生活就好过得多了啊！"慢步走到十字街，李立三问身边保卫人员："洞庭春还有不有？""有！"他手一挥，拉着秘书的手说："到洞庭春吃米粉去。"秘书担心街上的小吃店不卫生，就改口说，快吃晚饭了，今天就不去了吧。李立三笑着说："我们醴陵洞庭春的米粉是有名的啊！过去的文人墨客，地主老财到了城里都要去那里吃一吃的，冒吃就等于没有到醴陵城一样，嘿，机会难得，不吃太可惜了。"随后一同登上了洞庭春楼上。洞庭春位于伍家巷口，前面临街，后面是水（靠渌江），李立三朝窗外望去，渌江水在脚下流过，对面是状元芳洲，触景生情，渌江民谣涌上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渌江绿水绿悠悠，三刀石下状元洲。马脑潭前龙现爪，姜湾文

笔点春秋”的民谣。“部长的佳作作得真快”，秘书称赞道。李立三说：“这不是我的佳作，这是醴陵人民的智慧。”李立三吃辣椒，便自己加放了一点，边吃边问秘书米粉味道如何？秘书连声说好吃好吃。“是啊，我从来不吹牛，好就是好嘛。”李立三风趣地说。

晚上县委会议室，庄严肃穆，灯火明亮，坐在会议室恭候李立三的有县委书记赵凤祥、县长刘德仁、宣传部长胡春桃、县工会主席袁明辉等领导同志，李立三和秘书笑嘻嘻地步入会议室时，大家都起立鼓掌欢迎。李立三谦虚地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他见县委几个领导很拘谨的坐着，又说：“你们不要把我看做是中央来的领导，我是醴陵人，你们都是父母官。”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了，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接着，县委书记赵凤祥拿出笔记本，汇报醴陵的工作。赵书记汇报互助合作时，他说：“刚解放不久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积极性很高，互助组发展很快，全县有69%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其中有34%为常年互助组，1953年1月经县委批准试办了唐花香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到1954年9月前就重点试行了11个农业初级社。由于初级社刚一建立，就大大显示了其优越性，群众纷纷要求入社，有的干脆自动组合，人们称之为自发社。县委阻也阻不住，感到棘手。”李立三插话说：“这好嘛，他们有积极性，就让他们自己办起来，我们从中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县工会主席袁明辉同志汇报了工会组建情况，当他汇报工会理事会成员时，袁主席失言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工会成员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犯了一些错误。”赵书记随即补充了一句话：“没有什么影响，而是理事会成员的主观世界改造得不好。”袁主席发现自己失言讲错话时，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李立三也有些难过，但没有说话。汇报结束后，赵书记请李立三同志作指示，李立三说：“我没有什么指示，刚才听了两位领导的汇报，醴陵的工作搞得不错。我是管劳动工作的，对农业不太熟悉，九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刘主席都讲了话，你们在报纸上都看到了，中央的文件马上就会下发，我没有新的意见，你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醴陵的工会工作已经起步，总之工会要为工人说话办事谋取福利，要在工作中摸索经验，加快工会队伍的建设，至于理事会的成员有些错误，我看不要紧，我也犯过错误。毛主席曾经说过，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李立三同志的一席话，句句诚恳，言衷意切，大家都为他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而感动。

渌江中学的旧址就在县委会的后院，李立三曾在这里读过书。第二天清早他起得早，和秘书在县委机关的后院散步，眼望着后院内一排陈旧不堪的木板结构的老房子，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从东头走到西头，从室外走到室内，到处察看，后来在进门靠左边的木板墙上，弯着腰在那字迹斑斑的木板上寻找什么，突然，他高兴地喊了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并招呼秘书过来，他指着这间屋说：“这里原是渌江中学的教室，我曾在这里读过书。”并指着木板上一片模糊不清的字迹说：“我就坐在这里，坐我前面的是李明灏！”秘书惊奇地问，李明灏也是醴陵人？“是呀，新阳的嘛！”秘书赞叹地说，醴陵出人才呀！李立三自豪地回答说，醴陵文化发达，人才确实不少啊！走出教室他又指着外面墙壁上说：“当时我在这里读书时，内战不休，国无宁日，群众流离失所，我曾以忧国子的笔名，写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和救国的主张等方面的文章，就是贴在这块墙壁上。”接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三十多年了。转身又指着前面的那栋房子说：“这栋房子是国民党的地方法院，它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无辜的群众啊！我们的好同志孙筱山烈士就是被这班家伙杀害的。”

醴陵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在寻求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过程中，醴陵人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涌现了不少英雄人物，孙筱山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个。次日吃完早饭，李立三就提出要去看望孙筱山烈士的家属。汽车开到孙家的门口，烈士的长子孙仲章早已在门口迎候，见面时李立三抢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立三。”“他就是孙筱山烈士的长子孙仲章。”一位陪同的同志介绍说。仲章紧紧握着李立三的双手，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久久说不出话来。孙仲章的母亲坐在堂屋里，眼睛不太好。一进屋，李立三就喊：“大嫂呀！我是李立三。”大嫂连忙起身迎接说：“你回来了！”说着一双颤抖的手紧紧握着李立三的双手，上下打量着他，李立三无限深情地说：“大嫂呀！筱山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让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人民感谢你们，现在就好了，搭帮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好日子就来了。”大嫂连忙进厨房用大锅烧茶。本来保卫人员早已备好了茶，可他不吃，倒把筱山同志家带有辣椒和油盐味的茶一饮而尽，同志们都投以敬佩的目光！李立三详细询问了烈士家庭情况。然后站起来说：“现在好了，政权在人民手里，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面对仲章说：“你爹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你要继承父志，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孙仲章也站起来说：“一定听首长的话。”接着，李立三向仲章询问烈士埋葬在什么地方。仲章推开后门，指着离屋约50米的一座坟墓说：“就埋在那里。”李立三缓步走向坟前，恭恭敬敬向筱山烈士三鞠躬，静默三分钟后，他发现坟墓周围到处长满了箭竹，就有些不高兴了，便说：“怎么不修坟？不要忘记你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呀。”说得仲章满脸通红，低下了头。李立三又转过脸对在场的同志说：“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停了一会，又把仲章喊到赵书记跟前说：“今后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县委，但不要依赖。”他问赵书记：“你看怎样呢？”赵书记说：“完全应该照顾。”最后李立三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筱山同志的坟地，告

别了大嫂去电瓷厂了。

醴陵电瓷厂，当时是县里一个较大的厂子，也是全省唯一的电瓷厂，生产高低压瓷，大小套管等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汽车停稳后，厂长戴凌翔走到车前，热情地请李部长到办公室休息喝茶，李立三说，上午的时间不多了，先去车间看看吧。从炼泥、成型、烧结、试电到合格产品，每到一个车间，厂长一边介绍，李立三一边问工人的生产、生活和福利、设施情况。在成型车间，看见工人做大套管，高的有二三米，全是用手端出来的，李立三连声赞道："不简单，不简单哪。"参观最后一道工序的试电间（检验产品）时，火花四溅，秘书拉着李立三站远一点，怕有危险，李立三笑着说："工人每天干还不怕，我们怕什么啦。"在场的人都很受感动，有一位老工人拉住李立三的手说："您真是我们工人的贴心人哪！"参观结束后，李立三很有感慨的对厂长说："你们厂搞得不错，工人的积极性很高，要逐步扩大规模，由手工操作改变为机械操作。办好一个厂，除抓好经营管理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当领导的要关心工人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生产才能不断持续发展，才能不断巩固壮大。"从电瓷厂出来，一行人来到了李立三的母校——醴陵第一中学门前。李立三立即问前来迎接的欧阳文道校长："这里原来不是有个池子吗？"欧阳校长笑着说："不错，有一个池子，现在同学们把它填平了。""可惜，可惜！"接着李立三便讲起这个池子的故事来。这个池叫瑞渌池，原来朱熹来这里讲过学，池里的水很绿很绿的，传说是专供朱熹磨墨洗笔用的，说来也怪，池内的水可以蘸笔成汁，挥毫立就，后人把它作为醴陵八景之一。李立三站在梯云阁向四周张望，见森林茂密，绿树成荫，便自言自语地说，学校环境不错，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他对欧阳校长说："一中是醴陵的最高学府，要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过去的湘东中学就办得不错嘛！相信你们会比湘东办得更好。"校长答得爽快："请首长放心，对办好一中，醴陵人民是有信心的。"李立三高兴得大笑起来，并主动提出与赵凤祥书记等合影留念。

随行工作人员与李立三同志一道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县委的干部职工与李立三同志挥手告别，并请他适时再回醴陵，看看家乡发展、变化的新面貌，万万没想到这次回乡竟成了永别。可是立三同志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打成一片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至今留在醴陵人民的心中。

周小舟对湘乡"世界最大标语"的严厉批评

刘秉勋

1966年12月2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含冤去世，至今已35周年。周小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爱惜民力的好作风，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1958年10—12月，湘乡（原为县，1987年改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抽调2500名中学师生，奋战48天，在县城对面的东台山上和塔子山上，分别修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共18个字的两幅大型标语，每个字60米见方。此事曾受到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两次严厉批评。他说湘乡山上的大标语可说是世界第一，是劳民伤财。

但近年来，一些报纸杂志包括一些党史、文史资料上刊登的文章，说是谭政大将1959年回湘乡视察时，批评道：这条标语称得上世界第一，如果你们的生产也创造世界第一，就要你们到北京（中南海）领奖。（参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湖南》第252～253页，《湘乡文史资料》第7辑第81页）有的文章还对谭政大将当时的思想活动作了详尽的描述。

去冬以来，笔者参与《中共湘乡地方史（1949—1999）》一书的编写工作，对"大标语"一事作了详细考证：翻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及当时报纸上的有关报道，采访了当年接待过谭政、周小舟和参加过有关会议的老领导、老同志。证明后一种说法有违历史事实。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避免以讹传讹，给史书留下不确切的记述，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扬周小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珍惜民力的好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特作文以记之，并以此纪念周小舟同志逝世35周年。

湘乡打造世界上少见的大型标语

1958年1月23日，中共湘乡县委发出《关于立即开展以农业生产大跃进

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运动的紧急通知》，接着提出“实现亩产双千斤县”和“造林20万亩，实现林业大跃进”的口号。从县委书记到县区乡干部一齐动员，带领群众“破冰打凼”，上山整地植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挑灯夜战，到处可见。为了鼓舞斗志，互相促进，经省、地委撮合，湘乡与醴陵开展对口赛，两县相互派驻观察员，观察竞争对手“大跃进”的新举措，及时向派出方通报信息。8月，县委又提出“农业当全省第一”、“工业赶超邵东，两年改变面貌”的口号。9月，以20天时间，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实行大兵团作战，上阵10万人办钢铁，6万人办煤炭。10月，根据省委《关于中等学校停课一个月大搞劳动生产的通知》，组织中学师生1.6万余人去东郊、石磴、谷水、壶天、金石等地参加大炼钢铁和秋收秋种，小学六年级学生则停课就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此时，传来信息：醴陵县用瓷泥在山头上制作了一条鼓舞人心的大型标语。为此，县委常委研究决定，湘乡在东台山制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塔子山制作“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共18个字的两幅大型标语，要求规模和气势都要大大超过醴陵。初定每个字按60米见方设计，决定由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冯嘉仁主管此事。会后，冯嘉仁率技术人员瞭望远镜，在潭宝公路（320国道）东至铜钿湾，西至万贯亭瞭望观测，初定大标语位置。之后，指定文教科派员组织实施，由湘乡一中美术教师冯达明负责设计。冯老师选定每笔每画粗细一致、横窄纵长的矩形字体，先在纸上写好，交县委审查同意后，带8个学生上山放样。当时未使用任何仪器，只是山上山下各站着一群人，凭大家的目测、步量定位，用绳子丈量测定各字笔画，再用石灰粉划线，标出框架，每笔宽6～10米，每个字占地5亩多。塔子山上的10个字依山势横展，延绵1公里；东台山上的8个字，依山势每个坡上放一个。设计放样后，县委决定调已停课支钢支农的一、二、三、四中及东山学校的2500名师生施工。这批师生于10月17日上山，至12月5日竣工下山，历时48天。参与施工的师生按军事建制，以校为单位建营，下分连、排、班，任务按“字”分到营、连、排、班，组织施工劳动。施工中，先将各笔各画的四周挖好坑，坑深25公分，四边以石灰浆嵌砌片石或块石，中间填充卵石与黄土并夯紧，呈龟背状，以利排水；上面再覆以石灰砂浆拌稻草，压紧嵌实，使各笔各画连结成一个整体；再在石灰砂浆上嵌插玻璃片，使之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每个字的四周都开好50公分深的撇洪排水沟，以防水土流失。18个字共用去片石、块石240万公斤，河沙180万公斤，石灰17.5万公斤，稻草3.6万公斤，共用水2.4万担。除片石、块石部分在山上采捡外，其余物资均须人工一担一担肩挑上山，河沙从涟水河中捞取，稻草、石灰均无偿调用，从各生产队稻田中和各管理区或公社的石灰窑内担运，其中一部分石

灰还是从几公里外的酒铺运至山上。肩挑运输任务十分繁重。施工中，共砍伐大小树林（苗）1.9万余株，总耗工9.7万个。所用畚箕、锄头、桶子等工具全由师生自带，学校适当添置。参加施工的师生个个热情高涨，他们提出的行动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思想感情群众化；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当好天，吊起月亮当白天。他们在山上安营扎寨，吃饭、休息、读报、开会都在工地。有的疲劳了，坐在树下打个盹又干起来；有的边走边打瞌睡，致跌倒跌伤的事常有发生，但总是爬起来又干。时值深秋冬令，风枪霜剑，不少人手脚皮肤皲裂，但无人叫苦。湘乡一中一位女教师身怀有孕，也一直坚持爬山挑运，挖土搬石，致劳累过度而流产，但她既不告诉别人，也不请假休息，坚持干到复课后才被别人发现。

大型标语打造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只要能看到东台山和塔子山，18个银光闪闪的大字就赫然入目。据说，飞机经过此地，机上的人也看得一清二楚。县委对此满意，对参建的单位和师生给予了表彰奖励。《湘乡报》于11月11日以《青山当纸手当笔，把人民的心愿刻在塔子山上》为题，作了第一次报道，说“这真是青山当纸，石头当墨手当笔，是文化艺术上的新创造”。12月23日，又以《世界上少见的巨型标语》为题第二次报道说：“‘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这是湘乡60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豪迈口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体现了全县人民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现在这两句有深长诗意的标语，已经镌刻在县城对面的塔子山和东台山上，光芒万丈，照耀着全县人民挺进。有诗为证：两座青山肩并肩，绝美诗句绣山尖。全县人民团结紧，快马加鞭挺向前。”报道在全面介绍大标语打造过程及巨大的工程量后说：“大标语修建完成了，百里路外也能看到清晰的字迹，它那高大秀丽的身躯是：千里之外银光闪，百里也知是誓言。不是在下夸海口，古今中外都罕见。”接着，报道在介绍了修建过程中所克服的艰难险阻后，又以诗句歌颂参建师生的奋斗精神：“老师同学信心坚，日夜战斗在山尖。不怕山高路又远，一心为了刻誓言。”报道最后说：“明年是苦战三年的关键年，全县人民正以冲天的干劲夺取巨大战果，提前完成豪迈的誓言。”数日后，《新湖南报》社主编的《地县报纸巡礼》转载了《湘乡报》的报道。从此，三湘四水甚至全国各地都知道湘乡县打造了两条“世界上少见的大型标语”。

1959年2月21—23日，谭政大将来湘乡视察，临行前在县委机关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到：“今年是苦战三年中的第二年，是带有决定性的一年。你们对面山上的大标语不是说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吗！”没有对大标语建造本身作出评论。

周小舟的两次严厉批评

1959年3月16日，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在省军区大礼堂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报告中根据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了全省半年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与经验教训。在讲到发生的问题时，他离开讲稿，声色俱厉地批评了益阳等地挖祖坟及湘乡搞巨型标语的作法。他说："湘乡山头上的大标语，可说是世界第一，劳民伤财……"参加会议的县领导听后大为震动。会后，县委常委开会，传达省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和周小舟的批评，学习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有关文件，对公社化以来的得失进行了回顾检查。紧接着于3月23日——29日召开有6139人参加的县、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五级干部参加的大会，进行传达贯彻，批评了1958年的高产指标，和人民公社化初期的一些形式主义、大轰大嗡的做法，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政策措施。会后，常委分工下去检查督促。县委第一书记霍旭奎在一次常委会上指出，现在是口号大，实劲小，今年肥料情况不如去年，搞不好，会有减产的危险。常委决定，一定要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争取1959年有个好收成。

同年夏，周小舟来湘乡检查工作，住县委机关后栋宿舍。晚饭后，他提出要去涟水河里洗澡，县委书记李子平、县长王湘杰陪伴他，经人委门口去望春门，到镇湘楼前数十米的地方下河，县里雇一只小船跟随，李子平、王湘杰在岸上守候。可能周小舟在河里游泳时看到了对面山上的大标语，上岸后，神情严肃的对李、王二人说："对面山上的大标语实在是浪费人力、财力、物力，劳民伤财，何必这样搞!"县领导当面向他作了检讨，并汇报了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贯彻情况以及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与收到的效果，周小舟对此表示满意。

教训与反思

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全县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征的共产风以及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日甚一日，招致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生猪等主要农产品连年大幅度减产，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劳力外流及病人、死人现象大量增加。1961年3月底，毛泽东派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来湖南，与省委调查组汇合，到韶山公社与湘乡沙田公社大坪大队做调查。4月13日，胡乔木、王力与省农办贺炳贤等到中共湘乡县委听取汇报，在县领导陪同下，到陈赓公社的4个大队做调查。4月14日，胡乔木嘱省委工作组长毛华

初带着他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向正在湖南考察工作的毛泽东汇报。胡乔木在信中汇报湘乡"五风"严重，病人、死人甚多等情况，认为湘乡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被定为三类的湘潭县，在死人这一点上犹有过之。毛泽东批示将胡乔木的信印发给正在举行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会后，省委派工作队来县，深入社队，开展整风整社；同时，帮助县委整风，总结经验教训。1961年5月29日，县委常委在地委副书记曾广成、省委工作队副队长王全夫（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主持下，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县委第一书记李子平的检讨。他在检查几年来县委工作上的错误以及带来的严重损失后说："几年来，自己站在运动之外，特别是59年反右倾以后。那时周小舟批评我们的大标语，我们搞了大标语，是从醴陵学的。"他检讨到，周小舟批评大标语以后，在一段时间内，个人和县委常委一班人头脑较清醒，纠正了一些"五风"错误，工作作风有了改进；但庐山会议批判周小舟后，我们的脑子又发热了，把前段纠正的一些正确作法当作右倾加以批判。1959年冬又搞一平二调，大拆民房，大办猪场，大搞水力站、田园化。要求东郊一个公社一个冬春安排70万个水利工，修芦塘寺水库集体研究过，修皂坝就没有很好研究了，由我个人决定了；拆民房，办厂，办千、百猪场，上级没有要求，常委也没有集体研究，个人脑子发热，就往下面压任务，强令推行，谁不听就批斗谁，以致造成严重损失……（见湘乡市档案馆档案11～1～159）

历史已经证明，周小舟对湘乡搞大型标语的两次严肃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作用是好的。湘乡搞世界上最大的标语，完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是浮夸风的典型，是劳民伤财的"灾害工程"。虽然这两条标语早于60年代初期就已湮没于荒草之中，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深入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端正党风的今天，重温周小舟同志40多年前对湘乡的两次批评，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对他逝世35周年最好的纪念。

翦伯赞在香港

岑生平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反对和平，公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文化围剿，镇压一切民主运动，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受到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在上海工作的翦伯赞同志，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然是敌人伺机迫害的主要对象。翦伯赞遵照党组织的安排，被迫于同年10月27日秘密离开上海转移到了香港。

在翦伯赞到达香港的前后，郭沫若、千家驹、茅盾、曾昭抡、侯外庐等也到了香港。一时间，香港集中了一大批从国民党统治区转移过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在香港形成了一个颇为强大的进步阵营。

翦伯赞初到香港时，既没有钱也没有住处，临时借住在一家小书店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应聘为达德学院教授。

翦伯赞开的是历史课，他在讲授时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统率史实，开辟新史学，使人耳目一新。加之他博学多识，高超的讲演艺术，妙趣横生，既生动又富于哲理。他上课的时候，听众总是座无虚席，往往要在门外窗下增加座位才行。

他在校园里或课堂上，与同学平等相待，共同讨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当时校园内外谈论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胜利在望，革命胜利后，会不会重犯历史上农民革命政权的错误以及中国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翦伯赞从历史和社会现状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是个汪洋大海，它的习惯势力和思想影响是十分顽固的。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那些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和思想影响，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消除，它所产生的消极现象和各种弊端都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弄不好还会带来极大的灾难，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它。土地革命在于解放农民，促进生产力发展，争取农民支援解放战争。革命胜利后，继续进行民主建设反对封建意识，仍然是我们的长期任务。近百年的历史都只能说明，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而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遗产和影响，对中国的发展和富强起着不可忽视的消

极作用。生产力低下，文盲众多，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相当沉重的负担。在我国历史上，为什么总是容易出皇帝呢？还有众多的土皇帝。就是由于这块土地上的社会基础具有适应这种特产的条件。因此，如果没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社会是很难进步的。它只能是痛苦的徘徊。中国革命的成功，在于高度的经济文化建设，在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变。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翦伯赞在《华商报》发表专论，他说：1947年9月13日，中共全国土地会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决议，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这个土地法的实现，便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终消灭。他通过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分析，指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土地政策，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他们的改革，无论是占田制或均田制，多数是在土地兼并剧烈，土地大量集中于那些享有特权不纳税的地主豪强之家，影响朝廷征贡，或是在遭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后，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增加赋税而采取的措施，非但不是关心农民，而是为了保卫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便利地主阶级的剥削。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又提不出自己的土地改革方案，太平天国提出“有田同耕”的主张，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全国土地法，这方案和以前的封建统治者的土地改革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它是鼓舞农民为收回自己的土地而斗争的土地法，没有为地主阶级保留任何剥削农民的特权。总之，这个土地法实施以后，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土地当作剥削的手段，亦即不能用土地所有权证明自己有剥削农民的特权。有了这个土地法，便保证了这一次革命的胜利，保证这一次革命的终局不再是地主阶级的换班，而是农民翻身做主人。

翦伯赞不仅是严谨的学者、教授，也是勇敢的战士。他是不畏风刀霜剑的一株劲松。他在香港一年整，除教学外，还以历史为武器，拿起笔杆进行革命宣传，著书立说，发表论文数十篇。

1948年元旦，翦伯赞在《华商报》发表了《迎接划时代的1948年》的文章，指出蒋介石靠美国支持打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民已经用血和火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作了结论：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必将打出一个新中国。1948年将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一年，革命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将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迎接这新的年份，新的时代的时候，希望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让后来的历史学家，把人民大翻身当作新中国历史的序言。文章坚信革命必将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最后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奔向革命前线。

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军事上的失败，又在政治上导演了一场“自由主义运动”，即“第三条路线”。这一个自由主义运动，

最初是由司徒雷登、马歇尔等人提出来的，旨在帮助蒋介石渡过危机，维护美国在华的侵略利益。“自由主义运动”在国民党政府的推动下，开始活跃起来，诱骗一些社会名流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自由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发表了包括国民党政府各部代表和部分国立大学校长、教授署名的32条主张。这个新动向，立即引起了香港左翼文化人士的密切注意，开展了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华商报》召集座谈会，向社会广泛征稿。翦伯赞针对“自由主义运动”写了几篇很尖锐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以《戳穿美蒋新的政治阴谋》为题，以明快犀利的文字揭露美蒋导演这个运动的罪恶目的。文章说：美帝为什么不先不后而要在现在组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明白，就是因为目前的中国人民武装斗争，正在大步跃进，他们在中国已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单凭金元和军火尚嫌不够，必须再把蒋介石的奴才给予新的伪装，用另一种方法去反对中国人民。所谓32条主张，实际上就是反对中国人民的武装革命；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反对苏联和民主阵营。必须粉碎美蒋的新阴谋，打退“自由主义者”的宣传攻势。之后，《华商报》还连续发表了茅盾、侯外庐等教授的文章。在香港开展的这场斗争，使人民进一步认识了美蒋导演“自由主义运动”的假民主、假自由的面目。那些真正希望自由的人士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从反面的阵营中挣脱出来，靠拢革命阵线。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劳动节口号，其中第5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聚集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致电响应，开始酝酿筹备成立新政协。各民主党派都在积极酝酿施政纲领，召开各方面的讨论会。翦伯赞除积极参与各方面的讨论会外，还积极参加新闻界组织的笔谈。《华商报》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专题报道了翦伯赞、马叙伦、章乃器、冯裕芳、黄药眠等的笔谈纪要，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6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从东北搞“文化撤退”，胡适之流奉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散布流言，说什么“共产党只要工人农民，不要知识分子；只要土地工厂，不要文化学术；只要游击队，不要工程师”。煽动“文化逃难”，企图把将要被解放的地区的文化教育连人带物洗劫一空，使那些将要被解放的地区在将来的建设中陷入困境。若不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这个阴谋，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影响新中国的建设。为此，翦伯赞在《华商报》发表了《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的文章，把国民党政府文化撤退中的种种罪恶行径公之于社会，逐条批驳胡适散布的流言，以正视听。

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在文化撤退中，盗卖藏在东北的文物，解散学校，强制文化机构、教授搬迁，简直是在执行一种“文化焦土”政策。现在，“文

化撤退”的运动不过刚刚开始，这个运动，跟着蒋介石的军事失败，尚要继续扩大，这就是说，继东北各大学之后，必有无数蒋管区的大学，在撤退的命令之下，陷于无形解散，继东北的古文物之后，必有更多的古文物，在“集中整理”的理由下，继续被盗窃，这真是中国文化空前的危机。因此，我吁请全国学术界人士，对于胡适之流利用“文化撤退”破坏中国文化，及其盗窃中国文物的企图，予以密切的关注。为了让国内的教授和学生了解真相，不要上当受骗，他又着力介绍了党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用事实证明党重视文化科学，重视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文化建设成就以及党在团结、爱护知识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最后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国家，而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乃至开明绅士共同的国家。号召国内的学术工作者和技术人才一致起来反对文化撤退的阴谋，反对历史文物的迁移，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

这年9月，原上海《文汇报》在香港复刊，翦伯赞又与战友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该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7个副刊，配合正面战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发动了强大的思想攻势，为最后摧毁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而战斗。翦伯赞在该报发表了《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十余篇论文，谈古论今，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行将覆灭的必然命运，激励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在香港，翦伯赞在统战工作方面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争取湖南的和平解放，这年秋，他写信到解放区，将李明灏介绍给周恩来，派其回湖南进行和平解放活动。对后来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8年11月，他奉党中央电召，与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曹孟君、侯外庐等20余人离开香港。他在港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年，但他发表的文章就有将近30篇。对翦伯赞一生来讲，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廖沫沙与花边文学

唐正芒

“一根藤上仨黑瓜，邓拓吴晗廖沫沙。”十年浩劫初起之际，廖沫沙即以“三家村”成员之一而名扬天下，家喻户晓。

廖沫沙，长沙东乡干杉村人。1907年生。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战文化运动，曾为创办与编辑湖南的《抗战日报》和出版于重庆的《新华日报》作出过重要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当廖沫沙还只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时，鲁迅已是蜚声中外的文坛巨匠。他们虽是两代文化人，但却能相互支持。廖沫沙对鲁迅先生及其作品深为折服，并始终怀着崇拜和敬仰之情。鲁迅也大力支持作为文坛后起之秀的廖沫沙。

1934年4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吞中国领土，中国人民蒙受巨大国难和国耻之际，帮闲文人林语堂、周作人创办了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大力鼓吹享受，提倡“闲适”、“幽默”，引导人们逃避斗争，脱离现实。血气方刚的廖沫沙读了《人间世》后十分愤慨，奋笔写下了《人间何世》一文，发表在1934年4月的《申报·自由谈》上。文章义正辞严地批驳了林、周等人逃避现实斗争的懦夫思想，申明了鼓舞国人、团结抗日、爱国救国的观点。鲁迅读了这篇文章后，认为批得对、批得好，大加赞赏。由此，廖沫沙即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驳倒了大人物，而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广泛注意。

然而共同的战斗中，廖沫沙与鲁迅之间也确实发生过一场误会。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1934年，上海的外国租界当局，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禁止在租界内倒提鸡鸭行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此事引起了几位华人的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比不上鸡鸭”。针对这件事，鲁迅用“公汗”的笔名在6月28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倒提》，讽刺了那些“没出息的”、“自叹不如鸡鸭者”的不平华人。并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他认为，鸡鸭这类动物，无论怎样优待，最终不过要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而人却“自有

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更无须跟鸡鸭去比高下。因为人“能组织，能反抗”，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廖沫沙看到此文后，因不知道“公汗”是鲁迅新启用的笔名，不知该文为鲁迅所作，便不能容忍该文对洋人的“宽恕”。于是便以林默署名，在7月3日的《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批判文章，认为《倒提》一文是在替西洋人辩护，“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人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文章指责《倒提》说，“抱不平的人”并不是“一律没出息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战争、东北抗战，这都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战斗和反抗”。由此廖沫沙推断《倒提》一文出于“买办”的手笔，并且将这类在四周围着花边的副刊上发表的杂文讥讽为“花边文学”。“花边”在当时也是银元的别称，这自然隐含着讽刺作者写文章是为了赚稿费的意思。

为什么廖沫沙这时要在《申报》上选这篇杂文进行批驳呢？这是因为当时他听说国民党反动当局撤换了《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并严禁鲁迅等左翼作家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廖沫沙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行为十分愤慨，又对《申报》馆屈服压力的做法深感鄙弃，更为鲁迅和左翼作家们受到压制而愤愤不平，于是总想从《申报·自由谈》中找岔子出出气。结果“子弹”却误伤了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左联主将鲁迅。不几天，果然找到了《倒提》这篇他自以为是出于“买办”手笔的文章，便向它发起猛攻。这说明当时的廖沫沙对特殊环境下应采取的斗争艺术还认识不深，同时对鲁迅杂文的特点也不完全了解。这种认识上的不成熟，致使他误解了鲁迅先生的《倒提》一文。

后来，鲁迅在将自己1934年的杂文汇为一集时，特意定名为《花边文学》，并把廖沫沙的《论“花边文学”》附在他的《倒提》一文之后。在该杂文集的序言中，鲁迅以先辈和长者的口吻，解释了这一名称的由来，说这“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1935年2月7日，鲁迅给曹靖华的信中曾提到林默的《论“花边文学”》，说他知道这一文“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过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一些既认识鲁迅也认识廖沫沙的朋友，自告奋勇，向鲁迅答应，代他去找廖沫沙，要廖作出书面解释。而廖沫沙在1934年9月即被调出“左联”，转入另一秘密机关工作，组织上严格要求他：除有直接工作联系的两三个人外，不许同其他任何人来往接触，而且另迁住地，断绝与一切熟识人的往来。同年冬，廖沫沙被捕，从此离开了上海。这样，曾向鲁迅作过许诺的那些

朋友再也找不到廖沫沙的踪迹，无法让廖沫沙向鲁迅作书面解释，便造成至1935年2月鲁迅仍"没有收到"廖沫沙的书面解释的又一误会。

抗战初期的1938年，廖沫沙在长沙编辑《抗战日报》，偶然看到《鲁迅全集》中的《花边文学》的序言，才猛吃一惊，没想到"自己竟造过这样一桩孽"，竟以自己的乱枪，伤害到自己向来景仰崇敬的鲁迅先生。而这时鲁迅谢世已近两年。

鲁迅与廖沫沙在20世纪30年代因复杂历史环境而造成的这场误会，32年后竟被戚本禹利用，1966年5月，他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中，诬称"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戚本禹把历史与现实都加以歪曲，把一篇出发点本是为鲁迅等左翼文化人鸣不平的文章，作为廖沫沙攻击鲁迅的罪证，然后再穿凿附会地编织出一些吓人的莫须有的罪名，将几十年前"同一营垒"中战友间的一场误会硬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这固然是"四人帮"及其打手们诬陷迫害的惯用伎俩，然而，历史的真相绝不是他们所能歪曲和编造的。这伙迫害狂也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我和沈醉

刘俊德口述　周保林整理

沈醉，给我的印象是四方脸，中小身材。他是临澧人（应为湘潭——编注），我是慈利人，同饮一条澧水。他和我是大老乡。在湖南，他是军统负责人，我是中统头目，两者本是对立的，但我俩算是例外。我俩以前只闻其名，并无交往。是在打中相识的。

有一次，我的一位手下，与一商家小姐好上了，开始他们偷偷传情，后明目张胆作爱。不料被军统的几个人争风吃醋，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借口将他抓去。因是我的手下，我不能不管，写上字条派人去找沈醉。沈醉不理，撕了条子。我气不过，亲自去找他。说也怪，他却二话未讲，放了人。我表面感谢他，心中总觉不是滋味。心想：我们官职差不多，我是湖南大学高材生，怕你不成？后来我亲眼见他的为人，他的文武之才，我服了。他不仅字和文章写得好，武艺也非同一般，枪法准，还有臂、腿之功，几个汉子不是他的对手。尤其他在家是孝子，为国尽力，极仇恨日寇。这些都是我称道的。

1944年春，中统专员徐政，在衡阳组织经济检查，在经济队担任秘书，沈醉在经济检查队担任组长（当时经济检查队是由一半中统分子一半军统分子组成的，报上公开发表时，只说是各机关抽调高级官员组成）。沈醉和我相处的时间多了。我俩除了政治外，其他无所不谈。

我和沈醉谈起过沈镜秋，他说镜秋是他的嫡堂兄长，镜秋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同胞弟兄。镜秋从湖大毕业到重庆参加国民党组织部办的党务人员讲习班学习三个月，结业以后，派到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我俩共同认为沈镜秋是有本事的人，在政界吃得开。沈醉告诉我说，1937年军统在临澧办一个速成班共有80多人，他是其中的一人。尔后，我们有过多次接触，但毕竟不同行，只是乡情而已。抗战时（1944年6月22日日寇攻到衡阳）沈醉已先调离衡阳了，我再没有见到他。

我们特赦后，各在一方，他居北京，我住慈利农村。虽未通信，但我经常

想起我们的往事，关注他的动静。当我读到他的《军统内幕》等许多回忆录后，心中甚喜，又如面晤。我为他坦诚、实事求是地再现历史的精神而钦佩。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大胆地写了《我与宣统皇帝交往》等重要文史稿，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受到他的口头好评，托友人向我道贺。

幸留遗照识亲娘

——记母亲胡筠烈士

李荣光

我离开母亲时仅五岁。原先，她带着我打仗。由于游击战争万分艰苦，不得不把我寄放在一位名叫中山的干爹家抚养。后来，中山干爹也上了部队，把我送到了父亲这边。我对母亲的音容笑貌，已记忆不多了。1934 年，她受“左”害牺牲时，我才 12 岁。那时，红白相争，咫尺天涯，我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仅仅传给了我几句口头遗嘱：“孩子要多读一点书，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新中国会需要的。”母亲的音容长逝了，但她的英名永存。“先烈遗风催起舞，洪流滚滚从戎去”（旧作《蝶恋花》句），我终于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继承母亲遗志，与国民党战斗。

天下哪一个儿子不念母亲呀！可是，我也长期受到“左”害，在 20 多年的漫长日子里，只是怀着一瓣心香念着，念着。直到 8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才找到了母亲的一张照片，即现在陈列在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和平江起义纪念馆及江西铜鼓、万载的革命纪念馆的胡筠烈士遗像。我的爱人汤佩佑极为钦仰这未谋一面的婆婆。虽然母亲的事迹已具见《中共党史人物传》、《解放军将领传》等十余种书刊，但她还是天南地北，刻意追寻，搜求母亲的遗闻佚事，准备为写小说或剧本的同志提供资料。

母亲原名昀（不是匀，有的传记中写错了，下同），字敛容（不是剑容），幼名咸慎（不是娴真），生于 1898 年。19 岁时与父亲结婚。1924 年就读于平江启明女校师范部第五班。这是一所很进步的学校，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人凌容众、李樵松夫妇都是留日学生，同为同盟会员。1922 年春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余贲民烈士，这时是启明女校的园艺主任。平江得风气之先，1922 年成立了湖南文化书社平江分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创办了《平江旬报》，成为平江革新的鼓吹力量。母亲在这个环境里很快地成长起来了。1925 年五卅惨案后，母亲积极参加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不许英国煤

油在平江起岸的斗争。母亲与周德一、朱璋等烈士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列。在码头上，她向上千群众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以致被驻在平江的鄂军李柱中部打伤，并被推汨罗江中（见 1926 年 1 月 26 日长沙《大公报》等）。这年冬，母亲由余贲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秋，被派到北伐军中叶挺独立团做宣传工作。1927 年春，又被派去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她和邱纪文（广州起义中牺牲）、徐纬文（后为瞿云白夫人）等一道被录取到政治大队女生队。这次考生 6000 余人（另据资料为 8000 余人），仅录取男生 986 名，其中著名人物有罗瑞卿、程子华、段玉林、徐彦刚、陈季让（陈毅之弟）、陈伯钧等；女生 195 名，其中湖南籍最多，有 61 人。著名人物有李淑宁（赵一曼）、游曦等烈士和钱瑛、曾宪植、危拱之、黄杰、张瑞华、谢冰莹、胡兰畦等。女兵状元是四川籍的陈德芸。她回忆当年“汉上谈兵胆气粗，几回戎马梦江湖”。这是中国大革命浪潮中的第一代女兵啊。

先是，1926 年冬，黄埔军校第五期的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和工兵大队迁来武汉，所以，武汉录取的新生称黄浦六期生。代校长为邓演达，教育长张治中。1927 年 3 月 23 日，武汉政府罢免蒋介石本兼各职后，改委员制。邓演达和恽代英烈士等为常委。恽代英驻校负实际责任，兼政治总教官，陈毅任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官有许德珩、施存统（复亮）、胡愈之、沈雁冰（茅盾）等。茅盾当时有诗云：“秀才初次去出征，不带男兵带女兵。”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是徐向前，女生队教官是章伯钧兼任（他本职为总政治部政治科长。这时，他是中共党员）。女生队实际到校在“锤镰旗下习金戈铁马”（史明恕《高阳台》句）的只 183 人。她们在校学习政治、军事之外，还参加了 1 月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化装宣传。5 至 6 月，同男生一起，组成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讨平了夏斗寅、杨森的叛乱。“旌旗西指阵云高，杨、夏群魔夜遁逃”（陈德芸句），母亲在这次西征中参加了实际战斗，并参加了远征队。

1927 年 7 月，风云变幻，女生队有的分配到叶剑英教导团，有的派往苏联，多数派回家乡工作。母亲奉命回平江组织武装暴动，成立了游击队，担任了北区特委书记，平湘（阴）岳（阳）游击总队第二大队党代表。

1928 年 3 月，平江扑城失败后，县委书记毛简青、宣传部长张幄筹往上海向中央汇报。随后，毛简青往莫斯科参加六大，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张幄筹滞留上海未归。5 月，组织部长罗纳川不幸被捕牺牲。平江县委因之解体。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说：“平江无人不共，要地翻边，人换种，血洗平江。”仅存的县委委员，母亲与张警吾也分开了。母亲到处寻找失散了的同志，终于找到李宗白、张警吾、毛贲虎等重组县委。母亲担任了县委书记。这

一职务见于彭德怀 1945 年《在红三军团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稿》（见中央党校出版社《平江起义资料选辑》）、李寿轩《从九都山到井冈山》（见《星火燎原》）、夏敏之《曙光在前——平江起义纪实》（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彭泽智《忆平江起义前后》（见《平江起义资料集》）、林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见香港《七十年代》1979 年第二期）、《平江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平江县农运调查办公室编）等文献。但是，平江县委党史办以皮简卿回忆录这一孤证确定县委负责人为张警吾，而省委党史委因之，殊甚粗疏。同年 7 月，彭德怀平江起义，母亲又担任了县苏维埃主席。此后，她一直战斗在湘鄂赣边区。1930 年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时，母亲任湘鄂赣暴动委员会党代表，率赤卫队 20 个团一同进城，在教育会坪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威武雄壮的讲演，并与彭德怀、王首道等一起当选为湖南省苏维埃委员。以后，从修水中心县委、赣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并兼警卫团长、红八师师长调任湘鄂赣省委总务处长（秘书长）、妇女部长。王明路线来“改造”省委后，她被调任党校教务主任、互济会副主任等职。

母亲本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能征惯战，又能歌善舞；既是“难得的女将”（彭德怀语），又是出色的文艺和宣传工作者。她的业绩，不仅长留在彭德怀、何长工、吴溉之、钟伟、张平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记忆中，也传颂于湘鄂赣边区老人口碑中，还记录在国民党的档案里。请看《清乡公报》（存湖南省档案馆）。它多处记载了母亲与彭德怀并肩战斗的事迹。

母亲指挥作战，机智勇敢，为人称道。何长工说，“胡筠是湘鄂赣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很会打游击”。当时母亲创造了“拦腰截尾，找敌哨线，敌进山，找下塅；敌疲我打，敌去河东，我往河西；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等战术。可惜那时她并未亲聆毛泽东、朱德的指导，而是在自己的战斗中找到了这些完全符合他们所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的战术。平江人民至今传颂她利用烧旺火、放楠竹炮打进木瓜章平庙；利用风向烧辣椒烟攻克岑川碉堡；用竹筒作滚石擂木在辜家洞阻击敌人等故事。

到 1930 年，她指挥攻城打了大仗。红军战士胡次芳回忆：有一次打武宁，胡筠率领新八师 1000 多人，包围了武宁县城。武宁城前有一条河，城墙又高，敌人的工事很坚固。战斗从头天中午开始，打到第二天上午，牺牲了一些人，还没法接近城墙。胡筠当机立断，命令将附近 5 里以内人家的棉絮全部借来，放在河里浸湿；然后，每组几个战士共顶一张方桌垫了几层厚的棉絮冲锋。这一下真灵。湿棉絮子弹打不穿，也不着火。我军顺利地冲到了城下，架起楼梯

往城上冲。只是由于敌飞机赶到，轰炸扫射，敌援军也接近了，才撤退到修水。现在，武宁县委建在烈士塔旁的纪念碑上赫然铭刻着母亲的名字和这次攻打武宁县城的事迹。又据《通城县志·革命史》记载："1930年8月12日夜，红十六军第八师由胡筠率领，由麦市直捣葛皇甫所部铲共团，缴获步枪18支……同年12月22日胡筠部1000人重返东区。23日下午，冰天雪地，胡筠部在修水、黄袍两地赤卫队1000余人的配合下，从棺材村出发，直指县城。行军60里，夜抵城郊，埋伏于东、南、西三门，成包围之势，约以放火为号，同时攻城。晚8时，锡山火起，伏兵立即呼冲喊杀，大造声威，并以竹筒、棉花、炸药、煤油制成的混合炮弹，打入城内。顿时，炸声四起，火光烛天。敌县长方超，顽固抗拒。城西敌湖北省防军新三十师陶广部某副官原经红军预作动员，即趁势大开西门。东、南二城门则同时各由30余人组成的先锋队架梯爬城而入。敌新十师一旅从北门溃退出城，方超亦弃城逃命。"据《平江革命历史文献集》记载："这一战争，共获敌枪确有1374支，长机关5挺，手枪30余支，子弹十余担，军用品无数。"

母亲的文艺宣传工作，《苏区舞蹈概述》中写道："胡筠……不仅学问渊博，且喜歌善舞。当时宣传队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她创作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上说："1932年9月，湘鄂赣省委在小源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并以列宁小学的教职工为主要骨干，成立了一支赤色宣传队，当时也叫慰劳队。胡筠是这个宣传队的领导兼编导。为了配合部队作战和做好地方工作，宣传队经常组织演出。有两个节目当时影响很大，深受军民欢迎。一个是小歌剧《李更探监》，一个是舞蹈《鲁胖子哭头》。"这两个节目都是母亲创作的。

《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载："李更是平江早期县委书记罗纳川的妻子。罗纳川……由于被叛徒出卖，1928年5月被敌人逮捕杀害。《李更探监》这出戏写的是罗纳川在监狱，李更去探望他的情景……戏演得很生动，扣人心弦，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出戏在小源演过许多场，每次都是人山人海。"

《苏区舞蹈概述》上载："《鲁胖子哭头》是一个男子单人舞蹈。它所表现的是1939年我军活捉张辉瓒后，砍下其头钉在一块木板上，将木板放在河里顺流而下，漂至南昌。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正在野外散步，发现张辉瓒的头后，兔死狐悲，如丧考妣。他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心惊胆战，最后竟将隆隆雷声当成我军的炮声而被吓瘫在地。""整个舞蹈只用了三种步法，'鸭公步'、'前踩跳步'和'痞子步'。'鸭公步，和'前踩跳步，都是根据民间灯采《花灯》的'踩花步'夸张发展而来。它把鲁涤平昂首挺腹，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痞子步'则是根据《秧歌》的'大十字步'并模仿喝醉了酒的人那头重脚轻的形态演变而成的。它把鲁涤平见大势已去兔死

狐悲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优秀节目，至今在老区仍广为传颂。"现收录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资料·万载卷》中。

母亲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我家和我外公家原来都很富有。她说服我祖父拿钱出来买枪，名为团防，实则组织农民游击队。农民运动刚兴起，她首先率领农民分了自家的田地。父亲在初办农民协会时，也曾大声疾呼要解除农民痛苦，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还主持过半日女校的工作。但他后来害怕流血革命，落荒了。此后终身未问政治，做他的"灰色分子"。即使这样，母亲还是毅然跟他离婚了。天下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呢？但是，母亲由于革命需要她去冲锋陷阵，她终于失掉了我。母亲为了革命舍弃了曾经有过很好的感情的丈夫和心爱的唯一的亲生儿子。这样无私忘我，一心为党为人民，正如甘渭汉、张令彬两位将军回忆的："就革命动机之纯正这一点说，胡筠在平江是首屈一指的。"

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勇于战斗，不怕牺牲的好母亲，终因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于1934年4月被害于平江和铜鼓交界处的山鸡坳下冷水井边。她在被害前向党写了《狱中自述》一万言，讲述了自己革命的历程以及"此志未酬，身陷囹圄"的愤慨。她说："牺牲换人间幸福，奋斗乃吾辈生涯。"

母亲被害13年后，我曾到修水、铜鼓、万载、浏阳和平江边界地区三次寻找母亲的骸骨，终因年代久远，当时仅草草埋葬而不得，使我抱恨而返。所幸的是，到80年代初，我竟从全国妇联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大队女生队183人的集体照片，是在1927年3月15日拍摄的。军校招考一批女兵，这是破天荒的创举。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很希望看到这一群在中国古老的、封建的土地上的崛起者——英雄妇女形象。于是有了这张集体照，其中就有我的母亲。照片是健在的同志保存下来的。健在的还有一二十人，如曾宪植、黄自纯（静汶）和近在湖南大学的王容箴，湘潭的谭珊英，远的有在台湾的吴妙章和在美国以《女兵自传》名世的谢冰莹。

谢谢保存了这张照片的同志，谢谢健在的母亲当年的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从这张集体照片中辨认了她——我的母亲。

母亲如在世已有93岁了。我也已70，有了孙子，三代人了。当我们聚在母亲、祖母、老祖母的遗像前，我们就默诵着我写在母亲遗像下面的一首代替家奠文的诗：

一从马列播东方，斩棘披荆战大荒。
敢为工农求解放，不因儿女费周章。
风波狱寄千秋恨，父老心存一瓣香。

金剑沉埋无觅处，幸留遗照识亲娘。

敬爱的母亲，在您生活过的大坪故居的前面，修建了钢筋混凝土的大桥，命名胡筠桥；在您建立第一个支部的小学，修建了三层教学大楼和新校舍，命名胡筠学校。家乡人民永远纪念着您。安息吧，我的母亲！

编者按：李荣光先生此文作于1992年。其后，平江大坪乡又改建了一所胡筠学校，还在大坪中学竖立了胡筠烈士塑像。塑像座基正面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题名，两侧镌刻了方强题词“伟大烈士”、刘志坚题词“浩气长存”和欧阳大裴周玉、李锐、黄吉民等题诗；背面则是湖南大学教授李时中所撰《胡筠烈士传略》。

湖南省立一中杂忆

李荣光

1938年，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简称长高）迁往宁乡高桥。我于下半年入学普36班。这年冬，学校经由宁乡黄材再迁安化七星街。翌年，长高、长沙女子中学（简称省长女中）、第一师范、高等工业学校等七所省立学校合并成立湖南省立第一临时中学（简称临中）。长高和省长女中合并为临中高中部；长高的师范部和第一师范合并为临中师范部。师范部和临中校本部在桥头河，高中部在七星街，相距10公里。高中部有四所房屋，即欧阳宗祠、三槐第、星罗寺和师俭园。师俭园为女生宿舍。我们长高普36班改称临中高中部第11班，先住欧阳祠，后住三槐第。1941年春，临中撤销，高中部改称省立第一中学，我们班改称一中第一班。

时值抗日战争初期，学校里弥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例如我们常说的 I am sorry that I have only one body to save our country（我很遗憾，我只有一个身体去拯救我们的祖国）。又如李肖聃先生曾拄着拐杖在教室门口天井边朗诵他的一首诗，其中“横刀且待磨”，“壮士莫悲歌”等句，豪迈悲壮，感人肺腑。再如军训教官，山东人，刚从台儿庄战场负伤下来。他题岳飞庙的对联云：“我若奉命出师，大敌当前，十二金牌诏不转；公果精忠报国，权奸在位，三千铁甲杀回来。”其抗日思想，溢于言表。

学校里民主空气很浓厚。有中共地下组织（不久被破坏），还有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等。我们的口号是“有理服从，无理反对”。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无疑是正确的。

临中校长熊梦飞，宁乡人。一次，他在纪念周会上，自诩“五四”健将，现有弟子三千。接着便是那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谬论。因此，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同学们继嘘声之后，走了大半。（据另有一中校友回忆，历史教员钟月秋驳斥他说：“还有熊梦飞其人，每演说必称‘五四’，五四运动的队伍里，我就未看见他，烧赵家楼的是谁？你们知道吗？就是本校高七班匡介人的父亲匡互生。”同学大力鼓掌。）

比我们高一个班级的童知新同学以所谓中共嫌疑被开除学籍，悬牌于欧阳祠。他那个班级的同学对学校当局迫害进步同学的行为非常愤慨。于是，整队而来，将布告牌取下，一脚踩成两块，两脚踩成四截，整队而去。童知新同学虽然被开除了，但他和他那班级打布告牌的行动，得到了高中全体同学的称赞。学校当局害怕激成学潮，只好不了了之。

这是我入校前上半年的事。学校军训主任教官动辄以蒋介石的训词训人，灌输反动思想和散布对抗战的悲观情绪。同学们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他驱逐离校。有一天开饭时，食堂门口张贴了一篇《欢送×主任上前线杀敌》的四六文章。文中说×主任教官为了抗日救亡，多次请缨杀敌（其实他从来没有请缨杀敌的事），同学们闻之，莫不感奋，特致欢送之辞，预祝旗开得胜，建立丰功云云。这篇皇皇大文，红笔浓圈密点，读来音韵铿锵（李肖聃先生修改过）。当这位主任教官来到食堂门口时，鞭炮齐鸣，同学们热烈鼓掌。这位主任教官十分尴尬。结果，假戏真唱，他只好卷起铺盖走路。

1940年秋，九战区长官部的军训处杨处长随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等到蓝田、桥头河、七星街等地的中学视察。蓝田同学传来信息，杨处长很坏，对进步同学以各种借口开除学籍。大麓中学就被开除了好几名。我们班义愤填膺，乃做好准备，待杨处长来时，要给予报复。杨处长很刁滑，到桥头河后，竟没跟朱经农到七星街来。我们向朱经农提出要求，坚请杨处长来“训话”。朱经农不得已，通知杨处长来了。这一天，我们领了教练枪，在三槐第操场集合，队列非常整齐，等待着领头同学的号令，将有所行动。可是，杨处长在队列前低着头急匆匆一晃而过，口里一迭连声：“同学们好！好！”这使得我们竟来不及“表示”，他就走过了操场，随即溜回桥头河去了，真有点儿“丧家犬”的味道。

湖南是很闭塞的。在何键长期统治下，提倡四维八德，尊孔读经，以禁锢人们思想。抗日战争初期，张治中虽略显开放，但在蒋介石片面抗战的总方针下，人们依旧“万马齐喑”，生机深受压抑。那时，日本侵略军横行无阻，仅一年零三个月，就侵占了平、津、京、沪、广州、武汉，侵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长沙“文夕大火”，我们在宁乡看见红了半边天。因此，原本读书风气浓厚的学校也有不少同学不想读书了。“要当亡国奴了，读书还有何用?”于是，学校里罢课、罢考的事不断发生。也有同学提出所谓吃饭早到（饿了），上课迟到（形势使然），开会不到（不满现实）的“三到主义”。这充分反映了那时同学们烽烟怅望，歧路迷茫的心情。

七星街有条小河叫虎溪；溪侧有山叫凤翔山。虎跃凤翔，山水掩映。溪上有桥，桥下流水清清。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那国事蜩螗，日军深入

的形势下，哪有心情欣赏这水光山色？此情此景，颇多新亭对泣之叹。1939年，我们为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而置国家存危于不顾的落后倾向，起而罢考。高中全体同学便都到虎溪桥去了。三五成群，或行或坐，神情悒郁，心境悲凉。

1941年上半年，我们毕业班同学吴显祺写了首毕业歌，周亮枝先生谱曲。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同学保存了它。谭靖夷说，50年前，我们的歌声飘扬在虎溪上空。曲终时，同学们涕泗滂沱，至今不能忘怀。歌词录以存史：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原野，刀光剑影闪辉着五大洲，惊涛骇浪，沧海横流。同学们啊！我们在这大时代中分手，凤林山前，虎溪桥畔，尘梦般的往事，历历在心头。白日堂堂，光阴一去不复返，人生应珍惜这一寸一分。祖国的自由解放，人类的幸福安宁，都是我们肩头的重任。今朝依依离去，明日长亭短亭，休眷恋，莫因循，要努力，万里前程。别了，别了！珍重，珍重！

中药店称“堂”起源于长沙

刘名果

中药店称“堂”者，何其多也。长沙市有劳九芝堂、李四怡堂、宏济堂等，在北京有“同仁堂”、宁波有“叶老仁寿堂”、沈阳有“天益堂”、贵阳有“同济堂”，可谓遍布南北东西。

中药店称“堂”，缘于“坐堂医生”之称，而最早称“堂”者首推长沙。其中有令人敬仰的历史典故。相传东汉献帝建安中期，张仲景在长沙任太守时，长沙连年疫情流行，死人甚多，为拯救百姓，时称“经方大师”的张仲景，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坐堂医生”四字为病人诊脉处方，并以此来藐视功名、爱护民众。他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坐在公堂上，大开衙门，让民众就医。后来，为效法张太守的医德医风，许多中医师在药店门前悬挂招牌，坐堂应诊，并就此沿袭称“坐堂医生”，中药店的牌号也多称为“堂”。可见，中药店称“堂”起源于长沙。

长沙的坐堂行医方式，从东汉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那时，较著名者有张海青坐堂登隆街宏济堂药铺，钱岫东坐堂南正街李四怡堂药店，言庚孚坐堂湘春街同和药铺。改革开放以来，坐堂行医的方式又重新出现在长沙一些中药堂（店），雇请名老中医坐堂，医生看病兼咨询，一心为病人，病人看病买药两方便，药店生意也兴隆起来。

从《铜官感旧图》题记看曾国藩的投水

石沉

1853年（清咸丰三年）1月曾国藩开始帮办湖南团练，为他参加镇压太平天国之始。次年，他率领的“湘军”已逐渐扩大，成为了一支内战劲旅，但到了这年的5月，在长沙靖港一战，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全军覆灭，作为主帅的曾国藩仅以身免。这一大事在正史上有记载，在野史演义上有描写，但大都或语焉不详，或描摹想象。我从章价人《铜官感旧图序》和左宗棠《铜官感旧图记》以及王闿运（湘绮）的《题铜官感旧图》七言古诗中看到了一些当时人所见所闻，足补遗阙。

《铜官感旧图》是曾国藩死后，由长沙人章华（字曼仙）出资请当时画家绘制的一张曾国藩在1854年靖港之战的图画。章华是1895年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是清王朝最末一科的“人才”了。他为什么要请人画这图呢？那是因为当年从长沙铜官的浅水里捞出曾国藩的就是他的父亲章价人。价人字寿辉、举人，与桂阳陈士杰、湘阴左宗棠、平江李元度同为曾国藩的幕僚。那年旧历四月，太平军分兵三路由武昌出发，羊楼司一战，击败清军，向长沙进发，势如摧枯拉朽。曾国藩的后方是湘潭，他率领了少数部队在靖港正面扰击，陷入太平军重围。“轴轳千里，旌旗蔽空”，曾国藩见大势已去，怕被俘，就投水了。章价人住在后舱，听到扑通一声，知道有变，赶忙跳入水中，将曾国藩捞起。章价人在《图序》中说：“策公败必死，因潜随公出，居公舟尾，而公不知，至是掖公登小舟逸而免。”

曾国藩被救起后，怒骂章价人救他。章价人扯了一个谎说，湘潭一战，我军战胜了，这时曾国藩才吐了一口气。章价人当时并不知道湘潭战事，不料太平军左翼由宁乡攻湘潭一支失利，从正面攻靖港长沙的一支也就退却了。

《铜官感旧图》画成后，左宗棠作记说：“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反属，所著单襦，沾污泥沙痕迹犹在，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检点而已。”

章价人在《图序》中还不敢直说曾国藩投水事，左宗棠就说得更清楚了。曾国藩是四月初一晚半夜投水的，左宗棠是初二凌晨“缒城出”，曾国藩淹得半死，仅穿一件沾污泥沙的单衣不能说话。

至于王闿运的《题诗》则更妙了。他叙述这一段说：“省城无兵无守卫，却付曾家作孤注。空船坐拥木关防（按：曾国藩当时不是正规军，所以只能用一颗木刻的官印）。兵谋军势盗不讲（这是说太平军由岳阳直下），上屯湘潭下靖港，两头挥手擒釜兵（指曾国藩扼守靖港的部队。釜兵，在锅底的军队），十日淘河得枯蚌（太平军由三月下旬出征，约十天即重重围困长沙）。刘郭苍黄各顾家，左生狂笑骂‘猪耶’（其实骂‘猪耶’就是左记中说的‘责公速死非义’，翻成口头语即是‘你真是一只猪呀’）。彭陈李生皆愿死，四围密密张罗网……我方高枕城东庐，平明丁叟踢门入，报败遥闻一军泣，督师只欲从湘累……”

刘蓉，字霞仙，郭，即郭嵩焘，当时都是曾国藩的好友，太平军围长沙时，他们跑了。左生是指左宗棠。彭指彭玉麟，陈指陈士杰，李指李元度，当时都在靖港军中。诗中说：作者当时在长沙城中。东庐即今日长沙市学宫街口，作者曾筑楼于此（因在河东，故称东庐），四月初一清早，丁叟（左宗棠的大儿子）跑来报告，说曾国藩投河了。这首叙事诗真是妙得很，把曾国藩战败投河的事写得淋漓尽致了。

当年，左宗棠“缒城出”，见了曾国藩那熊样子，大骂“猪耶”！

王闿运的这首诗没有收在《湘绮楼诗集》中，大约是因为曾国藩的名气太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这件事的具体描写，就鲜为近人所知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王闿运、郭嵩焘都是好友亲戚，但他们又矛盾重重。左宗棠评论这件事说：“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荡平东南遂无望后起者乎?”人们认为这句话中的“后起者”是左宗棠“夫子自道”，我认为是符合辩证之理的。

《铜官感旧图》为一巨册，图之后是120多人的题跋。原册大约已由约农先生携往台湾，我见到的是章价人之长子章同于1909年（宣统元年）的柯罗版影印本，这影印本在国内也极为罕见了。

欢迎您到苗家做客

裘 桂

只要您进入苗乡山寨，热情好客的苗家人便视您为贵宾。年逾花甲的老大爷会双手捧着那又长又亮的金竹烟杆递到您面前，请您抽上一锅浓浓的土烟；青年小伙子会斟上香喷喷的高粱酒，同您尽情地干上几碗；姑娘大嫂们会端来香甜可口的油茶，请您吃上四大碗方肯罢休……可是，作为一个苗家客人也得注意，不可犯了苗家的规矩。那么，到苗家做客，要注意哪些规矩呢？

行 走

苗家人是十分讲礼貌的，凡事以礼待人。同客人走在一起，必须让客人先行，即使是年迈的苗家老爹也是如此。与人路遇，要先停步让于路边，从对方的一侧绕行而过。如在本寨区域内遇见客人，不论生熟，要说一声“您来啦”，“进屋坐”等打招呼的话。若是遇见出寨的客人，不分亲疏，都必须以主人的身份挽留。进入寨门以后，客人必须主动让主人先行，这时主人也会主动走在前面带路，表示欢迎客人。

进屋后，未经主人允许，不要随便进卧室，特别是女性的房间。

言 谈

苗家有一句格言：“唱歌无大小，讲话有高低。”意思是男女青年唱情歌可以不避长辈，但绝不可在长辈跟前嬉笑戏谑。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严格注意辈分。辈分是不论年龄的，即使是孩童，只要他辈分大，也必须尊重，不可无视。日常生活用语，也有许多讲究，如睡觉苗语叫“乜”，但在喜庆节日或对客人来说，就必须说成“瓦埚”，含有祝贺之意。苗家很注重对人的称呼，对年长的男女老人，可呼为“同年爹”、“同年娘”。男客人对平辈的男者，只要年龄相仿，可称“同年”、“老庚”；对同辈的女者，可称“同年嫂”、“同年妹”。苗家最喜欢这种“同年亲”，他们在山歌中唱道，“除了锦鸡无好鸟，除了同年无好亲”，同年才是至爱亲朋。男人对女子的称呼要特别

注意，年轻的男子切不可直呼姑娘为“妹妹”，而应称做“同年妹”或“表妹”，因为“妹妹”是苗家的特殊爱称，一般只用于夫妻之间。还要注意，同辈人只呼名而不呼姓，表示亲切和尊重；对长辈或老人，姓和名皆不能呼，只能呼以辈称。

就　坐

到苗家做客，就座的方式也是很讲究的。当你进入茶堂（伙房）时，主人便热情的招呼你坐下。客人应当坐什么地方为宜呢？一般来说，苗家的茶堂都以火塘为方位，年长的人坐上方，左侧坐男主、客，右侧坐女主、客，下方为未成年的孩童座位。倘若不按这个规矩就座，男人坐到女人的位置上去，会受到别人嘲笑；女人坐到男人位置上去，会被视为你不懂礼节。苗家伙房的矮木凳是靠墙放的，你如要起身走动，必须从别人前边走过，因此你应当招呼一声“对不起，从你前边过了”。酒席上的座位也须按辈分，同席的长者、贵宾坐首位（俗称上席），席左为大，席右为小，下端次之。如果坐错了，会导致不欢而散。

吃　喝

来到苗家坐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吃油茶。油茶是一种用糯米、玉米、花生、黄豆等加工油炸之后，以油炒的茶叶加水煮沸，再冲泡上述食物而制成的一种香酥可口的饮食。主人用红漆茶盘端着香喷喷、热腾腾的油茶，恭恭敬敬送到客人面前，这时客人务必起身用双手接其中一碗。吃完这一碗后，切勿将碗送还橱灶，须等主人用茶盘来接，否则主人会误认为你不乐意或嫌她做的油茶不好吃。主人接碗时，每个客人的碗所放的位置是绝不会搞混的，苗家姑娘大嫂在这方面有惊人的记忆力，即使客人众多的场合，她们端送油茶总是“碗归原主”。如果客人觉得实在吃得太饱，或不习惯吃，可以向主人说明原因，但不要说油茶不好吃之类的话。如果主人同意你的要求，则只用一只手来接碗，如仍用茶盘来接，那便表示让你继续吃完四碗方肯罢休。吃完油茶，主人会端来一杯清水或淡茶，这是用来漱口的，倘若你把它喝了，就会闹出笑话。苗家有好客的风尚，一家有客，众家来请。每次吃油茶时，隔壁邻居也做好油茶端来敬客。这时，客人即使吃得太饱，也必须再吃一碗，以示领情。宴席上，主人斟酒时，客人必须起身双手接杯，主人举杯邀请时方可喝酒。吃菜也同样，主人给客人一一夹菜，然后自己再吃。客人推让，主人会以为讲客气，总是让你吃下去。有时主人把菜挟起，猛然放到你的饭碗里搅拌几下，表示让你一定要吃掉。更有甚者，主人有时会挟起一块肉，在你鼻子下边一捋，这样

一块肉，客人无论如何是要吃下去的。

苗家人是通情达理的。倘若远道而来却又不知苗乡习俗的客人，他们会热情指点，不会处处计较的。请您不必顾虑，苗家人会礼貌、热情地欢迎您到苗家做客。

八指头陀诗翰

王启初

1899年农历正月，37岁的齐白石，拿了自己做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和刻的印送请著名学者、文学家王闿运（湘绮）评阅。湘绮先生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绮先生说的寄禅，就是指的近代高僧八指头陀。其生平详见戒圆法师所撰传略。

寄禅刻苦自学，熟读《唐诗三百首》。赋诗时，如一字不惬，则寝食俱废。35岁后，诗名大振。他一生赋诗近2000余首，为文若干篇。有《嚼梅吟》、《白梅吟》、《八指头陀诗集》、《八指头陀文集》等行世。是我国近代一位成就突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著名爱国诗僧之一。著名学者杨树达教授曾说："敬安虽身在佛门，而心萦家国。"他的不少诗歌都是具有爱国思想、感情充沛，而且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作品。

当寄禅精研了唐、宋人诗后，有人问他唐、宋诗两者有何分别？他毫不含糊地答道："唐人诗纯，宋人诗薄；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然，宋诗费力；唐人缜密，宋人疏漏；唐诗铿锵，宋诗散漫；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两者风格对比，剖析生动、翔实。寥寥数语，将唐、宋诗概括得淋漓尽致，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之战，中国失利，在他的一些诗作中强烈反映出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讴歌抗敌战士的英勇顽强。如《和张子虞》诗有句云："……坐惜芙蓉萎，常忧天柱折（芙蓉、天柱皆峰名）。幸瞻岳祀全，遑知障海溢。甘受达人嗤，永贻来者逸。终为庐阜云，耻作王城乞。……"《感事一首酬衡阳令朱太史益浚》句云："……氛埃晦宇宙，腥膻乱华夷。鸱枭苟得势，凤凰无宁栖。大鹏在其侧，敛翅犹徘徊。忍见百鸟王，坐受微禽欺。……长鲸犯波来，吞食靡有遗。夜叉服神力，稽首遥皈依。修罗亦恐怖，窜入藕孔丝。海氛既已净，天宇方澄辉。"《感时》词云："凤凰巢欲坠，燕雀幕何安？燃眉时已急，不容闲。一棋错下，竟输了通盘。笑群公衮衮，颠倒乾坤，乞儿扮作神仙。念长林没个鸣蝉，赤手欲擎天！乱星环北斗，夜钟残，鲁连今日蹈海亦云难。故国重回首，夕阳影里，只留一角青山。"

1901年，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他痛心疾首，在其一系列诗词中，流露了他的愤懑和爱国情操。如《题魏春阶司马看剑图》云："长鲸吸海波澜枯，神龙徙宅遗其珠。大千腥垢无净区，人天陨泣宗社芜。昭陵魏侯烈丈夫，古之任侠今则无。赤手欲将天柱扶，龙泉三尺随身俱。酒酣看剑长叹吁，国仇那敢忘须臾！青天朗朗明月孤，行矣努力毋踟蹰。歼除毒虺斩丰狐，妖魅闪尸伏其辜，血腥荡涤剑不污。功成皈依佛之徒，老僧待子蒲团蒲。"《寄遁叟》句云："哀时余涕泪，辟世有须眉。安得随吟杖，青山掇紫芝。"《日本冈千仞寄次甲申夏同游天童玲珑岩韵见怀并所著<观光纪游>感叠原韵》有句云："……中日本来唇齿国，掣鲸休使海波生。"《梅花岭谒史阁部墓》云："荒草萋萋掩墓门，杜鹃啼断月黄昏。欲知亡国当年恨，万树梅花是泪痕。"

上述诗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寄禅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格调清新而又深沉悲壮，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八指头陀从一个半文盲，终以"磨杵成针"、"磨砖作镜"的刻苦自学精神，成为我国近代诗坛上一个著名的诗人，的确难能可贵。他的卓越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外，当然也和与他过从密切的师友郭嵩焘、王湘绮、郭菊荪、樊樊山、陈三立、易实甫、王益吾、吴大澂、章太炎、陈衡恪、熊希龄等人的帮助、指导和切磋琢磨分不开的。

八指头陀工诗能画，但拙于书。自谓"余口多期艾，手拙拈毫犹倒薤"。成名以后，慕其名而求其诗翰者日众。他虽以书为苦，但又无不强书以报友朋雅愿。他曾有《自笑》诗云："寒岩枯木一头陀，结习无如文字何？自笑强书尘世字，却嗔仓颉误人多。"又《胡梓芳自金陵寄纸索书旧作，戏书一绝句于后》云："千里迢迢索我书，我书之拙世间无。折钗倒薤俱难拟，臆造宁为仓颉愚。"从这些诗里，显然可见寄禅拙于书而苦于书的思想感情。

他的挚友著名书家王翌钧（运长），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索求其诗翰。1900年庚子四月王翌钧出纸索书，寄禅书五首七言律诗；同年新秋王翌钧又出纸索以诗翰，寄禅乃书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各五首；1901年辛丑，王翌钧去浙履任，又出纸索其诗墨，寄禅乃书七律送行，前二纸以中、小楷书成，而第三纸系以大楷书之。此三纸每纸横约四或五尺，纵约六至八寸。三纸合装一长卷，是时湘中名士在此卷题跋者甚众。

《诗集》自述中有："酡仙书法名一时，出纸强余为书，笔画错落，左右易位，如倒薤然。每宴会，酡仙以悬之中堂，诸客观者，无不绝倒也！"寄禅虽

不善书，而书为人爱重，此固品高望重所致。

八指头陀书《辛丑十月翌钧道兄之官浙江诗以送之》诗墨，乃51岁时所书。幅中所书“胜、台、天、青、云、江、雪、泛、陪”诸字，细观具有颜体笔意，其笔力于圆厚中见锋利，结体于紧严中见开扩。予人以丰伟遒劲，雄透独出之感；再看幅中所书“莱、于、亦、钱、水、梅、公、道、人”诸字，又具柳体略兼欧字笔意，这些字用笔方圆俱见，意态精密俊逸，清朗瘦硬，柔中见刚而又爽劲。据此推断，八指头陀在书学上还是下过一番工夫的。颜、柳、欧诸楷皆摹，故其传世遗墨只见楷法。遗墨奇拙，而无俗气，别具风采，人称“娃儿体”。人讥其书拙口吃，寄禅乃曰：“字不欲工，略有写意；语不欲明，略有话意。”此后竟无人难之。

他曾为两江总督端方《题石鼓文拓本》五律诗云：“衡山吾旧住，曾陟岣嵝巅。蝌蚪照赤石，鸾凤翔苍烟。斯文纪方叔，神武歌周宣。愿公匡圣主，再颂中兴年。”从而可知八指头陀对碑版亦曾涉猎。

了空居士子宽当八指头陀圆寂20周年之际，曾赋七律诗以纪念：“外侮兵燹蓦地惊，降魔曾假以诗鸣。仁王护国经犹在，毅魄生天恨未平（日韩合并，曾作感事二十绝句，忠肝义胆，跃然纸上）。剩欲救时僧祗劫，故教示寂涅槃城。再传衣钵容瞻仰，巍巍灵光不可名。”

湖南竞技体育的一则往事

伏笑雨

1930年，国民政府在杭州举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湖南组织了由黄凤岐、曾福盛率领的50余人代表团参赛。这是一次勇敢的出击，“湖南”的旗帜将高高飘扬在山水如画的西子湖畔。

会期自4月1日至10日共计10天。我们如期前一天抵杭。春天的杭州，绿柳垂肩，杨花漫舞，湖光山色，绚丽多姿，迷人欲醉。我们几十个初出茅庐、花季年华小子，真正走上了天堂，沉浸在温馨妩媚的春光里，尽情尽兴地玩了一天。

4月1日举行开幕式后，比赛开始。我是以篮球和撑杆跳高参赛的。湖南的篮球队碰上了天津的南开队。上场的队员是熊舒果、李梦庚、伏源、丁子葵、周怒安、李必信等。南开队员是大学生，我们都在中学肄业（当时体育运动仅在学校进行），不仅年龄有差，身高也矮了一截，何况南开的牟作云、唐宝堃等都是全国高手，被称为“南开五虎”呢！一场比赛下来，比分相差之巨，恐怕是世界篮球史上之最吧。全场完毕，我们投入一个球，他们把76个球送进了篮圈，战后计分为2：152，相差150分。在场上我们无法控球，只见他们将圆圆的皮球传来传去，我们摸不到球边，当时的行话称之为“摸风”。南开五虎中投篮命中率以唐宝堃（已故）为最高，与我们弱队对场，他更从容不迫，几乎每投必中，大有今日美国乔丹之风；牟作云身高体壮，是该队的核心，不久前他还在领导新中国的篮球事业，当年湖南与南开的一场对抗，不知他还能记忆否？

湖南代表队这次没有“吃鸭蛋”，还应归功于一位周南女校的杰出女生杨仁，她掷铁球获得第二名。按当时计分规则：冠军记5分，亚军记3分，季军记2分，殿军记1分。她是亚军，应记3分，给湖南增了光，我们个个高兴，尊称她为“三分人才”，以喻其人，一以壮其功。杨仁在湖南体育史上确是风云人物。后来她曾组织女子篮球赴东瀛击败日本女队，载誉而归，谱写了湖南体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看看当时湖南体育的败落和今天在悉尼奥运会上连夺七金的兴盛情况，真不可同日而语了。